MY PROMISED LAND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Israel

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

【以】阿里·沙维特 (Ari Shavit)- 著 | 简扬 - 译

我的应许之地

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

从奴役走向解放，从软弱走向强大

从浩劫走向复兴，一部犹太民族的复国史！

入选《经济学人》《纽约时报书评》年度最佳图书

版权信息

书名: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

作者:阿里·沙维特

ISBN:97875086479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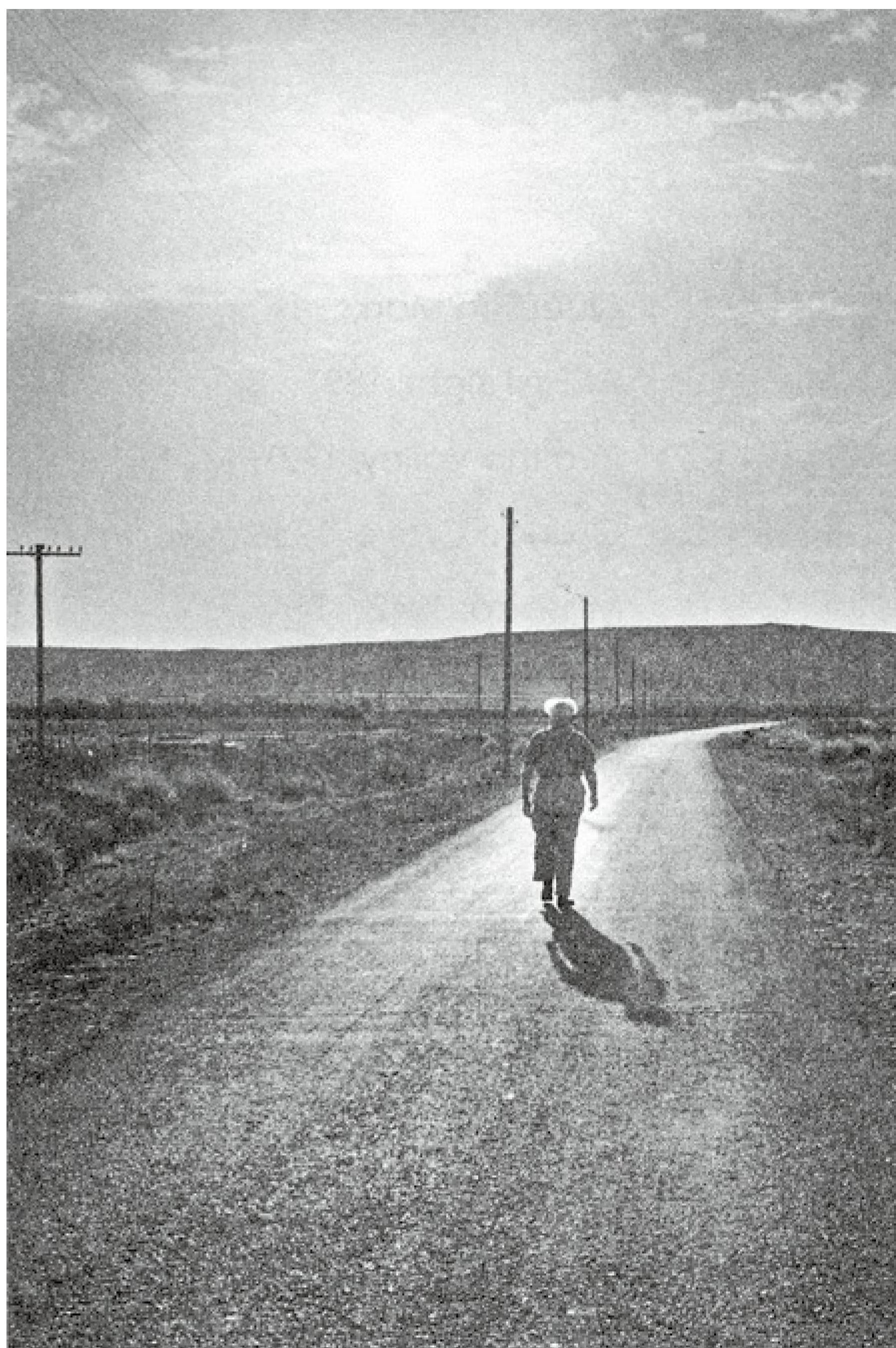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题记

献给我的挚爱，汀娜



赫伯特・本特威奇的路线
阿里・沙维特的路线
Lebanon
Mount Hermon
Banias
Syria
Mediterranean Sea
Nahariya
Safed
Rosh Pina
Capernaum
Sea of Galilee
Haifa
Horns of Hittin
Tiberias
Nazareth
Degania
Mount Tabor
Valley of Yizrael
Ein Harod
Valley of Dotan
Jenin
Jordan River
Nablus
Tel Aviv
Jaffa
Mikveh Yisrael
Shilo
Mount Baal Hazor
Rishon LeZion
Lydda
Beit El
Ofra
Ramleh
Rehovot
Hulda
Jerusalem
Jordan
Old Jaffa-Jerusalem railway
Bethlehem
Israel
Dead Sea
Gaza Strip
Gaza
Hebron
Masada
Dimona
Egypt
0 10 20 miles
0 10 20 kilometers



引言
疑

从我记事之始，我就知晓了恐惧，那种真切的恐惧。我生长于以色列。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以色列，是一块富有活力的希望之地。然而，我总觉得，在那时的家乡，在富人们豪华的宅邸和漂亮的草坪之上，似有暗波汹涌。我恐惧着，总有一天，这汹涌的暗涛会吞噬掉我们所有人，就像神话中的大海啸一样，摧毁海岸，将以色列一扫而空。也许，以色列会成为另一个亚特兰蒂斯，迷失在海洋的最深处。

1967年6月的一个早晨，我那时9岁，跑到父亲跟前—他当时正在盥洗室剃胡子—询问他那些阿拉伯人会不会赢？阿拉伯人会占领以色列吗？他们真的会把我们一个个全都扔进海里？而就在几天后，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

1973年10月，灾难哭号着揭开序幕。在静谧的赎罪日下午，我感冒卧床；与此同时，F–4战斗机轰鸣着撕裂天空。他们从我家屋顶500英尺高的上空飞过，前往苏伊士运河拦截突袭以色列的埃及军队。很多飞机再也没有回来。当西奈沙漠及戈兰高地防线崩溃的消息传来，16岁的我目瞪口呆。在那十天里，我陷入极大的惶恐之中。看起来，我最初的忧虑变成现实—以色列的危亡就在旦夕之间，第三圣殿的石墙摇摇欲坠。

1991年1月，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伊拉克向特拉维夫市发射了“飞毛腿”导弹，又有传言，我们可能会遭到化学武器袭击。于是，一连几周，以色列人无论去哪儿都随身携带自己的防毒面具包；偶尔有防空警报拉响，我们便立马戴上面具躲进防空洞里。虽然传闻中的化学袭击并没有发生，但是，每天重复着这种荒诞的、离奇的仪式，令人毛骨悚然

的恐惧如疽附骨。我曾那样细致地聆听空袭警报，数算它的每一个音阶，也曾那样惶然地望向我深爱的人们，望向从德制面具中透出的、一双双惊恐万状的眼眸。

2002年3月，一系列的恐怖袭击震撼着以色列。来自巴勒斯坦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者攻击着公共巴士、夜总会、大商场，数以百计的以色列平民因此丧生。一天晚上，我正在撰写有关耶路撒冷的文章，突然，传来一声近在咫尺的、巨大的爆炸声，就在附近的酒吧！我一把抓过速记簿跑上街道。然后，我看到三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坐在酒吧里—他们已经死去，面前的啤酒杯还是半满；我看到一个娇小的女子躺在拐角，年轻的脸庞泛着死灰，失去了生命迹象；我看到更多受伤的人在尖叫，耳边是他们无助的哭号。就在这灯光灿烂的夜晚，在被炸得粉碎的街边酒吧，我环顾四周，看到自己身处人间炼狱。作为一个专栏撰稿人，我经常被问到这些问题—以色列的未来在哪里？这令人发疯的现状，我们还要忍受多久？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以色列人享有盛誉的生命力，会屈服于企图灭亡我们的暴力？

1967年的“六日战争”，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胜利驱散了我们的战前恐惧。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复苏，医治着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深深伤痕；90年代的和平进程修复着1991年的海湾创伤；新世纪的繁荣掩盖了2002年的恐怖。恰恰因为一直以来的前途未卜，以色列人无比坚信着自己，坚信以色列的民族与国家，坚信着未来。然而，这些年来，笼罩在我心头的那层淡淡的恐惧始终未曾远离。谈论，或者显示这种惧怕成了一种禁忌，但是，它确实在那里，无论我身往何处，它如影随形。我们的城市就像建在流沙之上，我们的住宅从来不曾坚固。尽管，我们的国家逐渐变得强大、富庶，我依然忧虑地感到—它脆弱无比。我意识到，我们显露多少力量，就会面临多大威胁。是的，我们的生活仍然是充实而富足的，我们奋发图强并享受快乐。以色列建立的安全感来自它在物理、经济、军事方面取得的成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及活力。然而，我总是恐惧着，有一天这样的生活

会倏然冻结—就如火山灰下的庞贝城一样。以色列，我挚爱的家乡，一旦数量庞大、装备精良的阿拉伯或伊斯兰军团突破它的防御，我的以色列将不复存在，湮没于史海。

从我记事之始，我就知晓了占领。就在9岁的我问父亲阿拉伯人会不会打败以色列的一周之后，以色列就攻占了阿拉伯人口稠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一个月后，我与哥哥跟随父母踏上第一次家庭迁徙之旅—我们将前往新占领区的拉马拉、伯利恒和希伯伦。我们所到之处，尽是燃烧着的约旦吉普、卡车、军用战车，投降的白旗在房屋上空飘荡，街道上以色列的坦克碾过豪华的奔驰车以及车里烧焦的尸体。那些与我同龄，或比我还小的巴勒斯坦孩童，清澈的眼睛里笼罩着无尽的恐惧，他们的父母则是一脸悲痛屈辱的表情。不过短短几周，强大的阿拉伯人变成了受害者，而险遭灭国的以色列人成了征服者。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胜利了，它骄傲而又得意地陷入狂欢，深深陶醉于自己强大的力量之中。

当我还年少时，我觉得一切并不坏。大家普遍认为，所谓的军事占领还算仁慈。现代化的以色列为巴勒斯坦占领区带来了进步和繁荣，我们落后的邻居开始享有电力、自来水及医疗服务—这是他们之前从未有过的。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生活从未这样好过，并且感恩我们赐予他们的一切。当迎来真正的和平时，我们会归还大部分占领的土地。就目前而言，在以色列的国土上，一切都很好—全国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和平共处，享受平静和富足。

直到我成为一名士兵，我才意识到，我错了。加入以色列国防军精锐伞兵部队6个月之后，我被派往占领区的市镇。10年前，我曾在那些地方度过了童年时光，而现在，我被分配做一些不怎么光彩的苦活儿：驻守检查站，以及软禁、暴力驱散游行示威的人群。最打击我的，就是闯入民宅，把年轻男人从温暖的被窝里拽出来，进行毫无人道的午夜审讯。我不禁自问：这算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保卫祖国的方式是欺凌平

民、剥夺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为什么我的祖国以色列要占领和压迫另一个民族？

所以，我成了反战运动的一分子。从一名年轻的激进分子到一个专栏作家，我用激情对抗着暴力征服。20世纪80年代，我反对在巴勒斯坦占领区建立犹太人定居点，90年代，我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的巴勒斯坦建国运动，21世纪初，我支持以色列单方面从加沙地带撤军。但是，几乎我参与的所有反战运动最后都失败了。现在，距我们第一次家庭迁徙已有将近半个世纪，西岸地区依旧被占领着。更糟糕的是，“占领”已经成为这个犹太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以色列人，它同样也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我反对军事占领，却仍然要为此负责，因为，我不能否认或者逃避这个事实：我的国家以色列，已经成为一个侵略他国的国家。

直到几年前，我才突然领悟，我对国家未来的深切恐惧与我对国家占领政策的道德义愤密切相关。一方面，以色列是唯一一个实施占领政策的西方国家；另一方面，以色列又是唯一一个切实受到威胁的西方国家。占领和威胁的双重作用使以色列那样独特，以至于成为这个国家的两大支柱。

很多观察员和评论家否认这种二元性，左派关注占领而忽略威胁，而右派恰恰相反。但是，事实真相是，如果不把这两个要素纳入同一个世界观体系下考察，就不能真正理解以色列，或者理解巴以冲突。任何不注重紧密联系二要素的思潮及观点，势必流于缺陷和无用。只有第三种途径—将占领和威胁内在化，才是切合实际并符合道德规范的，才能帮助以色列步入正轨。

1957年，我出生于雷霍沃特市的大学城。我的父亲是一位科学家，母亲是一名艺术家，我的祖先们不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像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我在18岁应征入伍，成为一名伞兵。服役期满后，我进入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修习哲学，就是在那儿，我投身和平运

动，以及后来的人权运动。自1995年开始，我为以色列自由派的主要媒体之一《国土报》撰写文章。尽管我总是站在支持和平、支持“二国方案”的立场，但是，我逐渐意识到和平运动的缺陷和偏见。我对“占领”和“威胁”的理解使我的声音不同于那些主流媒体的观点。在我的专栏里，我同时挑战着左翼势力与右翼势力。我已经认识到，在中东问题上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正如没有解决巴以冲突的捷径一样，以色列的情况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甚至可以说是悲哀的。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以色列的表现可圈可点—她有效遏制了恐怖主义活动，高速发展尖端科技，令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欣欣向荣。她的经济强势如猛虎，向全世界展示着一个生机勃勃、富于创新的强国形象，并享受着这一切。然而，在这非凡成功的光环之下，一种焦虑正在默默地酝酿、发酵。以色列人开始大声地提出质疑—这些问题也是我这一生中不停扪心自问的问题。这不再是简单的左翼与右翼的区分，或者世俗与宗教的对抗。我们正在触及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很多以色列人为新以色列的复兴感到不安，他们怀疑自己是否还属于一个犹太国家，甚至怀疑以色列的前途。于是，有人申办了外国护照，有人送子女出国留学，社会精英们也开始留意除以色列之外的其他选择。尽管，大多数以色列人仍然热爱他们的国家、赞美她的福祉，但是，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对以色列未来的坚定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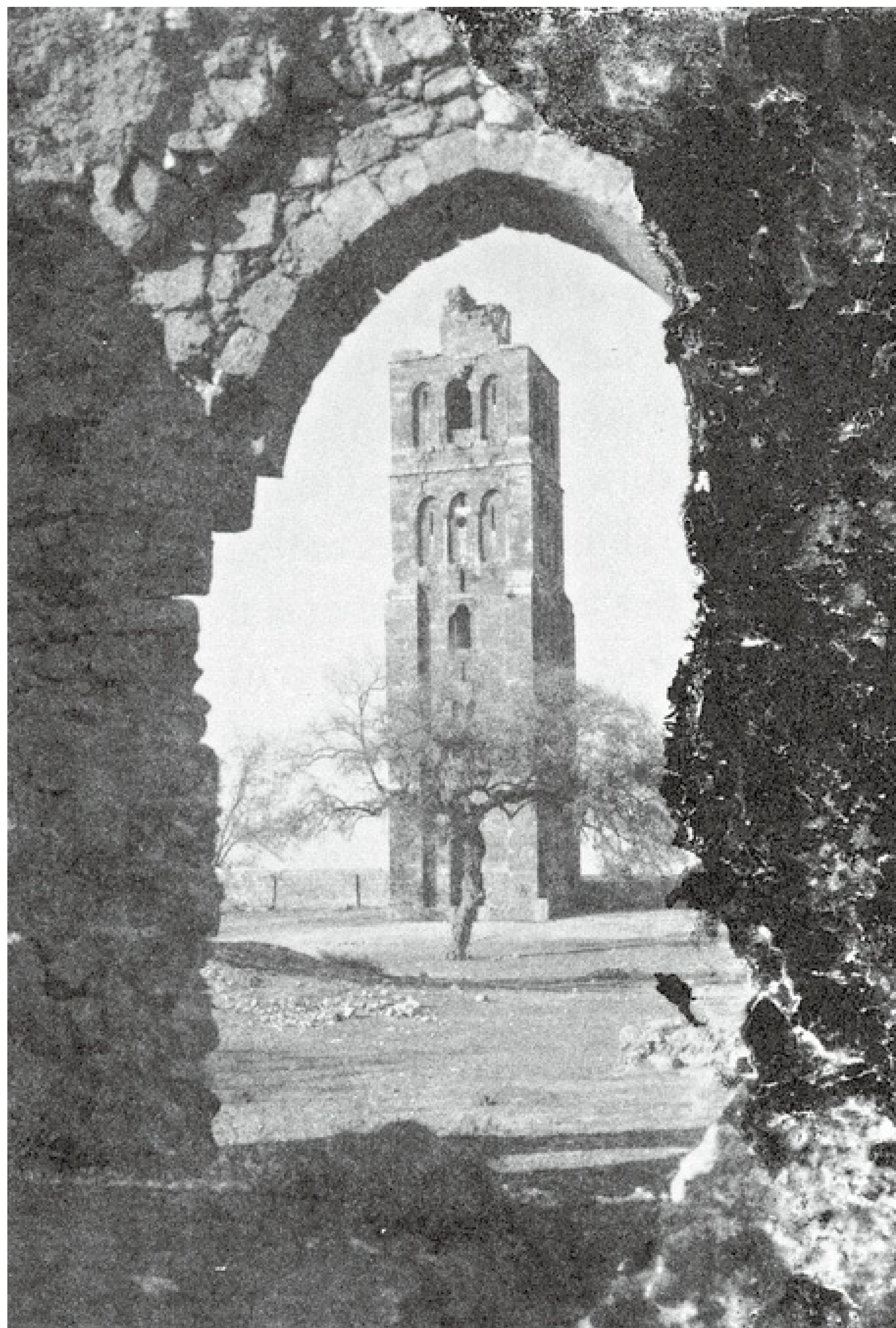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贪婪的以色列已被五大隐忧的重重阴影所笼罩：巴以冲突在可预见的未来并不能止息；以色列的区域霸权战略正在经受挑战；犹太国家的合法性遭到削弱；深度变革的以色列社会越发两极分化，自由民族的根基摇摇欲坠；调控不力的以色列政府不足以妥善应对诸如军事占领、社会分化之类的严峻挑战。五大隐忧之中，每一个都意味着重大威胁，而它们的合力更引人注目。以色列的战略优势濒临消失，以色列的合法性日渐凋零，以色列的民主旗帜逐渐破裂，以色列的社会矛盾使民众渐行渐远。如果现在不能实现和平，以色列该如何承受又一个长达整整一代的世纪之战？尽管，以色列仍然保持

着创新、魅力与活力，她却已经成了一个深陷质疑的国家。焦虑徘徊在这片土地之上，宛如处在一座不祥火山的巨大阴影的笼罩之下。

这就是我展开这段历史旅程的原因。这就是以色列建国65年之后，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起116年之后，所面临的核心矛盾。如今的挑战，远远超出当时的军事占领，也比单一的和平议题要深入得多。我们每一个人都将直面以色列问题的三重性：为什么是以色列、以色列意味着什么、以色列将何去何从。

辩论回答不了以色列问题，以色列是如此复杂，它不会屈从于某一种论证或者抗辩；而回答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追述以色列的历史。于是，我开始撰写本书。以我自己的视角，用我的独特方式，将我们所有人的存在阐释为一个共同体。这本书讲述一个以色列人的个人旅程，他因经历席卷家乡的、戏剧性的历史进程而陷入深深迷惘。跨越时间和空间，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对国家更广泛意义的探索。通过家族历史、个人历史，以及深度访谈，我试图描述以色列的大历史，解决更深层次的以色列问题。一个世纪以来，我的国家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处于现在的境地？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将走向何方？我深深的焦虑是否有根据？我们的犹太国家是否真正处于险境？以色列人是否陷入了绝望的悲剧？我们是否能复兴和救赎自我，挽救我们深爱的土地？

第一章
初见，**1897**



1897年4月15日的夜晚，一艘小小的火轮悠悠划过湛蓝的地中海，从埃及的塞得港（Port Said）抵达雅法城（Jaffa）。船上共有30名乘客，其中，有一队来自伦敦，途经巴黎、马赛、亚历山大港等地的21名犹太复国主义朝圣者。这群朝圣者的领头人就是我的曾祖父——可敬的赫伯特·本特威奇（Herbert Bentwich）先生。

本特威奇是一名不同寻常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世纪末那个年代，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来自东欧，而我的曾祖父却是一位英国公民；大多数复国主义者生活贫苦，而他则是一位家境殷实的绅士；大多数复国主义者投身运动是基于世俗的考量，而他却怀揣一腔虔诚的信仰。对于那个时期的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复国运动是他们的唯一出路，而我的曾祖父踏上这条道路，却是自觉自愿。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赫伯特·本特威奇就已立志，要让犹太同胞再次安居于祖先的应许之地——犹地亚 （Judea）。

这次朝圣之行同样不同寻常。它是英国中上层阶级的犹太人首次踏上以色列土地的开荒之旅。锡安政治运动（Zionism）的发起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非常重视这21名朝圣者。赫茨尔希望他们可以在夏末的巴塞尔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举行之前提交一份关于以色列的综合报告，他对于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定居者以及对其殖民的前景非常感兴趣。但我的曾祖父并没有这样的勃勃雄心。他心目中的锡安主义[注]比赫茨尔更为远大，甚至，是罗曼蒂克式的。没错，他痴迷于赫茨尔《犹太国》（*Der Judenstaat*）英文版[注]预言性的美妙描述，亲自邀请赫茨尔光临他名声显赫的伦敦俱乐部，并为赫茨尔富有远见的领袖魅力所折服。就像赫茨尔一样，他坚信，犹太人应当重返巴勒斯坦。但是，当那艘名为“奥克苏斯”（Oxus）的平底小火轮如刀一般割开漆黑的地中海时，本特威奇仍然是无可指责的。因为，我的曾祖父从来不曾有通过侵略一个国家来建立犹太国的意愿，他的愿望只是去敬拜上帝耶和华。

恕我要在甲板上多停留一会儿。我需要弄明白“奥克苏斯”号为何越

洋而来，我的祖辈到底是谁，他为什么来到这里。

在即将跨入20世纪时，全世界大约有1　100万犹太人。其中，约有700万在东欧，200万在中欧及西欧诸地，150万定居北美。亚洲、北非和中东的犹太人加起来还不到100万。

只有身居北美和西欧的犹太人才获得了解放，享有自由。在俄国，他们受到迫害；在波兰，他们遭到歧视和排挤；在伊斯兰国家，他们作为“被保护者”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即使是在美国、法国和英国，所谓的“自由解放”也仅限于法理上的名义，反犹主义正甚嚣尘上。1897年的基督教国家，内部也并不平静，很多国家无法平等、尊重地对待犹太人，保障他们自由的人权。

而在欧洲东部地区，犹太人的处境已然恶化。一种新的、基于种族歧视的反犹主义正在取代古老的、以宗教为基础的反犹主义。大屠杀降临了，俄国、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波兰的犹太城镇遭到血腥清洗。大多数生活在“犹太村”里的犹太人意识到“犹太村”前路断绝。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举家迁往埃利斯岛（Ellis　Island）。犹太民族的离散再次演变成洪水般的大规模迁徙。

然而，未来很快就告诉他们，灾难会来得更加惨烈。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死于屠杀，三分之二的东欧犹太人惨遭屠戮。犹太民族史上最惨痛的浩劫即将来临。因此，当“奥克苏斯”号抵达圣地的港湾，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需求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们不在这里泊岸，他们将无路可走。那条逐渐显露的海岸线，也许是他们唯一的救赎。

当然，还有另一个需求。在1897年之前的千年里，正是得益于伟大的上帝和伟大的犹太人聚居区，犹太民族才得以绵延生息。与上帝的亲密接触以及与周围非犹太世界的隔绝，维护了犹太人的身份与文化。犹太人没有领地，没有国家，他们也没有所谓的自由原则和国家主权原

则；是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强大的宗教故事以及周遭外邦人砌筑的隔离高墙，使他们相偎成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然而，在1897年之前的100年里，上帝渐行渐远，犹太区的高墙也轰然坍塌。世俗化与解放运动——它们本身的作用倒是有限——日益侵蚀着犹太人的旧有准则。犹太人的民族特性无法维持。即使没有俄国哥萨克人的屠杀和法国反犹分子的迫害，犹太人也面临着民族同化的危机。他们曾在历史大离散中一直维系着的非正统犹太教文化的能力，此时正面临严峻考验。

第三，还有革命的需求。要想继续生存下去，犹太人必须将大离散的民族迁徙状态转变为主权国家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说，1897年的犹太复国主义堪称天才之举。其奠基人赫茨尔博士的确兼备英雄主义和先见之明。总之，19世纪是西欧犹太人的黄金时代，而赫茨尔预见到了未来。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下一个世纪会出现像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这样的地方，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和行动预防着20世纪40年代的悲剧。他们意识到了一个根本问题，犹太民族正濒临灭绝。他们也意识到，解决根本问题仰赖根本的解决方式：犹太民族的自我变革。而这种变革只能发生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古老的家乡。

我的曾祖父赫伯特·本特威奇当然不会如西奥多·赫茨尔那样，看问题明晰透彻，他根本不知道，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世纪会开启犹太民族史上最具戏剧性的历史进程。但是，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激进的时代。他知晓，在东欧正在上演令人发指的惨剧；也知晓，在西欧酝酿着不可避免的民族同化。他意识到，在东方，犹太人处于危险之中，而在西方，犹太人的信仰陷入危机。我的曾祖父认为，犹太人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生存之地，一个新的开始，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如果种族要得以延续，那么，犹太人需要巴勒斯坦这片圣地。

1856年，本特威奇出生于伦敦的白教堂区。他的父亲是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异地游商，往来于伯明翰和剑桥之间以兜售珠宝为生。父亲希望心爱的儿子能有更大的成就，于是将本特威奇送往上等的文法学校。

在学校里，本特威奇表现出色，成绩优异。深知肩负父母的所有期望，这个严于律己的年轻人以努力工作来证明自己。在30岁时，他已经是圣约翰伍德的一名成功律师。

在去巴勒斯坦之前，我的曾祖父是英国犹太社会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专业领域是著作权法，他是著名的马加比餐饮及辩论俱乐部（Maccabean Club）的创始人之一；生活中，他迎娶了一位美丽典雅的女子，为他孕育了九个孩子，次年，还会迎来两个新生儿。

作为一个完全靠自己力量成功的男人，赫伯特·本特威奇有些刻板迂腐。他性格傲慢、坚定、自信、独立自主而又特立独行，但是，他也是一个富有浪漫情怀的人，对神秘主义的热爱是他的软肋。他属于维多利亚时代。当他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大英帝国为犹太移民的后裔敞开了国门，对此，他深怀感激之情。本特威奇两岁时，英国议会诞生了第一名犹太议员；当他15岁时，剑桥大学录取了第一名犹太学生；29岁时，第一名犹太人进入了上议院。对本特威奇来说，这些里程碑式的进步堪称奇迹。他并不认为这样的“人权解放”是迟到的自然权利，而将之视为维多利亚女王统领下的大英帝国的恩惠。

他的外表看起来像威尔士亲王，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精心修剪的络腮胡子，以及挺拔的下颌。他像贵族一样有涵养。尽管出身贫苦，但是，本特威奇完全信奉帝国推行的那套价值观和社会准则体系。就像一个真正的绅士那样，本特威奇热爱旅行、诗歌和戏剧，他喜欢莎士比亚，甚至知道莎翁在湖区的故居。当然，他并没有违背犹太教信仰。他同妻子苏珊共同建立了一个家庭教会，教会中盎格鲁人和犹太人和谐相处，一同晨祷、唱赞美诗，研读坦尼森[注]和迈蒙尼德[注]，举行安息日仪式，接受牛津剑桥的教育。本特威奇相信，就像大英帝国肩负着使命一样，犹太人也有自己的使命，而看顾在东方遭迫害的犹太同胞，就是身处西方犹太人的使命。我的曾祖父无比坚信，如同大英帝国拯救了他，他也将拯救自己的同胞。对帝国的忠诚和对犹太人使命的忠诚在他

心中交织在一起，最终，将他推向巴勒斯坦，指引他带领着这支独特的盎格鲁——犹太人朝圣团，驶向圣地的海岸。

如果我见到赫伯特·本特威奇，我可能不会喜欢他；如果我是他的儿子，我确信我会跟他对着干。他的世界，尽是保皇党、宗教主义、宗族主义，还有帝国，距离我的世界就像有几个世纪那么遥远。但是，当我从遥远的彼端（100多年的距离）观察他时，我发现，我无法否认我们之间的共通之处。我惊讶的是，我同那古怪的曾祖父之间，竟有着如此多的共同点。

所以我再次自问：为什么他在那儿？为什么他要踏上那艘火轮？就他个人而言，他并没有身临险境，他在伦敦的生活富足而充实，为什么他就这样驶向雅法？

其中一个解释就是浪漫主义。1897年，巴勒斯坦尚未落入日不落帝国的王权之下，但英国已经心怀觊觎。整个19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对锡安的向往不亚于犹太人。乔治·艾略特[注]的《丹尼尔·德龙达》铺就了道路，劳伦斯·奥里芬特（Laurence Oliphant）[注]又使之更进一步。在那个殖民时代，锡安的魅力撩拨着英国浪漫主义人士的心弦。对于我的曾祖父这样一个浪漫的男人、一名犹太人、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来说，这个诱惑简直无法抵挡。对锡安的渴慕已然成为点燃他整个生命的激情，这决定了他的身份。

另一个解释更为重要，也更为中肯，即赫伯特·本特威奇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男人。他在19世纪末从白教堂区奋斗到圣约翰伍德区的经历，相当于20世纪犹太人从下东区进入上西区[注]。1900年即将到来之际，我的曾祖父面临着与21世纪美国犹太人所面临的相同的问题：如何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保持犹太人的民族性，如何防止犹太教信仰被犹太区的高墙所隔绝，如何引领大离散中的犹太民族走向现代西方化的自由与繁荣。

没错，赫伯特·本特威奇离开查令十字路口前往雅法，因为他致力于结束东方犹太人的不幸。他开启这段航程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认识到，仅仅西方犹太人过上安定生活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享受到了优越的生活，但他已经看到伴随反犹主义而来的挑战，以及大屠杀之后的灾难；他意识到，自己构筑的盎格鲁——犹太人的和谐社群正黯然褪色。于是，他横渡了地中海。

4月16日，他抵达了古老的雅法港口。我看着他在清晨5点起床，走出他的头等舱；我看着他穿着浅色的夏装、戴着软木帽，走上舷梯，登上“奥克苏斯”号的木甲板；我看着他站在甲板上远眺，太阳缓缓从雅法的拱门和炮塔上方升起。我曾祖父看到的土地就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在温柔的晨光下闪闪发光，沉浸在微弱的希望之光中。

我希望他登岸吗？我不知道。

我痴迷所有打上英国标签的东西。就像本特威奇一样，我深爱这片土地，从兰兹角到斯诺登尼亚山峰，到大湖区；我深爱着英式风情的别墅、酒馆以及乡村；我深爱着早茶、下午茶文化以及德文郡的凝脂奶油；我深深痴迷于赫布里底群岛和苏格兰高地，以及铺满柔软绿茵的多塞特山丘。英国人对自己民族深深的认同感让我感到由衷敬佩；同样，让我深为迷恋的，还有这座800年间不曾被征服的伟大岛屿的宁静祥和、绵延不断的香火传承，以及举手投足间的优雅风范。

如果赫伯特·本特威奇下船登岸，他将告别这一切。他将把自己、他的孩子、孙子以及曾孙永远带离英格兰苍翠的土地，而让我们在这里——荒凉的中东，世代安居。这样做太愚蠢了吧，这不是太疯狂了吗？

但事实并非这样简单。不列颠群岛并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暂居的过客，因为我们的旅途是那样漫长又充满艰辛。绿色的英格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优美的临时避难所，一块旅途中的暂栖地。当时的人口统计数据清楚地揭示：在赫伯特·本特威奇无法看到的20世纪下半叶，英

国的犹太社群将减少三分之一。从1950年到2000年，不列颠群岛的犹太人数量将从40多万减少到大约30万。犹太学校和教堂将会关闭，城镇——比如布赖顿和伯恩茅斯中的犹太社区将会大为缩减。异族通婚的比例增加超过50%。年轻的非正统犹太人会疑惑，为什么他们应该是犹太人，意义何在？

类似的进程也会发生在西欧其他国家。在丹麦、荷兰、比利时，非正统犹太人的社区将逐渐消失。门德尔松、马克思、弗洛伊德、马勒、卡夫卡以及爱因斯坦，这些犹太人的思想，200多年来，对现代欧洲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现在，犹太人将逐渐离开欧洲舞台的中心。欧洲犹太人的黄金时代即将终结。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富于创造的欧洲犹太人，他们的存在将遭到质疑。曾经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50年之后，同样的情况甚至会冲击强大、富有的美国犹太人社区。美国社会中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比率将大幅降低。异族通婚将比比皆是。古老的犹太社群组织将失去活力，几乎不会有非正统犹太人愿意遵循或者参与犹太教信仰生活。比起欧洲的犹太人，美国犹太人虽仍然充满活力，犹太人能够看到21世纪意味着什么，但那幅图景并不乐观。

那么，我的曾祖父应该下船吗？如果他不登岸，我也许将在英国过着富裕而充实的生活。我不用服兵役，不用面临随时都会发生的危险，不用忍受道义两难的啃噬。我和家人将在多塞特郡有茅草屋顶的乡村小屋里度过愉快的周末，夏季，我们会去苏格兰高地。

如果我的曾祖不登岸，我的孩子也许会只拥有一半的犹太血统。甚至，他们根本不会成为犹太人。不列颠将会抹去我们的犹太身份。在古英格兰的草甸和新英格兰的密林，世俗的犹太文化也许将化为云烟。在大西洋的两岸，非正统犹太人将逐渐消失。

当本特威奇和他的团员下船时，地中海是如此安详，就像一汪湖水。阿拉伯码头工人将“奥克苏斯”号的乘客接上粗糙的木船。雅法的港

口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难挨，进城时，这些欧洲的旅行者们发现，今天恰好是雅法城的集市日。对于集市上悬挂的动物尸体、腥臭的鱼和腐烂的蔬菜，有的人感到震惊。他们注意到那些乡村女子、瘦骨嶙峋的孩子们以及人们浑浊的眼神。这里的环境拥挤、嘈杂且肮脏不堪。16位男士、4位女士及1名女仆，打算前往市区的旅舍，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旅游公司派遣的精致马车很快抵达。刚一驶离混乱的阿拉伯雅法港，这些欧洲人又重新兴致盎然。4月的柑橘林散发出来的甜美气味，窗外怒放的红色花朵，以及羞涩的紫色野花，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精神。

这21名旅客受到我的另一位曾祖父——希勒尔·约夫医生（Dr. Hillel Yoffe）的热烈欢迎。他给这群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希勒尔·约夫在六年前来到雅法港，被同一批阿拉伯码头工人带上岸。在这里，他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他的医疗工作——对根除疟疾的研究——已声名远扬，他的社会工作——作为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主席——更是杰出非凡。像这些英国朝圣者一样，约夫赞成享有优越生活的西方犹太人必须扶持穷困的东方犹太人的理念，并以此为己任。这并不只是为了拯救他们，使他们脱离愚昧哥萨克人的魔掌，还有基于向他们传播科学及教化的道义责任。在这个偏远的奥斯曼省的艰苦环境中，约夫医生堪称推动这一进程的第一人。他的使命，不仅在于医治他的病人，也在于救助他的同胞。

在约夫医生的带领下，本特威奇一行来到了米凯维以色列的法国农业学校。时值逾越节（Passover holiday）[注]，学生正放假，但教师和员工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米凯维以色列学校如同这一旅程中的一方绿洲，其优秀的教工指导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年轻人以现代方式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其使命是为下一个世纪培养农业家和葡萄种植者。这些法国式的农业技术将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传播，并将沙漠变成绿洲。欧洲旅客欣喜万分，感觉看到美好未来的种子正在他们眼前发芽，而这正是他们所期待的未来。

离开米凯维以色列，他们又到了里雄莱锡安的殖民地。殖民地的开拓者和赞助人是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Baron Edmond de Rothschild）男爵。代表男爵的当地官员在殖民地庄园招待了这群可敬的朝圣者。英国旅行者很喜欢这个法国人。在这样闭塞的地方，能找到这样的建筑、这样的主人、这样精美的食物，实在令他们松了一口气。最令他们高兴的是，在这个拥有15年历史的殖民庄园，男爵居然兴建起了一家强大的、技术先进的酿酒厂。他们对"将巴勒斯坦变成东方的普罗旺斯"这个概念啧啧称奇。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在800年后的犹太人家乡，在红屋顶的殖民房屋和郁郁葱葱的葡萄园里，第一次飘荡着希伯来葡萄酒的醉人气息。

中午时分，他们抵达了兰布尔。此时距离他们在巴勒斯坦登岸已有七个小时。本特威奇一行的大部分队员都坚信：犹地亚正是那些在俄国、波兰、罗马尼亚受到迫害的犹太人的安居之所，巴勒斯坦将成为拯救犹太人的乐园。不久，他们将坐上从吕大（Lydda）开往耶路撒冷的火车。像赫伯特·本特威奇这样的男人绝不舍得浪费宝贵的每一分钟。他的同伴已经精疲力尽，他们一边休息，一边默默地回味这一路来的所观所感，但是，我的曾祖父却难以入眠。他穿着白色夏装，戴着白色软木帽，爬上了拉姆拉城中心地标式的白塔。在那座巨大的塔楼上，我的曾祖父眺望着整片大地。

1897年，在这片尚显空荡的领土上，本特威奇极目远眺，他看到了平静、空旷和希望。这是一方即将上演剧目的舞台，这里发生过太多的事，又有很多事即将发生：鲜花如地毯覆盖，古老的橄榄树林荫郁郁，犹大山投下淡紫色的剪影。就在这里，耶路撒冷！就是这偶然的机会，我的曾祖父成了这出剧目的中心。在这个时刻，他必须做出决定：此路，或彼方；向前，或者后退；选择巴勒斯坦，或者拒绝。

我的曾祖父并不适合做出这样的选择，他没有看到这片土地的全貌。坐在优雅的小马车里，从雅法到米凯维以色列，他没有看到巴勒斯

坦人的村庄，阿布卡比尔；从里雄莱锡安到兰布尔，他没有看到萨拉凡德；在兰布尔，他没有注意到，兰布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巴勒斯坦城；而现在，站在白塔之顶，他没有看到哈迪塞、基姆佐、埃尔库巴布。我的曾祖父也没有看到基色山上的阿布舒莎城。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在新的千禧年里，我问我自己。我的曾祖父怎么会没有看到呢？

在1897年，巴勒斯坦拥有超过50万的阿拉伯人、贝都因人和德鲁兹人，拥有20个城镇，以及几百个村庄。本特威奇怎么会没有注意到它们，从拉姆拉塔远眺的本特威奇，目光敏锐的本特威奇，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这片土地上已有人栖息，已经有另一支民族，此刻，正占据着这片原本属于他的祖先的土地。

我并不想批评或者指责什么，相反，我意识到，在他的概念里，巴勒斯坦是一块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包括了今天的约旦王国。而在这片辽阔土地上，只有不到100万的原住民，它可以为从反犹主义欧洲而来的犹太幸存者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伟大的巴勒斯坦，可以成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家园。

我也注意到，本特威奇所观察的土地上，充斥着人口众多的贝都因人。而在那里居住的贝都因人，大部分都是没有产权的农奴。1897年，绝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人居住在简陋的小村庄里，他们的房子不过是泥土堆砌的小屋。贫困和疾病压弯了他们的脊梁，而对于一个维多利亚式的绅士来说，本特威奇是不会观察到他们的。

也有可能，本特威奇，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白种人，并不能平等地看待非白种人。他很可能轻易地说服自己：来自欧洲的犹太人更能给这片土地的人民带来美好的生活。欧洲犹太人会医治这些居民，教化他们，培养他们。所有人会以一种高尚且有尊严的方式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如同友邻。

但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观点：在1897年4月，还没有巴勒斯坦人民。那时的巴勒斯坦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自觉，也没有民族运动这一主张。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觉醒还在遥远的地域之外：在大马士革，在贝鲁特，在阿拉伯半岛。但是，在巴勒斯坦，尚没有出现强烈的民族认同，也没有形成成熟的政治文化。奥斯曼帝国的这些偏远之地没有自治权，巴勒斯坦也没有自治权。如果是一名来自大英帝国的骄傲公民，他将这片土地视作一块无主之地、一块犹太人可以合法继承的土地，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我还是要问，他为什么没有看见。毕竟，阿拉伯的码头工人在黎明时分叫醒了他，并用简陋的木船把他带上了岸。在雅法的集市上，他从阿拉伯商贩中穿行而过，也是阿拉伯人在他居住的雅法旅舍服侍他。在马车行进的途中，他可以看到沿途阿拉伯人的村庄，以及拉姆拉和吕大的阿拉伯居民。即便是在他自己的托马斯·库克马车上，也有阿拉伯向导、马夫和仆人。巴勒斯坦旅行指南手册特别强调了，拉姆拉城是由阿拉伯人兴建的，还有拉姆拉的白塔，也是阿拉伯风格。

随着我观察本特威奇在塔顶眺望那片土地时遗漏的视觉盲区，我完全理解了他的心思。我的曾祖父没有看见，是因为他不想看见。他不想看见，因为如果他一旦知晓，他也许就不得不打道回府。而我的曾祖父，从不后退，所以，他选择了“看不见”，这样他才能继续前行。

……

所以，他继续前行。他召集了同行的朝圣者，登上前往耶路撒冷的火车。从雅法到耶路撒冷的铁道是几年前一家法国公司修建的，发动机是现代化的蒸汽式的，拉着设有舒适软座的车厢前行。当他为这新式火车展露的进步信号而兴奋时，窗外的景致更是震撼了他。透过法国人建造的车厢的宽大窗子，他看到了希伯来基色古城的遗迹（但他没有看到与阿布舒莎相邻的巴勒斯坦村庄）、莫迪因的英雄马加比家族坟墓（但没有看到巴勒斯坦村庄米迪）以及参孙纪念堂（但没有看到阿图罗）。

他没有看到迪尔哈瓦，也没有看到哭泣教堂。我的曾祖父关注着通往耶路撒冷曲折峡谷中的古老荣耀，却并没有看到，在耶路撒冷周边辛勤耕种崎岖梯田的巴勒斯坦人民。

在赫伯特·本特威奇的内心，有两股驱动他前行的力量：鲜活的历史记忆交织着不断进步的信仰，以及对历史荣耀激发起的实现现代化的决心的渴求。是的，他致力于解救正在沙皇暴政下的俄国犹太人。他从来没有忘记1881年至1882年的乌克兰大屠杀和最近罗马尼亚迫害中的幸存者。但是，真正令他着迷的是《圣经》和现代化。他真正的热情在于恢复先知文化，以及铺设电报线路。对于他而言，在神话般的过去和技术先进的未来之间，没有当下；在历史记忆和梦想之间，没有“这里”和“现在”。在我曾祖父的意识里，没有这块土地已有归属的概念，也没有那些站在橄榄树和无花果树旁，挥舞着手，向穿着精致亚麻衣服的英国旅行者们问好的巴勒斯坦居民的位置。当他透过车窗望去，他们被湮没于圣经化的景观中。

当我跟着火车去往耶路撒冷时，我想到了斐迪南·玛利·德·雷赛布（Ferdinand-Marie de Lesseps），这位制订了用人工水渠连接地中海和印度洋的详细方案的驻埃及法国总领事，他建立了一家股份公司来筹措资金，以实现他的计划。十年后，耗费巨大人力的苏伊士运河完工，雷赛布向19世纪证明了人的无限潜能——在那个时代，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在理性进步面前，没有一座山峦可以成为障碍。

赫伯特·本特威奇不是法国人，而是英国人。虽然，他不是笛卡尔的信徒，而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是，雷赛布的精神仍然影响了他。他相信必然有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合理方案。对于他来说，西奥多·赫茨尔就是犹太人问题中的德·雷赛布。赫茨尔制定了宪章，绘制了蓝图，并以建立股份公司的方式筹集了资金。赫茨尔将建立一个伟大的人为的民族国家，它将联结东方与西方、过去与未来，并将把这片不毛之地变成上演重大事件和标榜卓越丰功的舞台。

曾祖父的同伴们也非常兴奋。从黎明到现在，他们已经看到了很多：雅法、米凯维以色列、里雄莱锡安、拉姆拉、裘德平原以及通向耶路撒冷的峡谷。火车在缓缓前行，这些旅客利用这点时间翻阅起各种指南和参考书：贝德克尔、史密斯、汤普森、奥列芬特以及“秃鹰”气枪。当通过阿亚隆山谷时，他们重温了《圣经》里记述的发生在这里的伟大战役。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居然辨认出了英雄哈斯摩尼人在伯和仑取得胜利的遗址。他们感觉自己正在穿越时空，回到了以色列之子光辉的历史纪元。

我仔细地看着他们。他们当中，有16位男士和5位女士，16个英国人，3个美国人，以及两个欧洲大陆人。只有3个不是犹太人，只有1个有钱人，几乎全部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生活自足、来自现代化社会并获得解放的犹太人。尽管他们的穿着有点古怪，思想天真，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恶意。带领他们来到这里的是绝望，以及在绝望中滋养出来的解决问题的坚定决心和信念。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他们当中涌动的巨大暗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科学与技术——将彻底改变这片土地。而一旦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以及科技被他们的坚定信念浇灌成熟，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的步伐。这些强大的力量将夷平山岭、掩埋村庄，将一个民族替换成另一个民族。于是，当火车载着这些沉浸在阅读中的旅行者继续前行时，变革将不可避免。

……

在21名旅行者中，只有一人并不天真。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是一名知名作家，撰写过国际畅销书《犹太区里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Ghetto）。他言辞刻薄，明察秋毫，冷血无情。他并不赞同曾祖父仁慈的保守主义和浪漫的人道主义。他不自我欺骗，不刻意探究什么，也不对一切视而不见。所有赫伯特·本特威奇没有看到的，伊斯雷尔·赞格威尔都看在眼里。他看到了雅法、吕大、拉姆拉的巴勒斯坦城镇，也看到了卡比尔、沙拉番、哈迪塔、阿布舒莎的巴勒斯坦村

庄。他看到了所有的简陋房舍，以及至耶路撒冷沿线生活悲惨的村庄，也看到了在耕地上劳作、向驶过的法国火车挥手的农民。

在接下来的七年里，赞格威尔将他看到的公之于世。在纽约一次意义重大的演讲中，这位世界著名的作家将以“耶路撒冷已被占据”的事实震骇他的听众。他指出，耶路撒冷地区的人口密度足足是美国的两倍。但是，这位激进的锡安主义者，不仅仅公布了这个颠覆性的人口统计数字，他同样宣称：没有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不是依靠实施武力来赢得胜利的。赞格威尔做出了结论——因为别人占领了以色列人的土地，以色列的子民们就应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像我们的祖先做的那样，用利剑驱逐占领地上的部族。”

赞格威尔的演讲被锡安运动者视为可耻的异端邪说。在1897年，甚至直到1904年，除了赞格威尔，没有一个锡安主义者做出这样直率而尖锐的分析，并得出这样残酷的结论。演讲后，这位另类的作家被驱逐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织，但他将在几年后再次回归。当他在20世纪20年代回归时，他继续向公众宣扬：“阿拉伯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占领那几公里的土地，‘收起帐篷，悄然离去’就是他们众所周知的习俗。就让他们现在证明吧……我们必须温和地说服他们踏上一段艰苦跋涉的旅程。”而这样的话，在当时没有一个锡安主义者敢说出来。

但是，这一切还要很久以后才会发生，现在还为期尚早。1897年4月16日，星期五下午，经历了漫长而刺激的火车旅行，本特威奇朝圣团终于抵达新建的耶路撒冷石式车站。我的曾祖父欣喜若狂——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

时间紧迫。他们抵达时正值逾越节，几小时之后将迎来自由的假期，犹太人将像《出埃及记》记述的那样庆贺节日。所以，在车站接受耶路撒冷老犹太区知名人士的欢迎后，他们匆匆忙忙赶往老城区。他们再一次被迫面对东方式的痛苦：黑暗曲折的小巷、肮脏的集市以及饥饿的民众。贫困的阿拉伯人以及世代居住在圣城里，和以慈善和祈祷为生

的当地犹太人，共同构成了一幅悲惨的图景。然而，当他们最终抵达哭墙（Wailing Wall）时，却为信徒们的虔诚所折服。在圣殿仅存的残垣前，信徒们哀悼着犹太民族在1 800年的历史中所经历的重重苦难，大胡子犹太老人唱起苍凉的挽歌，深深地触动了他们。

这些英国女士们和先生们，以及他们的美国、欧洲大陆同伴惊讶地发现，同样的渴慕与哀切如洪水般向他们席卷而来。他们潦草地写下自己的愿望，塞入哭墙的缝隙中。因为时间不足，本特威奇催促着气喘吁吁的朝圣者们赶紧前行，穿过黑暗曲折的幽巷，来到卡米尼兹旅馆，在那里，将为他们举办逾越节的家宴。接着，第二天早上，他们启程赶往戴维城以及戴维冢，然后转去险峻的橄榄山。无论朝圣者们走到哪里，所见都是惊人的对比：过去的辉煌图景与现今的贫困肮脏并立于世。古老的耶路撒冷城拥有令人窒息的美丽，而无论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都被贫困生活所折磨。年轻的男孩们苍老如翁叟，疾病与贫穷无处不在。

逾越节后的第二天，他们向北方进发。这可是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兄弟展示他们杰出才能的时候了。在收取每名乘客44畿尼的费用后，这家著名的旅游公司提供了马和骡子一共100匹，包括免费的英式马鞍和专门为女士铺垫的横式马鞍，以及优质的白色印度帐篷，还派遣了超过48名仆从，包括1个屠夫、1个厨师和1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服务生。每天早晨，备好的英式早餐端上餐桌，午餐打包进手工编织的野餐篮子里，晚上则会享受一流的美食，包括热汤、两种肉类或家禽类主食和三款不同的甜品。

从1897年4月20日至27日，赫伯特·本特威奇带领着欢乐的殖民地车队穿过了这片土地。从耶路撒冷到贝特埃尔，从贝特埃尔到希洛城，从希洛城到纳布卢斯，从纳布卢斯到杰宁，途经唐谷。离开杰宁，他们经由伊兹拉山谷前往他泊山；从他泊山出发，他们沿着哈丁战役遗址来到太巴列。他们又在加利利海沿岸花了两天时间，然后，乘船前往迦百农，再从迦百农到罗什平纳，又从罗什平纳沿约旦河直至它的源头，然

后去了黑门山、大马士革和贝鲁特。

这是殖民主义吗？如果一个生物看起来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也像鸭子，那么它很可能就是一只鸭子。这些照片看上去有种罪恶感：白色的猎装，软木帽，带托马斯·库克标志的帐篷。我曾祖父日记里的记述同样摆脱不了嫌疑，遣词造句没有歧义，开门见山。他的目标，以及他所在的伦敦圈子的目标，就是将巴勒斯坦开拓为殖民地。这些赫茨尔锡安主义者还寻求帝国的支持，作为自己行动的强力后盾。他们不断地向英国、德国、奥地利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提出申请。他们需要一个主流欧洲强国的支持，以便在这片土地上，将锡安主义付诸行动。他们希望西方可以驯服这块阿拉伯土地。他们希望这块阿拉伯的土地被西方收缴，于是，一个欧洲问题可以在欧洲以外的地域得到解决。

可是，本特威奇代表团谋求另一块土地并不是为了不列颠的荣耀，而是为了拯救一群受迫害的人民。他们并不真正代表帝国，而是一群被剥夺权利的人苦心寻求帝国的帮助。他们的目的不是压迫，而是解放。他们不是为了盘剥这片土地，而是为了开发。除却伊斯雷尔·赞格威尔，代表团里没有一个成员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某种形式的征服、剥夺和驱逐。

所以，当我观察这些坐在质地考究的英式马鞍上的绅士们，以及在横式马鞍上摇摇欲坠的淑女们时，我看不到任何罪恶，我没有看到居高临下的睥睨、抢夺穷人羔羊的企图。尽管，他们的设备是殖民式的，习俗也是殖民式的，但是，这个代表团并不属于任何一股殖民势力。尽管，他们的外貌、思想和行为举止是欧洲式的，但是，他们也不代表欧洲。恰恰相反，他们是欧洲造就的受害者。他们站在这里代表了另一群被欧洲迫害的终极受害者。

这真是一个悲哀的故事。赫伯特·本特威奇的一代是属于被解放的犹太人中的一代，他们热爱欧洲，并将自己的命运与欧洲紧密相连。摆脱了禁锢他们几百年的犹太区，他们昂首前行，热情拥抱开明的欧洲

——使这片大陆富足，也使自己富足。然而，当19世纪逐渐落下帷幕，这些犹太人意识到，欧罗巴并不像他们热爱它那样热爱着自己。对于这些新解放的欧洲犹太人来说，欧洲宛如一个代孕的母亲，他们尊敬她、崇奉她、爱慕她，他们给她一切所能给的，然而，突然，这些全心投入的儿子们发现欧洲母亲不想接纳他们了。仿佛一夜之间，母亲眼中的这些儿子们就有了一副新的、古怪的模样，身上散发着一种异味，简直无法忍受。这些儿子看出了母亲眼里跳动的疯狂与忍耐，于是，他们知道，是时候离开，开始自己的生活了。

这就是为什么西奥多·赫茨尔要在夏末召开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这就是为什么赫伯特·本特威奇以及他的团队出现在这里，骑着晃悠悠的马儿穿越古老的以色列山岭。因为，欧洲的进步与开明到达了一个顶峰，所以，犹太人必须逃离欧洲。这片荒凉的土地，就是他们逃离疯狂的欧洲之后所能找到的避难之地。

耶路撒冷一行后，赫伯特·本特威奇的日记突然中止了。也许，巨大的疲劳终于把他压垮，又或者，他太兴奋了。有一个目击者称，本特威奇不小心跌进了当地的刺梨仙人掌丛，那些细小的尖刺令他痛苦不堪，几乎不能安坐，更别提写些什么了。但是，其他同伴的记录却描述道：离开之前，本特威奇从斯高帕斯山望向耶路撒冷，暮色中的圣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后，仍久久沉浸于那幅图景不能自拔。就在第二天，这位朝圣者中的领袖又沉迷于可怕、古老而又静谧的塞巴斯蒂安遗迹。他被同《圣经》描述如出一辙的撒玛利亚景色深深感动：阶梯状的丘陵，橄榄树的园子，沉静的山间幽谷。他还看到了神奇的基利波山。而最令他难忘的，当属那日落时分，被连绵赤色山岭环绕的加利利湖，以及他在清晨悠悠荡桨于静谧湖水中的经历。

我注视着我的曾祖父，带领着有100匹马拉着的车队一路上行，从加利利海到金农沙山谷中的胡拉湖，又从胡拉湖到巴尼亚斯的山泉，白雪皑皑的黑门山顶就悬在他们头顶，距离他们那样近。就像20世纪距离

他们那般近一样。而我的曾祖父并不知道，在下一个50年，即将开启犹太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时代；而在紧接其后的下一个50年，为了恢复民族主权，犹太人又将付出极其可怕的代价。现在，一切还很平静，这片土地还享有和平。你可以听到马儿翻越黑门山时哒哒的蹄声，载着沉思的绅士和安静的淑女。我的曾祖父回头，最后一次望向这片土地：那宁静的加利利，湖水魔幻般涌动，还有那带着惊人预示的哈丁战役遗址。这片土地还没有被他未来的事业所波及，这片土地还没有被犹太人的贪婪和绝望所颠覆。

赫伯特·本特威奇赶不上参加巴塞尔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了。尽管他会出席未来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但是，不能在1897年赫茨尔召集的历史性集会上做报告，这是一个遗憾。不过，只要回到伦敦，他会毫无保留地陈述和撰写他的一切经历。无论他走到哪里，他总是那样坚定不移。“巴勒斯坦从来没有被其他民族纳入版图。”他这样宣称，并与锡安的评论家们辩论，坚持巴勒斯坦完全适合数百万处境艰难的东欧犹太人，只需要克服极小的苦难并怀揣希望，就能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美好的家园。

在未来的辩论中，我的曾祖父会占尽上风。在朋友和同伴的帮助下，他会在欧洲最重要的首都建立起犹太复国主义中的一股坚强势力。巴勒斯坦朝圣之行20年后，他参与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团与英国王室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第一次会晤。那时，这位年迈、高贵的律师已成为旧时代古董式的标识，但是，出于荣誉和礼仪，他仍然被邀请参与早期的谈判进程。半年后，1917年11月2日，谈判诞生了著名的、仅有70字的《贝尔福宣言》，它以信件的形式由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寄送给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罗斯柴尔德勋爵：

外交部

1917年11月2日

尊敬的罗斯柴尔德勋爵：

我很荣幸地代表英国政府将下述对锡安主义者之志向表示同情的宣言转达给您，该宣言业已呈交内阁并为内阁所批准。

“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必须明白理解，绝不应做出任何有损于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人社群的公民权利及宗教权利，或其他任何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之各项权利及政治地位的行为。”

蒙您向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晓以此宣言，我向您表示感谢。

顺致

崇高的敬意

亚瑟·詹姆士·贝尔福

这就是本特威奇的巴勒斯坦之旅，短暂而匆忙，甚至有点荒诞，但却改变了我曾祖父的一生。回到伦敦后，他已经无法重拾维多利亚绅士式的做派。他不再满足于从事法律事务，演奏室内音乐，阅读莎士比亚，把他的九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培养成伦敦式的淑女和绅士。12天的耶路撒冷之行，令本特威奇难以继续在伯青顿的海滨别墅里享受舒适的优越生活。在肯特郡的海岸线上竖有一座灯塔，本特威奇就长久地对着它吐露心声。

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被巴勒斯坦的神秘魅力所征服。到1913年，赫伯特·本特威奇的女儿和女婿将在雅科夫的殖民地葡萄园修建起一座豪宅；1920年，他的儿子将出任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的第一位检察总长；1922年，国际联盟授权英国管辖巴勒斯坦；1923年，赫伯特·本特威奇在基色山和阿布舒莎的巴勒斯坦村庄建立第一个盎格鲁—犹太人殖民地；1929年，年迈的本特威奇终于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定居下来，直到三

年后去世。这位家族的领袖被埋葬在斯科普斯山西坡新建的希伯来大学旁，不远处，就是他在1897年4月回头眺望日暮下的耶路撒冷圣城的故地。

回到那时，火轮载着本特威奇一行从耶路撒冷返回伦敦，船正划过幽暗的海水驶向君士坦丁堡。5月的夜晚酷热难耐，我的曾祖父站在甲板上，凝视漆黑的海水以及席卷而来的白色泡沫。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有模糊的概念，也只隐约地预见到这片以色列的土地上即将发生的改变。他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太有限了。不过，他的确感觉到，一个时代即将终结，另一个时代正在来临。当“奥克苏斯”号出现在雅法的港湾，当它缓缓泊岸，当所有的人走出船舱登上那片土地时，的确有什么发生了——这改变伟大，而又可怕。

---

1. 锡安主义，也称犹太圣会主义，阿拉伯世界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是由犹太人发起的一个政治运动，也泛指对犹太人在以色列土地建立家园表示支持的一种意识形态，但并非所有犹太人皆支持锡安主义。——编者注（本书中带*的注释为作者原注，其余都为编者注）

2. 《犹太国》英文版书名为《The State of the Jews》。

3. 阿尔弗雷德·坦尼森（Alfred Tennyson，1809~1892），是华兹华斯之后的英国桂冠诗人，也是英国著名的诗人之一，著有《尤利西斯》等多部诗作。

4. 迈蒙尼德（Maimonides，1135~1204），犹太神学家、哲学家。

5. 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原名玛丽·安·伊万斯（Mary Ann Evans），19世纪英语文学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与萨克雷、狄更斯、勃朗特姐妹齐名。《丹尼尔·德龙达》（Daniel Deronda）于1876年出版，是其经典作品。

6. 劳伦斯·奥里芬特（1829~1888），英国著名的作家、旅行家、外交家和神秘学者。著有《圣地海法见闻录—1882~1885》（haifa,or Life in the Holy Land）。

7. 内伦敦的西区，是英国王宫、议会和政府机关的集中地；也是大商店、剧院和高级住宅区的聚集区。而东区则是工业区，多为底层人民的聚集区。

8. 逾越节，又称无酵节、巴斯卦节，是犹太教的主要节期之一。逾越节即犹太历正月十四日白昼及其前夜，是犹太人的新年，犹太民族的四大节日之一。

第二章
步入深谷，1921



我正驶向北方。从特拉维夫到哈代拉的道路全部由沥青柏油铺就，沿途有加油站和大型购物商场。拥挤、粗俗的众多城市不时显现，区分它们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以色列沿海地区人口稠密，生活节奏快，消费至上，酷热不堪。我向东拐弯，驶过巴图阿和乌姆埃尔——费赫姆的阿拉伯——以色列人混居村庄，抵达伊兹拉山谷，这是本特威奇在1897年曾经走过的地方，现在，这里是一个富饶的盆地。耕犁的农田被翻开，

露出褐色的肥沃泥土。在浓重的泥土气味的萦绕下，我继续向东，抵达以色列我最喜欢的一个地点。越过一个名叫伊兹拉的基布兹（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后，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我的前面是哈罗德山谷和基波利山的岩石山脊，可以看到伊萨查高地铺满柔软碧草的山坡，还有数不胜数的农场。这里感觉平静安详。然而另一个时代的魔咒仍然高悬在哈罗德山谷之上。

在第一个农场艾因哈罗德破旧的档案堆里，我查阅着地图、计划、方案、文章、信件、个人日志等资料信息。我浏览着20世纪20年代的黑白照片：时间定格在了我们初入山谷之际。随之一幅画卷在我面前缓缓展开——那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冒险征程。

……

哈罗德山谷走势狭长，位于南部起伏的山岭与北部和缓的高地之间，它的东面是贝特谢安城，西面是分水岭。20世纪20年代，这个山谷有三个巴勒斯坦村庄和两个巴勒斯坦小聚落点。这片面积达三万德南（dunams）*的土地隶属于亚历山大的撒索克家族（the Sarsouk family）。当地的许多居民都是撒索克的农奴。

本地的历史悠久，并且充满血腥。当以色列的军队被腓力斯人击溃时，扫罗王（King Saul）和他的儿子约拿单 （Jonathan）战死于基利波的山顶，他们的尸体被亵渎。基利波山下的汩汩清泉旁，基甸（Gideon）带来了他的勇士，借助哈律泉来测试英勇的人和胆怯的人、适合保卫民族的人和不适合的人，最后,他带着300名勇士击败了来犯的米甸人。

1904年，在这狭长地带的中央，一条由德国人设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修建的铁路铺设完毕。不过，这个山谷的滞后与僵化掩盖了这些进步因素。每隔两天，蒸汽火车呼啸着穿过寂静的山谷，但是，之后寂静又把这片土地彻底驯服。直到1920年，这片土地和灌木的荒原，难以耕

种。致命的沼泽零星分布在旷野里，这里疟蚊繁殖，当地的巴勒斯坦居民大多都因此感染上疟疾。沿哈律泉旁的小径迤逦而下，可见穿着长长黑袍的赤脚乡村女孩，她们头上顶着装满泉水的陶罐；骨瘦如柴的牧羊人驱赶着瘦弱的羊群在山岭间游荡。在这条土耳其和德国建造的铁路两旁，当地的生活如牧歌般缓缓流淌，千百年来如此平静。然而，死亡的气息依旧充斥在空气中。它潜伏在巴勒斯坦毒气弥漫的绿色沼泽里，它盘旋在濒临灭绝的欧洲犹太人的头顶之上。

1903年4月，摩尔多瓦的首都基什尼奥夫爆发了复活节大屠杀。49名犹太人被杀死，上百人受重伤。全世界的犹太人处在动荡的中心。西奥多·赫茨尔被深深震撼，他考虑买下撒索克家族在巴勒斯坦的土地，来安置欧洲反犹主义迫害中的幸存者。一位投资顾问审核了他的提议，认为哈罗德山谷美妙绝伦，只是，疏散那片土地上的农奴需要使用暴力。

1903年的赫茨尔锡安主义尚不能接受暴力驱逐。但是，17年后，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不再这样挑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令他们的心肠变得坚硬。所以，1920年，最后与撒索克家族签署交易时，明确指出的行为手段原则是：果断、迅速。新一代的犹太人，开始付诸行动。

基什尼奥夫大屠杀之后的十年里，约有100万的犹太人逃离了东欧，其中，不到35 000人移民至巴勒斯坦。有明显的两种选择倾向：想要美好生活的大多数人去了美国；而那些想要构筑乌托邦的犹太人，则组织了“阿利亚”（aliyah）行动，前往以色列的土地。不像1897年我的曾祖父在殖民地看到的传统农民，这些后基什尼奥夫的移民是世俗的、乌托邦式的。他们都是托尔斯泰式的理想主义者，来到巴勒斯坦只是为了寻求救赎——通过人道的和环保型的社会主义，谋求国家和个人双重意义上的救赎。

这次乌托邦尝试的伟大创造就是公社。1909年，他们建立了第一个

公社——迪甘妮亚，规模很小，但是，社员之间关系亲密，充分尊重个人需求和个人自由。迪甘妮亚公社延续了下来，但是，乌托邦尝试却宣告失败。在这严酷、贫瘠的土地上，很多人感到孤独，不少人陷入沮丧和绝望，还有少部分人自杀身亡。大部分人放弃了，离开巴勒斯坦前往美国。

与此同时，欧洲发生了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犹太人觉得就像看到了《圣经》里描述的末日战场。而俄国的十月革命就像弥赛亚降临。尽管世界充斥着战争、解放运动和各种内战，对犹太人的迫害更甚往昔，大屠杀无处不在。

巴勒斯坦乌托邦社会主义尝试的失败和东欧犹太人的严酷危难迫使犹太复国主义寻找新的出路。一个新的思想诞生了，以建立共产主义性质殖民地的方式，将巴勒斯坦开拓成犹太人的殖民地。这种共产主义式的殖民地，不应像迪甘妮亚那般小型、亲密和乌托邦化，而应组织庞大、纪律严格，类似布尔什维克风格。为驯服这块土地，就需要一支不畏艰苦、意志顽强、半军事化的劳动军（Labor Brigade）。

1920年夏，劳动军成立了。一年后，劳动军发展成为拥有数百人的强大队伍。他们觉得自己是犹太民族的先锋队，说话的方式也像，他们的行事就好似走在游行队伍前的革命精英，而紧跟其后的就是他们要解放的人民。没有任何工作是卑贱的，也没有任何任务是不能完成的，以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名义，他们可以做一切需要他们做的事。

我仔细观察着他们的照片。我看到的这些年轻男子，的确都属于新式的犹太人。他们强壮、健康，心中充满坚定的信念。很难想象，遗留在东欧的他们的父母只是小商人或者贫民窟的教员。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这些青年身上就发生了常人难以理解的巨大改变。现在，他们戴着平顶的贝雷帽，穿着卡其布裤和无袖衬衫，骄傲地展示着他们健壮的四肢。他们肌肉强健，被晒得黝黑，看起来就像革命的标准模特。在前几代人遭受羞辱之后，以色列小伙子开始以满满的男子气概形象展露于世

人面前。

而姑娘们，则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性感。有的姑娘的打扮追随欧洲时尚，如果不是登上了巴勒斯坦的海岸，她们可以在“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音乐声中跳起查尔斯顿舞。即便她们穿着斯巴达式的卡其布制服，也仍然诱人。因为，在巴勒斯坦没有上帝也没有父亲，一切都是自由的，那里没有宗教也没有宗族，一切都是开放的。那空旷的天际下没有怜悯，也没有诸多束缚，没有什么可以阻挡20世纪革命运动中最雄心勃勃和无所畏惧的年轻人。

1921年的夏天，整个山谷和煦安详。除了铺设的铁路，所有的一切就像几百年前的一样。在20世纪前25年，这里的景致同美国旅行家约翰·里奇韦（John Ridgway）在19世纪最后25年描述的完全一致：“山谷满是收割庄稼的人，拾蒿者，以及赶着牲口的运货者。驴车满载着成袋的谷粒，妇女们忙着拾取遗漏在地上的东西。你时常可以听到收割者在唱歌，麦秆随着古老歌谣的节奏摇曳生姿。”

在山腰的纽瑞斯村庄之下，遍布着撒索克家族为艾因杰劳德的农奴修建的石头房屋。伊兹拉农场所在之处，可以看到宁静的扎林村，在群山环绕的一处小丘上有坍塌的泰尔菲泥屋。再往下，零星的沙塔村舍若隐若现。翻过北部的高地，可玫村俯瞰着整个山谷。

河水缓缓流淌，沿着老旧的磨坊从欢快的哈律泉奔向萨哈内（Sahneh）的湖泊，千年如一日。偶尔，河水细细注入农民挖掘的沟渠，滋养他们贫乏的土地。然而，这些河水也滋生了毒气蒸腾的湿润沼泽，横行的疟疾病毒将里哈尼雅村庄变成了一块死地。这里所有的一切，从谢赫·哈桑（Sheikh Hassan）的坟茔到哈桑泉的周边，都是那样寂静——这方古老的土地，陷入长久的安眠。

然而，某些力量将在这个平静山谷里轰然释放。这股能量来自基什尼奥夫大屠杀，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自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以及

其他大屠杀。而它被允许释放的机会则源自《贝尔福宣言》、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以及与撒索克家族的交易。东欧犹太人所遭受的巨大不幸，驱使他们逃亡进入山谷。新一代犹太人的新身份也吸引着他们进入山谷——塑造和改变自我，在这个山谷里彼此友爱相邻。

1921年9月21日，一支古怪的车队开进了哈罗德山谷，共计有两辆汽车、四匹马，以及大量的运货车。车队里，数十名劳动军的拓荒者兴奋十足，无比确信他们将颠覆历史。一个青年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 没有马路，也没有乡村小径。我们沿着铁轨前行，Z. 骑着马走在最前面，紧跟其后的是两辆汽车、运货车队和整个军团。天气酷热难耐。已过正午，而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进展。重复着停下、前进……
>
> 现在我们必须右拐，向基利波山进发。山脊的脚下，哈律泉欢快地流淌。这眼泉水就是山谷的水源，我们必须占领它。哈律泉便是征服哈罗德山谷的密钥，而我们必须俘获这把钥匙。Z. 依然在队伍的最前面，骑着他那匹高贵的阿拉伯骏马，走向哈律泉。我们跟在后面，行走在水池与阴冷沼泽之间，直到我们抵达哈罗德山。这时我们发现，泉水从山坡的一处洞口汩汩流出——正是哈律泉的源头。
>
> 现在是下午四点半。我们就像跟随英雄基甸拯救以色列的祖先那样，跪在水边，快乐地捧起水大口咽下。泉水以东有一个叫杰劳德的小聚落。我们在泉水的西边搭起了35顶帐篷。我们把铁棍敲进土里，再罩上带倒钩的铁丝网。我们还挖了战壕。几小时后，我们建成了一个设施齐备的营地。就像一个军团一样，我们拥有了所需的一切。现在，有了战地厨房，女同志们开始做晚餐。日落时分，我们结束了在艾因哈罗德的第一天劳作。我们一起进了圣餐，并跳起霍拉舞为山谷祷告——这可是山谷里出现的、来自先锋队的第一支舞。

艾因哈罗德的先锋队深深印在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心里。在某种意义上，那是我们的源头，我们的立足点。对我来说，艾因哈罗德同样有着特殊意义——我的家族在这里。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我常常来这儿度暑假。那时的我总被基布兹的神秘光环所吸引。我喜欢走在它阴暗的小径上，享受这个典型公社午后的宁静与慵懒。我会站在公共餐厅的门廊下面，俯视下面青翠的山谷，目光穿越雄伟的基利波山。

现在，我坐在艾因哈罗德残破的档案堆中。我仔细翻查着有关拓荒者抵达第一天的资料，发现它们都有着共同的构成要素：酷热、泉水、阿拉伯人、帐篷以及带倒钩的铁丝网。这些拓荒元勋们流露出来的意识显示，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未来的行动也许需要暴力。他们决意必须占领哈罗德山谷——不择手段。

我不是法官，我只是一个观察者。在这个备受争议的历史临界点，我认为，不要单单放大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我们与他们、以色列与其他。确切地讲，我要扩大观察视野，探求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不同维度的叙述怎样在哈罗德山谷中发生相互作用。

1921年，局势是很明确的，非社会主义的犹太人没有能力将巴勒斯坦开拓成殖民地。如罗斯柴尔德殖民地（就像赫伯特·本特威奇1897年访问的那个）一般，那些基于自由主义价值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以及永远完不成任务的市场调控的资产阶级殖民地，已经走到了尽头。类似迪甘妮亚这样的乌托邦公社同样也行不通。自由、亲近和个人主义与职责和使命是不能兼容的。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想要取得胜利，这就要求有一个组织良好、纪律严明、具有社会主义结构的新社群。从撒索克家族购入的29 000德南的土地，为架构新社群提供了领地基础。就在那个时代，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占据了这块土地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以建立他们庞大的共产主义式的殖民地——基布兹。

基布兹社会主义之所以重要，是基于几个原因。没有先锋队的努力，锡安主义殖民者就不能度过殖民过程中那段艰苦的岁月。没有基布

兹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锡安主义殖民者就不会拥有道德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对保证殖民过程成功进行至关重要。没有基布兹的共产主义成分，社会主义犹太复国运动者就丧失了合法性，他们的举措也将被视为不公正的殖民运动。只有基布兹社会主义能给锡安主义者带来社会凝聚力、坚定的意志以及在那个革命年代所需要的道义律令。只有社会主义基布兹劳动军的民族精神，才能鼓舞锡安主义者占领哈罗德山谷，才能占领巴勒斯坦的土地。

他们的行动不仅辉煌出色，而且英勇无畏。这支在哈罗德山谷扎营的青年劳动军并没有自问，在1921年期间定居巴勒斯坦的8万犹太人要如何面对当地60多万的阿拉伯人；也没有疑虑，一小群巴勒斯坦社会主义者如何领导大离散中的1 500万犹太人开启一段大胆的历史性冒险征程。同赫伯特·本特威奇一样，这74名艾因哈罗德的拓荒者们也是选择性失明的，这种天真庇护着他们也诅咒着他们。他们看到了阿拉伯人，却选择“看不见”；他们看到了散发毒气的致命沼泽，却刻意忽略；他们知道这里的历史环境相当不利，却乐观地相信可以克服一切困难。他们的气质之一，就是钢铁般的反抗精神。对抗着所有的困难，他们在深谷里扎下营地，建立了艾因哈罗德。

当然，他们是叛逆的。他们的革命性至少有六重。这些着手建立艾因哈罗德的74名弱冠青年，他们反抗着那些在大迫害和大离散中失去信心的犹太人，反抗着那些不事生产、仰赖别人施舍的腐朽的犹太人，反抗着基督教的欧洲，反抗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反抗着巴勒斯坦的有毒沼泽和巨大石砾，反抗着巴勒斯坦的那些土著居民。当这支劳动军先锋队在哈律泉边安营扎寨时，他们反抗着20世纪阻碍犹太人生存的各种势力。

我看着营地在扩张。最开始是位于泉水边，以便能够绝对控制山谷的水源。几星期后，艾因杰劳德的农奴放弃据点离开后，他们的营地便扩张到了山坡、空置石屋的右边。到现在为止，艾因哈罗德的劳动军基

布兹已经有了150名同志，搭起了70顶白色的圆锥帐篷。

每顶帐篷的中央都有悬挂煤油灯的赤铁条，三张金属支架床围绕在铁条周围，床上铺着灰褐色的军毯。没有桌子和椅子，但每一张床边都立有用老旧的木质水果箱改造的简易柜子，队员们用以存放私人物品。每个帐篷还配备一支步枪及相应的弹药。白色的沙砾覆盖了这片不毛之地。为了防止在即将到来的雨季中帐篷被毁坏，帐篷周围都挖掘有深深的排水沟，每一顶帐篷都用军用绳拉紧，并用金属钉固定。

一切看起来棒极了，艾因哈罗德的青年创始者们欣喜若狂。“这可真令人吃惊，”其中一人写道，“我忍不住想起《圣经》里以色列的子民们在沙漠中住帐篷的情景。不过他们还要继续前往埃及，而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站——这是我们流浪的终点。”巨大的兴奋不单单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而是整个群体。劳动军的男女队员们齐心协力建起了艾因哈罗德，他们又唱又跳，尽情抒发内心的快乐。在那个夜晚，年轻的双脚踢向天空，年轻的双手紧紧相握，一张张脸庞热情洋溢，一双双眼睛闪闪发亮。他们围着篝火跳着欢快的圆圈舞，就好像在举行一场祈祷仪式，他们跳着，就好像在山谷扎营具有圣经式的意义。庆贺的鸣枪声直冲云霄。

漆黑的夜空被篝火映得通红。受压迫的农奴们好奇地观望这些唱歌、跳舞、鸣枪的新来者，思考着他们是何方人士。惊讶的哈罗德山谷也想知道，这些流浪者们从何而来，为什么他们搭起了帐篷，并且跳舞直到夜深，将它从上千年的沉睡中唤醒。这舞动的欢快何尝不是一种粉饰？当这群跳到精疲力竭的青年回到帐篷、瘫倒在铁架床上，又有谁会意识到，他们所有的人，某种意义上都是孤儿。他们切断了家族根脉，背弃了父母，于是，他们现在的状态是：无父、无母、无神。他们建在基利波山坡上的营地，更像是一座孤儿院。

归根结底，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属于孤儿们的运动，一场欧洲孤儿们发起的绝望的“十字军东征”。当这些被基督教大陆抛弃的子女们逃离代

孕母亲的怨恨后，他们发现自己在世上孑然一身，不再有信仰、不再有父母、不再有家园，而他们就将这样继续生存。因为丢弃了一种文明，他们必须建立一种新文明。因为背离了家乡，他们必须创造一个新家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来到巴勒斯坦，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绝望而坚定地紧紧攫住这块土地。

在艾因哈罗德，这种孤独感则更加深切。它占据了每一个拓荒者的心房和梦境。其中一个青年这样写道：

> 当迁入这片土地……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我们抛却了过往。隔绝了曾经。我们放弃了旧有的身份，又疏远了最亲近的人。一夜之间，我们就将自己从承载父辈文化的肥沃土壤中连根拔除，即使那泥土已沉淀了几千年的历史。然后，冥冥之中伸来一只大手，粗暴地将我们扔进这片不毛之地。如今，在烈日暴晒的焦渴荒野间，裸露的岩石如火在烧。我们直面这烈焰，直面严酷的生存环境，受不到任何保护。在这里，这个荒凉的峡谷，我们必须雕刻我们的生活，用这些山岩雕出我们的基石。在这艾因哈罗德山谷，我们必须挖掘、再挖掘，直到找见那滋养以及鼓舞我们新生活的深藏源泉。

……

孤儿的身份并没有削弱他们。相反，艾因哈罗德的非凡之处，就在于它将这群人的孤独和绝望转变成一部独特的、输送能量惊人的发电机。因为这里没有父亲，也就没有了界限和束缚；因为这里没有母亲，也就没有了舒适和安慰；因为这里没有神，也就没有了仁慈和怜悯。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不会有希望的奇迹。

艾因哈罗德的建立，一开始就基于残酷的现实。这群精疲力竭、现在躺在白色帐篷里酣然入睡的年轻人，知道他们已经没有了避难所。再没有阴凉供他们休憩，再没有大树供他们掩藏。一切暴露在极其残酷的

历史背景下，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终极考验：生存，或者死亡。所有的一切都压在这些小男孩和女孩稚嫩的肩上。他们能胜任这个任务吗？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耐力和毅力？

当犹太人在欧洲没有了希望，犹太人中的青年就挑起了大梁。这是犹太民族的破釜沉舟。这支独特的先锋队走在了历史的前列。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在接下来的短短20年里，欧洲的犹太人将被消灭干净。这就是为什么建设艾因哈罗德成了绝对的当务之急。在这个新建立的基布兹里，没有怜恤，没有放纵，没有宽容，也没有自怜，同样也没有个人权利、个人需求以及个人意愿。每一个人都经受着考验。然而，尽管荒凉孤寂，这个山谷却将见证这些犹太人能否在他们的古老家乡建立一个新的世俗文明，将见证这支野心勃勃的先锋队能否确实带领他贫困潦倒的人民在这里开辟一方新天地，又或者，这个营地将成为又一个没有民众基础和储备的、通向死亡之谷的桥头堡。

当太阳逐渐升起，这里呈现的景致令人惊艳。一排排的白色帐篷点缀在梦幻般的山峦间，一个苏醒的队员将这些帐篷形容为从远方大陆飞越而来的群鸟，降落在荒凉岛屿的山岩上、休憩、恢复体力。

这些队员们不会想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胆大妄为，就好像书写一部新的《旧约》。不过，已经没有时间去思考了。特拉维夫的劳工联盟（the Labor Movement）派来了三辆老式的美国拖拉机，又从加利利的某地买来12匹强壮的、纯种的匈牙利马。于是年轻人可以开展工作了。他们首先清理满是卵石和巨岩的土地，然后种下第一批人造林（有桉树、松树），再铺设一条碎石子路，连接基布兹和当地的铁路车站。姑娘们开辟了一小块蔬菜园。在艾因杰劳德的废弃石屋，小伙子们建起了木工、制鞋、焊接及鞣皮的作坊。诊所也开放了，接待了第一批疟疾患者。他们又兴修了一个公共食堂，招待所有的人，并建了乡村面包房以及临时图书馆。不知何故，还从某个地方运来了一架钢琴。

几周后，所有人翘首以盼白昼的降临。当第一缕晨光照亮山谷，新

建的餐厅里，人们开始骚动。早早到来的人们喝着热咖啡，吃着涂满橄榄油或果酱的厚片吐司。当用餐完毕，男人们整齐地排成一列，唱着歌，踏着军队节奏的步伐，向田野进军。

那些岩块、野生灌木和荆棘已被清理干净，现在的田野正徐徐展开一幅宏大的图卷。两对拉着现代铁犁的匈牙利马引领整支队伍，后面跟着四对阿拉伯骡子，套在本地铁犁上。这支队伍在田地中慢慢前行，犁铧深深刺入土地，留下一条条犁沟。片片日光跟随着翻犁泥土的铁铧，刺穿这个古老山谷的坚硬外壳。当这些铁犁开始耕作，犹太青年们仿佛回到历史长河中，并重新获得了他们的男子气概。当他们翻犁着田地、从事着体力劳作时，他们将自己从客观变为主观，从被动变为主动，从受害者变为统治者。

几天后就到了播种的时候。巨大的喜悦洋溢在这群青年之间。6名播种者肩上扛着半袋麦种，撒播在田地上的每一寸土地。他们迈一步，伸手进袋子掏出一把种子，用力一扬，麦种便划出一道大弧，落入翻犁好的土地里。就这样一步接一步，他们种下了大麦和小麦。当他们结束一天的劳作回到营地时，每个人都沉浸在喜悦与欢乐里。1 800年之后，犹太人终于回到这片山谷，播种土地。他们在公共餐厅唱起欢乐的歌谣，整夜整夜地跳舞，直到黎明。

……

工作进展得非常快。仅仅几个月，艾因哈罗德先锋队就耕作了1 900德南的土地，又播种了其中的900德南，越来越多的野地被清理完毕。他们炸山建起了一个采石场。在奶牛场里，他们挤着牛奶，鸡舍里的母鸡也开始产蛋。在这个6个月大的基布兹，队员们的数量稳步增长：从180人到200人，再到220人。而更令人激动的是，现在这些队员穿着自制的鞋子，享用着自己烘焙的面包，喝着基布兹所养的奶牛产出的香醇牛奶，吃着基布兹鸡舍里捡出的鸡蛋，庆祝从地里采摘的第一批番茄。

当先锋队的一名领导者环视他的队员时，他惊异于他们所创造的成就。他觉得他的同志们就像鲁滨孙·克鲁索（《鲁滨孙漂流记》的主人公），那失去船只被海浪席卷上荒岛后不懈求生的勇士。像鲁滨孙一样，他和他的队员们从不哭泣，也不哀叹自己悲惨的命运；像鲁滨孙一样，他们检视着荒凉的岛屿，想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像鲁滨孙一样，他们利用了他们所能找到的一切。他们是这样脚踏实地，同时又富有想象力和创新精神。他们英勇无畏，就像鲁滨孙一样，创造了一个超现实的、人造的奇迹。

1921年的冬天来势汹汹。呼啸的北风如鞭子一般抽打着营地，带来毁坏与灭亡。大雨如瀑布般从山脊倾泻而下，不时有白色帐篷坍塌。这个临时避难营地不再是避难之所，这群无家可归的青年失去了家园。

悲剧笼罩着这个营地。艾因哈罗德建立仅仅5个月，其中一个创始人就已经离开了这里——年仅24岁的他死于一颗猎枪的铅弹。一个月之后，三声空洞的枪声再次撕裂了宁静的早晨，循声而去，他们发现一个20岁的漂亮姑娘倒在血泊中，身边躺着她25岁、毫无生气的英俊爱人。欲求、绝望和猜忌在营地里蔓延。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人们的情绪同样如此。

其中一名最具有反省精神的队员试图阐释这个问题，他这样写道：

> 我们赤裸地站在宇宙间，我们完全暴露。在这样可怕的形势下，我们试图缔造一种新的生活。然而，我们的生活同样也是暴露而严酷的。我们没有前几代人的微妙玄通，也没有仁慈暧昧的黄昏。这里只有白天和黑夜。白天，我们正午出去进行艰苦劳作，黑夜，我们进行无休止的意识形态辩论。一个有爱的家庭应当有母亲的温柔呵护，以及父亲严厉却饱含鼓励的瞪视。这样的爱意可以令人们甘心承受艰苦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爱意却不存在于这里。即使是随处可见的青年男女之间的亲密接触，实事求是地说，明显是粗暴而生硬的。所以，我们必须面对自己身上暴露的问题，完全坦

诚，完全面对。每一束光的火花，我们都必须注入心田。每一步生命的足迹，都必须从我们灵魂之源的深处行出。而我们去哪里寻求力量？我们如何才可以有能力前进，进而征服每一天？我们又应当去哪里寻求强盛，去哪里？

即便如此，基布兹依然没有瓦解。即便大雨倾盆、狂风怒号，营地依然还是那个热情高涨的营地。自杀及谋杀的阴影只徘徊了一会儿，他们便克服、否认，甚至几乎遗忘了。孤独固然狠狠啃噬着心灵，却同样迫使这个边境社区紧密连接，维系他们脆弱的团结。在漫长的冬季夜晚，他们不再热衷跳舞，而是唱起了民谣、革命歌曲以及哈西德派（Hasidic）曲目。还有一些娱乐节目，如恶作剧、笑话、讽刺素描。他们还创作了第一台戏。图书馆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书籍：马克思、陀思妥耶夫斯基、克鲁泡特金、汉姆生等。爱情孕育滋生，新生儿出世。一些人思索着未来，在帐篷里结合。颀长瘦削的小提琴手结束采石场一天的劳作后，在自己帐篷里奏响美妙的音乐，吸引艾因哈罗德的年轻人侧耳聆听。在昏黄的煤油灯下，那琴声听起来像孤独的哽咽。

1921年12月，当伊扎克·特本金（Yitzhak Tabenkin）加入艾因哈罗德时，劳动军的很多人都吓了一跳。特本金比他们都年长，他将近34岁，已经拥有一个家庭——有妻子和两个儿子。在犹太复国主义革命运动中，大部分参与者都是普通大众，而特本金却是社会名流。他从波兰移民至巴勒斯坦的10年间，已经崛起为最杰出的工人运动领导者之一。鉴于他的朋友及竞争伙伴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决定从特拉维夫发起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特本金选择加入这个已然令犹太民众心驰神往的新基布兹。尽管他仍然在某些方面保持着局外人的身份，但他的出现将艾因哈罗德变成了基布兹运动的圣地。

1888年，特本金生于白俄罗斯，在华沙长大。他的父亲在年轻时就背弃宗教，投身激进的政治运动，母亲亦在波兰的革命知识分子中表现活跃。他的父亲在作为政治犯羁押期间去世，母亲则为前途远大的儿子

奉献了一切。18岁时特本金就在社会主义犹太复国运动界中享有盛名；24岁时他来到海法港，穿越山谷，定居特拉维夫。尽管信奉并且鼓吹劳动，可年轻的特本金并不擅长劳动。比起耕犁田地，他更喜欢高谈阔论。他无法实践自己宣扬的那一套理论，这深深折磨着他，常常令他沮丧万分。有一段时间他曾考虑过自杀。

对特本金来说，加入哈罗德山谷的首个基布兹，也算是一种补偿。他终于可以同真正的劳工一起，做着真正的活计。最后，他站在了伟大的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前沿。尽管特本金并不擅长分析或者雄辩，也并非才气纵横，但却有着自己的独特魅力。艾因哈罗德的青年队员都将他视作父亲或者老师。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特本金就成了基布兹中的领袖、艾因哈罗德的世俗拉比（rabbi）。

从个人气质和个人信念来看，特本金更像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深受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影响，他反对政府，痛恨所有的当权者，怀疑一切军事架构、等级制度及国家统一。当然，特本金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或者非战主义者，他承认使用武力的必要性。他的领导风格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并坚持好战的政治立场。特本金不尊重任何个人，无论是谁。对于他而言，任何个人都是促成事业的简单、原始的原材料。他认为艾因哈罗德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将自己视为先锋，而先锋的要求就是摒弃所有个人权利，因为这些个人权利可能会危害社会主义犹太复国运动的蓝图。

而所谓的蓝图是什么，艾因哈罗德的梦想又是什么？答案显而易见：成为一个强大的、不断扩张的基布兹。特本金及其拥护者拒绝赫茨尔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他们不需要一个犹太民族国家，也不信任国家外交。他们的途径是社会主义，注重实践和务实。他们没有创造一个大国的期望，鄙弃本特威奇维多利亚式的浪漫主义，以及赫茨尔资产阶级上层的精英主义。他们希望以共产主义的方式对巴勒斯坦施行殖民统治，如果条件允许，他们想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工人阶

级的大公社。

而达成这一目标的途径就从艾因哈罗德开始。让艾因哈罗德以最快的速度成长，让它坐拥更多的田地，从山谷攫取更多资源，开拓其在工艺制品、轻工业及重工业方面的利润空间；让它征服目极之处的每一片土地，征服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让它臣服于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以及满足其他一切所需，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实现犹太人的社会主义之梦。

春天来临之时，艾因哈罗德先锋队需要排干山谷的水。一天晚上，一名安静、认真的工程师抵达年轻的基布兹。他穿着灰色的西装，站在困惑的队员们跟前，解释他们接下来应该怎样做。他打开一张地图给他们看，蓝色的粗线是运河主道，细线则是辅助的小水渠。众多小水渠均通往运河主道，最后将山谷中的污水尽数排出。这些由粗线和细线架构的网络，就像渔夫手中的渔网，撒在山谷间，它们将祛除盘踞山谷几千年的沼泽、淤泥及其滋生的疟疾祸患，使山谷清澈并引领它走向进步。

几天以后，山谷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男人。他们穿着卡其布的短裤以及看起来十分怪异的橡胶高筒靴，这些测量员们看起来就像史前的两栖怪兽，然而这群蛙人却能在受诅咒的沼泽中自由行走。他们沿着主运河和小水渠将要开凿的线路打下桩钉，系紧绳子。当他们完成的时候，高筒靴、绳索、各式各样的铲子也被运送到了营地。太阳一出，劳动军的队员们就一头扎进了哈罗德山谷的沼泽。酷热令人难以忍受，而蚊子使这一切更加糟糕。它们萦绕在耳边、眼旁甚至身体私处，从强壮而年轻的躯体里吮吸新鲜血液。沼泽的恶臭汹涌而来，高大的芦苇丛中到处都是蛇，而他们必须开凿运河。

小伙子们五人一组。每一组铲掉一层淤泥，然后前进，下一组紧紧跟上，再深挖一层。袒胸露腹的队员们站在两码宽的湿淋淋的渠坑里挥舞铲子，又把铲起的污秽从头顶上方抛出。当掩埋在沼泽淤泥下几千年的硬土终于显露时，人们爆发出节日庆典般的欢呼。此时，姑娘们也走

过来，手里挎着装满白色沙砾的篮子，那是从早上开始就用她们小巧而高效的凿子开凿下来的。当姑娘们的沙石铺满小伙子们开凿的沟渠时，才开始供应午餐——罐头牛肉和几片面包，就用这些来充饥。

就在几个月之前，这项排水工程看起来还很不现实——像挖掘苏伊士运河一样野心勃勃，像开凿巴拿马运河一样危机四伏。然而现在，这些沼泽一天天地退却。陶土制的排水管道被安放在新凿的、铺设好的水渠里，用来排出那些致命的地下污水。7月的太阳似乎永远不会下山。一英亩又一英亩，沼泽变成了肥沃的田地。锡安主义者的周密计划，锡安主义者的专业知识，锡安主义者的辛勤劳动，打败了诅咒哈罗德山谷几个世纪之久的沼泽。曾经肆虐的疟疾发病率急剧下降，就连周围的阿拉伯邻居也得益于这项奇迹般的工程。荒凉的哈罗德山谷，正逐渐披上绿茵。

在未来的几年里，历史学家们将试图确定哪一条道路才是努力的主要方向：社会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有些人认为，在那个关键时期，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占领那片土地而采取的狡猾手段，社会主义给这个迟来的殖民计划罩上正义、合法的光环。作为哈罗德山谷的殖民者，他们并不像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主人或者罗德西亚的英国种植园主，他们是无可指责的。他们赤手在土地上劳作，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进行着大胆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他们驳斥任何控告他们占领别人土地的言论。然而，所有这些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规划不过是托词，未来的批评者们依然会进行声讨：这是极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道德掩饰，它真正目的在于掩盖其殖民主义及领土扩张论的本质。

真实或者虚假。就在1922年的国际劳动节前，一位住在艾因哈罗德的年轻诗人将《国际歌》 翻译成希伯来文。译本在原词基础上引申出一处尖酸的潜台词：原本有一句指全球的工人阶级，而在希伯来译本里，不单指世界上贫穷的无产阶级，还包括世界上最受压迫的人民。这就是艾因哈罗德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毁灭一个旧世界，缔造一个新世

界；从伤痕累累的背脊上卸下沉重的负担。因为那里没有上帝，没有帝王，没有英雄，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突破重围。我们将在永恒之战的最后战役中光荣获胜。昨天，我们一无所有，明天，我们将赢得一切。

特本金正是这种“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共栖关系的化身。35岁时，他仍然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男人，有着性感的嘴唇和高高的前额。他并没有多么深邃的智慧，却有着历史主义的悲情和信念。他并没有撰写太多文章，却擅长长篇的、富有激情的演讲。他身上有着一些真正苏联式的东西。如果他不是一个犹太人，现在他也许会在某个偏远的苏联集体农场，站在列宁或斯大林的身边，或者参加新西伯利亚某个无产阶级聚会。

但是，特本金是一个犹太人。他相信在20世纪，犹太民族将走向灾难。在大屠杀之前的20年，他就已经每天都感觉并呼吸到大屠杀的气息。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能若无其事地生活。他相信只有在犹太青年当中才有真正的补救之法，只有犹太青年才能在逼近的灾难面前拯救整个民族。但是，他知道没有时间了。他感到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够。巴勒斯坦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哈罗德山谷可能还没有真正归属我们。这就是特本金这样苛求的原因。他对待自己就像对待他人一样无情，他爱说教，责骂人，态度严厉。他一遍遍地宣扬，社会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应该做得更多一些，再多一些；他一遍遍地布道，每个年轻的先锋队员应该成就更多一些，再多一些。艾因哈罗德的先锋性应当超越它的能力，艾因哈罗德必须完成它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特本金并不是一个理论家，比起其他革命者，他没有一个整体的、系统的思想体系，然而，这位艾因哈罗德的拉比却有一个强大的观念：激进。

在意识形态上，激进主义意味着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实现革命价值；在社会上，激进主义角斗着人性，并改变着事物的不公正秩序；在政治上，激进主义主张掌握主动权，并以暴力对抗阿拉伯人。但是，激进主义还有比这一切更广阔的含义——这是犹太人对他们消极的过去的

反抗，是犹太人对他们悲剧命运及接受悲剧命运的反抗。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或准心，却是一种动力，是一种关于行动的动力，是一种敦促人勇往直前的力量，是犹太人抵制被湮没命运的最后尝试。

就像本特威奇一样，特本金并不是我所欣赏的绅士。就我个人而言，我无法忍受苏联式的政客、教条式的革命，以及鼓吹但不实践的领导人。但是，当我在艾因哈罗德的档案里翻看特本金的旧照片时，我更加宽容了。这个男人身上有着迷人的东西。他没有本·古里安的政治天赋，没有其他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的深邃智慧，也没有艾因哈罗德那些同志们令人钦佩的职业道德和端正品行。但是,他有满腔如火的热情。与巴勒斯坦的其他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相比，他更明白大离散，以及大离散中的复杂情绪。与当地的其他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相比，他是一个犹太人。尽管他反对犹太教，但他的的确确是个犹太人。尽管他奋起反抗宗教，但他反抗的途径也是宗教式的。在他攻击和驳斥上帝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太多的神，于是，他尝试缔造一个信仰自由、无神的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特本金成了联系哈罗德山谷与东欧事件的纽带；这就是为什么特本金可以代表大离散中的犹太人与山谷里的青年对话，又代表山谷里的青年向大离散中的犹太人发言；这就是为什么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特本金忧虑在山谷中完成的工作是否充分，忧虑山谷中的青年是否拥有足够的力量，将东欧犹太人从淹溺他们的死亡之海中拉出。

在首个周年纪念日，艾因哈罗德庆祝着它的成功。到目前为止，这个一周岁的基布兹已经掌控了8 390德南的耕地。其中,谷类作物占据了7 000德南，橄榄园和葡萄园450德南，蔬菜园200德南。又有600德南的树林，内有14 000株桉树、200株松树和1 000株柏树，这是基利波山脉第一次被覆上希望的绿芽。

到1922年夏，艾因哈罗德已经有了将近300名同志。除却特本金和

少数几个人，他们的年龄在19岁至25岁之间。200顶白色的锥形帐篷围成一个年轻、繁荣、活力充沛的社区家园，改变了山谷，也改变了谷中居民的生活。谷中又兴建起了四个新的基布兹。哈罗德山谷的发展势头快速而强盛，视野所及之处，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它。

现在，很多人前来探访这个奇迹。随着艾因哈罗德的实验逐渐扬名，全世界范围的犹太社群和进步人士都被它吸引了。有些人将它的革命形式与新生不久的苏联比较，也有些人将之视为建设成功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唯一范例。一名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人士在对其做了为期一天的访问后，有了不同的见解。这位深受感动的国际道德领袖这样评价道：

> 这个国家的死亡山谷崛起了新的一代。新生代的年轻人在我们祖先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复兴着我们祖先的语言，从而寻求到了生命的意义。在我们的人民被迫流亡之后，兴建了覆盖这片土地的水利工程，治理了哈罗德的沼泽——这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奇迹。然而，这个奇迹更象征着治理我们国家所陷入的两千年流亡的泥泞沼泽。你们，哈罗德的先锋者们，无愧为新一代的英雄。你们所做的，是在医治这片土地，也是在医治这个国家。你们将引领我们回到发源之地。

这些聆听的同志们并不是英雄。他们的不寻常之处就在于，他们身上没有英雄主义。他们脚踏实地，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做所有能做的，但他们没有自我膨胀，也没有多愁善感、矫揉造作。纵然被卷入超越自身的历史舞台，他们也只是继续前行，翻开又一条犁沟，清理又一亩田地，治理又一个沼泽，直到他们真正拥有这个山谷，直到这片土地再次归属以色列。

然而，这片土地上还有另外的景致。艾因杰劳德的农奴虽已离去，沙塔的农奴依旧留在那里，他们居住在山谷中央的铁路车站旁。纽瑞斯

的村民从山顶虎视眈眈地俯瞰艾因哈罗德。扎林的村民也曾为山谷的繁荣贡献过一臂之力。泰尔非和可玫的村民成倍增长，因为这里不再有疟蚊夺走年轻人的生命。贝都因人也越发被这山谷所吸引。随着夏季到来，他们在山谷北部支起了黑色的帐篷。他们将成群的绵羊驱赶入田地，他们年轻的、武装的骑兵恐吓着基布兹的姑娘们。所以，任务尚未完成。的确，有一支坚强的犹太人驻扎在山谷里，五个不同的基布兹已经开始形成这个国家的第一条犹太人聚居带。但是，工作仍未完成。哈罗德山谷的阿拉伯人仍然阻碍着犹太人的解放运动，而这项解放运动要求把阿拉伯人清出山谷。

1926年4月17日的中午，哈罗德山谷的工作日被打断了，从采石场传来最后的爆炸声。一小时后，田地里的收割工作全部停止。艾因哈罗德的年轻队员们被召回营地。同样被召回营地的还有泰尔尤瑟夫、基瓦、贝特阿尔法及赫弗齐芭的基布兹青年队员。整个山谷的基布兹社员都在洗澡、剃须，之后他们换上白色的安息日服装。在采石场，他们正在搭建一个木制的舞台，下午4点全部完工。装饰着绿色棕榈叶的旧钢琴立在舞台上。数千名先锋队员或骑马，或骑骡，或驾四轮马车，或驾运货马车，或步行，涌向山谷中采石场的圆形剧场。

从一开始，艾因哈罗德的劳动军先锋队员们就对音乐情有独钟。其中一名队员这样解释道：

> 古典音乐的演奏填补了我们生活中的空虚，只有音乐响起之时，我们的集体餐厅才恍如一个朝圣之地。我们生活空虚是有原因的。远离上帝对我们造成了可怕的冲击，它摧毁了我们作为犹太人的生活根基，这成为我们新生活的悲剧矛盾。我们必须白手起家，从头做起，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新文明。而这个文明的建设，没有任何根基，我们失去了根本原则。在我们头顶之上，有湛蓝的天空和光芒四射的太阳，却没有上帝。这就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真实，一刻也不能忽视。这就是我们的空虚。对我们来说，音乐就

是填补空虚的一种尝试。当小提琴的琴音流淌在我们的餐厅，它同时也令我们反思生活的其他方面。它激荡起埋藏于我们心间最深的、已被忘怀的感觉。我们闭上眼睛，回归内心，仿佛被一个圣洁的光环包裹。

几个月之前的深秋，刚举办了第一次采石场音乐会。当时数千人从山谷各处赶来，聚集于此，聆听当地唱诗班演唱的赞美诗，以及贝多芬、巴赫、门德尔松的弦乐四重奏。当地的一位教员说，在那伟大的一天，基利波山得以复活。一名年轻的姑娘朗读了以西结感灵见枯骨复生的经文。当消瘦、颀长的艾因哈罗德小提琴手在采石场墙壁的背景下奏响巴赫的音乐时，全场陷入了寂静。但是，今天不同了，今天将要登台的是雅沙·海菲兹（Jascha Heifetz）。

海菲兹出生于1901年的立陶宛首都维尔纳。他3岁开始习琴，7岁已能出色地公开演奏门德尔松协奏曲，12岁就被公认为欧洲的音乐天才之一，16岁时——就在《贝尔福宣言》发表的前一周——在纽约的卡耐基音乐厅完成了传奇般的美国首秀。现在，海菲兹是美国公民，也是闻名遐迩的明星。他之于20世纪音乐，就像卓别林之于喜剧，爱因斯坦之于物理。他是一个惊才绝艳的天才，一个非凡人类的罕见化身，几乎可称得上是上天恩赐的礼物。

这就是哈罗德山谷的先锋队员们如此兴奋的原因。不仅仅因为他们喜爱音乐，并视之为神圣，也并不仅仅因为音乐能让他们释放自己、减轻苦痛、滋润他们的眼睛，还基于这样的事实：世界上最著名的小提琴家，通过在他们荒凉的采石场举行音乐会的方式，肯定他们贡献的重要性。这是犹太人在大离散中所建立的最好的世俗文明，向他们在山谷中建立的崭新的世俗文明表达敬意。海菲兹不仅是海菲兹，他同样也是雅沙，我们当中的一员；一个从过去及当今犹太人的痛苦与绝望中崛起并从中提炼出天赋才华的人；一个逃离无望的东欧并选择美国的人。所以，当杰出的同族选择认可他的年轻的犹太同胞们——他们经历了相同

的磨难，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逃至不同的地方——就连劳动军中最强硬的队员也陷入了狂喜。他们觉得类似《圣经》中记述的奇观将呈现于眼前。

现在，成千上万的人挤满坚硬的灰色卵石搭成的临时座位。当海菲兹最后登场时，我看到了大师级的音乐家，以及入迷的听众。无论是小提琴家还是先锋队员，都像那个世纪一样古老；无论是小提琴家还是先锋队员，都将成为那个世纪的标志。他们共同讲述着那个世纪的犹太人传奇。当哈罗德的青年男女狂热地站起来鼓掌和欢呼时，这个直到他们平静下来，才开始演奏的维尔纳小男孩，被真切地感动了。尽管，他是一个冷静的、追求完美的表演家，他同样被感动得不知所措。这个站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的年轻男人，以及那些站在临时搭建的圆形剧场里的年轻队员，他们之间仿佛突然展开了一场亲密对话。从现代犹太人遭遇的不幸中急剧爆发出来的两股强大的力量、两股创造性的能量，它们代表着20世纪的犹太人做出的两个伟大选择，如今面对面地冲撞在一起。在哈罗德山谷的采石场，两种力量互相致意。

当海菲兹伸出他的手臂，小提琴弓在琴弦上飞舞，我想的却是那些即将在山谷中发生的一切事情。

在接下来的3年，艾因哈罗德的长子们将在兴建的第一个水泥造牛奶场里蜷伏数天，以躲避阿拉伯邻居的火枪。

在接下来的9年，阿拉伯村民将被迫离开，他们位于铁路车站旁的家园将被一个新的基布兹所取代。

在接下来的10年——恰好一天也不差——阿拉伯人突然意识到，犹太人已经侵占了他们的大部分领土，于是，阿拉伯人放火把山谷里的田地焚烧殆尽。看着熊熊燃烧的烈焰，艾因哈罗德的长子们将硬起他们的心肠。

在接下来的12年，艾因哈罗德将成立第一支盎格鲁——犹太人精英突击队。这支突击队将夜袭阿拉伯人的村庄，杀死村中的一些阿拉伯平民。

几个月之后，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犹太士官的课程将在哈罗德山谷中开讲。这门课程将为以色列未来的军队奠定最初的基础。

在未来的20年，艾因哈罗德——以及它扶持的几股势力——将会拥有真正的军事实力。在未来的22年，这支军队将会袭击纽瑞斯、扎林及可玫的村民，将山谷中的巴勒斯坦人尽数驱逐。

当海菲兹奏响的音乐回荡在安静的采石场时，我想的是哈罗德山谷中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我想的是，当他们站在那片裸露的荒原直面自己赤裸裸的命运时，为这片不毛之地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复苏；我想的是他们无论如何都要缔造属于自己的祖国的惊人决心。我想的是燃烧在他们心中的那团伟大火焰，没有这团火焰，这个山谷不可能被驯服，这片土地不可能被征服，犹太人的国家也不会建立。然而，我却知道，这团火焰终将失控。它将烧尽山谷中的巴勒斯坦人，也将焚毁它自身。它引燃的火焰，最终将人们对艾因哈罗德的惊叹变为质疑。

我合上艾因哈罗德破旧档案里的海菲兹文件，走出屋子，迈入初降的夜幕中。我与我亲爱的亲戚长辈们一起吃晚饭。我徘徊在基布兹退化的道路上。在过去的30年里，它失去了方向。艾因哈罗德的经济基础崩溃，社会结构解体。许多年轻人离开了，许多长者在绝望中老去。曾经的集体餐厅空无一人，曾经的集体育儿园被关闭，曾经的集体精神消失殆尽。基布兹崛起的同时也在衰落。我向外眺望，看到下面的清泉和山峦的剪影，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选择：是获得胜利的基甸，还是被击败的扫罗王？然而，直到消逝的光芒爱抚着渐暗的山谷，我依旧，没有寻到答案。

---

1. * “德南”是土地丈量的传统基本单位，出自一天之内耕犁的土地面积。1德南约为

1/4英亩。

第三章
柑橘园，1936



柑橘，是巴勒斯坦的特产之一，在当地已有几百年的种植历史。19世纪50年代，在雅法的柑橘园诞生了一个新品种——硕大椭圆、丰厚多汁的沙莫蒂甜橙。1890年，这种新品甜橙已被奉上了维多利亚女王的餐桌。1897年，当赫伯特·本特威奇登陆偏僻的雅法港时，那些送他上岸、头发斑白的码头工人，每一年冬天都要装载数千箱的沙莫蒂甜橙（现在叫雅法蜜橘），将它们送上开往利物浦的货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维生素C营养价值的新认识，使得整个欧洲柑橘类水果的需求量

急剧上升。1925年，巴勒斯坦只有30 000德南的柑橘园，两年后，这个数值就增长了将近一倍，又过了两年，1929年，柑橘园的种植面积增加至87 000德南，到1935年的时候，巴勒斯坦的柑橘园已经坐拥28万德南的土地。在10年里，巴勒斯坦柑橘的种植面积已上升近10倍。这个在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小小行省，成了一个强大的柑橘出口地，以至于到1935年英国进口的柑橘中有三分之一都是雅法蜜橘。

20世纪20年代，在雷霍沃特殖民地，人们发现了柑橘的价值。这个杜兰的奥斯曼封建庄园位于雅法东南约15英里处，建立于1890年，占地10 600德南。这片土地被收购后，曾经占据这里的贝都因人遭到驱逐，那些期望在以色列土地上寻求平静和富足的俄国、波兰犹太人占领了雷霍沃特。这些移居者做得相当不错。在雷霍沃特，正统教徒和世俗者、富人和穷人、阿什克纳齐犹太人[注]和也门犹太人，和谐相处。所有的犹太居民也和他们的阿拉伯邻居相安共居。至1935年，快速发展的雷霍沃特已成为巴勒斯坦最繁华的犹太人殖民地，引领着当地的柑橘产业，也引领着这个国家步入前所未有的繁荣。

雷霍沃特与柑橘园堪称一对完美的黄金搭档。雷霍沃特的干热淋溶土壤（hamra）呈棕红色，肥力十足。其独特的沙、泥、黏土的配比使土壤兼具良好的储水和排水性能，也使充足的空气得以到达果树纤细的根须，非常适合柑橘树的种植。雷霍沃特的温和气候同样适合柑橘树。春天果树开花，气候温和；冬天结果之时，也不会太冷或者刮大风。雷霍沃特拥有果树成长所需的充沛水源，并且靠近雅法港。雷霍沃特接受自由市场原则，私营经济蓬勃发展，邻近的阿拉伯村庄提供了大量廉价、高效的劳动力。此外，雷霍沃特还受益于新成立的农业研究所推行的尖端科技。研究所里，大部分成员都是德国犹太裔的农艺学家，他们引进了高效的加利福尼亚式种植法。在西方技术、阿拉伯劳工和自由放任经济的共同作用下，雅法蜜橘变成了一个世界知名品牌。因此，当欧洲和美国仍然处在经济大萧条的窘境时，雅法蜜橘和巴勒斯坦移民浪潮却使雷霍沃特焕发一派繁荣盛景。当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犹太人失去了

他们在欧洲和美国的家园时，那些选择雷霍沃特的犹太人却踏上了兴旺发达之路。于是，20世纪30年代初，拥有最优越条件的巴勒斯坦与怀揣美好愿望的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者，在雷霍沃特相遇了。

我将讲述一个关于独特的柑橘园的故事，这个柑橘园建立于1931年。据说有一个人从他的英国犹太裔岳父那里继承了一小笔遗产，这个人就拿着这些钱从科贝比村的村民手里购入了70德南的土地。土地位于迪尤谷的丘陵地带，正处铁路的北方，站在小山丘的高处可以俯瞰雷霍沃特。这个人首先开垦了贫瘠的荒地，然后雇用戴着贝雷帽的犹太社会主义者和戴头巾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清理土地上顽固的毒草，并委托一支拥有优秀挖掘工人的流动工程队开凿了一口水井。然而，直到那些兴奋的挖掘工人欢呼着他们找到了水，这个人才意识到，这片土地太适合种植果树了。他用白色的绳子和木棍细致地在土地上做了标记，每隔4米挖一个半米深的坑，在坑中种下从附近苗圃带来的柠檬苗，覆盖上土，夯实，浇水。然后，生于英国的他的娇美而阳光的妻子，站在笨重的老式柯达相机前，带着满怀的希望拍下了一张照片。

几个月后，这位雷霍沃特的农夫将沙莫蒂甜橙的枝条嫁接到柠檬初生的根茎上。他温柔小心地把沙莫蒂甜橙枝条插接、包裹在柠檬砧木上，浇水，施肥，祈祷大风不要掠走幼苗，冰雹不要击打新枝。在经受了长达一年的忧虑后，这名柑橘种植者终于看到长势喜人的嫁接植株，沙莫蒂甜橙和柠檬合二为一了，红色的土壤高兴地接纳了脆弱的苗株。于是，他和他美丽优雅的英国妻子再次站在了柯达相机前，在长排的、刚萌发新芽的果树间，留下了又一张照片，记录了一个忧心忡忡的开始。这对年轻夫妇，丈夫穿着平整的卡其布西装，妻子穿着斜纹裁的丝绸连衣裙，站在从裸露的土地上长出的实验性的柑橘树苗旁。

这名柑橘种植者是雷霍沃特本地人，在其他柑橘园中已工作了好几年。他自律而挑剔，及时浇水，适时施肥。他修剪掉所有多余的枝条，清除掉杂草，用水泥封好井壁，在井上安装了一台大功率的柴油齿轮

泵，又兴修了一个大的露天的方形水池蓄积从井中汲取的水。他规划了一套水泥砌成的灌溉水渠网络，使水流四通八达，又在柑橘园的沙质土壤中开凿沟渠来引水。还在每一株沙莫蒂树苗周围开挖了一个沙坑，这样树苗就永远不会缺水。随后，他兴建了一个现代包装厂（厂房是长方形的，有方形的窗户和红色的屋顶），并且他为果园的阿拉伯守卫们盖了一栋两层楼高的塔楼式住房。在果园的入口，他竖起了一道装饰极其华丽的铁门。然后，他足足花了四年时间，耐心等待这些果蔬孕育出甘美的果实。

1935年的春天，当柑橘园的果树开始结果时，犹太复国主义也同样成熟了。现在，犹太人的解放运动已不再是1897年4月赫伯特·本特威奇途经雷霍沃特时，那般天马行空式的幻想，也不像1921年9月在哈罗德山谷创下的斯巴达式的革命事业。1935年时，犹太复国主义已不需要先驱者们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和牺牲。它已经有了一群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舒适而悠闲。它有了城市、城镇、殖民地和村庄。现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已经超过了巴勒斯坦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这个数值还在以超过10%的增长率逐年递增。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在海法，建立了以色列理工大学。已有25年历史的特拉维夫俨然成了一个小型都市，放眼望去满是剧院、餐馆、咖啡馆和众多的出版社。然而，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眼前的任务就像赫拉克勒斯所面临的那般艰巨。但是，在全国各地，成功的预兆是那般明显，锡安主义的冒险变成了锡安主义的现实。在青翠欲滴的雷霍沃特柑橘园，春天里湛蓝的天空仿佛带来了未来的承诺。

那时萦绕在人们心中的不仅仅是成功感，还有正义感。1935年的春天，犹太复国主义成为正义的民族运动。在德国选择纳粹主义的两年之后，一个犹太人家园的必要性不言自明。无须赫茨尔的先知天赋，或是塔本金的危机意识，人们就已经预见到了未来。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可以看到欧洲已成为犹太人的死亡陷阱。同样清楚的是，美国不会及时地敞开大门，拯救饱受蹂躏的欧洲犹太人。只有一个建在巴勒斯坦的犹

太民族国家，才能拯救数百万濒临死亡的生命。1935年，犹太复国主义的正义是无可反驳的普遍正义。

在那段时间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当地阿拉伯人造成的不公还是有限的。诚然，在哈罗德山谷，在雷霍沃特，在巴勒斯坦其他许多地方，巴勒斯坦的佃农被剥夺了土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农民在他们的阿拉伯主人手下讨生活时，生活水平比犹太殖民者执掌这些土地时要差得多。在阿拉伯人统治时期，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财产实权，而当犹太人占领后，很多人得到了现金和土地作为补偿。而且，当这些巴勒斯坦人确实遭受苦难时，很多人也的确受益于先进的犹太复国主义。在科贝比、扎努加和环绕雷霍沃特的其他阿拉伯村庄，犹太人的资本、犹太人的技术、犹太人的医疗，都为当地居民带来了福祉，给绝望的巴勒斯坦社会带来了进步。所以，雷霍沃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依旧可以相信：两国人民之间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们还不能预见到那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悲剧。

新生的柑橘园迎来的第一个春天是关键性的。柑橘种植者必须启动大功率的水泵，从深井里汲水；必须清理灌溉渠中冬天脱落、积压的还未成熟的果实；必须再次开挖沟渠和土坑、除草、清理土地、修剪干枯纠缠的树枝；必须确保在夏季第一场雨到来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就绪。

1935年4月底，灾难降临。滚滚热浪袭击着果园，4月27日，温度计中的水银柱爬到35摄氏度　（95华氏度）。4月30日，又一举攀上了38摄氏度。接连十天，干燥的沙漠风暴肆虐着娇柔的白色柑橘花。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种植园主将失去果园中一半的柑橘，这一年的收获季也将化为泡影。因此，这个新生的雷霍沃特果园的第一次灌溉刻不容缓。清洁的井水被水泵抽出，注入水池，又从水池流经那些露天的、水泥加固的水渠，从泥栅的圆形开口流进沙沟。阿拉伯人守卫卷起裤脚直到膝盖，赤裸的双足全是泥巴，用锄头将水从这棵树引流到那棵树。他迅速

地在每一棵树旁垒起高高的土堆，将水聚在其中，这样这些果树就能承受干燥、致命的沙漠风暴了。

滚滚的热浪令人恐慌。果园需要更多的水源，并且需要想尽办法节约用水。柑橘种植者和阿拉伯守卫们在闷热的天气里一起工作，长久地驻扎园中。然而，在这样的惴惴不安中，他们仍然能听到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他们奔来看喷涌的井水，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大声叫嚷。当这些孩子伸出小手参与这项伟大的协同劳作后，他们跑到方形水池旁，欢快地跳进凉爽的水里。当成人们还惴惴于灾难临近的恐慌，并与酷热苦苦斗争时，年幼的孩子却在人造的伊甸园里，发现了属于他们的乐趣。

在热浪消退和紧急灌溉工作完成之后，5月、6月和7月，孩子们一次又一次回到柑橘园。他们在水池里洗澡，在水渠里放出纸船，在密密的树林中捉迷藏。7月底，他们吃惊地看着从遥远南部来的骆驼长车队提前抵达果园，用黄麻袋运来一袋袋满满的羊粪。到了夏末，雷霍沃特丰润、肥沃的巴姆拉土壤造就出了一个优良的沙莫蒂甜橙园，枝条上开始冒出闪闪发光的小香橙。

1935年7月底，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去世。9月中旬，纳粹德国强制执行了种族主义的纽伦堡法案。以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观点看，这两件事件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德雷福斯是犹太裔的法国军官，他被迫害的遭遇令赫茨尔恐惧，这就是20世纪等待着欧洲犹太人的噩梦。种族主义的纽伦堡法案证实他的忧虑是对的。难以想象，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数百万的犹太人将被投入化学毒气中。而就在1935年的夏天，柏林的犹太人正在经历他们一百年来都未曾体验的事情——大屠杀。当这个消息在夏末抵达雷霍沃特时，事实已经确凿无疑：大雪崩开始了，欧洲犹太人将被灭绝。

那个时候，圣地中的犹太人正沉浸在欢庆的汪洋。1935年2月，海法，里雅斯特航线新启用的三层甲板新式轮船在特拉维夫举行入水庆典。豪华游轮成为这个季节的时尚主题。1935年3月，特拉维夫市主办

了普珥节，人们如《旧约》记载一般狂饮至不省人事。五万人在首个希伯来城市的大街上欢庆了三天三夜，直到喉咙嘶哑。1935年4月，又举办了马卡比运动会。来自28个国家的3 050名犹太运动员参加了运动会，在成千上万的观众面前展示着自己的肌肉力量。1935年的5月人们见证了1934~1935年度的收获季打破了历史纪录。新数据显示巴勒斯坦输出了700多万箱的柑橘、葡萄柚和柠檬，而前一年只输出了550万箱。1935年6月，在这块应许之地，拍摄了电影《应许之地》（Land of Promise）。一支由德国摄影师组成的强大队伍，用胶片记录了先锋者们在这片古老土地上演绎的奇迹。1935年7月，特拉维夫布为一个月后即将在瑞士的卢塞恩召集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举行了选举。选举和大会共同证明，现在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已经有了一个成熟而强大的政权体系，并且正以有序、文明和民主的方式有条不紊地运行。

1935年，雷霍沃特很好地折射了犹太复国主义已取得的全部成功。1890年建立伊始，这个殖民地只有280人，到1935年6月，这里已经居住着5 500人。并且雷霍沃特仍然在膨胀。在1936年1月，人口将达到6 500人。到接下来的夏天，将达到9 000人。几乎每天，都有医生、科学家、农学家、建筑师、工程师和音乐家从德国逃亡到这个乡村殖民地。逐渐地，他们改变了雷霍沃特，赋予它在学识、格调、文化上更高层次的体验。1935年6月，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的第一家分行打开了它典雅的大门。新建的、现代的市政厅有着可伸缩的屋顶，每周将在这里放映两部电影，每月都将举办一次音乐会。现在，雷霍沃特有了一个冰库、一家小制药厂和一家大橙汁厂，有了一个农业研究所和一个科学研究所，以及年轻人踢足球、打网球和手球的运动场。雷霍沃特不再仅仅是农业的，它还是科学的、金融的、工业的、文化的以及体育的，一年比一年更好。

整个秋天非常平静。逐渐地，雷霍沃特的人们开始意识到1935年9月15日在德国生效的新法案的全部意义。更多有关37个德国城市中犹太人被袭击的消息传到了这里。但是，在巴勒斯坦，天气还很晴朗。8月

相当凉爽，9月也是如此。柑橘种植者终于放心了，4月酷热带来的恐慌被远远抛在身后。现在，他必须铺设从果园到包装厂的窄轨铁道，几个月后，这些铁轨将承载特莱西恩施塔特制造的特雷西纳轨道车。不过这并不紧急。秋天的工作可以缓慢开展。在对果园和未来的殷切希望中，工作完成了。

1935年10月，这个柑橘种植者坐在他宽敞的雷霍沃特豪宅的阳台上，他翻阅着当地的周报，远处水泵那儿传来安静的水滴声。报纸上满是福特汽车、西屋冰箱、RCA收音机、麦斯威尔咖啡和吉百利巧克力的广告。他注意到一则关于本周在英国发起的雅法蜜橘广告大战的报道，非常高兴。他愉快地阅读着英国电影院和百货商场正在推出雅法蜜橘的消息。显而易见，在英国市场上，雅法蜜橘领先于来自西班牙、南非和加利福尼亚的竞争对手。当这位柑橘种植者读完报纸，在他阳台的石头椅子上闭上眼睛放松心情时，他听着柑橘园里辛勤工作的水泵处传来的滴答声——这是安静的声音，是和平和富足的声音，没有任何声音如这般甜美，同时也代表一段试验中的征程抵达终点。由此上溯到1　800年，犹太人从来没有这样的好生活；由此上溯到1　800年，犹太人从来没有像这样，如此安心、充实、平静地居住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

然而，在雷霍沃特周边，萦绕着令人不安的阿拉伯人问题。柑橘种植者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一个巴勒斯坦的本土居民，他了解那些阿拉伯人，知晓他们的语言辞令和行事方式。他认为与阿拉伯人相处的关键是相互尊重。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种植园主，他觉得他懂得一个人什么时候需要坚强和刚硬，什么时候需要谦恭和慷慨。所以，当黎明时分，科贝比和扎努加的村民来到柑橘园工作时，柑橘种植者是严厉的。种植者让村民站成一排，一个个地检查，确认他们双手干净，不会弄脏他优良的柑橘树，确认他们都修剪了指甲，不会划伤他珍贵的果实。当其中一位村民被怀疑偷了一头毛驴时，这位种植园主没有当众给他难堪，而是谨慎小心地拜访了村中的长者，结果，那头毛驴被悄悄送了回来。当其中一位村民惹上警察陷入麻烦时，柑橘种植者将他保释了

出来。他还提供医疗和财务担保。在果园工作的阿拉伯村民都非常尊重他，他们钦佩他的学识，感激他的公平，畏惧他作为主人的权威。他们看待他，就像奴隶们看待一个仁慈的封建领主。与此同时，柑橘种植者看待这些阿拉伯村民，就像任何一个殖民点的任何一个种植园主看待他的工人一样。他认为他的工人是优秀的，他们强壮、灵活，又严守纪律。他们全心全意地工作，倾力侍奉主人。一直以来，这个柑橘种植者这样认为。

有一个人是与其他人不同的，这个人就是柑橘园的守卫阿比德（Abed）。他完全忠实于种植园主，也深得种植园主的信任。这就是为什么，他与高挑苗条的妻子、高大健壮的儿子以及年轻漂亮的小女儿被允许住在柑橘园。每当种植园主离开，阿比德就接管了果园。寒冷的早晨，是他走在覆满露珠的地上，启动强力的水泵。夏天，他灌溉；秋天，他施肥；在冬天即将来临之时，他擦洗着包装厂房。他戴着白色的针织帽，穿着滚边的东方马裤，蓄着傲人的黑胡子，以威严领导他的同事。他比他讲究的老板更挑剔，要求所有他看到的一切都井井有条，整个柑橘园都得到精心的养护。

与其他工人一样，阿比德在邻近的扎努加村出生并长大。雷霍沃特近一半的劳动力都来自这个村庄。而柑橘种植者也与村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非常清楚近期的一个趋势：在过去的10年里，扎努加的人口翻了一倍，居民总数达到了2 400人。在过去的5年里，他的柑橘园面积也扩大一倍，达到了2 555德南。在接下来的10年，房地产的价格将飙升10倍。如同雷霍沃特，扎努加也在高速发展。因为太多的扎努加村民在雷霍沃特工作，并在那里花费了大量时间，所以他们也从雷霍沃特获益良多。他们现在可以驾驶拖拉机，操作水泵，打理现代的柑橘园。他们建造了现代的石头房屋，越来越多的民房模仿雷霍沃特的房屋式样。在雷霍沃特，他们购买了西式夹克、西式家具、锅碗瓢盆、牛肉、罐头食品、医药和婴儿食品。所以，到1935年秋，柑橘种植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阿拉伯人不再是一个问题。在柑橘园工作的阿拉伯工人不是问题，

阿比德和他的家人更不是问题，甚至邻近的扎努加村也不是问题。雷霍沃特发展，扎努加发展；雷霍沃特兴盛，扎努加也兴盛。每天早晨，扎努加的工人们来到柑橘园的大门前，看起来一切都很好。每天，几十个扎努加的小青年们骑着自行车进入雷霍沃特，一切看起来也很好。没有理由去相信，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能在这里和平共居。没有理由去相信，有一天，扎努加村与雷霍沃特会终止往来，扎努加的村民将一去不返，忠诚的阿比德和他的家人将被逐出雷霍沃特的天堂。

然而，在遥远的北境，距离柑橘园很远的地方，正发出一些其他的声音。虽然还没有成形，至少，还不够让坐在整洁阳台上的柑橘种植者看清，然而多年以前就开始形成的某种地下活动，现在即将浮出地面。

伊兹·阿卜德·阿尔卡德·穆斯塔法·尤瑟夫·艾德丁·阿尔卡萨姆（Izz Abd al-Kader Mustafa Yusuf ad-Din al-Kassam）出生于1882年的西叙利亚。他在开罗学习了伊斯兰教义，回到大马士革后成为一个激进主义的革命者。1918~1920年，他在叙利亚领导了一场反对法国统治的民族宗教起义。起义被镇压后，他逃亡到海法北部的海滨城市做教员，并且成为伊斯提克拉一所清真寺的布道人。他的魅力，他所宣扬的阿拉伯爱国主义，以及他对阿拉伯穷苦百姓的奉献，使他迅速成为当地的英雄。与变质和腐败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不同，他是来自人民中的人，被人民所认可，被人民所爱戴。阿尔卡萨姆并不是个伪君子。他实现了伊斯兰圣战与反对文盲与无知之战的有机结合。他既带来了宗教激进主义，也带来了社会激进主义。如同社会主义的锡安主义者，他旨在缔造社会内部与外部的改变。他促成了一场民族的、政治的、精神的和经济的革命。

1925年，阿尔卡萨姆制订了一个五阶段计划：做好革命的思想准备，建立秘密的革命基地组织，收集武器、资金和情报，屠杀犹太人，以及发动全面的武装斗争。1930年，这个计划开始执行，巴勒斯坦北部形成了秘密基地组织的网络。每一个基地组织都有 5 名全心致力于伊斯兰教、保密工作以及对抗犹太人的成员。晚上，阿尔卡萨姆在迦密山的

采石场训练他的人员，从这里可以俯瞰海法。他鼓吹宗教、道德，收集步枪，自制炸弹。1931年4月，阿尔卡萨姆的信徒们杀害了三名驾着干草车走在回家路上的基布兹社员。1932年1月，一名农夫在家门口被他们杀害。1932年3月，他们又谋杀了另一名农夫。1932年12月，在伊兹拉村庄，他们向村民家里投掷炸弹，炸死了一名农夫和他8岁的儿子。

当警察实施追捕时，这些秘密的基地组织又转移到了地下深处。而他们的领导者不断地鼓吹，这就是“圣战”的实现方式，犹太移民正在从巴勒斯坦人民手里偷走巴勒斯坦，每一个犹太移民都是他们的敌人。但是，时机还没有到来，他们必须耐心，他们必须训练、准备，等待一个信号。

1935年10月18日，当柑橘种植者正为他的首个收获季做准备时，一艘满载比利时水泥桶的货轮抵达了雅法港。一个桶掉下来摔破了，从里面滴溜溜滚出成千上万发步枪子弹。整个港口陷入一片恐慌。显而易见，这些非法的军火正要运往那个非法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哈加纳。几小时之后，港口的恐慌席卷了全国。此刻，巴勒斯坦人民发现，不仅仅有来自犹太移民的威胁，犹太人的军备同样也是一个威胁。在发动一场大罢工之后，阿尔卡萨姆决定展开行动。在距离雷霍沃特柑橘园80英里的一处地方，他发表了最后的演讲。“我教导过你们教义，也教导过你们国家的意义，”他对他的信徒们说道，“现在，你们履行责任的时候到了，就是进行‘圣战’。喔，伊斯兰的教徒们，出发，‘圣战’！”

当这个布道人结束他的宣讲时，所有的人热泪盈眶。信徒们亲吻他的手心，承诺为安拉献出生命。但是，当午夜他离开海法前往撒玛利亚北部点燃巴勒斯坦人民大起义的革命之火时，只有12个男人跟随了他。最后，起义的唯一“成果”就是在1935年11月7日，在距离哈罗德山谷不远的基利波山，枪杀了警察摩西·罗森菲尔德（Moshe Rosenfeld）。一天之后，阿尔卡萨姆团伙开始遭到英国军队的追捕。他们发现，自己没有一处避难所可以容身，不论是在艾因哈罗德之上的纽瑞斯，还是艾因

哈罗德附近的扎林。于是，这些叛军逃到了道唐谷，被一架英国飞机发现。这场在大英帝国和绝望叛军之间爆发的战争持续了三个小时。五名巴勒斯坦人被抓获，三名被击毙。第一个被打死的，就是伊兹·阿卜德·阿尔卡德·穆斯塔法·尤瑟夫·艾德丁·阿尔卡萨姆，他死于1935年11月20日。于是，当阿拉伯工人带着首次收获所需的木梯、草篮和修枝剪抵达柑橘园时，雷霍沃特的柑橘种植者再次平静了下来。阿尔卡萨姆死亡一周之后，他没有看到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所看到的：阿尔卡萨姆仅仅是一个开始。阿尔卡萨姆的死亡神话，其危险性远远超过这位叛党领袖活着时候的所作所为。阿尔卡萨姆将成为巴勒斯坦的第一位殉道者，他如同切·格瓦拉般的传奇将在以后的世世代代中流传，令他成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标识。然而就目前来说，柑橘种植者并不理解北方这一系列事件的意义。他相信英国政府已经成功铲除了突然出现在基利波山的毒草，没有理由再报以忧心。现在的时间该用来关注那些硕大圆润、甜美多汁的果实了，它们坠在郁郁葱葱的柑橘树的枝条上，正在变成橙黄色。

11月极其潮湿，大雨下了13天。在三天的时间里，112毫米的降雨席卷了整片橙树林。每天晚上，柑橘种植者在他宽敞的别墅大厅里踱来踱去，忧虑冰雹的到来。如果冬季的冰雹如那场春季热浪一般扫荡果园，这第一年他将一无所获。好在随着风暴消散，天空再次变得明澈，柑橘种植者发现，他的果实安然无恙。当他站在果树下——现在已经挂满累累的蜜橘，他觉得充满希望。也许，11月降雨的祝福弥补了4月哈木辛的诅咒。也许,在历经重重困难之后，他年轻的果园将迎来第一个收获季的繁荣。

柑橘种植者并不是那类相信可以白白获得福祉的人。这片土地所需要的，是汗水、奉献和严谨。1935年12月的第一周，柑橘种植者清理了通向柑橘园以及园中的小径。他剪去了果树的丫杈，这样，在收获时就不会擦伤果实。他打开了包装厂沉重的大锁，那里是他存放梯子、修枝剪、背包和篮子的地方。他确保这些梯子是牢固的，修枝剪的长刀片被

磨得锋利。他将粗糙的篮子用软黄麻线串起来，用以保护果实。

12月底，早期的采摘工作开始了。为了保护敏感的青色果实，工作全部由手工完成。1936年1月，当冬日金色的暖阳把雷霍沃特上方的天空涂抹得蔚蓝，沙莫蒂甜橙的收获工作正式开始。阿拉伯的采摘工人两人一组，一个人蹬上三脚梯，在上面采摘柑橘，另一个人隐在灌木丛中，在下面摘。采摘柑橘时，他们用左手手掌温柔地笼住柑橘，再用修枝剪的圆形刀片扣住叶柄处剪下，令果实从树枝上剥落，然后，再把柑橘小心地放进背包里。

柑橘种植者站在队伍中监督工作，确保梯子不会撞到柑橘，确保修枝剪不会在果皮上落下疤痕，确保柑橘是轻柔地快速放入背包中。当这些加利福尼亚制造的背包装满了柑橘，他召唤来一个贝都因姑娘，让工人们把袋里的柑橘悉数轻柔地倒入她的草篮中。当草篮子也满了，他就让工人帮忙把篮子举到贝都因姑娘的头顶，然后，这个贝都因姑娘就加入了她同伴的队伍——她们分布在果园的各个角落。柑橘种植者乐于见到贝都因姑娘的队伍走在柑橘树间的景致，她们穿着黑色的连衣裙，头顶的草篮里满载着发亮的雅法蜜橘。

当时间步入1936年，柑橘种植者开始有点忧虑。令人不安的传言在流传。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媒体正在煽动民众反对犹太人。雷霍沃特的一些朋友担心有什么恶劣的事情正在逼近。但是，当地的周报仍然在1936年1月12日报道，巴勒斯坦出口了2 794 165箱柑橘；到1月19日，这个数值达到了2 923 571箱；到1月26日时，上涨到3 259 609箱。柑橘的产量令人满意，市场条件非常有利，犹太复国主义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作家摩西·史密兰斯基（Moshe Smilansky），雷霍沃特众多柑橘种植者的领导人，在当地周报上用强烈坚定的语气这样写道：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进入一个国家的方式像我们进驻我们

的国家一样。一切的发生有两条理由：第一条，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等待我们的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进驻一个不属于我们的新国家；第二条，我们的民族拥有古老的文明，在我们流亡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在古文明中注入了来自新文明的伟大财富。我们把所有的财富作为礼物，带回到我们古老的土地，也带给在我们离开时定居此地的人民，那些周边的东方人……

从来没有一次殖民活动像我们一样，给被殖民的土地和人民带来这般福祉。我们脚步踏过的每一个角落都发生了良好的变化。我们行善是为自己，也是为我们身边的人。这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正义事业的骄傲。没有一个殖民活动像我们的事业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必经的历史进程。没有这个国家，我们不能复兴；没有我们，这个国家也不能复兴。这个必要的历史进程是为了保证，我们的伟大事业不会受到人为的阻碍。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绝对正义。它基于尊严和大爱。

仲冬，姗姗来迟的冬雨冲刷着包装厂的红瓦屋顶。在温柔的雨中，贝都因姑娘们头顶着草篮，走进包装厂长长的、昏暗的大厅。她们的主管将姑娘们的篮子卸下，帮助她们轻柔地把篮子里的柑橘倾倒在铺有草席的水泥地上，然后，把柑橘拢成一堆堆高约一米的果堆。在2月的黎明曙光中，在新盖的现代包装厂，柑橘种植者看到了从地上升起的一堆又一堆柑橘。

首先工作的是分拣工人。这些也门的分拣工有着锐利机敏的眼睛，他们的双手在果子间飞舞，从中挑出达到出口质量的柑橘。然后是包装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新来的欧洲犹太男女。他们用精致的棉纸包裹每一个柑橘，就像它们都是一颗颗宝贵的珍珠。

现在轮到装箱工人出场了。他们戴着工作帽，穿着卡其布的制服。他们是包装厂工人中的精英。凭借惊人的速度和精度，他们在每一个箱子里装满一排排新鲜的柑橘，也装入巴勒斯坦的骄傲。

最后,则是木匠，他们在前面的门廊处工作。他们小心地用铁锤把钝的、生锈的钉子敲进板条箱盖，将箱子封好，这样柑橘就不会互相挤伤，安然度过漫长的海外旅行。

现在，装满柑橘的板条箱一个叠一个成排地垒在包装厂附近。不久以前，它们还需要被骆驼驮到码头，但是现在有了小型卡车，小卡车载着板条箱，沿着沙砾路开上了雷霍沃特的主干道。到了雅法港，箱子被卸下，送上开往利物浦的轮船。在利物浦，这些柑橘将被送往伦敦科芬园的批发市场。从科芬园，它们将被送到切尔西、贝尔格维亚、汉普斯特德、樱草山、圣约翰伍德，甚至白金汉宫。

柑橘种植者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善于行动。但是，当冬雨袭来时，他在长长的大厅里来回踱步，看着这些分拣工、包装工、装箱工和木匠。他看到他们双唇紧闭，专心工作。他们沉浸在安静、有序、神圣的工作氛围中，似乎男女工人们都意识到，他们正在参与一项远超乎他们自身的伟大事业。柑橘种植者想起了史密兰斯基说过的话，那些言论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此刻的情绪。犹太店主们的儿女已经变成了优秀的柑橘种植者。他们学会了爱惜这些柑橘树，精心地培育它们。这一代，犹太人完全改变了自己，以至于现在美国农业部担心巴勒斯坦飞速发展的柑橘产业将破坏国际柑橘市场。

厂房外，卡车的引擎咆哮着；门廊上，木匠们用锤子叮叮当当地装钉柑橘箱；但是，在门内，安静无声，一个个柑橘被包裹上精美的二苯纸，一个个柑橘被轻柔地放进箱子中的合适位置，一切都是那么精准、熟练，如同朝奉一般。一切都是那么和谐：男人，女人；也门犹太人，阿什克纳奇犹太人；犹太人，阿拉伯人。两块大陆的两个不同的族群，肩并肩地一起工作，共同生产出金色的果实。

几年后，史密兰斯基的侄子伊扎尔（Yizhar，后来成为以色列主流作家之一），将试图捕捉20世纪30年代雷霍沃特的魔法。他这样写道：

一切都是不疾不徐，有条不紊。每个人都过着舒适而节制的生活，出行骑毛驴或马。一切都是开放的，切切实实的开放。一切都是宽广的，带着农民优秀的坚定精神。尽管那里的麻烦从未停止过，那里也经历了忧虑和紧张的时光，但是，雷霍沃特却变成了一块和缓而冷静之地，那里的人们值得尊敬。

那里平静而安全，事情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就好像，在往来的人们、丰收的柑橘园、缓缓飞行最后降落在桉树顶上的鸦群之间，存在着什么秘密协定。到了夜晚，寂静完全地笼罩了这里，大地沉浸于水泵汲水的滴答声中，以及从遥远处飘来的弦乐，还有豺的吼叫声。在安静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听到远方的海浪声。

在灯笼的微光下，作家写文章直到夜深。公鸡一轮轮地啼叫，毛驴从腹腔深处发出嘶鸣。一切仿佛诉说着，不论怎样，都没什么可担心的，整个世界都秩序井然。

当你来到雷霍沃特，就好像来到一个严肃而阴沉、诚恳而又坦率的地方。人们在这里谈论着至关重要的议题，也关心无关紧要的琐事。肥沃的柑橘园中，一片片青翠绿得发蓝。金合欢围绕的篱墙散发着阵阵香气，金色的花朵点缀在金色的道路上。骆驼们驮运着沉重的柑橘箱，灌溉池如梦幻般荡漾，鲁莽的小伙儿子们在池中尽情畅游。这儿仿佛始终有一颗活跃的心脏在跳动，一下又一下，永不停息。在柑橘树荫下，清水日日夜夜地不断从沙土地的深处涌出。

然而，当我回顾过去，在1936年的3月中旬，我目送柑橘种植者在甜蜜慵懒的下午时光，骑着他的马儿离开包装厂，我看到的不止这些。这个柑橘种植者尚不知晓，就在铁路以南的一栋两层楼的石质建筑里，在这个新成立的西弗研究所，将诞生以色列未来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农业研究所的裘玛斯克家族试验田中，将涌现以色列未来的现代农业技术。这些居住在米勒周边的包豪斯式房屋里的德裔犹太科学家和农学家们，用他们的天赋和学识改变着这个殖民地国家。1936年的雷霍沃特是

安详、冷静、和谐的，这里孕育着未来的种子，一个令人惊异的未来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返回雷霍沃特的路上，柑橘种植者骑着马儿路过了冰库，路过了小制药厂，以及新铺砌的赫茨尔大道上新建的咖啡屋。柑橘种植者还途经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面包房、理发沙龙、新建的巴士车站以及新来的澳大利亚摄影师经营的新商店和兜售电气设备的新商场。他路过了体育场，年轻人正聚集在这里进行体育锻炼，还有乡绅俱乐部，德高望重的当地乡绅正在里面聚会。然后，在新建的妇产科医院旁，马儿爬上了山丘，来到宏伟的犹太教堂，在这里就能俯瞰整个雷霍沃特。向西望去，柑橘种植者看到了工人们的营房。向东眺望，便是属于富裕的柑橘种植园主的宅邸。南方，是也门人的地方。北方，就是著名建筑师埃里克·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为犹太复国领袖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博士建造的宫殿般的现代别墅。2000年以来，犹太人没有一处地方可以定居，而现在，在雷霍沃特，他们有了一个安居之处。

1936年，在雷霍沃特一切都很平静。犹太复国主义革命与革命所带来的演变之间维持着平衡，快速发展的需求与稳步发展的决心之间也维持着平衡。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人士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一致同意，逐步发展才是进步之路。两派人士都希望，犹太复国主义者们能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并自然地实现人口的逐渐增长。这里并没有暴力占领土地的言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都想让犹太复国主义者完成身份的自然构建过程。他们想通过土地耕作的方式，实现民族的融合。1936年3月，雷霍沃特没有任何形式的集权主义，没有布尔什维克主义，没有法西斯主义，也没有军国主义。雷霍沃特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人道、务实、温和而平衡的，它把19世纪末种在这里的种子浇灌成鲜活的现实。

1936年4月初，在柑橘园中举行了季末派对。这个柑橘种植者并不是热衷聚会的派对党，但是，他的特拉维夫朋友们却坚持要举行派对。

他们说，现在的时尚就是在沙仑、犹大和雷霍沃特的柑橘园里举行野外的春季派对。他们认为柑橘园里的包装厂正是举行聚会的好地方。他们自发地安装好了笨重的发电机，聘请了流行爵士乐队，在新兴都市的维也纳风格的咖啡厅里做了宣传。他们邀请了苗条的柏林姑娘，以及披着水貂皮的波兰上流社会的贵妇们。这些客人驾驶着美国豪华汽车，组成了欢乐车队，从特拉维夫的罗斯柴尔德大道开到柑橘园的大门前，兴奋地按响喇叭，打着车灯。

柑橘种植者并没有真正地加入派对。他不唱歌，也不跳舞。尽管喧哗的客人们向他举杯致意，但他更喜欢在一旁观看。他的包装厂已经成了夜总会，他站在角落，看着特拉维夫的年轻企业家们，正为也门妙龄女郎一杯杯痛饮的雷霍沃特年轻的柑橘种植者们，以及现在定居特拉维夫的世故的欧洲城市移民，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他惊讶地看着这些浮华的进出口代理商拥着醉醺醺的、几乎衣不蔽体的少女，滑进临时铺就的舞池。乐队演奏的音乐愈发轻快，最开始是华尔兹，然后是探戈，然后到深受欢迎的狐步舞。在舞会女郎们喧闹过后，一对对的舞伴更加肆无忌惮了。柑橘园里，有几对舞伴从亮堂处悄悄溜进了昏暗的地方。

当太阳升起时，从城市来的人群已经散了，柑橘种植者又变成了独自一人。守卫阿比德和他的儿子们将桌椅搬出厂房，扎努加的工人们平整院子，清洗水井房。带着一点沮丧，他们捡起了遗落在灌溉池旁的一件丝绸文胸。柑橘种植者背过身，踏着他的高筒靴，走进厚重的晨露中。

他思考着犹太人与柑橘之间的神秘联系。他们大约同时到达了巴勒斯坦，扎根在同一块沿海平原。他们都需要这里的肥沃土壤，这里的阳光和蓝天，这里的温和气候，以及面朝大海的生活。如果英国没有统治巴勒斯坦，犹太人和柑橘都无法在这里繁衍生息。现在，1936年4月，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犹太人和柑橘同时走向繁荣昌盛。

柑橘种植者在柑橘园里漫步，一群野鸡扑腾着，一只兔子蹦跳着跑

开，一只狐狸从灌木背后偷偷打量，蜜蜂在上空嗡嗡地跳着圆圈舞，然后猛地降落在花蕾吸食它的蜜汁。柑橘种植者还发现了猫鼬和豺的新鲜足迹。柑橘园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界的缩影。

柑橘种植者觉得，一切都是那样不可思议。此时，距离他从科贝比村民手里购入迪尤山谷的70德南荒地仅仅6年，距离他清除地上的毒草、种下1 000株瓦伦西亚树苗和4 000株沙莫蒂甜橙仅仅5年。而现在，似乎眨眼之间，这5 000株幼苗就变成了一片森林。曾经灰色、干旱的荒地变成了一个动植物的绝佳栖息地，就好像它们一直在这儿一样。柑橘种植者环视四周，他看到一个人造的自然盛景。

柑橘种植者思索着犹太人的复兴和这个国家的复兴。现在，巴勒斯坦大约有30万德南的柑橘园，其中有超过一半的果林属于犹太人。预计下一年柑橘的出口量将达到1 000万箱。到1939年，预计将出口1 500万箱。如果没有灾害的侵扰，到1940年，巴勒斯坦将出口超过2 000万箱的柑橘，这将使这个国家成为世界柑橘产业的主导力量。犹太人在当地柑橘园的成就充分证明，这些海量的橙色黄金可以无限地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这片土地的慷慨是无限的，巴勒斯坦吸纳和拯救犹太人的能力也是无限的。

这名柑橘种植者登上了果园的制高点，环视四周。在果园的南方，是红白相间的雷霍沃特房屋。西方，则是科贝比和扎努加沉睡的石头房屋，殖民种植园就夹在它们当中，与它们和谐共处。果园的北方，是巴勒斯坦大地主们宏伟的东方式宅邸，这些大地主们与新兴的犹太人以及他们枝繁叶茂的果园，一同走向兴旺发达。向东眺望，通向兰布尔的道路长满高大的棕榈树，远处，可见耶路撒冷山脊浅蓝色的轮廓剪影。这位柑橘种植者并不天真，他关注着来自德国的消息，他留意着从阿拉伯城市和村庄中冒出的不详的谣言。他知道，1936年的雷霍沃特正受到一股强大力量的威胁，这股力量冲击着欧洲犹太人，改变着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但是，现在，他站在自己柑橘园的最顶峰，无论看向哪个方

向，入目所及之处，都是柑橘园。有新生的，有长熟的，有犹太人的，也有阿拉伯人的。它们从地上冒出，就好像得克萨斯州的石油涌出地表一样。于是，这位柑橘种植者觉得，这片土地是被祝福的，这片土地充满希望。雷霍沃特的殖民地就是一部鲜活的圣约，预示着犹太人将在犹大平原结束他们两千年的流浪历程。他们将来到这里，建立一个家园，种下一棵树，扎下它的根系。他们将白手起家，创造如绿色海洋般的柑橘园，这里将是充满着和平和富足的家园。

---

1. 阿什克纳齐犹太人（Ashkenazi Jews），也叫德系犹太人，指源于中世纪德国莱茵兰一带的犹太人后裔（阿什克纳齐是希伯来语“德国”的音译）。他们普遍采用意第绪语或者斯拉夫语言作为通用语，其文化和宗教习俗受到周边其他国家的影响。

第四章
马萨达，1942



1936年4月15日，响起了第一声枪声。黑暗的清晨，在撒玛利亚山上图勒凯姆路的非法检查点，大约有20辆车被拦截下来，停泊在一排排山岩和沥青桶旁的小站。头戴面罩的武装人员要求每名司机和乘客交出钱财，以支持阿拉伯事业所需的步枪和弹药。但是，当55岁的兹维·丹嫩贝格（Zvi Dannenberg）和70岁高龄的伊斯雷尔 ·哈赞（Israel Hazan）开着满载雏鸡的卡车驶向特拉维夫的市场时，卡车被歹徒拦截，持枪的歹徒认出他们是犹太人，将他们拽出卡车并射杀。丹嫩贝格当场死亡，哈赞因失血过多死在了未熄火的卡车旁。

第二天，沙仑平原的艾普鲍姆香蕉园，两个穿着卡其布衣服的犹太人来到了阿布·赖斯（Abu Rass）的临时小屋。当时，已近午夜，阿布·赖斯听到敲门声，起身为这群不速之客打开了门。这群人向他和他同屋的埃及人开了11枪。阿布·赖斯当场死亡，他的埃及室友在漆黑夜色中爬行100码后虚脱而死。

第二天，伊斯雷尔·哈赞的葬礼在特拉维夫市中心举行。很快，送葬的人群失去了控制，葬礼变成愤怒的示威游行。成百上千的人聚集在街上，高喊复仇。几伙人试图将镇上正准备开始一天工作的阿拉伯卡车司机和鞋匠以私刑处死。“在血与火中犹太陨落，”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大声呼吁道，“在血与火中犹太将得到复兴。”

两天后，谣言在雅法蔓延，宣称四名阿拉伯人在特拉维夫附近遭到谋杀。几百名阿拉伯人涌上街头，向城市的警察局和政府总部进军，要求他们交出那些“死者”的尸体。随后，他们成群地聚集在街道的每个角落，等待那些牺牲的阿拉伯人的尸体，向犹太人的巴士、出租车、汽车扔石头，攻击每一个路过的无辜犹太人。

一名23岁的法官助理，哈伊姆·帕什哥德（Chaim Pashigoda），在前往雅法司法登记办公室的路上，被一群手持石头、锤子和刀的巴勒斯坦人袭击并杀害了。埃利泽·拜索基（Eliezer Bisozky），一位上了年纪的操依地语的犹太人，试图逃离愤怒的雅法城。他跳上了一辆前往特拉维夫的马车，不幸又摔了下去，落到暴民手中，被拳打致死。30岁的泥水匠哈伊姆·科恩菲德（Chaim Kornfeld）和34岁的维克托·库珀米兹（Victor Koopermintz），正在雅巴尼亚的专属阿拉伯区粉刷一栋宏伟的阿拉伯宅邸，从柑橘园港口而来的暴徒将他们殴打致死。同样被打死的，还有伊扎克·弗伦克尔（Yitzhak Frenkel）和耶胡达·希曼托维（Yehuda Siman-Tov）。电工戴维·夏巴多（David Shambadal）来到一家咖啡馆安装新的照明系统，被一帮阿拉伯青年剁成肉泥。齐利格·莱文森（Zelig Levinson）在雅法边境遭到步枪扫射身亡。

第二天，又有7名太人遇害。短短三天里，16名死于阿拉伯暴行的受害者被埋葬在特拉维夫，80名伤者在市内医院接受治疗。由于血液短缺，还发动了公众献血。

在接下来的一天，国内巴勒斯坦领导人呼吁总罢工。现在，暴力采取了一种新形式。在耶路撒冷，在卡法梅纳科姆的众多基布兹，在北方的贝尔福森林，暴徒们开始纵火。哈罗德山谷的田地被焚毁，成百上千德南的柑橘园被砍伐或者夷平。三周后，5月13日的耶路撒冷旧城，两名犹太人被谋杀。5月16日，在耶路撒冷的爱迪生电影院，一群观众正走出场厅，当中的三名犹太人遭到狙击手射击。8月13日，在萨菲德，一伙暴徒闯入一家正统犹太人的宅邸，杀害了正睡觉的父亲、16岁的儿子、9岁和7岁的女儿。第二天，4名犹太人正开车前往位于卡梅尔森林一处静谧山庄休养，遭到阿拉伯人伏击。第三天，在距离雷霍沃特不远的萨拉班德，一名犹太人被谋杀。就在萨拉班德被害人的葬礼仪式上，暴徒从一辆过路火车上向特拉维夫繁华的赫茨尔大道投掷了一枚炸弹，造成19名犹太人受伤，一个8岁的犹太男孩死亡。第二天，在雅法公立医院，前来上班的两名年轻犹太护士被射杀身亡。三天后，一枚步枪子弹射穿了一名学者的头骨，那时他正在耶路撒冷自家简陋的书房中研读一份古老的伊斯兰手稿。接下来的一天，在卡法萨巴柑橘园工作的一名犹太女工和三名犹太男工在下班回家路上被谋杀。

整个犹太社会惊骇万状。的确，之前曾有过类似的暴行。1920年3月，曾在加利利北部爆发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第一次对峙。1920年4月，耶路撒冷发生了几次骚乱。1929年8月，在希伯伦和萨弗德发生了大屠杀。但是，所有这些都是短促零星的暴力事件，来得快也去得快。一位英国官员将之精确地描述为内盖夫地区的山洪暴发（内盖夫位于巴勒斯坦南部沙漠）。然而，1936年的持续暴力事件是不同的，它在巴勒斯坦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席卷全境的矛盾冲突。因为，它伴随着巴勒斯坦总罢工，并且由巴勒斯坦国家机构推动，它不会被误解为别的含义，其本质就是：阿拉伯——巴勒斯坦地区集体的民族主义大起义。

1936年的春末和夏初，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应是很拘谨的。直到下半年的8月，阿拉伯恐怖袭击的四个月之后，犹太人才采取了第一批的报复行动。1936年的夏季80人死亡、400人受伤的伤亡数字，烧焦的田地，被夷平的柑橘园，路边的伏击以及持续整晚的枪击，改变了犹太人的集体意识。1936年4月至8月发生的残酷事件，将犹太复国主义从一种乌托邦式的幸福状态推至反乌托邦式的斗争状态。由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现在主张并要求立即停止犹太移民，所以，现在无法忽略阿拉伯人定居这片土地的事实，无法忽略阿拉伯人唾骂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事实。犹太民族解放运动必须认识到它正面临着一场阿拉伯解放运动，而这场运动试图驱逐已定居在海岸线一带的犹太人。

日复一日，报纸刊登都是死者通告，以及诸多的葬礼演变为游行的报道。但是，在犹太社会里，并没有恐慌或者绝望。相反，一天天地，他们看起来越发不屈不挠。悲惨的现实不仅没有削弱他们的坚强意志，反而更加鼓励了他们，令1936年定居巴勒斯坦的350 000犹太人结成了一个战斗的团体。

11月，以皮尔（Peel）勋爵为首的皇家调查委员会（Royal Enquiry Commission）抵达巴勒斯坦。仅仅几周，这个委员会就意识到，不断恶化的现实是极其严峻的。八个月之后，1937年7月，委员皮尔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将这片土地划分为两个民族国家——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同时，报告建议现居犹太国家的阿拉伯人需要“移居”到其他地区，现居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也是如此。从这一刻起，这种“移居”的意识——特指阿拉伯人口的迁出——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主流思潮的一部分。1935年时，“移居”意识曾不被理睬，而1937年，它被接纳了。在犹太复国运动发起之初，这种意识曾是绝对的异端，而当犹太复国主义面对面地与一个民族运动对峙时，它成为被大众普遍接受的观点。

伯尔·卡茨内尔森（Berl Katznelson），劳工运动的精神领袖，在

1937年11月发表了一次演讲：“我的良知绝对清楚这件事情。一个远方的邻居好过附近的敌人。他们移居并不会失去什么，我们更不会有损失。总之，这次改革对双方均有利。有一段时间，我认为，这是最佳解决办法。而在骚乱期间，我开始确信，这是必须采取的方式。但是，我从没想过会移居到纳布卢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确信，他们会移居到叙利亚和伊拉克。”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主席戴维·本·古里安在1938年6月发表讲话说：“对于犹太国家的阿拉伯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请他们移居到阿拉伯国家。”一年后，本·古里安宣称“强制的转移将为我们清出广阔的领土。我支持强制移居，在其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不道德的成分”。

1940年12月，约瑟夫·韦茨（Yosef Weitz），犹太民族基金会（Jewish National Fund）林业部的主管，拜访赫伯特·本特威奇位于特拉基色的宅邸后，在私人日记里这样写道：

> 必须明确，就在我们之间，这片土地上的两个民族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空间。没有任何进展将引领我们达成目标——在一块小小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如果阿拉伯人离开，这个国家对我们来说宽敞无比；如果阿拉伯人留下，这片土地依然狭小而贫穷。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以色列的土地上，至少以色列的西部土地上，没有阿拉伯人。这里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迄今为止，犹太复国主义事业……进展良好……但是，它仍然没有为以色列人民建立一个国家。没有别的解决方式，除了将阿拉伯人从这里迁出到邻近国家。迁出所有的阿拉伯人，伯利恒、拿撒勒、耶路撒冷旧城也许可以除外。不保留任何一个村庄，或者任何一个部落。移居地可以是伊拉克、叙利亚，甚至外约旦。因为，这样才会获得资金，大量的资金。只有通过这样的移居方式，这片土地才有能力吸纳我们数百万的兄弟姐妹，犹太人问题才会得以解决。只有这种方式，没有其他。

20世纪30年代末，巴勒斯坦的犹太社会还没有办法促使阿拉伯人移居。但是，人们大肆谈论复国主义领导人关于新国家的畅想。赫伯特·本特威奇在1897年登陆雅法港时被压抑和否定的东西，现在都浮出了水面。曾经令人震惊的、来自伊斯雷尔·赞格威的深刻洞悉现在变成常规思维的一部分。不到一年时间，对现实的一种残忍见解在人们心中扎根：我们，或者他们；生，或者死。

意识形态的改变不仅发生在领导人阶层，整个犹太社会都改变了。1936年一系列暴行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经历了蜕变。不再有清白、自欺欺人、道德自律。随着新的、残酷的现实感知，兴起的是新的、残酷的决心：我们绝不后退，我们绝不让步。我们将竭尽所能，来传承犹太复国主义。

1936年秋至1937年秋，暴力事件暂时偃旗息鼓。但是，1937年10月，阿拉伯起义再次爆发。我祖父最好的朋友，阿维龙·亚林（Avinoam Yalin）在耶路撒冷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外被射杀后，犹太人采取了复仇行动，谋杀了一个阿拉伯路人和一个亚美尼亚的摄影师。在犹大山地，当五名种松树的先锋队员遭到伏击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接连杀害了两名阿拉伯人，然后在城市的繁华市场旁，一辆汽车爆炸，车里的两名阿拉伯妇女被烧死。仅仅一个月，无辜的阿拉伯受害者数量就超过了无辜的犹太人受害者数量。

1938年，阿拉伯大起义达到高潮，阿拉伯人试图占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警察局被烧毁，山区一片混乱。阿拉伯解放运动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冲突变得野蛮而残酷。在一年的时间里，超过1 800人遇害。尽管，大多数伤亡是来自英国人与阿拉伯人、以及阿拉伯人之间的对抗，但是，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敌对行动中的受害者数量也上升了。在这场血雨腥风中，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暴行，以及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暴行，变得更加恐怖狰狞。

1938年3月，阿拉伯人袭击了一辆从雅法开往萨菲德路上的汽车。

他们杀害了车上的六名犹太乘客，当中有两位女士、一个年轻姑娘和一个小男孩。姑娘被强奸，然后被杀死并分尸。这次事件掀起了愤怒浪潮，导致加利利一个犹太极端分子对阿拉伯巴士发动了袭击，但是没有成功。6月底，一个犹太恐怖分子被绞死，犹太民族主义者们陷入了疯狂。7月3日和4日，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发生了若干起暗杀事件。7月6日，在海法的阿拉伯集市，犹太人用定时炸弹害死了18名阿拉伯人。7月15日，在耶路撒冷旧城集市，犹太人用定时炸弹炸死10名阿拉伯人。7月25日，在熙熙攘攘的海法集市，犹太人引爆了一枚高能炸弹，炸死了超过35名阿拉伯人。8月26日，在雅法港的柑橘集市，犹太人引爆一枚隐藏严密的炸弹，炸死24名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也没有坐以待毙。6月23日，他们袭击了基瓦艾达殖民地，造成3人死亡。6月5日，蓄意谋杀艾因维拉的柑橘园工人，4人死亡。6月21日，基亚特哈洛希尔贫穷的工人区遭到一次计划周密的袭击，5人死亡。8月4日，基布兹哈克维什一条土路上的地雷爆炸，6人死亡。8月28日，基布兹艾因撒玛遭到袭击，两人死亡。9月10日，麦斯密安枢纽站的电力公司员工遭受私刑折磨，7人死亡。9月14日，一枚地雷在哈罗德山谷东部的外围地带爆炸，3人死亡。10月2日，提比利亚爆发大屠杀，8名成年人和11名孩童被杀害。

1938年上半年，以色列人的暴行与阿拉伯人的暴行有一个明显区别：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和大多数阿拉伯民众纷纷支持袭击犹太平民，而袭击阿拉伯平民则遭到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谴责。大多数犹太杀人犯都是边缘恐怖组织的成员，他们蔑视巴勒斯坦犹太社会选举出的领导人，蔑视他们所制定的政策和指示。另外，一些犹太人的行为远比阿拉伯人的行为更致命。1938年的夏天与1936年夏天的不同点在于，被谋杀的阿拉伯受害者的数量远远超出被谋杀的犹太人数量。

夏天大屠杀带来了另一个戏剧性转变的事件。在哈罗德山谷，反抗的苏格兰突击队战士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上校建立了五支夜间

特别行动队。1938年6月，这个计划开始实施。正式组建后，小队的任务是保护穿越山谷的伊拉克——海法石油管道，然而，他们真正的任务却是开展反叛乱的斗争，以盎格鲁——犹太人的反恐行动对抗阿拉伯人的恐怖主义。开始时，温盖特的战士们在山谷中设伏，与阿拉伯人的武装团伙斗争。不久之后，他们开始突袭阿拉伯村庄，对村民发动恐怖袭击。

这时，关于抢劫和死刑犯的报道越来越多。1938年秋，夜间特别行动队变得更加残忍。当艾因哈罗德的当地英雄伊扎克·斯特曼（Yitzhak Sturman）因乘坐的汽车碾过地雷而被炸死后，盎格鲁——犹太人游击队愤怒地扫荡了基利波山上的帕奎村。当提比利亚的19名犹太人被杀害后，游击队在前往萨菲德的路上、在达布利亚村和赫提村采取了报复行动。14名阿拉伯人在萨菲德路上被杀，15人死于达布利亚，在赫提村，大量平民遇害。

指挥夜间特别行动队的是英国的军官。一般来说，英国士兵是更无情的战士，但是，哈加纳的战士们愿意与他们结成搭档。随着这种新的好战精神被认可，他们成为巴勒斯坦年青一代希伯来人的英雄。9月13日，在艾因哈罗德基布兹的圆形剧场，温盖特启动了一个军士长课程。这个笃信宗教的基督教民兵指挥官毫不怀疑这起事件的意义。“我们在这里建立锡安之军。”他对面前的100名犹太青年说道。

1938年冬至1939年春，英国以铁腕镇压了阿拉伯大起义。但是，犹太人的恐怖主义袭击并没有收敛。1939年2月，海法火车站、海法集市、耶路撒冷集市发生爆炸，超过40名阿拉伯人丧生。5月29日，在比阿达斯，4名阿拉伯妇女被谋杀。6月20日，一枚炸弹在海法的阿拉伯集市爆炸，大量无辜的阿拉伯人丧生。6月29日清晨，5个驾着马车进入雷霍沃特的阿拉伯村民被枪杀。7月20日，在雷霍沃特的柑橘园，又有3名阿拉伯人遇害。

1939年9月19日，哈加纳的总参谋部成立了。在一个犹太国建立之

前，兴起了一支组织精密的军队。阿拉伯人起义虽然终结，但是，巴勒斯坦的犹太社会却做出一个建设性的决定：组织国家的军事层级架构。20个月之后，1945年5月15日，帕马奇武装突击队（Palmach Strike Force）成立。期间，哈加纳的军需工业不断壮大，并且发展呈现多样化趋势。参与犹太复国运动的青年都接受了准军事化的训练。

现在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经不再抱有幻想。它意识到，1936~1939年的残酷内战仅仅是个开始。犹太民族主义运动正在为新一轮的暴力做准备。没有人知道在什么时候、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但是，没有一个人怀疑将再次爆发矛盾冲突，且来势凶猛。人们已将1936年夏天的创伤深深埋在心底，并从中吸取教训。在1939年4月19日早晨，当哈伊姆·帕什哥德、埃利泽·拜索基、哈伊姆·科恩菲德、维克托·库珀米兹、伊扎克·弗伦克尔、耶胡达·希曼托维、戴维·夏巴多尔以及齐利格·莱文森在雅法遇害之后，锡安主义与之前相比，已经面目全非。然而，重新定义的犹太复国主义需要一个象征和一个圣地。当它被重新定义、转变自己后，它需要一个新的中心。

马萨达仅高于海平面63米。但是，由于马萨达东部的死海低于海平面大约400米，所以，马萨达台地则高于高盐的海水460米。它的西部是犹大沙漠，南部是索多玛，北部有艾因基底、艾因费什察和耶利哥。在晴朗的日子里，隐约可见远方耶路撒冷模糊的轮廓。

山壁陡峭，几近90度垂直。山顶呈平坦的扁菱形，长645米，最宽处315米。沙漠的悬崖由沉积岩组成，岩层顶盖为白云岩和石灰岩。从远处看，马萨达看起来就像一座孤独的沙漠堡垒，有着震撼人心的威严，让人敬畏。

哈斯蒙王朝首次在这个自然的堡垒上人为建造了一座要塞——马萨达。他们于公元前2世纪建造了马萨达要塞。在此后的100年中，马萨达要塞被称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要塞。但是，使马萨达成为一个建筑传奇的却是希律王（King Herod）。在公元前36年至公元前30年，他围绕着岩

体修建了带岗楼的掩蔽墙，建造了瞭望塔、兵营、华丽的房屋、宽敞的仓库、石头雕刻的水池，并将所有这些都纳入一座惊人的宫殿。

当公元66年爆发犹太人反对罗马帝国的大起义时，马萨达是义军攻占的第一个要塞。公元70年，罗马人镇压了起义，占领了耶路撒冷，摧毁了寺庙。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小群犹太教的坚贞教徒坚守马萨达，进行最后的徒劳反抗。公元72年，罗马第十军团（the 10th Roman Legion）包围了马萨达。公元73年春，军团准备攻入要塞。在进攻的前夜，960名马萨达男子、妇女和儿童自杀身亡。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屈从罗马人的统治。

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马萨达。坚贞信徒的故事被视作极端主义者的自杀行径，马萨达遗址也被遗弃了1 000多年。1838年，美国游客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Robinson）和伊莱·史密斯（Eli Smith）成为首次识别马萨达遗址的现代人。1842年，美国传教士塞缪尔·W. 沃尔科特（Samuel W. Wolcott）及英国画家W. 蒂平（W. Tipping）首次登上马萨达要塞。1875年，著名的英国船长克劳德·赖格尼尔·康德（Claude Reignier Conder）首次绘制出马萨达的精确地图。1932年，德国学者阿道夫·舒尔滕（Adolf Schulten）在废墟遗址周边进行了全面的考古研究。

1923年，记载马萨达传奇的唯一史料——弗莱维厄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犹太战记》（The Jewish War）（成书于公元75年）被译为希伯来文。1925年，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约瑟夫·克劳斯纳（Joseph Klausner）满怀激情地转述了马萨达传奇中的坚贞信徒。两年后，伊扎克·拉姆丹（Yitzhak Lamdan）出版了他的悲剧诗歌《马萨达》（Masada）。当犹太民族主义复兴后，民族主义者同样感兴趣于那个偏远的、被遗忘的遗址以及遗址所体现的一切。20世纪20年代，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高中生组织了若干次前往马萨达的旅行，直到一次旅行发生一起致命的意外事故才终止。不过，一直到阿拉伯大起义结束、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马萨达并没有完全俘获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思想。只有边缘的民族主义者才崇拜马萨达传奇中自杀的狂热信徒。

1942年1月，什马利亚胡·古特曼（Shmaryahu Gutman）年满33岁，精力充沛、富有活力、极富魅力。他略显矮胖，但是身体敏捷，行动起来十分快速。在沙漠徒步旅行和攀岩方面，没有人是他的对手。1909年，他出生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3岁时，跟随家人移民巴勒斯坦，定居哈罗德山谷外围的麦哈维亚。青年时期，他在米凯维以色列的农艺高中求学，并成为青年劳工运动的领导人之一。21岁时，他建立了基布兹“纳安”（Na’an）。但是，作为一个业余的东方学者、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基布兹的生活并不能满足这位年轻、精力充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在这片土地上旅行，也带领一批批青年徒步旅行。他是《国土报》耶迪亚特（国土知识）运动（Yediat Haaretz Movement）的支柱，他的理念就是研究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达到地与人的融合。与此同时，古特曼同样与劳工党领袖、犹太复国主义者伯尔·卡茨内尔森、伊扎克·特本金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他最好的朋友伊斯雷尔·加利利（Israel Galili），是哈加纳军事组织的战略策划师。

在1940年早期，古特曼并没有一个正式的职位；但是，实际上，他是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内部圈子的一员。作为一名教育家和一名杰出的道德权威，古特曼可以秘密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隐秘的部分。他认为，他的角色就是引导希伯来青年专注于前方的道路。

1942年1月，古特曼决定带领青年先锋运动的精英们前往马萨达。这次旅行并不是普通的远足。古特曼自己就是一个坚定的信徒，试图改变青年们的集体意识。他想让这些希伯来青年团结在某个强大、具体的象征周围，而这个象征他认为就在马萨达。1941年10月，他带领马萨达研究的初级实验班来到特拉维夫，然后选择了46名青年运动领导人——他将在次年1月带他们去马萨达。在他看来，这些精心挑选的年轻特工即将发生改变，他们将成为马萨达的新传教士。他们将使马萨达成为犹

太复国主义者身份标识的新中心地。

1942年1月23日，星期五，古特曼和他的46名门徒离开耶路撒冷。清晨，一辆阿拉伯巴士载着他们来到希伯伦南部的巴勒斯坦村庄——雅塔。三匹骆驼驮来了他们从当地巴勒斯坦人那里租来的帐篷、装备、食物和水。向导是巴勒斯坦的贝都因人。青年男女们穿着短裤、高筒靴，帆布背包里装满了卷好的军用毛毯。一些人拄着手杖，一些人在脖颈围上了阿拉伯式头巾，所有的人都带着水罐。当他们沿着白色的山峦走进犹大沙漠，他们大声地唱起了歌，满怀无限热情。

古特曼要比这些年轻的、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想得更多。事实上，他是忧郁的。就像他在50年之后告诉我的，他完全清楚这些17岁的年轻人为什么如此积极乐观。在过去的几年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过着平静的生活。自从阿拉伯人起义被粉碎、阿拉伯民族运动瓦解后，这个国家一直处于和平状态。在1940年年初，犹太人的经济呈飞跃式的发展，犹太人组织也凝聚了力量和权威。大规模的工业革命业已发生。ATA公司（ATA Ltd.）现在正在为英国军队的士兵生产制服，与此同时，埃立特公司（Elite Ltd.）、莱伯公司（Liber Ltd.）和Z.D.公司（Z.D. Ltd.）正为他们提供巧克力棒。梯瓦公司（Teva）为英国皇家军队生产药品和医疗设备，艾西斯公司（Assis Ltd.）则提供橘子酱和果酱，而社会主义的索莱尔·伯尼集团（Solel Boneh）则为英属巴勒斯坦、埃及、伊拉克、伊朗等地修建桥梁、铁路和军事基地。柑橘产业虽然陷入危机，但是，钻石行业已经取代它成为巴勒斯坦的主要出口商品。于是现在，以色列不仅出口雅法蜜橘，还出口帐篷、绳索、伪装网、降落伞、靴子、水罐、起重机、烤箱、刮胡刀、轮胎、测量设备、塑料制品、光学设备、医疗用品、干冰、丙酮、乙醚、啤酒、皮革、电话线、电线和地雷。从事这些行业的犹太雇员数目在短短三年间增长了三倍，工业产值在五年里已增长五倍，出口总额也在两年内翻了一番。现在的巴勒斯坦，犹太工业产值与阿拉伯工业产值的比率达到了6∶1。因为就业岗位增多，工资大幅上涨，工厂以每天三班倒的轮班制，昼夜不停地开工。集体所有

的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蓬勃发展。剧院总是座无虚席，咖啡馆的客人川流不息。当古特曼带领他的年轻学员进入沙漠时，特拉维夫正在举办第四届——也是最成功的一届——时装周,迷人的皮兹咖啡馆里，华丽舞会正在进行。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如此自信。他们是幻想与憧憬的儿女，而现在，这个幻想将变为现实。他们自力更生，不断创新，他们的生活体验是惊人的集体功绩。

但是，什马利亚胡·古特曼却知道犹太复国主义陷入了困境。尽管，它抵挡住了20世纪30年代的阿拉伯起义，带来了20世纪40年代的经济奇迹，但是，历史却对英勇无畏的犹太民族事业关上了大门。阿拉伯人的威胁并没有消失殆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非常清楚，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决定巴勒斯坦命运的残酷战争将再次打响。

然而，威胁并不仅仅来自阿拉伯人。就在距离利比亚的班加西不远的地方，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刚刚成功击溃了英国的防线。1941年的夏天，德国人看起来会从北方攻入巴勒斯坦。但是现在，似乎他们将要从南方进攻。面对阿拉伯和纳粹的双重威胁，显然，如果不使用暴力，犹太复国主义将以失败告终。它依然将被载入史册，却以虚假的弥赛亚之名。这就是以色列的青年必须时刻准备着的原因。只有锡安的儿女，才能拯救锡安主义彻底毁灭的命运。

巴勒斯坦的向导们迷路了。天色渐晚，在沙漠泉水处短暂休息两次后，队伍终于抵达一处贝都因人的营地——计划中本来应是正午时分到达的。一些旅者想在这里过一个晚上，精疲力竭的骆驼也走不动了。尽管遭遇挫折，古特曼依然决定继续前行。毕竟，这正是他带领这些学员来到沙漠的原因：锤炼他们的意志，坚定他们的决心，教导他们面对任何逆境都不要退却。太阳已经下山，沐浴在月光下，他们继续跋涉。骆驼不能负重前行，年轻的男人们就接过来担在自己的肩上。

现在这场旅行已经完全改变了。向导错误、行程延误、对贝都因向导的疑虑，瓦解着这群徒步者的意志。他们从前天凌晨三点开始赶路，

而昨夜他们也没有真正睡着。他们经历着焦虑和疲劳。在漆黑的夜晚，他们的眼睛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因为缺水，他们的喉咙干渴难耐。沉重的背包，重量全落在肩带上，几乎要把他们的肩膀切成两半。空气都是咸的。沙漠里满是沟壑和峡谷，看不见任何植物、动物或禽鸟。只有不断前进的队伍，发出沉重的脚步声。

当然，古特曼并不知道，就在上个星期二，1942年1月20日，第三帝国的15个部门代表聚集在柏林的万湖别墅，通过了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他也不知道，向东驱逐犹太人的计划已经实施。他更不知道，在六个星期之后，在偏远的名叫奥斯维辛的集中营，将建成一座狭小的红砖房，这是德国人建立的首个毒气室，用来消灭犹太人。但是，古特曼确确实实地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欧洲犹太人未来的黯淡预言正在变成现实。他知道，在德国占领的每一个国家，德国人将找出犹太人，把他们聚集在一处，送进犹太人区。

因为他对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古特曼意识到，对犹太民族来说，现在的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他看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典型欧洲战争中常规的反犹太大屠杀。有些以往从未有过的事情正在发生。十几万犹太人已经遇害，而这个数字将很快上升到数十万。如果苏联红军不能在克里米亚和列宁格勒阻挡住德军，灾难将很快来临。危在旦夕的不仅仅是犹太复国主义。对犹太人来说，1942年可能是自第二圣殿覆灭后最悲惨的一年。它可能是犹太人灾难性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年。

当古特曼看着这些徒步者，他理解这段旅程对他们来说有多么艰难。他们不像他一样善于行走在沙漠里，他们也几乎没有应对口渴和疲劳的经验。马萨达的峭壁陡峭险峻，难以攀爬。银色的月亮刚刚自头顶升起，微弱的光芒尚不能在漆黑的夜色中照亮道路。很多人的汗水浸湿了衣衫，呼吸困难。有的人步履踉跄，有的人摔倒在地。在持续赶路16个小时之后，46名学员已濒临崩溃。但是，他们不屈不挠。这群青年出

生于巴勒斯坦斯巴达式的20年代，经历了充斥暴力的30年代，如今，他们如磐石般坚强。带着新希伯来文化的力量与坚忍价值取向，学员们顽强而坚定。即便他们的双腿违背着意志，他们仍继续前行；即便他们跌倒在地，他们爬起来继续前进。古特曼看着他们微笑。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采访他时，他告诉我，他在这群青年闪亮的眼睛里看到了决心，这正是他所希望寻求到的。

古特曼是理智的。他生长于哈罗德山谷附近疟疾肆虐的沼泽旁，所以，他一直清楚地知道，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是一场斗争。他顶着山谷里阿拉伯人仇恨的目光生活，所以他一直清楚地知道，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就是斗争。他一直信奉犹太复国主义所蕴含的孤注一掷的精神，认为锡安主义的本质就是勇往直前——永不退却，永不止息，一直向前。新一代的希伯来人必须提升犹太人能做到的极限，提升人类能做到的极限。他们必须与命运抗争。

但是，现在，古特曼察觉，犹太复国主义的能量场即将撞上一堵墙。终结英勇的民族运动的力量太强大了：前方的阿拉伯人，前方的德国人，以及欧洲犹太人的崩溃。他的学员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一想到这点，古特曼就忍不住战栗。来到哈罗德山谷20年之后，犹太复国主义再次要求它的追随者们进行全民动员，并且准备牺牲。可是，从山谷、柑橘园、特拉维夫走出的年轻的徒步者们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处于危险之中。他们沉浸在犹太复国主义数十年成就的喜悦中。他们陶醉在希伯来人的复兴、创新、荣耀等等体验中。就在不久之前，古特曼听伊扎克·特本金说道“我们正濒临深渊”，伯尔·卡茨内尔森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描述这段时间的恐惧，巨大的恐惧吞噬着我们”，所以古特曼知道他只有很短的一点时间来改造这些年轻人。这就是他的角色——当那个时代来临，这些守门人站在大门迎战时，他在这些守门人身上涂抹膏油。

古特曼选择马萨达有着自己的考量。他16岁时，曾参加早期的死海

徒步跋涉，却因身体虚脱没有登顶。年轻的古特曼曾发誓要回归。而在几年后，他确实做到了，尽管他差点丧生，却成功到达顶峰。在马萨达度过的几个小时改变了他的生活。他隐约感觉自己与那个可怕的地方联结在一起。在过去的九年里，那个山顶要塞并没有放他离去。他总是梦到那儿，即便清醒，眼前也会浮现那个古老遗址的图像。他开始相信马萨达是这片土地的真正心脏，是犹太复国主义传奇的关键所在。直到去年，古特曼才意识到，他在那群犹太青年的集体意识里烙下了马萨达，而马萨达同样也在自己身上留下了烙印。在1941年10月的早期行程结束后，他派遣一位官员拜访国家领导人，经多方游说筹集到所需的资金。于是现在，他可以连接生活的不同轨道。作为一个导师，他既是历史学家也是业余考古学家。他可以将公元73年的恐怖行径与1942年的英雄挑战联系在一起。他可以使马萨达复生，使它成为新犹太复国主义的发源地。

山丘投下的阴影笼罩大地，就像一艘笨重沉船的影子。人们忘记疲劳，歌声嘹亮。倏然之间，这些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们不再感觉行路艰难，他们奔向要塞的巨大剪影——犹太民族主权的悲情之地。篝火已经在山脚起舞，那是早先抵达的守卫们所点燃的。第二圣殿的义军曾用篝火进行联络，拉姆丹的马萨达诗歌也满篇充斥着这样的火焰。但这是新马萨达所燃起的第一簇火焰。待他们抵达篝火旁，46名徒步者脱掉他们的背包，展开他们的毛毯，扎营过夜。

黎明时分，古特曼警告他的门徒们，攀登马萨达非常危险。有人曾经在攀爬中不幸身亡。从现在开始，每个登山者必须照顾好自己，也必须照顾身边的登山者。每一步都暗伏危险。古特曼爬上马萨达高耸的城墙，大声背诵拉姆丹描述“最后一个屠戮者”的沉痛诗句。

年轻人们静立在马萨达的山脚。他们都太熟悉此时他们的导师念诵的正典里的病态文辞。他们听着这些文句长大，在学校里研习，很多人将它们牢牢地记在心里。现在，在这传奇的要塞下，这些词句获得了新

的意义。他们唱起了歌，就好像进入沙漠寻求最后避难所的绝望人们唱起了国歌。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研究马萨达，研究马萨达的精神，以及古特曼的马萨达之旅。我阅读了相关档案室和图书馆里我能找到的所有资料，采访了还能接受采访的所有人。我重读了对古特曼漫长访谈的所有笔记，那是我在他去世前不久采访的。我一片片拼合起这块历史拼图。然而，在我完成所有的研究之后，一切似乎难以取信。尽管基于理性和实践精神，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事件，现在，却笼罩在神话的光环之下。我了解它们越多，反而距离它们越远。在这个充斥着批判主义、犬儒主义、自我意识的时代，我发现自己很难真正理解这群学员准备第一次攀登马萨达的精神状态。然而，我意识到，这种矛盾正是锡安式马萨达精神的本质，它象征着世俗和现代，却超越了世俗和现代，是一个超越人工建造水平的人文标识。古特曼所做的——将这个理想主义的年轻团队引领至这座沙漠废墟，正是利用希伯来人的过去深化希伯来人的现在，迈向希伯来人的未来。为实现一个具体、现实、民族的目标，古特曼赋予这座要塞一段基于神秘主义的人文历史。

……

穿着卡其布衣服的青年们排成长队，从东部开始攀登，他们攀上罗马人建造的白色壁垒，它们主要用来攻击犹太狂热信徒要塞的城墙。当队伍抵达壁垒与顶端之间的裂沟时，他们更加努力攀登。最前面的五名徒步者用镐锄敲击岩面，然后敲进岩钉，系上绳索，再把绳子放下去给其他人。

令这项任务更艰难的是，他们必须把沉重的给养全部吊上顶峰，包括帐篷、毛毯、罐头食品、水、背包、武器和弹药。年轻人串成了人链，将这些辎重手把手地传送到顶部。在古特曼眼里，人链传送的景致是那么鼓舞人心。“锁链未卸”一句出自拉姆丹的诗歌，而拉姆丹将把它立为这一代人的座右铭。

古特曼指示他的学员们不要往后看，也不要向下看，只能一直向前。一直向前、向上攀登的46名青年前行着，他们抵达了城墙，攀上了城墙，最终，他们发现自己站立在马萨达之上。

这是古特曼第三次爬上顶峰，但是，他仍像九年前第一次登顶时那样兴奋。沙漠的山脊，可怕的峡谷，静谧死海漾起的银色波浪激起他心中的深切悲伤。直到50年后他回忆这番情景，古特曼仍然着迷于那环绕孤独山丘的八个罗马军团营地。即使被遗忘了1869年，那幅景致仍然令人窒息，令他感觉仿佛第十罗马军团大军仍包围着1 000名反抗的犹太人；令他清楚地感觉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再次执掌了强大的、历史的力量。

在他从城墙俯瞰深谷的几分钟里，他陷入了迷茫，片刻后，他摆脱了他的幻觉，重新思考作为一个领导人他该如何行事。年轻人们不能体会古特曼深切的焦虑和欢喜的幻想。但是，他们同样兴奋着，兴奋地观看被落日染成粉红的沙漠的山丘，以及山顶上矗立了2 000年的哈律王的遗迹。古特曼留意到，这些青年的快乐心情没有失控。黄昏很快来临，他们必须快速支起帐篷。古特曼将他的学员们分成若干组，有的采集柴薪，有的去溪流取水，有的在要塞的废墟里搭帐篷。他们临时搭起了一张桌子、一个厨房和一间教室。当太阳落下，在马萨达平坦的峰顶，营地已经建成。当夜幕降临在莫阿维的山脉，古特曼为这个从废墟中升起的营地而骄傲。年轻的人们点燃了篝火，又唱又跳。

古特曼对学员们发表了演讲。他讲述了马萨达和它的英雄们的传奇故事。“我们的帐篷，同样，也搭在深渊之上。”他这样说道。当演说结束，他退回到夜色里，目视舞会重新开场。这是一场鼓舞人心的表演。他们的眼睛仿佛跳跃着火焰，他们的舞步像风一样轻快。以色列的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们回到了马萨达，在深渊上尽情跳舞。

古特曼没有跳舞，不过现下这自发的仪式正是他希望看到的。因为他知道，锡安主义没有教堂，没有神学，也没有神话。他清楚锡安主义

正岌岌可危，它需要一个鲜明的象征，而这象征足以代替教堂、神学和神话。他在马萨达找到了这个象征，它将团结和鼓舞锡安主义的追随者们。他为锡安主义找到了一个支柱，它具象、神秘而崇高。古特曼认为叙事和图像的合一将深化希伯来青年的思想。马萨达将吸引他们，赋予他们力量，激励他们迎接前方的挑战。这座悲壮的山丘将为他们揭示斗争的意义。以马萨达的名义，这些正在跳舞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将加入这场灾难性的战争，拯救锡安主义，拯救犹太人。

古特曼知道，他的事业是有争议的。甚至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内部，很多人认为马萨达的坚贞信徒就像那些抢劫、谋杀以及最后自杀身亡的凶残的极端主义者。犹太事务局的主席戴维·本·古里安，就非常忧虑马萨达传奇，因为这是一个关于死亡与自我毁灭的故事。但古特曼却有不同看法。他相信他正宣扬的不是一个马萨达复合体，而是一个马萨达悖论：只有这些年轻的希伯来人愿意去死，才能保证他们安全的、独立自主的生活；只有他们愿意战斗到底，才能阻止他们的末日的到来。

年轻的人们唱起了歌谣：

我们征服并登上了悬崖，

我们开拓并清理了道路，

我们开辟了山道——直到山谷。

古特曼在歌声中离开。他带着一个手电筒，走到古老的东南生活区，那里仍然残留着镶嵌的地砖。他继续走向一座有两个前院的建筑，德国考古学家舒尔腾（Schulten）曾描述过这个建筑，并进入了西间豪华的殿宇，但将之错认为希律王的宫殿。他穿过舒尔腾描述为小宫殿的方形建筑，然后走进山的北尽头的巨大宫室，在那些众多的厅室中徘徊。他走过了浴室，走过塔楼，徜徉在长长的走廊。

这里是士兵的营房，古特曼猜想着。这里住着希律王的军官，这里储藏食物，这里是军械库。古特曼极度兴奋。手电筒打出的灯光在厚重的城墙间蜿蜒。他的手掌抚摸过粗糙的刻石。对古特曼而言，这座沙漠上的城堡就像吉萨金字塔一样奇妙。但是，捕获这位锡安主义革命者心神的并不是希律王的天赋和智慧，而是义军们在这废弃的宫殿寻求庇护的想法。这名业余的考古学家，打着手电搜寻那群坚贞信徒遗留下的东西。也许是在那四年大起义中铸造的几舍客勒的硬币，也许是最后时光里他们在石头上刻下的铭文，也许是收集清水的陶罐、松垮的凉鞋、撕裂的晨祷披巾，或者黏土制的油灯。但是，所有古特曼在黑暗中找到的，不过是义军准备用来射穿罗马人头骨的圆形的石制弩炮和罗马人从远处射进叛军要塞的石弹。当他检查这些石制品时，他的思绪被牵引到那个最后夜晚的最后几个小时。

公元73年的那个可怕夜晚又重现在古特曼的脑海中。希律王的炮塔掩蔽墙已被突破，义军们临时搭建的木墙也遭焚毁。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罗马人的步伐，他们将在拂晓时分攻入马萨达。于是古特曼崇拜的爱力阿沙尔（Elazar Ben Yair）决定宁可死亡，也不要投降。就在这里，爱力阿沙尔聚集了所有的坚贞信徒，发表了他最后的、著名的演说，这篇演讲词被一名幸存者引述，世代流传：

> 你们都知道，明天我们将走向灭亡！ 但是，我们选择像英雄一样死去，与我们所爱的人同在……也许，从我们站起来维护自由的开始……我们就领悟了上帝的意旨，知晓他决定了他曾钟爱的犹太民族的命运！
>
> 我们不能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让我们的妻子，在被敌人蹂躏之前死亡；让我们的儿子，在尝到奴隶的苦味之前死亡！我们将带着英雄们的祝福彼此护佑！带着自由进坟墓！至美至妙，至圣至伟！

古特曼远远地看着他的年轻学员们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当他看着他们时，思忖着他的导师特本金最近说过的话语："在这场战争里，我们犹太人是最孤单的人民，我们众叛亲离，也最正义。"古特曼也回忆起他的另一位导师卡茨尼尔森在欧洲战争爆发时说的："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孤儿。随着这个世界的崩溃，我们的孤儿生涯更加艰难。居住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民，虚弱的翅膀担负起重担，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承受的范围。很可能，犹太人历史的全部未来就取决于现今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最艰巨的任务，已不请自来地压在我们肩上。"古特曼还想起就在几个月之前，卡茨尼尔森新加的几句话："虽然在圣殿被毁时，在我们失去土地和自由时，我们的命运都不确定，但是，现在是时候决定以色列的命运了。我们的历史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知之不详，直到毁灭之火即将立即包围离散全球的全部犹太人。"

古特曼清楚这些言论并不是空穴来风。自1940年夏天以来，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领导人就已经严肃地考虑了启示录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必须坠落，我们就坠落，带着我们的妻子、孩子以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那个夏天，特本金这样说道。自1941年夏天以来，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领导人就一直担心英国将撤出巴勒斯坦，德国人将进攻，而纳粹支持的阿拉伯起义将终结锡安主义。"我不奢望我们能死在这片土地，"特本金说道，"但我希望我们不离开这片土地，至少，活着时不离开这片土地。"1941年11月28日，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哈吉·阿敏·侯赛因（Haj Aminal-Husseini）与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柏林会面，侯赛因领导的阿拉伯——巴勒斯坦运动与第三帝国结成正式联盟。于是现在，1942年的早冬，特拉维夫的恐慌升级了，人们担忧可能发生的德国与纳粹阿拉伯——巴勒斯坦的联合攻击。现在看来，遥远的过去正与现在结合，神话正与现实相伴。

午夜，舞会结束了，营地一片寂静。只有古特曼仍然清醒。在他的帐篷里，他在提灯的灯光下准备明天的课程。尽管，他的使命是教化和再教育，古特曼却不是单纯的政治委员。尽管，他的目标定位于意识形

态，但是，他并不仅仅着眼于简单的宣传。他要求他的学员认真地研习马萨达。他要求他们熟悉马萨达的地理、历史、考古—— 一切有利于其科学体系架构的知识。为了使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他仔细考订了康德绘制的精密地图。他阅读了舒尔腾的考古调查资料——虽然有一些被舒氏误解。他阅读了弗莱维厄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著作，并为弗莱维厄斯对英雄史诗枯燥而精确的描述方式所震撼。最后，他再次阅读了拉姆登冗长、哀伤的诗歌。这位在俄国大屠杀中失去家人的移民诗人对成功并不抱信心。他向读者表示，他并不确信，20世纪的锡安主义马萨达将逃脱公元一世纪那些坚贞信徒的命运。所有拉姆登主张的，就是堡垒即最后的机会。对于犹太人来说，除了巴勒斯坦再没有容身之处，除了马萨达再没有其他道路。

古特曼带着他的年轻学员在马萨达度过了五天五夜。第二天，他向他们展示由平行的两道墙组成的掩蔽墙，并解释了其中的建筑细节。他向他们展示墙体30座岗楼的遗迹。第三天，古特曼带着学员们沿堤考察罗马人围攻马萨达的八个营地。他满怀激情地申明，罗马人集中这样规模的军力包围偏僻、荒凉的马萨达，证明这些反抗的义军确确实实地挑战了那个强大帝国的权威。

第四天，古特曼挑选了最优秀的和最适合的学员来帮助他探索马萨达未知的部分。他们悬空在峡谷上方，冒着生命危险，坚定的小伙子们成功发现了那未被以前的探索者发现的、迷失于历史的蜿蜒小径的部分遗迹，并找到了一条至今未被人所知的高架渠，这条水渠把东方的清水引至山丘要塞。

在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古特曼带领学员们回到壁垒，拓宽墙体，这样，数千人可以一起攀登。他派遣其他人去附近的山顶堆起干燥的木料，这样，夜晚的告别仪式将再现公元一世纪时叛军们一山接一山的火把信息传递方式。

但是，夜晚暴风雨来袭，所以结束仪式在一个似乎是叛军曾居住过

的洞穴里举行。人们大声诵读从古老的弗莱维厄斯和当代的拉姆登的著作中节选出来的篇章。“锁链”被多次谈及，这锁链连接着过去与未来。马萨达之日并没有结束，他们这样说。以色列英雄的声音将永不沉寂。为了我们的自由，我们可以牺牲一切。我们永不做奴隶。

就餐时，就像过逾越节一样，他们屠宰了一只贝都因羔羊，同样在逾越节的晚上，马萨达的城墙被攻破，义军们舍生取义。他们大声念诵着约瑟夫的诗篇中关于爱力阿沙尔最后行为的描述：

> 在那最后的时刻，他们紧紧拥抱深爱的妻子和心爱的孩子，他们亲吻她们，泪流满面……他们杀死了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同胞。每一个人都躺在地上，环拥着死去的妻子和孩子……最后留下来的那个人，检视所有的尸体……确认所有人死亡之后，他放火焚烧宫殿里的每一个角落，用尽所有的力气把剑刺入自己的身体，倒在死去的亲人身边。

古特曼沉迷于这些词句。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体会到其中的恐怖，但是，作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他同样意识到1942年即将来临的恐怖。他并不热衷培养自杀的风气，但是，他觉得有责任培育勇于反抗的精神。他知道，1942年即将迎来终极审判。尽管爱力阿沙尔的马萨达与古特曼的马萨达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古特曼却要求他的马萨达传奇以完全不同的结局告终。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的训辞是“马萨达将永不沦陷”；这就是为什么他告诫他的年轻学员不要做马萨达失败的狂热分子，而要做成功的坚贞信徒。他想看到的是继承这座古老要塞的果敢，换一个角度，将这种毁灭的精神转变为胜利。

夜深，风在洞口呼啸，这场史诗般的马萨达仪式即将抵达终点。学员们在青年工会的马萨达书卷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装进一个玻璃瓶，埋在他们立起的墓碑下。他们大声喊着“锁链未卸”，大声叫喊着马萨达召唤以色列为这片土地而战。他们唱起社会主义之歌：“我们的兄弟用强

壮有力的双手建设这片土地。”他们唱起国歌：“希望还没有沦丧。”随后年轻人收起帐篷，收拾好帆布包，准备下山——现在这座山已经镌刻在他们的意识中。

是否真如爱力阿沙尔所写，上帝封杀了他曾钟爱的犹太民族的命运？1月下旬，就在古特曼的马萨达学员回到耶路撒冷的当天，陆军元帅隆美尔（Rommel）结束了他在利比亚班加西的突围。四个月之后，德意志国防军的战略天才在比尔哈希姆击溃了英军，抵达埃及。1942年6月，隆美尔距亚离历山大港西部仅有100公里。特拉维夫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猜测，一旦亚历山大失陷，大英帝国将撤出中东，在印度完成军队重组。一些报道宣称，在开罗的办公室，英国军官们正在焚毁秘密档案。还有一些报道宣称，英国的精英军队正在撤出埃及。在巴勒斯坦，很多人谈论着，犹太人正在把财产卖给阿拉伯人，在修道院准备藏身之所，向基督教和穆斯林的朋友寻求帮助。有些人在申办外国护照，另一些人购买了毒药。

但是，欧洲的情况更加糟糕。1941年1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体育馆宣布，战争的结果就是消灭犹太人。1942年3月，奥斯维辛集中营开始积极执行灭绝计划。几天后，贝尔泽克和索比堡的灭绝集中营开始咆哮着将特殊的烟喷吐到欧洲春天的天空。1942年3月17日，卢布林的犹太人开始被驱逐到贝尔泽克。3月24日，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开始被驱逐到奥斯维辛。3月27日，法国的犹太人开始被驱逐到奥斯维辛。3月30日，第一辆从巴黎来的、满载犹太人的火车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巴勒斯坦，很少有关于死亡集中营和希特勒大规模灭绝计划的信息，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屠杀。越来越多的人也意识到，一旦英国失守埃及，同样一场大屠杀将发生在巴勒斯坦。因此，1942年3月，犹太人开始考虑，在迦密山建立现代马萨达的想法。他们没有在迦密山自杀的意图。一项绝密的计划是：在沿海的迦密山区，集中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这样就能发动一场战争拖

慢德国人进军的步伐，说服英国不要抛弃犹太人。然而，1942年夏，在特拉维夫市的夜间讨论中，犹太复国主义领导集团并没有预料到最糟糕的情况。

古特曼最好的朋友伊斯雷尔·加利利曾说：“没有后退的余地……我们必须保证，我们坚守在这里直到最后时刻，保卫我们自己直到最后时刻，哪怕付出遭到灭绝的代价也要坚守。”

古特曼的导师伊扎克·特本金说：“这里50万的犹太人不应退却，哪怕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幸存。我们必须站在这里直到最后时刻，为了未来，为了自尊，为了犹太民族的历史忠诚。这就是马萨达教给我们的道理，甚至在马萨达之前，我们也是被这样教导。这就是第二圣殿毁灭所教给我们的道理。”

波兰犹太复国主义早期的领导人，伊扎克·格伦鲍姆（Yitzhak Gruenbaum）这样说：“大离散中的犹太人，他们的问题是：比起带着荣耀死去，他们更愿意像挨打的狗一样苟且偷生。一旦德国人发动进攻，将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上帝保佑别发生这样的事，如果德国人真的发动进攻，我们必须做到抛弃马萨达的传奇。”

特本金又说：“我们，犹太人，没有退却和撤离的选择。有的人说，必须救助女人和孩子。这里没有救助他们的余地。这里不存在需要救助妇女和儿童的公义……我们必须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我们面临灭绝。德国人难道会放过雅格基布兹，艾因哈罗德基布兹，或者德加尼亚公社吗？”

当天气渐热，犹太复国主义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1942年5月11日，在纽约的比尔特摩酒店，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们放弃了长期自然增长的旧有观念，转而支持在巴勒斯坦尽快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的要求。在比特摩尔大会召开的前后几周里，帕马奇武装突击队实施了第一次爆炸袭击行动，并训练了第一支五人分队。

1942年6月，哈加纳的指挥官们被召集出席在特拉维夫举行的一个紧急会议，在会上他们听取了几分钟关于“迦密山上的马萨达”计划（Masada-on-the-Carmel plan）。7月，在伊兹拉山谷举行的一个特殊集会上，这个计划得到全面而详细的讨论。最初的准备包括设立武器、水、食物的藏匿处，以及在海法和山谷之间的地带建立可供十万人藏身的避难所。现在，人们已经明确地讨论着，要将迦密山变成马萨达。

也难怪，从1942年2月到7月，古特曼提倡的马萨达精神扎下了根。青年运动周刊对马萨达之行及其学习班做了大量报道，并将爱力阿沙尔的最后演讲刊登在3月31日周刊的封面上。其他劳工出版社也赞美和颂扬马萨达。古特曼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宣扬马萨达，在公众间唤起了强烈共鸣。46名年轻的领袖对他们的青年运动学员分享并传递着马萨达的信息，所以，包含200多名青年的第二次马萨达之旅仅仅在三个月之后就成行。全国各地的逾越节青年营和青年团体都致力于为马萨达奉献一切。当隆美尔逼近国门，当欧洲犹太人身处犹太区，当国家领导人正在考虑极端的主意，古特曼的马萨达信仰如星火燎原之势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青年团体向马萨达进发，帕马奇的队伍也向马萨达进发。马萨达成为公众话题。短短几个月之内，马萨达精神就在青年一代中蔚然成风。现在，马萨达俨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成为新一代的巴勒斯坦人的标志。

秋天，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恐惧平息了。盟军指挥官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对隆美尔展开了反攻，隆美尔自11月4日的伊利阿拉曼开始败退。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已经没有纳粹进一步进攻的危险。

然而，就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民放松心情，重拾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带来的快乐之时，从欧洲传来的消息变得严峻。1942年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伊登（Anthony Eden）在威斯敏斯特宣称，纳粹德国正在灭绝犹太人。到目前为止，显而易见，希特勒心里想的不是大屠

杀，而是大灭绝。每一天，数千犹太人被杀害。1942年，就有超过100万的犹太人被屠戮。战争结束后，也许欧洲犹太人已经完全消失。

1943年，马萨达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现在，它不仅仅是以色列土地上召唤犹太人为一场绝望战争做准备的历史传奇，而是代表犹太民族的寂寞孤独的神话般的、几乎是超自然的隐喻。就像以往一样，伊扎克·特本金以最残酷的方式来阐释新的见解："我们感觉到终极的孤独……我们无法知道会幸存多少犹太人……我们也不能保证犹太人能幸存下来。我们苦痛，因为意识到，我们孤立无援，意识到，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

对于像特本金、卡茨尼尔森和古特曼这样的精神领袖而言，大灭绝有三重意义：自中世纪以来，从未有过这样规模的人类的大灾难；自第二圣殿毁灭以来，犹太人从未经历过这样规模的大灾难；这是不同于其他任何犹太复国主义的大灾难。对于犹太复国事业来说，大灭绝的影响是毁灭性的。锡安主义计划拯救的那些伟大的犹太民众已一去不返，能拯救锡安主义的伟大的人类宿主一去不返，锡安主义存在的理由也一去不返。即便希特勒被打败，留下的也许依然是被击败的犹太民族。没有东欧的人口支柱，锡安主义变成了一座没有援军穿行、保护或坚守的桥头堡。

但是，特本金、卡茨尼尔森和古特曼将灾难变成了使命。他们三人，以及其他人，开始宣讲希伯来青年们在这灾难性的境遇下所承担的责任。"现在，我们已经失去十倍于巴勒斯坦犹太人口总数的同胞，以色列土地上的每一个希伯来小伙子都要以一当十，"被特本金所激励，古特曼这样写道，"在这个现实的黑色阴影下，你们，以色列行动的年青一代，必须继承创始者的基业，手举光明的火炬，引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走向复兴。"

事实证明，1942年远比任何人想象的更悲惨。就在这一年，270万犹太人被纳粹屠戮。在这一年里，全世界每六个犹太人就有一个被杀

害，每四个欧洲犹太人就有一个死于疾病、饥饿、枪杀或者毒气。犹太民族将永远不能从这记重击中恢复。锡安主义将永远无法挽回损失。

但是，马萨达的精神将得到继承。当1942年的恐怖暴露后，在古特曼1942年1月学习班中锻造的马萨达精神将成长得越发强大。所以，那些询问这种精神是否仅仅基于虚构事实的人真是问了个愚蠢的问题。定义马萨达精神的不是爱力阿沙尔，而是古特曼。公元73年，事件是否确实发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公元1942年历史轨迹上，它的确发生了。古特曼提出的马萨达精神将标志着20世纪40年代的犹太复国主义，将决定1948年的命运，将塑造以色列国家的未来。

19世纪中期，法国心理学家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首次推翻“生命适应于环境”的传统观念。伯纳德认为，适应周遭环境的是死亡，生命现象就是保持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相悖。从1936年夏天到1942年夏天，犹太复国主义者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经历一系列的打击，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丧命，这样的现实教导这场卓越的运动。它周遭的环境极其严酷。相关的历史环境都是致命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适应就等同于死亡，而延续生命的唯一方式就是抗争。从那以后，决定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不再是排干的沼泽或者孕育果实的柑橘园，而是一座孑然矗立的沙漠要塞，它在荒芜的土地上投射下令人敬畏的身影。

第五章
吕大城，**1948**



犹太复国主义是如何来到吕大山谷的？就像它抵达巴勒斯坦的其他山谷和平原一样。

1903的秋天，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闭幕之后，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以80 730法郎的价格购入哈迪萨村庄2 330德南的土地。其中，有1 946德南土地肥沃而平坦，剩下的384德南则全是丘陵和荒原。它们共同组成一条狭长地带，从阿拉伯吕大城的银色橄榄园延伸到吕大山谷至耶路撒冷一线的灰色低山丘陵。拜特·阿里夫（Beit Arif）的产业变成

了贝·谢门（Ben Shemen）的产业，这片土地成为赫茨尔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购买的首批地皮之一。

两年后，当内厄姆·威尔鲍什（Nahum Wilbosh）穿越全国考察了其他几处地方，这位土木工程师决定在吕大山谷建立阿提德（Atid，希伯来语，意“未来”）工厂。他投资150 000法郎，从英巴银行购入100德南土地，建起一座现代化的工厂。工厂在橄榄园中榨油，并用橄榄渣制造优质的肥皂。前四年，阿提德是令人失望的。橄榄油浑浊不堪，肥皂品质低劣，而生产成本却居高不下。但是，到了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阿提德否极泰来。它给工厂主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令工人们过上了体面的生活，而它的阿拉伯邻居也因售卖原料给新兴犹太工业而有了额外的收入。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阿提德就倒闭了。曾经的阿提德工厂没有为吕大山谷留下什么遗产，除了那阴郁的、被遗弃的废墟。

威尔鲍什建成工厂后的第二年，一位名叫伊斯雷尔·贝尔坎德（Israel Belkind）的教员建立了“基亚特之书”（Kiryat Sefer）农业学校。学校位于贝谢门的土地上，占地55德南，接收三年前在可怕的基什尼奥夫大屠杀中幸存的孤儿。在山顶距离工厂不远的地方，贝尔坎德建起几栋被开阔庭院环绕的两层楼的房子，让大屠杀的幸存者们在这里接受训练，成为技艺娴熟的农夫。但是，在花费43 000法郎购置土地、建造教室和宿舍后，贝尔坎德再也拿不出学校运营所需的资金了。就这样，“基亚特之书”也倒闭了。

1908年，西奥多·赫茨尔去世几年后，为纪念这位奠基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定在吕大山谷种植1 000株橄榄树。在赫茨尔园林（Herzl-Wald）选择种植橄榄树，既有现实意义又有象征意义，其目的就是，证明新犹太人能够种出像吕大山谷阿拉伯古老橄榄园里那样美丽的、枝繁叶茂的橄榄树。1908年早期，在阿提德工厂和“基亚特之书”学校之间的地带曾有过一个苗圃，就在那里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为了响应

犹太民族运动，犹太工人们某天聚集在苗圃，将阿拉伯工人种下的橄榄树连根拔起，又亲手补种回去。于是，1909年，当赫茨尔园林工程启动时，所有都成了犹太人独有的劳动成果。这些新犹太人在起伏平缓的山坡种下了12 000多株橄榄树，从园林眺望，可以看到吕大城的尖塔。树苗渐渐长成，看起来似乎赫茨尔园林确实变成了位于巴勒斯坦的、真切的、枝繁叶茂的橄榄园。但是很快，战争、蝗虫和绝望接踵而来，有的橄榄树被连根拔除。赫茨尔的橄榄林消失了，就像它在吕大山谷出现时那样迅速。

1910年，兴起了一场从也门到巴勒斯坦的移民浪潮，鲍里斯·沙茨（Boris Schatz），耶路撒冷著名的比撒列艺术学院的美术教授和创始人，决定把技艺娴熟的也门银器匠人安置在吕大山谷。他希望建立一个朴素的工匠殖民地，其居民通过20世纪农业和传统手工业自力谋生。为此，他在毗邻贝谢门庭院和赫茨尔园林的地方建造了一个小型社区，在社区里建起简陋的房屋，把12户贫困潦倒，但艺术传统深厚的也门犹太人带到这里。整整三年，这几户家庭努力在吕大山谷扎根，但是，艰苦的条件、水源的短缺，以及婴儿的高死亡率使他们无法生存。就像阿提德、基亚特之书、橄榄林一样，工匠殖民地也消失了。

1909年，第一个来到贝谢门橄榄苗圃工作的农学家伊扎克·维坎斯基（Yitzhak Vilkansky），将贝尔坎德的庭院变成了模范的农业企业。在贝谢门的橄榄苗圃，维坎斯基建立了巴勒斯坦的第一个现代牛棚，让强壮的德国公牛与适应性强的大马士革母牛杂交。维坎斯基又尝试养蜂，尝试种植扁桃树和小麦。他改进了灌溉方式，提出了混合养殖概念，使定居巴勒斯坦的每一户犹太家庭都能在自家田地上运行一套给养系统，这套系统将使每一户全年都可以充分利用自家的每一寸土地。他将经验丰富的农民编成工作组，把他们安置在也门犹太人留下的废弃房屋里。维坎斯基训练这些经验丰富的农民，建成了一个小型但欣欣向荣的劳工村。在16年里，维坎斯基在吕大山谷上演着奇迹，证实了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哈伊姆·魏茨曼所说：　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希伯来人的双手

能导演神奇。

但在1926年，维坎斯基将他的实验农场搬到了雷霍沃特殖民地繁荣的柑橘园。经历了五次尝试和四次失败后，犹太复国主义再次面对着在23年前就已经提出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在吕大山谷定居，从岩石山脉到贝谢门的荒废庭院、阿提德的废墟以及阿拉伯的吕大城里伸出的诸多宣礼塔（minarets），在这片狭长地带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齐格弗里德·莱曼（Siegfried Lehmann），1892年生于柏林。他学习医学，在德国军队做一名军医。尽管，他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被同化的德国犹太家庭，但在“一战”期间，他重新认识了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并找到了努力振兴犹太教的意义。1916年，他在东柏林的一处贫民窟里，为无家可归的犹太儿童建立了一处收容中心。1919年，在立陶宛的考弗那[注]，为犹太战争孤儿开设了一处避难所。受到精神导师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艾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以及他的兄弟阿尔弗雷德（Alfred）的启发，莱曼相信，犹太人在德国没有未来，而西欧犹太人必须通过重新联结东欧犹太人、重新联结他们的传统和仪式的方式实现自我重铸。

1925年，这位由医生改行的导师意识到，高涨的反犹浪潮将妨碍他维持可弗纳儿童之家。他们已经无路可去——除了前往巴勒斯坦。开始的时候，莱曼打算在哈罗德山谷重建他的独特机构——就在1921年夏末，艾因哈罗德曾在那里搭建白色帐篷。但他了解到，沼泽中成群的疟蚊将可能威胁孩子们的生命，这位爱因斯坦的门徒改变了他的路线。于是，在冬季的一个雨天，莱曼带着他的妻子和12个考弗那孤儿，抵达20年前伊斯雷尔·贝尔坎德为基什尼奥夫孤儿们修建的庭院。

其他人都失败了，莱曼却成功了。1927年，莱曼的青年村庄只有55个学生，1931年，数量上升到220个，1946年，则约有600个。村庄里10德南的耕地，已经拓展为500多德南。现在，这里有了一个很好的牛

棚、一个大羊圈、一间马厩、一个柑橘园、一个菜园，还有麦田、鸡舍和一个葡萄园。从“基亚特之书”学校的庭院到阿提德工厂的和缓山坡上，建起了一排红屋顶的宿舍。学校成立了，又开挖了游泳池，兴建了体育场，沿着小路建了花园。校舍明亮，莱曼坚持为孩子们创造家庭般温暖的学校氛围。十年时间里，这位德裔犹太人在吕大山谷成功地打造出犹太复国运动中最讨人喜欢的事业之一。

莱曼的村庄是独一无二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它实现了创始人的乌托邦式价值观。这位柏林自由派犹太人支持的柏林医生，并不是一个狭隘的锡安主义者。尽管，他致力于无家可归的犹太儿童的救助事业，但他将自己的人道主义使命纳入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他意识到，犹太人民的生活已然变得难以承受。他认识到，犹太人经历的被迫迁徙流散在身体、心理、精神三方面威胁着他们。但莱曼认为，在20世纪，并不单单只有犹太人经历了流离失散，他发现无归属感同样也对当代西方文明产生了威胁。莱曼希望犹太复国主义能同时应对现代犹太人民和现代人。他希望犹太复国主义能完成一项紧急的国家任务，而这一任务在某种意义上将造福全人类。他希望犹太复国主义成为不被殖民之名玷污的定居运动，成为不被沙文主义打下烙痕的民族运动、不被城市分化所歪曲的民族运动。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绝不能建成一个封闭的、居高临下的巴勒斯坦殖民地，忽略它的周边环境和本地居民。它也绝不能建成一个欧美国家指挥东方的边塞。相反地，莱曼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必须以一种有机的方式使犹太人在他们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必须尊重东方，成为东西方之间桥梁。尽管，莱曼从来没有说得这样明确，但他将吕大山谷的青年村视为理想犹太复国运动的一个范例。它将是一个救赎工程——为无家可归之人提供家园，为生如浮萍之人提供根脉，为生命重塑生活的意义。莱曼的贝谢门将为孩童与丧失和谐的时代带来和谐。

莱曼医生相信，犹太复国运动唯有与中东融为一体才能赢得胜利。1927年7月，一次毁灭性的地震摧毁了古老吕大城的大部分区域，数十

名居民遇难，这位年轻的医生匆匆赶往受创的阿拉伯城市吕大救助幸存者。在20世纪30年代，因为他在灾难期间发挥的深远社会影响力，莱曼与吕大的贵族绅士及邻近阿拉伯村庄——哈迪萨、达哈里亚、吉姆祖、达尼亚尔、德尔塔里夫和拜特拿巴拉——的达官显贵们结为了朋友。他注意到，村民们在焦炙的夏日来往吕大城，便在犹太复国主义的青年村大门口修建专门设计了欢迎喷泉，让村民们可以享受凉爽的泉水和清凉的树荫。若有巴勒斯坦人前来寻医，莱曼便指导青年村的诊所提供医疗救助。他认为贝谢门的学生理当被教导尊重他们的邻居，尊重他们邻居的文化。几乎每个周末，贝谢门的青年们都要拜访这些村庄。他们也同样频繁地拜访吕大城，考察吕大的集市和学校。阿拉伯的乐师和舞者则被邀请参加青年村的节日，青年村的村民们学习并赞美在东方庙会中展示的阿拉伯农村文化。

当“二战”后，好莱坞电影《国土》（Land）在莱曼的青年村上映时，影片捕捉到的镜头描绘了一个人文主义的乌托邦。在这部黑白片中，导演赫尔玛·雷斯基（Helmar Lerski）展示了一派虚幻的现实。在这里，侥幸逃出德国的孩子们生活在进步、民主的教育机构里，在这《圣经》的土地上，流离失所的青年们生活在康复之家；在这里，年轻的希伯来牧人在哈迪萨和达哈里亚之间的崎岖、古老的山峦间放牧羊群；在这里，年轻的织工们转起纺锤纺起纱线，就好像那些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代人的法国村民和德国村民一样；在这里，孤儿们组成了社区，接受欧洲巴勒斯坦式的乡村文化熏陶，享有刚刚降临在这片土地上的和平。在安息日（Sabbath）的前夕，孩子们穿着白衬衫，聚集在铺着白布的桌前点燃蜡烛。他们虽然没有父母，但他们有信仰。一些人演奏巴赫的音乐，一些人唱起赞美诗，一些人讲述托尔斯泰（Tolstoy）撰写的犹太传奇和故事。在贝谢门大厅的所有人，从8岁到18岁，都参与到这个世俗犹太年轻人融入圣地圣洁的特殊仪式。

吕大没有怀疑，也没有去想象未来将要发生的事。44年来，它旁观锡安主义者进入山谷。首先是阿提德工厂，然后是“基里亚之书”学校，

然后是橄榄林、工匠殖民地、小小的工匠村、实验农场，然后是由古怪的德国医生领头的古怪青年村——这个医生对吕大人民是那样友好，为那些求医的人们提供医疗救助。

吕大城有两座清真寺，还有一座叫作圣乔治的大教堂。尽管，依据基督教的传统，吕大是圣保罗大教堂的城市，吕大的人民却并未看到犹太复国运动将变成一条现代的恶龙；他们没有看到，当莱曼医生倡导和平的同时，其他人却在怂恿战争；当莱曼医生带领他的学生拜访邻近巴勒斯坦村庄的同时，什马利亚胡·古特曼却率领他们到了马萨达；当青年村教化人文主义和兄弟情谊的同时，它背后的松树林却进行着军事课程，教导贝谢门的青年们投掷手榴弹、组装冲锋枪、发射反坦克炮。吕大城的人民没有看到，进入山谷为一个国家的孤儿们带来希望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变成了一场残酷、坚决的运动。它已经决定，要以暴力夺取这片土地。

44年里，吕大见证着犹太复国运动的推进，而吕大城也走向繁荣。从1922年到1947年，吕大城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从8 000增长到19 000。飞跃式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质量上。现代化无处不在。1927年，地震造成破坏之后，许多旧式的土坯房被新的、坚固的石头住宅所取代。在大清真寺和大教堂旁边，又兴建了一个商业中心和一座新的清真寺。在城镇的西边，又出现一个新的、街道笔直的现代街区。吕大成了巴勒斯坦铁路系统的中央枢纽，火车公司的高官们居住在这个城市引以为豪的新建的英式花园郊区。一些街道已接通电力，一些宅邸也有了自来水。吕大城的男孩和女孩分别在两所州立学校和一所圣公会学校接受教育。两个诊所、五名医生和两个药店保证着良好的医疗服务。死亡率降至12‰，与此同时，生育率则大幅上升。在20世纪上半叶，在吕大城，已然发生了真正的工业革命。

吕大的经济同样发展快速。英国的委托统治、犹太复国运动的间接影响以及黄金地段的区位因素，使它的经济如骏马疾驰。在英国委任统

治的那几年，正处巴勒斯坦中心的吕大成为主要的交通枢纽。城镇南方的火车站以及北方的国际机场为吕大的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途经吕大的跨国公路则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拥有3 200德南的柑橘园，吕大也同样受益于柑橘市场的繁荣。在这个古老的城镇里，液力榨油取代了人工榨油。三个工厂生产油和肥皂——就像阿提德曾经生产的一样。镇上还有一座颇为成功的制革厂。大量的纺织厂生产阿拉伯头巾和毛纺织品。咖啡馆人来人往，商场里摆满最好的现代商品。在周一和周四，从远近赶来的数千人来到吕大著名的牛市和集市。除了富裕的地主阶级，又兴起了繁荣的商业中产阶级，将吕大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兴旺昌盛的城市。

然而，1947年，巴勒斯坦问题面对现实的时刻到了。2月，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长久积累的冲突使英国政府决定撤出圣地，让联合国决定巴勒斯坦的命运。6月，一个由11人组成的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抵达巴勒斯坦，并在途中走访了贝谢门和吕大山谷。8月，委员会得出结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可能共存于巴勒斯坦。因此，委员会建议将这片土地分割为两个民族国家。11月，联合国大会（UN General Assembly）通过分治决议，呼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但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以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均拒绝执行181号巴勒斯坦分治决议（Resolution 181），暴力抵制在全国范围内爆发。显而易见，阿拉伯民族主义正打算消灭犹太复国主义，使用野蛮的暴力摧毁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同样，犹太人必须保卫他们自己，因为没有别的人会来拯救他们。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5月，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残酷内战愈演愈烈。英国撤离之后，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第二天，埃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进攻以色列，巴勒斯坦全面战争爆发。

12月，一列由七辆车组成的车队在前往贝谢门的路上遭到恶意袭击，13名犹太乘客被残忍杀害。1948年2月，大约400名悲伤的青年村学生乘坐巴士车，在英国装甲车的护送下从吕大山谷撤离。莱曼医生心碎

了。4月，青年村已经成了被围困的军事据点。5月，吕大城的市长劝告贝谢门投降，但贝谢门拒绝了。这位市长仍然央求阿拉伯军团的指挥官不要攻打这个孤立的辖区，因为它不会以任何方式威胁吕大。当毗邻贝谢门的阿拉伯田地被战争殃及起火时，一些青年村的毕业生仍然匆忙赶去救火。即便战火熊熊燃烧在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地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均将吕大山谷视为战争禁区地带。

但在1948年7月4日，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戴维 ·本·古里安提出了征服吕大的拉尔拉行动（Operation Larlar）。7月10日至11日，以色列国防军（IDF）第八旅攻占了吕大山谷北部：德塔里夫和哈迪萨的村庄，以及国际机场。与此同时，伊弗塔克精英旅（elite Yiftach Brigade）也拿下了山谷南部：伊拿巴、基姆祖、达尼雅尔和达哈里亚。以色列军队第一波师级规模攻势仅仅展开24小时，莱曼医生如此深爱，并教导他的学生去爱护的所有村庄就全部沦陷。犹太复国主义者从南部、东部、北部包围了吕大山谷，现在，它准备攻克吕大城。

7月11日，第三军团的两个排从沦陷的达尼雅村，向分隔贝谢门和吕大城的橄榄园进军。从吕大郊区开火的重机枪阻止了他们的步伐。与此同时，摩西 ·达扬（Moshe Dayan）的第89团抵达了贝谢门。就在莱曼医生为他的阿拉伯邻居建造的喷泉旁，达扬将89团编成装甲队。一个接一个，他们站在那儿待命：巨大的装甲车载着加农炮，还有威力十足的半履带车，以及装备机关枪的吉普车。下午晚些时候，装甲队驶离了贝谢门，闪电般地进攻吕大城，47分钟的闪电战后，100多名阿拉伯平民被射杀——女人、孩子、老人。而89团有9名士兵战亡。傍晚时分，第三军团的两个排进入吕大城。在几小时内，士兵们就占领了市中心的要害位置，并将数千平民圈禁在大清真寺、小清真寺和圣乔治大教堂。入夜，犹太复国主义占领了吕大城。

第二天，两辆约旦装甲车误入这个被占领的城市，引发新一轮的暴力冲突。约旦军队在犹大城以东数英里，这两辆车不足以造成威胁，但

一些吕大市民错误地认为他们是解放吕大的先兆。而一些第三军团的士兵也错误地认为他们的出现意味着第三军团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机——约旦人的攻击。于是，以色列的士兵在小清真寺一带开火了。年轻的士兵们，曾经的贝谢门毕业生，现在穿上了制服隐蔽在壕沟里。军团的指挥官同样也是贝谢门的毕业生，正是他下令开火。士兵们向四面八方扫射。一些士兵将手榴弹扔进民房里，一名士兵用反坦克炮射击小清真寺。在正午的30分钟内，200多平民被射杀。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吕大城进行的大屠杀。

当这个血腥的消息传到设在被攻占的巴勒斯坦雅祖村的拉尔拉行动总部时，伊加尔·亚伦（Yigal Allon）询问本·古里安如何处置阿拉伯人。本·古里安挥着手道：驱逐他们。吕大城沦陷几小时后，行动指挥官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对伊弗塔克旅发出书面命令："必须迅速驱逐吕大的阿拉伯人，不论老少。"

第二天，谈判在圣乔治大教堂的教区进行。出席人员有什马利亚胡·古特曼——他现在是吕大的军政府首长，以及被占领城市的各位政要。不知所措的政要们急于拯救他们羊群[注]的生命，然而，狡猾的古特曼急于在没有明确驱逐令的情况下驱逐这一大群民众。1948年7月13日上午，谈判结束，双方同意吕大市民以及驻扎吕大的难民立即撤出吕大城。中午时分，一场大规模的撤离启动了。到晚上，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排成长长的队伍，离开吕大向南进发，越过了贝谢门的青年村，渐渐消失在东方。犹太复国主义毁掉了吕大城。

吕大就是我们的黑匣子，里面盛放着犹太复国主义的黑暗隐私。其真相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不能容忍吕大。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和吕大之间就存在一个实质性的矛盾，只要犹太复国主义存在，吕大就不能存在，如果吕大存在，犹太复国主义就不能存在。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太明显了。当1897年4月，赫伯特·本特威奇从拉姆拉的白塔眺望吕大时，他本来应该看到，如果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巴勒斯坦

的中心就不能存在一个阿拉伯人的吕大。他本来应该知道，吕大就是建立犹太国家道路上的障碍石，总有一天，犹太复国主义者将移除它。但是，赫伯特·本特威奇没有看到，犹太复国主义选择回避。于是，半个世纪以来，它成功地掩藏了自己，掩藏了犹太民族运动和吕大之间的实质矛盾，45年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者假装与吕大和平相处，在阿提德工厂，在橄榄林，在贝谢门的青年村庄。然后，在1948年激变的夏天，在三天时间里，矛盾和悲剧显露。吕大城不复存在。

现在，20年之后，我认识到吕大是我们的黑匣子，我尝试着破译它的密码。我找到了当时的军团指挥官，与他交流许久。我找到了军政府首长，在他的基布兹和他生活了很长时间，我花时间与第三军团的士兵一起生活，采访青年村曾经的学生。为了撰写这一章节，我翻出我当时采访时录下的录音带，听他们讲述那些关于吕大城大屠杀的故事。

军团指挥官1923年出生于考弗那，他的父亲是莱曼医生的同事。他成长在特拉维夫的社会主义家庭，15岁时被送到贝谢门的青年村，在这里他迅速成为他父亲最好朋友的最中意的人。在安息日的早晨，他被邀请至莱曼的小屋，与他们一起倾听留声机里传出的罕见录音：海顿、莫扎特、巴赫。在节假日，他护送莱曼医生去邻近的村庄做礼节性拜会。偶尔，他随同莱曼医生前往吕大拜访朋友和学校。他喜欢上了吕大，喜欢它的集市，它的橄榄油作坊，它的旧城。在贝谢门，他来往于牛棚、葡萄园、柑橘园。他打手球，又对艺术产生了兴趣。但最重要的是，他热爱音乐，古典音乐、流行音乐以及民谣。他在贝谢门最美好的记忆之一，就是数百名学生静静坐在宽敞的庭院里，倾听交响乐团和合唱团演出巴赫的《农民康塔塔》（Peasant Cantata）。

然而，在贝谢门人文的、音乐的世界之外，这个17岁的小伙子还生活在另一个现实世界里。每到夜晚，他和他的朋友们都要前往青年村外的树林，在那里，他们学习组装和拆卸英式步枪，学习使用机关枪和投掷手榴弹。当这位音乐爱好者从贝谢门毕业后，他加入了帕马奇武装突

击队（Palmach Strike Force）的第一支分队。在1942年冬天，他爬上了马萨达。1942年夏，他前往南方用燃烧弹阻止隆美尔的纳粹军。21岁时，他晋升为连长，23岁时，他在一次全国性的培训课程中担任指挥官，24岁时，晋升为军团的指挥官。当1947年年底战争爆发时，这位贝谢门的毕业生指挥一支犹太复国主义的精锐部队。

这位指挥官意识到两个世界的矛盾了吗？他能否将莱曼守则与士兵二者结合？对于这些问题，他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当他谈及北方战斗时，展现出令人吃惊的直白。录音带里传出的声音直白地说道，他们的任务就是在阿拉伯人发动进攻之前清缴加利利地带。如果他们不预先肃清国内的巴勒斯坦人口，一旦面对与阿拉伯联盟的对外战争，这个即将诞生的犹太国家将无法生存。所以，他们首先在太巴列——塞菲德地带肃清所有的阿拉伯人。之后，1948年4月，他们占领了太巴列——这里的阿拉伯人在占尽上风的以色列军队所造成的军事压力下，已经尽数撤离。随后，他们占领并摧毁了塞菲德周边的阿拉伯村庄。5月，他们攻占塞菲德，当地的阿拉伯人在炮火中四散逃亡。然后，他们驱逐了胡拉山谷的村民。1948年5月末，胡拉山谷的阿拉伯人已经全部被赶出。整个塞菲德——太巴列地区的阿拉伯人全部被驱逐。整个加利利东部地区的阿拉伯人被全部驱逐。在这位贝谢门毕业生的指挥下，东加利利变成了一个阿拉伯无人区，变成了新犹太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当这位军团指挥官谈到吕大，他的声音变了。现在，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沉静，几乎是痛苦的。他叙述起来显得谨慎小心，也许还不太坦诚，就好像谈及吕大时，他突然意识到那些矛盾和悲剧。他缓缓地向我讲述，他如何占领那些村庄——他曾在安息日陪伴莱曼医生拜访的村庄：基姆祖、达哈里亚、哈迪萨。他缓慢地向我讲述，他如何占领山谷，占领吕大城。他讲述，那天早晨，他被告知约旦人的两辆装甲车已经闯进了城市，不久之后便了解到第三军团的一些贝谢门毕业生遭到袭击。他告诉我，他就是那个下达命令的人——下令射杀在城中街道的任何人，下令疏散整个城市。他以及那位军政府首长，就是驱逐吕大平

民、让他们排成长队走向东方的人。

很显然，这位军团指挥官心痛欲裂。从录音带里传出的声音实在令人难以信服，这并不是说他对我蓄意隐瞒。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感觉到了什么。他对吕大的讲述是模糊的，缺乏颜色、气味和细节。他回忆中的贝谢门鲜活灵动，却对占领吕大的记忆模糊。他没有提及曾经拜访的学校、他所知道的那些家庭、他曾经如此喜欢的那些社区，他完全没有提及那座他深爱却又被他摧毁的城市。只有他黯淡的语气流露出他压抑的东西。他的第一次道歉是：我们当时被包围了。第二次道歉是：我们当时内外交困，危险迫在眉睫。他的第三次道歉是：来不及了，我必须马上做决定。他的第四次道歉是：在战争中总会发生可怕的事情。但是，这些道歉似乎没有一个是发自内心的，或者解释那压抑的、持续三天的吕大大屠杀。

布尔多瑟则不同于这位军团指挥官。尽管，他同样带着1948年战争的精神创伤，他的精神创伤是不同的。他大幅度地提高了声音，语气粗野而低俗，显得紧张、易怒而不安。他承认在那该死的战争中他丧失了内心的平静。这么多年来，他再也找不到内心的安宁。

布尔多瑟同样出生在东欧，但在特拉维夫长大。在他7岁时，有一天他正从学校回家，一个阿拉伯人在途经的火车上向繁忙的赫茨尔大道投掷了一枚炸弹，数十人受伤，站在他附近的一个8岁男孩死亡。就在那一天，他清楚地认识到：在这里将爆发一场同阿拉伯人的全面战争。尽管，在青年时代，他步行去了阿拉伯的雅法，结交了阿拉伯的朋友，但他一直都知道，在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悬挂着一把利剑。他一直都知道，这片土地的归属最终决定于战争。

他的身体非常强壮。他打拳击，骑马，擅长运动。他的体型和力量是他绰号的来源，并令他成为男孩们的领袖、女孩们的最爱。14岁时，他成为哈加纳秘密组织的一员。15岁时，他开始进行手榴弹投掷训练，16岁时，在靶场进行实弹训练。17岁时，爬上了马萨达。布尔多瑟在18

岁时加入了帕马奇，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相信某种基布兹的乌托邦，而是因为，他想在战争来临之时成为精英中的精英。

1948年的第一个月是轻松的，任务只是突袭村庄和路边伏击。但当他完成反坦克弹射手的训练后，战争局势开始紧张了。在很多军事行动中，第三军团都需要他的反坦克火箭炮。4月、5月和6月，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惨无人道。一个亲密朋友死去，然后是一个又一个。痛苦变成了愤怒，愤怒变成了冷漠。没有时间去理解，没有时间来哀悼，也没有时间流泪哭泣。他们必须把阿拉伯人驱逐出加利利，必须阻止叙利亚和黎巴嫩军队进攻加利利。占领加利利，净化加利利，保卫加利利。务必确保——加利利属于犹太人。

突袭艾因扎伊通，是他们首次出于占领的目的袭击一个阿拉伯村庄，而不是为了复仇。布尔多瑟生动地回忆起那场午夜的预谋袭击。他回忆起了那场突袭，风暴般的火舌，以及惊喜——占领一个村庄是多么容易。当第三军团的小伙子们闯进石砌的房屋，他们只看到燃烧的灯笼、温暖的毯子，以及从奶锅里沸腾而出的牛奶。他们走进了这些民居，而被吓坏的主人们已经逃进茫茫夜色中，抛弃了这些屋舍。他回忆起亲眼见证一个鲜活的村庄一夜之间变成一个鬼村的可怕感觉。

布尔多瑟回忆，他的第一项野蛮行径就是审讯战俘。有那么一会儿，他坚定的声音变得犹豫起来：可以说吗？但在短暂的停顿后，他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述，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的倾诉。因为他又高又壮，于是被分配一项任务——协助情报人员审讯在艾因扎伊通逮捕的七个年轻人。一个接一个，他将这些恐惧的囚犯捆绑在一张矮凳上，在一端令他们的额头碰到地面，另一端将他们的脚绑在一起。他用一根短棒击打囚犯的头部，然后用另一根长棍击打这个囚犯的双腿。当他开始虐打这些囚犯，他开始享受虐待他们的快感。他感觉自己正为那些死者复仇，他正在做那些已故战友们希望他做的事。他让这七个囚犯向情报人员招供所有他们知道的，让他们流血，直到他们再也坚持不住。

接着，塞菲德被占领，这是第三军团第一次攻占一个城市。一开始，进展得非常困难。当武装的阿拉伯暴徒对他所在的建筑物展开风暴式的攻击时，布尔多瑟觉得，他几乎是独自一人在战斗。那些暴徒们大喊着："杀光犹太人！"弹药耗尽了。他感到死亡正在迫近，忍不住打冷颤。但到早晨时，局势逆转，犹太增援部队抵达，阿拉伯人撤退了。拿着他的加拿大制步枪以及新补充的子弹，布尔多瑟在这个古老城市里，在阿拉伯人寻求庇护的古老石屋间，猎杀着阿拉伯人。在狩猎过程中他感到无比的快乐，因屠杀而快乐。这种快乐堪比令男人瘫倒的性快感。

战斗结束后，布尔多瑟前往当地的医院，在那里，他发现三个战友横躺在冰冷走廊的地上——他们的脸庞毫无生气，恐惧在脸上冻结。即使他如此强硬，仍然感到害怕。一周后，在一次针对某些阿拉伯村庄的深夜行动中，由于他是最后撤离的人员，他将最后一辆卡车泊在集合点。半小时后，他意识到那些曾经跟他在一起的战友们都死去了。再一次，他感觉到恐惧。突然，在那一刻，他认识到，战争中的这几个月他到底做了什么，他过着怎样一种噩梦般的生活。

5月下旬，他被调到了约旦峡谷。在这里，他经历了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光。他带着自己的反坦克火箭筒，在前线阻止叙利亚坦克向德加尼亚基布兹进军。他独自一人站在那里，注视着第一辆坦克向他开来，注视着这辆坦克瞄准了自己。在最后一刻，他率先发射反坦克火箭炮弹，阻止了坦克，同时自己也负伤了。

他所经历的另一个糟糕时刻，就是看见约旦峡谷两个基布兹的两名幸存者逃出他们被焚毁的房屋。见证基布兹社员变成难民带来的震撼，使他第一次考虑失败的可能。他意识到，自己所投身的战争，也许将以犹太复国主义的灭亡而告终。而一旦犹太复国主义覆灭，即将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就同在欧洲一次又一次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两样。犹太人将再次变成犹太人，他们将全然无助。

待布尔多瑟抵达吕大山谷时，他已经疲惫不堪。他已经看见了太

多，做了太多，又杀戮了太多。这一次，他已不再好战。但当命令下达，他依然遵从。他跟随第三军团的队伍进军，从银色的橄榄园开进吕大。当太阳升起之时，他漫步在吕大的街道，寻找他能够抢掠的相机商店——他是那么喜欢相机。突然，枪声响起。有传言说装甲车进攻吕大，战友们被围困在小清真寺旁的壕沟里。当布尔多瑟赶到小清真寺时，他看到这里的确正发生着枪战。一颗手榴弹不知从哪里飞过来。他便指示其中一个下属用反坦克炮向小清真寺射击。当投弹士兵拒绝并离去后，布尔多瑟将反坦克炮拿到了自己手里。尽管，他深知在这种狭窄的巷子里发射一枚反坦克炮弹，会使身为炮手的自己受伤，但他无论如何都要发射。他拆卸下狭窄巷子里公共卫生间的大门，尝试把自己庞大的身躯尽可能地掩藏在卫生间里。很明显，手榴弹是从宣礼塔处投掷过来的，但是，他没瞄准塔，而是瞄准了清真寺的墙体——他能听到从墙后面传来的人声。他从六米远的位置向清真寺的墙体发射了反坦克炮弹，杀死了70个人。

这一支受训队伍，由来自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和雅法的120名青年运动的毕业生组成，他们的任务是在红海沿岸、靠近埃拉特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基布兹。1947年的夏天，这群18岁的青年们在加利利沿海的一所老基布兹接受了关于基布兹生活的培训。他们清理田地，建造公共住房，修补渔网，在香蕉园和牛棚里工作，把羊群带出羊圈放牧。一个月里有十天的时间，他们研习地形和导航，学习如何操作冲锋枪、组配炸药。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们维持着集体的生活方式，他们开设了一门文学课、艺术研讨会、一个政治经济讲习班，以及一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课。他们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分析它践踏人的尊严，他们探求究竟是人类创造了历史，还是历史塑造了人类。他们阅读泰戈尔（Tagore）、茨威格（Zweig）、海塞（Hesse）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著作，阅读凯斯特勒（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甘地（Gandhi）的《我体验真理的故事》（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布伯（Buber）的《我和你》（I and Thou）。他们演奏和聆听音乐，门德尔松（Mendelssohn）、帕格尼

尼（Paganini）、多米尼科·奇马罗萨（Domenico Cimarosa），这些都是他们特别喜欢的音乐家。在加利利海边的树林里，受训组的小伙子和姑娘围着留声机坐成一圈，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奇马罗萨的悲剧双簧管，它忧伤的乐音在沙沙作响的桉树林和轻轻拍击的湖波间回荡。

1947年12月，受训组的几个小伙子参与了他们的第一次报复行动，目标是上加利利的一个小型的阿拉伯村庄。因为女人和孩子们被意外杀死，他们决定炸毁两间布满尸体的村舍。1948年1月，受训组一名男孩牺牲。姑娘们围着他的身体点燃一圈蜡烛，整个夜晚他们都坐在他身旁，就像为他守灵一样。不久，又一名小伙子在行动中遇害。然后是又一个，接着又是两个小伙子被杀死。有一些小伙子开始变得愤世嫉俗，变得有些病态。有一些给姑娘们留下了遗嘱。

在1月中旬，八个小伙子执行了他们的第一次路边伏击。他们用机关枪向一辆阿拉伯出租车开火，射杀了车里的全部无辜乘客。在2月中旬，他们中的一些人参与了第一次突击队形式的突袭，炸毁了加利利一个偏远村庄的16间石头房屋，炸死了60个人。他们的心态改变了，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开始退化。留声机的音乐会仍然在夜间举行，但现在谈论的主题却是复仇。文学讨论和意识形态辩论仍在进行，但常常在军事行动之前先来一场战前舞会。就像画上的印第安勇士，就像贪婪的阿拉伯刺客，这些希伯来小伙子们用牙齿咬着小刀，高高举起匕首一圈圈地绕着场子行走。五一节的前夕，他们沿柯那安的山峦而下，第一次占领一个村庄。他们驱逐了800名居民，将村子洗劫一空，最后炸毁了这个村庄。他们从地球的表面抹去了这个村庄。

现在从我桌上的录音带里传来的女声，来自受训组的其中一个姑娘，我对她了解颇深。她回忆起当小伙子们深夜出发袭击村庄时，她所感受到的焦虑。而当他们在日出时分返回时，他们骑着抢来的驴子，包着抢来的阿拉伯头巾，戴着抢来的串珠。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取代了几个月以来的紧张。似乎，突然之间，战争不再是严肃而阴郁，而是充

满乐趣。小伙子们有了一种新的感触——对于权力和解放的感触。取代卡其装、斯巴达精神和自律意识，他们感觉卸下了重担，抛弃了道德的枷锁。他们霸占的用来当基地的酒店房间，现在堆满了色彩斑斓的布料、串珠、铜器和水烟袋。其中一扇门贴着手写的标语：“吃饱，喝足，抢掠，因为明天我们就将灭亡。”看起来，被毁坏的不仅仅是一座在五一节那天被攻占的阿拉伯村庄，同样沦落的还有社会主义——锡安主义者曾经宣扬的民族精神：谦虚、行善、服务大众。

一些小伙子参与到对村民囚犯的残酷审讯中。审讯结束后，其余人把这些血流不止的囚徒带到一处干涸的河床。当囚徒们被处决时，有的小伙子转过了脸，但更多的人嬉笑着观看。与此同时，在塞菲德市，一个小伙子成了一名优秀的狙击手。他的声音从我的磁带上传出，显得非常冷酷。他叙述，有一回他射杀了一名妇女，还有一次狙击一名牧师，然后是一个孩子。每一次他击倒一个阿拉伯人，他就在他的加拿大狙击枪的木托把上刻下一条凹槽。总共有50条凹槽，他这样说道。

接下来就到了声势浩大的塞菲德战役，他们清洗了整个城市，然后把塞菲德洗劫一空。“我们的庭院就像阿拉伯村庄的庭院，”其中一个姑娘在信件中写道，“这里太热闹了。母鸡到处乱跑，咯咯咯地叫着，牛时不时地闯进院子里……但在所有这些带来的兴奋中，我意识到，一切抢夺而来的财产都不是正义的，这令我恶心。在一天结束之后，我看着这些东西，一切都令我作呕。我几乎不认识这些同伴了。所有的人都醉醺醺地欢庆胜利，被抢劫的欲望所驱使。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拿走了所能拿的全部东西，沉浸在挣脱束缚的胜利喜悦里，尽情地抒发仇恨和报复的快感，变成了真正的动物。他们粉碎，破坏，杀死阻挡他们道路的任何生灵。复仇的渴望喷如泉涌，我的同志们丧失了所有的人性。我简直不敢相信人类居然能做下这样的事情：冷血地杀死数十名同胞。不，我做不到这般冷血，充满激情，日复一日，在我们心中，人类的感情变得越发淡漠。”

1948年7月11日，受训组的小伙子们向吕大进发。城镇东郊的枪击把他们限制在与贝谢门接壤的橄榄园。蚊子嗡嗡嗡地在他们身边打转，热浪滚滚，头上戴着的新式钢盔被烈日蒸得嘶嘶作响。有几个人受了伤，其余人则被炮弹震得有些呆滞。受训组第一个白天的战斗并不顺利。但当达扬的炮火风暴摧毁吕大的抵抗意志后，受训组的小伙子们夹在第三军团的士兵中间挺进了吕大城。他们引领着排成长队、高举双手投降的吕大居民走进大清真寺，将他们圈禁在这里。他们监禁了数千名平民，包括老人和孩子。他们听着这些平民尖叫、咆哮和哭泣，看着女人和孩子眼里流露出的深深恐惧。

第二天，约旦装甲车闯进吕大城之后，培训组的其中一个领导人负伤。当时，一枚手榴弹突然从小清真寺投出并爆炸，夺走了他的一只手。这一事件激得布尔多瑟将那枚反坦克炮弹射入清真寺。而当这位反坦克炮手自己受伤后，复仇的欲望变得更加强烈。一些第三军团的士兵向清真寺里的伤员扫射。另一些士兵将手榴弹投进邻近的民房中。还有人在大街上架起机枪，射杀任何移动的活物。这一场报复持续了半小时。之后街道上多出了数十具尸体，又有70人陈尸清真寺。夜晚，清真寺里的尸体被拖出，埋葬在附近阿拉伯人挖掘的深洞里；天亮之前开来了一辆拖拉机，铲土填平尸洞。

“我们真是残忍。”受训组的另一个姑娘写道。“这该死的战争把人类变成了野兽。”一个小伙子这样写道。而另一个小伙子写着：“我累了，我太累了。这种疲惫体现在很多方面上，但最累的莫过于精神。我还是太年轻，挑不起这样的重担，挑不起这一切。”在我桌上摊开的所有信件中，最令我难过的，是来自另一个男孩的信——现在我视他为我的导师和朋友：

“日复一日，我看着这场战争带来的破坏，对我们这一代，对我们的下一代。日复一日，我的恐惧在滋长，担忧我们这一代将无法担起肩上的重担——建立我们的国家、实现我们的梦想。我陷入全然的焦虑和

担忧中。当我回想那些偷盗、洗劫和肆无忌惮的掠夺，我意识到，这些并不仅仅是孤立的事件。所有这些叠加起来，催生出一个腐败的时代。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本着郑重的态度、深入的思考，以及带着历史维度的反思。我们所有人，将为这个时代承担责任。我们将面临审判。而我感觉在审判中，正义并不在我们这边。现实给了我这样的印象：这个国家的快速转变，以及这个国家的希伯来力量的快速转变，驱使着人们走向疯狂。否则无法解释这样的行为、这样的精神状态，希伯来青年（尤其是当中的青年精英）的行动。这个国家从数千年中的弱势中锻造而成的道德准则，现在正迅速地堕落、恶化和瓦解。”

占领吕大城的军政府首长就是那位塑造马萨达的人。尽管，就他个人来说，什马利亚胡·古特曼是世俗而理性的；但他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方式是神秘的。他将革命运动视作一个人在灭亡边缘的生命爆发，视作一个失败国家不再等待弥赛亚、主动承担弥赛亚使命的雄心壮志。他坚信这50年来，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每一次，一波移民浪潮消退，另一波又出现。每一次，一代人衰弱了，下一代人就伸出强壮的手接过了火炬。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有一些东西却变化了。阿拉伯问题，一直存在的阿拉伯问题，此时突然给未来打下了一个问号。全国各地，阿拉伯村庄开始走向现代化，阿拉伯城市开始变得更繁荣。新兴的阿拉伯知识分子阶层促进了强烈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开始结成独特的、高度危险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这一身份认同。所以，旧式的犹太复国主义道路不再适用。所以，渐进地赎买土地，渐进地迁入训练有素的移民，渐进地、自下而上地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都不再适用。于是，有必要采取不同的举措。战争固然是不人道的，但它允许一个人做出和平时期不能做的事情，它可以解决和平时代不能解决的问题。

距离古特曼率领他的第一批46名学员登上马萨达已经过了六年半。自那次以后，他又把数千人带上了马萨达，独力地改变了一代人。而现在，他的工作已然不仅仅是激励年轻一代。在接下来的几年，他已经变

成了一名杰出的情报员。在第一次马萨达之旅后，他就利用他的阿拉伯语、他的狡诈、他的敏锐直觉，协助搜集阿拉伯诸多村庄的情报。每一份情报文档都包含一张航拍照片、一张地图和一张人口统计细目表，以及村庄的领导人、力量及弱点、道路和偏僻小径和指挥所。每一份村庄的文档，都意味着一个村庄的覆灭。

这几年里，古特曼的思想秘而不宣。只有同他最好的朋友——哈加纳的参谋长伊斯雷尔·加利利——在一起的时候，他才可能显露坦诚的一面。只有他们两人私下相处，他们才会讨论那些不能讨论的事情——那些心里明白、不能言明的、道德禁止的事情。当这场规模宏大的、不可避免的战争开始谋划时，显而易见，这两位密友将战争的第一要务定为：确保清出一个阿拉伯的无人区——为了犹太人领土的延续和统一。古特曼坚信，这个任务可以完成。他非常了解这些阿拉伯人，推测出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层级分明的内部结构，或者说，不具备国家主权的精神。他相信，一旦这些阿拉伯人遭遇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决心和火力，他们将痛快地离去。

1948年的战争爆发时，古特曼正负责帕马奇的特殊秘密情报站。哈加纳的保守派阿拉伯专家们，仰赖他们与全国范围内的友好阿拉伯村庄签署的和平条约，古特曼与他们展开了激烈辩论。古特曼声称，当事态严重时，即使是最忠诚的阿拉伯人村庄领导人都无力承担来自泛阿拉伯世界的压力，他们将撕毁条约，转而对付犹太人。这些阿拉伯盟友的确在这几年成为犹太人的支持力量，而就在保守派依然致力于打造阿拉伯联盟之时，这位精力充沛的教育家和阿拉伯专家，却自始至终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会爆发一场战争。这场宏大的战争将是你死我亡的争夺。

古特曼居住在那安，这个他协助建造的基布兹就在距离吕大不远处。那安隔壁就是阿拉伯村庄那安尼哈和贝都因村庄萨塔利亚。萨塔利亚建于58年前，为了给雷霍沃特殖民地的柑橘园腾出地方，萨塔利亚的

部落从杜兰的土地上被驱逐到这里。1948年春，那安基布兹的领导人与萨塔利亚部落的首领会面，犹太人与贝都因人宣誓彼此效忠。但古特曼却不能忍受双方虚伪的天真。他站起来，对贝都因首领们说道："伟大的战争即将到来。当战争来临时，那安基布兹无法支持你们，或者保障你们的未来。"萨塔利亚的部落首领立即听出了言外之意。第二天一早，萨塔利亚的贝都因人就匆匆离开家园，逃往加沙。几个星期后，那安尼哈的村民们也逃了。无须举手之劳，无须承担任何战事，古特曼就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两个村庄的居民就这样消失了，即使他与村民们相交颇深，即使他们之间维持了15年的亲密友邻关系。

与军团指挥官、布尔多瑟以及受训组员不同，古特曼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完全知晓他正面临的悲剧和道德困境。他一直都知道，他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清除这个国家的阿拉伯人；也知道，这个任务会有多么可怕。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在寻求多种"世故"的方式来清除他们。他并不想杀死或者驱逐他们，他只是要引导他们自愿离去。

古特曼被分配到吕大担任军政府首长完全是出于偶然。1948年7月11日，他正因为一些情报事务前来寻找伊加尔·亚伦和伊扎克·拉宾。他从那安驱车赶往特拉基色附近老赫伯特·本特威奇的产业，最终却在被攻占的、荒废的达尼亚尔村找到了两位将军。当他们在达尼亚尔注视着军队挺进吕大，亚伦告诉古特曼，一旦这座城市被占领，他将是吕大城军政府的首长。古特曼便问亚伦道："我应该如何处理那些阿拉伯人？你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吗？""我没有什么嘱咐你的，"亚伦回答，"你将看到事态的发展，当它们发展时你就可以行动。你可以做任何你认为必须做的事。"

黄昏时分，古特曼抵达吕大，成为军政府首长。在黯淡的暮色里，他看见几千人排成长龙，静静地涌向大清真寺。他们主动接受圈禁，否则宵禁时间后任何在外面的人都要被射杀。夜幕降临时，成千上万的恐惧的人类聚集在高天顶的屋子里祈祷。这里闷热、拥挤，令人窒息，没

有食物，没有水，空气浑浊，也没有坐下或躺卧的空间。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那些病弱的人和年幼的孩子就会窒息而死。

午夜时分，军政府首长释放了女人和孩子。然后，他释放了磨坊主和面粉店主以保证面粉供应，令面包师去烘烤皮塔饼，又释放了水井的操控人员来供应清水。稍后，他释放了两百个来自那安尼哈的难民，提供给他们食物、水、骆驼、驴子，让他们可以在灾难降临之前逃离这个城市。到了早晨，他释放了大部分的青少年。尽管这样，清真寺里还是拥挤不堪。上午，第三军团全面接管整座城市后，事态再次恶化，更多的人涌进了清真寺，他们的双手高举过头顶，眼里充满恐惧。

7月12日，正午的枪声突然响起时，这位军政府首长正在圣约翰大教堂的教区与吕大的政要们谈判。第三军团的行动长官被派往镇子查看到底出了什么该死的事情。几分钟后，一个激动的年轻士兵前来报告，说有人从小清真寺里扔出了手榴弹，投向他的战友们。军团指挥官转向军政府首长，露出一个讽刺的笑容："您怎么说，首长？您要下达什么命令？"他这样问道。但军政府首长没有挖苦也没有被逗乐。他意识到，如果他不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事态将会失控。于是，他建议向每一座开火的房屋射击，把子弹射进每一扇窗户，射杀每一个被怀疑参与暴动的叛乱分子。

古特曼形容接下来的30分钟是他一生中最难挨的30分钟。几十年后，当他复述这起事件时，录音带里他的声音依旧显得紧张不安。那些恐慌的喧闹，永不止息的枪响，上帝的义怒，当枪声终于止息，寂静是那般的甜美。然后，部下通报在小清真寺发生的事实。这位军政府首长只得命令他的部下埋葬死者，抹去不利的证据。

古特曼现在清楚，木已成舟，吕大城的命运也已经注定了。已经无法回头。但是，因为他没有收到驱逐令，他不能变出一份。他回到阿拉伯政要们聚集的圣约翰大教堂教区，控制住自己，做他必须做的事。他告诉这些达官贵人们，吕大马上就要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为了争夺

国际机场。他说，就像他们看到的，在大战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恐惧的政要们询问，如果他们请求离开，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可是个不吉利的问题，”军政府首长回复道，“我必须好好想一想。”他走进隔壁房间休息，放松他的大脑，暗想，如果这一大群阿拉伯人不在这里的话事情将多好解决。但他仍然决定，不管怎样，他不会命令阿拉伯人撤离。于是，他顶着巨大的压力返回政要们那里，告诉他们，他必须同上级再次磋商。

当他们第三次会晤时，阿拉伯的政要们已经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他们请求离开吕大城，只附加一个条件——释放被扣押在大清真寺的所有囚徒。第三次，这位军政府首长以磋商为由离开了。但这一回他折返回来，带着两名陪同的年轻军官——他请他们来见证这番决定命运的谈话。

政要们：“那些被扣押在大清真寺的囚徒们，他们的结果会是怎样呢？”

古特曼：“你们过去怎样把我们投进监狱，我们就将怎样对待他们。”

政要们：“不，不，请不要做那样的事。”

古特曼：“为什么？我刚才有说什么吗？我说的不过是你们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就将怎么对待你们。”

政要们：“请不要这样，主人。我们请求您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古特曼：“好吧，我们不会这样做。从现在起，十分钟以后，所有的囚犯都会被释放。叫他们离开清真寺，离开他们的家，离开吕大城——连同你们以及吕大的全部人口。”

政要们：“谢谢您，主人。上帝保佑您。”

古特曼觉得，他已经达成了他的目标。占领、屠杀和精神压力产生了预期效果。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在48小时的炼狱生涯后，他并没有命令吕大的人民撤离。在屠杀的间接威胁下，是吕大的领导人令他们撤离。

现在，古特曼从教区穿过了街道，走进大清真寺。他面向人海，告诉这些囚徒们他们可以自由离开。他告诉他们，根据吕大政要们的决议，吕大居民必须在一个半小时之内撤离吕大城。严禁携带武器，严禁乘坐轿车或者电车，但可以携带其他财产——只要他们立即离开吕大城。

这位军政府长官简直不敢相信他的眼睛。成千上万的人，低着头，离开了大清真寺。没有人抱怨，没有人诅咒，没有人唾弃他。他们完全屈从地排着队走出去，散开了。他爬上大清真寺高高的尖塔。从这处制高点，他注视着混乱把这座城市吞噬。吕大的民众匆匆打包所有他们能拿走的东西：面包、蔬菜、海枣和无花果，袋装的面粉、白糖、小麦和大麦，银器、铜器、珠宝、毛毯、褥子。他们手里拖着不堪重负的行李箱，背上驮着由床单和枕套制成的简易包囊。所有的东西都压在了马车上，驴子上，骡子上。所有的事情都在匆忙和恐慌中完成，仅仅用了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

古特曼从尖塔下来，走到镇子的东角，俯瞰贝谢门。离开城镇的平民们聚集成了一支长长的、圣经化的、数千人的队伍。当军政府首长注视着这支被放逐的行伍，注视着人群中那一张张脸孔，他想着，如果耶利米（Jeremiah）[注]在他们当中，又会如何哀叹他们的灾难和耻辱。突然间，他心中涌上一股冲动——加入行进的人群中，成为他们的耶利米。在那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作为他们的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他希望成为吕大民众的耶利米。

在他终于描述完行进的队伍后，军团指挥官的话题转回到自己身

上。站在他的指挥车旁，他注视着吕大的人民走在路上，背上背着由毯子和枕套制成的沉重袋囊。逐渐地，他们卸下了背不动的包袱，将阻碍他们前行得更远的背囊丢弃在路边。在这酷热的天气里，忍受可怕的口渴，老人和女人们濒临崩溃。就像古犹太人一样，这些吕大的人民走向流亡。

看着这支队伍，军团指挥官会感到内疚吗？没有内疚，没有怜悯，他在磁带里这样说到。随即，他把话题从人性体验转到全局的战略背景上。“伊扎克·特本金支持驱逐阿拉伯人，”他告诉我道，“特本金看得十分清楚。他所处的职位并不能下达特殊命令，但他对帕马奇总部做出了宏观指示：战争为解决阿拉伯问题提供了一次性的机会。伊加尔·亚伦同样也这样认为，是时候让他们离开这里了，他们必须离开。亚伦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但他说阿拉伯人绝不能留在这儿，否则，这里将不能被称为一个国家。”当亚伦委任这位军团指挥官时，他明确地告诉他：你所战斗之处，不应该留下阿拉伯人。于是，这样的情形出现在提比利亚和塞菲德，出现在加利利的村庄，出现在吕大山谷的村庄里——伊拉巴、达尼亚尔、基姆祖、达哈里亚和哈迪萨。“只有吕大城出现了混乱，因为这座城市规模庞大，东边又有军队围城，战斗一旦打响，这些阿拉伯人没办法逃离。”

这支队伍产生的原因来自一个早先制订的驱逐计划或者一份公开的驱逐令吗？“不，不，”受惊的军团指挥官答道，“拉尔拉行动是由以色列国家直接指挥的。在1948年7月，戴维·本·古里安已经是这个主权国家的总理。进攻吕大的部队正是新诞生的以色列国防军的军队。大灭绝是这起事件的背景。本·古里安总理没有指示以色列国防军清除阿拉伯人，深谋远虑的伊加尔·亚伦也没有这样做。亚伦清楚地知道本·古里安没有下达驱逐令。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能驱逐人民。但是，本·古里安和亚伦都认识到，绝不能允许一个阿拉伯人的吕大城依旧矗立在国际机场旁边，矗立在距离特拉维夫不远的地方。如果我们允许它保留，我们将不会胜利，也会丧失国家的意义。本·古里安和亚伦之间也许有过

口头交流，但没有下达书面命令。”

亚伦和军团指挥官同样没有下达驱逐令。但军团指挥官在帕马奇接受的训练使任何命令都显得多余。他知道自己必须做的事，即使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于是，当约旦装甲车开进吕大城时，至少，还有一个借口，事实就是这样：约旦人的大军向以色列中部进发，从东部袭击了吕大。第三军团遭受了内外夹击的压力。吕大拥有大量人口，又有相当多的约旦军队在吕大东部集结。于是，当吕大的阿拉伯人向军政府首长询问他们是否可以离开，告诉他们向着阿拉伯军队行进就有了战略意义。“这是一个有利的结果，”军团指挥官说，“百分之百奏效，从吕大城撤离的平民队伍让阿拉伯的军队只能东进。这样一来，不费一枪一炮便扫平了大片土地。”

然而，当我请求这位军团指挥官回忆一下地点、时间以及个人体验时，他显得非常吃惊。亚伦和拉宾离开了吕大，赶往另一处前线阵地，于是，驱逐吕大平民的责任就落在了这位军团指挥官、他的副手、他的团长，以及军政府首长的肩上。这四名军官不得不面对东部再次开战的危险，以及城中士兵们疯狂掠夺造成的混乱。他们必须负责埋葬我们的战友和阿拉伯人。还要看顾那支行进中的队伍，可怕的、由成千上万的人组成的撤离吕大的队伍。

“军官也是人，”军团指挥官说，“而作为一个人，你此时突然面对一个分岔口。一边是青年运动，青年村，以及莱曼医生留下的宝贵遗产；另一边则是吕大城中的残酷现实。你惊讶于自己所惊讶的。你这么多年的训练就是为了这一天，你准备了那些村庄的档案文件，你被告知不可避免的一场战争正在迫近，你被告知这些阿拉伯人必须离开。但即使这样，你还是震惊了。在吕大，战争就像它本身那样残酷，充满杀戮，劫掠，愤怒和复仇的感情。然后，那支队伍走过来了。尽管你强大、训练有素又适应力强，但在某种程度上你仍然感到精神崩塌。你感到你所接受的一切人文教育都在崩溃。你看看那些犹太士兵，再看看这

行进中的阿拉伯人，然后，感到一种沉重的、深沉的悲伤。你感到就像正面对什么无限的东西，你根本无法处理，甚至都不能伸手握住。”

布尔多瑟记不得那支队伍，因为他朝小清真寺射出反坦克炮弹后就受伤了。他失去了意识，被送到医院。几天后苏醒过来，他的战友们过来告诉他，他做得很对，他杀死了70个阿拉伯人。他们这样说，是出于看到他负伤流血的愤怒，他们当时还冲进了小清真寺里，用全自动火力的枪械向幸存的伤者扫射，然后闯入附近的民居扫射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一个人。晚上，他们被命令清理小清真寺，移出寺里的70具尸体并安葬他们。于是，他们带来另外8个阿拉伯人，命他们挖掘葬坑，然后又射杀了他们，把这8个人同那70具尸体埋在一处。因为，自小清真寺的枪击事件后，他们不再犹豫彷徨，而是强硬如钉。“这些家伙放弃了高尚的举止，”布尔多瑟道，“他们知道该做什么，并且去做。而他们所做的，与驱逐吕大人民并将他们赶出犹太国家边界的决定相一致。”

来自受训组的一个小伙子清楚地记得那支队伍。他记得，上午小清真寺大屠杀过后，他们连队的任务就是清理小清真寺的东区。他记起一份明示的驱逐文告，指示驱逐阿拉伯人，要把他们赶出城，驱逐所有的阿拉伯人。这名理想主义的第三军团士兵，穿行在吕大的现代街区，沿着笔直的街道挨家挨户地用阿拉伯语叫喊：“Yallah，Yallah.”（快走，快走。）他们向天空鸣枪，恐吓并催促吕大新兴中产阶级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家庭。这些富裕的阿拉伯人惊慌地召集孩子，带着他们的驴、马以及财物，在酷热的天气里走向城郊，踏上通往贝谢门的马路。

其他小伙子记得的要少一些。他们对吕大的记忆并不是很清晰。他们记不得在那关键性的几个小时里他们在做什么。那7月里的三天时光，他们能回忆起来的，只是一些零散的图像：一个被占领的城市，紧闭的窗户，白旗，大清真寺里拥挤的人群，小清真寺响起的枪声，半小时的炼狱，之后便是死一般的寂静。然后便是在寂静中，被击败的阿拉伯人排成沉默的队伍，他们的手举向天空示意乞降。于是现在，年轻的

士兵可以骑着抢来的自行车满大街乱逛，闯进吕大的奢侈品商店，带走照相机、留声机、收音机、地毯、水烟以及精美的铜器。他们没收了卡车、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以及柑橘园，以供未来的基布兹建设之用。还有供未来的基布兹驱使的巴士，他们在里面装满了吕大各式各样的商品。这时，在一个无法解释的暂停之后，我所采访的这些男人注意到了那支队伍。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当他们描述那支由老人、妇女和孩子组成的队伍，以及这些人遗弃再也搬不动的日用品所留下的长长的痕迹时，他们的声音听起来依然是那样令人震惊。一袋袋的面粉、白糖、小麦、自行车、褥子、孩子们的玩具、衣服、鞋子。

受训组的领导人对那支队伍记忆深刻。在他受伤前，他还闯入一家理发店，找来干净的毛巾和酒精，为在战斗中受伤的吕大儿童包扎伤口。在小清真寺旁的战壕里受伤失去右手后，他被送到市中心的临时战地医院接受治疗。当医护人员用绷带给他包扎、用吗啡给他镇痛时，他听到了镇压吕大起义的严厉命令。然后是反坦克炮的声音，以及机枪地狱般的“啪哒哒哒”声。第二天，当一辆军用救护车载着他撤离至贝谢门的野战医院时，他们撞见了正撤离吕大的队伍。透过救护车的窗户，受训组的组长看见了一幅超现实主义的图景：老人、妇女和儿童，拖着驴子、骡子、马车，带着婴儿车走在路上，脸上挂着大难临头的表情。这位受训组领导人再也不确定，他究竟同情哪一方更多。是他死去的战友，他自己，他这一代人，还是这成千上万的穿越吕大山谷的民众？

古特曼同样记得这支队伍。他爬下了尖塔，走在这些行进者之间，这位军政府首长心绪翻涌。他扪心自问，他鼓励军团的士兵向吕大的民居开火是不是做错了，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方式来避免已经发生的一切。然后，他沉默地自答，如果不这样做，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将可能覆灭。他看着这些行进中的男男女女，他震撼地发现他们脸上的表情是无动于衷的，即便他们现在丧失了主权，丧失了尊严。他难以理解，一个城市、一种文明，竟能就这样被摧毁。在城镇外，军政府首长看到数百名，甚至数千名的民众围着一口井汲水，缓解7月的干渴。一个人跌落

到井里，另一个人在惊慌中被踩踏致死。他看到骚乱的人群中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正跪着生产。他看到一个男孩迷路了，他的母亲大喊着寻找走失的孩子。他看到士兵们强迫队伍中的人上缴现金、手表和珠宝。他制止了这些士兵。他看到在两排武装的犹太士兵之间，数目如此庞大的巴勒斯坦人如何离开了城市，排成一支长队。队伍变得越来越长，走出了吕大城，穿越了吕大山谷，经过了贝谢门可爱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村。

对这支队伍记忆最完整的要数奥特曼·阿布·哈曼德（Ottman Abu Hammed）。他的祖父曾在阿提德工厂同犹太人一起工作，并帮助犹太人种植了橄榄林。他的父亲曾经为青年村供应蔬菜，待莱曼医生如朋友，并陪同他在吕大注射霍乱疫苗。他自己则在童年时期经常地拜访贝谢门的青年村。他热爱着那里的现代化牛棚和游泳池，以及穿着卡其布短裤、露出晒黑美腿的姑娘们。

奥特曼跟受训组的小伙子们差不多年纪，但1948年战争爆发时，他远比他们更无辜。他缺乏良好的教育，也没有任何政治意识，他真的完全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只记得他的父亲试图阻止对贝谢门的攻击。他的父亲在田野跟贝谢门的人见面，然后，他的父亲被指控叛国，又在最后一刻从行刑队处逃离。对奥特曼来说，1948年夏天的吕大，就是一座充斥着隆隆爆炸声的城市。成千上万的难民从雅法、塞菲德、那安尼哈逃到吕大，为这座城市带来金钱。随着食品和蔬菜的价格飙升，当地居民赚得了两倍至三倍的利润。咖啡馆营业至夜深，跳肚皮舞的舞者无处不在。镇上到处放着音乐沉浸在娱乐氛围中，而女孩们随处可见。

奥特曼同样也记得暴力。开往贝谢门的犹太车队遭到袭击，乘客遇害。一辆吉普车的犹太人司机被谋杀在主干道上。一天，两个年轻的犹太小伙子和一个年轻的犹太姑娘的尸首被带进镇子，他们在附近的一个村庄被抓获、女孩被强奸，然后三个人全部被杀害。当这三具被侵犯的尸体在吕大繁华的商业大道被展示时，奥特曼惊得目瞪口呆。但无论是这个18岁的青年还是他的家人，都想象不到那即将到来的未来。当吕大

在7月10日夜晚遭受一支犹太空军的炸弹袭击，又在7月11日遭到犹太炮兵的炮袭时，他们完全震惊了。当11日中午一支犹太装甲队扫射吕大的街道，留下数十具尸体时，他们完全震惊了。他们惊骇、恐惧、沮丧。

奥特曼记得，7月11日的晚上，犹太士兵突然地出现在附近。安装在吉普车上的大喇叭叫喊着，命令所有的男人都进入大清真寺。奥特曼跟随他的父亲走出来，加入到街上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清真寺里闷热而拥挤，没有地方坐卧。奥特曼吓坏了。他哭着，泪水把自己打湿。当小清真寺大屠杀的一些消息传来，人们更加恐惧。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这些犹太人还能做出什么事情。他的父亲合上他的眼睛祷告。奥特曼感到极度的恐惧。但第二天，噩梦般的36小时后，犹太人似乎与政要们达成了一致。最终这些阿拉伯人被允许走出清真寺。尽管奥特曼的父亲注意到，小清真寺受害者葬坑的疏松土壤，但他相信，生活现在将回归到正常轨迹。

当他们回到家里，母亲欢迎他们，就好像他们死后复活一样。几分钟后，有人敲门。两个士兵站在那儿，大声叫嚷道："Yallah，Yallah。收拾你们的东西，赶紧离开！去阿卜杜拉国王（King Abdullah）那儿，去约旦！"其中一个士兵敏感而羞涩，显然，他并不喜欢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但另一个留着薄薄一层胡须的士兵，非常享受现下的每一分钟。父亲从口袋里取出一封希伯来语书写的信件，在信中莱曼医生为他正派的阿拉伯朋友做担保，希望这位贝谢门的朋友不要受到伤害。但大胡子的士兵一点都不在意。他把信一丢，用他的枪口抵着父亲的胸口，说道："如果你不马上滚蛋，我就开枪。快滚去阿卜杜拉那里。"

母亲哭起来，她以为父亲就要被开枪打死。而父亲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陷入了震惊中。他低着头，叫母亲赶紧收拾所有能带走的东西。然后去召集祖母、三个姑姑，和他的两个儿子。在两名犹太士兵的枪口下，阿布·哈曼德家族匆忙地收拾行李：面粉、大米、白糖、珠宝、床褥。他们将行李装上马车，又帮助半瞎的祖母跨上驴子。

最令奥特曼感到耻辱的，就是在吕大市郊的检查站，那些士兵对女人进行搜身。一个士兵拿走了奥特曼身上的现金，另一个取走了他的手表。犹太士兵的黄麻袋里，迅速地装填着项链、耳环、银器和金器。而女人们——不论老少——所遭受的羞辱证实了他们所有人现在是多么屈辱。

奥特曼牵着马的缰绳，他的父亲在后面推着马车。道路非常狭窄，拥挤得令人不堪忍受。孩子们大声叫嚷，女人在尖叫，男人们在流泪。有人说一个母亲丢失了她的男婴，又有人说一个母亲遗弃了她的女婴。一辆犹太人的吉普车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车上的士兵吹响了号角，催促人们向前，向前。犹太士兵在他们头顶上鸣枪。不能停步，不能往回走，不能向后看。

在匆忙中，人们急于携带面粉和大米，而不是水。所以，现在没有水，而酷热令人难以忍受。镇外，一个人跌落到井里，当他被拉上来时，人们吸吮他的湿衣服。人们吸吮野地里找到的西瓜，茄子，任何含有水分的东西，只要能暂时缓解他们兽性的干渴。大部分女人都穿着传统的黑色长袍，头上顶着麻袋。一些男人穿着传统的阿拉伯长袍，一些穿着优质的欧式西服。时不时有家庭退出队伍，在路边停下来——埋葬因酷热而夭折的婴孩，向因疲劳而倒下的老祖母做最后告别。不一会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一个母亲把她哭号的婴儿丢弃在树下。奥特曼的堂姐把她的孩子遗弃在另一棵树下——她再也受不了一周大的婴儿发出的饥饿的哭号。但奥特曼的父亲命令她回去树下把孩子带回来。尽管，父亲也是绝望的。他看起来都快失去理智。他一边推着沉重的马车，一边诅咒犹太人，诅咒阿拉伯人，诅咒上帝。

在距离贝谢门不远的地方，发生了一起意外。一群穿着制服的犹太人站在两辆指挥车旁，注视着这支队伍。其中一个人大声叫着父亲的名字。父亲抬起眼皮，走向那位指挥官。贝谢门的毕业生，以及贝谢门的蔬菜供应商，面对面地站在夏季的田野里，两人沉默无言。最后，那位

指挥官说父亲可以留下。父亲说如果他留下，他将被视为叛徒，会被处死。指挥官返回指挥车，带下一罐子（jerry can）[注]的水，搬至父亲的马车上。指挥官看着父亲把水喂给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弟媳，他的儿子；看着父亲拉着他的家族马车，重新加入队伍，一直向东。

我开车驶向吕大。现在正是7月，热浪令人窒息，就好像回到了1948年的7月。厚重的黄色雾霾堵塞住吕大山谷。小清真寺因为最近装修而关闭，但大清真寺是开放的。我穿过了吕大居民们曾经迈进的石头大门，穿过了他们曾经涌入的方形庭院，站在高高的圆拱之下——他们曾经站在这儿足足36个小时。几码远的地方就是庄严的圣乔治大教堂。穿过小路，就到了军政府首长古特曼与吕大城的政要们举行会谈的教区。

这里曾经耸立的老式石屋、橄榄油榨油作坊、旧城的胡同小巷，在20世纪50年代被毁坏了。但是，站在这一平方公里的咫尺之地（它曾经坐落于古老的吕大）你还是会感觉到，有些事情错得离谱。这里有一处古怪的建筑遗迹，那里又有一处无法解释的废墟。在丑陋的贫民窟、破旧的市场、廉价的商店之间，很明显，吕大还有着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不像以色列攻占过的其他巴勒斯坦城市，这里的巴勒斯坦人依然感觉得到伤痕的存在，不像其他地方靠现代化遮掩了过去，在这里过去依然存在。

我应该为犹太复国主义洗手以示无辜吗？我应该对犹太民族运动在吕大的行径置之不理吗？就像军团指挥官一样，我面对着某些极广大的东西，以至难以处理；就像古特曼一样，我看见一个自己不能操控的现实；就像受训组领导人一样，我不仅仅是悲伤的，我还感到恐惧。当一个人打开这个黑匣子，他就会明白，尽管小清真寺大屠杀是基于一个误会而引发一系列悲剧的意外事件链，但占领吕大、驱逐吕大居民却不是意外。它们是犹太复国主义革命不可避免的阶段，奠定了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根基。吕大是我们的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当我试着坦诚

地对待它时，我看到选择是如此明显：或者因为吕大拒绝锡安主义；或者，连同吕大一起，接受锡安主义。

就我而言，有一点是清楚的：军团指挥官和军政府首长有权对假惺惺的以色列自由派生气，这些人在几年后谴责他们在吕大做下的事情，却享受他们行动的成果。我谴责布尔多瑟，否定那位狙击手。但我并不责备军团指挥官、军政府首长以及受训组的小伙子们。相反，如果有需要，我将站在受责的一方。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他们，以色列的国家将不会诞生；如果没有他们，我不会诞生。他们做了肮脏的、龌龊的工作，但令我的同胞、我自己、我的儿女可以生活。

在东方，银色的橄榄园消失了。阿提德工厂的遗迹也消失了。那久远的吕大阿拉伯人的田地，现在已成了以色列基顿合作社和贝谢门合作社枯萎的向日葵花田。莱曼医生的青年村依然矗立在这里，但自1948年战争，以及莱曼医生1958年去世后，它的精神也消失了。现在，在缓坡下矗立的是一栋毫无特色的建筑，一个毫无特色的教育机构。只有仍然耸立的一排长长的、红屋顶的建筑（那曾是为欧洲的孤儿们建造的）向人们证明，贝谢门曾经是什么样的，它又希望成为什么样子。贝谢门的庭院仍然保留，一个主项目正在准备对它实行保护。

我从贝谢门青年村的制高点眺望吕大山谷。我看到了吕大的城市，以及大清真寺的高高尖塔。我看到了消失的橄榄园，消失的赫茨尔森林，消失的阿提德工厂，消失的莱曼青年村。我思索着在这里发生的悲剧。在犹太复国主义以基什尼奥夫大屠杀的名义进入吕大山谷的45年后，它在吕大山谷煽动了一场人类的灾难；在犹太复国主义以无家可归的名义进入吕大山谷的45年后，它将一群无家可归的人遣送出山谷。在沉重的热浪下，透过阴霾，沿着干燥的棕色田野，我看到那支队伍正向东进发。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支队伍仍然在向东进发。因为队伍——就像吕大的队伍——永不停步。

1. 现在叫考那斯（Kaunas）。
2. 指人民，犹太人的习惯表述。
3. 耶利米，是《圣经》中犹大国灭国前，最黑暗时的一位先知，被称作“流泪的先知”。
4. 军用盛装液体的罐子，一罐装4 ~5加仑的水或油。

第六章
供给房，**1957**



我与泽夫·斯坦赫尔（Ze’ev　Sternhell）教授在他耶路撒冷的朴素公寓里会面。斯坦赫尔是一位在研究欧洲法西斯主义方面成就杰出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因反对犹太法西斯主义而备受赞誉的政治活动家。他身材颀长，举止优雅，是一位真正的绅士。在连续三天的时间里，我聆听他的人生故事，也试着理解我自己的人生。在聆听的过程中，我尝试理解20世纪以色列犹太人的传说。

“我出生在加利西亚一个世俗的富裕家庭，父母老来得子，因此，我备受宠爱。”斯坦赫尔告诉我，“我的祖父是一位成功的纺织品商人，我父亲则是他的合伙人。我的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连同一个女佣及一个保姆在家照顾着我。我的姐姐艾达（Ada）比我年长13岁，她就像我的第二个母亲一样。我沐浴在爱中。直至今日，我印象最深刻的记忆仍是我的父亲把我搂在怀里，跟我脸贴着脸。”

“突然，战争爆发了。我在半夜被惊醒。所有的灯都亮着，我的父亲身着波兰军队的制服，跟我们道别。几周后，当他战败而归，一切都坍塌了。我的父亲死了，我的祖父也死了。苏联人占领了波兰东部，也抢占了我们大宅的一半。我们没有女佣和保姆了。母亲必须要工作。母亲和姐姐尽了她们最大的努力来保护我。在那个动荡的世界，她们是我唯一的依靠。

“我6岁的时候，也就是1941年的夏天，巴巴罗萨行动（Barbarossa operation）就发生在我们建于维斯瓦河岸的房子前面。我记得被震碎的窗户、燃烧弹以及德国纳粹军令人震慑的势力。几个小时内，我们看到了惊恐的苏联战囚排成的长龙。几个月后我们被发送到隔离区。转变是骤然的：从我们的宏伟大宅到隔离区的一个角落，拥挤不堪，散发着恶臭，并且我们忍饥挨饿。

“然后开始了灭绝行动（Actions）。隔离区被分阶段清理，每一次是不同的捕杀。我记得我们自己被追捕的情形。母亲、艾达和我在一个类似岩洞的地洞里躲了三天，其他几个人和我们躲在一起。与此同时，

外面的隔离区正进行着大捕杀。我从一道地缝里窥见那场捕杀。我看见男人们被枪杀，孩子们被枪杀。我是一个躲在地底下的六岁的孩子，而我透过一条缝看见别的藏在树顶的孩子被开枪杀死并掉在地上。

“我根本不能用言语描述我的情感。我成长在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一个殷实的欧洲中产阶级的家庭。然后，五年的极乐之后，一夜之间，整个世界轰然坍塌。我们的神圣被践踏了。我们的自然守则被颠覆了。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隔日之间。在隔离区，一个人失去了他的人权基础，以及他的身份。他不再是人，我不再是人。而在这个坍塌之后的世界，想要生存下去便要付出全部的代价。

“第一次行动过后又来了第二次。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德国人又开始捕杀犹太人。那是一场真正的捕猎，就像猎狐狸或者猎兔子一样。然后命令下来说没有工作许可的人都要在隔离区一个指定的地点集合。我的母亲和姐姐去了。我记忆中，这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我记得，我的姐姐跟妈妈说：我们还年轻，我们会找到工作，我们会活下去的。她们知道，她们要离开我了。她们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她们不想吓着我。而且，她们也心存盼望。她们相信她们会回来，而我也一样。我甚至没想过她们不能回来，或者，我会再也见不到她们。她们拥抱我，亲吻我，把我留给我的婶婶。我看着她们离开，越走越远，越变越小。

“我的婶婶拼尽全力弥补母亲的缺失给我留下的遗憾。我的叔叔极其足智多谋，他把我们从隔离区中救了出来。尽管叔叔婶婶努力地安慰我，但是，从母亲和姐姐离开的那一瞬间，我就是独自一人了。从7岁开始，我没有跟任何人谈心。我知道，我必须靠自己活下去。虽然我只是个孩子，我知道，我不能依靠任何人，无法向任何人求助。这是一种完全孤独的生活。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生了奇迹般的事情。我的叔叔在里沃夫找到一位房主，他曾经是波兰军官，愿意帮助犹太人。在波兰当时糟糕的

反犹太气氛下，这个概率是1%。还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也帮助了我们，这两个家庭救了我们。我们伪造的证件上说我们是雅利安人，是波兰的天主教徒。所以，我们没有被捕，婶婶还教了我天主教的故事及祷告词。至关重要的是让邻居们看到我们像天主教徒一样地生活。渐渐地，这不再是一个伪装。我喜欢上了这一切：复活节，圣诞节，圣诞礼物。耶稣的故事，马利亚的塑像。天主教教义一种精神支柱。你不需要像犹太人或者新教徒一样独自奋战。耶稣为你而牺牲了他自己，而玛利亚时时刻刻为你守望，你求她来拯救你。而当身为孩子的你处在一场惨绝人寰的战争中，身边是一场大屠杀，你的父亲死了，你的母亲也死了，这时候，你非常容易被引诱相信这一切，你希望这会拯救你。你会跪在圣坛前，说着每一个天主教孩子说的话。

“战后波兰的反犹太主义十分可怕。尽管纳粹不在了，你仍然能够在每条街道的拐角处嗅到对犹太人的痛恨。我记得一个女人对犹太人叫嚷着：‘渣滓！你们从洞穴里出来啦，真可惜希特勒没把你们赶尽杀绝。’我记得，从集中营里返回的犹太人隐藏他们的身份，一旦被曝光，他们就被诅咒和暴打。不断传来谣言说战后还会有大屠杀。真是再明显不过了：犹太人在波兰没有未来。在经历过这一切，目睹一切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再也不能做犹太人了。我们必须更换我们那旧的、被咒诅的身份。

“我正式接受了洗礼。我的波兰名字变成了泽维格纽·奥乐斯基（Zvigniew Orlowski）。我是克拉科夫大教堂（Krakow cathedral）的祭坛圣童。我与神父一起祷告，帮助他行圣餐礼。每一天我都跪拜。服侍上帝的仆人让我觉得亲近上帝。然而比那更重要的是，我不再是犹太人了。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永远的逃亡。要隐藏，要撒谎，要伪装。我从中脱离，我结束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为了生存，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天主教徒。

“然而，到了1946年，局势清楚地表明，即使是作为一名天主教

徒，我在克拉科夫也没有未来。一列红十字会的儿童运输火车把我从波兰带到了法国，从一个婶婶那儿到另一个婶婶那儿。我当时11岁，再次孤身一人。当我到达法国时，我把在波兰发生的一切都埋在我的心里。我不想记住任何事。从我的记忆里，我抹去了我的母语波兰语，同样也抹去了我的天主教背景。我接受了一个新的身份，法国人。只用了一年的时间，法语成了我的第一语言。我在阿维尼昂的一间有名望的高中就读，到15岁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浸淫在法国文化中了，甚至我的口音都听不出外国味儿了。我正大踏步地迈向索邦大学。

“法国教会了我自由、平等以及人权。我学习去信奉普救论、世俗主义、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我一直知道，法国不是我的家。尽管，我试图去抹掉过往，可我无法抹掉关于我的父亲、母亲和姐姐的记忆。他们从我身边被带走，死去，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我觉得我是与众不同的，我是从别处来的。作为一名犹太人，我觉得我永远不能在法国成为完整的人。我不是地道的法国人。在法兰西和我之间总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的消息激起了巨大的兴奋。你和你们这个年代的人们是无法理解的。”斯坦赫尔告诉我，“在波兰，即使是在战前，我们家庭成员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在阿维尼昂的婶婶在犹太国家基金会中非常活跃。在每个房间里都有犹太复国主义的海报。我曾经每天读三份报纸，关注巴勒斯坦的局势。13岁的我非常害怕阿拉伯人会屠杀犹太人。然而，犹太人的军队英勇奋战并且胜利了，犹太国家建立了。这简直超出人的想象。四年前，红军才解放我们。六年前，纳粹刚扫荡了隔离区。而现在，这些曾被关在隔离区，被捕杀的犹太人，同样的犹太人，兴起并建立了国家。甚至对每一个像我一样世俗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有些超自然的历史事件。突然有了犹太人的政府官员和军官，一面国旗，一本护照，一身制服。如今犹太人不再依靠外邦人了，现在犹太人就像外邦人一样。他们为了自己而挺身而出。回溯过往，我生命中最令人兴奋的事件就是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我感到一种近似于宗

教升华的感觉。

“在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世界里，犹太人没有尊严。犹太人是尘土、人渣，他们以猪狗不如的方式被处死。他们的待遇不如动物，你可以同情动物，却不能同情犹太人。犹太人是低于人类的，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一无是处。而现在，仅仅是在奥斯威辛之后三年，犹太人成了一个人类的实体。现在，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犹太人开始反击。体面的反击，他们为胜利而战。我在杂志图片上和纪录片上看到他们：年轻，强壮，荷枪实弹。突然，他们成了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的人类。他们能够像埃迪蒙托·德·亚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爱的教育》中的意大利人一样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他们不再是任人奴役、捕猎及杀害的生物。对身在法国南部的我来说，这简直是一个传奇。这是发生在真实、具体的历史上的神迹。

“在16岁的时候，我决定返迁（aliyah[注]）。我独自移民到以色列，和一大群从马赛来的孩子们在一条船上，非常拥挤，但是非常有趣。我记得我们站在上层甲板上，迦密山映入眼帘，以色列就在前方。当我们下船的时候，一些孩子们跪下亲吻了土地。我没有跪下也没有亲吻土地，但是我觉得我到家了。这就是终点——不再有漂泊，不再有转变，不再有伪造的身份。再没有欺骗和伪装，我终于可以做我自己。因为，这里不再需要借口和谎言。我再也不会感到虚伪和恐惧了。有些事，我需要不断为自己辩解。然而在以色列的国家，我不再需要为自己辩护或解释。这是何等的解脱。我那时还不会说希伯来语，也并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我还是孤身一人，没有财产，不受保护。但是，我被一种奇妙的感觉所充满，好像一段难以忍受的漫长的旅途终于结束了。”

……

阿哈龙·阿佩菲尔德（Aharon Appelfeld）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小说家，他写的大屠杀相关小说——《1939年的巴登海姆》（Badenheim

1939）、《奇迹的时代》（The Age of Wonders）、《铁轨》（Iron Tracks）——已经被翻译成许多种语言。我现在正在他耶路撒冷附近梅瓦塞莱特锡安郊区的家，同他一起坐在地下工作室。他身材矮小，圆圆的脸，声音柔和，眉宇间或闪过一丝邪气的光芒。就像我聆听斯坦赫尔一样，我花了几天时间倾听阿佩菲尔德。在倾听阿佩菲尔德的过程中，我再次尝试理解20世纪以色列犹太人的故事。

“1932年，我出生在切尔诺夫策[注]附近，”阿佩菲尔德告诉我，“我的父亲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实业家，也是维也纳的前国际象棋冠军。我的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她实在是个大美人。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的父母快把我宠坏了。他们给我买冰激凌、蛋糕、各种玩具和童话书，给我讲民间故事。他们希望我能在柏林或者维也纳做一名律师。总的说来，他们的眼睛总是注视着维也纳，注视着那里的歌剧、剧院和大咖啡厅。犹太教是某种不合时宜的事务，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未来是属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我们家资产丰裕。我们雇用了一名保姆和一名厨师。家里有一架钢琴，还有许多书、漂亮的水彩画、彩色的花瓶，以及一个砖砌的壁炉，温暖冬日里的厅室。我们这个快乐的小家庭有时会外出度假，我们会去维也纳、布拉格或者喀尔巴阡山脉。我喜欢穿着澳大利亚的短裤、袜子、高筒靴，在维也纳公园里，我喜欢站在秋天落叶铺就的柔软地毯上。当我们回到家，我的母亲会弹起钢琴，说着下雪的故事哄我入睡，那些雪花经常落进我的梦里。每逢星期天，父亲和我就会在我的房间里一起玩他给我买的电动火车，我的母亲会在房子的另一边叫我：‘欧文，你在哪里？’我就会这样回应她：‘我在这儿，妈妈，我在这儿。’

“1941年夏天，那时我9岁，我们正在喀尔巴阡山脉我祖母的庄园度假。我生病了，中午时我正卧床休息。突然响起了枪声。我呼唤着父亲与母亲，这时传来更多的枪声。我从窗户跳出来，躲在房子后边的玉米地里。这时，我听到那些德国人在田地里折磨我美丽的母亲。我听到我的母亲在尖叫，我听到德国人杀害了我的祖母和我的母亲。

“父亲是在晚上回到家里的。他成功地躲过一劫，又为了我回到这里。他在高高的玉米丛中找到了我。我们一起回到了切尔诺夫策，发现我们的家被洗劫一空。那些书、漂亮的画、彩色的花瓶、钢琴、砖砌壁炉全部没有了。我们被带到隔离区，每十个人分得一个房间。房间拥挤不堪，散发着恶臭，毫无体面可言。垂死老人的呻吟回荡在整个房间。几天后，我们被命令排好队伍前往火车站。到处都是骚动，人们的高声呼喊，狗的狂吠。时不时会响起一声枪响。我们被装在拉牛的火车车厢里，我们快要窒息了。我的父亲把我举到他的肩膀上，这样我才没有窒息而死。火车停下了，又是一阵骚动，人们大声喊叫，狗也在狂吠。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推下车厢，然后被踢进了德涅斯特河。强壮的人在水里游，病弱的人溺水而死。几乎所有的老人和孩童都淹死了。因为我是父亲唯一的儿子，我的父亲救了我。

“当我们抵达河对岸，我们被命令继续排队前行。那时，夏天已经结束了，天气正在转冷，还下起了雨。整整两个星期，我们白日里在泥泞中赶路，夜晚就睡在野地里。一些人在沼泽地消失，一些人在疲劳中倒下，一些人在病痛中离世。但我的父亲强壮而坚韧。尽管我已经九岁半了，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但大部分的旅程，他都把我扛在肩膀上。最后，我们到达了一个废弃的集体农庄，这里已经被改建成集中营。孩子们与成年人被分隔开。父亲就这样失踪了。直到10岁之前，我就这样孤独地活在世上。

“我意识到，如果继续待在营地，我将会死去。于是我逃跑了。我敲开了乌克兰农夫的家门，但他们赶跑了我。我饿极了。我感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了。在家里我听说，当大限即将来临，你要倚在一棵树上，闭上眼睛，静静等待。于是我倚在一棵树上，闭上我的眼睛，等待。但饥饿、寒冷、潮湿让我一直保持清醒。几小时后，一束阳光射进树林，于是我继续行路。我找到了避难所，那是一个乌克兰妓女的木头小屋。我成了她的仆人。在之后六个月的时间里，我挤牛奶，打扫地板，注视着粗鲁的农夫们以各种体位操弄着妓女。但当我感觉到危险

时，我又逃了。这次我找到的庇护者是一伙马贼。马贼认为我很有用，因为我身材瘦小，他们可以在晚上把我偷偷送进牲口棚，我从里面把大门打开，然后马贼们就能牵走那些马匹。但后来我又感觉到有危险，于是，我又跑了。就这样，我从一个下层社会跑到另一个下层社会。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从这片森林到那片森林。我生活得像头野兽。那个被宠坏的资产阶级家的小少爷，在那三年里活得像只老鼠。

“当苏联红军抵达后，我成了其中一个旅的小伙夫。这些苏联人渴求食物、酒和女人。我看着他们占领土地、洗劫钱财、强奸妇女。我看着他们喝得醺然大醉，大喊大叫。当1945年战争结束，我离开了他们。13岁的我再次孤身一人，我没有任何方向。我没有上过学，不具备历史的前瞻性。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也不知道我是谁。整个欧洲到处都是难民。不论你去哪里，每个地方都有难民。成群的流离失所的孩子正在寻找一个家，但我已经没有了家。我的母亲遇难，我的父亲失踪。英军犹太旅的士兵们找到了我，当然他们也找到了其他跟我类似的孩子。他们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把我们偷偷运出，最先送到意大利，然后是南斯拉夫。但我自己仍然满腹愁肠。我是谁？我是什么人？我又属于哪里？

“哈加纳号从萨格勒布[注]驶进了海法。这艘轮船载满了人，谁也不认识谁。每个人都生病了，每个人都在呕吐。当我登上岸，我一点儿都不兴奋。这不过是旅途中的又一个车站，又一个隔离区。我知道，他们还会继续追猎我，就像他们在过去的五年里追猎我那样。我将生存下去，就像过去的五年我苟延残喘的那样。而为了生存下去，我必须赚取人心。在这里，同样，我必须证明，我在某些方面是有价值的，必须证明，我值得他们让我活着。”

阿哈龙·巴拉克（Aharon Barak），1995年至2006年间的以色列首席大法官，此刻，正坐在海尔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Herzliya Interdisciplinary Center）舒适的办公室里。他是一名才华横溢、崇尚自由主义的大法官[注]，他重塑了以色列的法理哲学，享誉世界。但我走进

他，正如我走进斯坦赫尔、阿佩菲尔德一样，聆听他的人生故事，因为我想理解我自己的故事。在聆听巴拉克的过程中，我再次尝试着理解20世纪的以色列犹太人的故事。

“1936年，我出生在立陶宛，我的名字是艾瑞克·布里克（Erik Brik）。”巴拉克告诉我，“我的父亲出生于一个拉比世家，但他完全地背弃了家族传承。他进入大学研读法律，并成为科夫诺犹太复国主义办公室的主任。我的母亲是一个杰出的女性知识分子。她上了大学，然后教习历史、德语和俄语。我们的家庭很朴实，但却是快乐的。跟着我的父母，我学会了依地语。跟着我的立陶宛保姆，我学会了立陶宛语。我是家里的独子。

“我不太记得大屠杀之前的生活，也许我的潜意识压抑了它，于是我最初的记忆就是从大屠杀开始的。德国的纳粹空军轰炸着城市，不久之后我们便离开了家。我们把少量的行李装上马车，搬进隔离区。我的第二段记忆就是那些德国人来到隔离区，他们召集了犹太人，并进行分配。一个德国军官负责对每个人的分配判定：右或者左。右边的人将被遣回家，左边的人将迈向死亡。我那时才五六岁，我的记忆很模糊，这个背景也记不太清楚。我不知道真正的历史事实是怎样的。但我记得机关枪扫射，一排排犹太人像割草一样被放倒。我记得大批的家乡的犹太人被纳粹杀害。

“然后就到了灭童行动（Children’s Action）。在1944年年初，德国人意识到，他们不能赢得这场战争。但是，在被击败之前，他们想要尽可能地杀掉犹太人。于是，他们决定消灭科夫诺隔离区的所有犹太儿童。我记得士兵从一户人家走到下一户人家，带走12岁以下的男孩或者女孩。我那时8岁。我的母亲跑回家，紧紧抱住了我。她带着我离开，把我藏了起来。我及时地得救了。

“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我是一个住在隔离区里的犹太男孩，但隔离区里现在不应该还有活着的犹太男孩。于是，我的父母把我装扮成12

岁的样子：踩着高高的鞋，戴一顶帽子，穿大人的衣服。但我生活在恐惧中，我害怕有人会看破伪装，发现我不是一个少年。有一次，一个德国警官发现了我的身份。他看着我，笑了笑，然后转身离去。我又一次得救了。

“我的父母意识到，整个隔离区就是一个死亡陷阱。尽管极度危险，他们仍然决定把我偷运出去。我的父亲在一家为德国国防军缝制制服的血汗工厂[注]担任副经理。从血汗工厂出来的制服会装进大帆布袋，堆在马车上。他们把我装进帆布袋里，扎口，丢上了马车。他们将这个袋子放到堆物的最顶部，以免我会窒息。但这是一个大错误，马车的车夫就坐在装我的袋子上。我差点没被压扁，呼吸困难。但8岁的我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在经历了人生中最漫长的半个小时之后，我被扔进了一个牛棚。因为我在隔离区长大，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牛。当最后袋子被打开时，我感到有条舌头在舔着我的脸，正是那胖胖的、友好的动物。

“几天后，我的父亲成功地把我的母亲从隔离区偷送出来，于是，我们团聚了。在1944年年初，到处都是纳粹，到处都是纳粹的同党，但一户立陶宛家庭为我的母亲和我提供了庇护所。他们在他们小屋的其中一个房间建造了双层墙。我的母亲和我就在两道墙之间一米半宽的夹缝里生活了六个月。只有在晚上，我才被允许出来，在田野里散步，呼吸下新鲜空气。我甚至可以骑一会儿马。但在漫长的时光里，我跟我的母亲坐在墙后头的黑暗隔间。她会教我一切她知道的知识：数学、拉丁语、历史。

“我的父亲待在科夫诺隔离区直到结束。隔离区被烧成平地，里面的居民被消灭，但我的父亲活了下来，虽然他的父母已经遇难，我母亲的大部分家庭成员也被杀害了。所以，当战争结束时，我们家只有三个人：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以及我。苏联人解放科夫诺后，他们逮捕了我的父亲，但最终放了他。所以，很明显，我们必须逃亡。我们从科夫诺逃到维尔纳[注]，从维尔纳逃到格罗德诺[注]，从格罗德诺逃到布加勒

斯特[注]。在布加勒斯特，我们登上了火车的运煤车厢，来到布达佩斯。从布达佩斯，我们逃到俄占奥地利，然后又从一条山路逃至英占奥地利。在这段旅程中，我们经历了反犹太主义、屈辱和抢劫。我记得，醉醺醺的苏军士兵拿走了我父亲的手表。他们羞辱我的父亲，看不起我们，对待我们就像对待污垢。对于他们而言，我们就是地球上的渣滓。我看到了父亲母亲是如何竭尽全力，所以我才得以存活，我们才得以维持作为人的尊严。当我们抵达英国区时，我们遇到了犹太旅的士兵。这些士兵穿着翻领的制服，领子上缝着蓝白相间的旗子，讲着希伯来语。他们真正地关心我们，并且愿意为我们提供帮助。你无法想象我们的兴奋。即使现在，当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时候，我仍然心绪翻涌。在发生这一切事情后，犹太士兵成了一个梦。他们是弥赛亚的启示。

“犹太旅把我们带到了米兰，从米兰我们转道去了罗马。在罗马他们把我们安置在一栋宅邸里，这栋宅邸之前属于一个法西斯伯爵。突如其来的，记忆以来，第一次，我们过上了舒适的生活。我们被人照顾，我们有了食物。我们享受正常人的待遇。我去了学校，开始上学。母亲带我到镇上看了歌剧。但我最喜欢的，就是宅邸里的地下室——我在某一天发现的。在里面我找到了伯爵的华丽衣服、剑和匕首。在我生命中，第一次，我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一个属于自己的想象世界。我独自一人在地下室里，穿上伯爵的衣服，挎上伯爵的剑，想象着我也是一个伯爵。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一个伯爵。

“前往巴勒斯坦的旅程我只记得最后一个晚上。当我们站在甲板上，看到海法的灯光时，我的父亲母亲紧紧抱着我，我们大哭起来。早晨时分，我们靠岸，一切都迅速而有效率。离开海法港，我们被带到位于特拉维夫的一间租来的公寓里。几天后，我独自一人被送到沙仑平原村庄的亲戚家，学习希伯来语。芬芳的泥土、柑橘园以及犹太农民，在第一时间就震慑住了我。几天后，我的姑姑带我去了霍德哈沙仑村的一家阿塔工人服装店。她为我买了一顶以色列产的钟形帽，卡其布的衬衫，卡其布的裤子，以及凉鞋。我已经在这个国家待了一个星期。我不

会说他们的语言，我不了解那片土地。但当我脱下我的旧衣服时，我也告别了过去，告别了大屠杀，告别了隔离区。当我穿着卡其布的衬衫、卡其布的裤子以及凉鞋站在阿塔的商店，我变成一个全新的人。一个以色列人。”

露易丝·安纳齐（Louise Aynachi）是不同的。她是一个女人，从伊拉克而来，她并不被公众所知。但就像斯坦赫尔、阿佩菲尔德、巴拉克一样，她也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许多犹太人所经历的巨大转变。在北特拉维夫她女儿的豪华公寓里，我坐在起居室听她讲述20世纪以色列犹太人故事的另一篇章。

“在长达2 600年的岁月里，伊拉克的犹太人居住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带，”安纳齐告诉我，“当英国建立起现代的伊拉克，他们被赋予犹太人平等的地位和充分的权利。当1932年伊拉克取得独立，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财产权利仍然得以保持。在伊拉克，100个人里就有30个犹太人，1 000 000犹太人居住在首都巴格达，在它的商业和学术生活中占据着主要角色。许多大型企业都是犹太人开办的，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也在政治上产生影响，一些人在议会上拥有席位。我的父亲是国家铁路公司的高管。我的叔叔在议会。在20世纪30年代，在我长大的伊拉克，犹太人不是仆人而是主人。在萨西耶的现代街区，在底格里斯的河岸，我们过着有尊严、富裕和幸福的生活。

“到20世纪30年代末，德国对伊拉克的影响与日俱增。《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被翻译成了阿拉伯文，纳粹的宣传被散布得随处可见。亲纳粹的艾尔弗塔瓦（Al-Futuwa）青年运动得到普及和支持。因为法西斯势力的增长，犹太人成了英国的合作伙伴、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然而，至于那些在德国的犹太人，在巴格达，我的家庭成员、我的朋友圈都拒绝去看那即将到来的事情。他们说，巴比伦的犹太人离散是完美的犹太人离散。巴格达赋予犹太人他们从未拥有的东西：平

等、安全、繁荣以及声望。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有一天一道闪电会摧毁这一切。

“1941年4月1日，一场反英的军事政变爆发了。5月，英国镇压了兵变。在英国人支持的国王返回首都的第二天，民族主义的士兵和市民因为政变的失败而感到沮丧，他们将怒火发泄在途经艾尔胡和桥、前去问候归国国王的犹太政要代表团身上。很快，艾尔鲁萨法街区和阿布塞菲扬的犹太人遭到袭击。整整36个小时，亲纳粹的士兵和年轻人们大肆破坏着犹太人的产业。他们的队伍由贫穷的贝都因人和警察组成。在五旬节的假日，几百栋犹太人的公寓被毁坏，几百个犹太人的商行遭到抢劫。犹太人的律法书被亵渎，犹太教堂被焚毁。总共有700名犹太人受伤，180名犹太人遇害。遇难者有老人、母亲和婴儿。

“当我们接到farhud[注]、大屠杀的消息时，父亲召集了家庭全部成员，我们全搬到位于巴格达中心的姑妈家。我们把自己锁在房子里，恐惧万状。我们听到那些暴徒正在逼近。我们看到，他们挥舞着刀子和斧子。我看到，他们的眼睛里燃烧着憎恨的火焰。暴徒闯进了隔壁的犹太家庭。强奸女人，残害婴儿。街上血流成河，还有人体的残肢。巴格达一片混乱。平静的巴格达突然之间变得疯狂，这个世界已经脱离了它的正常运转。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已经发生。

“我的家庭奇迹般地得以幸存。不知道为什么，暴徒们放过了我们躲藏的房子。当farhud结束后，我们试图忘记。我们试着当作从来没发生过。我嫁给了一个富裕的纺织商人纳伊姆·安纳齐（Naim Aynachi），我们抚育了三个孩子。就像我的父母一样，我们生活在底格里斯河岸的一栋优雅别墅里。享受甜美的生活。

“1948年5月，以色列建立了。7月，伊拉克政府通过了一项反犹太法令。9月，一个极为富有的犹太商人被绞死在巴士拉。10月，犹太政府的工作人员被烧死。1950年3月，政府通过了限制犹太人权利的法

令。这时还有威胁和零星的攻击。现在巴格达的大多数年轻犹太人都不再相信：在巴格达，犹太人还拥有未来。在farhud事件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者。在以色列建立之后，他们见证了民族主义的阿拉伯人掀起席卷整个伊拉克的反犹太狂潮。他们明白了，在巴格达生活了2 600年的犹太人将不再享有任何恩惠。他们知道，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但我父亲的家庭以及我丈夫的家庭仍然相信巴格达的承诺。他们紧紧攫住底格里斯河畔的快乐记忆，尽心尽力地相信。

“到1950年的时候，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起初，每个月有1 000个犹太人取道伊朗逃出国；然后，每月2 000到3 000个犹太人直接乘坐以色列安排的飞机逃亡。到1951年春天，每个月逃出伊拉克的犹太人数目达到10 000至15 000人。当社会崩溃时，即便是我的父亲和我的丈夫也意识到，除了逃亡没有其他出路。违背了他们所相信的一切，我的父母在1951年3月登上了飞机；违背了我们所相信的一切，我的丈夫、我和三个孩子在1951年6月登上了飞机。在事件发生整整十年后，farhud胜利了。我坐在摩萨德（Mossad）[注]的‘空中霸王’飞机的木板凳上哭泣，注视着巴格达离我越来越远。两个小时后，‘空中霸王’在吕大降落。”

斯坦赫尔、阿佩菲尔德、巴拉克和安纳齐不过是1945至1951年之间抵达以色列的750 000名犹太难民中的四个。在这个数字中，超过90%的人在这个国家建立的三年半内来到以色列。在42个月内，迁入的移民数量（685 000）超过了吸收他们的本地居民数量（655 000）。一个可供比较的数值——想想21世纪的美国，在三年半内吸纳350 000位移民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数值是如此惊人，所以也带来了挑战。这个犹太国家在它诞生后的第一个十年，经历了其他任何国家在现代未曾经历的移民狂潮。

这挑战不仅仅在于人口。这些移民中，很多人都是来自隔离区、林区和集中营的幸存者，很多人没有技能、不识字、老朽或者病弱。大体

来说，他们的民族与文化面貌与现在以色列的资深居民有着显著区别。他们身上所带着的创伤是前所未有的。然而这些移民正在被吸纳。到1957年，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都是战后移民。在十年里，以色列的人口增长至原来的三倍。社会完全被改变了，国家也是如此。在建成一个自由的、稳定的实体之前，以色列变成了新式的以色列。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大屠杀及独立后的高温锻造，以色列成了一个移民国家。

最开始情绪是低落的。第一批抵达这个自由的犹太国家约有100 000名移民，他们被送到刚刚逃离雅法、海法、阿卡[注]、拉姆拉和吕大的阿拉伯人空置下来的房屋中。数万移民被安置在数十个巴勒斯坦鬼村，这里的石头房屋适合居住。但到了50年代初，这些遗弃的房产已经不能解决惊人的移民浪潮所带来的严峻问题。超过100 000名移民发现，自己只能居住在令人沮丧的、建于英国军事基地中的营地里，大部分营地周围还环绕着铁丝网。他们住在帐篷里，卫生间和洗浴间都是公用的。营地泥泞不堪，乱成一团，很容易感染上疾病。这不是移民们所期待的应许之地应有的模样。为了应对这番人间惨剧，121个“帐篷城市”和难民营在全国范围内被匆匆搭建起来。到1949年年底，93 000名移民搬进了这些营地的锡棚小屋。到1951年中期，这个数值激增到220 000。至1951年年底，增长到257 000。几乎每两个近期迁入的移民就有一个居住在这些“帐篷城”或者难民营。11 500个家庭居住在帐篷里，15 000个家庭住在狭小的临时窝棚，30 000个家庭住在锡棚小屋。与此同时，国家陷入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尽管在1949年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国家经济仍然趋于崩溃。失业率接近14%，通货膨胀率超过了30%，政府已经无力偿还债务。而大规模的移民负担将压垮这个年轻的国家。

政府最终在1952年采取了行动。它停止吸纳移民，削减了国防预算，提高了税收，让以色列的货币里拉（lira）贬值。随后，以色列与德国签署了至关重要的赔偿协定，并开始向美国的犹太社区出售债券。两年后，应急经济措施、德国的赔款、美国的债券获得了成效：通货膨

胀率和失业率下降，而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上升。当1954年再次接纳移民时，以色列已经成为一头猛虎，经济跳跃式的发展，年增长率超过了10%。1950年与1959年相比，后者的GDP惊人地上升了165%。

创造以色列经济奇迹的第一个国家工程是20世纪50年代的住房供给。致力于消除“帐篷城市”，为每一个居民的头上撑起一片屋顶，政府发起了200 000座公寓大楼的建造工程。最开始建的是狭窄的24平方米和32平方米的单元楼，然后，建造了更合理的48平方米和52平方米的公寓。在短短几年里，供给房小区就像长长的白色火车，点缀着风景。这是针对一个大问题采取的廉价、高能、大众的解决方式。“帐篷城”里的居民数量从1952年的160 000人下降到1954年的88 000人，又降至1956年的30 000人。公共贷款使大多数的新来者得以购置新房，这些新房就好像政府在一夜之间建好的一样。到1957年，以色列是世界上自家房产占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供给房、师昆公司（ShiKun）[注]，已然成为以色列国家福利的定义性特征。

20世纪50年代的第二个国家工程是农垦。从1950年到1951年，以色列新建了190个基布兹和莫沙夫[注]。建筑平均增长速度为每4天建起一个新的定居点。从1951年至1952年，又建立了110个新的基布兹和莫沙夫。建筑平均增长速度现在是每个星期建起1个新定居点。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以色列的村庄数量增长了14%，从290个上升到680个。耕地使用面积从1 600 000德南增长到3 500 000德南，土地灌溉面积从300 000德南增长到1 250 000德南。农村人口增长到原来的3倍。农业生产急剧增长。当400个清空的巴勒斯坦村庄被拆毁，400个新的以色列村庄形成了以色列的新经济和新地图。

50年代中叶又启动了第三个国家工程：工业化。在为绝大多数的人口解决了基本住房、土地保证、食物供给的问题后，这个年轻的国家转向了现代工业。以色列从德国收来的赔款，几乎有一半变成了政府贷款，使企业家可以在偏远地区兴建工厂。有一些新企业失败了，但更多

的企业取得了成功。1954年，第一把乌兹冲锋枪[注]被制造出来。1955年，航空业如火如荼地展开。1957年以色列开始规划它的第一个科学的核反应堆。紧随其后是死海的溴化工业和内盖夫的磷酸盐工业，约克尼穆（Yokneam）开设一家金属工厂、海德拉（Hadera）开设一家轮胎制造厂、阿卡开设了一家钢铁厂。从1953年到1958年，工业产值增长了180%。当它的第一个十年结束后，以色列已经经历了一次快速而又激烈的工业革命。

以色列的能量永不停息。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拆除和建设。1950年，政府的主要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设计了国家总体规划，根据该项规划，现代的以色列国家将取代消失的巴勒斯坦。除了那些新建立的村庄，还将建立30个新的城镇。铺设道路，建造发电站，规划一个新港口。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利用一个中央集权的规划来打造新以色列，就像它是一个宏大的工程项目一般。与此同时，这个国家还健全了自己的机构：一个议会，一个政府，一个司法机关。颇受欢迎的征兵制度成为一个强大的新社会的大熔炉。它也执行许多非军事的职责，比如教导它的希伯来新军士兵。这十年里，国家教育体系在范围上扩展了三倍。国家银行，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就业服务中心都建立了。公立医院和公共健康诊所为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提供先进的医疗服务。

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是一个打了兴奋剂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城市，越来越多的村庄，越来越多的一切。然而，尽管发展如此迅猛，但社会差距却是很小的。政府致力于全民就业。它真诚地努力着，为每一个人提供住房、工作、教育和医疗保健。这个新生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平等、民主的国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是一种公正的社会民主主义。但它同样也是一个注重实践的国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结合了现代化、民族主义和经济发展。它没有时间，没有平和的心态，因此它缺乏人性的敏感。当国家成为一切的主导，个人就被边缘化了。当以色列昂首走向未来时，它也抹杀了过去。再也没有以前的景致，再也没有以前的身份。所有的事情都以集体的形式完成，所有的事

情都是从上层强加下来。所有的一切都有了人为的痕迹。犹太复国主义不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而是未来的砰然一击。为了它卓越的经济、社会和工程方面的成就，新以色列付出了昂贵的道德代价。那里没有人权、公民权利、法定诉讼程序或者不干涉主义的概念，没有对巴勒斯坦少数民族的平等观念，也没有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同情，没有对离散犹太人的尊敬，没有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同情。本·古里安的中央集权和铁板统治，强迫着这个国家向前迈进。

从海法港出来，斯文恩·斯坦赫尔（Svern Sternhell）被送到犹太事务局在海法的一处移民帐篷，但几天之后他就被送往马基叠一个小镇上的阿利亚青年寄宿学校。在那儿的第一个晚上，这个16岁的男孩扔掉了他的欧式西装——这是他在阿维尼翁[注]的姨母为他的返迁生涯特地缝制的。在他上工的第一个早晨，他已经穿上了蓝色的工人制服和黑色的工人靴子。当他第一次来到柑橘园时，他简直像小鸟一样欢乐。太阳，湛蓝的天空，柑橘。自从他们家被带到隔离区后，第一次，他感到这个世界如此美好。

仅仅几个星期，斯坦赫尔已经可以操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几个月之后，他成为了一名技艺娴熟的农夫。他在柑橘园里工作，一天要吃掉几十个柑橘。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把自己的欧洲名字换成了一个希伯来名字，泽夫（Ze’ev），但他拒绝更改自己欧洲名字的姓氏，因为，那是他的父母和姐姐留给他的姓氏。现在，这个17岁的幸存者决心不再沉溺于过去的痛苦，而是抑制它。他担心过去的负担将会损害到未来。他知道，自己必须在全新的根基上建立起全新的自我。

斯坦赫尔的新同伴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虽然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工作，睡在同一间小屋里，但他们确实从不谈论自己的过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少数是阿拉伯世界的难民。所有的人都经历了创伤。一些人失去了他们的父母，所有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家园。然而，这些年轻人都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乐观。无论是闷热的夏日还是

刺骨的凛冬，他们不悲伤，也不抱怨。他们从不愤愤不平。他们不允许自己像孤儿一样思考，或者感觉像个孤儿。相反地，他们决定把自己尽可能快地转变成一个以色列人。挤牛奶，在田地里工作，加入一个基布兹。为了忘却。为了开始一段未来，就像过去从未发生那样。

因为斯坦赫尔已经是一个思想者，他对同伴们仅能凭直觉感知的事情有着自己的概念。他知道，犹太人需要一个庇护所，而以色列就是这个庇护所；他明白，犹太人需要一片屋顶，而以色列就是他们仅有的屋顶。即便是那些没有上帝信仰、没有宗教生活的世俗犹太人，以色列对他们的灵魂和身份同样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一个犹太国家，像他这样的世俗犹太人将赤裸地站在世界上。他们将没有家园，没有集体归属，没有未来。因此，斯坦赫尔完全接受了他作为以色列人的新身份。只有在以色列，他才不用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不用躲藏。只有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才能够从历史的客体转变成历史的主体。只有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才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1952年的夏天，斯坦赫尔和他的同伴搬去北方的一个基布兹。早晨，泽夫在基布兹里劳作，下午，他去海法上学，夜晚，他回到基布兹并承担基布兹的警卫工作。因为继承了一笔少量的遗产，所以他能够搬回海法，完成他的高中学业，并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1954年8月，他加入了以色列的军队。他通过了基本训练，一门班长的培训课程和一门军官培训课程。十年前，他是克拉科夫[注]的一名圣童，十年后，斯坦赫尔则是戈兰高地步兵旅的一名杰出的战斗指挥官。1956年10月，西奈战役期间，这位具有超凡魅力的排长发现，他的士兵被困在布雷区，他打头阵，引领他们走出了那里。灵敏的头脑、强健的体魄、无畏的精神，标志着斯文恩–泽夫·斯坦赫尔成了这片土地的儿子。他已经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从隔离区走出来的备受折磨的男孩，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以色列人。

从船上下来，欧文·阿佩菲尔德被带到阿特利特[注]的一处移民营

地，又从阿特利特被送到耶路撒冷南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青年村。在农场里，34个大屠杀的幸存者尝试在这个陌生的新国度学习它的生活规则。他们比赛谁第一个学会驾驶拖拉机，谁更健康，谁晒得更黑，谁能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谁看起来最像一个犹太人。他们尝试着假装那些隔离区、林区以及集中营从来没有出现过。假装切尔诺夫策[注]从来没有存在过，也不曾存在维也纳。不曾存在父亲，也不曾存在母亲。

阿佩菲尔德担忧他即将失去自己的自我感知。他的老师会说："孩子们，现在我们将学习希伯来语，学习《圣经》，学习种植树木、浇灌花圃，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一切都将被证明是美妙的。"其他孩子看起来相信了。他们迅速地摆脱了过去。第一天他们从田地回来，被晒伤。第二天他们回来，被晒伤。但到了第三天，他们变成了晒成棕褐色的以色列人。但是，14岁的阿佩菲尔德是不同的。他不想让自己依附于一门不属于他的语言，依附于一个不属于他的世界。他不想失去童年时代的德语、剧院和音乐。他害怕失去自己的父母，成为一个永远的孤儿。直到有一天，在所有人都离开后，他独自坐在餐厅里，拿出一个学校的笔记本，写下了大量孩子气的信："我父亲的名字——迈克尔（Michael），我母亲的名字——布里安（Bulia），我祖父的名字——迈尔·约瑟夫（Meir Joseph）。我的家在切尔诺夫策的马萨利卡大街。"第二天，当欧文读着这份清单，又添加了一些唤起童年记忆的凄美文字，他感到从内心荡漾出的一种温暖。"我有了一个家，"他想着，"我有了一条街道。我有了一个爸爸、妈妈、祖父，我有了一个城市，一个公园，还有一张秋天树叶编织而成的柔软地毯。尽管，我经历了一切事情，我还有着一些维系自己的东西。我不是一个孤儿。"

在1948年战争期间，16岁的阿佩菲尔德是一名接受过准军事训练的战士。为了躲避纳粹，他隐居乌克兰丛林长达四年，他用一挺机枪保卫他生活的农场，因为附近的阿拉伯人要屠杀农场里的青年。战争结束后，他被派往精英的米凯维以色列农业学校，学习如何种植苹果、梨和李子。一年后，他被派往艾因卡陵新开办的一座农业学校，教导摩洛哥

和伊拉克的移民小伙子们如何种植苹果、梨和李子。六个月后，他被派往位于拿哈拉的女子农业学校担任看门人。在这些学校工作时，欧文感到全然的孤独，这些地方没有家庭也没有社区。他觉得，他与那些傲慢的萨布拉犹太人[注]、东方的新来者，或者那些没有礼貌的以色列姑娘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1950年他应征入伍，被训练成为一名迫击炮手。这个时期，孤独已经不堪忍受。安息日，他所有的战友都回家了，欧文却无家可归。他就独自待在基地里。每逢星期六晚上，他会在内坦亚[注]附近的小镇待上几个小时。他会坐在一间海边的咖啡馆里，注视着往来路过的人们。他们有的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有的是阿拉伯世界的幸存者，但阿佩菲尔德看到的只是人类的残骸。他看到，20世纪被赶出家园的犹太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被灾难搅得粉碎。

阿佩菲尔德反思着本·古里安宣称的平等团结的以色列与真实的以色列之间的‘鸿沟’，现实里命运悲惨的人民现在只能挤在移民营地和供给房里；他反思着犹太复国主义者虔敬的、开创性的华丽文辞与现实的新以色列之间的‘鸿沟’，现实里尽是喧闹的酒鬼、赌徒和妓女，他们从不曾拥有内心的安宁；他反思着以色列上层的全体动员与以色列下层不和谐音之间的‘鸿沟’。他所看到的是由醉醺醺、荒淫的移民组成的以色列，正尝试忘却曾经发生的一切。

在他服兵役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阿佩菲尔德以自学通过了大学的入学考试，被希伯来大学录取。他在耶路撒冷雷哈维亚区附近租了一间阴暗的房间。这个从未上过一年学的男孩现在成了一些世界上最具声望的学者的学生：他师从多夫·萨丹（Dov Sadan）学习依地语，跟随格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学习卡巴拉（Kabbalah）[注]，跟随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学习经文。但欧文对他的进步毫不在意。没有支撑他的东西。他缺乏基础牢固的身份认同，他努力控制着十年经历给他带来的众多改变。独自待在雷哈维亚的房间里，阿佩菲尔德试图解读他自己：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谁；他来自哪一片海域，又被冲到哪一处岸边。

在耶路撒冷铺满青翠草地的德国殖民地，有一家彼得咖啡厅，只有在这里，阿佩菲尔德才感到轻松自在。这里的人说着他童年记忆里带奥匈帝国口音的德语注，端上来的是奥匈帝国风味的家常菜。那些坐在精致餐桌旁的优雅女士，看起来就像他的母亲。这里没有大熔炉注的法令。在这里，他可以回忆他的母亲，可以怀念她。他想象着，尽管她已经遇害，却仍然以某种方式回归。在1956年的彼得咖啡馆，阿佩菲尔德可以唤起他记忆里的地下室，那个在1956年被以色列封锁的地方。在他的笔记本里，他草草写下了几行单词，然后是一些句子，然后是零散的文段。破碎的断章，零星的剪贴资料，不成文的断简残篇。一个故事，两个故事，三个故事。一个故事讲述一个人的灰飞烟灭。一个故事讲述一个世界的灰飞烟灭。故事讲述了一个男孩所见证的生活——大屠杀之前、大屠杀之中、大屠杀之后。而现在，大屠杀十年后，他坐在彼得咖啡馆里，尝试着收集自己，修复自己，定义自己，找到他自己的声音。

当艾瑞克·布里克一家抵达耶路撒冷时，艾瑞克·布里克已经经历了五次变故：在战前的科夫诺度过的被呵护童年，在战时的隔离区度过被迫害的童年，在战争临近尾声时躲藏在墙壁里的童年，战争结束后作为一个难民四处流浪的童年，以及战后的几年里住在犹太事务局宅邸的休养时光。但当布里克家庭在雷哈维亚区的一间小公寓定居下来后，这个11岁的男孩告诉自己，所有过去的将再不会发生。这里是我们的家乡。这里是最后的开始。他将扎根在这里。

一开始是困难的。艾瑞克个性温柔，胖乎乎的，博览群书。他喜欢歌剧。那些在以色列出生的六年级萨布拉嘲笑他，视他为一个虚弱、苍白的离散犹太人。但仅仅几个月，他就证明了他的本质。他学会了希伯来语，改掉了立陶宛口音。他将自己看作一个出生在本土的以色列人，并且行为得体。他没有跟任何人谈及民主广场、灭童行动、隔离区，以及在墙壁里的生活。仅仅一年的时间，艾瑞克就显示出他卓绝的天分。他的数学和历史尤其出色，也当选为学生会的主席。他是一个热心的童子军，先是幼童军的成员，然后是小队长，再然后是童子军的领袖。作

为学生会主席，他被选中拜见本·古里安，就在古里安于沙漠里召集的退休会㊟上。因为他在童子军中的角色，他在基布兹领导一个劳工营地，并打算定居在一个基布兹。布里克内化了以色列老一辈先驱们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他将这个犹太国家完全定位于给他提供庇护的避难所。他将以色列视作一个正奔向未来的动态的、开明的、建设性的实体。这个把名字改为阿哈龙·巴拉克㊟的男孩，现在决定要抹去他的科夫诺的过去，投身以色列的未来。

同样做出类似决定的还有他的父亲与母亲。利亚·布里克（Leah Brik）曾经是立陶宛的一名受人尊敬的高中教师，但到了以色列，她在一所工人阶级的小学教授三年级。兹维·布里克（Zui Brik）曾经是立陶宛犹太事务局的负责人,但在以色列，他只是一个办事员。两人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两人都不满足专业需求，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将永远无法满足。因为大屠杀使之无法实现。兹维失去了他的父母。利亚失去了她的父亲、母亲、哥哥和姐姐。这个家庭微小而悲伤，几乎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个家庭是痛苦的，经常可以听到哭声。利亚和兹维仅有的就是他们的儿子，在儿子身上他们灌注了全部心血。阿哈龙是承诺，阿哈龙是希望，阿哈龙是从绝望的过去射向充满盼望的未来的利剑。

1954年，巴拉克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了。因为他想继续深造，因此，没有加入一个基布兹，而是进入希伯来大学研读法律。1956年，耶路撒冷大学的教员们都达成一个共识：阿哈龙·巴拉克是一个司法的天才。1957年，他结婚、组建家庭，他的许多朋友都毫不怀疑，总有一天，这位年轻的新郎将成为以色列的首席大法官。

当露易丝·安纳齐抵达吕大机场时，她发现她从巴格达寄过来的行李箱，有一半已经不翼而飞，剩下的一半也被人打开了。这个家庭没有衣服，没有食物，孩子们正在大哭。从机场出来，她被带到航空站末端的一个寒冷的房间。一个粗鲁的护士揪起她的头发，查看有没有虱子。尽管这个护士没有找到一只虱子，却依然在没有任何提醒的情况下向她

的头发和身体喷滴滴涕（DDT）[注]。然后又喷了露易丝的丈夫纳伊姆，然后是他们的孩子胡达（Huda）、纳比尔（Nabil）、莫里斯（Morris）。纳伊姆非常震惊："她以为我们从哪里来？"他问道，"我们又落后了多少？"

安纳齐家庭填写完所有各式各样的官僚形式的表格之后，犹太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将这个家庭送上一辆卡车。卡车在黑暗里颠簸了三个小时，驶向未知的目的地。卡车抵达了一处看起来像是军营的地方：一座座军用帐篷，外围环绕着铁丝网。露易丝试图按捺她的恐惧，因为她的孩子们已经害怕极了。她把所有剩下的行李取出来，码在分配给他们的军用帐篷的角落。她尽力安抚孩子们入睡，枕着稻草制成的枕头，盖着秸秆。第二天早晨，当纳伊姆醒来时，他的愤怒爆发了。"在伊拉克，我们在国王的王宫里是尊贵的客人，而在这里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不被尊重，我们没有荣誉，我们连财产都没有。我们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个挤在帐篷里的无家可归的难民。"

打击一个接着一个。当安纳齐家庭离开巴格达的时候，因为他们选择移民以色列，伊拉克政府已经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纳伊姆曾成功地经伊朗私运出一小笔资金，但当他们抵达以色列时，他才得知，他所信任的货币兑换商人私吞了这笔钱财。他们还要忍受滴滴涕、帐篷里的屈辱生活、本地以色列人居高临下的态度、阿什克纳齐移民的蔑视目光。事实就是，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并不把巴格达视作一个伟大文明的摇篮，而是野蛮人占据的未知领地。在一个星期之内，安纳齐家庭经历了从天堂堕入羞辱和堕落的突然蜕变。

露易丝坚持了下来。即便很明显，那些钱永远不会抵达以色列，她仍然没有崩溃。即便她在混乱的难民营里挣扎生存，但在侮辱与落魄前，她仍然挺直了腰板。为孩子们着想，她假装一切都很好，假装这只是某种形式的沙滩夏令营而不是世界末日，假装这只是前往新大陆途中拐过的一段小弯路。在那片新土地上，他们将开始新的冒险和新的生

活，那片新土地上流淌着牛奶与蜂蜜。

从阿特利特的移民营地出来，安纳齐家庭被运往内坦亚附近的帐篷城——从一座帐篷到一所锡棚屋，从潮湿到酷热，从震惊到消沉。但几个月之后，纳伊姆在特拉维夫南郊的霍隆小镇[注]找到了一处公寓，并在特拉维夫的奥特拉咖啡屋找到一份工作。这处公寓完全比不上底格里斯河畔的别墅，咖啡屋的工作也完全不能与纺织厂的总经理的工作相提并论。但在这个家庭，纳伊姆需要照料八个家庭成员（祖父母、姨母、妻子和孩子们），而他的工作也并非上不得台面。所以在一年后，露易丝就感觉他们正在从深井里爬升到他们一开始的坠落之处。不像其他许多从伊拉克移民过来的人，纳伊姆没有崩溃，他只是非常伤心。在他余下来的日子里，他一直伤心着。

露易丝父亲的命运则更加悲惨。他没有女婿那样幸运，埃利亚胡·伊扎克·巴鲁克（Eliyahu Yitzhak Baruch）没有在以色列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当他离开伊拉克的时候，已经失去了他的不动产、资产和钱财。他和他的妻子离开难民营后，不得不居住在霍隆的斯特鲁马广场的破旧单间公寓里。每天早晨，埃利亚胡·伊扎克·巴鲁克离开单间公寓，前往洛兹亚女士内衣厂。整整一天，这位前火车公司的总经理推着他的小贩手推车站在工厂大门旁，尝试向贫困的工人们兜售口香糖、蜡烛和巧克力。每天夜晚，当他回到自己在斯特鲁马广场的狭小公寓，埃利亚胡·伊扎克·巴鲁克便想起底格里斯河。他的心因想起底格里斯河而哭泣，直到再也不用忍受痛苦，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57年11月，我出生的时候，以色列国已经取得了胜利。边疆安定，经济繁荣，人口接近了200万。1948年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家诞生。1956年西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使这个国家获得了稳定。吸纳将近100万移民的超人壮举成功了。20个新城市、400个新农村、20万栋新公寓楼、25万个新工作岗位，证实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成就。这时，斯文恩·斯坦赫尔已经成为陆军中尉斯坦赫尔，他离开了以色列国防

军，进入希伯来大学研读历史和政治学。欧文·阿佩菲尔德已经变成了阿哈龙·阿佩菲尔德，正在编纂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艾瑞克·布里克已经成为了阿哈龙·布里克，他即将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得法学学位。露易丝·安纳齐仍然在霍隆的移民区里奋斗，但她的三个孩子已经适应了他们的新家园。经历了战后10年以及疯狂的国家建设，狂乱的节奏过后，一个稳定的迹象出现了。这个年轻的国家不再是一个临时的营地。这个国家不再被视作一个疯狂的冒险，而是一个坚实的政治事实。当然，坦率地说，这里没有和平。阿拉伯人仍然将这个犹太国家视为一个诡计，他们认为这只是暂时的，认为犹太人是卑鄙的。但这里同样没有战争。1948年和1956年的胜利遏制着敌人。与法国的新联盟使以色列空军装备有最先进的战斗机群："飓风"战斗机（Ouragans）[注]、"神秘"战斗机（Mystères）[注]、"超神秘"战斗机（Super-Mystères）[注]。英国和西德同样支持这个坚毅的国家，这一点在他们抵达苏伊士运河的前一年就已经证明了[注]。以色列与美国关系良好，与苏联的关系也相当不错。整个世界注视着这只犹太凤凰从沙漠中飞起。以色列的柑橘园、以色列的考古、以色列的科技，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

我在秋天出生。雷霍沃特，我出生的城市，那时正打算创办一个核子物理部门。尼尔·博尔（Niels Bohr）和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即将来到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向这个前途光明的年轻国家里的前途光明的年轻物理学家们致以问候。与此同时，特拉维夫新的艺术表演中心，弗里德里克·R. 曼恩大礼堂开放了。阿瑟·鲁宾斯坦（Arthur Rubinstein）、艾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和雷昂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也来到大礼堂，他们同以色列爱乐乐团的杰出音乐家和热情听众一同庆祝以色列国家9岁生日。排干加利利胡拉河沼泽水的国家工程完工。在特拉维夫开设了第一个大型超市。

当苏联人把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以色列的媒体们仍然关注着国内，报道电冰箱和洗衣机销售的惊人业绩。经济的繁荣和德国的赔款也唤醒了古老的饮食嗜好：数十家熟食店在特拉维夫中心开张

了。当以色列庆祝它的10岁生日时，到处洋溢的都是创造成就——甚至是创造奇迹——的强烈意识。第一届十年展览会正在规划中，1958年夏天，它将在耶路撒冷举办，以突出以色列的成功。它要传递的信息就是：以色列现在是中东地区最稳定，也是最先进的国家。它是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大熔炉。这个犹太国家是一个人造的奇迹。

但这个奇迹建立的根基却是背弃。我出生的这个国家已经把巴勒斯坦从地球上抹去了。推土机夷平了巴勒斯坦的村庄，授权令没收了巴勒斯坦的土地，法律撤销了巴勒斯坦人的公民权，将他们的家园化为乌有。社会主义的基布兹艾因哈罗德旁躺着裘穆亚（Qumya）的废墟。雷霍沃特的柑橘园旁是扎努加和科贝比的遗迹。以色列吕大的中部，巴勒斯坦吕大城的残骸真是太扎眼了。然而，似乎在人们的思维里这些遗迹与占领他们的人没有丝毫关系——而那一切仅仅发生在十年前。10岁的以色列已然从它的记忆和灵魂里，把巴勒斯坦拭去。自我出生起，我的祖父与祖母，我的父亲与母亲，以及他们的朋友们，都像从未有其他民族在这里存在过似的那样生活；就像以色列从未驱逐过他们；就像其他同胞没有在杰利科、在巴拉他、在德黑夏、在贾巴利亚的难民营里饱受折磨。

背弃有自己的原因。在第一个十年里，国家建筑工程的非凡努力消耗了这个年轻国家的全部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去内疚或者同情。以色列吸收的犹太难民数量超过了它驱逐的巴勒斯坦难民数量。而与此同时，广阔的阿拉伯国家没有伸出哪怕一根指头去帮助这些巴勒斯坦的兄弟姐妹。在1957年，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人还没有将他们自身定义为一支独立的民族。他们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公认的民族运动。世界为他们感到遗憾，但世界也否认他们的政治权利，并不将他们视作一个合法的国家实体。因此，无怪乎以色列选择把阿以冲突看作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看作以色列戴维与阿拉伯哥利亚（Goliath）[注]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将巴勒斯坦的悲剧边缘化，仅将其视作某种形式的不愉快的外围问题。

然而，这种背弃是惊人的。700 000人无家可归是既定的事实，他们的家园消失得干干净净。阿斯都变成了亚实突，亚基变成了以革伦，巴谢特变成了阿瑟雷特，达尼亚尔变成但以理，基姆祖变成了贾姆祖，哈迪他变成了哈迪德。阿拉伯城市吕大，现在变成了新的移民城市吕大。数十个城市、数百个村庄、数十个定居点获得了新的身份。在家园里，在野地里，为了那些现在成为难民的以色列人，一个巨大的难民复兴计划正在启动。

然而，对巴勒斯坦灾难的背弃，并不是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奇迹所仰赖的唯一根基。年轻的以色列同样也背弃了犹太人在20世纪所经历的大灾难。尽管在耶路撒冷正在兴建亚德瓦谢大屠杀纪念馆。每年4月，以色列都会标出大屠杀纪念日和英雄纪念日（Holocaust and Heroism Remembrance Day）。而在与国际社会的周旋中，欧洲犹太人的悲剧总是被提及，以及被利用。但在以色列国内本身，大屠杀的话题没有生存空间。人们不期待幸存者诉说他们的故事。在大灾难过后的十几年里，本地的媒体和艺术创作根本不关注大灾难。大屠杀仅仅处于犹太复国主义兴起的最低点。以色列持续地拒绝着创伤，拒绝挫败，拒绝痛苦，拒绝悲惨的回忆。此外，以色列仍然没有个人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大屠杀依然是抽象的、独立的。它并不真正关心在我们中间生活的人。很明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国家。不要问不必要的问题，不要沉湎于自怜，不要怀疑，不要悲伤，不要软弱或者多愁善感，不要追忆危险的亡魂。现在不是回忆的时候，时代要求我们忘却。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所有的力量专注未来。

这番背弃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尽管以色列充满朝气和自信，但它不够强壮，不足以应对过去的恐怖。它仍然还是一个散乱的社会，正在为它的生存和未来而奋斗。这个犹太国家就是一个边远的绿洲，四周受到沙漠的威胁。它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做自我剖析，它还没有安宁到可以用正确的维度反思自己的剧目。还有太多的挑战。还有太多的痛苦。没有自我约束、自我压抑和一定程度上的残忍，所有的一切都会分崩离析。

但是，背弃的代价却是高昂的。是的，野心勃勃的泽夫·斯坦赫尔和阿哈龙·巴拉克看到了这个代价。他们热情地接受他们的新身份，想要跑得离过去越远越好。但善于反思的阿佩菲尔德，看起来正在为他身边发生的事情而感到恐惧。人们以一个名字代替另一个名字，一种口音代替另一种口音，一个身份代替另一个身份。为了生存，他们清除了他们的过去；为了发挥作用，他们摧毁了他们自己。他们变成了只会行动的人，个性僵化变形，灵性肤浅。他们失去了犹太文化的博大深邃，而是构建了一种新式的合成文化，缺乏传统习俗，缺乏精微玄妙，缺乏反讽精神。他们已经丢失了根基，不知道将走向何方。

确切地说，这两项背弃实际上是四重背弃：背弃了巴勒斯坦的过去，背弃了巴勒斯坦的灾难，背弃了犹太人的过去，背弃了犹太人经历的大灾变。四种遗忘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从记忆里抹去的是曾经的土地和曾经的大离散，以及对他们的不公正和对我们的种族灭绝。当他们为生存斗争并塑造一个新身份时，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人埋葬了巴勒斯坦的果园，埋葬了犹太村的神学院，埋葬了700 000巴勒斯坦难民的背井离乡，埋葬了6 000 000遇难犹太人的消失。在本·古里安的急迫发展下，消失的还有这片土地的美丽、大离散的历史深度，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大灾变。

很有可能，这些多重的背弃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以色列就不可能运行，不可能建设，不可能生存。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种顽固的漠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意识的缺乏对以色列建国十年来取得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以色列承认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情，它将无法生存。如果以色列表现得善良或者同情，它将可能走向崩溃。我出生在这个成立9周年的国家，对于这个国家来说，背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当务之急。

……

为了证明背弃的重要意义，我采访了施皮格尔家族（Spiegels）。

我知晓他们好几年了，他们的家族传记引人注目。这个家族的族长，厄尔诺·施皮格尔（Erno　Spiegel）已经去世，但我成功采访到了他92岁的妻子安娜（Anna），在她最后清醒的日子里。他们的女儿耶胡底（Yehudit）将自己的记忆添加到家族故事里。当我翻阅着这个家族的记录、相簿和文件时，我发觉，施皮格尔的故事正是20世纪以色列犹太人故事的又一个强大例证。

1918年，安娜出生在喀尔巴阡俄罗斯的斯瓦拉瓦小镇。1944年春天，当德国人进攻时，26岁的她已经出落成一个美人。然后大门被敲响，犹太人的黄色星徽被践踏。犹太人如羊群一般被赶进当地的砖厂。十天后，犹太人被拉出来游街，然后送往火车站。他们在密封的装牲口的车厢待了三天，然后抵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安娜的嫂子和四个月大的侄子被送去左边的集中营。幸运的安娜同其他几百名妇女被送往右边。首先，他们来到一个拥挤的淋浴间，然后是全身剃毛，丧失了所有的身份表征。她在集中营的营房待了三天，窗户外火葬场的火苗正跳跃起舞。由于安娜年轻而强壮，她被送到一系列的劳工营，一次是飞机制造厂，一次是飞机场，然后到丛林进行艰苦的劳作。她成功地参加了3月的撤退，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在厄尔巴河，这些艰苦跋涉的幸存者们被解放了。在布拉格的火车上，许多女性幸存者被苏军士兵强奸。在布拉格，她与她的兄弟姐妹团聚。一切都从地狱回归到原来的样子，但他们的父母和姐姐舍娜（Sheyna）却永远不会返回。在布拉格，安娜遇到了厄尔诺·施皮格尔。

1915年，施皮格尔出生于布达佩斯，但在喀尔巴阡俄罗斯的穆卡兹小镇长大。在战前，他是捷克军队的一名军官。1941年，他被亲纳粹的匈牙利人送到强制劳动的集中营待了两年。1944年，他被德国人送去了奥斯威辛。施皮格尔从奥斯维辛站台带来的一对双胞胎成为门格尔医生（Dr. Mengele）双胞胎实验的实验材料，施皮格尔被门格尔委任为这对双胞胎的主人。他的工作是监控和组织双胞胎配合门格尔的实验，包括他的妹妹。好几次他救下了别人的性命，包括他妹妹的性命。到了晚

上，他尝试安抚年轻双胞胎的孤独，缓解她们的恐惧。他向她们保证，她们的父母没有死亡，并且战争结束后他将使她们与家人团聚。1945年1月底，施皮格尔带着32个孩子离开了刚刚解放的死亡集中营。不久后，他神奇地护送着这支幸存者队伍穿越了欧洲的废墟。在他把双胞胎送回她们的家乡后，施皮格尔回到了穆卡兹，随后又搬到了卡尔斯巴德。他干回了他的老行当，做了一个记账员。在一次首都之行中，厄尔诺遇见了安娜，三个月后他们在布拉格的古代犹太教堂结婚。

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1949年3月，厄尔诺和安娜·施皮格尔带着他们两岁的女儿驶进了海法港。以色列的士兵把船泊岸，并分发柑橘。安娜悲不自胜。以色列的土地，以色列的国家，柑橘。她觉得这是对希特勒的胜利。安娜和厄尔诺一同对希特勒的胜利。两岁的耶胡底对希特勒的胜利。以色列国对希特勒的完全胜利。

从海法出来，施皮格尔家族被送往贝尔雅科夫的移民营。军用帐篷被铁丝网环绕，3月的雨渗入防水布，把地板变成了泥泞的水坑。所有在营地的人都在大声叫嚷和抱怨。来自混乱国家的混乱移民使用着混乱的语言。婴儿耶胡底染上了急性痢疾，生命垂危。在一些帐篷里，婴儿很快夭折。尽管如此，安娜·施皮格尔仍然是快乐的：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的地盘。

当安娜在营地里奋斗的时候，厄尔诺前往特拉维夫求职。他在一家小小的会计公司找到一份簿记员的工作。施皮格尔家族精打细算着每一分钱。最终，在抵达以色列九个月后，他们攒够了钱，搬去位于特拉维夫东部郊区的供给房，一座拥有一间半房间的公寓。

1949年12月，施皮格尔家族抵达比萨隆。在比萨隆大街和胜利路之间，是匆忙建在沙地上的长长的、白色的供给房。人行道挨着狭小的、泥泞的庭院。在人行道的尽头，三段混凝土的阶梯从泥土中指向一个小小的、被遮盖住的入口。右边是工程师费希尔博士（Dr. Fischer）的公寓，左边的公寓则被资深会计师，施皮格尔先生购置。34平方米——一

个房间，半个房间，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令安娜·施皮格尔哭了起来：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家。

除了犹太事务局提供的三个金属床，小小的公寓空无一物。但就在这些天里，施皮格尔家族从卡尔斯巴德寄来的柳条箱都到了：毛毯、毛巾、床上用品、针织桌布、壶、锅、镀银的餐具、两套茶具。还有了一个电炉，一个机械绞肉机，一个咖啡机，以及一个罂粟种子的研磨机。沉重的捷克式家具无法通过微型公寓的大门，所以他们换成了轻便、现代的以色列制造的桌子和椅子。当厄尔诺·施皮格尔成为刚刚建立的卡梅里剧院的簿记员后，他们添置了更多的家具：扶手椅、一个沙发、一个冰柜、一个收音机。在一年的时间里，空旷的公共住宅单元变成了一个温暖的家，安娜在她的小厨房里准备着牛肉汤（goulash）、红椒酱（paprikash）以及罂粟籽发酵蛋糕，整个家里都笼罩着佳肴的香气。

对于厄尔诺·施皮格尔而言，工作就是一切：一种收入来源，一种安全网，一种疗法。他告诉他的妻子，工作可以使他远离不好的思想和记忆。每天早晨8点，他穿上西服，系上领带，戴上帽子，乘坐公交车来到剧院的办公室。每天下午4点，公交车又带他回到家里。用完一顿清淡的晚饭，他会休息一下，听一听收音机里播送的新闻，读一读中立派的《晚祷报》（Maariv）。然后，在大厅的桌子上，他会审核那座私营剧场的账目，这令他拿到很高的报酬。这就是为什么他有足够的钱添置另一个房间，为耶胡底购置一架钢琴。

安娜·施皮格尔是一位家庭主妇。早晨，她烹饪香辣的匈牙利菜。下午，她带着耶胡底去上私人的钢琴课程。她对自己的穿着和女儿的穿着非常讲究，她缝制、熨烫衣服，还在衣服上刺绣。一周里有一天是专门洗衣服的，一个月里有一天是专门缝纫的。偶尔，她会去集训堂（Ulpan）[注]上一门希伯来语课，或者参加妇女俱乐部的母亲聚会。不像厄尔诺，安娜从未停止谈论那里，谈论这个巨大的奇迹——她的家庭以及其他的犹太幸存者们，得以从那边来到这里。

耶胡底进入了供给房社区的幼儿园和小学。最开始的时候是在毗邻的街区，然后是供给房自己的社区学校。在她的班上，几乎所有的孩童都是阿什克纳齐移民的孩子，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时不时地有人会说："爸爸在夜晚尖叫。"时不时地有人会说："妈妈又病了。"他们会讨论父母手臂上的数字刺青，讨论游击队、隔离区、集中营。但所有这些阴影都不能掩盖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奇迹般的事情。1953年，以色列开始着手实施加利利胡拉湖沼泽的排水工程。1954年，开挖国家引水项目的第一期工程，这期工程最终将把加利利海水引入内盖夫沙漠。1955年，在距离加沙地带不远的赫勒兹发现了石油。1956年，以色列赢得了西奈战役的胜利。所以，在供给房社区的学校，没有人再抱有疑虑。显而易见，穿着蓝白相间的衣服庆祝以色列的第九个独立日成了孩子们的愿望。而这些孩子当中，耶胡底是最突出的。没有什么耶胡底做不了的事情。运动、侦察、英语、法语、钢琴，她样样精通。她是班长，是青年运动的领袖，是一个金牌运动员。穿着她的蓝色褶裙和白色的刺绣衬衫，11岁的耶胡底·施皮格尔象征着胜利，是对门格尔、奥斯维辛集中营、比克瑙毒气营的胜利，是对该死的德国人的胜利，是对犹太人恐怖历史的胜利。以从奥斯维辛比克瑙毒气营出来的厄尔诺·施皮格尔之名，以从劳工营走出的安娜·施皮格尔之名，耶胡底将大步向前、征服世界。

所以，如果要我选择一处最能代表1957年的以色列的地方，我不会选择我的家乡雷霍沃特，不会选择一个基布兹，或者一个莫沙夫或者一个新城镇。我也不会选择耶路撒冷、海法或者特拉维夫中心。我选择比萨隆的供给房社区。

1957年，比萨隆有师昆公司建造了19栋供给房，每一栋安置有16户人家。这些家庭大多数都是欧洲犹太人：波兰人、俄国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是死亡集中营、林区、隔离区的幸存者。很多孩子就像耶胡底一样，在战后不久就出生了，出生在欧洲的废墟上。每个小家庭都没有祖父，也没有祖母，没有叔伯或者姨母。每个家庭只

有一个孩子，最多有两个。曾经庞大的家族不复存在，这样的阴影笼罩在每个家庭的上空。泰歇（Teicher）先生娶了另一个妻子科恩（Cohen）太太，又有了两个女儿。肖莎娜（Shoshana）的妈妈整天卧病在床，因为肖莎娜的弟弟和还是婴儿的小妹妹再也不能从集中营回来。在守夜人温斯托克（Weinstock）和劳动党官员卡茨（Katz）先生整洁、干净的公寓里，他们的妻子被无休止的偏头痛折磨得疲惫不堪，他们不允许任何人抬高声音说话，或者嬉戏玩闹，以免惊扰他们的妻子。不要唤醒沉睡的魔鬼。供给房社区的每一对父母，尽管才30岁或者40岁，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或者整个家庭不复存在；供给房社区的每一个孩子，都知道他们的父母有一段不能提及的过去。比萨隆的供给房社区，在沉默的死亡的大山下苟延残喘。

然而，供给房社区并不是消沉的。夹在长如火车般的供给房建筑群间的人行道上，企业林立，业务繁忙。大多数父亲都是政府、工会办公室或者小型私营公司的小职员。大多数母亲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做着兼职工作。每一个街角都有小商店。这里开了间小杂货店，那里就有了家文具店，你做了水管工，我就做一名摄影师。夏皮罗（Shapiro）太太用从美国寄来的特殊搅拌机制成胡萝卜汁在店里出售，利维（Levy）太太就用进口的胜家缝纫机[注]为女士们缝制花式裙子。一个大屠杀幸存者成了送牛奶的工人，另一个做了警察。这个供给房区已经有了一个鞋匠、一个卖鸡蛋的小贩以及一个装订商。隔壁的供给房区有了一个化妆师，还有人修补丝袜。在20号楼，一个富有魅力的年轻女人向男人出卖自己的肉体。在26号楼和30号楼，可以买到黑市的黄油。冬天，当卖煤油的商人拉响他的铃铛，每个人手里提着金属的简易油罐聚集在商人马拉的圆柱形红色油桶旁。夏天，大家围着售冰者的方形蓝冰车，喷溅而出的冰水赢得了孩子们的欢心。那些在家里拥有浴缸的幸运儿，他们会在星期四把浴缸注满水，往里面扔进一条鱼，以便为安息日预备鱼丸。每个夏天的傍晚，移民们坐在自家的阳台，读《晚祷报》，或者工党的《话报》（Davar），或者匈牙利语的《新东方》（Uj Kelet）。到了夜晚，俄国犹太人喝着伏特加，波兰犹太人打牌，捷克犹太人听古典音乐。一

年又一年，一个社区联合为一个整体。在1949年炙夏抵达比萨隆、满目疮痍的犹太难民的大杂烩，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结成了一个稳定的社区。

在政治上主要支持工党。当劳动部长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前来视察供给房社区时，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戴维·本·古里安总理在停于胜利路的卡车后边发表令人振奋的演说时，供给房社区陷入了狂喜。毋庸置疑：对于比萨隆的供给房社区而言，工党不仅仅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位伟大的全能母亲。工党建造了供给房，召集了难民，为他们提供了居所和保护。供给房社区的医疗诊所、社交俱乐部以及运动设施也都是与工党相关的。社区里的大部分男人都在与工党相关的办公室或机构工作。在胜利路的另一头的供给房社区，属于中产阶级的欧洲犹太居民支持前进党。半英里以外居住的东方犹太人崇拜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投票给他的利库德集团（Herut Party）[注]。一英里以外的供给房社区，支持社会主义的统一工人党。在20号楼，一些俄国人过着放荡的生活。但在比萨隆供给房社区的中心，工党有着稳固忠诚的群众基础，甚至这里的心态也带有工党色彩：温和的民族主义，节制的社会主义，以及实用主义。没有人过于激进，没有人过于正义，没有人坚持绝对公平。他们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相信脚踏实地的辛勤工作，但他们也相信为了到达既定目的地，有时必须采取一点迂回策略。

比萨隆社区已经有了很多机构：一个合作制的小型超市，一间医疗诊所，一个犹太教堂，一个图书馆，一个运动场，一个社交俱乐部。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哈博尼姆（Habonim）这所建筑学院。这个拥有两层楼建筑的学院是社区生活的绝对中心，也是社区的熔炉。在这里，欧洲幸存者的孩子们学习数学、英语、希伯来语以及《圣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开始变成以色列人。他们在这里了解他们的英雄先驱们，这些英雄排干哈罗德山谷的沼泽水，创下柑橘产量增长的奇迹，赢得独立战争的非凡胜利。他们学习犹太国家基金的造林计划，学习以色列在科技上取得的突破，学习年轻以色列在工业上的巨大成就。那些说

着依地语、波兰语、匈牙利语和捷克语的比萨隆成年人，看着哈博尼姆把他们的后代变成了以色列人。

每一个移民社会，每一个战后社会，孩子都是问题的核心。但在比萨隆供给房社区，孩子就是一切。像利亚和兹维·布里克夫妇，这些三四十岁的一代人知道他们是被遗弃的一代。虽然他们被从灭绝中救出，但他们知道他们永远到达不了真正的天堂。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事情都不是长久的，是脆弱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就是等待下一次灾难来临。但是他们的孩子是不同的。就像布里克的儿子，他们的孩子也是射向未来的利剑桥。虽然弓被烈日晒焦，在大火中变形，但它依然能射出承载未来的利剑桥。这就是为什么父亲们可以做任何工作以抚育年幼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母亲们可以为他们去黑市买黄油，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们可以选择任何私人课程。因为孩子们的教育是第一要务，人们知道只有这件事情是不能从他们身上夺走的。在比萨隆，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孩子。尽管未来的大门已经对他们父母关闭，但孩子们却因为这一切所行得以敲响那扇大门。

孩子们有的理解，有的不理解。只有雅各布（Yaakov）的父亲，希姆尔·果戈里（Shmuel Gogol）每年会来学校一次，向学生们诉说其他父母不愿回忆的过往。在大屠杀纪念日和英雄纪念日，他告诉这些年轻的学生，从他七岁起他就开始演奏口琴。他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演奏口琴。口琴救了他的命。作为那个死亡乐队的口琴手，他为那些走向工作的人吹口琴，也为那些走向死亡的人吹口琴。在那些年里，他只能闭着眼睛吹口琴。即使现在，当他为哈博尼姆的学生们演奏口琴时，他的眼睛依然是闭着的。但孩子们更愿意忘掉果戈里令人心碎的故事和口琴。他们也想忘掉他们父亲的噩梦，以及他们母亲的偏头痛。他们想玩排球、篮球、足球，参加童子军和各种聚会。他们只想相信1957年的以色列告诉他们相信的一切。譬如我们现在很强大，譬如我们是最棒的，譬如我们不是待宰的羔羊，譬如我们将长得更高更强壮，我们将成为飞行员、空降兵、工程师和科学家。我们将战胜德国人和阿拉伯人，战胜荒

芜的沙漠，我们将战胜我们的缺点、畸形的基因、屈辱的历史。在这里，比萨隆的供给房社区，我们将战胜我们自己。我们将成为以色列胜利的新种族。

于是，在供给房社区，两代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整洁的公寓里，没有人可以逃离痛苦的捆绑。尽管大灾难已经过去，痛苦依然存在。死者的黑白照片被追思蜡烛照亮。但屋外的白天却是一片欢腾。当你走在14号小区和16号小区之间，你可以听到费希尔家的姑娘在弹钢琴，施皮格尔家的姑娘在弹钢琴，贝尔德伦（Belldegrun）家的男孩拉着小提琴。

在特拉维夫市政大厅的地下档案馆，我俯身翻阅比萨隆供给房社区14号小区的厚厚档案。这是一栋具有两层楼结构的建筑，是1949年以色列总工会的师坤住房建设公司为它的员工建造的。土地所有者为犹太国家基金会，该计划的灵感来自20世纪20年代维也纳和30年代特拉维夫的工薪阶层住房工程。尽管14号小区由一长排的房子组成，但每个单元被漆成不同的颜色，以赋予它们某些外观特征和个性。在计划方案里，每一层有430平方米，被分隔为8个单元，每个单元将占地53.2平方米。但在实际建造中，由于1949年的经济动荡，师昆公司只建造了指定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二。于是，在这些图纸上，出现了每个单元34平方米“既有建筑面积”与剩下的19.2平方米“未来建筑面积”的区分。

1951年12月，工程师以埃利泽·费希尔（Dr. Eliezer Fischer）博士提交了一份申请，希望可以在他公寓的原有基础上增加一间卧室和一间浴室。1953年5月，簿记员施皮格尔也提出了类似的请求。1953年8月，沃尔夫·托斯特夫斯基（Wolf Dovrovsky）递交了同样的申请，还有1955年9月的扎尔曼·温斯托克（Zalman Weinstock）、1956年5月的阿里耶·曼德科勒（Arieh Mendkler）。一天天，移民们把家园建设得更好，把14号小区建设得更好。墙壁用空心砖砌成，天花板以混凝土加固，使用的灰泥都经过防水处理。北向的房屋有漂亮的高窗，南向的房屋有方形的

窗户和矩形的阳台。建筑现代化而不冷酷，功能齐全却不廉价。显而易见，在那个困难时期，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民众拥有尽可能好的住宿条件，当局竭尽全力。尽管住房已经扩大，这些公寓看起来还是相似的。一进门就是一间小客厅，左边是小厨房，右边是浴室。客厅挨着两间方形的、互相连通的房间，其中一个通向阳台。通过厨房就抵达前院。20世纪50年代期间，大多数布满灰尘的庭院逐渐变成了花园，栽着梅花、番石榴、菊花和蔷薇。1957年，师昆公司于1949年建造的长长的住房区已经铺满绿色的植被。

供给房社区的周边点缀着柑橘园。一些犹太人的柑橘园结出了果实，其余遗弃的巴勒斯坦柑橘园正在枯萎。在临近地带，新的供给房社区如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冒出。新的工厂也一个个出现。西弗朗斯公司（Sypholux）生产国内的冷饮柜，安姆科公司（Amcor）制造出以色列第一台电冰箱，阿加斯公司（Argaz）组装巴士汽车。一座以色列军工厂被栅栏围起来，谁也不知道军工厂里生产着什么。1957年的比萨隆仍然被野花环绕：秋番红、野百合、风铃草、银莲花，美丽得令人吃惊，但它们即将消失。发展建设的狂潮将使越来越多的供给房取代他们，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将住进来，快速地转变成新的以色列人。

我离开市政厅档案馆，开车驶向比萨隆。60年里，这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满山遍野的住宅区，正在变得越发高贵阔气。但住宅区的结构几乎跟以前一模一样。19排长长的建筑群，18条人行道，还有一座仍然叫哈博尼姆的学校。

我漫步在分隔14号小区和16号小区的小径上。1957年的孩子曾经在这里玩着躲避球、跳房子、“西蒙说”的游戏。他们在这里滚铁环，向小伙伴们喷水嬉戏，直到他们的母亲在阳台叫他们回家吃晚饭。收音机里会响起新闻快报，然后是以色列的流行音乐、古典音乐、唱诗班的和声颂歌。当我环视着小径，我几乎可以想象出施皮格尔家的整洁客厅，耶胡底正在弹钢琴；还有贝尔德伦家的客厅，阿里（Arie）正在与小提琴

较劲，而他的密友平夏斯·祖克曼（Pinchas Zukerman）却已经熟练掌握了技法。从某个地方传来手风琴的声音，令人心碎的口琴乐在某个地方响起。与此同时，科夫诺隔离区的幸存者亚巴沙·阿克塞尔罗德（Abrasha Axelrod）正在用依地语写着无情的诗篇，救助门格尔双胞胎的厄尔诺·施皮格尔正合上他的记账簿。费希尔博士正起草在沙漠里架筑一座立交桥的工程计划，水管工萨哈里科夫斯基（Zahlikovsky）正在与朋友打牌。摄影师利昂·泰歇（Leon Teicher）正在冲洗他两个心爱儿子的照片，其中一个将卷入以色列未来的战事。夜幕降临，卧室里，阳台上，灯光变得模糊。孩子们的尖叫声平息了。以色列强迫撑起的欢笑，白日里的坚强意志，融入夜色，慢慢消散。地毯被卷起，扶手椅被放到一边，客厅的沙发打开就成了床。最后他们躺下入睡，比萨隆供给房社区的租户们闭上眼睛，坠入梦乡。在他们的梦里——他们做着噩梦——他们看到他们的社区正沉入海洋。

然而，当我漫步在14号小区和16号小区之间的小径上，我意识到，比萨隆不是一个悲剧，而是一个奇迹。不幸不能定义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定义它的应当是人类的伟大。面对重重困难，供给房社区的绝大多数大屠杀幸存者战胜了它；面对重重困难，本·古里安的以色列渡过了难关。泽夫·斯坦赫尔将成为一个政治学教授。阿哈龙·阿佩菲尔德将成为一个杰出的小说家。露易丝·安纳齐的孩子们同样表现出色。阿里·贝尔德伦将成为一名非常成功的医生，同时也是洛杉矶一名非常成功的投资者。耶胡底·费希尔将成为波士顿一名希伯来文学的教授。泰歇家的幸存男孩什洛莫（Shlomo），将成为以色列最好的牙医之一。耶胡底·施皮格尔将成为一名心理学家，并与她的丈夫一同创办投入高达10亿美元的医药公司。以最令人惊讶的方式，比萨隆将成为未来以色列精英集团的中心。它的后代将在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以色列，1957年年底，我生于此，不仅仅克服了它的可怕过去，还推出了一个灿烂的未来。

---

1. aliyah，这里做专有名词，指犹太人大规模地移居以色列。

2. 今乌克兰西南部的一个州。原属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和多拉荷伊县（今博托沙尼县）的一部分。1940年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被划归乌克兰。

3. 现为克罗地亚首都。

4. 以色列宪法革命的积极推动者，被称作以色列的“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巴拉克任内的最高法院是以色列自由主义司法哲学的巅峰。

5. “血汗工厂”（Sweatshop）是指：工人在非常恶劣的工作条件下从事长期、艰苦的超强度劳动而待遇极其低下，这种工厂称为“血汗工厂”。

6. 波兰城市。

7. 白俄罗斯城市。

8. 罗马尼亚首都。

9. 上述1941年4月1~2日发生在巴格达的反犹太暴行的专有名词。

10. 摩萨德，全名情报和特殊使命局，是1951年4月1日成立的以色列情报机构，被誉为世界最有效率的情报机构之一。

11. 以色列西北部海港。

12. 师昆公司，以色列负责经营和管理公有住房的一家公司。

13. 莫沙夫（moshav），私人租地集体耕作制的农庄，以色列农业定居点的一种形式。由60~100个分散家庭组成，是以土地国有、家庭经营、合作互助、集体销售为基本特征的农业合作组织，自给自足。

14. 乌兹冲锋枪，1949年由以色列陆军中尉乌兹·盖尔（Uziel Gal）参照捷克斯洛伐克Vz23系列冲锋枪和ZK476式冲锋枪的结构特点，并结合中东地区的沙漠环境条件设计；最终在50年代初定型，并由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IMI）生产，成为以色列军队的制式冲锋枪。

15. 法国东南部城市。

16. 波兰南方的一个小镇。

17. 以色列北部、海法附近的一个小镇。

18. 这里指乌克兰东南部切尔诺夫策州的首府。

19. 萨布拉犹太人（Sabras），指在以色列土生土长的犹太人。

20. 内坦亚，以色列沿海城市，位于特拉维夫——雅法以北。

21. 建立在对《圣经·旧约》的神秘解读基础上的古犹太神秘哲学。

22. 奥匈帝国存在于1867年至1918年间，分奥地利和匈牙利两部分，奥地利部分的官方语言是德语。

23. 源自美国学者德克雷弗科提出的“熔炉论”，意指民族的融合和同化。

24. 退休会，犹太教、基督教等宗教的一种静修活动，意思是从世俗繁忙中抽身退下，到旷野中休息，静思，重新得力。退休会期间安排有研习、会议、讨论、聚会、娱乐活动等。

25. 阿哈龙、巴拉克都是常见的以色列人名字。

26. DDT，又作“滴滴涕”，学名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曾经是最著名的合成农药和杀虫剂。对人类毒性低，但不易降解。

27. 霍隆，以色列西部海岸的一座市镇，位于雅法以南，为特拉维夫——雅法城镇群的一部分。

28. 指达索“飓风”系列战斗机，Ouragan MD-450，是马塞尔·达索设计的系列战斗机中的第一型。1955~1956年以色列从法国空军的剩余物资中购买70架，在随后的15年里这批达索飓风战斗机多次参与实战。

29. 指“神秘”ⅣA战斗机，在“飓风”的基础上将原来的平直机翼换成了后掠翼，将英制“恩”发动机换成仿制的“阿塔”(Atar)发动机，以色列在1956年从法国购入60架，一直服役到20世纪70年代末。

30. 指“超神秘”B2战斗机。以色列在1958年从法国购置36架，在随后十年里多次运用于中东战场，以挂载“响尾蛇”导弹用作轰炸战斗机用而名噪一时。

31. 指20世纪50年代中期围绕埃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一系列外交和军事冲突。

32. 哥利亚是《圣经》中巨人族的勇士，后来被戴维王杀死。

33. 以色列用集训办法为移民开设的课程或学校。

34. 胜家缝纫机，缝纫机由美国人列察克·梅里瑟·胜家发明，美国胜家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缝纫机公司。

35. 利库德集团，以色列右翼政党。

第七章
核工程，**1967**



早在7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怀疑，“那个地方”有一个秘密。没有人告

诉我那里有什么，甚至连点提示都没有。我怀疑到秘密的存在，因为我是一个好奇的孩子，喜欢留心大人们的谈话。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雷霍沃特的科学家圈子里，他们谈论的话题即便不是直接指向那些听起来就很邪恶的地方——比如希尔基地、第四车间以及赫梅德吉默尔，也总是围绕一些秘闻。我的父亲是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前途光明的青年化学家，而他的许多同事——他们经常聚集在我家——则是以色列的杰出科学家。他们经常讨论伊斯雷尔（陀斯特夫斯基）（Israel Dostrovsky）的工作进行得如何，恩斯特（伯格曼）（Ernst Bergmann）进展到哪一步，沙赫维特（弗赖尔）（Shalhevet Freier）如何沉溺于研究，阿莫斯（德·沙利特）（Amos de Shalit）正准备做什么尝试。而他们的交谈总是在绕了一圈以后，回到了正在内盖夫（Negev）进行的某个宏大的、没有名字的项目，而这个宏大的、难解的项目需要我父亲的朋友以及我朋友的父亲启程前往内盖夫。在雷霍沃特，就已经弥漫着达成目标的紧迫感。在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安静的、精心修剪的草坪上方，更是笼罩着期待的安静气氛。尽管什么信息都没有公开，但某些证据表明，这些看着我长大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被期待着挽救我们的命运。

我的叔叔，也在20世纪60年代初去了那片沙漠。在沙漠的边缘、贝尔谢巴[注]郊区附近，有一片方形的、混凝土浇筑的平顶别墅区，这是政府为科学家们修建的房舍。我的叔叔和他的家人就住在那里。每天早晨，工程师们离开他们整洁、昏暗、安静的房舍，登上一辆灰色的巴士，巴士将他们送到那处机密的所在地。下午，巴士又把他们带回家。像我一样的孩子们知道，不可以询问他们到底在那里做什么。但我8岁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基甸（Gideon）、罗伯托（Roberto）、米西卡（Mishka）、扎基叔叔（Uncle Zeki）和约斯卡叔叔（Yoskeh）所做的，远远超出在炎热的夏天夜晚集会上唱民歌、边讲故事边抚摸我的头发、招待我吃一片切得厚厚的西瓜这些事。我知道，除了他们的别墅和精心照料的花园，有什么特别伟大的事情正在发生。在沙漠里一些事情正在发生，而它们将永远地改变一切。

9岁时，我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我从父亲的书架上抽下来的第一本书就是《比一千个太阳更明亮：原子科学家们的个人传》（Brighter Than a Thousand Suns： A Personal History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讲述关于曼哈顿计划的故事。另一本我感兴趣的书，是以色列学者和知识分子反对研发以色列原子弹的文章合集。我把这两本书联系起来，把它们与魏茨曼科研所的期待联系起来，与沙漠别墅区那幅庄严神秘的景象联系起来。我意识到，我可能伴随着以色列的曼哈顿计划一同长大，而我身边的这些人可能就是以色列的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s）、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s）、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ey Groves）。10岁时，我已经知道，身边那些戴眼镜的工程师和羞涩的物理学家，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到一项神话般的事业。

半个世纪以后，这个秘密仍然是秘密，但事实上，现在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被国际媒体报道过：为什么以色列要建造迪莫纳，以色列如何建造迪莫纳，以及以色列在迪莫纳做了什么。但是，官方仍然推行“核模糊”政策，迪莫纳的核反应堆依旧秘而不宣。以色列的国家政策也不允许以色列人公开讨论迪莫纳。我尊重并遵守这一国策，我所撰写的这一章节也通过了以色列有关部门的审查。然而，即便讨论迪莫纳必须克服这层神秘的阴霾，迪莫纳依然明显是以色列故事的中心。

……

根据核物理学家们——例如法兰克·巴纳比（Frank Barnaby）的论断，迪莫纳的核站大致呈长方形。在靠近入口的地方设有行政办公室、教室、餐厅和图书馆。核站的南部是4号车间（废料处理车间，处理从钚提取过程中排出的放射性废物[注]）、8号车间（用气体离心机提炼浓缩铀[注]）和9号车间（这里储藏有激光同位素浓缩装置）。中央区域之外设有5号车间（铀燃料棒插入反应堆之前在这里涂铝）。中央区域被草坪和一排排棕榈树一分为二，途经3号车间[注]（此车间的作用是从黄饼[注]中提炼出铀）和2号车间[注]（是主要的生产设施，钚、氘化锂和铍

在这里被加工成核武器的部件），直通1号车间。1号车间就是核反应堆本身，有一个高高的穹窿屋顶[注]，反应堆直径18米，高25米。镀银的穹窿顶下面设有迪莫纳的中央指挥机构。是中心，也是核心，是整个中东的重中之重。

这样说的理由，就其基本条目而言，可能会包含下述内容：为了创建和维护地处中东的一个犹太国家,为了给羽翼未丰的犹太复国事业撑开一把保护伞，为了给因步入这片土地而激起仇恨的犹太人提供庇护，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机构。他们不得不需要这样一个保护伞保护他们，保护他们免遭受虎视眈眈的掠食者的侵害。

第一个保护伞是由英国提供的。只有在英国委托统治的高墙内，这些车间的建造才能免遭审查。即便英国从以色列撤离，面对阿拉伯穆斯林的恶意敌对——这种恶意敌对在他们选举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后愈演愈烈，西方的霸权主义仍然为他们提供了保护。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色列的领导人们发现这把西方的保护伞正在慢慢收拢。殖民时代即将宣告终结，欧洲正节节败退，而以色列，则被抛弃在对它充满敌意的沙漠上。与此同时，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正在凝聚，正在被快速的现代化建设和迅猛的军备建设所改变。

以色列的领导人们惊慌失措。犹太复国主义事业赖以生存的根基，犹太复国主义奇迹得以滋生的土壤，都不存在了。尽管这个年轻的国家正蒸蒸日上，正迅速地吸纳移民、人口扩张为原来的三倍，但现在这个国家完全地暴露在那些恶意敌对前。

因此，1955年，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做出了决定：我们必须以一把新的保护伞代替西方殖民主义的旧保护伞。不再仰赖于西方对中东的霸权，以色列必须建立自己的霸权主义。1956年夏，本·古里安花费了大量时间与顾问们讨论，最终提炼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在1949年就已经开始酝酿。现在，他明确指出：以色列必须拥有核选择[注]。

在1956年，只有三个国家拥有核武器：美国、苏联和英国。甚至连法国都要在四年后才有能力生产、组装核弹。与这些富裕的国家相比，1956年的以色列是一个只有1 800 000人口的脆弱的移民国家，连制造半导体收音机的能力都没有。这个弱小的国家能成功获得核能力？仅是想想就觉得狂妄和疯狂。然而，这个犹太国家的创始人格外坚决：以色列必须拥有核选择。本·古里安相信，阿拉伯与以色列积怨太深，二者之间的争端已经无法解决。他忧虑从长远看来，以色列的军事霸权难以维持。他感到了压力，为他小小的祖国承担个人责任的压力。在秘密会议上，他分析了以色列所面临的战略威胁，并得出结论：以色列的最终安全将很可能仰赖于核威慑所提供的生存保障。

很多高级内阁成员和政客都反对他：贸工部长和平夏斯·萨皮尔（Pinchas Sapir）、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教育和文化部长扎尔曼·亚兰（Zalman Aran）、议会长戴维·哈科恩（David Hacohen），以及经常反对他的财政部长利瓦伊·艾希科尔（Levi Eshkol）。还有很多物理学家[尤其是阿莫斯·德·沙利特）、高级军官（以伊扎克·拉宾为首）和众多的知识分子（以赛亚·雷伯维兹（Yeshayahu Leibowitz）、以法莲·奥尔巴赫（Ephraim Auerbach）、埃利泽·利弗尼（Eliezer Livneh）最为突出]。这场辩论既不合乎道德也不合乎伦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早期，在被围困的以色列共和国，大屠杀的记忆仍如影随形，现实的威胁也是如此。这两个因素支撑起这个被普遍接受的道德理由：我们有权要求拥有核选择。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则系统地驳斥权力政治的观点：有些人担忧经济破产，有些人害怕外交破产，其他一些人则忧虑军事的破产。有的人提醒这将导致与法国新缔结的盟约失效，另外的人则警告，当心美国的怒火和苏联的制裁。还有其他一些人宣称，这整个想法就是一个白日梦。没有任何一个贫穷、只有部分产业实现工业化的弹丸小国，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承担一个大多数大国都未曾尝试的科技壮举。

全面、系统的核选择反对论，是由两位著名的军事战略家伊加尔·

亚伦、伊斯雷尔·加利利提出的。这两人在领土问题上都是突出的鹰派，但在核问题上却成了鸽派。他们的立场是：首相大人对以色列在中东的生存概率充满了历史悲观主义，而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以色列的科技创造力；而他们恰恰相反——历史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亚伦和加利利反对核弹的观点是三重的：在中东，不可能形成基于相互威慑的稳定政权。既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政权，以色列将成为在核打击的恐怖下暴露最多的政党。因此，为了保障其自身安全，以色列不应追求有可能引发一场中东核军备竞赛的核能力。因为，此类竞赛一旦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地区开展，将切实危及犹太国家的生存。

本·古里安没有被吓倒。在1956年的夏天，他派遣了他的巫师学徒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前往巴黎挥动他的魔杖。难以置信的是，这位国防部的处长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他巧妙地操控着苏伊士时代的反阿拉伯情绪，以及维希迫害(注)十周年后的犹太人情绪，他宣扬伤痕累累的阿尔及利亚爱国主义感情，宣扬殖民主义的灭亡，宣扬欧洲的衰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这位33岁的贝谢门青年村学校的毕业生——和平主义者齐格弗里德·莱曼的学生，成功实现了战后最大的战略壮举之一，说服了一个主要的欧洲强国支持一个小小的中东国家拥有自己的核选择。佩雷斯接受的选项是全方位的，包括了工程师、技术人员、科技、专项技能和培训。根据国际出版著作的相关描述，这个核工程包括了一个核反应堆、一部钚分离设备以及导弹能力。本·古里安的宏图，佩雷斯的精明，其他几个同佩雷斯一起前往法国的以色列人的辛勤工作，将现代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放在了以色列的手心。有史以来，犹太人第一次拥有了可以消灭别人的能力。

在阿夫纳·科恩博士（Dr. Avner Cohen）的著作《以色列与核弹》（Israel and the Bomb）中，他提供了下面的细节：1956年9月，他们达成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同意建造EL–3核反应堆的模型。1957年10月3日，达成建造大型G1反应堆以及秘密建造钚分离车间的重要协议。1958年年初，在迪莫纳东南14公里的罗特姆高原，挖掘了一个巨大的深

坑，核反应堆开始在这里运行。1959年2月，从挪威购入20吨的重水[注]。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们从当地的磷矿石中提取铀，也从美国和南非秘密购买铀。1963年4月，又与法国达索特武器制造厂签署购买MD–620导弹的协议。1963年10月26日，迪莫纳的核反应堆进入临界状态。1964年，位于地下的钚分离车间建成，于1965年年底开始生产钚。1965年3月，耶利哥导弹系统开始接受测试。1967年，以色列已经有能力组装出它的第一枚核装置。

在一个夏天的傍晚，我把车停在特拉维夫富人区拉马塔维夫的一条僻静街道旁。我找到了那栋公寓，按响对讲机，乘电梯到达八楼，一个高大、宽肩膀的八十出头的老人正在那儿等着我。他握手非常有力，声音有些粗哑："请进。"他用命令的语气说道，"我一直在等待你的拜访。"

客厅的陈设简单而舒适：斯堪的纳维亚出产的金色木头制成的沙发和扶手椅，一张破旧的波斯地毯，墙上挂着水彩画和油画——招待我的主人亲笔画的以色列柑橘园的生动美景。桌上放着一瓶芝华士威士忌和一碗咸杏仁。角落里的电视机自顾自地播报，特写镜头中的人正在讨论另一则新闻片段所提及的伊朗核威胁问题。"胡说八道，全都是胡扯，"主人说道，"伊朗人已经有了自己的一枚核弹。有一个核弹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一个国家有渴望，有手段，能保证最低限度的工程能力，那么它就会拥有一枚核弹。如果你决定去制造一枚核弹，你就会制造出一枚核弹。"

他应该知道，阿夫纳·科恩宣称，以色列的确在1966年年底至1967年年初制造了第一枚核弹。主人就是迪莫纳那时的总监和负责人。当他问候我的时候，我也打量着他。我们双方都心知肚明，但是，我们双方都将不置一词。主人将威士忌倒入两个平底玻璃杯，向我举起酒杯致意，祝福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富有成效的夜晚。在沉默数十年后，他愿意在遵守官方誓言——他们曾向国家宣誓——的前提下，讲述一些与他相

关的部分。他的讲述紧紧围绕着那个秘密，但不会暴露那个秘密，也不会暴露他所参与的部分。他要求，在他有生之年不要公开他的名字。但即便他叙述得那般委婉，也无法掩盖他所见证的那出伟大剧目，无法掩盖他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1926年，他出生于耶路撒冷。他最初的记忆就是一片血腥：1929年的阿拉伯人大起义期间，他的父亲前往耶路撒冷旧城救助受伤居民，当他回到家时，汽车座椅上全是血，他的衣服和手上也是。20世纪30年代，他家搬去了里雄莱锡安，在那里，他的父亲成了一名富裕的柑橘种植者。殖民地农庄的生活舒适而快乐。这位柑橘种植园主被宠坏的儿子几乎不怎么去上学。他热爱运动，锻炼出了一副令人印象深刻的体魄，加上他对技术的好奇心，以及非凡的勇气，共同构成他的完整人格魅力。11岁时，他就可以驾驶着家里的奥斯汀——莫里斯老爷车在里雄莱锡安周边的沙漠里到处跑。16岁时，他在父亲的新别克轿车里赢得了姑娘们的芳心。他的青春期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纪念的回忆，不过是从这个游戏到那个游戏，从这个聚会到那个聚会，从这个姑娘到那个姑娘。直到1943年春天的一个美丽早晨，他的父亲开着车驶出家里的柑橘园，被一个阿拉伯人射杀，他的生活从此改变。

在他的人生中，父亲的遇害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经历。他不再放纵自己，之后，在海法的以色列技术工程学院拿到化学工程学位，并在哈加纳指挥官们授予的课程中表现优异。独立战争期间，父亲的遇害为他提供了充分的动机和残酷的力量，他成为了一名复仇者。1947年12月，他接到了北方步兵排的命令，在1948年1月期间保卫加利利东部的一个孤立的基布兹。1948年4月和5月，他领导了对加利利东部巴勒斯坦村庄的征服战争，并于6月至7月在南方抵挡埃及军队。1948年10月，他将北方的巴勒斯坦人从他们家园驱逐出村庄。在十个月的激烈战斗中，22岁的排长看着自己的士兵杀死了数以百计的阿拉伯人，埋葬了数十名战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他的朋友。战争把他锤炼得坚韧，也令他的心肠刚硬，教会他智慧、能力和胆量。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位指挥官觉得

没有所谓的不能完成的任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能被征服。

战后，他成了一名工程师。1951年，他被伊斯雷尔·陀斯特夫斯基征调。陀斯特夫斯基过着双重生活：既是雷霍沃特魏茨曼科学研究院的杰出科学家，同时也是以色列军队一个秘密机构赫梅德吉默尔的负责人。陀斯特夫斯基任用他招募的新兵做赫梅德吉默尔的运营官。这位工程师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勘察内盖夫的矿产资源，搜寻沥青、磷矿和铀矿。他记得那次沙漠之旅，尤其记得，当他用地质学家的地质锤敲开一块沙漠岩石，只见里面鱼骨纹的物质在黑夜里涌动着炫丽的绿色光芒。但是，那个决定性的时刻是在他从沙漠回来的时候。他回到雷霍沃特，与陀斯特夫斯基见面，陀斯特夫斯基从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拿出一大块用蜡纸包裹的金属块。陀斯特夫斯基教授把它放到兴奋的年轻运营官的手里，问他是否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像铅，但是比铅重多了，”这个年轻人回答，“是铀，一定是铀。”两个人都沉默了，不需要再明确地说什么，他们两人都明白了赫梅德吉默尔建造的目的以及它的使命：为这个犹太国家创造一个新的保护伞。

在拉马塔维夫这间客厅的茶几上，有一堆国际科学期刊，旁边放着阿夫纳·科恩著作的一份复印本。我的主人高度评价了科恩的书，凭借这种态度，他暗示，我们都知道在说什么。我们将在不透明的裹尸布中进行下面的谈话。

“那时并没有一个总体规划，”我的主人开始讲述，“恩斯特·戴维·伯格曼教授做他自己的事情，伊斯雷尔·陀斯特夫斯基也做他自己的事情，当他们开始谈话时都使用挪威语或者法语。我研究如何从磷矿中回收铀，陀斯特夫斯基致力于重水的研究，物理学家们则进行核的科学研究。但所有这些工作都不是协调好、互相配合的，它们也不是一项统一的工作计划的一部分。它们源于十几个人的一种认识——这个时代是核的时代，而以色列必须走在核的前沿。如果以色列在核军备竞赛上落后于阿拉伯国家，那么以色列将不复存在。阿拉伯人本来就因数量庞大而

难以击败，最终，他们将因太强盛以致无法击败。然后，在1948年春天和1948年秋天的加利利众多村庄发生的事情，就不会再上演。时间紧迫，我们在与时间赛跑。这个国家的公民还不能明白，但我们明白；军队的将军们还没有明白，但我们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清晨5点起床，工作直到太阳落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阅读、研究、实验、创作、发明，只要一种新的性能出现了，我们立马利用。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取得进展。因为那是20世纪50年代，因为那种20世纪50年代的精神，没有人去问我们要跑向哪里，每个人只是不停地向前跑，一直跑。从50年代中期一直到60年代末，没有一个人曾经停下过脚步。”

这场马拉松开始于雷霍沃特，陀斯特夫斯基的团队建起了笨重的克莱因施密特装置，这种装置能通过一种独特的方式对重水进行蒸馏处理。运营官的团队从内盖夫带回了磷矿，并发明了各种方法来从大桶大桶的溶剂中提炼出铀。蒸馏富含重氧（O_{18}）的重水立即获得了成功。它使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导者之一。但铀的提取过程却是缓慢而艰辛的。数年的努力工作只产出了几克的铀。但这两个过程打造出以色列在核研究该项领域的初始能力，这两个过程也引起了国际方面的兴趣，允许以色列参与国际合作。在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在柑橘园的林间，以色列获得了它的核装备的立足点。

以色列与法国的第一次核联系缔结于20世纪40年代，中间人是恩斯特·戴维·伯格曼。1956年年末，伯格曼与法国签署了一个初步协议，要在迪莫纳建造一个核反应堆。西蒙·佩雷斯建立了核事务上的外交联盟，法国在1957年签署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尽管这两个年轻人营建并加深了与法国的联系，但秘密科学技术专员沙赫维特·弗赖尔，以及赫梅德吉默尔的运营官，几乎没有分到什么荣誉。通过与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直接协作，这两个精力充沛的男人赢得了法国人的信任，并促进了巴黎与雷霍沃特之间科学、技术以及战略方面的密切关系。1956年到1957年之间，运营官频繁地拜访巴黎，与法国人敲定了一个协议。协议督促双方保持沟通，每一方都要完全地通告另一方其进展状

况。1957年，我的主人搬到了法国，以便学习核进程当中最为关键的阶段。1958年，他被邀请访问法国最神圣的地方，法国最先进的核设施所在地。从那时起，一切都对他开放，他可以看到一切。当他服完兵役后，这位赫梅德吉默尔的年轻运营官成了一名工程师，负责法国——以色列最敏感、最秘密的部分。

我出生的那年冬天，运营官返回了以色列。七年前，他坐着一辆指挥车前往内盖夫寻找铀，如今，这位工程师再次坐着指挥车来到沙漠，寻找建造法国——以色列核反应堆的最佳地理位置。这个调查队包括了八个法国人和两个以色列人。这两个以色列人彼此并不喜欢对方。一个是迂腐的上校马内斯·普拉特（Manes Pratt），另一个是前陆军军需部的指挥官，现在是专业工程师，负责建造以色列的洛斯阿拉莫斯[注]，而这位傲慢、有时有些冲动的工程师将承担未来核设施最为关键的部分。但在现下这个剧情里，这两个以色列人都只是小人物。决策者是法国人。当指挥车护送车队到达罗特姆高原的472三角测点，法国人一致同意这就是最佳地点。就在迪莫纳镇东南14公里的地方，将建起以色列的核反应堆。

根据官方协议，以色列的核反应堆是非常低调的EL–102类型，输出功率只有24兆瓦。然而，依据阿夫纳·科恩所述，在地面部分，法国圣戈班公司（Saint-Gobain）为以色列复制了法兰西共和国建在马尔库尔的G1核反应堆。国外的出版物宣称，沙漠里的这个升级版核反应堆的输出功率至少在24兆瓦以上。而那些同类型的出版物认为，这个核反应堆还包括一个未在官方协议里提到的秘密的钚分离装置。我有理由相信，工程师在法国度过的三年时间里，他很可能参与规划以色列核反应堆最为重要的单元。而在他频繁地来往以色列期间，他肯定会观察其建设进程。他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解决最棘手问题的人——因分离装置与核反应堆本身过于接近而引起的严重问题。然而，工程师对下面这个事实深信不疑：无论他或者马内斯·普拉特的贡献多么意义非凡，迪莫纳依旧是法国对以色列创下的惊世之举。这是衰落的殖民力量送给这个年轻

前沿国度的离别赠礼。在东方，这个被西方扶植出来的国家，现在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因为工程师与马内斯·普拉特的激烈竞争关系，当迪莫纳的建造工作于1961年完工时，工程师没有出席。当1962年法国人离开，内盖夫核子研究中心（Negev Nuclear Research Center，官方称呼是迪莫纳）正式落成，工程师也没有出席。至关重要的1963年年底，当核反应堆被激活，工程师仍然没有在场。事实上，在迪莫纳建成的第一年，工程师只是远远地眺望迪莫纳。然而，当他在1965年被任命为迪莫纳的掌舵人时，他惊讶地发现，他最重要的工作将放在政治层面。

1960年，美国就知道了法国正在罗特姆高原为以色列建造一个核反应堆。美国总统约翰·F. 肯尼迪（John F. Kennedy）致力于防止核武器的扩散，坚决反对迪莫纳的核武器生产。根据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一项协议，从1962年开始，美国专家检查小组可以每一年前往沙漠的核反应堆检查一次。在他们前四次的检查中，那些美国人什么都没有发现。但随着一次次的拜访检查，以色列的故作姿态越难取信于美国人。1965年，根据阿夫纳·科恩和其他人的论断，以色列面临着最戏剧化的时刻。

工程师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但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他40岁之前，这个里雄莱锡安种植园主的儿子的角色就是对付美国人。他的使命就是愉快地、谨慎地、优雅地说服美国人，使迪莫纳可以继续发挥它的功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根据某些并非源自以色列的消息，他们建造了模拟控制室，地下入口处铺砌与水平线平齐的地砖，又在安置有禁用设备的建筑物周围散布鸽子粪便，营造出这里未被使用的假象。

每个美国人前来拜访检查的星期六，都是紧张、令人筋疲力尽的。工程师与来访研究人员进行交谈的每分每秒，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都远远地注视着。每一时刻都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疏忽都有可能是致命的。但工程师的自信和魅力创造了奇迹。1966年3月的检查通过了，没有任何事变；1967年4月的检查也是如此。

然而，还有最后一个障碍需要以色列去克服。1958年查尔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当选法国总统，他上任不久随即明确表示，他坚决反对以色列与法国之间开展的核项目合作。1960年，他下令终止这一合作。但亲以色列的法国部长们允许在迪莫纳的建造工作到1961年至1962年完成。即便在1965年，戴高乐开始敌视以色列的时候，法国与以色列的核合作仍在继续。就像我目前所了解到的，整个20世纪60年代，如果没有法国的原材料和法国的技术，迪莫纳就无法发挥作用。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高级成员们当然明白这一点。他们觉得应该对这个国家承担义务，因为这个年轻国家的科学贡献，因为这个国家遭受的大屠杀，因为这个国家在阿尔及利亚方面提供的情报。即使在委员会中，不亲近犹太人的成员，也认为这是历史的正义行为，认为以色列是西方设在东方的堡垒。工程师的戏剧性工作就是维系与法国核项目专家领导人（他们敢于违抗总统）的联盟，使迪莫纳成为可能。

我想询问工程师这个进程的最后阶段，但我知道，他不会从生产方面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在坚持了这么多年的沉默后，现在他也不会轻易松口。所以，我只开口要了第二杯威士忌。客厅的窗外，夜幕降临。

为了缓解访谈节奏，我在我的主人面前放置了一段不可思议的报道，来自缪尼亚·马尔多（Munia Mardor），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RAFAEL Advanced Defense Systems）的首席执行官。这段记述出自他的回忆录，但这段材料一直被人们忽略，直到几年后艾勒夫·本（Aluf Benn）在《国土报》发表，又在不久后被阿夫纳·科恩在书中引用，其重要意义才被人们注意。此段记述的日期标注为1967年5月28日：

> 我走进了会议大厅……这个团队正在组装武器系统，这个系统的改进和生产需要在战前完成。现在已经是后半夜。工程师和技术员——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小伙子，还在专心致志地工作。他们的表情是庄严的、沉思的，就好像他们完全认识到这套导致操作警报的系统所蕴含的巨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价值。显而易见，这个项目的

参与人员都处在紧张的状态下，身体和精神上的极度紧张。

工程师大笑起来。他知道马尔多写的是什么，但他不假思虑地否定了：他不会谈论那个迪莫纳的决定性时刻，但他打算谈一谈迪莫纳的精神。“我们从来没有兴奋到颤抖，我们也从来不开香槟庆贺。我们是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我们做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事，不需要引人注目的夸耀或者崇高的说辞。”

而军备竞赛还没有结束。1967年3月17日，六日战争后不久，两架埃及的米格21战斗机（MiG 21）飞至迪莫纳的上空侦察，引发了耶路撒冷的空袭警报。工程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保护他的特殊工程。但在战后的一年里，工程师面对着他最大的技术性挑战——机遇。1967年后，以色列感到了一种紧迫感，因为战前几周里，这个国家经历了灭绝的恐惧。但由于它在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此1967年后的以色列同样也体验到一种全新的感觉，仿佛它无所不能。这种恐惧与全能感觉的混合结果，就是技术上的肆无忌惮。根据阿夫纳·科恩的观点，在工程师成为迪莫纳总负责人的第三年，迪莫纳的产出能力提高了两倍。

成功之后，很快又是第二个、第三个，工程师大胆地提高产出量。在他的指挥下，以色列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发展出卓越的专业技术。他们将以色列建设成了自给自足的核国家。不再需要法国的庇护或者仰赖美国，凭借先进的核能，这个犹太国家现在已经举世瞩目。

然后就是核进程的最后阶段。1968年和1969年，美国检查员的检查都通过了，没有任何问题。同物理学家阿莫斯·德·沙利特一起，工程师把检查员们整得疲劳不堪，又将他们带入歧途，再次成功地掩盖了迪莫纳的秘密。但在1969年7月12日，长达18个小时的检查后，果尔达·梅厄改变了策略，与美国进行了一场直接对话。在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推动下，美国也改变了策略。1969年9月底，美国新当选的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与梅厄总理举行会晤，美国和

以色列就迪莫纳问题达成了一项不成文的共识。罗特姆高原上的核反应堆已经成为既成事实，而国际社会将接受和采纳以色列对于其存在的不透明政策。

工程师的叙述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发生在1966年的12月的事件。根据国际出版物介绍，就在那个时段，以色列组装了第一颗金属球，这枚核弹足以炸毁一个城市。他们真的没有起鸡皮疙瘩？他们的手真的没有颤抖？他们是不是真的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吃了禁果？工程师真的一点都不曾感到恐惧或者担忧？

我的主人没有肯定或者否认任何国际出版物。“就算他们说的是准确的吧，”他笑着说道，“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以色列必须保护自己，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以色列必须震慑它的敌人，这难道还不够清楚吗？总有些人必须要做这项工作。总有些人必须要在1955年进入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必须要在1960年前往法国，必须要在1966年建立迪莫纳。”

总有些人要做这些事，于是他做了。他尽力做到尽善尽美，掌管以色列第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的其中之一。这个产业展现出以色列的敏锐、精明以及雄厚的资本实力，超乎所有人的预期，保障了以色列半个世纪的生活。

记笔记时，我不时抬头看着工程师的笑脸，我首先想到的是他被谋杀的父亲。尽管，这起谋杀案发生在阿拉伯大起义结束的四年之后，但就像影响他这一代人的1936年至1939年的一系列暴力事件一样，1943年春，在他家柑橘园响起的枪声也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了这位工程师。那起谋杀将他变成了坚强、可怕、一心复仇的战斗机器。曾经被宠坏的、理性而冷漠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无所畏惧的战士，百无禁忌。无论是作为戈兰高地一个步兵排的指挥官，成为赫梅德吉默尔的运营官，法国工程师，还是迪莫纳的总管，他一直在战斗。他将他的内在力量和钢铁般的意志，尽数灌注在犹太人为土地进行的民族斗争中，灌注在与阿拉伯人的斗争中。确保以色列生存的义务高于一切，其他一切问题都不予考

虑。每时每刻，工程师都只有一个使命：确保犹太人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确保没有一个敌人在春日美好的早晨从灌木丛中一跃而起，把犹太人射倒在地。

接下来想到的，是1948年这位工程师摧毁的诸多阿拉伯村庄。尽管他没有这么说，但很显然，那些村庄中，有直通迪莫纳的道路。1948年的驱逐行动使迪莫纳成为必需。因为那些被摧毁的村庄，巴勒斯坦人总是在追逐我们，他们总想夷平我们的村庄。因此，有必要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建立起一张盾牌，而工程师毅然亲自担当重任。我们决不允许巴勒斯坦的悲剧危害我们的不朽事业，我们所规划的事业将结束我们自己的悲剧。

我第三个想到的是工程师自己。他讲述得越多，我越发明白，他这个人是不需要深入探究的。他并不具备本·古里安对于历史走向的敏锐把握能力，也没有阿莫斯·德·沙利特的悲剧性洞察力，或者陀斯特夫斯基的辩证的精明。他是真的不理解自己行为的复杂性，不理解自己行动存在的问题。他对于自己的暴行和所作所为的恐怖程度没有任何概念。他整个人充斥着国家强盛的需求、钢铁般的意志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行动主义倾向。他永远没有能力正确地看待他这一生所做的工作。他工作的能力正是来自于他不能看到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影响。

我的主人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仿佛在试图解读我的思想。我坦率地回答他沉默的质疑。我告诉他，他的成就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色列作为一个只有2 500 000人口的弹丸小国，却成功地赢得了德国、意大利、日本都未曾拥有的能力。尽管它国土狭小，本身存在不少困难，却被认为是世界六大主流力量之一。而事实上，它并没有就此停步。根据国际出版物记载，在成功踏入主流力量之列之后，它还建立了一个军械库，里面装满大量的核弹头：原子弹和氢弹，低能量的和高能量的，核炮弹和核地雷。我告诉他，在这些书问世的年代，即使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我们现在谈论的都是一个足以令人目瞪口呆

的成就。根据那些非以色列的核专家所说，甚至在工程师执掌迪莫纳的早期，沙漠里的设施就不仅仅依赖法国的分离技术，而是还使用了以色列人的方法。这些专家们声称，通过久经考验的引进的技术，以及国产的新型技术，这个科学机构生产出谁都想不到的产品：一种惊人的大规模杀伤性的能力。

工程师微笑了一下。他既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

但科技成就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我继续说道。与以色列研发核弹的能力相比，更令人震惊的是，在还没有核弹的情况下，将这个决定付诸行动。在最开始的时候，还有着两个学派的思想：那些绝对信奉核弹的为一派（就像摩西·达扬和西蒙·佩雷斯），他们相信，国家安全可以建立在核弹的基础上。那些绝对反对核弹的为另一派（就像亚伦和加利利），他们认为，核弹将最终危害国家安全。但在1962年加利利海边的休息寓所，本·古里安召开了安全讨论会，会议进程中两个流派合二为一：理论上，以色列应当拥有核电力，但是要表现得好像不拥有核电力一样。这种方式不会刺激阿拉伯人，也不会加快中东的核化进程。以色列也没有采取鲁莽的，或者是不道德的安全策略。与核武器有关的所有事情，以色列的谨慎远远超过美国和北约；与核武器有关的所有事情，以色列都将以一个成年人的态度对国际社会负责。以色列完全了解核恶魔的可怕本质，并且将一直把它锁在地下室。

工程师微笑，似乎对这个分析非常欣赏。

我继续说。我告诉他还有第三个同等重要的成就。迪莫纳的十年时期（1957~1967年）同样也是以色列恢复正常的十年时期。在那几年里，前往巴黎的不仅仅是物理学家及核工程师们。画家和雕塑家也前往法国美术学院（École des Beaux-Arts）进修，作家和诗人频繁出入拉丁区的咖啡馆。当他们返回以色列，他们深受萨特（Sartre）、加缪（Camus）、布哈森（Brassens）、普莱维尔（Prévert）等人的影响，并且带来一种全新的个人主义精神。他们去纽约、伦敦旅行的同事也是

如此。有些人受到W. H. 奥登（W. H. Auden）的影响，有些人则接受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思想，还有些人则被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所带动。特拉维夫成了一个洋溢着文化和艺术热情的城市，在这里，出生于以色列的新一代艺术家和作家反抗着旧式的保守的犹太复国主义法令。在胡尔达基布兹，年轻的阿莫斯·奥兹（Amos Oz）写下了他的第一篇开创性的短篇小说。在耶路撒冷，A. B.约书亚（A. B. Yehoshua）撰写了表达新一代人心声的现代主义小说。当一个法国式的核反应堆在内盖夫建造的时候，以色列已经成了一个西方国家，“我”取代了“我们”。在这两个进程之间有一个显著的衔接：迪莫纳不仅仅是现代化与个性的表现者，还是现代化与个性的引导者。在这个新的钟罩的保护下，新兴的以色列可以更加轻松，可以少做一些动员。以色列人远比以前更自由和轻松，他们可以真切地追求个人幸福。迪莫纳使这个犹太民族家园的居民过着相对理智而又充实的生活，与那些西欧的犹太人有着根本不同。

我告诉我的主人，在将近半个世纪里，这三个成就是卓有成效的。保护伞的解决方案确实发挥了作用。迪莫纳是那样令人惊叹，无论是它的存在，还是它的不透明度，还是它所培养的准常态。迪莫纳象征着20世纪60年代的以色列最好的一面：视野、想象力、冷静、勇气、坚韧、力量、约束以及决心。那里有一种理性的严格规章，一种非帝国主义的严格思想，一种非沙文主义的爱国主义。它是一个凝结外交智慧和睿智通达的独特联合体，有一点谦虚，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对现实的精练理解，也有管理这个现实的勇敢努力，试图寻找一个合理方法解决当时疯狂情形。迪莫纳给以色列带来了半个世纪的相对安全，给中东带来46年的相对稳定。因为在那个时期总是周期性地发生区域性的火灾，以色列便没有考虑到更大的火灾爆发的可能。迪莫纳防止了全面战争的发生。因为有迪莫纳，那些和平协议才有可能签订。46年后，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迪莫纳是对的吗？如果阿拉伯人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魔鬼，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工程师以及他的同事，会不会打开了一扇通往地狱的未来的大门？

工程师喜欢我的分析，但不喜欢我的问题。他从扶手椅上站起来说，他想给我看点东西。他慢慢走近隔壁的房间，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长方形的相簿。封面用薄薄的铜片制成，上面錾着图画，沙漠里棕榈树间露出一座圆顶屋。

相簿里的照片几乎全部都是那座圆顶屋。1960年，建设中的圆顶屋。1961年，完工后的圆顶屋。1963年，本·古里安总理站在圆顶屋前；1965年，总理艾希科尔（Eshkol）站在圆顶屋前；1970年，梅厄总理站在圆顶屋前；1972年，国防部长达扬站在圆顶屋前。还有带领本·古里安、艾希科尔、梅厄来到圆顶屋的核工程师小组的成员。我看到达扬脸上洋溢的欢欣微笑，也看到梅厄脸上的严肃表情。

我认出了很多工程师的脸孔，他们三四十岁。我记得他们在独立日的晚会上翩翩起舞，记得他们在夏日的海边沙滩跟我们这些孩子一起玩耍嬉戏。我记得我10岁时候，他们为我们这些孩子讲笑话，表演魔术。而在照片里，他们正在向果尔达·梅厄和摩西·达扬展示这个机密。他们在上演属于1948年的那一代人的沉默决心。他们既没有得意也没有焦急，既没有骄傲也没有畏惧。但他们脸上的表情以及实现自我的方式似乎在说：这件事情必须要做，于是我们做了，我们不需要任何理由。

在很多照片中，工程师都站在领导者的位置。他走在前头，显得精力旺盛、意志坚定，他的秃头闪闪发光，他的嘴唇厚厚的，带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他浑身都散发着信心，充满信念。当他开着雪铁龙D3在直升机场会见那些高官政要，带领他们游览他的沙漠王国时，他看起来是那么的自豪。但是，这些相片并没暴露那个秘密。即便在这本秘密的相簿里，那个秘密仍然得以保守。我只看到沙漠里的施工现场，尘土下的索莱尔·伯尼建筑公司（Solel Boneh building company）；看到60年代新兴的现代流线型结构；看到棕榈树和木麻黄；我还看到了新种植的草坪，以及众多叶子花属的植物，以及巨大的、银色的穹窿顶，就像为悲剧的现代而建造的大教堂。

然而，有一张照片令我不寒而栗。这是一张空房间的照片。圆屋顶下的一切工作都没有人类的干预，一切都沉默地运作着。如果那些国际出版物记载的是正确的，在沉默中，每一天将产出几十克的浓缩铀，每一年将产出几公斤的钚；如果那些国际出版物记载的是正确的，我童年中，平静的、冷淡的以色列人生产着那些钚，并将它们制成黑色的金属纽扣。当梅厄太太的脸转向照相机，她的眼里盛满恐惧，莫不是因为她看到了那些黑色的纽扣？

当工程师合上长方形的相簿，他只想透露一个秘密。他告诉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果尔达并不喜欢他，她不喜欢他管理的那些设备。然而逐渐地，她开始接受他，并开始表现出对于那些设备的更大的兴趣。她把那个设备称为“varenye”。varenye就是装果酱的罐子，在有麻烦的时候，东欧犹太人就把这种罐子放进碗柜里。当一场大屠杀爆发，他们就可以用这种果酱养活自己的家庭，直到人们的狂怒过去。每当工程师迈进她的办公室，向她报告迪莫纳的进展情况，这位总理就会问道：“呶，varenye里有什么新东西吗？”

1973年10月，看起来果尔达·梅厄的以色列需要用到varenye了。以色列被迫考虑它的迪莫纳能力，它决定发挥它们的威慑作用。但即使是这样，梅厄还是十分谨慎的。她表现明智并且尽责。根据非以色列的信息，以色列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展示了它的核导弹，供俄罗斯和美国卫星拍摄照片，但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使用它们。很快，危险就过去了，迪莫纳也再次消失。但是创伤依然存在。赎罪日战争（The Yom Kippur War）明确地证明，迪莫纳就是以色列看不见的锚，是其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迪莫纳，以色列就像沙漠中的一株孤独的柽柳。

然而，迪莫纳为以色列带来的历史喘息已然接近尾声。以色列在中东的核霸权也很可能接近了尾声。迟早，以色列的核垄断将被打破。第一个敌对国家将走向核化的道路，然后是第二个敌对国家，再然后是第三个。在21世纪的前半段，中东地区必然走向核化。世界上第一个核领

域的竞技场，将出现在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

我对我的主人描述了我的担忧。我对他说，在现下的非常时刻，伊朗的工程师们正在从事你们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所做的事情；在现下的此时此刻，各式各样的微型迪莫纳正在纳坦兹和帕琴基地兴建。伊朗的核科学家们正被送往国外，竭尽所能地从西方学习一切他们能学到的知识。精明的代理商们正在从东方和西方窃取一切他们能偷的东西。伊朗现在正跑着你们从1957年到1967年跑完的马拉松。而他们并不孤单，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阿尔及利亚全都表现出对核的兴趣，如果伊朗可以取得成功，他们的兴趣将更加浓厚。他们认为，既然以色列有权兴建迪莫纳，他们便也有权利兴建他们的迪莫纳。而一旦其他中东国家行使他们的权利，以色列的迪莫纳将从一个祝福变成一个诅咒。我们将重新审视亚伦和加利利的警告，然后发现，他们是正确的。半个世纪后，我们将重新审视那些我在父亲的图书馆里读过的知识分子的论文，然后发现，他们是多么地具有先见之明。这个使以色列从1967年一直繁荣到新千禧年的第二个十年的事物，将变成以色列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它也许会将以色列人的生活变成一场噩梦。

工程师没有驳斥我的观点。恰恰相反，他非常肯定地预见到中东正在发出放射性的绿光。他直言不讳。很可能基于政治方面的不正确说法，他轻蔑地做出结论，认为阿拉伯人不会像我们这般行事，他们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他们获得了这种能力，他们就会使用它。就在这里，在特拉维夫的上空。就工程师而言，他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先发制人。谁要前来杀你，你就奋起先宰了他。尽管他相信阿拉伯人已经拥有了核弹，依旧先打他们。全力以赴、用尽一切力量打他们。现在必须积极主动，就像工程师和他的同事那时那样积极主动一样。“我们不能无所事事地坐等挨揍，”他咆哮道，“我们绝不能坐等在一个美好的春日，一朵白色的蘑菇云从我们家园的上空升起。”

我给工程师看了一篇文章的一部分，这是我在1999年秋天撰写的，

当时《国土报》雇用了一辆路虎的守护者吉普车，带着我前去位于内盖夫的秘密研究中心。

从一开始，以色列就非常清楚迪莫纳本身所蕴含的危险。它建造了迪莫纳，但决定不会不负责任地使用它。以色列没有利用迪莫纳的非常规优势，在常规外交手腕、常规政治策略、常规军事对抗方面占尽上风。它也没有将迪莫纳纳入日常安全战略，没有在迪莫纳的基础上构建军事假想，没有把迪莫纳变成政治资本。没有利用它使以色列的民众冷静下来，也没有利用它削弱军事战备。它真的一直保持着这样的身份：只是一个选项，只是为了应对预想的最糟糕灾难的选项。是因以色列生存状态基本的、原始的焦虑，而产生的超现代的答案。

看起来，核模糊似乎是一个笑话。它是一个既定的公约，是所有人都知道但没有一个人公开宣扬的事物。但事实上，核模糊是一个天才的构想。这一举措包含着深邃的智慧。因此以色列不愿意让人知道迪莫纳，要看到它只能在有颗粒的照片里——那是从很远的地方用长焦镜头拍摄的；要听到迪莫纳的信息，只能从外国的文献和国际出版物里。迪莫纳是至关重要的，（迪莫纳是模糊的，这在以色列是被大众普遍接受的）。为了将某一天不得不使用迪莫纳的可能性减小到最低（不管是出于任何使用目的），以色列知道，决不能单单依赖迪莫纳。我们应该像迪莫纳不曾存在那般继续生活。

但迪莫纳就在这里。当布满灰尘的守护者爬上被推荐观看那个秘密的山峦，早晨的雾气升起，突然你可以看到你在那些卫星照片里看到的图景：迪莫纳的混凝土、沥青和棕榈树，是如何铺满整片沙漠。内盖夫核子研究中心，是如何矗立在这片浩瀚沙漠，就像规划严密的西方前哨的小广场，就像一个孤孤单单的以色列现代殖民点，被电网的栅栏所环绕。

我走出吉普车向四周望去，打量迪莫纳周边的一切——小火山口张开的血盆大口，陡峭的通向索多玛的岩壁——思考着那些建造迪莫纳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离世，已经不能被语言、感觉

或思想所安慰。他们是20世纪中期犹太世代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20世纪前半期犹太人所经历的事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他们辛勤工作。所以，当以色列的国家陷入僵局，告诉他们需要他们打破僵局，他们就去打破它。他们建造的核反应堆，不单单只是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核心。

他们做下这些事情并没有考虑的太多。没有口号，没有陈词滥调，也没有胡思乱想。这批优秀的工程师满怀信心地工作，是出自国家承诺的巨大吸引力，出于为国家服务的使命感，不论好坏。没有疑问，没有顾虑。只有行动。

现在，当太阳在约旦山脉的上空高高升起，沙漠的空气开始变暖，远处的银色圆屋顶熠熠发光，而我在思考迪莫纳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最基本的是，它是我们的绝对禁地。我们为大众所知的秘密不再是秘密。它是真实存在的事物，科学的，具象的，是我们在这里赖以生存的根基。我们在这里生存的独特困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宁愿把我们的视线从迪莫纳移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宁愿不要了解它那么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宁愿知道它在那儿，却不关心它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忽略隐藏在以色列巨大秘密中的悲剧。

工程师把文章放在他面前的桌上，摘下他的眼镜，亲切地告诉我，我想得太多了。我想到的事情是他从来不曾想过的，而这就是他以及他那一代人复兴的原因。享受当下的每一刻，因此明天将比今天更美好，明天的明天将比明天更加美好。“如果每个人想的都像你想的这样多，”他告诉我，“他们将永远不会行动。如果每个人都花费太多的时间思考，这些思考将使他们陷入瘫痪，使他们不能建造迪莫纳。”

“但是你邀请了我，”我对工程师说道，“你想要谈心。你认为在合适的背景下呈现一些东西是重要的。你认为你所说的会湮没于历史，这一点是重要的。”

工程师用锐利的目光与我对视，“我知道，我的日子是可以数算得清楚的，”他说，“一个月，半年，或者一年。在某种意义上，我是我这一代人落在最后的一个。与那些一开始就走在前面的人，那些实干家相比，我的的确确是最后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将某种认识告诉你。不是知识，只是认识。通过你，我要确保，你这一代人将知晓我这一代人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从来不曾谈论，我们紧闭着嘴唇。就因为我们不能说话，属于我们的部分将被历史遗忘，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考虑后，我在这个晚上邀请了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与你交谈，就像之前我做的一样。之前我从来没有这样谈论过。这就是我的遗产。”

工程师累了。我们又喝了一杯威士忌，这个晚上的最后一杯。我们听着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指挥的克莱采奏鸣曲。“真是个天才，”工程师说道，“虽然他厌恶以色列，但仍然是一个天才。真不敢相信这个国家产生了这么多天才。这个国家所创造的音乐、美术和诗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在这里，沙漠的边缘，在死亡线上，我们创造了一个充满天赋、快乐和无穷创造力的国度。”

工程师询问我正在撰写的书。因为他向我敞开了心胸，我也向他打开了心扉。我告诉他关于山谷的故事，柑橘园的故事，马萨达的故事，吕大的故事，供给房社区的故事。我告诉他迪莫纳是山谷、柑橘园、马萨达、吕大、供给房社区的必然结果。我敢于告诉他这里正发生着悲剧。我们不仅给内盖夫带来了清水，还带来了重水。我们不仅给这边土地带来了农业上的现代化，还带来了核的现代化。因为在大屠杀和民族复兴之间，在恐惧和希望之间，在生存与死亡之间——我们做出了迪莫纳的壮举。对接下来的世世代代而言，这个举措究竟是祝福还是邪恶诅咒，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我对我的主人说，也许现在我们谈论的一切都不是巧合。你是一个实干家，一个行动派，而我是一个对行动的解释者。你是一个建筑师，

而我尝试着揣摩你所造的建筑的意义。你是经验的，我是意识的，而你需要意识。哪怕是你的邻居，都不知道亏欠你什么。所有你身边的人都耽于享乐，追求享乐的特拉维夫已经忘记了它曾亏欠了你。而你看到历史的车轮开始向反方向转动。现在已经有布尔什维克的核反应堆，以及伊朗的纳坦兹离心机。在你生命中，第一次，你不再仅仅像个工程师那样思考，思考它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你现在也同样是意识的，你看到了这个背景。这个背景令你充满骄傲，也同样令你充满恐惧。你意识到你所做过的事情，这事情对你来说太大了。对全人类来说太大了。

工程师说了很多。天色太晚，他很累了。他承诺会思考我说的话。他从扶手椅站起来，带着我走过那些绘着他童年时代的柑橘园的水彩画和油画。当他带我走到门口时，他突然温柔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诉我说，这个夜晚他倾诉了那些从没有想过他会说出口的事情，重游了那些他从未想过还能再次拜访的地方。接着，他要我承诺我会谨慎对待这些放射性的原料，我会公正地看待他，我会公正地对待迪莫纳，我会给予以色列这个国家应有的公正。

一个月后，这位工程师去世了。

---

1. 以色列内盖夫地区中心城市。
2. 废料来源于Machon 2的的钚提取过程，4号车间对这些废料进行常规的转化处理，也可以将其中的铀提取出来进行再利用。
3. 用气体离心机提炼浓缩铀的部分只是Machon 8的840单元。Machon 8其余单元包括一个实验室，主要作用是进行测试和技术开发。
4. 化学车间，生产锂－6氘化物，加工处理天然铀以及制作反应堆燃烧棒。
5. 核燃料生产过程中必需的一种中间产品，粉碎后的天然铀矿石经多种溶液萃取、沉淀制成，主要成分是重铀酸铵或重铀酸钠，呈黄色，常加工成饼状，故名。“黄饼”名称源于最初的工艺产出的非纯净成品的颜色和形态，而通过现代先进科技手段生产的“黄饼”，实际上呈褐色或者黑色。
6. 分为钚铀自动分离萃取车间，钚生产和回收车间、氘化锂和铍弹药制作车间。
7. 60米高；镀银。

8. 指一个国家研发、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能力。后来引申为比喻重大的不可逆的选择。

9. 指维希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

10. 重水（heavy water），由氘和氧组成的化合物。分子式D_2O，分子量20.0275，比普通水的分子量18.0153高出约11％，因此叫作重水。原子能发电站的心脏是原子反应堆，为了控制原子反应堆中核裂变反应的正常进行，需要用重水做中子的减速剂。

11. 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的原子能研究中心。

第八章
定居点，**1975**



一个不知道六日战争的人就不能理解定居点的含义。1967年5月，埃及军队进攻西奈沙漠，封锁了蒂朗海峡，直接威胁到以色列国。国际社会没有回应，在以色列，许多人陷入一片恐慌。他们担忧这次泛阿拉伯的进攻将摧毁以色列。但当以色列1967年6月5日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后，以色列占据了上风。在三个小时里，以色列国防军便摧毁了四个阿拉伯国家的空军力量。在六天时间里，以色列占领了西奈沙漠、约旦河西岸以及戈兰高地。阿拉伯的军队被击溃，阿拉伯国家蒙受耻辱，而小小的以色列，领土扩张了三倍，并成为区域霸主。建国19年后，以色列共和国成了一个帝国。在第二圣殿毁灭1　900年后，在耶路撒冷古老殿宇曾经矗立的圣殿山，犹太人再次成为它的主人。

一个不知道赎罪日战争的人同样不能理解定居点的含义。1973年10月6日，整个以色列都在这个神圣的假日里遵循赎罪日的律令禁食，埃及军队出乎意料地突袭了以色列。他们渡过了苏伊士运河，突破了巴列夫防线——这是以色列用来护卫国土南翼的防线。与此同时，叙利亚的军队越过了北境，摧毁了以色列的防御，占领戈兰高地的大部分地区。短短几天里，成千上万名以色列士兵牺牲、受伤、被俘。以色列空军损失了三分之一的战斗机。有时，以色列看起来似乎即将被攻破；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也动摇了信心，以《启示录》的论调说，第三圣殿的毁灭迫在眉睫。经过整整十天的浴血战斗，以色列夺回了主导权。它击败了进攻的敌军，穿过苏伊士运河，威胁埃及首都开罗，同时迫近了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然而，迟来的军事成就并不能消除几近失败的创伤。这次战争被视为巨大的失败。以色列领导人集团和以色列军队的信念被击碎了。同样被击碎的还有以色列的自信。历史上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没有前进，反而撤退。

定居点，就是对这两场战争的直接回应。1967年事件的急转弯——从灭绝的恐惧到响亮的胜利——间接抨击着70年来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共同制定的严格自律精神。以色列国家陶醉在胜利里，全国充满了欢乐、傲慢以及弥赛亚式的华美妄想。而六年后，这个国家又经历了一个几乎

是瞬间的转变，从帝国意识变为了畏缩消沉，伴随着对领导集团、价值观、身份认同的深刻批判。以色列现在充满了绝望、自我怀疑和真实的恐惧。很多人对以色列失望了，在耶路撒冷寻求安慰。相距不过六年却截然相反的战争体验，使以色列人的心理失去了平衡。鲜明的对比，截然不同的两个结果令人难以置信，于是促使了定居点的诞生。

1980年时，我还是一个23岁的学生，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定居点正在制造着灾难。25岁时，我为“现在和平运动”写了一本小册子，在小册子里我斥责定居点为愚蠢的工程。那是我出版的第一份文本，在册子里我写道，一旦定居在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犹太人的数量增长到五倍——从20 000人增长到100 000人，那么以色列将会迷失。今天，在西岸地区已经有将近400 000以色列犹太定居者。作为一个学生，作为一个和平运动人士，作为一个记者，我迫切的警告都是徒劳的。伟大而高尚的以色列和平运动失败了，国际社会阻止定居点扩张的努力也失败了。我们预想的噩梦变成了现实。

这就是30年后的今天，我开着车驶向奥弗拉的缘由。奥弗拉是所有定居点的母亲。我现在去那里，并非是为了对抗她，而是为了理解她。理解定居点如何从右翼势力的幻想变成了历史的事实。理解是什么力量驱使20世纪末的以色列推行了这个徒劳的、与时代脱节的殖民工程。理解奥弗拉将走向何方。

在一个凉爽的冬日，我自特拉维夫驱车向东驶往奥弗拉。我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越过了“绿线”[注]，越过了撒玛利亚，越过了约旦河西岸的北部地区。沿着这条路，分布有20个小的定居点，以及一个定居者的城镇。然后我开车向南，越过阿里埃勒抵达以利，又从以利到达奥弗拉。公路沿着撒玛利亚山脉的分水线，这片地区大约分布着另外20个小定居点，坐落在巴勒斯坦村庄之间。山峦错落参差的峭壁景观，就像这里统计出来的人口数量那样令人震惊。在12月水晶般明净的天空下，看起来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纠葛已经无法解开。占领已成事实。《圣经》中以

色列土地上最美丽的地区，现在成了被现代以色列占领的最凄惨的地区。这里是庄严的，也是令人沮丧的；是壮丽的，也是令人遗憾的。也许，这里是毫无希望的。

在此前的一天，我会见了约尔·宾·努恩（Yoel Bin Nun），他是虔诚教徒集团（Gush Emunim）注定居者运动的发起者，也是奥弗拉的创建者。在他的家乡约旦河西岸南部，就是定居点阿龙什瓦特。在那个寒冷、潮湿的夜晚，窗外寒风呼啸，我询问他，为什么他要推行定居者运动，是什么力量促使以色列在1967年6月占领土地上建起定居点。

宾·努恩的回答正是他的人生故事。这个故事开始于“二战”前夕，1939年夏，他的母亲乘坐最后一批船次的其中一艘船驶离欧洲，抵达巴勒斯坦。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海法城长大，接受开明的宗教教育，并成为温和的民族宗教青年运动的一名成员。60年代中期，他进入耶路撒冷的犹太教经学院（Mercaz HaRav yeshiva），在压抑而自制的学院气氛中学习。随后，1967年春天，他经历了那个关键时刻。那时是六日战争爆发的三周前，拉比兹耶胡达·哈科恩·库克（Ziyehuda HaCohen Kook）召集他的学生分享他心中的一个期待，这份期待在他心中埋藏了20年。“我们的纳布卢斯在哪里？”这位年迈的学院创始人大声叫喊道，就像正在这一时刻、这个地方经历神的启示，“我们的希伯来在哪里？我们的耶利哥在哪里？我们的以色列国王在哪里？我们的神殿在哪里？”激动的宾·努恩在房间里踱步，高高的窗户外，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

6月初战事爆发，宾·努恩在东耶路撒冷的巷子里战斗。库克拉比预言式谴责结束后的第22天，他发现自己正站在圣殿山，拉比的叫喊在他耳畔回响。他告诉我，那时他感觉仿佛天空打开了，天空触摸着大地。“突然间，”他说道，“大地在呼唤我们，召唤我们。这片土地灌注入我们的灵魂。”就好像《圣经》突然获得了生命。一个圣经级的历史性事件发生了：在以色列的土地上，以色列人民重新掌管以色列。

当宾·努恩对我述说这一切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他站起来又坐下，拽着自己的胡子，在他的客厅里来来回回地走着。他向我提起，战后两个月，数百名拉比和学院学生在耶路撒冷举行了第一次集会："那里的每一个人都确信，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土地，我们永远不会离开。就在那一天，虔诚教徒集团定居者运动的萌芽成形了。的确，当时它还没有一个名字，也没有一个平台。但在1967年夏天，非常明确的是，直到六日战争前还没有热切地希望看到一个大以色列，也没有对大以色列宣誓效忠的民族宗教团体，现在将完全投身于大以色列。"宗教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定要建立犹大和撒玛利亚，并使它们成为以色列主权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在六日战争和赎罪日战争之间的间隔期，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确，耶路撒冷南部的加什艾泽恩，在1948年被遗弃和毁坏后，被重建起来。在希伯来，1929年大屠杀之后的第40年，建立了一个新的犹太社区。但这些约旦河西岸定居者的总数量尚不到3 000人，而且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住在撒玛利亚。工党政府遏制民族宗教运动扩张野心的目的实现了。然而，赎罪日战争削弱了工党政府。战后的创伤和迷惘令本已存在的弥赛亚式冲动变成了坚定而富有侵略性的政治力量。阻止建立犹大和撒玛利亚野心的水坝再也不能抵御狂涌的浪潮。

宾·努恩为我重新梳理了这些事件。1973年，战争即将结束时，一小群信奉宗教的年轻妇女觐见了果尔达·迈尔总理，建议她在撒玛利亚建立一个犹太人定居点，以鼓舞士气，证明赎罪日战争没有击垮以色列人民的精神。而迈尔认为这些年轻女人失去了理智。1974年冬天，当哈南·波拉特（Hanan Porat）、本尼·喀左威（Benny Katzover）、梅纳赫姆·菲利克斯（Menachem Felix）以及约尔·宾·努恩从战场返回后，他们接过当年宗教妇女们的接力棒，继续展开斗争，并在果尔达·迈尔的居所和办公室附近组织了一场静坐示威运动。令他们惊讶的是，更多的民众自发加入了他们，先是几百人，然后上升到几千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爆发了。之后，政府迫于压力，允许在耶路撒冷北部建立第一个犹太人

定居点。

精力充沛的狂热分子与疲惫衰弱的工党政府之间的僵局持续了一年半。一次又一次，坚定的年轻信徒尝试在撒玛利亚夺取土地，建立定居点；一次又一次，他们被疏散；一次又一次，非法的边区村落在约旦河西岸被建造起来；一次又一次，它们又被拆毁。然而，一次次不曾间断的对抗运动锻造、巩固了虔诚教徒集团的定居者运动，并且授予该运动更多的权力。越来越多的年轻宗教信徒对这一运动表示认同，并欣然加入。即使在非宗教人士中间，定居者运动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并被视为新时代的新先驱。在那些决意要去撒玛利亚的人身上，有一些吸引人、诱惑人的热情和奉献精神。即使某些以色列人意识到，在占领地建造定居点是非法的、不道德的、非理性的，但他们发现自己很难抗拒定居点运动。在其他火炬逐渐熄灭的时候，虔诚教徒集团被看作了犹太复国主义点燃的新火炬。

宾·努恩告诉我，领导虔诚教徒集团的并不是拉比，真正的领导者是大约12个充满活力、富有魅力的青年男人，年龄在20多岁至30岁出头之间。他们身上有一种赤诚热情与实用主义、理想主义与狡猾诡诈的罕见结合。他们同时兼备宗教信仰和政治技巧。他们崇拜历史上的劳工运动，但鄙视工党现在的模样。他们把犹太教的弥赛亚信仰与以色列的肆无忌惮结合，决定以之代替，或者说继承劳工运动曾经开展的理想主义的先锋运动。穿着法兰绒的衬衫，罩着军大衣，戴着针织的圆顶帽，这些男人成为以色列新的先锋派。他们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人，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并赢得了成千上万的人的默许支持。以色列当选政府感到了恐惧。垂死的工党政府被视为过去的领导者，而虔诚教徒集团将自己看作未来的领导人。它向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和民主的以色列发起挑战，要求在撒玛利亚建立自己的艾因哈罗德。

奥弗拉不是艾因哈罗德。奥弗拉的诞生并不是基于绝望的离散犹太人，而是基于一个主权国家。它不打算为犹太人提供避难所，而是要兴

建犹太人的王国。它对抗的不是一个外国势力，而是犹太人的民主国家。然而，对于它的创始人来说，奥弗拉就是艾因哈罗德的直系后裔。就像艾因哈罗德，它在一块几千年来不曾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搭起了帐篷。就像艾因哈罗德，它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被建立起来。就像艾因哈罗德，它证明了意志力的胜利。以自己的方式，奥弗拉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乌托邦强加于现实，就像艾因哈罗德54年前做的那样。

平夏斯·沃勒斯坦（Pinchas Wallerstein）在他的奥弗拉红屋顶宅邸中，用热情的握手欢迎我的拜访。作为奥弗拉的另一位创始人，沃勒斯坦与宾·努恩有着显著不同。他身材矮小，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充满朝气，又富有实践精神。他不是那种具备深刻思想的人，但他行动起来果敢迅速。不过，就像宾·努恩一样，他用他的人生故事回答我的问题。他出生于海法郊区基亚特阿塔的一个工人家庭，童年生活十分贫困。他的父亲每天清晨5点就要离家，驾着马车分发新鲜的面包。母亲的迷人微笑掩盖了大屠杀的深重苦痛。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孤独的，他们的家人已经永远离开了他们。然而，他们年轻的儿子，作为一个出生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将告别悲惨，告别贫困，告别痛苦。尽管他年纪小，又有诵读障碍，但他逐渐在社交上表现活跃。尽管他被经学院高中部开除，但他成了民族宗教青年运动的领袖，并把青年运动当成他真正的心灵归属。尽管他居住在以色列的外围，但他崇拜着基布兹，并梦想成为一个基布兹的社员。在1967年战争中，他身负重伤，在医院休养了两年。但他克服了残疾和读写困难，结了婚，有了孩子，并完成了学业。他一直都不能安静下来，总在寻找着另外的东西、另外的地方。1973年战争结束后，沃勒斯坦意识到，他想要找到一条复兴犹太复国主义的途径。25岁时，他成为一群青年男女的领袖，呼吁在撒玛利亚建立定居点。但直到1975年，他才想出一个可操作的方法，这个方法将确实地使撒玛利亚定居点成为可能：与其与政府对抗，不如诱骗政府接受，最后承认狡猾的撒玛利亚定居点的既成事实。为了在撒玛利亚山地建起第一个定居点，善于实践的平夏斯·沃勒斯坦随即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另一名奥弗拉的创始人，耶胡达·伊曾（Yehuda Etzion），带着怀疑的态度接待了我。我到底想要得到什么？我在奥弗拉寻找什么？这位身材颀长、蓄着胡须的定居者不相信一个左翼倾向的记者可以平和、公正地看待奥弗拉。但在一个小时的闲聊后，他的态度软化下来。他为我冲泡口感浓郁的土耳其咖啡，用葡萄干和烤杏仁招待我，之后，我们开始了谈话。伊曾是一个有深度的人。不像宾·努恩和沃勒斯坦，早在他的童年时代，他就对《圣经》里描述的以色列土地感到一种深深的渴慕。他至今还记得独立战争后他父母的愤怒，因为本·古里安没有坚持将旧城保留在“我们的手中”。他还记得以色列建国前冷酷的斯特恩帮（Stern Gang），他十分钦佩他们，欣赏他们当初的誓言——要把英国人强硬地驱逐出这片土地。然而，即使是伊曾，六日战争对他而言仍然是一个引爆点，一次大爆炸。他告诉我，当东耶路撒冷被解放时，他欣喜若狂。他感到一种对圣殿山的渴慕，在那里，曾经矗立着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他所经历的现实告诉他，圣殿山是关键所在，他决定登上圣殿山。将《圣经》引入他的生活。

距1967年天空打开六年后，天空随着赎罪日战争的到来逐渐崩塌。当他背着尸体爬下戈兰高地，一系列问题敲击着他的心灵：我们遭遇了什么？我们为什么失败？我们怎么会变得如此虚弱，虚弱得可怕？

耶胡达·伊曾告诉我，比战争更糟糕的是战争带来的后果——政治的雪崩。突如其来地，以色列政府愿意放弃一切。外部，压力的确在增加；但国内并没有树立真正的抵抗意志。相反，充斥的是愤世嫉俗、虚无主义和失败主义。在战后的那个冬天，在那几个月里，他意识到，有些东西错得离谱，有一些意义深远的东西已经消失。在过去的几年里，以色列经历了一种精神得衰退。世俗的、开创性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经被自鸣得意的犹太复国主义所取代，被一种世俗的薄弱意志所攫取。这是一种文化方面的同化，以色列的精神已经向西方投降。而战争把这些潜在的进程全部摆上了台面。的确，第三圣殿没有在这一次倒下，但当它遭遇下一个挑战时，它也许就会崩塌。所以，救赎的使命现在落到了信

徒的肩膀上。火炬已经传递到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手里。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使命，就是在山的顶峰点燃圣火。一个撒玛利亚山地的定居点不能解决问题。但是一个定居点是完全可行的。它将引领犹太复国主义迈向全新的方向。

伊曾告诉我，对于建立奥弗拉，虔诚教徒集团有一个战略上的理论基础：最终，以色列的永久疆界将跨过犹太人开挖的最后一条沟渠。他们相信，只有设立犹太人定居点的领土才是属于犹太人的。但伊曾承认这个鹰派的战略基础仅仅是他们雄心勃勃的事业的一小部分。“纳布卢斯，撒玛利亚的首府，是以色列土地上最重要的一座城市，”他这样告诉我道，“征服耶利哥后，就在这座城市，约书亚更新了与上帝的盟约。以伦摩利附近就是亚伯拉罕进入以色列后建立第一个圣坛的地方。在以伦摩利，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土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To your offspring I shall give this land.）所以，神的启示就发生在以伦摩利和纳布卢斯。在第一次返迁中，以色列人民所移居的以色列土地就是撒玛利亚山地。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没有爬过撒玛利亚山脉。它仍然待在平原。赎罪日战争后，犹太复国主义的重生和复兴不仅仅在于获得约旦河西岸高地的战略控制，同样还包括将以色列的人民引领至以色列的山地。从攀爬山脉的过程中，从以色列国家没有一种信仰深度就不能维持的认识中，我们将复兴犹太复国主义、拯救以色列。从平原犹太复国主义必将灭亡的认识中，我们将复兴它。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我们祖先所走的道路，我们必须返回我们祖先的土地，返回我们失去的山地。我们必须把犹太复国主义带回撒玛利亚山地，同时把撒玛利亚山地带回至犹太复国主义。”

沃勒斯坦是平淡的，而伊曾却是令人难忘的。在他朴实的奥弗拉的家，在他简陋的客厅里，他的话深深触动了我。尽管，我拒绝他的世界观，鄙薄他的行为，我却不能对他的话语无动于衷。令人惊讶的是，我认识到了拉着他走向奥弗拉的强大力量。我理解他所说的平原、山地，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带着惊惧，我意识到，他的犹太复国主义与

我的犹太复国主义是有相同之处的。

透过伊曾客厅的矩形窗户，我可以看到巴力哈措尔山。它的峰顶是撒玛利亚的最高点：1 010米。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空军选择在这里设立一个高度发达的远程预警雷达站。因为我与伊曾面对面地交谈，我可以透过他那边的窗户看到那个巨大的、科幻小说式的金属球体，正扫描并保护着以色列的天空。除了战略重要性，这个雷达站还具有历史意义。它为伊曾在撒玛利亚获得立足点提供了理由。1974年冬天，他23岁时，身材颀长、皮肤白皙的伊曾成功成了建造秘密雷达站的耶路撒冷承包商的转包商。伊曾的任务就是在巴力哈措尔雷达站四周竖起安全篱。于是，这位独出心裁的狂热分子得以召集民族主义的青年，组建了一支小的工作队，每天来到山上竖起围栏。这就是为什么，伊曾有理由要求找一个地方供篱笆工人睡觉。这就是他成功找到的一条通向禁地的路径。

伊曾的语言艺术是平静、简洁、不带感情的。他总是十分注意，不过多地赞扬自己的功绩，不自吹自擂。但当他告诉我他第一次上山的那段日子时，他的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芒。而当我说他第一次上山时必定感觉到了上帝的显灵，他没有反驳我。“你知道，我不喜欢夸夸其谈，”他说，“我也从不喜欢健谈者。我总是说，‘去做’。但你是对的，就在那个冬天，我理解了我们的角色。突然地，一切都明晰起来，以色列的土地在召唤我们，上帝在召唤我们。一个宗教使命强加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使命点燃了我们的躯体和灵魂，点燃了我生存的全部意义。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我都在处理细枝末节的琐事：给路虎车加油，装载金属管和铁丝网卷。然而，当路虎驶上巴力哈措尔山，山顶映入眼帘，我可以与天国对话。我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正在做一切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所以现在请行使你的职责。’是的，我在与上帝对话。我向上帝说以色列的子民们曾经说过的话，当他们用篮子装着头批成熟的水果并摆在神殿，他们这样对神说：‘这里，我们已经做完了我们的这一份。请做你的那一份，庇佑你的子民，你的以色列。’”

1975年年初，所有事情都碰到了一起。约尔·宾·努恩厌倦了虔诚教徒集团在约旦河西岸举行的喧嚣的示威游行。平夏斯·沃勒斯坦正在寻找一个渗透撒玛利亚的可行方法。耶胡达·伊曾知道工作队的借口不能持久。这三个人都意识到，是时间采取不同形式的行动了，谨慎而机智的行动。

起初，伊曾打算在巴力哈措尔山西边的鞍状山口建立定居点。他想把奥弗拉建在上帝赐予亚伯拉罕土地的地方。但他务实的同伴说服他这个愿望是徒劳的。突进撒玛利亚的唯一方法就是占领位于艾因耶卜鲁德已废弃的约旦军事基地，然后突袭其他非私有的、已经建有建筑的土地。在动力消散之前，在青年们丧失希望之前，在定居者运动瓦解之前，前进的唯一途径就是立即采取行动。

行动被策划得像一次军事进攻。工作日结束了，伊曾的工作队下了山，抵达山下的废弃基地。这时，沃勒斯坦率领耶路撒冷的队伍即将抵达。与此同时，虔诚教徒集团的领袖，哈南·波拉特正在与同情定居者运动的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联系，这样，当军队发现基地被入侵后，他会给军队施加压力，令军队视而不见，接受这一事实。在夹缝中，建立奥弗拉，成为既定事实。

1975年4月20日，星期日，沃勒斯坦率领一支小型的车队从耶路撒冷的虔诚教徒集团办公室驶向撒玛利亚。在下午晚些时候，伊曾的工作队走下巴力哈措尔山。傍晚时分，两支队伍在艾因耶卜鲁德基地汇合，并占领了基地。几个小时后，地方军事指挥官抵达基地，命令进攻者们离开。伊曾和沃勒斯坦拒绝了，他们宣称，他们的行动代表国防部的利益。当这两人被带到军队设在拉姆安拉的总部时，波拉特对佩雷斯以及他的三个鹰派副官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深夜，佩雷斯指示军队既不要帮助定居者，也不要驱逐他们。伊曾和沃勒斯坦立即抓住了这些含糊指示的历史性意义。在军队总部，他们找到了一瓶葡萄酒，举杯庆祝。午夜，这两个年轻的领导人被赶出基地，他们坐在军用吉普车里，带着胜

利返回艾因耶卜鲁德。意志坚定、足智多谋、狡猾诡诈，他们战胜了以色列政府。在奥弗拉，他们为20世纪的最后一个殖民工程铺设下地基。

1975年3月初，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了特拉维夫的萨沃伊酒店，八名客人遇害。联合国没有谴责这次袭击，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看到了他国际地位的上升。3月底，亨利·基辛格促成埃及和以色列达成一个临时协议的意图宣告失败。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指示他的国务卿重新评估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至关重要的美国——以色列联盟陷入危机。与此同时，美国对东亚的政策也正面临崩溃的边缘。1975年4月18日，红色高棉（Khmer Rouge）占领了金边[注]。1975年4月20日，老挝共产党的最后一波攻势展开。1975年4月30日，南越失陷。美国的直升机从西贡的美国大使馆屋顶救出了最后一批美国公民。在以色列，民众普遍认为，西方也将同样放弃以色列。西方的软弱，以色列的软弱，而国际社会的孤立非常明显。很多以色列人民担忧着在西贡上演的事件将同样发生在特拉维夫，那么以色列的命运将与南越相似。无怪乎出现了紧紧抓住奥弗拉的本能反应。不仅是胡言乱语的右翼分子，很多现实主义的中间派也将奥弗拉视作对正滑向深渊的国内与国际环境的一个象征性回应。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以色列官员——高级的和低级的——暗中支持奥弗拉；这就是为什么，主要的公众人物也支持奥弗拉并为它捐献财物。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来自公众的海潮般的支持将奥弗拉从一个临时的营地，变成了一个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定居点。

当平夏斯·沃勒斯坦描述早期奥弗拉的时候，他的说话方式就像一个企业家。他告诉我，最开始，他们用塑料板挡住约旦基地建筑的破损窗户，临时搭建起一间厨房、一个食堂，搬来了水罐，配置了用化学剂清理的简易厕所。然后，在岩石地带铺设了道路，搭起帐篷，将长长的军营分隔成小型的家庭单元式住宅。之后，他们非法地从区域内（巴勒斯坦）的水资源系统引来清水，又从区域内（巴勒斯坦）的电网里抽取出电力。他们挖了一个化粪池。他们建立了一所田间学校、一个五金车

间、一个计算机程序设计工作小组以及一个生产飞机舷梯的工厂。他们引进了第一座活动板房。然后他们进行了一整晚的讨论，讨论奥弗拉的未来规划。他们决定，奥弗拉不是一个基布兹，也不是莫沙夫，或者一个睡房社区[注]。它将鼓励个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允许拥有私人财产。奥弗拉将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定居点社区。

耶胡达·伊曾说起早期的奥弗拉时就像一个浪漫主义者。“奥弗拉的第一原则就是所有的居民都要在这里工作，”他告诉我道，“第二条原则就是阿拉伯人不会在这里得到永久性的雇用。第三条原则是奥弗拉要拥有一个强大的农业基础。”对于伊曾来说，农业是奥弗拉的关键。他那时相信，现在也这样相信，除了在土地上劳作，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坚守这片土地；除了与土地产生直接的肢体接触，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回到这片土地。这就是为什么，他用他赤裸的手清理出这片土地的第一块地皮，在第一个夏天种上黄水仙，在第一个秋天种下樱桃树。当定居点日益强盛后，他便专注于他的樱桃果园，他坚信，这是上帝要他做的事。

当我问及阿拉伯人，无论是沃勒斯坦还是伊曾都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他们难道看不到定居点附近的阿拉伯人吗？不，他们当然看到了他们。他们难道不知道奥弗拉周边尽是巴勒斯坦村庄，西尔万、马扎拉特、阿沙基亚、艾因耶卜鲁德、巴亭和塔伊比赫？不，他们当然知道这些村庄的存在。难道他们不明白嵌在犹太人的奥弗拉与它周边稠密的巴勒斯坦人口之间的内在矛盾？不，他们当然知道。

沃勒斯坦告诉我，1975年的阿拉伯并不是今天的阿拉伯。那些村庄狭小、贫穷，非常原始。它们的存在感非常薄弱。村民们也与敌视和暴力无缘，他们没有显现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迹象。在最初的几年里，奥弗拉的定居者们频繁地拜访这些村庄，与村民们交易，他们并不觉得这些当地的阿拉伯人会以任何方式威胁到他们。相反，那时候的村庄都有一种原始的美，这种美把《圣经》里对山脉的神奇描述更放大了，历史上，奥费拉曾安置在这片充满情感的地域。这些阿拉伯的村庄看起来

并非是真正的障碍。

另外，伊曾更了解这一点。他会讲阿拉伯语，与阿拉伯人一同生活了很长时间，并购买了阿拉伯人的土地。他甚至对阿拉伯人传统的生活方式有一些同情。他尤其赞赏这一点：不像世俗的城市犹太人，乡村的阿拉伯人将自身维系于与土地的紧密联系。我感觉，伊曾从一开始就清楚，在奥弗拉和这些村庄之间注定会有一场战争。他相信，战争结束后，这些村庄将会消失。这位历史主义思想的民族宗教领袖从未忘记艾因哈罗德。他确信，拯救奥弗拉的正是某种形式的未来灾难，就像1948年的灾难席卷艾因哈罗德一样，它即将降临，席卷约旦河西岸。

然而，当我倾听沃勒斯坦和伊曾的讲述时，我意识到，他们两人都没有一个关于阿拉伯问题的定义完备的学说。当他们在撒玛利亚定居，与其说他们是邪恶的，不如说他们是无知的。他们看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的软弱，意识到以色列的危机不仅仅在政治上，还在精神上。他们感到有义务解决以色列的危机，但他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荒谬的，完全忽略了人口现实。沃勒斯坦和伊曾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没有考虑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他们年轻而叛逆，他们是青少年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热衷挑战禁忌、越界、挑战权威。他们从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方向，他们也从未意识到他们将造成什么样的混乱。他们在没有考虑后果的情况下，建立了奥弗拉。

平夏斯·沃勒斯坦担任奥弗拉的秘书长已经有四年了。他领导着奥弗拉的建设，从被约旦遗弃的基地，扩张到周边的巴勒斯坦人私有的田地。他使奥弗拉的人口翻了一番。他在奥弗拉建立起一间幼儿园、一座学校、一个小型超市、一间邮局以及一座犹太教堂。在他的授意下，奥弗拉铺设了一条公交车路线，架起了电话线。他发起并规划了奥弗拉的第一个有50栋住宅的社区。1977年，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执政后，沃勒斯坦说服以梅纳赫姆·贝京总理为首的内阁承认奥弗拉在法律上的合法性，承认它是一个合法的定居点。被认可的结果就是政府各部

门鼎力支持奥弗拉的建设：住房、医疗、福利、教育和防御工作。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非法的据点变得稳定、可行。奥弗拉成了定居者运动的召集地，定居者周刊的发源地，是定居者政治机构的组建地。所有最初的定居点现在成了所有定居点的首都。它是定居者运动和定居点现象的标志。

然而，平夏斯·沃勒斯坦想要更多。一个奥弗拉是不够的。就像虔诚教徒集团的其他领导人，他在1979年痛心地看着以色列右翼政府拱手让出西奈沙漠给埃及，借以换取和平。他看着以色列的疆域急剧收缩，也许很快就要退到约旦河西岸。即使奥弗拉是定居点成功的一个例子，但它也不能阻止自己走下坡路，不能阻止它的创始人计划终止它的意图。这就是为什么，沃勒斯坦认为有必要接管约旦西岸的广大地区。沃勒斯坦试图通过建立数十个奥弗拉，阻止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协议的签订。他这么做了。1979年，沃勒斯坦被任命为本雅明区的市政局负责人。在本雅明，沃勒斯坦兴修公路，创办工业园，建立犹太社区。他精力充沛，富于创造，精明强干，成功地赢得了以色列政府对虔诚教徒集团的梦想的认可和推动。在他从政的这28年间，沃勒斯坦建立了40个定居点，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定居者的人口从1 000人增加到43 000人。与此同时，沃勒斯坦在耶沙委员会[注]扮演着重要角色，迫使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并支持140个定居点和数十个非法定居点。他协助成千上万的定居者进入占领区。成功建立奥弗拉定居点后，沃勒斯坦意识到，定居点的建立没有任何阻碍。在1973年之后的以色列，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于是，沃勒斯坦得以建立一个又一个奥弗拉。一个奥弗拉，十个奥弗拉，一百个奥弗拉。同他的朋友和同伴一起，他领导虔诚教徒集团的革命走向体制化。他创造了一个新的人口政治的现实，而这个人口政治现实重新定义了以色列人，改变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进程。

曾经，耶胡达·伊曾同样想要更多。他在自己的樱桃果园工作了四年。时至今日，他仍然可以高兴地回忆起拖拉机的轮链第一次在奥弗拉的土地上发出刺耳的噪声。他从耶斯列山谷带回了樱桃树，用桩钉和白

色的绳子划出果园的界线。他回忆，他如何为树苗挖掘树坑，又把水灌注到坑里。他在果园的第一个区域种植欧洲酸樱桃，第二个区域种下日本李，第三个区域则是欧洲甜樱桃。之后他又开垦了第二个果园，就在20英里之外的地方，种下了桃子、油桃和葡萄。从种植初始一直到第一次收获，整整四年。他向我讲述，当经过精心装饰的马车驶入奥弗拉，装载他的第一批果实时，他是如何的欣喜。

但伊曾同样意识到，即使奥弗拉已经在这里扎根，但它的成功是局部的，并且是有限的。梅纳赫姆·贝京总理背叛了以色列，坚持让以色列人归还西奈半岛。平原上的以色列人将不能站立在以色列的土地上。这次的撤退是充分的撤退，似乎很明显，犹大和撒玛利亚都有可能沦陷。美国主义不过是新的希腊精神，它使以色列非犹太化，使它变得软弱、空洞、腐烂。如果要拯救以色列，只能以一种新的观念、新的行动、新的事件，这些新事物将改变以色列的历史。

圣殿山一直令胡耶达·伊曾神魂颠倒。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跟随父亲前往西耶路撒冷边境，朝拜曾经被占领的圣殿遗迹。直到六日战争爆发，伊曾一直迷恋着圣殿山。甚至当他在努力建造奥弗拉的时候，他一直认为，奥弗拉只是通往圣殿山的这条路的其中一个站点而已。“圣殿山是这片土地的中心点，”伊曾这样告诉我，“然而它却在非犹太人的手里。只要阿克萨清真寺[注]和奥马尔清真寺[注]仍然矗立在圣殿山上，以色列就无法获得救赎。”

1979年，当沃勒斯坦开始在本雅明市政局工作的时候，伊曾也开始在耶路撒冷会见约书亚·本·肖山（Yehoshua Ben Shoshan）、梅纳赫姆·利夫尼（Menachem Livni）和沙卜泰·本·多夫（Shabtai Ben Dov）。四人达成一致意见，认为任何伊斯兰的令人厌恶的事物都不应出现在在圣殿山上。圣殿山是上帝和以色列盟约的象征，是犹太人生命的根源和中心。在伊曾等人看来，圣殿山将会成为以色列犹太人的复兴之地。只有圣殿山的激动人心的行动才有可能重新开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以，

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是正确、纯洁的，真正的以色列。

……

沃勒斯坦当时不知道这一情况，直至1980年，他从伊曾那里得到了部分信息。他们仍然在奥弗拉居住，彼此的住宅紧邻，仍然是奥弗拉的道德领袖。沃勒斯坦钦佩伊曾的精神，伊曾也尊重沃勒斯坦的工作。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所从事的是两项截然不同的事业。沃勒斯坦决心要建立越来越多的定居点，这是他的工作，也是他正在做的工作。但是，伊曾确信，沃勒斯坦建设的定居点远远不够。定居点是很重要，但是，它们并没有解决核心问题。核心问题的解决需要深层次的内在变革，需要一场革命。这就有必要让以色列王国替代以色列国家。西方的民主制必须让位于伟大的犹太人法院、评议会。全能的上帝将会介入现代史，拯救他的以色列，拯救他的子民。

在这一点上，相对于与沃勒斯坦的交谈，我与伊曾的交谈之间则显得比较趣味相投。之前，耶胡达·伊曾从未像现在这样说起圣殿山的计划，流露出他那时内心深处的希望和恐惧。“当我们建立奥弗拉时，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斗争就时刻准备着面临真理和谬论的对抗，”伊曾告诉我，“政府试图在撒玛利亚建立犹太自由区是一个错误。我们与政府之间的斗争是善良与邪恶的斗争。犹太人的传说教导我们，这样的斗争或许会以令人惊讶的结果结束——邪恶自己会说出‘阿门’。被击败后，他将被迫面对真实。这也是这情况下会发生的事情。即便我们遭遇的势力更强大，但最终，我们的真理会取得胜利。那时，即便是工党的领导人，也会说出‘阿门’。

“奥弗拉的成功带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它增添了我们的信心和底气。接下来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由于奥弗拉的成功。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都前来拜访我们，加入我们。对于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们感到惊讶。突然，他们看到山顶有灯光在闪烁，随之，我们点燃了奥弗拉的灯，点燃了埃隆莫雷赫的灯，点燃了希洛的灯，点燃了贝

特艾的灯。当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仍在低地，我们已经爬上了高山，在山顶燃起越来越多的篝火。

“但我仍活在恐惧中，安全问题远远没有解决。我们所建立的根基还没有稳固，一切看起来似乎是脆弱和容易摧毁的。与埃及可耻的和平协议、政府的口是心非、工党与初衷背道而驰。如此种种，我觉得我再也不能相信国家领导人，我感受到了背叛。所以，我必须反对以色列国家，他们不再是以色列民族的使者。我不得不靠自己为以色列的民族争取权益和利益。因为没有真正的领导权，没有真正的国家，所以，责任就落到了我的身上。

“70年代末，我被推荐阅读沙卜泰·本·多夫的著作。本·多夫准备了一个建立以色列王国的有效计划。从他那里，我认识到，定居点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的迫切需要是替换以色列以前所吸纳的外来价值观。欧美观念必须废除。我们需要接受从以色列的律法书中直接演化出来的观念。我们必须把民主付诸脑后，回到起点。我们必须发起一场以色列王国的革命。

“我知道圣殿山是一个关键点。这座山是我们在天堂的祖先与我们联系的地方。事实上，圣殿山不在我们的手里，就是证明我们沉沦有多深的最确凿证据。圣殿山上的清真寺是对以色列人的侮辱，是对以色列的历史的侮辱，是对上帝的亵渎。摧毁清真寺将使我们通往天堂，为评议会和神殿铺设一条圣洁、神圣的道路。它将结束腐朽和落后的时代，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以律法启示的国家代替世俗的以色列国家。

“第三次世界大战？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徒游行？数以万计的人员伤亡？我想象过这些场景，但我得出结论是，它们都是悲观和危言耸听的说辞。我意识到，当苍穹崩塌时，地狱也会崩塌。但我没有想到，数以千计的坦克会开进以色列，数以百计的导弹会对准以色列。但我同样意识到，即便我错了，这样的风险也是值得的。本·古里安认为，以色列的根基证明了战争的合法性。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对我来说，这一

点是毋庸置疑的：建造一个神圣的以色列，使对抗所有以色列的敌人的战争合法化。”

……

80年代初，当平夏斯·沃勒斯坦调动民主以色列越来越多的资源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建立定居点时，耶胡达·伊曾也动员越来越多的犹大和撒玛利亚的定居者发动一场革命，企图推翻民主以色列。当沃勒斯坦对约旦河西岸的殖民僵局施加影响时，伊曾试图在圣殿山点燃一场末日大决战。奥弗拉的成功让这两个人更加肆无忌惮、野心勃勃。当善于实践的沃勒斯坦，成功地让以色列共和国成为大以色列的一个分包商时，以救世主形象出现的伊曾则是希望重建一个以色列王国，以取代以色列共和国。

时至今日，当他重新回忆三四十年前的大事件时，沃勒斯坦仍然精力充沛、他的讲述详细又有说服力。他记得自己规划的每一条路，自己建立的每一个工业园，自己经手的每一笔政府财政预算。修建的塞弗里路、每个工业园和政府拨给的每次财政预算。他拆东墙补西墙，推波助澜，让以色列的主流政治家们追随虔诚教徒集团。

伊曾在进行沉思和反省。他悄悄告诉我，他如何得出结论，说时机已到。并不是一个或一千个奥弗拉就能解决问题。所以，他经营着樱桃园，从阿拉伯人手里买下土地，规划奥弗拉的犹太教堂，与虔诚教徒集团的领导人进行每周例会。但是他的思维却在别处。他的心与圣殿山同在。他收集古老的雪松圆木，这些雪松圆木据说以前是第二圣殿的一部分。他想象着圣殿，思索着圣殿，在脑海里重建着圣殿。他确信，不挽回圣殿，就不会有救赎。因为他从来没有被非常规的思维所推延，那么这次，他同样也不会被占据头脑的非常规思维所推延。因为他一直厌恶那些光说不做的人，因此他知道他必须行动。他在夜晚爬上了橄榄山，观察圣殿山，研究它的防御体系。他绘制了地图，获得了航拍照片，尽可能收集与之相关的情报。他还制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他动员了一些

男人，指导他们拿到炸药。他抵达了一处地点，在那里他预先安置了4个爆炸装置（每个20公斤），它们将炸毁圆顶清真寺的四根柱子。然后他抵达另一处地点，那里有12个小型的爆炸装备（每个7公斤），它们将会炸掉环绕在圆顶清真寺周围的12根柱子。他准备就绪。“在我的脑海里，”伊曾告诉我，“我已经准备好看着圆顶清真寺在巨大的扬起的尘土中轰然崩塌。然后不再困惑，以色列不再结巴，最终的结果显而易见，旧篇章结束，新的篇章即将开启。一个时代走到尽头，另一个时代刚刚开始。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因为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该做的，上帝即将开始做属于他该做的那份。”

1984年春，以色列秘密情报组织抵达奥弗拉，逮捕耶胡达·伊曾。社区竭力反抗。官方公开指责伊曾的行为，但许多人表示了支持。很快，伊曾被曝他不单单是一名奥弗拉的居民，而是现在臭名昭著的“地下犹太人”[注]恐怖组织的一员。部分犹太恐怖主义分子就住在奥弗拉。由这类恐怖主义分子设计的一系列连锁事件已经被成功实施，这些事件就是在奥弗拉策划的。从奥弗拉传出指示，恐怖分子在三个巴勒斯坦人市长的车上放置饵雷，致使两个市长失去了双腿。在短短五年之内，巴勒斯坦人定居的奥弗拉就成了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培养意识形态上的犹太谋杀犯。奥弗拉成了孕育好战的弥赛亚主义的家园，成了孕育激进的、相信可以用无限制手段改变这片土地的学派的家园。

伊曾领导的地下组织的暴露震惊了以色列。尽管现在，以色列正在从这种震惊中慢慢恢复。现在，即使是奥弗拉的定居者也意识到，弥赛亚主义是放射性的，形而上学与政治的结合将导致疯狂。在最初的风暴平息后，狂热分子的方法被拒绝。大多数的奥弗拉居民选择了实用主义而舍弃了原教旨主义，选择自我约束而舍弃极端主义，选择了支持沃勒斯坦而放弃了伊曾。在扩大了奥弗拉的同时，定居者也增强了它的实力。定居者获得了更多土地，找到了新的邻居。作为一个社区，它在巴勒斯坦人的两次暴乱中存活了下来[注]。他们承受痛苦，埋葬了死者。他们承受随时发生的暴乱，承受生活在一片有争议领土上的持续的不确定

性。的确，有时奥弗拉的暴徒们会自行执法，并对邻近巴勒斯坦村庄进行野蛮攻击。即使是沃勒斯坦自己也卷入了一起枪击事件——当一个巴勒斯坦小伙子用石头砸他的车，他开枪把小伙子打死。但是，作为一项规则，奥弗拉不会公然地反抗国家。奥弗拉的推进方式不是对抗国家和法律，而是利用它们。采用旧工党的逐步逼近法，奥弗拉变得越来越强大。1983年，它只有500名定居者，到1995年的时候，它的定居者增加到1 200名。而今天，人口已经接近了3 500。

然而，当我和耶胡达·伊曾坐在一起，听着他的讲述，我知道，他仍然是奥弗拉基因的一部分。因为伊曾是正确的：奥弗拉是无用的。像这样的定居点毫无希望。尽管沃勒斯坦修建了纵横交错的道路，但这个定居点仍然是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孤岛；尽管沃勒斯坦兴建了社区、工业园、公路和桥梁，定居者仍然是犹大和撒玛利亚的少数民族。由于国际组织永远不会承认它的合法性，这个定居点就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上；由于平原上的以色列人永远不会接纳定居点，他们就只能是偏远和孤立的，生活在山那边的黑暗里。就像阿尔及利亚和罗得西亚[注]，他们将无法生存。他们正走向死路。

善于实践的沃勒斯坦没有想到解决方案。他在山脉间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但这种胜利是一种皮洛士式的胜利[注]。他所建造的房子没有持久的地基，他所栽下的树木没有深深的根系。拯救沃勒斯坦不朽工程的唯一办法就是采用耶胡达·伊曾的方式，对奥弗拉的未来抱以信心的唯一途径就是相信大灾变降临，或者相信神的干预，或者两个同时相信。伊曾诚实地说出了这一点，但奥弗拉的每一个聪明人都必须知道，他们在自己的心灵避风港埋藏着对一场伟大战争的信念，通过战争他们将赢得对自己的救赎。

毫无疑问，将会有一场战争。因为1948年和1967年，因为奥弗拉，将会有一场战争。但战争不会拯救奥弗拉，也不会拯救以色列。沃勒斯坦、伊曾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所创造的现实，将以色列拖入了一个困境，

缠绕的死结无法解开。定居点已经在以色列的脖子上套上了绞索。他们创建了一个不堪一击的人口、政治、道德、司法的现实。而现在，奥弗拉的非法性玷污了以色列本身。就像癌症那样，从一个器官扩散到另一个器官，直至危害到整个身体。奥弗拉的殖民主义让世界将以色列本身看作殖民主义的实体。但是，因为21世纪没有殖民主义实体存在的余地，所以西方逐渐抛弃了以色列。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和欧洲的开明犹太人为以色列感到羞愧。这就是以色列内部争执不休的原因。虽然奥弗拉创始人的初衷是希望以色列变得更强大，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却削弱了以色列。因此，当一场大战真正爆发时，它将邂逅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斥的、支离破碎的以色列—— 一个几乎不能保护自己的以色列。

在这个晴朗的冬天，一切都是安静的。巴力哈措尔山的雷达站扫描着蔚蓝的天空。奥弗拉白色的房子和巴勒斯坦人西尔万村庄的石屋两两相望。远处坐落着葡萄园、樱桃园、灰色的岩石、土石的山丘。一千年的记忆，一千年的沉默，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耶胡达·伊曾继续诉说着。他跟我讲述他出狱后推行的项目，新耶路撒冷的建设计划：一个没有清真寺也没有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一个拥有第三圣殿的耶路撒冷。平夏斯·沃勒斯坦也继续讲述，“我们没有犯错，”他这样说道，“我们建设了一个辉煌的工程。我们做了祖先在哈尼塔、在艾因哈罗德曾经做过的事情。我们继承工党的精神，使用工党的方法。在20世纪最后的25年里，我们在撒玛利亚做了工党在20世纪第一个25年在艾因哈罗德做过的事。”

“但这就是争论的焦点所在，”我打断，“问题就是，奥弗拉究竟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良性沿袭，还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恶性变异？”当然，答案就是——它两者兼备。一方面，二者的精神和行为方式明显是相似的。没有一个公平的观察员会否认这个说法，奥弗拉的确是艾因哈罗德的后裔子孙。但另一方面，它们的历史背景和观念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奥弗拉不是艾因哈罗德的延续而是偏差，是艾因哈罗德

的一个怪诞的轮回。

沃勒斯坦并不理解我的说法，所以我解释给他听。我告诉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如履薄冰。一方面，它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殖民主义事业。它打算以驱逐一个民族的方式拯救另一个民族的生命。在起初的50年时间里，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它小心翼翼地避免和殖民主义扯上关系，试图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困难。非常肯定的是，那时的它是一个民主的、进步的、启蒙的运动，与世界其他进步力量是合作关系。它以伟大的明智解决了它的核心矛盾。它成功地经历了1948年的大战，成功地变强大，以一个犹太人的民主的民族国家的姿态，成功地自战争阴影中走出。它明确了国家边界，犹太人成为国民构成的主体。它已经将原本的移民社区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冲突变成了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我们避免了与阿尔及利亚和罗得西亚相同的命运，犹太复国主义将被视为一个拙劣的殖民工程。

我对沃勒斯坦说：“但在1967年和1973年之后，一切都改变了。自我约束和历史主义的洞察，这些建国第一年的特征，开始逐渐褪色。你的殖民者利用了这份虚弱，利用了战争造成的政治真空。你滥用了工党的缺点和利库德集团的鲁莽。虽然你认为自己比其他人都聪明，但你错了。你错误地以为，1975年你在奥弗拉做的事就是1921年祖先们在艾因哈罗德做的事；你错误地以为，就像一场革命运动可以圈占未定义的土地一样，一个主权国家也可以占领别人的领土。你没有领会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供给房政策的深邃智慧，也没有领会20世纪60年代迪莫纳工程的初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你领回了巴勒斯坦人，而本·古里安想尽办法请他们离开。你将国家之间的冲突转变为移民社区与本土以色列社群之间的冲突。因为这些事，你让一切都陷入危险之中。你的能力固然引人注目，但你所做的种种事情无一例外都是完全错误的。你渴慕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和它的尊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否定了犹太复国主义的逻辑，损害了它的利益。你为我们带来了灾难，沃勒斯坦。从我们

这方面来说，你的行为是历史主义的自杀行为。”

我带着愤怒与沮丧走出平夏斯·沃勒斯坦的房子，来到伊斯雷尔·哈雷尔（Israel Harel）的家。哈雷尔是我在《国土报》的同事，是一位专栏编辑，也是跟我讨论国家未来的长期搭档。他和蔼、聪明而又低调，不像沃勒斯坦和伊曾，他从来不会目中无人或者固执己见，而是深思熟虑、忧肠满结。1967年，他是抵达圣殿山的第一批伞兵中的其中一员；1973年，他又是穿越苏伊士运河的第一批伞兵中的其中一员。当他还是年轻学生的时候，它是“伟大以色列”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当他成为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在奥弗拉建立后就定居在这里。他创办并编辑面向奥弗拉定居者的周刊杂志《Nekuda》，建立定居者的居民委员会——耶沙。虽然我喜欢哈雷尔并且尊重他，但我现在对他非常残酷。“我越是观察奥弗拉，越是思考奥弗拉，我更是得出结论：你简直是疯了。你是一个狂热分子，头脑发热蒙蔽了你的眼睛，一种集体的民族宗教狂热令你看不到你周围的阿拉伯人。你的种族心态和荒诞不经的思想导致你把以色列引上一条不归之路。”

我的激动对哈雷尔没有任何影响。透过他厚厚的眼镜，他直视着我的眼睛，回之以令人吃惊的坦率。“任何一个来到奥弗拉谋生的人都被要求提供一个答案，”他说道，“我们最初来到这里时，也被要求答复。”于是他列出了四条答复：

1. 从苏联或者美国来的一波移民高潮即将来临，这将解决人口问题。

2. 他们自己一致认为，阿拉伯人将会离开，前往约旦，同那里的阿拉伯人住在一起。

3. 以色列国家不会通过武力改变它的人口，但是将鼓励个体的阿拉伯人移民到阿拉伯国家。

4. 将会出现一场类似1948年那样的战争。

“那么，我还是对的,”我大声说道，“奥弗拉的假设就是阿拉伯人不会在这里逗留。它希望来一场世界大战，让阿拉伯人消失。”

哈雷尔礼貌地忽略了我，继续说道：“我们一直都知道，有一天，我们将被迫离开这里。虽然从没有人谈起。它隐藏在黑暗的角落。但是，从奥弗拉建立的第一天，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我们还知道其他一些事情。这里的人们相信，一个大事件将会发生，就像1967年战争和1948年大战那样。而这件大事情将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它不会让我们的奋斗付诸东流，它会让以色列人相信我们，并且加入到我们当中。特拉维夫的人们将会明白，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空虚。没有我们，他们就没有根系，没有深度，没有生活。大量民众将蜂拥而至。到了那个时候，当1 000 000犹太人在山脉间定居，以色列将绘制新的地图，伴随着新的观念。开创于奥弗拉的伟业，将会再次使以色列犹太化、锡安主义化。”

当我听完哈雷尔所说，我才理解，虔诚教徒集团之所以强大，乃是基于这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解放运动。通过前往犹大和撒玛利亚，它试图将小资产阶级的、保守安息日的社会转变为一场革命运动；通过建立定居点，它试图将犹太复国主义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叙述的边缘转移到中心。这就是为什么，对奥弗拉的渴慕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宗教的，而是发自肺腑的。只有在以色列主权国家边界外的那些有争议的领土，这个民族宗教主义的部落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只有这些未被定义的土地上，它才能定义自己；只有在奥弗拉，这些民族宗教主义的青少年才能高举他们的双手，在世界上找到他们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拒绝看到奥弗拉的愚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闭眼不看奥弗拉即将走向终结的现实——就是当下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明白，在21世纪，奥弗拉将不复存在。

目前，奥弗拉还在这里：3　500人的庞大人口基数。当我离伊斯雷尔·哈雷尔的家，漫步在商业中心，参观日托托儿所，参观幼儿园和学

校，生动活泼的一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里的生活是美好的，天空万里无云。只要你不抬眼看邻近的巴勒斯坦村庄，只要你不知道，你脚下的土地是如何获得的；只要你不知道，一切过后，这里是如何维持着如此的平静。

这就是奥弗拉所欺骗我们的事情。从一开始，它就是不被允许存在的产物，被孕育于国家法律、国家边界、国家主权之外。时至今日，奥弗拉仍游离在国际法之外，毫无国际背景，缺乏国际援助。奥弗拉存在着，同时又是虚无的。显而易见，迟早有一天，奥弗拉的内部逻辑将会被曾经反抗和忽视的外部逻辑摧毁。

我想到在20世纪60年代，罗得西亚的农民在他们的大农场里感到十分安全。他们所拥有的实在是太好了，他们看不起批评家和怀疑论者。在他们的眼中，他们的现实是如此稳固，以至于他们看不到它是多么脆弱。他们错误地相信，他们富裕的虚拟现实是持续的、可供生存的现实。我想起加沙地带的尼泽尔哈扎尼定居点，就在我拜访它不久之后，它在2005年的解约中被疏散、拆毁了。我记得，当我听到尼泽尔哈扎尼毁灭的消息时，我是多么恐惧。它就像奥弗拉，繁荣且自信。但推土机把它夷为平地，一天之内，它便消失了。这一秒它还存在，下一秒就消失不见。

我同情奥弗拉。我对奥弗拉抱以强烈的同情。以至于我因它而动怒。

奥弗拉的档案室就如药房那样干净、整洁。在其中一个白色盒子里，我找到一份来自耶胡达·伊曾的久远声明：“我们真正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精神强大、政治强势、令人骄傲的王国。”在另外一个白色盒子里，我找到一幅破烂的地图，标注着坐落在山岩之间的约旦艾因耶卜鲁德基地的16栋混凝土建筑。一张黑白照片上，一座孤独的阿拉伯石头房屋俯瞰着第一批定居者占领艾因耶卜鲁德。在8毫米的镜头下，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妇人正在打扫被遗弃的军营。相片中还有一辆婴儿车，一

个水箱，晾晒的衣服，穿着短裤和背心的年轻男子正在大力建设，穿着T恤的少妇粉刷着白色墙壁。23岁的耶胡达·伊曾戴着一顶红色的钟形帽。26岁的平夏斯·沃勒斯坦愉快地与同伴交谈。历史记录了属于1975年4月的天真和盲目，登上山顶点燃篝火的决心。未来逼迫上帝介入历史，拯救他的子民，拯救他的以色列。

---

1. 绿线，指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前的实际停火线。
2. 虔诚教徒集团，以色列极端狂热的民族主义宗教组织。
3. 柬埔寨首都。
4. 形容一个社区失去社交、置业、娱乐等社区功能，对居民来说，这儿的唯一功用便是晚上用来睡觉。
5. 代表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犹太定居者利益的组织。
6. 位于耶路撒冷旧城。
7. 位于耶路撒冷旧城，也叫圆顶清真寺。
8. “地下犹太人”，主要是由定居点犹太人组成、由虔诚教徒集团领导的一个松散恐怖组织，活动于1979年至1984年，从1980年开始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巴勒斯坦著名人士的“温和”恐怖活动。
9. 指1987年年底，以色列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暴乱。
10. 津巴布韦的旧称。
11. 一句西方谚语，意指代价高昂或得不偿失的胜利。典出古希腊国王皮洛士在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79年间以重大牺牲打败罗马军队。

第九章
加沙海滩，1991



占领之后的第20年、奥弗拉建立后的第12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了。1987年12月，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起义反抗以色列的军事统治。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道。城市、村庄和难民营都被抗议的浪潮吞噬。前所未有的巴勒斯坦反抗挑战着以色列，差点推翻了以色列在占领区域上的统治。但在最初的震惊过后，以色列展开了反击。它动员了军队，将之训练成一支有效的警察队伍。它出动了以色列安全局辛贝特，以这个效率出众的特工部对付反抗的、手无寸铁的民众。

在几个月之内，以色列军方就建立了若干个拘留营，用来监禁被军事法庭定罪的数千名巴勒斯坦人。在几年之内，反抗活动明显减少。压制力量系统的、果断的出击发挥了效力。巴勒斯坦运动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消失了，大范围的对抗可以迫使以色列放弃占领的观念也消失了。数千名巴勒斯坦平民蜷缩在拘留营里。在很多方面，对他们的大规模监禁败坏了以色列的民主形象。

1991年3月，我还是一名年轻的记者，并且即将成为一个父亲。当我因为年度的预备役集训到那个距离吕大不远的军事基地报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次的训练意味着什么。当我被告知要在加沙拘留营担任看守，我惊骇极了。作为一个反占领主义的和平主义者，我不愿意违背我所相信的一切，生命中第一次，我严肃地考虑违反法律、拒绝义务、入狱。

但当以色列国防军的汽车载着我和我的预备役士兵同伴驶向南方时，我有了更好的主意，我要记录下这番经历。我将记录一个以色列公民突然之间转变为一个军队狱卒的体验。我相信，记录下占领是比拒绝参与之中更行之有效的抗议方式。在加沙海滩拘留营度过的12天里，我做了大量笔记。在接下来的三天，我将这些笔记组织成一篇3 000字的小文章。《在加沙海滩》（On Gaza Beach）首次发表在《国土报》上，然后被《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杂志转载。在此期间，我的大女儿塔玛拉（Tamara）在英国出生。

地中海岸几百码长的白色沙滩如田园风光一样闲适。每天早晨6点，渔船出海捕鱼，让我感觉仿佛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克里特岛。西边的风光捕获了我的心房：湛蓝的天空，蓝绿色的波涛，满怀希望的渔夫。但是，吹进瞭望塔的清新微风也吹向了东边，拂过了尖刺竖立的铁丝网，拂过了黑暗的军事帐篷，鼓舞了被羁押的巴勒斯坦人的精神，鼓舞了被监禁的犹太人的精神。

瞭望塔的守卫们把目光转向清晨的地中海，海水的色泽变幻莫测。

早起的囚犯们也望向大海，在锡棚屋的洗手间，他们执着地站在唯一能看到地中海的狭窄窗户边，踮起脚尖向外眺望。也许有一天，当自由的巴勒斯坦共和国建立，政府铁定会将这片地带出租给某些国际大企业，他们将在这里建起地中海加沙海滩俱乐部。也许有一天，这里会迎来和平，以色列人会来这里度过短暂的假期。他们会在蓝绿色的海水边，喝着白葡萄酒，跳着桑巴舞。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会在国际候机楼冷气开放的免税店里购买刺绣的巴勒斯坦黑色礼服，从和平的巴勒斯坦回到繁荣的以色列。

但就目前来说，没有自由的巴勒斯坦，也没有和平的巴勒斯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每天早上要准备好交接班。穿着蓝色囚衣的囚犯排成长长的队伍，被带到卷曲的铁丝网下。那些拿着M–16步枪催促他们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在4月初的晨曦微光里，犹太士兵们紧紧握着步枪。他们命令这些囚犯停下，前进，停下。当清新的微风从海上吹来，他们命令囚犯们把手伸到身前。一个年轻的士兵给他们依次戴上手铐。

这里就是加沙海滩拘留营。这里是自1987年12月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后，近年来，在加沙地带匆匆建起的数个拘留营中的一个。超过1 000名巴勒斯坦人被监禁在这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恐怖主义分子，不过是游行示威者，或者是扔石头发泄不满的人。很多人都是十几岁的少年。有一些体格矮小，看起来还是小伙子，夹杂在他们之中，分散在拘留营各地。

拘留营有两间审讯室以及四个带围篱的院子。每个院子里都有12个老旧的棕色军事帐篷，每个帐篷关押有20名到30名囚犯。在过去，会有50个到60个男人挤在一个帐篷里。现在条件有所改善，他们的待遇提高了些。

按照惯例，每个院子都被带尖刺的铁丝网环绕。在这些围篱外设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供看守使用。经过通道，然后抵达另一道外篱——由装满水泥的金属桶组成的简易墙。当看守们在两道围篱之间来来回回地踱

步时，我突然感到，被监禁者与监禁者的界限其实并不明确。我觉得整个营地就是这里每个人的监禁生活的象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被围篱监禁在这里。

拘留营还建有12个瞭望塔。令一些犹太士兵震惊的是，这些瞭望塔与他们之前在学校书本中看到的瞭望塔非常相似。但这种震惊仅仅是感觉上的。那些建于20世纪40年代的欧洲瞭望塔都是用产自德国和波兰的重木材建造的，然而，加沙海滩拘留营里的瞭望塔却是用加利利生产的以色列薄金属制成。这些瞭望塔配备有探照灯，但它们很少被使用。那是因为，营地整夜沐浴在由数百根灯柱发出极强的、微黄色的灯光之下。只要电力系统不关闭——就像它被要求的那样，到黎明时分，这些灯泡和灯塔仍然发光，直到白天。

拘留营里还有一个公共食堂、一间小卖部、洗浴室、卫生间。巴勒斯坦囚犯们要被分配刷洗以色列士兵的卫生间，一天三次到四次。唉，某些士兵仍嫌弃这些巴勒斯坦囚犯们的卫生标准还不能令人满意。这个监狱同样为预备役士兵设置了一套帐篷、一间指挥官办公室、一间设备控制室。营里有两个厨房，一个为看守们烹饪，一个为囚犯们而准备。两个厨房仅隔着一张隔网。有时，当看守们的咖啡喝完了，他们的厨师就叫囚犯们的厨师通过隔网传过两三袋那种没有味道的劣质咖啡。在一家医疗诊所里，一位医生可能在处理完一个预备役士兵的眼部感染之后，立即接着处理一个囚犯被过于狂热的审问者所伤到的腿。就像这样，一切都秩序井然。加沙海岸的拘留营遵循着规则，有条不紊地运行。

鉴于他们所陷入的情形，拘留营的主管人员们竭尽全力做到最好。他们是正派的绅士。在他们的命令下，这些囚犯可以得到大量的食物和香烟。根据他们的政策，这些囚犯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囚犯还被允许经营他们自己的厨房，有他们自己的军需官，并得到了足够他们维持运营的日用供给品。监狱主管们会与囚犯领导人

进行每日谈判。他们使这里的生活继续平静地走下去。现在，距离上一个军官射杀一个试图攻击他的囚犯已经整整两年了，当年，即使那个年轻的男囚倒在血泊中，军官仍旧朝他不停地开枪。与过去不同，如今，家人和律师有权在每个周五探望这些囚犯。红十字会也会定期拜访。

然而，一种邪恶的臭气正在空气里飘荡，甚至连地中海的微风都不能把它带走。尽管这么说不够公平且没有事实根据，但那种阴魂不散的感觉是普遍存在的。这一点不是出于反以色列宣传活动的暗示，而是体现在士兵们使用的、那些理所当然的言辞上。当A起床去其中的某个问讯室站岗，他会说："我去审讯了。"当R看到囚犯们排成长队在他朋友们的M–16枪口下前进时，他会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说："看。'行动'（Aktion[注]）已经开始了。"即使是N，一个持强烈右翼观点的人，会跟每个愿意倾听的人抱怨说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一个集中营。M会带着浅浅的微笑解释说，自巴勒斯坦大起义以来，他已经积攒了太多天的服役期，以至于他很快被提升为盖世太保的高级官员。

而我，一直都憎恶这种感觉，总是激烈地与发出这些暗示的人争论，我几乎不能控制我自己。那些联想实在是太强烈了。当我看到一个1号圈棚的男人透过铁丝网叫来2号圈棚的一个男人，给他出示他女儿的照片，这种感觉就会涌上心头；当我看到一个刚刚被捕的年轻人带着屈从、恐慌以及骄傲等待我的命令时，这种感觉就会涌上心头；当我从镜子里瞥见我自己，震惊于我身在此处，一个记者正身处这个可怕的监狱，这种感觉就会涌上心头；当我看着我周围这大约1 000个人被锁在圈棚里、笼子里，这种感觉就会涌上我的心头。

就像一个信仰动摇的信徒，我审视着长长的反驳清单，审视那些众所周知的差异性。最明显的是，这里没有火葬场。在20世纪30年代时，并没有两个民族间的实质冲突。德国，以及它的种族主义学说，其组织体系是邪恶的。无论如何，当时的德国也并不存在任何实质危险。但是，随即我认识到，问题并不出在相似性上——没有人会真的以为二者

之间存在什么切实的相似性。问题在于，它们不同的地方还不够多。差异的程度还不够强烈，以致不能让这一切平息，不能让所有邪恶的回声平息。

也许辛贝特应当为此接受问责。每个夜晚，当它在审讯室里对一些青年严刑拷打后，这个以色列的情报机关就会将一张清单交给掌控加沙城市的以色列伞兵部队，上面都是那些被打得不成人形的青年们的密友的名字。而任何站在大门口的人，就像我，都能看到伞兵部队的吉普车在午夜离开拘留营，驶进被占领的、黑暗的、正在实施宵禁的城市，去逮捕那些据称会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当他们坐着军车回来时，我仍然站在门边，看着那些被捕的十五六岁的小伙子们。他们咬紧了牙关，紧闭着眼睛，眼皮后面的眼球鼓鼓地凸出。有时候，他们已经被毒打了一番。士兵们围过来，围观他们脱衣服，围观他们穿着内裤颤抖。当他们恐惧得瑟瑟发抖时，即便是在被占领区拥有一家塑料厂的S，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他问道，“我们怎么可以这样逼迫这些孩子？”

或许，营地的医生应当为我耿耿于怀的感觉负责。他当然不是门格尔，但当我在死亡之夜叫醒他去诊治一名刚被带进来的夜间被捕囚犯，这名囚犯赤着脚，伤痕累累，看起来似乎癫痫发作了，这名医生对他大声叫嚷。尽管这名囚犯只有17岁，尽管他抱怨着背部、胃部、胸部都有伤，尽管确实他全身都是血迹，但医生大声冲他叫嚷道：“我真希望你死了。”然后转向我，笑着说道：“我希望他们都死了。”

或许，那些尖叫声应当为我脑海里萦绕不去的感觉负责。结束了站岗，当我从预备役的营房走向洗浴间，我突然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就在我穿着短裤和木屐、肩上搭着毛巾、手里拿着洗漱包走在路上时，我被从另一头的审讯室镀锌铁皮栅栏处传来的尖叫声震惊得寒毛直竖，这尖叫声就像文学作品里描述的那样。从我读过的各种各样的人权报告中，我知道栅栏那头正在发生什么。他们会不会正在用“香蕉捆

缚”（banana–tie）[注]进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其他更加残忍的方式？或者他们只是使用简单的、粗鲁的严刑拷打的方式？

不管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方法，我都认识到，从这一刻起，我将无法享有安宁。因为当我在50码外的地方洗浴，试着冲洗掉一天以来的尘土和汗渍，他们在尖叫；当我在80码外的地方的食堂吃东西，他们在尖叫；当我在100码外的床上试着入睡，他们在尖叫。他们尖叫，是因为正有其他穿着跟我一样制服的人令他们尖叫；他们尖叫，是因为我的犹太国正令他们尖叫。以一种有条不紊的、规划严密的、绝对合法的方式，我亲爱的民主以色列正令他们尖叫。

别激动，我告诉我自己。不要急于下结论。难道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其黑暗的地窖吗？难道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其秘密机关、特殊部门和隐藏的审讯机构吗？只不过我的运气不好，恰巧被送到一个可以让我听到所有声音是如何响起的地方。但当尖叫声越来越响，我知道，我刚才告诉自己的根本不可信。因为在这间特定的审讯室，他们并没有在审问危险的间谍、叛徒或者恐怖主义分子。这里没有定时炸弹。近几年来，在以色列树立的各种各样的监狱建筑群中，关押着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中的很多人正在被酷刑折磨。在我们的案例中，存在的问题不在于十几个致命的敌方特工，问题也不在于一系列有限而精确的反间谍行动。被镇压的是一场人民起义，针对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强迫占领。我在这里看到和听到的，是我们国家的全体民众——银行职员、保险经纪人、电子工程师、零售商人和学生，正在监禁别的国家的全体民众——砌砖工人、泥水匠、实验室技工、记者、神职人员和学生。这是西方所没有的现象。这是民主所不能容忍的暴行。而我承认，我是它其中的一部分。

现在，尖叫声变得越来越弱了，变成了啜泣和哀号。我知晓，从这时起，一切都将不同。一个听过另一个人尖叫的人发生了改变。不论他是否参与其中，他都被改变了。而我已经听过别人的尖叫声。我同样被

改变了。即便那些尖叫的男人停止了尖叫，我仍然能听到他们在尖叫。我无法平息他们的尖叫。

所以，尽管没有对比的基础，我仍然开始理解，那些站在另外某些地方的另一群看守，是如何威吓被锁在栅栏后边的另一群人；我开始理解，这些守卫是如何能对其他人的尖叫声听而不闻。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邪恶的人不知道他们是邪恶的。那些正在施暴的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施暴，他们只是简单地服从命令，或者等待一次晋升，或者当他们真正想要的只是回家、安全和稳定的时候，他们只是必须做可以让他们继续生存的事情。他们担忧着自己的赋税、担忧孩子们在学校惹麻烦。但当他们思念着家乡、思念着妻子、思虑着要支付的账单时，他们的手不假思索地握紧了武器，他们的目光落在栅栏后啜泣的另一群人身上。

大部分预备役士兵在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是震惊的。他们觉得眼下这幅把另一群人锁在围栏中的图景令人难以置信。当他们第一次听到那些尖叫时，他们动摇了。但是，60名预备役士兵中，只有两名拒绝在审讯室里执行警卫任务，只有四个或者五个人是真正饱受心灵上的折磨，而其他人，却适应了。在抵达拘留营的一两天后，大部分的预备役士兵觉得看到人们被锁在带刺的铁丝网后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审讯室里的执勤也变成了日常服役任务的一部分，就好像它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一样。就好像这正是以色列国防军最初的使命。而那些在服役初期浮现出来的道德疑虑也被士兵的乏味日常生活所掩盖。部队的下一次休整是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打电话回家？新做的制服什么时候抵达营地？毕竟这里只是另一个军事基地，尽管这个军事基地既不曾保护国家边界，也不曾对士兵进行战斗训练，它做的只是把一个个小伙子锁起来。这个军事基地把小伙子们带出院子时，还让他们戴着脸罩。

当我们早上一点半起床整队执勤时，我看着我的预备役同伴们——看着他们慵懒的身躯，肥大的裤子，凌乱的发型。我们是邪恶的士兵吗？我们是残酷的代言人吗？我们是压迫的无情看守吗？当意识到这一

点，我们也不愿意再留在这里。我们不喜欢这份工作。这一切都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就像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更希望我们的以色列可以成为另一个加利福尼亚，但问题在于，我们的加利福尼亚周边围绕着阿亚图拉（ayatollahs）(注)。困难在于，尽管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以消费为导向和技术性民主里的实打实的公民，但是，我们发觉我们自己陷入了深重的困境。就在我们所站立的令人厌倦的半圆地带——我们劳累、绝望，我们系着的破皮带、穿着污秽的不足以保暖的衣服——我们同样感到自己是受害者。

但事实并不像这样简单。当队伍解散，我登上梯子爬上六号岗楼，我认识到，令这座营地运转的正是劳动分工。这种分工，使罪恶在没有恶人的情况下，在这里清晰可见地上演。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那些投票支持以色列右翼政党的人们并不是罪恶的，他们不曾在深夜围捕这些巴勒斯坦青年；那些在政府里代表右翼选民的部长们并不是罪恶的，他们没有用自己的拳头打在这些小伙子的胃部；陆军参谋长并不是罪恶的，他所实施的是一个合法的、当选的政府要求他做的。连同拘留营的指挥官也不是罪恶的——他尽其所能地做到了最好。至于那些审讯者们——好吧，归根结底，他们只是做自己的工作。而事实上，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不能管理这些被占领地域。还有那些看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不是罪恶的。他们只想抛下一切回家。

然而，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这些非罪恶的人集合起来，导致了一个罪恶行径的结果。而罪恶总是比其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大，后果比造就它、执行它的人所做一切的后果更严重。尽管我们不修边幅，我们笨手笨脚，我们在情绪表达上带着小资产阶级的特征，但我们在加沙的确是罪恶的。但我们的这种罪恶是一种狡猾的罪恶。因为它是一种惯常状态的罪恶，就像它本来就在那儿一样；它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罪恶，不能说应该由某个人对其负责。这是一种没有行恶人的罪恶。

从六号岗楼眺望，我可以看到大海、营地，以及加沙城。加沙是一

座没有希望、无可救药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居民，1948年，他们的房屋和村庄被我们占据，1967年，他们的避难所被我们征服。在几十年的漫长占领期，我们剥削这座城市的居民，否认他们的人权、公民权和民族权利。在加沙，我们没有任何借口。加沙不需要我们在西岸地带的某些战略要地设防。加沙也不像犹大或撒玛利亚的某些地区，被认为是我们历史上的既定领土。加沙是清楚而简单的。它是占领的荒谬性的缩影。它是徒劳的占领，是野蛮的占领。它在给我们的生存抹黑，它给我们存在的合法性抹黑。

我俯视着那些帐篷、栅栏以及铁丝网。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尝试着理解这个地方的内在逻辑，或者说，尝试着理解创造这个地方的必要性。我收集了我们所有的合法要求，以及所有的减罪情节：难道我们不也是难民吗？难道我们不也是暴力的受害者吗？如果我们要在中东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强大。当我们遭到袭击，我们就必须反击。以色列国防军和辛贝特都是为了在一片混乱中保全我们。只有使用武力的决心才能让我们得以在这里继续生存。

但是这些理由不适用于这里。在这个加沙海滩拘留营，它们不会发生效力。因为这片地带、这片地带的这些情况，都是清晰可见的。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情形。这里没有错综复杂的情况，也没有任何减罪情节。这就是巴勒斯坦人以大起义的方式给我们带来的事实：对于我们占领加沙，巴勒斯坦人是绝不能容忍的。他们告诉我们，如果要占领加沙，我们就必须拥有一个加沙海滩监狱。而如果我们要拥有一个这样的监狱，我们就必须背叛自己。我们必须背叛我们曾经的信念，背叛我们对于未来的期许。所以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以土地换和平”。现在的问题是以土地换取我们的正派。以土地换取我们的人性。以土地换取我们每个人的灵魂。

……

22年前，我从六号岗楼观察我的巴勒斯坦敌人以及以色列指挥官

们。如今，那座岗楼已经不复存在。在我从加沙海滩回到家的两年半后，1993年，奥斯陆和平协议签订。在这个难得的幸福时刻，以色列的正直征服了以色列的野蛮，巴勒斯坦的现实主义征服了巴勒斯坦的极端主义。在几个月之内，对加沙城的占领就成为过去。1994年春，以色列的拘留营被拆除。但是巴勒斯坦政府没有把海岸地带租给任何一个地中海俱乐部的企业家。政府把它移交给自己的安全部队——远比以色列的更野蛮。不久之后，这个世俗的巴勒斯坦政府就被激进的教徒组成的哈马斯圣战组织所推翻。短暂的平静之后，巴以冲突又开始了。再一次，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又陷入了他们众所周知的恶性循环：暴力，以暴制暴，对以暴制暴的以暴制暴。因此，那个关于加沙海滩的伟大隐喻仍然适用：关于看守与被看守者的密切关系，关于围攻者与受困者的复杂关系，关于监禁者被自己的监禁所监禁。事实是：我们生活着的现实是超现实的。

也许这就是直至今天，我在加沙海滩拘留营的所见所闻仍然在心头萦绕不去的原因。我被这个观念所困扰着：我们扼杀着巴勒斯坦人的同时，巴勒斯坦人也扼住了我们的咽喉。我们压迫着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也压迫着我们。我们因巴勒斯坦人而陷入困境，巴勒斯坦人也因我们受困。每隔几年，冲突就会演化为一种新的形式，一种更加可怕的形式。每隔几年，暴力的模式就发生着变化。悲剧在这一章结束，又在那一章开始，而悲剧，永远不会有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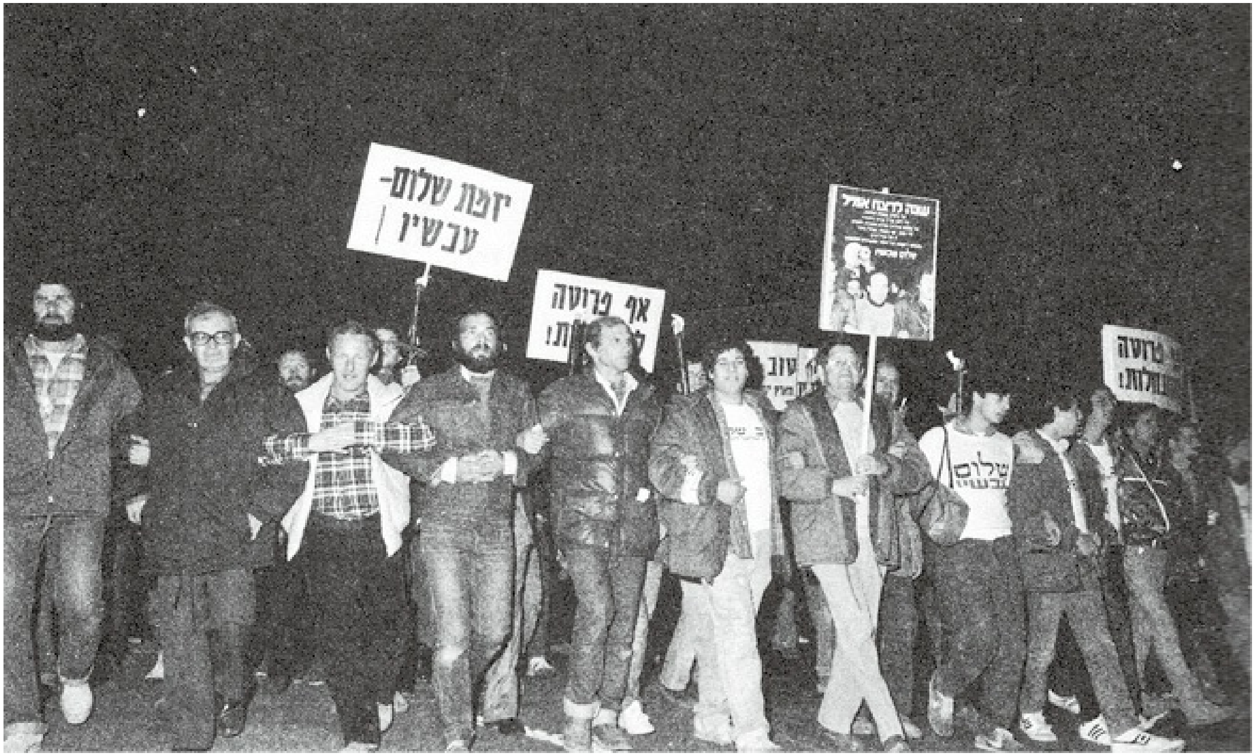
---

1. 德语的“行动”。

2. 指将囚犯铐在一张椅子上，把铁链的手铐和脚镣连起来，迫使囚犯弯曲成香蕉形，身体拉伸到难以承受的地步。有时，审讯人员还会将椅子抬到空中，然后突然摔到地上，让囚犯顿时不省人事。

3. 波斯语音译，阿亚图拉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最高宗教职衔和荣誉称号，意为“安拉的象征”、“安拉的奇迹”、“安拉的迹象”。伊斯兰什叶派现教阶从低到高依次为：毛拉、阿訇、乌莱玛、穆智台希德、霍贾特伊斯兰、阿亚图拉、大阿亚图拉。

第十章
和平，**1993**



就像定居点，和平，同样是1967年与1973年战争的结果。

就理论上而言，渴望和平的意愿一直都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组成部分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赫伯特·本特威奇的儿子诺曼（Norman）意识到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不仅仅有犹太人的时候，它存在着，于是诺曼加入了由耶路撒冷知识分子推动的犹太人和平同盟布里特沙洛姆（Brit Shalom）[注]。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当伊扎克·塔本金定居哈罗德山谷的时候，它存在着。而犹太激进分子们奋起反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殖民运动，导致了对阿拉伯佃户的驱逐。在20世纪30年代晚

期，当雷霍沃特的作家以及柑橘种植者摩西·史密兰斯基警告我们，在这片土地上不仅有犹太人，我们必须和非犹太人和平共处时，它存在着。史密兰斯基告诫我们必须学会与他们和平共处。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当什马利亚胡·古特曼率领他的学员登上马萨达之时，它存在着。于是犹太人文主义者公开指责他以军国主义的沙文主义俘获了这群年轻人的心灵。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当帕马奇的部队清空了巴勒斯坦的村庄、占领阿拉伯的吕大之时，它存在着，于是史密兰斯基的侄子伊扎尔写下了《基伯希兹安》（Khirbet Khizeh）(注)，一篇讲述野蛮驱逐的中篇小说。在20世纪50年代，当年轻的以色列国家建立并武装自己之时，它存在着，于是左翼人士发出一个和平倡议，承诺公正地对待巴勒斯坦难民。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本·古里安建立迪莫纳核反应堆时，它存在着，于是那些道德维护者公开指责以色列和中东的核化进程。

70年以来，对和平的渴慕存在于犹太复国主义的边缘地带，尝试着压抑犹太民族运动的可耻的本能。但在1936年阿拉伯民族大起义之后，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要求拥有越来越多的土地、越来越多的权利。它在口头上说着为和平服务，却没有意愿为其付出实际的代价。它将移民、定居点及国家建设视为最主要的目标，却不重视和平，并没有将其奉为最高事业。

真正的主流犹太复国主义和平运动诞生于1967年和1973年战争结束后。只有六日战争和赎罪日战争开拓的新视野才将和平之战引进到以色列的公共舞台。让同样在那些年，大以色列的观念以及吞并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的需求也萌芽了。第一个定居点所经历的十年，同样也是第一次和平示威所经历的十年。随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所发生的结构转变，同时兴起的还有新左翼势力和新右翼势力。这两股势力都反对工党的顽固领导方式，反对僵化不变的现实。两股势力都主张一种激进的解决方式，鼓吹即时达成乌托邦的秘诀。当它们彼此角逐、彼此界定、彼此促进的同时，和平运动和土地运动也开始成为新以色列的塑形之力。

这一次我不需要进行长途跋涉，约西 ·萨里德（Yossi Sarid）就住在距离我家5英里的地方。从他位于北特拉维夫的宽敞公寓的角窗向外眺望，可以听到湛蓝而宁静的地中海发出声声召唤。作为以色列左翼势力标志人物，这个男人以一个轻柔的握手迎接我。我们相识已经好几年了。在某次竞选活动里，我甚至自愿担任他的非官方顾问。但多年以来，我们彼此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然而这一次，约西知道，我前来并不是缘于争辩，而是出于理解的目的。和平运动是从哪里发起的呢？我问道，它包含哪些特质？它在哪些方面是正确的，又从哪里步入歧途？为什么它现在迷失了方向？

1940年，萨里德出生在雷霍沃特。他的双亲都在一座萧瑟的波兰小镇拉法洛卡长大，之后在1935年返迁。几年后，纳粹抵达了拉法洛卡，将犹太人赶进森林，指挥他们在地上挖坑，然后开枪射杀他们，让他们栽进他们刚刚挖好的坑里。约西的母亲杜芭（Duba），因此失去了她的母亲、父亲、姐妹和兄弟。她患上了临床抑郁症。他的父亲雅各布（Yaakov），尽管失去了他的整个家族，但仍然对生活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1945年，雅各布把他的儿子约西放在厨房的一张板凳上，告诉儿子，为什么他决定把他们的姓氏从“施耐德”（Schneider）改成“萨里德”（意思是“幸存的”），因为他们是最后的幸存者。对于约西来说，厨房里的这一刻是决定性的。听着他父亲的教导，他确信，在这个星球上他们都是孑然一身。

雅各布·萨里德表现十分出众。在短短几年里，这位学校教师成了学校的校长，然后担任所有社会主义学校的总监，然后担任以色列教育部主任。约西·萨里德同样十分出众。他是一个卓有天赋的孩子，在各个领域表现优异，经常胜过他的同龄人。但是杜芭·萨里德，仍然忧郁着度过了一生。在拉法洛卡大屠杀的第19个周年纪念日，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约西·萨里德就被寄予厚望。他的母亲希望他

成为一名诗人和教授，而他的同学确信他将成为一名伟大的国家领导人。无论萨里德走到哪里，他都因为他敏捷的思维、犀利的言辞以及矜傲的态度超类绝伦。从一个男孩成长为青少年，他都是耀眼的、叛逆的、自矜的。他从不盲从权威。他是一个输不起的人。他的野心、天赋和挑衅性格使他成就不断。16岁时，他在以色列最富声望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诗歌。23岁时，他在以色列国家广播电台担任一名主要的新闻编辑。24岁时，他成为长期执政的工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发言人。

萨里德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工党的后代。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劳工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的邻居是工党的，学校是工党的，他参与的青年运动也是工党的。工党是他唯一的参照系。难怪这位年轻的政党代言人迅速地赢得了党内元老的信任和喜爱。总理利瓦伊·艾希科尔（Levi Eshko）、外交部长平夏斯·萨帕尔（Pinchas Sapir）、秘书长果尔达·梅厄，都把他视作一个心爱的儿子。这些笨口拙舌、垂垂老矣的统治者们栽培着他们雄辩滔滔的发言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收养了他。他们给予他来自全能的强大机构的鼎力支持，而他回报以一条通向一个年轻以色列和一种新式媒体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他们以前未曾想到的。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用不了多久，萨里德就将继承工党，成为以色列的总理。

六日战争后不久，萨里德前往美国求学。他在自由的纽约度过了他的研究生生涯，那时的纽约正关注越南战争。这个精力充沛的以色列人参与到斗争中。他积极支持“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参加了示威游行，成了反战运动的一分子。当他在1969年回到以色列后，他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在他眼里，以色列的政策是好战的、轻率的、过时的。尽管他参加了竞选，但他的观点与政府的鹰派路线有着很大不同。当他意识到，果尔达·梅厄不愿为了和平归还被占领土，他愤怒了。于是，曾经的萨里德–梅厄友好同盟，演变成充满敌意的、彼此仇恨的关系。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萨里德就已经明确地认为，占领是一场灾难，诸多的定居点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和平势在必行。以色列必须撤回到1967年的国境线，必须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进行谈判。一些激进的左派人士和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同意他的观点。但在工党内部，他是一个弃儿，他的新的政治立场——绝对异端的政治立场——受到了排挤。在果尔达·梅厄和摩西·达扬的推动下，以色列已经沉迷于刚刚赢得的帝国权威，不愿理会一个被灌输以美国反战运动思想的傲慢王子的审慎警告。

赎罪日战争粉碎了梅厄和达扬的帝国妄想。同时，它也催生了一种基于抗议的新政治文化。而萨里德就成为这种新政治文化的捍卫者。他掌控了媒体，与行政机构、定居者、腐败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77年大选的异变带来了梅纳赫姆·贝京[注]以及右翼的利库德集团，这令萨里德更加强大。工党现在敌视他，同样敌视他的还有工党的中坚分子。在学术界、媒体界、商业部门、司法部门、行政部门，很多人都疏远了他。

但萨里德并不介意这些敌视和疏远，这正与他挑衅的、傲慢的本性相合。现在他成了明星。他站起来反对利库德集团，反对定居者，反对以色列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的宗教主义浪潮。他尖锐地批判着1973年后及1977年后的以色列观念模式，深刻程度超出其他任何一个以色列人。

萨里德最美好的时光在1982年降临。当梅纳赫姆·贝京和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注]将以色列卷入虚伪而离谱的黎巴嫩战争时，在以色列的议会上，萨里德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犹太复国主义成员。一时间，他成了全民公敌：被辱骂、被攻击、被排挤。但结果表明，这场战争的的确确愚蠢至极，萨里德被证明是正确的。对于参与反战示威游行的数十万以色列民众来说，萨里德是以色列和平运动无可争议的英雄。随着和平抗议运动汇集成一股浪潮，萨里德的声望也水涨船高。

两年后，萨里德退出工党，加入了左翼的梅雷兹党。尽管他最终成

为这支小党派的领袖，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担任教育部长，但他再也没有重现他在20世纪70~80年代时的显赫。脱离工党令这个满怀希望、特立独行的人只能徘徊在以色列的政治边缘，陷入沮丧和愤懑。尽管备受尊重，萨里德却错失了一个引起反响的良机。他所走的路是别人不曾走过的。

萨里德的脸庞镌满了深深的纹路，蚀刻他的是失望。他身材瘦削，头发几乎掉光，穿着打扮是令人吃惊的过时。他饮用的咖啡加了很多奶，味儿很淡。他客厅里的陈设也是注重功能性的。尽管他仍然不失为一个完美的故事讲述人，思维敏锐，善于讽刺，但他依旧无法掩饰自己的不满。和他在一起的几个小时，留给我的却是困惑和沮丧。

“我来到这里，并不仅仅因为你是以色列和平运动的标志人物，”我告诉萨里德，“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你的传记就是左翼的传记。在新和平运动取代衰落的劳工运动的过程中，你就是当中的顶梁柱。从工党走向和平的转变并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它也是从建设走向抗议、从实践走向讨论、从领导走向反对所经历的深刻思想变革。而你就是这种转变的化身。以色列由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实践的劳工文化，转向了基于以色列自由派的抗议而产生的和平文化，而您就是这种转向的化身。”

萨里德没有对此表示否认。他看到了左翼势力所经历的与他所经历的之间的相关性。他说：“塑造我的，是我双亲在拉法洛卡消失的家园，是我在雷霍沃特经历的快乐，是以色列建国之初所经历的19年。但六日战争破坏了所有的秩序，而美国又开拓了我的眼界。赎罪日战争把我激怒了，因为它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当我到了那个年纪，可以拥有政治上的话语权时，我拒绝成为当初我所期待的王子的角色。我曾经是任性的孩子。我不愿跟随长者的脚步，我想要彻底的变革。我想要推翻和颠覆已经背叛我们的国家领导集团。”

“问题就在这里，”我说道，“你以及和平运动，总是不停地 ‘反

对’，反对梅厄，反对贝京，反对占领。尽管你们有权利表达愤怒，但你们的失败恰恰在于你们总是持否定的态度。你们抗议，你们举行示威游行。不像老工党的党员，你们从没有建立任何东西。你们没有建造一处房子，也没有种下一棵树。你们也从来没有承担处理以色列复杂现实的沉重责任。从情感上说，你们仍然沉浸在20世纪60~70年代的青少年抗议阶段。和平运动的否定特质令它毫无效果，并最终失去了吸引力。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情绪上，它都是徒劳无益、不结果实，甚至起到了腐蚀性的作用。没有足够的爱，也没有足够的怜悯，却有着过多的论断。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不能填补衰落的劳工文化所留下来的空白。在你们上演一幕弑父弑母的鸿篇巨制后，你们自己却没有成功地担当父母的角色。没有抚养，没有鼓励，也没有领导。你们没有给这个国家提供一个成熟的政治选择。最后时刻，你们这一代只达成了创始者们已建立的功绩当中的一小部分。你认为，以色列变成了一个群龙无首的国家，没有船长、没有罗盘、没有方向感，在大海中迷失，但这只是你的视角，别人可不这么认为。”

萨里德立即就有了答案。当他用他短小的、指甲露出被啃噬痕迹的手指玩弄着他的无框眼镜时，他开始迸射一大段冗长的尖刻言论。

“重点关注占领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他这样说道，“占领是所有罪恶的根源，是所有暴行的根源。当我们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我们就打开了一扇门，罪恶的风就从这里吹了进来。你在今天的以色列所看见的一切罪恶都源自占领。譬如那些残忍暴虐、欺诈谎言，以及腐朽衰落。甚至军队当下正在腐化，也是因为它被强迫成为一支占领的军队。因为占领，我们已经被由一群以弥赛亚自居的狂热分子所组成的疯狂团伙所俘虏，他们将毁灭我们，就像他们的祖先毁灭了第二圣殿一样。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恐怕我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我看到它们正在降临，我提前预见到了所有的一切。当我看到占领的第一批种子之时，我就知道那是毁灭的种子。”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他继续说道，“你问我和平运动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呵，我这样说吧，以色列的和平运动是为了恢复常态而进行的斗争。我们想要的就是正常化。上一代人告诉我们，战争是我们的宿命。这就是事物运转的方式。在这个地区，在这个国家，战争是正常的。但当我们抬起头，环顾四周，却看到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永恒的冲突是不正常的。这不是别人生活的方式，这不是民族之间处理他们差异性的方式。比方说德国与法国、越南、中国以及后来的苏联。所以我们拒绝摩西·达扬臭名昭著的声明：‘刀剑将永远杀人[注]’我们寻找一种方式来担保，刀剑并非永远杀人。说我们一直都在反对和否定，这是不公平的。我们是带来和平新希望的人。我们宣扬接连不断的战争并不是某条既定法令，我们宣称和平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畴，我们宣告我们想要拥有像其他人那样的正常生活，我们想要享受其他人所享受的和平。”

“这就是了，”我质疑萨里德，“你们发现了世界，但你们忽略了我们自己的历史。你们忘记了1948年战争，忘记了它所造成的难民问题。你对犹太复国主义令人心寒的后果视而不见，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核心问题——对另一个民族的不公平驱逐视而不见。你们也没有认识到，西方犹太人文明下的民主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宗教矛盾和身份冲突。你们没有考虑到，从我们的地缘政治和历史进程来看，事实上，和平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萨里德理解我的意思，但他的答案就像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历史不是一个火车站，”他这样说道，“因为即使你滞留在最偏远的火车站，你仍然确信，即使你误了这趟火车，下一趟火车仍会抵达。你也许会等待一个小时，一天，或者一个星期——但下一趟火车仍会到来。历史并不这样。在历史的情境里，如果你错过了你应该登上的那趟火车，就不能指望还会有下一趟。这就是我现在为什么这样生气、这样恼火、大失所望。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任总理，我势必会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协定。也许我还会设法挽救一些定

居点，或者是一小部分东耶路撒冷的土地。但因为那时的以色列领导人既傲慢又冷酷，于是时间流逝了，机会溜走了，火车驶离了车站。现在我没有看到下一趟火车的到来。一列火车都没有。而这只会令我更加悲观和沮丧。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深爱着这片土地了。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感觉我归属于这个国家。在我的噩梦里，我看到数百万的巴勒斯坦人向着耶路撒冷进军，我看到数百万的阿拉伯人向着以色列进军。我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除了即将葬入的坟茔，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但有时，当我看着我的孙辈们，我的眼睛就涌出了泪水。我不再确定，他们的命运会不会与拉法洛卡孩子们的命运一样。”

我与尤西·贝林（Yossi Beilin）会面的地方，在赫兹利亚[注]高新技术塔楼里他的豪华办公室。他穿着浅色的套装，系着白领带，有一头银灰色的头发。尽管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这位由和平运动政治家转行的商业顾问却拥有一张年轻的脸庞，只有几行纹路镌刻其上。虽然他只比萨里德年轻8岁，但贝林显得更为成熟。在这些年里，他一直是和平运动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不是只会提出抗议，而是付诸行动；不是被情绪压垮，而是谋划着行动。

在以色列建国的那年夏天，贝林在特拉维夫出生了。他的家庭充斥着犹太人的历史以及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承诺。早些年前，他的祖父曾作为一名代表，两度出席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他的父亲是特拉维夫记者工会的簿记员，学识渊博，母亲则是一名教师，教授阿拉伯语、《圣经》以及考古学，并对工党的日报《话报》（Davar）贡献颇多。他们全家居住在一间简陋的公寓，这个家庭没有太多的财富，却并没有失去骄傲以及学习热情。在屋子的墙上，悬挂着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奠基人、大屠杀受害者以及哭墙的照片。贝林的双亲都为他们能活到救赎之日来临而感恩，并把这种思想灌输给他们年轻的儿子约瑟夫（Yosef）。

贝林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小伙子。他有着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后裔坚定

果敢的魄力。在小学时，他勤奋而刻苦，求知欲旺盛，并获得了著名的赫兹利亚高级中学的奖学金。他从不浪费时间，从不反抗权威，从不自由行动。下午时，在青少年广播站担任通信员。8岁时，他变得严守教义，配备了经文护符匣，只食用符合犹太教教规的食物。但他真正信奉的上帝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戴维·本·古里安。每逢周五，年轻的尤西都要走到犹太国家基金大道，去看那位有着不羁发型的白发老者迈出他的豪华轿车，走进朴素的两层楼的宅邸。在这里，他凭借无限智慧引领着犹太人民前进。当本·古里安退休时，贝林失声痛哭。

贝林印象中的以色列，从他的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度。这里有雷霍沃特的魏茨曼科学研究院，迪莫纳的核反应堆，特拉维夫的演艺中心，国家的引水工程。经济增长率超过了新加坡和韩国，贝林回忆起来都为之惊叹。国家的边境也是安宁的，阿拉伯人离我们很远，巴勒斯坦人也不存在什么问题。那时有着深深的安全感。犹太人的悲剧终于远离了我们。犹太复国主义在实现救赎的神迹之后，又成功地将以色列的国度引领向现代化和开明进步。

在1967年5月，有那么一段时间是恐惧的。在那战争迫近的日子里，特拉维夫的人们谈论着要在城市的公园里挖掘大型坟墓。有些人担忧会经历第二次大灭绝。但贝林服役的富于谋略、坚毅无畏的以色列国防军，迫不及待地要投入战争。而贝林，同样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属于他这一代人的战争。当战争确实爆发后，以色列的国家军事机器运行得就像一只瑞士产的时钟。短短几天之内，它就粉碎了阿拉伯的军队。埃及士兵烧焦的尸体横在沙滩，他们的双目还大睁着；19岁的以色列士兵被这幅景象震撼了。当他手里握着的晶体管收音机宣布耶路撒冷获得解放，圣殿山回到我们的手中时，贝林像个孩子一般大哭起来。这个国家已经成长到足够强大，保卫自己、实现权利，就像它已经证实的那样。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贝林在大学研读政治学和文学，并为《话报》撰稿，积极参与政治（工党）。他工作努力，学习刻苦，并

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结了婚。尽管他并不是鹰派人士，但占领从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对他造成过困扰。他甚至支持一些早期定居点的建立。他完全地信任果尔达·梅厄、摩西·达扬，以及他们的工党政府。再一次地，边境平静下来，阿拉伯人远去，巴勒斯坦人根本不算什么问题。一切就像它本来的模样。

1973年10月6日，贝林待在家里。他刚刚为他的年轻妻子和他们两岁的儿子做了赎罪祷告，就惊骇地听见拉响的空袭警报。他觉得肯定是弄错了，难道阿拉伯人愚蠢到在遭受1967年的屈辱惨败之后再来袭击以色列吗？但数小时之后，这位25岁的预备役士兵就穿上了制服，作为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坐在最高统帅部的指挥所里。他亲耳听到了以色列士兵的溃败，他亲耳听到了苏伊士运河的士兵哭喊着救命。将军们在互相大吼。没有秩序，没有纪律，没有尊严。通信网络传来恐慌的尖叫。崇敬的摩西·达扬在走廊里踱着步，就像一个战败的元帅。在以色列最高统帅部的大厅里，人们谈论着第三圣殿的末日来临。

而战争还在肆虐。贝林背弃了宗教，他不再携带经文护符匣，也停止食用那些符合教规的食物。他在安息日开车和写作，他再也没有走进犹太教堂进行祈祷。破灭的不仅仅是他的信仰，他所信任的世界也崩塌了。他曾经崇拜的神现在看起来什么都不是，只是惯于欺骗的偶像。“看起来就像某种宗教的启示，不过恰好相反，”贝林告诉我，“神的显圣、神的存在突然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痛苦和空虚。一切都失去了效力。没有什么是安全的，没有什么是值得信任的。那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更聪明，能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没有上帝，也没有领袖，没有人可以让我抬头仰望。我已经孤单一人。我背负着所有的责任。我不得不亲自确保不会降临又一场战争或者灾难，确保第三圣殿不会遭到毁灭。”

在赎罪日战争之后的十年里，贝林成了工党里前途光明的年轻思想家。1977年，他是西蒙·佩雷斯的助理、工党的发言人。1984年，他是

利库德集团——工党联合政府的内阁大臣。然后，他成了一个和平运动的倡导者。1987年，他作为站在西蒙·佩雷斯一方的外交部长，尝试与约旦国王侯赛因（Hussein）进行和平谈判。1989年，他在海牙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进行间接对话。1990年，他在耶路撒冷签署了一份以色列——巴勒斯坦联合声明。当约西·萨里德离开工党并开始游走在政治边缘后，贝林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为和平运动中被寄予厚望的人。他看起来是最有可能缔造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和解的那个人。

1992年6月，伊扎克·拉宾带领工党在国家大选中获得胜利，并建立了一个中左翼的政府。拉宾看不起贝林，贝林也不屑与拉宾为伍，但机会是无法抗拒的。在黎巴嫩战争失败以及1987~1992年的巴勒斯坦大起义之后，右翼势力被粉碎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以色列的议会里，和平的呼声占据了大多数。首相做出承诺，要在6~9个月之内与当地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达成一项临时协议。一个像贝林这样的男人绝不会错失这个机会，一个像贝林这样的男人绝不会坐等首相引领他们踏上通往和平的道路。

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贝林擅自行动了。1992年12月4日，他委派他的特使亚伊尔·赫希菲尔德（Yair Hirschfeld）前往伦敦参加一个秘密的、未经授权的会议，与巴解组织的财政部长阿布·阿拉（Abu Ala）会面。1993年1月20日，他派遣赫希菲尔德以及另一名特使罗恩·蓬达克博士（Dr. Ron Pundak）在奥斯陆[注]南部的萨尔普斯堡与阿布·阿拉谈判。1993年2月11日，他派遣赫希菲尔德和蓬达克在萨尔普斯堡启动了第二轮谈判。总理拉宾和外交部长佩雷斯此时还毫不知情，但在萨尔普斯堡，正在起草一份严肃的文件。文件声称双方达成一致，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区撤军，赞成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自治机构，并启动关于双方最终状态协议的直接谈判。

直到1993年2月中旬，贝林才将挪威的草案文件出示给佩雷斯。他着意淡化这件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欺骗了自己的上级。尽管他告知

了佩雷斯，但佩雷斯并没有完全理解萨尔普斯堡会谈的意义。因此，当外交部长向总理做汇报时，两人都没有注意到奥斯陆和约的含义。拉宾对这个计划并不感兴趣，但他并没有指示佩雷斯停止谈判。以色列最重要的两名政治家被贝林玩弄于股掌。就像耶胡达·伊曾、平夏斯·沃勒斯坦、哈南·波拉特从1975年拉宾——佩雷斯政府设法得到的在撒玛利亚建立定居点的模糊许可，贝林从1993年的拉宾——佩雷斯政府获得了与巴解组织谈判的模糊许可。大坝裂开了一条缝，一个加速的和平进程开始运行了。

1993年春，举行了另外的三轮会谈。5月，外交部总干事乌里·萨维尔（Uri Savir），加入了挪威的以色列团队。6月初，法律顾问——同时也是拉宾的心腹——约尔·青格尔（Yoel Zinger）也登上了飞机。1993年6月6日，拉宾指示佩雷斯中止谈判。看起来似乎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团队的意义，并为此感到恐慌。几天之后，他默许了此事。现在的谈判开始以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互相承认为中心。以色列谈判方由四人团所操纵：拉宾、佩雷斯、贝林和青格尔。他们每个周末秘密地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赫兹利亚会面。但是，主要的决策人是外交部副部长贝林。他是唯一知道谈判方向的以色列人，也是唯一知道每一个步骤意义的人。他是引领以色列总理和外交部长以及整个国家议程的人。

“你曾经探讨过你所做事情的历史意义吗？”我问道。“从来没有。”贝林冷静而坦率地回答。我又问：“你曾经探讨过当中蕴含的风险吗？”“从来没有。”“你曾经考虑过备选方案吗？”“没有。”“你是否意识到，你当时正在推动巴勒斯坦建国？”“我的确意识到了，尽管拉宾和佩雷斯不太明确这一点。我假设奥斯陆会谈是一条密道，这条密道会一直是一个秘密。它所达成的政治结果应该是，以色列政府与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的当地巴勒斯坦领导人之间，达成一项有限的自治权协议。没有人会预见拉宾和阿拉法特的和解，没人知道，以色列的合作者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而以色列团队要处理的就是细节问题。我们在小问题上投入了太多精力，如今回顾时却发现，它们并不具备真正的重要

性。”

在7月末的时候，当他们自信心不断增强时，巴勒斯坦人却说，如果双方没有互相承认，他们就不会在临时协约上签字。拉宾非常恼火，但这时他已经被困住了。他困扰于之前许下的达成政治突破的许诺，在叙利亚问题丝毫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巴勒斯坦人就是他的唯一机会。于是，他再一次满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走上了贝林引领他走上的道路。8月18日，拉宾授权西蒙·佩雷斯在奥斯陆签署了秘密协定。9月10日，伊扎克·拉宾承认了巴解组织。9月13日，拉宾在最后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策略上对阿拉法特做出让步，在协约的序言中将“巴勒斯坦团队”换成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小时后，以色列的总理与美国总统及巴勒斯坦人民的领导人一起，走向白宫的草坪，缔造这段历史，名垂青史。尤西·贝林坐在草坪上后排的一个位置，他还不太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事实。他将拉宾和佩雷斯引领到了这里。他将以色列引领到了这里。他实现了和平。

“我来告诉你我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我对贝林说道，“首先，你并不是一个主张与巴勒斯坦人和平相处的虔诚信徒。在遭受赎罪日战争的创伤之后，你想要和平，你意识到，占领是危险的，而你认为，签署一个协定把约旦河西岸归还约旦就能解决问题。但在1988年年底，约旦的侯赛因国王一点儿也不想处理西岸问题。于是1992年，你面临又一次选择时，与当地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谈判就不能公开了。而那时留给你的只有阿拉法特，但阿拉法特不是能轻易应付的。阿拉法特代表了巴勒斯坦全体人民——不仅仅是占领区里的居民，还包括了巴勒斯坦难民以及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阿拉法特是针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武装斗争的化身。因此，如果能与阿拉法特达成和平协定，这个协定将完全不同于与当地巴勒斯坦人达成的协定。一个能与阿拉法特达成的和平协定将基于巴勒斯坦的大转变：对犹太民族的承认，对犹太民族运动及民族权力的承认，对巴勒斯坦人回归权的放弃。

“事后看来，很明显，你并没有考虑到双方在宗教、文化以及生存空间问题上的冲突。你不记得阿拉伯世界对1917年《贝尔福宣言》的排斥，不记得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公开后阿拉伯人的暴行，也不记得1948年战争后所遭受的灾难。你看到的只是1967年相对简单的问题，也就是占领，而你认为你能够以一种相对容易的方式解决它。像你这样的聪明人却被诱惑以这样一种草率的方式达成和平是无法让人理解的。你没有利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特殊情境最终引领人民走向真正的和平，却选择了和平的表象。你以为你操纵了佩雷斯和拉宾，但事实上，是巴勒斯坦人操纵着你。尽管他们处在战略劣势，但他们仍然成功地把你甩在了地上。”

贝林安静而耐心地聆听着。他的其中一个优点就是时刻保持超然、冷漠的能力。“如果是我的话，”他说，“我会在那时、那地达成一个关于双方最终地位的协议。我会在短时期内解决你提到的所有核心问题。然而，在1993年，拉宾并不想要一个最终的、全面的和平。我不得不缝制一件他愿意穿上的衣服。我知道，这件衣服还远不够完美，我知道，任何延误都会埋伏下和平的隐患。但我不是那个发号施令的人，我没有其他办法。我不得不在现有条件下工作。在白宫的典礼之后，我立即飞往突尼斯，与阿拉法特最高级的副手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开始了关于真正和平协议的谈判。这需要时间，其间，还发生了很多事情。1994年2月，巴鲁克·戈尔茨坦（Baruch Goldstein）展开希伯伦大屠杀[注]。然后，伊格尔·阿米尔（Yigal Amir）在1995年11月刺杀了伊扎克·拉宾。所发生的事情不是我能预测到的。直到今天我仍然确信，如果拉宾没有被暗杀，和平最终会实现。我们也不会进行这样的谈话，因为以色列会同巴勒斯坦、叙利亚及阿拉伯世界和平相处。”

和平的故事同样也是我的故事。对于像我这样的中上层阶级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来说，和平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理念，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它还定义了我们的身份。和平是一种社会整合，也是我们民族之火的支柱。和平是我们的信仰。1965年，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我们最神圣

的歌就是和平歌曲《明天》（Tomorrow），但歌曲许诺的和平却是抽象的。歌曲中的士兵脱下了他们的制服，但士兵中却没有阿拉伯人。这是人们渴望却不敢相信的和平。到我读十年级的时候，我们最神圣的歌曲是《和平之歌》（Song for Peace）。这首和平之歌表达了一种抗议，是死去士兵的令人心中发寒的强烈抗议。歌中有反抗，但同样，没有阿拉伯人。《和平之歌》中的和平是愤怒的、对抗的、政治的，但它仍然是模糊的，就像它的前任一样。然而，它所反映的对和平的需求仍然是令人愉快的。

从《明天》中的和平到《和平之歌》的和平历程，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特征。在六日战争以及占领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后，我们相信和平是可能实现的。在赎罪日战争后，理所当然地，我们认为以色列争取和平的行径使我们失去了阻止战争的时机。经历了1977年的政治动荡、定居点的建立、黎巴嫩战争之后，和平成为我们反对右翼人士和定居者的悲叹。和平从来没有基于一个清醒的历史判断，也没有提出一个现实的战略预测。和平成了面对持续的、不堪忍受的冲突所表现出的一种情感、道德及理性立场，成了正在改头换面的以色列。

我读高中时，经常参加和平运动的聚会。我钦佩地聆听那些卓越人士——比如小说家阿莫斯·奥兹、记者乌里·艾弗纳瑞（Uri Avnery）以及前上校迈尔·帕伊尔（Meir Pa’il）——所承诺的和平。当我成为一个士兵，在休假时，我参与了令人激动的耶路撒冷火炬和平游行，怀着忠诚的信仰聆听约西·萨里德和尤西·贝林所承诺的和平。当我成为一个大学生，我是和平运动狂热积极分子。我撰写和分发和平运动的小册子，全心全意地相信和平做出的许诺。然而，直到30岁的时候，我才开始认真聆听那些巴勒斯坦人到底在说什么，然后意识到，和平的许诺毫无事实根据。它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道德角色，但它却没有任何实证基础。和平的许诺固然是善良的，但它却因我们生活的残酷现实所造成的一系列否定而深陷泥沼。

我提出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假定我们生活在一个悲剧里：两个民族共享着同一个家园并为之争战，而这场战斗几乎是永无止境的。70年来，我们犹太人拥有了承受这个悲剧的毅力。我们充满活力，可以忍受这场持续不断的冲突并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但当我们疲惫不堪地倒下时，我们开始否认悲剧。我们想要相信，在我们生存的核心问题上没有什么悲惨的法令。因此我们假称，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什么悲惨的境遇，而是我们自己的行为。1967年我们占领的土地为这个急需的假称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它允许我们关注一个内部化的问题，它允许我们专注于一个我们自己造成的内部冲突。右翼们说："只要我们吞并约旦河西岸地区，我们就能安然无恙。"左翼们说："我们只要归还约旦河西岸地区，我们就能享有和平。"右翼们说："那些离开我们的人死了，都是因为左翼的错误观念。"左翼们说："那些离开我们的人死了，要怪右翼的狂想。"与其直面一个从外部强加于我们的悲惨现实，不如我们选择自行创造一个左右翼互相对抗的简单叙述。这不是阿拉伯人的过错，而是犹太人的；这不是中东的过错，而是以色列政府的；这不是以色列基础条件的过错，而是某些特定的以色列政客所造就的特定的错误。于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我们将我们生活中的悲剧转变为一出寓言剧。我们创造出一幕虚假的现实，它使我们能够责备我们自己，而不用面对我们所陷入的残酷现实。

从这个一般性的理论中，我明白了一个关于以色列左翼的理论：它的根本缺陷是，它从来没有对占领问题及和平问题进行区分。在占领问题上，左翼是完全正确的，它认识到，占领是一场道德的、人口的以及政治的灾难。但是在和平问题上，左翼是有些天真的。它指望着一个从来不曾真实存在的和平伙伴。它假定，因为我们需要和平，因此，和平就是可以实行的。然而这个地区的历史冲突和地缘战略暗示着和平无法实现。左翼所主张的正确的道德立场，因其不正确的经验主义假想而受到连累。

为什么左翼要紧抓着这个经验主义的、不正确的假想不放呢？因为

这个假想能够令它否认1948年的悲剧，能够令它忽视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与犹太复国主义困境之间的裂痕。大家都知道，1967年的盲目幸福令右翼们相信大以色列是可能实现的；却没那么多人知晓，同样的盲目幸福导致左翼们相信大和平的可能性。这两种幻想的权力斗争使左右翼双方可以逃避现实，也令以色列可以逃避现实。因为占领是不道德的、是破坏性的，所以左翼放弃了坚持结束占领的合理的、理性的态度，于是左翼赞成这个不健全、非理性的信念——结束占领将带来和平。当时流行着这样一种倾向：将定居者和定居点视为罪恶的源头，忽视没有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地位。当时还有一种神奇的信念，认为以色列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以致能够以结束占领的方式结束冲突。左翼采取这种和平假象，因为它站在救世主的角度，它要赋予以色列一种崭新的生存状态。它要以一片假想未来的开阔蓝天取代我们脚下的荒原。

于是我们得知，和平不再是和平。它不再受到政权、利益、时机、威胁以及同盟的现实分析的约束。它不再受到合理判断的束缚。它忽略了阿拉伯人的愿望及政治文化，忽略了数百万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存在，这些难民不关注占领，而是迫切希望返回他们失去的巴勒斯坦。这种和平不是基于诸多事务的真实状态，而是基于思想的情感状态。它是一种心愿，一种信念，一种信仰。在我所长大的以色列，和平是一种生存需要，从中催生出一种救世主观念。它令以色列支持和平的阿什克纳齐犹太白人（White Ashkenazi Supporters of Peace，WASP）相信，他们可以不用做残酷的事情就能成为以色列人。这种观念令不断前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自欺欺人地相信，他们可以安抚犹太复国主义被剥夺的其他继承权。因此和平演变成世俗部族的图腾。和平承诺我们，我们可以是纯正的、公义的、美好的。和平意味着，我们不用再进行持续几个世纪的争战，因为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悲剧书写下一个愉快的结局。

我开车驶往耶路撒冷，去拜访泽夫·斯坦赫尔、梅纳赫姆·布林克尔（Menachem Brinker）以及阿维赛·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这三位都是以色列和平运动进程中引领时代的知识分子。其中的两位是我的

大学教授，第三位是我的政治导师。我询问他们究竟哪一步出了差错，又是什么挫败了和平进程。

斯坦赫尔说，奥斯陆协定作用太小，签订得也太迟了。但真正的问题是，左翼势力从来没有成功地超越那些信誉卓著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精英集团，它也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类似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派的政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及时地拯救以色列的原因，”斯坦赫尔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我如今饱受焦虑，”他这样说，“以色列就是我的生命，但我却看到以色列正在走向衰亡。我看到一种不治之症吞噬着我如此深爱的国家。”

布林克尔的观点就仿佛是我自己理论的翻版，这令我感到惊讶。他说，就像右翼一样，左翼也屈从于六日战争后随之而来的救世主妄想。这种妄想深信以色列是全能的，确信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是天真的，但我们同样也是傲慢的，”布林克尔说道，“原则上，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但我们不愿去承认这种立场是不适用于现在的情况的。首先，众多的阿拉伯国家对我们说‘不’。然后，侯赛因国王也说‘不行’。巴勒斯坦人总是那么浮躁善变。但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些难题。我们坚持认为，如果以色列一步一步地走下来，和平就会来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容易受到来自右翼的攻讦。一次又一次，右翼揭露了我们的内在矛盾，证明我们所指望的阿拉伯同伴从来不曾真正在那里。”

马格利特同样出乎我的意料。他根本都不信任奥斯陆协议。人不能两步跨过一条‘鸿沟’。他预见到了暴力、谋杀以及某种势头的受损。他预见到，现在的欢欣鼓舞会像蒸发的水汽一样消失殆尽，而其反作用将会占据上风。他从来没有信任过拉宾、佩雷斯和巴拉克，也不相信在戴维营[注]可以达成所谓的和平，但他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批判这场和平进程，因为他不想对它造成妨碍。作为一场运动，这次和平运动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他这样说道，“这么多年来，关于占领的辩论中，我们

占主导地位，我们甚至赢得了对右翼的口头胜利，这使他们最终采纳了我们关于两国解决方案[注]的措辞。然而，在最后的决斗中，我们经历了惨败。我们没有阻止殖民活动，我们没有结成一个足够广泛和强大的联合体来阻止定居者。现在已经太迟了。现在的境况几乎毫无转圜余地。我没有看到在以色列国内还有什么力量，足够强大到阻止这个我的父辈们所建立的国度变成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

我坐在耶路撒冷德国殖民区的一家咖啡馆里。附近，在劳埃德乔治大街上，矗立着现在实现和平运动的总部，当我还是个学生时，我曾在这里度过了很多个漫长的夜晚。在这里，我们曾尝试阻止黎巴嫩战争——然后失败了；在这里，我们曾尝试阻止定居点运动——然后失败了；在这里，我们曾尝试带来和平——然后失败了。在这里，我们没有成功阻止世俗的右翼势力和宗教的右翼势力攻占我们挚爱的、理智的以色列。这里有充满力量的经历，这里的战斗鼓舞着我们。那些抗议活动支持着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念，对和平的期望赋予我们意义。然而，在聆听萨里德、贝林、斯坦赫尔、布林克尔和马格利特的讲述之后，我扪心自问，我们的缺陷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以这样惊人的方式宣告失败？

我的答案很简单。我们争取和平是正确的。我们送贝林的团队去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会面，为他们提供一桩伟大的交易——让一个解除武装的巴勒斯坦与一个犹太民主的以色列沿着1967年的边界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这也是正确的。但我们决不应该向我们自己许诺和平，或者假想和平即将来临。我们应当足够清醒地说，占领必须结束，即便结束占领并不能平息争端。我们的目标是划下一条边界，并为这条边界争取国际认同，然后逐步地、谨慎地退至这条新的边界。我们的任务是说服以色列的公众，一个占领别国领土的以色列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一个结束占领的以色列是可行的，也是强大的。我们的使命就是设计最伟大的犹太复国主义工程，土地分治。

但是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对世界和我们的人民说必须停止占领，即

便不能取得和平。我们没有告诉我们自己关于巴勒斯坦人的事实，即他们想要回到1948年前的村庄和家园。与其勇敢地面对当下的现实，我们更倾向于“现在实现和平”的浪漫信念。因此，当绝佳时机在1993年降临时，我们错过了它。在奥斯陆，我们试图以一个有缺陷的和平理念在中东现实施加影响，但很快遭到拒绝。然而，即使在遭到非常明显的拒绝后，我们仍然紧握着这个有缺陷的理念不放。当公交巴士在我们城市的街道上爆炸，我们仍然唱着我们假想和平的圣歌。我们就是这样失去了来自同胞的信任和尊敬，他们背弃了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对和平的渴望正在转变成一出可怕的闹剧。我们的失败，并不是我们所遭遇的对抗力量所造成的，而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弱点，出于我们所缺乏的理智、正直和勇气，出于我们的不成熟。对于那些我们理当继承的来自以色列创始人的遗产，我们从不屑去继承；对于那些我们理当跟从的步伐，我们也从不屈就遵循。和平集团回避着历史的连续统一性。它拒绝承担真正的责任，依旧延续着20世纪70年代抗议运动的模式。

萨里德、贝林、斯坦赫尔、布林克尔以及马格利特，是我这一代人的导师和领袖，而我感觉距离他们如此之近。我感受到了共鸣和吸引。尽管我与他们争论，我们仍是一体的。萨里德、马格利特和布林克尔理解1967年夏天的占领是多么愚蠢。贝林和斯坦赫尔看到了1973年战争及1977年剧变之后的光明。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很早且很清楚地抓住了历史的这一面。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战斗，哪怕被一致认为是疯子和叛徒。但是我的导师们所培育的恋母政治文化，其主题却是弑父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从来没有长大过。他们永远不会成为领袖。而且，他们犯下了一个错误：将占领问题从以色列生命及中东现实的广阔背景中剥离。至少三次，他们是盲目的：他们看到了国内圈子里的冲突，一个以色列的哥利亚威胁着一个巴勒斯坦的戴维，但他们并没有看到在外部圈子中，一个阿拉伯伊斯兰的哥利亚威胁着一个以色列的戴维；他们看到了，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1967年的占领是灾难性的，但他们没有看到对于很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还有其他的事件远比占领更严峻，他们发自肺腑地投以关切，比如他们在1948年失去的家园；他们知道，以色列

不得不处理关于占领的挑战，但他们忽略或者说不予理会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其他严峻挑战。因为这三个认知缺陷，他们的视野有了缺损，他们所接触的现实范围越来越狭窄，直到最后，他们脱离了现实。这些善良的以色列左翼及以色列和平运动的领导人，逐渐失去了重要地位。

我开车驶回特拉维夫，与阿莫斯·奥兹会面。我们很早就彼此相熟。20年里，我们曾经面对面地探讨人生和文学，辩论和平与政治。尽管我确实敬爱他，但近年来，我却经常与他意见分歧。奥兹就是那个和平的预言家。他是和平运动的古鲁，是以色列和平圣会的领军拉比。

我发现阿莫斯的心情大好。在意大利，他们刚刚上演了一部歌剧，正是以他的诗歌小说《同一片海》（The Same Sea）为底本。他的书已经被翻译为数十种语言，在数十个国家流传。这个曾经的耶路撒冷孤儿在胡尔达基布兹建立了家庭，现在是以色列最杰出的作家。但他的头颅仍然没有高高昂起，就像他一直以来那般谦逊。我和他相约在拉马塔维夫的一家整洁朴素的咖啡馆里见面，他穿着格子的衬衣和米黄色的裤子，坐在一个偏僻的角落。他站起来迎接我，并和我握手。

“我不是一个东方学者，”奥兹说道，“但我每天早上所做的工作——从早5点开始，就是尝试进入人们的大脑，想象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1967年6月，当我穿着制服，提着乌兹冲锋枪，自西奈沙漠的战场返回耶路撒冷时，我看到的不是戴维王的都城。我看到擦皮鞋的阿拉伯小伙子恐惧地看着我。我回忆起了我在英属托管所度过的童年时光，记起了板着脸的可怕的英国士兵。我明白，尽管耶路撒冷是我的城市，但它仍然是个外邦城市。我明白，我不该统治它，以色列也不能统治它。古老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过去，却不是我们的现在，并将危及我们的未来。很多人都喜欢对其‘神圣的安宁’的描述，而我们不能被这样的宁静所诱惑”。

“当我回到胡尔达时，我意识到，我在耶路撒冷所看到的情景，其他人并没有看到。右翼和工党主流都将1967年战争视为1948年的完成。

我们在那时因不够强大而不能做的事情，现在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我们在那时不能征服的地方，现在被我们攻占。我认为，这种思想状态是危险的。我意识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是巴勒斯坦穷人们的羔羊。我知道，我们绝不能占领它。一英尺都不行，一个定居点都不行。我们必须以一个担保人的身份持有这片领土，直至和平降临。

“工党的狮子们——利瓦伊·埃斯科尔（Levi Eshkol）、平夏斯·萨皮尔、阿巴·埃班（Abba Eban）、伊扎克·本·阿哈龙（Yitzhak Ben Aharon）——就跟我想的一样。然而那些狐狸却想着吞并这块土地。于是，当狮子们不再咆哮时，狐狸们昂起了它们的头颅，而我孤军奋战。记者乌里·艾弗纳瑞和阿莫斯·凯南（Amos Kenan）固然在我之前,但在工党的内部世界里，我的确是“出头炮”。我撰文反对摩西·达扬关于‘生存空间’的渴望，反对号召土地解放的华丽辞藻。我呼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我综合考虑了道德和现实，只有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双方互相承认各自独立建国。

“我遭受到凶猛的攻击，即便在我自己的工党报纸《话报》上，即便在我的胡尔达基布兹。一个专栏作家同事要求《话报》停止刊登我的文章。其他人对待我就像对待一个叛徒或者疯子。与此同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Shmuel Yosef Agnon），还有杰出诗人乌里·兹维·格林贝格（Uri Zvi Grinberg）、内森·奥尔特曼（Nathan Alterman）和哈伊姆·古里（Chaim Gouri）这些以色列受人尊敬的小说家和诗人都赞同大以色列的观点。我看着这个国家渐行渐远，变换了它的面容。它不再是我心目中以色列，不再是我所知道的以色列。

“在20世纪90年代初，情况是完全不同的。现实震撼，并改变了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1973年的战争令阿拉伯人认识到，他们不能以暴力占领我们。1987年至1992年的巴勒斯坦大起义令以色列人认识到，这里还有一支巴勒斯坦民族，他们不会离去。他们就在这里，他们在这里停留定居。在一百年的集体失明后，我们突然看到了对方的存在。另一方

消失的幻想破灭了。这就是为什么，极少数以色列人所持有的观点在六日战争后被大多数以色列人所接受。1967年左翼人士的思想，变成了拉宾、佩雷斯以及1993年政府的舞台。和平，从边缘地带转移到政治的中心。

“我近距离地观看到拉宾和佩雷斯所走过的和平进程。我非常了解他们，两人都经常在周五的夜晚来到胡尔达拜访我。改变拉宾的是以色列的青年们。他意识到，这些21世纪的小伙子们可不会像他在1948年那般投入战斗。改变佩雷斯的是世界。他访问了很多国家，倾听了很多言论，然后，他意识到，他绝对不想把以色列变成一个新的南非。基于不同的理由和不同的方式，拉宾和佩雷斯都认识到，冲突必须停止了。他们曾经是具有远见的鹰派，现在变成了迟疑不决的鸽派。

“当佩雷斯秘密给我送来一份奥斯陆协议的草案，我发现了问题。我明白，在现实情况里，我们在这里签署的是一份棘手的三方协议，三方涉及以色列政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那些定居者。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相信，奥斯陆协议能够使阻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认知高墙轰然倒塌。一旦这座高墙倒下，我们就将前进一大步。我们将一步一步地前进，迈向真正的历史性的和解。

“我犯了一个大错，低估了恐惧的重要性。右翼最强大的论据就是恐惧。他们不曾大声地宣告这一点，因为他们羞于说出口，但他们有最令人无可辩驳的论据，那就是我们在害怕。这是一个正当的论据。我同样也害怕那些阿拉伯人。因此，如果我可以重新开启和平运动，这会做出改变。我将指出我们对阿拉伯人的畏惧。我将就以色列人对灭绝的恐惧心态发表一个真诚的对话。

“绝望吗？我还没有绝望。奥斯陆协议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因为它只是一个不被父母所爱的婴儿。但还不算太晚，定居点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双方都知道，妥协和折中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不曾彼此相爱。他们互相欺骗，他们互相大吼大叫。但是，不管他们是否喜欢对方，他

们互相看到了彼此。从这个意义上说，1993年的情感突破是真实的。禁忌被突破了。认知的障碍物倒塌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直面巴勒斯坦人，国家与国家直接对话，探讨对这片土地的分治方法。这是不小的功绩，那时的和平是尚未失败的实验成品。”

就这样，我在胡尔达，在这个阿莫斯·奥兹居住了半辈子的基布兹结束了我寻访和平的旅程。胡尔达是贝谢门的孪生妹妹，它以一个种植业农场的形式兴起，其目的是教导犹太移民如何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工作。它地处国家的中心，建在1908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从阿拉伯人手里购置的土地上，临近雅法至耶路撒冷的铁路以及阿拉伯人的村庄胡尔达。一个纪念西奥多·赫茨尔的橄榄园也被种植在这里，还建有一栋名叫赫茨尔庄园的富丽堂皇的宅邸。但是，在1929年夏天，胡尔达农场被它的阿拉伯邻居们袭击并焚毁了。因此，一年后，当温和的、追求和谐的社会主义公社戈登尼亚在这里定居时，在赫茨尔庄园的宅邸、在橄榄园附近的赫茨尔松树林，社员们做出了这样的声明：尽管我们被瞄准射击，尽管我们的房子被焚烧殆尽，尽管我们的林木被连根拔起，然而，我们永不放弃我们的梦想。

在18年的时间里，胡尔达的犹太复国主义公社和胡尔达的巴勒斯坦村庄和谐相处。这些建造乌托邦的先锋者们与那些遵循传统的村民们是关系融洽的邻居。但当1947年联合国的分治决议拟定后，敌意忽然迸发，事态改变了。1948年3月31日，阿拉伯人袭击了一支正驶向被围困的耶路撒冷的胡尔达的车队，杀害了22名乘客。本·古里安决定，犹太人已经受够了。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六个星期前，这位想要成为建国者的人决定，犹太人必须向前推进攻势，占领沿途的阿拉伯村庄，打通前往耶路撒冷的道路。1948年4月6日，凌晨两点刚过，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军队离开了胡尔达基布兹，穿过了赫茨尔森林，袭击胡尔达的阿拉伯村庄。凌晨4点时，村庄被攻占。村民们四散逃亡，在几个星期之内，房子被拆毁，田地被劫掠干净。很多巴勒斯坦胡尔达村庄的土地，被转移到了胡尔达基布兹的名下。

45年后，我同巴勒斯坦的难民穿行过以色列。1993年4月，当挪威正在推进秘密的和平进程时，我带着贾马尔·蒙赫尔（Jamal Munheir）回到胡尔达。我一直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寻找胡尔达的难民，最终找到了他。这位70岁的巴勒斯坦老人铭记着他的村庄，就好像他刚刚离开不久一样。他从来不怀疑任何事情，他告诉我。他还能怀疑什么呢？这么多年来，他观察着他的犹太邻居们，最开始是满腹疑虑，然后是感到惊奇，再然后是带着钦佩。他看着这些从俄罗斯来的苍白、贫穷的犹太人来到这里，看着他们逐渐强大，在这里扎根，将它们的橄榄园打造成一块人间天堂。他们学会了种植小麦、照料羊群、榨橄榄油。从他与犹太人毗邻的田野里，他感觉到他的新邻居们是正派而勤劳的。尽管他们的行事非常奇怪，尽管他们的女人几乎是半裸的，尽管他们服从公社的分配，不允许一个人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但他们有着一种奉献精神。尽管他们不敬畏安拉，但他们是恭敬的。村庄与公社分享水井。当巴勒斯坦的姑娘们从深深的古井里汲水时，这些基布兹的社员礼貌而耐心地在一旁等候。他们还会参观村庄的马达法旅馆，还会邀请村民参观他们自己的公共餐厅。他们从村民那里购置蔬菜，同时为村民提供药品和医疗服务。贾马尔同样与他的邻居们有着生意往来。到晚上，他会与那个讲阿拉伯语的田地看守阿哈龙坐在一处。阿哈龙会给贾马尔讲述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童话故事，而贾马尔会告诉阿哈龙那些关于恶魔的古老传奇。他们会安静地坐在篝火旁，小口地呷着小杯子里的浓郁黑咖啡，侧耳倾听从周边村庄传来的遥远的夜号，那是豺在这美好的夜晚发出声声嗥叫。

然而，很快，1948年4月，一支犹太军队来到这里，在深深的古井旁架设了一部迫击炮，开始炮击这座村庄。然后，犹太士兵们踏上了姑娘们曾经来来往往的小路，她们在过去头顶着装满水的陶罐，稳稳地走在这条小路上。整个村庄都被机关枪的火力笼罩了。贾马尔·蒙赫尔带上他的老母亲，把她推上一只骆驼的背上，带着家人逃到代尔慕黑森[注]。然后，就在第二天，代尔慕黑森也遭受袭击，他带着母亲和家人又逃到阿布舒莎。而两个星期后，他在阿布舒莎看到推土机把他在胡尔达的

家园夷为平地，他出生在那里，他父亲出生在那里，他祖父也出生在那里，而现在，他看到白色粉尘聚成的巨大云朵从那个村庄冉冉升起。

一个月后，犹太军队抵达了阿布舒莎，贾马尔·蒙赫尔又逃到艾尔古拜卜。从艾尔古拜卜，他逃到艾因阿里；从艾因阿里，他逃到亚塔；从亚塔，他逃到安曼；然后又从安曼回到亚塔。从那时一直到现今，他成为希伯伦郊区、西岸的亚塔村里的一个一文不名的难民。

然而，贾马尔告诉我，在那些流亡的日子里，在这么多年的岁月里，他从未忘记过胡尔达。因此，当1993年春天，我开车载着他行驶在通往胡尔达的公路上时，他咧嘴笑得像个孩子，嘴里呢喃着：胡尔达，胡尔达。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媲美胡尔达的土地。他带着我来到打谷场的遗迹，收获的谷物曾经堆积在这里；带着我来到一堆碎石残壁，这里曾经是他姑母的房子；带着我看一堆碎砖瓦砾，这里曾经是他叔叔的房子；还有他曾经的家，现在是一堆废墟。他告诉我，他实在不知道如何表述他心中所想。只有神知道，只有安拉自己知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一处地方，再没有其他地方像这里一样，没有也不会有其他任何地方。这里是贾马尔·蒙赫尔在这个世上唯一的家园。

离开已成废墟的村庄，我们驶向赫茨尔森林，我把车泊在赫茨尔庄园的旁边。我们坐在古老的松树下，一阵轻柔的带着玫瑰芬芳的微风轻抚着我们的面庞。四下是森林的寂静。贾马尔抬起手，指着我们前方土地说道：“这就是我的基址，这就是我的土地。这里有蒙赫尔家族数百德南的土地。”

“在过去，你可真是个富有的人。”我说道。立即，我意识到，我犯了个可怕的大错。贾马尔爆发了：“当我来到这里，我的心像有火在焚烧。我步入这里时，我都要疯了。我们曾经是受尊敬的人，英国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尊敬我们，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的话语是有分量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东西？乞丐而已！　没有人会听我们讲话，没有人会尊重我们。我们，曾经拥有这片土地，现在却不能

拥有它出产的一粒小麦。我们所拥有的全部，不过是一张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UNRWA）所颁发的难民证。”

他沉默了。在古老的松树下，唯一的声响就是我的小录音机录下的沉默。直到贾马尔再次转向我，他哭着说，从胡尔达诞生伊始，他的祖辈们就居住在这里，在这里去世，在这里安眠。几百年来，他们开垦这片土地。世世代代，他们从古老的水井里汲水。直到犹太人来到胡尔达，抹去了蒙赫尔家族；直到犹太人征服了这里，把胡尔达洗劫掠一空。“拉希德在哪里？”贾马尔哭道，“穆罕默德又在哪里？我们村庄的人民又在哪里？我们的胡尔达又在哪里？”

在胡尔达村庄的所有房舍中，只有马达法旅社得以保存。这个小型而迷人的旅社仍然矗立在南部山峦的顶部，居高临下，美景令人窒息。它有着坚固的黑色玄武岩墙体，平坦的屋顶，拱形的窗户。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雕塑家的工作车间，四周是一个雕塑主题公园。在我带着贾马尔·蒙赫尔来到这里的将近20年后，当我走近这座建筑，恰逢警报声划破了宁静。又是一年春天，又是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日。吞噬我的警报声是记忆中的警报。所以，我在马达法前立正站立。在尖啸的警报声中，我看到了那个消逝的村庄——胡尔达。

距离贾马尔·蒙赫尔引领我穿过他的胡尔达已经过去了20年，村庄的废墟已经彻底被破坏。什么都不曾留下，除了马达法、角豆树、一小段仙人掌组成的灌木篱墙、一些房屋的残垣、另一段墙以及一堆碎石瓦砾。巴勒斯坦的胡尔达村庄已经被犹太人的基布兹米什马尔戴维所继承。近些年来，米什马尔戴维处境艰难，已不能再称其为一个基布兹。所以现在，继承村庄的基布兹消失了，取代它的是以色列新兴资产阶级所建立的一个中上层阶级的社区。一辆巨大的推土机将原基布兹的一座旧式的、象征平等主义的房屋夷为平地。在这个曾经的阿拉伯村庄里，在贾马尔·蒙赫尔曾经的家园和土地上，阿拉伯工人们为犹太人建起了一座座别墅。

这一次的行程只有我一个人，但我完全复制了20年前，我与贾马尔走过的路程。我开车来到赫茨尔森林，把车停在赫茨尔庄园的旁边，在古老的松树林间徜徉。还是同样的寂静，还是同样的轻柔的风。

我首先登上殖民的赫茨尔庄园的外部楼梯，来到二楼的游廊。我向外眺望那片森林，体会这片森林对犹太人的慰藉。然后，我来到一座纪念雕像前，他是一名著名的守卫，1929年因保护这片森林和这栋房子牺牲在这里。然后，我走出森林，踏上分隔胡尔达公社的橄榄园和贾马尔·蒙赫尔的麦田的小路。这是犹大平原上最漂亮的小路之一，小路两边都是一排郁郁的、高大的棕榈树，一直连至地平线。微风是柔和的，天空是一种高贵的蓝。我的左边是胡尔达基布兹的轮廓，我的右边是消失的阿拉伯胡尔达村庄的剪影。

胡尔达是我个人传记的一部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在冬天的周末来到这里的森林寻找蘑菇。当我长成一个少年，我跟我的朋友骑着自行车来到这里冒险。当我成为一名士兵，我会开着我父亲的车载着女朋友来这里休假。之后，当我成为一名和平运动积极分子，我开着我的红色的大众甲壳虫汽车，载着阿莫斯·奥兹参加现在实现和平运动的示威游行。然而，自1993年春天，我跟着贾马尔·蒙赫尔拜访这里后，我心目中胡尔达的意义改变了，我心目中的家乡也改变了，和平运动，同样也改变了。我现在意识到，为什么以色列活跃的反战分子要反对占领。我现在理解了，我们这些支持和平的阿什克纳齐犹太白人所发挥的卓越作用——现在的冲突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过去冲突里那些令人无法容忍的侵害。我们必须保护自己，避免历史重演，重蹈覆辙，不让贾马尔·蒙赫尔的遭遇落到我们身上。我们专注于占领，这样，我们就可以证明我们自己，证明那矗立于胡尔达中部的豪华葡萄园就是某种不法行径的证据。

葡萄园在1999年被建造，现在已经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葡萄园之一。6种不同品种的葡萄在这里生长，包括梅洛、赤霞珠和长相思。葡萄园

里的葡萄被精心照料着，长势喜人，健壮繁荣，每一排葡萄的末端都盛放着一丛粉红的玫瑰。

葡萄园中第1排至第190排葡萄位于西胡尔达。这里，在基布兹和小路之间，曾经坐落着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橄榄园。第191排至第285排葡萄位于东胡尔达。这里，在小路和水井之间，曾经是贾马尔·蒙赫尔的麦田。肥沃的土地，贫瘠的土地。土地就在我们的脚下变换了模样。

我走下干涸的河床。那口深深的水井现在已经被锁上了。我找到了那个方形水池，井水被抽上来后在这里蓄积。我走上了那条小路，那些巴勒斯坦的姑娘们曾经头顶着陶质的水罐在这里来来往往。我走上这条以色列士兵曾经登上的小路，他们在井边架设了迫击炮，用直径三英寸的炮弹射向村庄。我再次在村庄的山丘顶驻足，俯视着胡尔达村庄。两英里之外是特拉基色的黄色峰顶，大约一个世纪以前，赫伯特·本特威奇曾经在那里定居。一英里半外是阿布舒莎的灰色废墟，1940年，约瑟夫·魏茨曾经在那里得出结论：为了生存，犹太复国主义必须清缴土地，驱逐本土的阿拉伯居民。这里也是基布兹胡尔达从田野里兴起的地方。赫茨尔森林，赫茨尔庄园，以及那口古井，还有胡尔达的葡萄园。两排郁郁的棕榈树向天边延伸，一直到消失在地平线。

这里是胡尔达，真是愚蠢。这里不是奥弗拉，而是胡尔达，我这样告诉自己。奥弗拉是一个错误，一个畸变，一个疯子。但是，在原则上，奥弗拉也许会拥有一个解决方案。但胡尔达则是问题的症结。胡尔达不是冲突的确切指向，胡尔达没有解决办法。胡尔达是我们的宿命。

我们的倾向是明确的。基布兹胡尔达并不是出自恶意。它的意愿并不是为了主宰。它也没有企图剥夺、驱逐或者取而代之。所有胡尔达先驱们所想达成的，不过是一个关系亲密的公社。他们的梦想只是聚集一个由四五十个自由人组成的大家庭，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结成伙伴关系工作，人人平等，与自然交流，从而证明，犹太民族身上因大离散生活造成的隐疾是可以治愈的。他们寻求着一条出路，以期待解决现代人离心

离德的危机，征服机械，在胡尔达的土地上，种下一个和谐、正义、和平的种子。

难道我们不曾来到胡尔达吗？或者，当战争爆发时，难道我们不曾在胡尔达浴血奋战吗？难道我们不曾派遣我们的士兵征服胡尔达临近的阿拉伯村庄吗？难道我们不曾占据这些村庄的房屋和田地吗？难道我们不曾硬起心肠、残忍地对待我们的邻居们，给他们带来这样的灾难吗？

他们的态度同样也是明确的。难道他们不曾反对我们对山谷的渗透吗？难道他们不曾袭击、烧毁、破坏我们殖民地的农田吗？然而，一个世代后，难道他们不能阻止对胡尔达车队的残酷袭击，难道这不是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中的一部分吗？在他们经历惨变之后，难道他们不会仇恨我们，恨我们占领他们的村庄、夺取他们的田地、把他们送上放逐之路吗？难道这样的仇恨可以消除吗？难道可以期待这些巴勒斯坦人放弃伸张胡尔达村庄的正义的要求吗？难道有人可以期待贾马尔·蒙赫尔的儿女和孙辈总有一天会接受我们在他们被毁的家园上修筑房屋、在他们被劫掠的田地上种植六种品种的葡萄的事实吗？

使这片土地上的这两支民族实现和平共处，很可能远远超过了人类能力。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眼中的正义的诉求。我们不可能放弃我们的生活。阿拉伯人的胡尔达和犹太人的胡尔达不会真正地正视彼此的存在，不会真正地彼此承认、实现和平，约西·萨里德、尤西·贝林、泽夫·斯坦赫尔、梅纳赫姆·布林克尔、阿维赛·马格利特以及阿莫斯·奥兹针对愚蠢的占领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战斗，尽一切所能推行和平。但一直到最后，他们也没有真正地正视贾马尔·蒙赫尔，他们不能正视胡尔达的事实。出于那些最美好的缘由，他们对和平的承诺其实是虚假的。

现在，我在胡尔达只看到一位真正清楚地知晓残酷现实的领导人，那就是摩西·达扬。在1956年，一名年轻的治安官员罗伊·罗滕伯格（Roy Rotenberg）在巡视以色列——加沙边境的执勤中牺牲，而当时这位以色列的参谋长在他的葬礼上说下了关于巴以冲突的最诚挚的讲话：

在前一天的黎明，罗伊被谋杀了。春天早晨的宁静蒙蔽了他，以至于他没有看到那些隐匿在犁沟后面想要杀害他的那些人。今天，我们不要责怪那些凶手。对于他们对我们可怕的仇恨，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八年来，他们就坐在加沙的难民营帐篷里，用他们的那双眼睛见证着，我们是如何把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和村庄变成我们自己的家园。罗伊的血债，不仅仅要归在加沙的这些阿拉伯人身上，还要算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怎么能这样闭目不看我们的命运，怎么能拒绝正视我们的命运，拒绝正视那残忍至极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

让我们在今天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于定居点的一代，如果没有这些钢盔和枪口，我们不可能种下一棵树、建造一座房屋。我们不要畏惧生活在我们周边成百上千的阿拉伯人，不要畏惧充斥在他们的生命中的对我们的仇恨。我们不要垂下我们的目光，以免我们的手臂变得虚弱无力。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这就是我们的选择——时刻准备着、武装着、强硬着、艰难着——否则，刀剑就会从我们的手中脱落，我们的生命将终结。

随着岁月的流逝，达扬的洞察力已经变得黯淡无光，被人遗忘。以色列人已经无力承担它的残忍智慧。六日战争令我们可以摆脱它尖刻的睿智。右翼孕育了自以为是的幻想，而左翼则被自己的道德假象所迷惑。经历了两代人后，奥弗拉的罪恶遮蔽了胡尔达的罪恶。但胡尔达依旧在这儿，胡尔达依旧在这儿停驻。而胡尔达，毫无解决之法。胡尔达宣告着和平将不会到来。

我沿着山下来直到井边，走到葡萄园。这里是那样的美丽、平静。但这里的土壤是坚硬的，这里的土地是被诅咒的。因为就在这里，1948年的4月6日的胡尔达村庄，历史的大门嘎吱嘎吱地打开了。就在这里，在赫茨尔森林的尽头，犹太人迈过了存在于公社的橄榄园和贾马尔·蒙赫尔的田地之间的门槛，进入了禁地。在经历1800年无权的生活之后，犹太士兵们雇佣了一支庞大的、有组织的军队，占领了另一支民族

的土地，占领了数十个村庄——其中，胡尔达是当中的第一个。就在这里，在胡尔达深深的古井边，我们从历史的一个阶段跨入另一个阶段，从道德的一面转到另一面。长久以来如鬼魅般萦绕在我们心头的那些东西，恰恰就在这里。而那些将继续如鬼魅般萦绕在我们心头的那些东西恰恰也在这里。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萦绕，一场战争接一场战争地纠缠。

---

1. Brit Shalom，由青年工人党于1929年建立的政治组织。其指导思想是的所谓“双民族国家”，具体内容为：巴勒斯坦既不是犹太人的国家也不是阿拉伯人的国家；它是一个双民族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是平等的公民，他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享有平等的权利，没有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之分。两个民族在各自的内部事务管理方面都有各自独立的自主权，但在共同利益方面是一致的。面对巴勒斯坦的现实，它主张阿拉伯人应承认犹太移民有进入巴勒斯坦的权利及购买土地的权利，而犹太机构也应当相应地取消禁止雇佣非犹太人的规定。但这个政治组织的主张并没有得到阿拉伯人的响应，影响并不大。Brit Shalom在《犹太复国主义史》[英]沃尔特·拉克著；徐方、阎瑞松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中译为“布里特沙洛姆”；《战时中东》[英]乔治·柯克著；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译为“伊胡德”；《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背景和前途：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肥沃的新月地带》（[英]R.艾伦著；艾玮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译为“布里·沙隆”。
2. Khirbet Khizeh，小说里一个虚构的阿拉伯村庄的名字。
3. 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1913年8月16日~1992年3月8日），波兰籍犹太人，1977年至1983年出任以色列总理。是第一位利库德集团出身的总理。1978年因以色列与埃及和解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1982年发动了第五次中东战争。
4. 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1928年2月26日~2014年1月11日），以色列前国防部长（1981~1984）、前总理（2001年3月7日~2006年4月11日）。以色列建国以来战功最大的将军，也是利库德集团创建人之一。
5. 出自《撒母耳记·下》第2章第24节：“押尼珥呼叫约押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
6. 以色列西部海滨城市，位于特拉维夫以北15公里。
7. 奥斯陆，挪威首都。
8. 1994年2月25日犹太右翼极端分子、美国公民巴鲁克·戈尔茨坦在西岸城市希伯伦的麦比拉洞清真寺，用机枪向正在做礼拜的1 100名穆斯林乱枪扫射，打死29人，打伤约150人；并在此后一段时间引发多起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报复性恐怖袭击。
9. 历任美国总统的度假行馆，位于华盛顿以北113公里的马里兰州山区。建于1938年，最早是美国政府官员的休假地，后来成为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美国总统小罗斯福的专

用疗养所；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改名为“戴维营”，戴维是艾森豪威尔孙子的名字。

10. 阿莫斯提出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双方互相承认独立建国的方案。

11. 一个位于拉姆勒（Ramle Subdistrict）的阿拉伯村庄。

第十一章
控诉，**1999**



阿里耶·马克鲁夫·德里（Aryeh Machluf Deri）本来可以在巴黎成为一名律师。他在摩洛哥北部城市梅克内斯长大，富裕的生活使他梦想成功的人生，梦想被法国所认可。在20世纪60年代，哈桑二世国王将他的庇护延伸到犹太人身上。在这个年轻的北非王国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和谐相处。生活秩序井然，充实丰盛，带着地中海式的宁静韵律。犹太人的社区非常强大。然而，当伊利亚胡（Eliahu）和埃丝特·德里（Esther Deri）意识到，他们5岁的儿子是一个数学天才时，他们期望他

可以展开翅膀，飞越他们所居住的快乐的摩洛哥犹太人社区。因为他们总是仰望法国，仰望它的现代化、它的启蒙运动以及法国赋予犹太人的平等权利，德里夫妇希望他们的儿子可以在那里开创一个未来。他们想象在巴黎、里昂或者马赛，他会成为一名律师，或者医生，或者一名数学教授。

在伊利亚胡10岁的时候，他成为孤儿。一天早晨他发现她深爱的母亲毫无生气地躺在床上，就在他的身边。接下来的十年，他过得非常艰难。他被年长的兄弟欺负。他给一个裁缝当学徒，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为法国军队缝制和熨烫制服。但伊利亚胡做得非常棒，他逐渐长大了，结了婚，成了自食其力的男人。他在梅克内斯的市中心开了一家店，成为一个成功的裁缝。北非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快速的现代化令欧洲服装的需求量增长了一倍甚至两倍，这正是伊利亚胡所擅长的。政治家、商人和官员们，全都来到他的小店订购服装。不久之后，这位从拥挤的姆拉克犹太区走出来的身无分文的孤儿，就有能力将他的小家庭迁至新的城镇维尔努维，他们搬到一栋带门房的智能建筑的宽敞公寓里。他们拥有两个女仆、一台电视、镀金的家具。他们会在丹吉尔最好的度假胜地度过夏天的假期。当埃丝特的仆人们烹饪、打扫、照料孩子时，她就能偷偷穿过街道到电影院观看汉弗莱·博加特（Humphrey Bogart）的电影。阿里耶像一个小王子那样长大，他喜欢踢英式足球、游泳，他喜欢阅读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小说。在假期，伊利亚胡会带着大儿子和二儿子去犹太教堂，伊利亚胡盛装打扮他们，给他们穿上剪裁得体的西装，系上丝绸的领带。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到曾经贫穷的孤儿已经拥有多么好的生活。德里一家享受着舒适的生活，这是战后摩洛哥的资产阶级犹太人所享受的典型的、充满希望的生活。

梅克内斯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面，姆拉克犹太区保存了犹太人的社区和犹太人身份；另一方面，维尔努维城镇也为法国人提供富裕的生活。德里一家，以及很多像他们这样的家庭，会在安息日的早晨参加犹太集会，但他们的孩子们却在周六下午踢足球、看电影。他们与

占据人口大多数的阿拉伯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与此同时，所有人都警惕地保护着自己身份的唯一性。在战后的那些年里，后殖民时代的梅克内斯成功地保持了地中海东部地区半殖民地时期的和谐，在这里，阿拉伯国家、犹太人以及法国文化交织在一起，现代与传统兼备。

六日战争破坏了这种融合。在1967年的夏天，仿佛一夜之间，一切都改变了。顾客们不再光顾伊利亚胡·德里的裁缝店，阿拉伯的雇工们开始在他背后窃窃私语。一天，一个过路人吐了口唾沫在德里精致的西装上，嘴里咕哝道：“Sale Juif.”意思是“肮脏的犹太佬”。德里愤怒地回到家。“我们应该去以色列。”他这样说道。没有告知他们的邻居，他们变卖了所有能卖出去的东西。他们把他们的家具打包进一个集装箱，他通过犹太事务局兑换货币，将现金都缝进伊利亚胡为孩子们缝制的冬衣外套的双衬里，告诉他们的朋友，他们要去法国度假。在一个深夜，他们叫来了一辆出租车，驶抵卡萨布兰卡。从卡萨布兰卡，他们飞到了马赛，在马赛，他们登上了一艘去海法的轮船。

埃丝特还记得，当他们离开梅克内斯时，她哭了。当他们登上去卡萨布兰卡的飞机时，她再次哭了起来。摩洛哥的生活是优渥的。但不管她如何恳求和劝诱她的丈夫返回摩洛哥，丈夫都听不进去。阿拉伯人突然的心态改变羞辱了他。直到他栖身在马赛的临时中转营时，他才开始为自己草率的决定而感到后悔。直到他抵达海法的港口，他才开始意识到他做了什么事。当他得知他们的行李还没有抵达时，他大发雷霆。当他知道他在马赛的住房承诺不能兑现时，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恐惧地看着暴怒的伊利亚胡掀翻了一张桌子。

阿里耶·马克鲁夫·德里记得，早在马赛的中转营地里，他的父亲与母亲已经关系紧张。但他们对未来的以色列生活寄予了最美好的希望，并购买了可以让生活更舒适的一切所需：一个冰箱、一个洗衣机、一个搅拌机。船上的旅程其实充满了乐趣。孩子们在甲板上疯狂地嬉戏，到了晚上，成人们会跳起探戈和斗牛舞。但当他们在海法下船后，他的父

亲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他说话大声，情绪紧张，茫然若失。他还不能理解他草率选择的这个新世界的诸多规则。于是，他会提高他的声音，大声高呼和叫嚷。他失去了他的高贵。

这个家庭被送到特拉维夫南部、里雄莱锡安的一个海滨城镇。他们的狭小的公寓里，除了犹太事务局定制的金属床和几张军用毛毯，什么都没有。他们的现金还没到账时，伊利亚胡每天都去银行询问；集装箱还没抵达时，他每天都跑去犹太事务局。他要求一个更好的公寓，要在一个更好的位置，有更好的条件。他开始变得情绪暴躁，他的血压也上升了。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愿出来。他躺在床上整天哭泣。

三个月后，这个家庭从里雄莱锡安的50平方米的公寓搬到位于巴特亚姆的一间100平方米的公寓。现在的居住空间大了一点儿，但附近的环境非常糟糕。很多居住在伊利科恩供给房社区的利比亚移民家庭就生活在社群的边缘。一些邻居是正派且努力工作的，但另一些则是有轻微犯罪的罪犯。他们吸毒、卖淫，有的还是街头帮派的成员。由于伊利亚胡·德里患上了抑郁症，保护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责任就落在埃丝特·德里的肩上。她把他们锁在家里，以免他们被街上的习气带坏。

一天傍晚，两个穿着长长的黑色外套的极端正统派年轻犹太人敲响了德里家的大门。他们听说德里家的小伙子们天分卓绝，建议把这两个小伙子送进内坦亚的一所宗教寄宿学校。埃丝特·德里大吃一惊。她完全不懂极端正统派，送她的孩子进入宗教寄宿学校的主意把她吓到了。这听起来可不人道。但她对毒品、卖淫、街头帮派更加恐惧。经过漫长的、令人心碎的考虑后，埃丝特将她的长子耶胡达（Yehuda）以及天分卓绝的阿里耶，交到了这两个年轻男人的手里。这两个才华横溢的摩洛哥男孩被送到内坦亚的桑莰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们完全与妹妹、弟弟、母亲和受创的父亲断绝了联系。

桑莰犹太学校的拉比是一名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导师，很快俘虏了阿里耶·德里的心房。但这个地方本身却是荒废破旧、肮脏不堪、令人

痛苦。阿里耶还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惩罚，为什么他会在九岁半的时候就离开了自己的母亲。在晚上，他会痛哭失声，白天，他会尝试逃跑。他从垃圾桶里收集了很多瓶子，卖给当地的杂货铺，用这些钱买了一张巴士车票回到了巴特亚姆。在家里，他大哭着，想要说服他的母亲让他留下，直到那位拉比来到家里，告诉埃丝特，她的儿子会成为一名前途光明的犹太律法学者。环视着阴郁凄凉的供给房，她再次把她的儿子交到了拉比的手里。

在这期间，埃丝特开始在巴特亚姆的一家工会所属的纺织厂上轮班。伊利亚胡也有所好转，为一家工会所属的男子服饰用品店裁剪雨衣。荣誉还没有回归，富裕的生活也不曾到来，也没有太多的快乐。然而，德里一家在被摩洛哥到以色列的急剧转变打击后，这个家庭正在使自己适应一种新生活——东方以色列人无产阶级灰色的、沮丧的生活。

阿里耶这个神童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在内坦亚悲惨的极端正统派寄宿学校里度过了他来到以色列国的第一个夏天。他逃跑，回来，又逃跑。几个月之后，他被送到另一所极端正统派的寄宿学校，然后又被送到另一所学校。在海德拉，生活条件同样是寒碜的，孤独感差点儿毁了这个孩子，但当他10岁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严守教规的犹太人。校长舒坤（Shukrun）拉比，对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那样，并对他的教育投入极大的热情。阿里耶一个月回家一次，当他在家时，他可以在星期五的晚上通过电视观看阿拉伯的电影，或者在安息日踢足球。但在学校里，他戴着圆顶小帽，研习塔木德[注]。三年后，他被送到耶路撒冷塞法迪犹太人[注]的波拉特·约瑟夫神学院。两年后，他被送到一所塞法迪犹太人和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混合犹太学校。在经历七年半的塞法迪犹太人低等、中等学校教育后，阿里耶·马克鲁夫·德里抵达了阿什克纳齐犹太人极端正统派世界的伊顿。

希伯伦也是戴维·约瑟夫（David Yosef）的学校，他是以色列首席塞法迪犹太人拉比奥瓦迪亚·约瑟夫（Ovadia Yosef）的儿子。这位首席

塞法迪犹太人拉比的儿子是一个资质平庸的学生，正需要才华横溢、富有魅力的德里的帮助和指导。作为回报，他建议阿里耶成为他弟弟的导师。于是，在阿里耶18岁的时候，伊利亚胡·德里和埃丝特·德里的儿子进入了约瑟夫的家庭。在莫里代号轮船停靠海法港的十年后，甲板上那个来自梅克内斯的被宠坏的世俗传统小伙子阿里耶·德里，成为以色列塞法迪犹太人贵族法院的后起之秀。

阿里耶的梦想就是为塞法迪犹太人的学生建立一所精英神学院。但在首席拉比的家里度过的生活令他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德里与一个漂亮的孤儿雅法（Yaffa）结婚后，一个朋友说服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公共服务。他自封的使命是说服塞法迪犹太人拉比约瑟夫和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超级拉比艾拉扎·沙克（Elazar Shach），联名保举建立一个新的塞法迪犹太人的宗教政党。于是，沙斯党诞生了。1984年，阿里耶·德里25岁时，他统治着这个东方的极端正统派政党，在它参与的第一次大选中，沙斯党一举获得以色列议会的四个席位。他即将改变以色列的面孔。

当他26岁时，阿里耶·德里是内政部部长旗下的一名有影响力的顾问。当他27岁时，他成为内政部的处长。当他29岁时，他成为内政部部长。尽管他没有任何公共行政方面的经验，也不清楚以色列社会，却不妨碍阿里耶·德里在一夜之间成为政坛明星。他同时增进了极端正统派和东方犹太人的事业。因为他是一个鸽派，因此左派对他有着好感。因为他支持定居者，因此右派也很欣赏他。因为他在内政部设置的议程令外面很多选民受益，他也赢得了商界和媒体的尊重。德里还成功地在不疏远其他选区的前提下，壮大了他所代表的两个少数民族选区。在他30岁时，他成了进入以色列国家权力核心集团的第一位极端正统派的东方犹太人。他是最令人激动、最承载希望的新以色列的人物。

1990年6月，以色列最具影响力的日报《新消息报》（Yediot Aharonot）刊登了一系列调查报道，声称德里贪污腐败。国家审计官和

警方公开了调查结果，德里实施了报复性的反击。他攻击《新消息报》，攻击国家审计官，攻击警方。人民的英雄变成了人民的敌人。他不仅被认为是一个受贿者，而且还被认为蓄意地无视法律。他失去了左翼的喜爱，失去了右翼的支持，精英集团也不再接纳他。阿里耶·德里只能撤退到一个忠于他的主场：传统的东方犹太人社会。

三年来德里都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一方面，他仍然是一个成功的内政部长，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以色列贡献巨大。他积极推动吸纳大量的俄罗斯移民，在防止以色列卷入第一次海湾战争上，起了积极作用，他也一直都是拉宾总理重要而勇敢的同盟。另一方面，他已经失去了一名标准政治家的正统性。因此，他把自己非凡的能量倾注到一个平行的以色列体系的构架中：一个宗教的东方世界，在接受政府资助的同时挑战并破坏其权威。这位沙斯党的领袖利用他的政治力量，兴建了一套宗教教育体系和一套宗教福利体系，它们将替代以色列这个腐朽的福利国家中功能失调的通用体系。他发挥了自己的管理能力和组织建设能力，建立起一个被压迫者和被践踏者的王国。因为开明的以色列拒绝了他，他也拒绝了开明的以色列。与其做一个联合者和医治者，阿里耶·德里更倾向于做一个东方传统犹太人的领导者，带领他们反抗这个由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的世俗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国度。

……

反抗的第一次爆发发生在1996年的大选期间。那是刚签订奥斯陆协议的那几年，政府是主张和平的政府。以色列的上层阶级感觉到以色列的世俗主义又重新掌握了力量。但在下层社会，被压迫的犹太人的反抗情绪正在酝酿。就国家层面而言，这场运动的图腾是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但从民族层面说，其身份的贯通是通过沙斯党。德里非常清楚这一点。他看到了，蕴含在由于文化分歧导致的不满情绪的潜力。他同样看到了，那一波恐怖主义袭击浪潮导致和平承诺化为泡影，恐惧因此震慑住了以色列人的心神。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给

他的选民们提供一些另外的东西：一些神秘的东西。德里再次找到了拉比伊扎克·卡杜瑞（Yitzhak Kaduri），一名100岁的卡巴拉神秘学大师，他使德里成为大选上的明星。卡杜瑞的护身符和祝福被分发给全体民众，而这位年迈的拉比乘坐直升飞机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巡游，参加绝望的、穷苦的传统东方犹太人召集的集会，他们紧紧抓住年迈拉比所说的每一个单词——尽管有时玄妙得难以理解。通过利用卡杜瑞和卡巴拉神秘学，德里从这些曾经拒绝世俗进步的犹太人手里，从这些曾经建立这个国家的犹太人手里，赢得了25万张选票以及在以色列议会上的10个席位。他带领很多塞法迪犹太人回到他们传统的神秘学的根基，回到骄傲与慰藉的源泉。

反抗的第二次爆发在1997年4月降临。以色列世俗的、鸽派的精英集团将内塔尼亚胡——德里的政府视作一个非法的政府。德里在法庭上为之倾力斗争。突然，在逾越节前夕，国家突然指控德里，疑似说服内塔尼亚胡总理委任一名变节的律师以期逃避进一步的腐败指控。警方以失信罪控告内塔尼亚胡总理及其他涉事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但不像塞法迪犹太人的德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被审判。这个结果引起了公众的义愤。在希伯来大学的体育场，成千上万的沙斯党支持者穿过了犹太议会和最高法院，聚集在一起声援德里。民族间的内战迫在眉睫。

但德里克制着自己，也约束着他的民众。他呼吁浩瀚的、愤怒的人群不要诉诸暴力。但在那个炙热的日子里，他选择的那些词句被视作他对这个国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告别。“犹太复国主义的宏图已经失败了，”他这样说道：

> 现在，世俗的犹太人害怕沙斯党改变这个国家的世俗状态。他们自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们绝不是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的运动是异端邪说的运动。他们把我们的父亲与母亲视作原始人。他们想要改变我们父母的宗教信仰。他们把我们的父母送到偏远的城镇和村庄，那里的生活极其艰难困苦。他们让这些父母的孩

子接受徒劳无益的教育，直到我们来了，才开始照料所有在偏远地区忍受折磨的同胞。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害怕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迫害我们。这是民族的迫害，也是宗教的迫害。然而，他们越是羞辱我们，我们就越发成长。我们将改变以色列国度的本质。

反抗的第三次爆发发生在1999年的春夏。1993年3月17日，耶路撒冷地区法院查处阿里耶·马克鲁夫·德里的罪行——收受贿赂，金额高达155 000美元。一个星期后，他被判决四年有期徒刑。一反常规，法院的判决宣读通过广播电台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现场直播报道。法官不仅宣读了对他的判决，还把他描述为一个道德败坏、居心叵测的人。当他从法庭走出来时，他的支持者感到心灰意冷，看起来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完蛋了。但仅仅几小时，阿里耶·德里又聚集起了力量。此时距离选举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他决定，要把自己的悲剧变成这场选举的主题。他把自己和一个摄影师锁在办公室里，发表了一个关于生命的演讲："我控诉(注)！"他哭了起来。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融合了两个观念：把他自己与法律法规联系起来，把塞法迪犹太人的教义与这个国家联系起来。阿里耶·马克鲁夫·德里现在成了东方犹太人的象征：被拒绝、被羞辱和被迫害，世俗的阿什克纳齐当权派对尊重传统东方犹太人的不甘愿，被以色列犹太人所排斥。

德里的"我控诉"是一次成功的演讲。为了满足需求，白天成千上万的盒式录像带在欧洲生产出来，连夜运向以色列。这一次不需要卡杜瑞的护身符，也没有多少兴趣投注在奥瓦迪亚·约瑟夫身上，整个大选其实都在关注德里。城镇发展、穷困区的自治市镇，还有那些偏远的村庄，全都火了。每个人都想看着德里、接触德里、与他产生共鸣。当一个以色列人宣判他有罪，另一个则认为他是无辜的，并让他成为英雄。一波基于以色列种族分化的抗议浪潮高涨起来。20世纪50年代刚刚抵达时遭受的创伤，60年代民族同化时的痛苦，70年代被歧视的感觉，80年

代的抗议苗头，如今一起汇集成对这个刚刚被判有罪的东方犹太人领袖的支持。德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他成了一名殉道者，在东方犹太人痛苦和悲剧凝结的十字架上，德里就是那个酷刑的承受人。在法庭宣判这该死决议的60天后，430 000张选票投给了德里和他的政党，东方犹太人的反抗到达了一个高潮。在1999年的6月，几乎每6个以色列人中就有一个人把选票投给了这位挑战现行秩序，并且已被判4年徒刑的革命领袖。沙斯党在议会中占据的席位，从上一次选举中的10张增加到了17张。

2000年7月，以色列最高法院驳回了德里的上诉，但把他的刑期减少到3年，因为最高法院发现德里从他的校友处接受的贿赂只有6万美元。问题是，如果在官司结束10年后发现，最初的指控只有这么点儿钱，德里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惩罚仍然是合理的吗？难道真的没有其他以色列的高级政客从朋友处收受非法的钱财，又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吗？然而法律就是法律，而现在，这个宣判是最终判决。

2000年9月3日，新学年的第一天，阿里耶·德里带着他年幼的女儿们来到他在耶路撒冷创办的塞法迪犹太人的小学。这所小学以首席塞法迪犹太人拉比的已故妻子玛格丽特·约瑟夫的名字命名。在摄像机镜头前，他哭泣着向他的三个女儿告别。离开学校，他被送到监狱。沙斯党的支持者们想让他们的领袖作为一个国王走进监狱，而不是作为一个重罪犯。当他离开耶路撒冷时，成千上万的民众等在那里支持他。从耶路撒冷到特拉维夫的高速公路几乎瘫痪，因为将近一千辆轿车和公交车由一支摩托车队引领着，跟随着德里从首都直到玛西亚胡监狱。在监狱外，又聚集了更多的达数十万的民众。奥瓦迪亚·约瑟夫拉比让这些民众相信，就像《圣经》里下埃及的约瑟，德里将离开监狱，成为以色列的国王。德里请求民众的宽恕，但他发誓他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被这样的挫折所击倒。在一个方阵的警察的护卫下，在他的跟随者们反复的高声吟诵中，德里与他的妻子雅法和他的父母告别，走进了监狱的大门。当夜幕降临，他躺在他的9平方米、没有窗户的单人囚室的双层铁

架床上，把脸深深埋进手里，听着他的崇拜者们在监狱的高墙外歌唱。他想象着他的妻子和父母忧心如焚的脸庞，思索着他所走过的长长旅程。突然，他感觉再也不能承受了，他崩溃了。在混乱的十年后，他在夜晚失声痛哭，就像他曾经在寄宿学校失声痛哭时候的那样：“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

“所以，你故事中的核心是什么呢？”十年后，我问德里，“东方犹太人故事的核心又是什么呢？这两个故事真的可以汇聚于同一点吗？”

我们现在坐在他耶路撒冷偏僻的办公室里，这里是阿里耶·德里隐退下来独居、思考的地方。四周的墙壁覆满了奥瓦迪亚·约瑟夫拉比以及其他鲜为人知的塞法迪犹太人拉比的照片。书架上堆放着成卷成卷的圣经、密西拿[注]和塔木德。书桌上放置着昨天的报纸。在他为我冲泡了浓郁的黑咖啡后，德里建议我尝试一下他朋友刚给他寄来的精致的比利时巧克力。然后，他坐下来，抚摸着他修剪整齐的胡子，拍着他的黑色圆顶小帽，就这样看着我。他的眼里有喜悦，他已经准备好了，情绪放松，几乎是安宁的。结束监禁已经好几年，他不再感到愤怒。坐在他的黑色皮沙发上，他可以平静地详细讲述他的个人传记。有时候，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不敢相信在他生命中这么短的一段时期内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不敢相信他的生活变成了这样一个传奇故事。“难以置信。”他小声咕哝道，似乎比我还难以相信。但我要求他告诉我更多时，他眯着眼睛，陷入了沉默。

“我不是那种以色列的典型东方犹太人，”德里告诉我，“绝大多数从阿拉伯国家移民到这里的东方犹太人是在20世纪50年代抵达这里的，但我来到这里时，已经是1968年。那些说阿拉伯语的移民所遭受的巨大创伤——比如他们刚抵达时被不加区分地喷洒滴滴涕、住在有辱身份的难民营帐篷里——这些我都不曾经历过。然而，当20世纪60年代抵达巴特亚姆时，满目疮痍，这一切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造成的，我看到一个满是裂痕的东方犹太人的社会。”

“发生了什么是一览无余的，”德里详细解释道，“东方犹太人的文化建立在三个支柱上：社区、会所以及父权。父亲是非常强大的——太强大了。他是支撑整个家庭的人，是整个家庭的王。他告诉他的妻子应该做什么。他告诉他的孩子学习什么、如何为人处事。即便在现代化的时代，即便受到了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影响，父亲和拉比仍然保持着主导地位。宗教、传统和父权，使东方犹太人得以保存并延续1 000年。我们没有经历欧洲风格的世俗化。我们没有经历西方的启蒙运动以及宗教反抗运动。我们过着宗教、传统以及初始现代化相融合的生活。我们仰望拉比，敬畏父亲，这样，我们才以一个社群的形式幸存下来。”

“抵达以色列后，”德里说道，“这个社群瓦解了。因为一种蓄意的政策让我们瓦解。拉比失去了他的权威，社群被分割，犹太会所大为削弱。但最糟糕的是，父权发生了改变——父亲的形象崩塌了。在这里，他不能像在摩洛哥或者伊拉克那样供养他的家庭；在这里，他失去了在突尼斯或者利比亚时的权威，他失去了他的风度，他陷入了沮丧消沉，他失去了他至关重要的意义。”

“这同样也是我们的危机，”德里说道，“当我们抵达以色列时，这里没有社区，没有会所，也没有拉比。而我的父亲是窘迫的。他明白，在我们邻居身上发生的事情也会降临在我们身上。整个家庭陷入了悲惨的穷困境地。我们这些孩子开始行为不端，开始讲起粗话。我的一个堂兄弟在街头帮派的对战中被枪杀。是母亲拯救了我们。在最初的震惊过后，她意识到，她不能再依赖父亲，于是，她积攒了足够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因为她是一位明智的、坚强的女人，她把我们锁在家里，因此我们没有误入歧途。但当她意识到这还不够时，她同意了敲响我们家门的两个拉比的提议，把我们送到寄宿学校。就个人和情感来说，这对她委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因为她太爱我们，她没有让她的心支配她的头脑。她其实不太明白，她要把我们送去的是什么地方。她也不知道，我们将成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但她知道，我们需要一个社会的组织机构，使我们不再混迹于街头。”

“你所说的，”我质疑德里，“一切都太偶然了。比起宗教化，你的父母显得太世俗；比起传统，你的父母则太现代了。他们喜欢亨弗莱·鲍嘉，他们跳斗牛舞。所以，如果没有年轻的拉比敲响你们家的门，你的生活很可能都不会有宗教的痕迹。如果是一个很好的世俗机构敲响你们家的门，也许你会成为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民主派工党的领袖。”

德里点头，但他十分谨慎，没有用自己的语言附和我的假设。他露出一个调皮的笑容，继续说道：“听着，我对工党可没有意见，对阿什克纳齐犹太人也没有意见。在家里，没有人说过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压迫着我们。那种感觉是我们经历了一场大灾难。我能理解20世纪5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毕竟，以色列是一个贫穷的、年轻的国家，而且被它的敌人所包围。它是脆弱的，还处在战后恢复阶段，总共才有65万人口。而突然之间，这个弱小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国家被从中东迁来的大离散中的塞法迪犹太人的洪流所淹没——从也门，从摩洛哥，从突尼斯，从阿尔及利亚，从利比亚，从黎巴嫩，从埃及，社群一个接一个地涌入。

“于是，国家为这些新移民营造了供给房，为他们兴建工厂。几年之内，它拆除了那些丑陋的难民营，为这些新来者提供了立足之地和工作场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这个由阿什克纳齐犹太人所主导的国家不理解的是，这其实是夺走了东方犹太移民的社会、骄傲和传统。它粗暴地拆散了他们的社群和标准架构，而这种社群和架构令他们在大离散期间保持着联合统一。他们没有工具来应对这个新世界，没有与之相关的教育和意识，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失去了权威，也失去了方向。他们能做的只是在街头宣泄暴力，虚度光阴。于是，就这样，一代人迷失了。然后又一代人也迷失了。数十个贫民区和偏远的发展中城镇都变成了巴特亚姆的伊利科恩所变成的模样：被忽略，犯罪猖獗，前途渺茫。成千上万的东方犹太人青年在没有父亲、没有纪律、没有人生意义的环境下长大。”

“那些被拯救下来的人，”德里说道，“就是那些拥有强大母亲的

人。这是一个母亲的时代。在以色列东方犹太人的故事里，这些母亲是真正的英雄。但我认为，我的母亲还难以独自支撑。她需要一所寄宿学校。那些像我一样进入宗教寄宿学校的人就成了犹太律法学者；那些进入世俗寄宿学校的人，就成为工程师或者保险代理人。只有一位强大母亲和一所相应的寄宿学校的结合，才可以把你从混乱中拯救出来。只有当你离开你的家，离开你崩溃的父亲和瓦解的文化，你才能被拯救。”

“我告诉过你，我不怨恨工党，”德里道，“这句话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有一件事情真的激怒了我：那种精神层面的同化。当它修建难民营、供给房以及偏远的工厂时，工党的心里还是没有恶意的。但在精神层面，它确实怀揣恶意。那些工党的老派阿什克纳齐犹太人认为，绝大多数从阿拉伯国家迁来的民众都是落后的，因此必须经历一个世俗的、欧化的开化过程。所谓的‘大熔炉’是西方式的大熔炉，它想要完完全全地改变我们。那些工党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丝毫不尊重我们的文化。他们不能理解我们传统的美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切断我们的根系，践踏我们的文化遗产。这是可怕的、恶毒的错误。这些人所做的不是建设，而是毁灭。他们夺走了我们的灵魂，却没有给我们新的灵魂。而他们在没有确切地为我们提供一种新文化或者新身份的情况下，他们就撇下了我们，什么都没有留下。我们面临着极端的经济困难和身体考验，我们发现，自己以一种精神赤裸的姿态存在在这个世界里。”

“在这样的空虚状态里，极端正统派走进我们的生命，”德里说道，“在开始的几年里，我并不是真心敬畏上帝的。我只是学习着被教导的知识，做着被告知要做的事，按照被指导的那样穿衣打扮。当我独自一人时，当我在家里时，我并不像表现出来的那样敬虔。当13岁的我来到耶路撒冷时，我才发现律法世界的丰盛意义。我被波拉特·约瑟夫学校的拉比们深深吸引住了，他们对待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我被古老的耶路撒冷卡巴拉神秘学的奥秘深深吸引住了。圣殿的西墙[注]俘虏了我的心房，耶路撒冷的圣洁令我心醉，我开始以敬虔的态度研究犹太教。”

“我并没有碰到东方犹太人的问题，直到后来，”他这样讲道，“因为我是从一所塞法迪犹太人的温室转到另一所，我并没有遇见那些非塞法迪的犹太人。我也没有遇见那些非东方犹太人的犹太人。只有在希伯来的神学院，我才看到塞法迪犹太人对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卑躬屈膝，而他们的领袖也对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领袖卑躬屈膝。这里没有对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愤怒，情况恰恰相反。只有对他们接纳我们、接收我们、教导我们的感激。但我不喜欢这种自卑，我不愿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然后逐渐地，我注意到以前我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我们没有塞法迪犹太人的精神领袖，没有塞法迪犹太人的政治代表，没有优质的塞法迪犹太人的教育。我们完全地依靠阿什克纳齐犹太人。我们捡起善良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面包屑。”

“最初的时候我并没进行政治层面的思考，”德里继续说道，“那时我并不是以色列社会真正意义上的一分子，我不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所求的只是建立一所为塞法迪犹太小伙子们开设的、高质量的神学院。但是，在奥瓦迪亚拉比的家里，我开始理解政治。我看到了塑造以色列的政客和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到了建设沙斯党的主意。我相信，凭借沙克拉比和奥瓦迪亚拉比的联合，将会打造出一个政治的团体，它的意图是代表塞法迪的犹太教，并赢得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宗教支持。我并不是想要对抗。一些以色列黑豹党人[注]的思想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我想要的只是给予我的民众表达意愿的权利，给予一处地方放置他们的尊荣，让神圣的王冠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上。”

德里靠在他宽大的书桌上，他的目光明澈闪亮：“直到我成为内政部的处长，我才真正理解了以色列的东方犹太人问题。直到那时，在我的办公室里，我才真正离开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的封闭世界，开始了解以色列的社会。突然之间，我意识到，我正在对成千上万的市民负责，而他们中的弱势群体绝大多数都是阿拉伯人或者东方犹太人。我突然意识到，以色列所遭受的最苦楚的部分就是东方犹太人所遭受的苦楚。我发

现，我考察的每个偏远的发展中城镇都是被忽视的。在每一个贫穷的地区，我发现东方犹太人都失去了他们的尊严和身份。我发现社群被破坏了，家庭被撕裂了，他们的荣耀和传统被夺走了，他们眼中的火花已经熄灭了。一派欣欣向荣的背后是一个没有父亲、没有拉比、没有希望的以色列。传统的以色列东方犹太人被抛弃，独自地艰难求存，却常常迎来悲惨的失败。”

“我在政府工作的第一年，”德里告诉我，“我是想融合为一体，而不是自我隔离。我那时可是很受欢迎的，我是一个政坛明星，也是媒体的宠儿。我与很多世俗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政治家、记者和企业家都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他们喜欢我的直率、开朗和活力。在他们的以色列文化和我的以色列文化之间，我们找到了共同点。所以，我很有信心，以为可以在塞法迪犹太人与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在宗教与世俗的鸿沟之间架设一座桥梁。我相信，就如同那些精英们认同了我，他们也会认同我所代表的公众。我觉得，我的目的就是治愈和联合。要加强东方犹太人和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力量，只能把他们汇集到一个多族群的以色列，在这里他们将找到一块栖息之地。

“但随后，报纸上就出现了他们的指控。国家检察官、警察和司法部接踵而来。右翼和左翼的精英们都背弃了我。我无尚尊重和喜爱的沙克拉比，也抛弃了我。他永远不会原谅我，因为我在1990年与西蒙·佩雷斯尝试建立一个和平的政府。我变成孤单一人。我失去了我在世俗世界结交到的新朋友，也失去了我以前的拉比和极端正统派的阿什克纳齐朋友。现在，我不再是讨人喜欢的，而是被迫害的；我不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贱民。我所剩下的一切只是我的族群：塞法迪犹太人。只有他们仍然信任我，给了我一个拥抱。东方犹太人认同我，他们认为我的人生经历与他们何其相似。他们确信，我是一个把自己的心胸向以色列敞开的摩洛哥犹太人，以色列接受了，直到有一天，以色列在他面前猛地关上了大门，尽一切所能地打击他。”

“那段时间是很难克服的，”德里轻声说道，“孤独感真是太糟糕了。我没有一个人可以求助，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仰望。我失去了曾经当作母亲和拉比的以色列，同时也失去了曾经当作父亲的以色列。因此我被卡巴拉神秘学所吸引。我前往加利利参加宗教的退休会。我去乌克兰旅行，在乌曼，我躺在布莱斯劳拉比的坟墓旁边。尽管我不是一个信仰神秘主义的人，我却需要神秘主义带给我的安慰。我转向了原始的信仰。来自塞法迪犹太教、神秘主义和原始宗教的支持带给我力量，让我在四周的一切轰然坍塌时仍能昂首站立。在夜晚，我大声地对我们在天上的神父祷告。”

“所以，在1996年大选中我利用卡杜瑞的护身符和祝福并不是纯粹的操作手法，”德里继续说道，“它同样也寄托了我的个人苦楚和情感需求。1999年大选的愤怒也是如此。‘控诉’并不只是一招绝妙的政治策略，而是情感上的真实的抗议呐喊。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期间，我，阿里耶·德里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和以色列的东方犹太人群体所经历的事情，都有着惊人的相关性。在建国50年后，以色列正面临着一场内部抗争，而这次抗争将改变它的身份。”

“他们将我视为一个威胁，”德里告诉我道，“这里就站着一个人，就像他们一样正直。没有畏惧，没有羞愧。他是一个组织者、规划者、领导人，而这个人以最现代和最有效率的方式操作着一切。但是他代表着犹太教，他为东方犹太人仗义执言。他把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带出了他们居住的隔离区，他把东方犹太人从压迫中拯救出来。他在全国各地创造着变革——他建立了非正统的学校、社区中心，给人民提供了其他选择。他威胁着以色列阿什克纳齐犹太人文化的霸权地位，凿下了它作为一个西方国家身份的外衣。而这个人正日益强大，领导着这个国家短暂历史上最重要的革命。”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必须把我踢出游戏，”德里说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把我踢出政府，切断我与国家资源的联系；这就是为什

么，他们要攻击我的人格，这样甚至能让我的选民都来谴责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单单审查我，而不是审查其他任何人——用一把梳齿细密的梳子审查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单单审判我，而不是审判其他任何人——用推翻所有证据的方式审判我。他们对我动用私刑，将我打造成邪恶章鱼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成功了：他们把我驱逐出政坛，把我投进了监狱，把我变成了一个恶魔。

“但从另一层意义上说，他们又失败了：他们攻击我，却令那些民众更坚定了跟随我的信念。100万的以色列人相信，当政府尝试驱逐我的同时，也将试着驱逐他们。当政府对我关上了大门的同时，他们也将被滞留在外面。当这100万以色列人终于抬起头，他们回想起半个世纪前的经历。滴滴涕，难民营，卑躬屈膝。这就是为什么，1999年我们能在议会赢得17个席位。如果大选推迟一个月举行，我们会拿到25个甚至28个席位。我们将取代利库德集团，成为中右翼政治势力的领导。而计划就是当我出狱时，我们就会这样做。我们将拾起我们遗留的一切，赢得议会的30个席位。但当我在监狱的期间，我决定不要撕裂那道伤口，不要重新点燃那个火堆。这并不是说伤口就不在那儿，火焰也是如此，依然在那儿逗留。你根本不能想象，仍然在那里的伤口是多么疼痛。但我得出了结论，就是一切已经足够了。发生过的事情已经是极度危险的，以色列已经走到了悬崖边，而我不想重蹈覆辙。每当我现在想到那时即将发生的事情，我都不寒而栗。如果成真，只有上帝才能阻止20世纪90年代从我们自家屋顶上燃起的熊熊大火。当我重新开启我的政治生涯、登上公众平台，我想要做些不一样的事情。现在，我要以一种新方式处理那道旧伤痕。”

德里与我差不多年纪。我们共同的世代经历是相似的，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和政治主张也相距不远。我们有着相同的信念与共同的语言。德里的行事具有非常直接的以色列的特点。他行动迅速，反应敏捷，他的高智商正与他骄傲的自我相衬。在他身上闪耀着天才的光芒。我喜欢他。然而，德里生活的世界是遥远的。他有着另一种承诺和忠诚。他是

另一个世界的居民，而这个世界是我所不知道的。他活在当下，却是这样难觅其踪；他是这样开放，又是这样神秘莫测。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还没明确自己是谁，自己又将变成什么样子。他是徘徊在世界之间、身份认同之间的流浪者，他象征着伟大的以色列在社会和文化上的混乱。

德里不是某个问题，而是一个象征。他会过得很好。在离去13年后，德里重新回到公众舞台，再次成为沙斯党的政治领袖。尽管他的个人魅力有所削弱，也失去了传奇般的声望，但他再次跻身以色列的权力角逐的游戏圈，并成为一个强大的游戏者。所以当我离开他的耶路撒冷办公室时，我思索的不是他，而是他的社群。东方犹太人的故事是简单而残酷的，我这样认为。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经历了一个相对的黄金时代。因为他们与法国和英国殖民者关系良好，他们享受着法国与英国的保护。他们享受着之前从未有过的权利。许多在北非和中东的犹太人都受益于这些来自巴格达、大马士革、贝鲁特、开罗、亚历山大、突尼斯以及卡萨布兰卡的东方犹太人的帮助。但20世纪40~50年代，东方犹太人的魔法如蒸发的水汽般消散。殖民主义退败了，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犹太复国主义取得胜利。在短短几年里，一个文明轰然坍塌，历时千年的社群在几个月之内解体。历史的“利剑”轻轻一划，古老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柔软下腹就被撕开。那个令人心醉的、多元的东方消失了。100万阿拉伯犹太人流离失所，他们的世界被毁坏，他们的文化被摧毁，他们的家园荡然无存。

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故事同样也是简单而残酷的。以色列应当是东欧犹太人的家园——这是这个国家的设计理念。但是从1939年到1945年，东欧的犹太人几乎全部遇难。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犹太复国主义只能转向更东的东方。结果是讽刺的，在1897年，当犹太复国主义蓄势待发时，全世界的犹太人中只有7%是东方犹太人。1945年大屠杀之后，全世界的犹太人中只有10%是东方犹太人。但在以色列，到1990年时，以色列犹太人中的东方犹太人比例超过了50%。一个为一支部族设计的国家，却在人口上不敌另一支部族；一个立足于一种文化的

国家，却被另一种文化所占据。但犹太复国主义者却没有承认，或者说不能承认，这个已经发生的突然性转变。它不能承认，初始的蓝图已经不能适应新环境的改变。因此，犹太复国主义继续前行，并蓄意地忽略了它所造成的伤害。以色列的大熔炉便以残忍的高效率翻滚着，它固然塑造出了一个国家，但同时也烧焦了那些人的身份，煎熬着那些本应得救的灵魂。

所以，当1959年德里在梅克内斯出生时，以色列第一次世俗的东方犹太人起义在海法的瓦迪塞里伯贫民区爆发。当1970年德里在悲惨的海德拉寄宿学校艰难度日时，第二次世俗的以色列东方犹太人起义在耶路撒冷的马斯拉拉贫民区爆发，当地的黑豹党也随之出现。当20世纪70年代中期，德里成为耶路撒冷的一名神学院的学生时，一种世俗的、文化的东方犹太人起义爆发了，伴随着兴起了一种新式的东方犹太人的音乐，尽管被主流电台和电视平台所忽略，但在巴特亚姆街道上的每一家夜总会里演奏着。德里并不知道这些变化的含义，因为他加入以色列的时间很晚，因为那时他一直生活在一块极端正统派的东方犹太人的飞地上。即便德里在1977年选举中赢得以色列东方犹太人的热烈支持，德里的热情也一点儿都不高。作为一名沙克拉比的门徒，他从来没有信任过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国家，他也不赞成贝京的犹太民族主义。然而，当贝京消失后，留下了一大帮孤立的以色列东方犹太人，德里看到了这块空白并迅速填补了它。最开始，他利用奥瓦迪亚·约瑟夫拉比扮演父亲的形象来代替贝京。然后，他又引进卡杜瑞拉比作为神秘的安慰师。然后，他将自己定义为东方犹太教的一名殉道者。而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地让自己超脱出政治和世俗，并同时获得了一个半神话人物形象的理想世界。

当我开着车驶离耶路撒冷时，我听着琐辖·阿尔格弗（Zohar Argov）的一张歌曲汇编专辑。阿尔格弗出生在里雄莱锡安，1968年，德里一家就被送进这个街区。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阿尔格弗和德里住得相距不远。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个羞涩的、瘦长的歌手用他温柔

的、令人心痛的歌声征服了下层的以色列民众，他的歌声成为他们战斗的圣歌。他们在特拉维夫混乱的中央巴士车站出售歌曲的盒式录音带，他们在婚礼上演唱，他们的歌声在巴特亚姆、雅法、内坦亚、拉姆拉的东方犹太人夜总会里回荡。这么多年来，阿尔格弗并不为上层的以色列人所知。当他终于被接纳时，他服用了过量药物，与世长辞。尽管他令人心碎的歌声大多数的主题都是歌唱爱情和失去，但我的车厢里似乎充斥着被压迫的巨大苦痛。当我驶上德里的车队开向玛西亚胡监狱的那条高速公路，我从阿尔格弗的歌谣中听到了长期遭受痛苦的东方犹太人的尖号。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东方犹太人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广泛承认。尽管他们占据了以色列近一半的人口，但他们是被压制、被忽略的。以这种古怪的方式，他们仿佛在场又仿佛不在场，仿佛归属于这里又仿佛不属于这里。他们的身后始终跟随着一团疑虑的烟云。他们不是我们的成员，不能真的算作我们当中的一员。

在军队里我已经是一个少数派。我在伞兵排里服役，像我这样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精英是不被尊重的。直到1977年把梅纳赫姆·贝京送上权力高位的政治动荡，以及暴力的、极富煽动性的1981年大选，才令政治权力转移到另一支部族的手里。人们再也不能忽视东方犹太人占据大多数人口的事实。他们从难民营、供给房、发展中城镇里走出来，几乎一个世代，他们都被限制在这些地方，而现在，他们即将俘虏城市广场。就政治方面而言，他们是利库德集团；就社会经济层面而言，他们是建筑承包商和小企业主；就文化方面而言，他们是琐辖·阿尔格弗的歌迷——尽管他的歌我并不怎么喜欢。

但在自由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圈子里，东方犹太人掀起的浪潮是一种带敌意的回应。20世纪80~90年代的种族歧视比以前的时代更加面目可憎，带着蔑视的诽谤，那些人是暴发户，那些人行为不检，他们的英语真是糟糕透顶，他们对于关乎荣誉的事情总是神经过敏，他们是印度

人，他们都是地中海东部人，他们是利库德集团分子，他们令我们建立的国家蒙羞，而最终他们将打倒我们。从这些评论里，我看到了开明的以色列黑暗的一面，以及那些自诩文明的人缺乏教养的一面。东方犹太人的故事令我着迷。随着我聆听到越来越多的移民故事以及越来越多关于压迫的故事，我意识到，我们做错了。我忧虑着，也许有一天，以色列东方犹太人的苦楚将把我们炸成碎片。

在某种意义上，它就像阿哈龙·阿佩菲尔德的故事。同样的国家否认了大离散，否认了大屠杀，否认了巴勒斯坦，同样否认了东方犹太人。也许已经没有其他方法了。为了生存，当权派试图打造一支强大的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但付出的人性的代价是沉重的，长期的后果也是严重的。我们伤害了数百万的东方犹太人。

然而，还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看待这一切。在政治上，有一个很难表达的错误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以色列为这些来自东方的犹太人帮了一个忙。那里的犹太人在新巴格达、新贝鲁特、新开罗、新梅克内斯都不会有真正的未来。如果他们继续停留在那里，他们很可能会被彻底消灭。但是，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身份和文化的确是莽撞、冷酷、残忍的做法。直到今天，很多东方犹太人还不清楚，是以色列拯救了他们：让他们脱离了对他们怀揣敌意的阿拉伯中东，让他们脱离那种苦难、落后的生活。直到今天，以色列还没有感觉到它强加给东方犹太人的痛苦：它摧毁了东方犹太人的文化和身份。无论是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它的东方犹太人民众，都没有完整地认识到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创伤。任何一方都没有寻求一种方式来尊重它、遏制它，来实现和平。这就是为什么，这条创伤历久犹存。

在特拉维夫的一家咖啡馆里，我见到了盖尔·加拜（Gal Gabai）。加拜是一名记者，也是一个颇受欢迎的政治脱口秀栏目的主持人，是我的朋友和同行。我问她，是什么使她支持阿里耶·德里。“你是一个世俗的、女权主义的左翼分子，”我对她说道，“你致力于民族、自由和法

治。为什么你会对这个被判受贿罪的极端正统派政客如此着迷？他的世界离你那么遥远。”

比德里年轻10岁的加拜说，那时还是20世纪70年代，她还是个贝尔谢巴的小姑娘，她记得那时被两种极性不同的力量拉扯撕裂的情形。一个是ruge raas ：法令要求你高昂起头颅。另一个是khshumeh的力量：羞愧，需要在人前掩藏，绝不能让他们看到你的耻辱。数十年来，khshumeh的力量一直强于ruge raas，羞愧强于骄傲。“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身上有什么不对劲，就在东方犹太人身上，”加拜说道，“是一种被玷污、低人一等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卑躬屈膝，在他们面前贬低我们自己。这是一种微妙的、复杂的自我厌弃，是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深深不安。直到德里来了，向我们证明我们可以昂首屹立，骄傲地、平等地走在阿什克纳齐犹太人之间。德里将北非犹太人的传统带上了中央舞台。他告诉我们，虽然不是特别出色，但我们也是不错的。他唤醒了我们心中的ruge raas，他让我们能够高昂起我们的头颅。他甚至赋予像我一样的东方犹太嬉皮士与我们自己和平相处的能力，并让我们觉得是有价值的。德里认为，我可以被特拉维夫所接受，而不是回到贝尔谢巴。他认为，我们可以在不背弃东方的情况下就能在西方取得成功。

“我记得，我对德里产生的压倒一切的认同，源起自我祖母的贝尔谢巴供给房社区，”加拜回忆道，“德里让供给房社区找回了传统，这是工党从来没有意识到的，是利库德集团从来不曾鼓励过的。德里提供了一个传统文化的选择，这个选择不是羞愧的、落后的，也不是狂热的。他终止了我们对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模仿，他扫除了我们的羞耻。他并不是通过伪装自己来赢得我们的信任。不像他之前的以色列东方犹太人领袖，德里是真实而坦率的。他认同自己，也认同他的东方犹太人身份。当其他人假装成欧洲人时，德里大声说出他是一个摩洛哥犹太人。这是一种解放。你都不能想象，阿里，这是多么意义非凡的一种解放。终于，我们其中的一个，从梅克内斯来的一个摩洛哥犹太人，不再畏惧

他的身份，不再害怕诉之于口。他为自己感到骄傲，为他的全部而骄傲。”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加拜说道，“血腥镇压换来归属顺从。在归属的河流里，我们东方犹太人流的血还不够多。我们没有在大屠杀中遇难，我们没有在独立战争中牺牲，我们没有参与大屠杀后英雄主义式的复兴传奇。我们是被输送到这里的，而我们被输送的时间已经太晚。我们被输送到这里的唯一原因，是欧洲犹太人已经灭绝了，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壮大这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总有一片阴影盘旋在我们头上：这个地方并不真正地适合我们，这些公共住房并不那么适合我们。它与我们不相容，直到现在仍是如此。我们已经没有了其他的家园，但对我们来说，以色列也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我们在这里并不像在自己家里那样轻松自在。”

“让我这么说吧，”加拜继续说道，“就其职权范围和使命宣言而言，以色列国家的计划里并不包括阿里耶·德里或者盖尔·加拜。在以色列的思维中都没有出现过这些人。然而，到了最后，欧洲的堡垒里却住满了讲着阿拉伯语的犹太人，例如阿里耶·德里和盖尔·加拜。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城堡的建筑结构和建造者的精神意志判决阿里耶·德里和盖尔·加拜维持待在城外的状态。西方化的犹太复国主义畏惧我们。它畏惧我们带来的阿拉伯主义：阿拉伯的音乐，阿拉伯式烹饪的气味和味道，阿拉伯的言谈举止。想一想，这里正发生着奇妙的事情。大屠杀之后，犹太复国主义将100万的阿拉伯犹太人带到这里，以便在人口上维持犹太复国主义，从阿拉伯世界输入了100万人；但当它把这些阿拉伯犹太人带进来后，却恐慌起他们的阿拉伯身份。从我祖父的摩洛哥音乐、我祖母烹饪的摩洛哥菜肴、我父亲遵循的摩洛哥传统习俗中，它感觉到危险。它畏惧我们这些东方犹太人会从内部分化西方的犹太复国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犹太复国主义要压迫我们，”加拜说道，“他

们必须支配我们。问题不在于某种社会经济的不公正，不关乎住房、福利或者收入。来自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新移民同样生活贫苦。他们与我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最开始的归属地不同。他们被包含在以色列国家的意义和计划之内，而我们从一开始，就受到以色列的怀疑。所以，我们在文化上遭到阉割。我们被期待着放弃以前的自己。每一天，我们都必须证明我们不是阿拉伯人。其结果就是一场分裂我们的内部战争，一直持续至今。我们不能接纳我们自己，我们不能爱自己。我们被分割到不曾真正相交的不同世界。我们总是被要求出示当下的证据。我们不得不证明，我们不是劣等的，不是有缺陷的。我们必须证明，我们已经彻底被同化了。每一天我们都必须证明，我们不再是阿拉伯人。”

“你还没有理解，”加拜告诉我，“你是这里的人，你是归属于这里的人。在以色列，你就像在家里一样。你拥有这个地方。我虽然生长在这里，却清楚地知道，这里是有一个内部圈子的，而我并不是当中的一部分。这里有一个社群甲，而我并不在其中。因为家庭充满了爱，我因此而获得力量。我拥有了我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坚持要打进这个圈子。我想要跟那些强大的、归属这里的人走在一起，这也是我的家庭教导我的。他们教导的首先是教育：学习，学习，学习。但显而易见，光有知识是不够的，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就得漂白我们自己。而漂白后裔就是社会流动中最可靠的媒介。我敬爱的祖母会用她的母语这样告诉我：‘对于你，盖尔，一个摩洛哥人不能成就任何事，除非你搭上一个波兰小伙子。’这一点钻进了我的潜意识。找一个摩洛哥配偶是毫无出路的——如果我与一个摩洛哥人结婚，他可能会成为一个热情的社会工作者，我也许会成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高中教师。晚上，我们会在贝尔谢巴供给房社区一间三室的公寓聆听美妙的民族音乐。但是，因为我雄心勃勃，我必须与白人的权力交配。我不得不用白人的精子稀释我体内的纯黑。

“我们的家庭到处充满音乐。即便在那艰难困苦的时期，我们的房子里也流淌着温暖的摩洛哥音乐。但我的祖母带我去听了场古典音乐

会，当我走出剧场时我就暗下决心，我将来要演奏曼陀林——不是摩洛哥的乌得琴，而是俄罗斯的曼陀林；不是演奏法里德·艾–阿塔什（Farid al-Atrash）(注)，而是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曲目。我热爱着柴可夫斯基。我热爱曼陀林。但在我心目中，总是有一种对已失去的向往，对阿拉伯的向往。当我拜访阿拉伯的朋友，我的眼睛就湿润了。当我观看阿拉伯电影，我就会被挑动所有的情感。我知道，在那里，在摩洛哥，我的父亲是安闲自在的。在以色列，他从来不曾享受过安闲自在，他把他的不自在也传给了我。尽管我住在特拉维夫，主持一个电视节目，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安闲自在，我不想自欺欺人。阿拉伯国家已经将我关在门外。但在某种意义上，以色列同样也将我拒之门外。虽然我的三个孩子已有二分之一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血统，但以色列仍然不会接纳我。以色列仍然对我心存疑虑。”

“这就是为什么，德里如此重要，”加拜说道，“在德里之前和德里之后，以色列的大多数东方犹太人都把他们的苦痛引向对民族主义政治团体或利库德集团的支持。这是武断的、错误的，大多数的东方犹太人都不是极端主义者。而当德里到来时，情况不同了。他指出了东方犹太人的自卑情结，指出了东方犹太人的向往，他将我们的痛苦合法化，但真正奇妙的是他与拉宾的联盟。当伊扎克·拉宾与阿里耶·德里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结成联盟时，其意义远超出政治认同。拉宾代表着基布兹、帕马奇和特拉维夫，他是一个神话般的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战士。德里则经历了梅克内斯、巴特亚姆、耶路撒冷。他是东方犹太人的英雄。当拉宾和德里站在一起时，我们所有人都站在了一起；当拉宾和德里四目相对时，我们所有人都直视着彼此。现在，有了相互认可。现在，有了一种方式可以将政治稳定和民族自尊结合起来。现在，东方犹太人要证明自己，可以不通过仇恨阿拉伯的方式，而是成为沟通阿拉伯人的桥梁。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与阿拉伯人达成和平的希望，不论是国外的阿拉伯人还是国内的阿拉伯人。然而，随后，拉宾被暗杀，德里被定罪，一切都土崩瓦解。20世纪90年代初的恩惠随着时光流逝了，德里越遭到迫害，愤怒便积累得越多。人民对追猎德里的白

人当权派感到愤怒，但人民同样也因德里而感到生气。也许政坛上的每个人都是腐败的，但他不应该被腐蚀。他应该比洁净的人更洁净，因为他肩负着一个使命，他承担着一个决定性的历史角色，他是我们的入场券。他本来应当带领我们进去，让我们归属于这里。但是，因为他的坠落，一切都不可能了。我们的期待似乎成了幻想。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机会了。我们将不能做我们自己。我们能做的仅仅是调整自己，模仿别人，我们只能放弃自己模仿他人。我们只能回到khshumeh。”

加拜停止了讲述，泪水溢出了她的眼睛。“当我的朋友们读到我对你说的这些话后，他们想必会非常生气，”她说，“他们认为，前进的唯一通路就是否定我们的过去，否定我们的痛苦。我们绝不能回头，绝不能沉溺于已经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假装那道族群的伤口已经结了痂。他们想要相信，社会经济流动和异族通婚已经淡化了这个问题，已经扑灭了心中的火。他们认为，东方犹太人与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分界线是以色列即将克服的一条分界线。但是我告诉你，这不可能。我亲眼看着我的兄弟和我的妹妹窒息而死，我看到他们所受的折磨。在夏亚阿利亚难民营，两个暴徒用暴力带走了我那时才9岁的母亲，剪下了她迷人的长发，然后撇下被剃光头发的、遭受屈辱的、无助的母亲。他们伤害了她的灵魂。他们告诉她不可以做她自己。贝尔谢巴的阿什克纳齐犹太教师以那种居高临下的方式看着我，用她的眼神告诉我，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她伤害了我的灵魂。她告诉我，我是有缺陷的。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所有的东方犹太人都被伤害了。这就是为什么，东方犹太人的灵魂是受伤的灵魂。它从稳定与宁静中被拽出，撞进了狂暴的湍流，又在湍流里遭受羞辱，又从羞辱到自我否定，到被迫西化。但在西化之下，涌动的是痛苦与不满。我们的强大敌人就是痛苦与不满，而德里将我们从痛苦与不满中释放出来。他本来应该带领我们反抗，引领我们走向和解。所以当德里跌倒时，我们都跌倒了。我们发现，自己又再次置身于黑暗。在黑暗里我们疼痛着，我们流血，我们得不到安慰，找不到疗法，找不到家园。”

1. 犹太教口传律法的汇编，是犹太教经典中仅次于《圣经》的典籍。主体部分成书于2世纪末~6世纪初，为公元前2世纪~公元5世纪间犹太教有关律法条例、传统习俗、祭祀礼仪的论著和注疏的汇集。
2. 塞法迪犹太人是犹太人的分支之一，现多居于中东、拉丁美洲等。1949年以色列独立后，大量塞法迪犹太人从阿拉伯国家逃离，其中大部分人迁移至以色列。
3. 法国著名作家左拉曾写下名文《我控诉！》。1898年1月13日发表于《震旦报》。其起因是左拉愤怒当局对阿尔弗莱德·德雷福斯案的不公判决，致信总统要求公正对待。
4. 犹太教口传律法集《塔木德》的前半部和条文部分。
5. 即哭墙。
6. 1971年成立的东方犹太人的政党。
7. 叙利亚——埃及混血作曲家、歌手。20世纪阿拉伯音乐史上最重要的巨擘，乌得琴大师。

第十二章
性，毒品及以色列的现状，2000



尼尼（Nini）说："最终，你可以真的生活在以色列。"他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在千禧年临近之时，尼尼在这里第一次感觉很酷。曾经，每一次他从短途的阿姆斯特丹之旅返回，他都要自问，他为什么要回到这里。但是今年，他突然意识到，在特拉维夫，他生活得很好。他可以在这里呼吸。特拉维夫自由自在，充满乐趣。就感觉突然之间，每个人都做出了决定：够了，一切都够了。每个人都厌烦了那些废话、那些政治主张、那些恐怖袭击、宗教狂热人士、占领区、军队的预备役以及这里一直以来把每个人的大脑搅得一团糟的所有压力。

伊奇克·尼尼（Itzik Nini）是艾伦比58俱乐部的舞者。31岁的他相貌英俊，体格健美。他穿着一件紧身黑色T恤，外罩一身迷彩军服，脚蹬黑色的高筒靴，看起来就像一个欧洲俱乐部的会员。事实上，他出生于小镇宾亚米纳，不过他在13岁的时候来到了特拉维夫。他什么都见识过了，什么都尝试过了，什么都体验过了，包括所有的俱乐部：大剧院俱乐部、企鹅俱乐部、麦德龙俱乐部。他离开过，又回来，又再度离开。

他追求的生活是一种演员、模特、舞台表演者的混合人生，他在特拉维夫时髦的沙因克因街区及阿姆斯特丹的夜场之间来回穿梭。所以他知道，在这里，有些事情是你仍然不能做的，例如性虐和受虐狂。这里现在还不足以开放到接受它的程度。这里是中东。无论如何，性虐和受虐狂都是太西方化的东西。但是除了这一点以及其他少数色情东西，他突然感觉，在这里，一切都开放了，几乎做什么都可以。这种变化真是棒极了，有时候他甚至都飘飘然起来。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改变？尼尼说，是和平。因为和平，以色列现在轻松多了，也更加自信了。他可以直接看到，他的窗外就是特拉维夫中心商业区的耶胡达哈勒维大街。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人们坐在咖啡馆里消磨好几个小时，他们对生活极其满意。再也没有老女人大嚷大叫道："有点羞耻心吧！当士兵们被杀害时你们在做什么，享乐、泡吧、上床？"

还有另一件事物导致了这种改变，那就是MTV。这种视频剪辑的作品切切实实地让人们记住了它，并为之神魂颠倒。现在，当你看到那些来自偏远的、发展中城镇的15岁的孩子，他们身上带着穿环和刺青走进城市，你便知道，他们这番打扮的原因就是即便在他们传统守旧的家乡，他们也看过MTV。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而他们也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想要活得鲜活。他们是这样渴望活得鲜活。

但是，尼尼说，造成这种改变的真正原因，其实是毒品。在过去的五六年里，它们以浩大的声势冲击着这个地方，每一年毒品的浪潮都会来得更加猛烈。每次他从阿姆斯特丹回到这里，他都会注意到这一点。所以现在，在特拉维夫的感觉还算不错。每个人都在吸毒，整个世界都在吸毒，毒品使他们经历极其美妙的事情。现在是可以诉之于口的时候了。它们让每个人都感到开心，它们释放了你，它们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尤其是摇头丸。摇头丸，真是千禧年的神药。它不像迷幻药，让你

经历梦游般的幻觉。它不是让你游离在现实之外，而是让你在现实里感觉更好一些。它源起自那种为易怒的人所调制的药物。它就是一种药丸，软化他们，让他们更加温和、更加友爱，而这就是它为以色列人发挥的效力。它让以色列人不那么愤怒，不那么紧张。看看这些大街，你就会明白这一点。有时候你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将大把大把的迷幻药倾倒入国家输水系统里，让每一个人都感到快乐和悠闲。就拿男同性恋者做例子，尼尼说，仅仅在几年以前，同性恋还见不得光。当一个男同性恋者走在街上，扎着长长的马尾，人们会冲他叫嚷道：你这个疯子，你这个死同性恋。而同性恋者的活动领域被深深埋藏在黑暗之中，同性恋者不会超过一百个或者两百个人。但是现在，这个数目变成了上千个，上万个，而他们也不再感到羞耻。他们不再畏惧，他们一点儿都不在乎了。“你看过在拉宾广场举行的普林节狂欢吗？”他问道，“你看见过爱的游行吗？还有在那个夜晚，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在大选上赢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阿里耶·德里，同性恋者们在大街上举行派对。还有设拉子（Shirazi）那些事情——再没有比这个更火辣的了。”每个人都出柜了。千禧年的以色列已经撬开了囚禁他们的铁栅栏。

尼尼说，如今，甚至连最强硬的东方犹太人都对此不置一词，而那些异性恋者甚至都嫉妒起同性恋者。现在，很难区分二者。“如今，所有的异性恋者看起来都像同性恋者，所有的同性恋者看起来也像异性恋者，”他这样说道，“一切都是七颠八倒的。现在这里的开放度是我们从来不曾有过的。这听起来有些奇怪，但确实连空气里都是爱的味道。现在的特拉维夫真令人兴奋，毫不逊色于纽约。也许比纽约更令人兴奋。阿姆斯特丹也不会比特拉维夫更令人意外——也许比不过特拉维夫。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都说特拉维夫火辣无比。而这里的景致实在是漂亮迷人，它值得你专程为这景致来一趟。它变得有点儿像伊比沙[注]。这里充满着同性恋者，异性恋者，晚宴，毒品，开放，性感，以及完全的自由。与以前的以色列完全不同。”

裘平（Chupi）说，只要你想想这件事，你都会觉得真是神奇。就在五六年前，在以色列，浩室音乐（housemusic）注还完全处于边缘状态。在1993年甚至到1994年，当他展示他的CD盒，开始演奏那些确实很长的音轨，人们认为这是疯疯癫癫的，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音乐，来自下一个千禧年的音乐。他们不能理解，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更不知道如何跟着音乐的节奏翩翩起舞。他们仍然要求音乐有歌词，有确切的含义，要有人声。即便在艾伦比58俱乐部，人们一开始也不想接纳它。它太怪异了。

“在那时的以色列，谁知道芝加哥浩室音乐是什么？”裘平大声说道，“谁知道底特律工业舞曲是什么？或者纽约车库是什么？谁知道高峰和顶点的区别？那时，谁知道最重要的角色就是DJ注？那时，人们完全没意识到，DJ不是什么熟练更换CD碟的技术员，而是在每个特别的夜晚创造一次性的音乐盛会的音乐家。他们不知道，DJ在调频器里创造出那些混音，然后在一个最佳鼓点击拍出那些顶点，于是，突然地把所有人联结在一起，突然地将一千人变成一个人。因为DJ的存在，一千人同时举起他们的手，一起脱掉他们的T恤，一起幸福地高声大叫。是DJ解放了他们，从冲突、战争、压力以及这个国家所有狗屎一样的东西里解放了他们。”

裘平说，他必须坚持下去。他必须让这些年轻人和俱乐部老板经历一次严谨的教育，让舞动的人群适应这个新玩意儿。他不得不以自己的力量创造出他自己的音乐受众群体，浩室音乐的受众群体。然后，将这个群体与音乐联系起来，然后通过音乐将这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联系起来。他的目标就是要让艾伦比58俱乐部成为浩室音乐的圣地。他去了欧洲，拜访那些引领潮流的DJ们，带回来最新的音轨。同其他一些人一起，他在这里创造出一个音乐现场，足以与伦敦、阿姆斯特丹或者巴黎的音乐现场媲美。这个音乐现场起作用了。所有玩硬摇滚浩室音乐和俱乐部迷幻舞曲的人都知道，特拉维夫现在成了最好的音乐圣地之一，以色列真是棒极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为什么这里的现场是那样特别。

也许是因为战争，因为压力；也许是因为这片海，这样的天气，这里的氛围，这里对生活的态度。但显而易见的是，以色列的音乐受众有着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对音乐的惊人的渴望。

他真正的名字是沙伦·弗里德利克（Sharon Friedlich）。他是德国的中产阶级犹太人的儿子，从德国犹太人那里接受了古典音乐的教育。他身材矮小，但结实健壮，他剪短了头发并染了色。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已经成了一名超级DJ。“当你成为一名超级DJ后，”裘平告诉我，“你就拥有了超级的力量。当你站在你的位子上，站在玻璃后面的高架亭里，你知道，只要你按下一个按键，就好像你按下了可以同时控制一千人的按键，这就是力量。总的来说，是性的力量。因为现在他们真切地全在你的掌握之中。你控制着他们。如果你想，你就可以送他们进天堂，你可以让他们欲火中烧。那在舞池里酝酿的能量是性的能量，而他们向你恳求的就是给他们高潮。你开始考虑，要不要把他们的迫切需求赐给他们。他们完全仰赖你。但如果你是个出色的DJ，你会等待。你不会在顶点后又打出一个顶点，你应该玩弄他们。你激起他们的欲望，但你仍然不给他们。这快把他们逼疯了。于是，他们更大声叫道：‘给我们！’然后，最终，当你给他们时，这个俱乐部就成了一个燃烧着的火球，就像一枚原子弹爆炸。上帝就是一个DJ，DJ就是上帝。感觉就好像你已经触摸到一千个人身上的每一个部分。然后你看到所有的血液自他们身上冲刷而下，汗水自他们身上滴落如雨。他们是你的，完全地属于你。他们感激你，崇拜你，因为你给了他们某些强大而完整的东西，某些生活中根本没有体验过的东西，某些你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在这个世间找到的东西。”

设拉子说，以色列已然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它不再是伴随着他长大的以色列。在过去的五年里，一切都完全变了样。而他的群体，男同性恋者群体，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直到他在艾伦比58俱乐部进行周五夜场表演之前，同性恋社群都处在边缘。它被隐藏在那些昏暗而秘密的地方。只有几百个人知道这些地方，而他们并不想被人看见进出那些

地方。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以色列不能容忍同性恋。以色列是完全笔直的。它有着循规蹈矩的社会、尊奉旧式的阳刚之气，坚持严格的传统道德规范。但当艾伦比58俱乐部在1994年开张后，设拉子说服了他的老板奥里·斯塔克（Ori Stark），让他可以自由支配星期五的夜晚。他们称俱乐部为游戏室，然后他们分发了邀请函。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害怕的。他们不知道笔直的特拉维夫会做出什么反应，他们不知道特拉维夫的同性恋者会不会害怕来到这样一个位于城市中心的大型场所。然而结果证明，特拉维夫再也不像以前那般笔直了；结果证明，那些同性恋者们不畏惧出现在这样的场所。他们穿着色彩缤纷的衣服，带着野性十足的全套装备，以一种肆无忌惮的姿态成群结队地进来。他们来了，丝毫不见羞耻。相反地，他们的神情放肆而骄傲。“我站在那儿，站在艾伦比58俱乐部的大门口，看着这支令人吃惊的同性恋群体聚集在一起，我的眼睛确实湿润了，”设拉子说道，“我知道，意义重大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非常伟大的事情。我们最终获得了解放。特拉维夫的同性恋者获得了解放，特拉维夫获得了解放。以色列成了一个崭新的以色列。”

“男同性恋者是整个社群的领导人，”设拉子这样宣称，“因为男同性恋者所拥有的特质就是总体性。男同性恋者是非常一体化的社群，这一点让我们的社群凌驾于其他社群之上。如果有人穿奇装异服，那么其他人都会穿奇装异服；如果有人吸毒，那么其他人都会吸毒；如果有人渴求性，那么其他人也都渴求性。任何参加我们周五夜晚聚会的人都会看到这一点。一切都是坦率直接的，我们提供了一切。这里你不需要忍受整整一个晚上的刁难，只为最后“她”会给你电话号码或者同你去看电影。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切都发生在瞬息之间。一旦我们彼此看对了眼，就走到一边，找个厕所，然后开干。你周围还在持续升温，这里有艳舞舞男，脱衣舞男，还有变装皇后。这里有摇曳的灯光，有浩室音乐的强烈节奏。再没有比这里更激情的了。”

“然而，这里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同性恋者，”设拉子继续说道，“每天晚上当艾伦比58俱乐部的大门打开时，你就会感觉到有事情正在发

生，就在这里，就在现在。在酒吧里，你无法维持冷静，你无法只是呷一小口酒。你身边是那些音乐，频闪灯，肉体与肉体的碰撞。裘平那帮家伙们脱下了他们的衬衫，全场都疯狂了，赤裸裸的性欲寻找着发泄口。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超能量的以色列突然出现，坚持聚会，坚持吞噬生命。”

设拉子出生在离这里不远的沙因克因大街。但设拉子说，那时的沙因克因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一个古怪的、宁静的街区，有东方犹太人邻居和一个小公园。没有一个人曾经想过，这个地方会成为特拉维夫的苏豪区。他自食其力，一穷二白起家，凭着辛勤工作和坚持不懈的毅力，他赢得了现在社群领导人的地位。他是男同性恋群体的国王。每一周他必须给子民们惊喜。每一个周五的夜晚，他都要创造一些新的、更强烈的颤栗。这一周是水手派对，下一周便是欧洲电视歌唱大赛的派对。这一周是法西斯制服派对，下一周则是变装晚会。每隔两个月，他都要在豪曼17号举办他的一流舞会，号召一场前往耶路撒冷的黎明朝圣之旅。

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我提起，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极其热爱以色列。无论哪个以色列人在国外赢得了哪种荣誉，他都感到由衷的自豪。当蓝白相间的旗帜在任何一座体育馆冉冉升起，都令他激动得颤抖。然而最令他自豪的，就是以色列的变性人达娜·英特纳什那尔（Dana International）赢得了1998年欧洲电视歌唱大赛的冠军。这就像一枚证明以色列已经改变的公章，证明以色列已经接受了一种新的身份。“于是现在他们说，艾伦比58也许是世界上第五重要的俱乐部，”他告诉我，“正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聚光灯对准了特拉维夫的现场。人们认识到，我们的场景是世界级的。全欧洲的众多DJ和变装皇后都想来这里。因为事实是，虽然这里的生活是苛刻的，但这里的生活也是充满乐趣的。以色列确实热爱享受乐趣，我们沉溺于享乐。我们必须每时每刻都在享受。我们必须不停地举办派对。也许是因为我们所经历过的所有事情，也许是因为我们仍然面临的所有问题，然而，我们有释放这些所有

被禁锢能量的深层次需求。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在特拉维夫的夜场，洋溢着某种独特的温暖，这是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在这里突然发生的事情，在艾伦比58俱乐部、在特拉维夫、在以色列的许多城市里发生的事。这就是当人们突然打开以色列的壁橱、开始生活时，从里面跳出来的东西，这就是你在这里看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在凌晨两点的舞池，每个人都大汗淋漓，他们呼唤着DJ，男人们脱下了衬衫，互相碰触着、感觉着，融为一体。”

米甲·纳达尔（Michal Nadel）说她感觉就像在一个部落。当音乐开始时，氛围是好的，节奏是好的，大家的身体一起扭动，所有人成为一体。她认为，这一切是非常原始、非常美妙的。当她进入迪吧，闭上眼睛，不停甩动她的头，她确确实实地从音乐声中听到了来自非洲古老部落里的隆隆鼓点，以及野马奔腾的蹄声。“这里有一种非常刺激感官的氛围，它富于韵律，深入人心，真叫人无法抵挡，”她这样说道，“在这种性感的、令人疯狂的气氛下，所有人都融为一体。你可以接近他们，你可以碰触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尽管有时的确会发生某些事情，但大体上，这是一种轻柔的爱抚，非常轻柔。因为在这里，人们会感觉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障碍，他们不是富有攻击性的，他们不会威胁另一个人。你感觉你甚至可以同从未见过的陌生人这样接近。你对一个人微笑，他也会以微笑回报你。因为在这里我们是一体的，是兄弟姐妹。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融为了一体。”

米甲的父亲是以色列军队的一位三星将军，她的哥哥是一名战斗飞行员。但是，米甲所处的以色列以新的方式呈现自己的特质。每个星期四的午夜，她站在艾伦比58的大门前。她盛装打扮，以一种挑逗的言谈举止，告诉保安们哪些人可以进来，哪些人要赶走，直到她挑出某个人，同她在黎明时分一同享乐。这就是选择的权力，米甲告诉我。这种权力就是像从海洋中捕鱼一样，决定谁被接纳、谁被拒绝。“因为艾伦比58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特拉维夫来说，就像54号工作室对于70年代的曼哈顿，”米甲说，“有的人闪闪发光，也有的人毫无价值、华而不实。

每个人都想进来，有时会有好几千人挤在门口。男人们穿着皮裤，姑娘们半裸着胸，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只会让最绚丽迷人的那些人进去。我放进去的人不仅要漂亮、帅气、富有，还要有开放的思想和开放的心态，并且愿意为之不择手段。他们已经准备好献身于我们在这里创造的可供选择的现实，这个现实不是旧以色列，而是新以色列。那不是真实的生活，但要比真实的生活好得多。这个现实充满了浩室音乐、浩室的性、浩室的毒品，充满了一个心醉神迷的部落的咆哮。”

38岁的奥里·斯塔克就是艾伦比58的拥有者。身材高挑、金发碧眼、美丽迷人的莱维德·齐尔伯曼（Ravid Zilberman）是艾伦比58一个25岁的女郎。奥里是特拉维夫公认的夜王子，而莱维德是他的女友。他们在一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喜欢谈论他们创造出来的景象。

莱维德说，如果你在白天进入艾伦比58，你会觉得没什么特别的。这个曾经是电影院的地方只是一个丑陋的、恶心的大厅，水泥砌成的墙，散发着一点儿恶臭。但当黑暗降临，夜场开始时，人潮开始涌动，灯光开始闪烁，音乐突然喷发，然后所有的一切立即像触电般兴奋起来。你的皮肤开始感到刺痛，因为你知道，有什么将要发生。你进入了一片并不真正存在的领域，一个让你快速甩动头颅的梦境。所有的障碍都消失了，所有的顾虑都消失了，你被改变了。即便是像莱维德一样的优秀的中产阶级姑娘也被改变了。在来到艾伦比58一小会儿后，她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性和毒品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莱维德说道，“这是毫无疑问的。当人们极度兴奋时，他们会完全敞开，他们一点儿都不在乎。然而，并不仅仅是性和毒品，在特拉维夫的众多酒吧里，摇头丸并不仅仅存在于血液中，它融化在空气里。每个人都呼吸进去，然后爽翻天。每个人都在摇摆身体。这不是某种兽性的行为，这是某种密码，让你感到安全，感到被保护。你可以完完全全地放松下来，因为你感觉你是被保护的。”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莱维德说，“你能看到一些住宅区里的姑娘，还有追求她们的富有的花花公子，但她们根本没把那些花花公子放在眼里。还有粗鲁的商业区的东方犹太人，他们更加真实，感谢被允许进入。然后是裘平那帮怪胎，他们在舞池简直跟疯了一样，半裸着身体，满身是汗地拥挤在一起。拥抱，摇摆，舞动，他们创造出来的能量漩涡是如此强大，以横扫之势感染其他所有人。星期六的晚上，士兵们会过来，看到士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只点水和柑橘——他们甚至都不喝酒。但即便如此，从午夜到早上6点，他们都不曾停止舞动，他们在舞池中倾力演出。然后当夜场结束，他们从艾伦比58出来直接登上巴士，前往黎巴嫩，或者占领区，或者偏远地带参加一些小规模战斗。确实，以色列是这样一个疯狂的地方。当这些还是孩子的士兵们吻别他们的女友，穿上他们的制服，然后上路，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这真让我心碎。”

“酒吧里有五个姑娘，”莱维德说，“我们的角色就是啤酒女郎。我们只为人们倒啤酒，但他们真的很尊重我们。做艾伦比58酒吧的女郎是最好的，你就像一个女神。当你穿着短短的紧身裙和小小的吊带衫，裸着你的后背，而酒吧里拥挤着200个饥渴的男人，你要知道应该如何主持游戏，如何恰到好处地，温柔地与他们调情。总而言之，他们尊重你。因为在艾伦比58，你可以尝试，而不是去威胁。如果你得到回应，很好。你可以去楼上的画廊，去一个黑暗的角落，或者一个漆黑的房间。如果你没有得到回应，你就继续努力。你不用大惊小怪。因为在艾伦比58，我们有这个共识。事实上，这是一种文化，一个被很好地定义的世界。但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这是属于当今的以色列的世界，这是新一代以色列人的世界。”

奥里告诉我，他们现在已经发展成一种运动。他们把成千上万的人带到拉宾广场，参加巴拉克的胜利庆祝会，他们发动了20万人参加特拉维夫爱的游行。“这个国家还有谁能把20万民众带上街？”他这样说，“也许德里的政党——沙斯党可以吧，但不会再有其他人了。确

实，它不是一场政治运动，它也没有一个平台，没有提出什么主张。现在不是60年代了。切·格瓦拉（Che Guevara）死了，詹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死了，伍德斯托克（Woodstock）死了，再也没有革命运动了，也不存在清白无辜。没有人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现在没有什么新的想法、新的消息，可是，政府、议会以及当权派真应该注意一下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个国家都是关乎战争和死亡的事情，甚至我们的教义都是非常悲伤的，比如赎罪日以及其他教义，总是告诉你要受苦、要牺牲。但是，在这里，我们拥有了非常强大的力量说出：'去你的！'我们再也不需要经历苦难和牺牲，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是一个建国50周年的国家，而周围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也不会再侵入。没有人可以征服和毁灭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自由呼吸。我们必须自由呼吸，而且我们不止可以呼吸，我们还可以微笑，大笑，疯狂地笑。"

"这是我们应得的，"斯塔克说道，"对于全世界的所有人来说，这是我们应得的。所以让我们这样生活。和平已经实现了，如果还没有，那就是即将实现。不久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巴勒斯坦国家，耶路撒冷会是它的首都，一切都会好的。所以，我们还要背负着这个重担多久呢？这个已经拖累了我们整整五代人的精神包袱。政府、议会和当权派不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是在本·古里安的影响下长大的，是古里安将所有人送去内盖夫。但是，现在这里已经横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你可以在艾伦比58看到这一点，你会听到年轻人们叫嚷着：'够啦，享乐时间到啦。'这就是以色列的新一代，需要快乐的新一代。"

奥里·斯塔克的父亲是一名工党官员，母亲是一名女演员。在特拉维夫郊区长大的他，是一名表现优良的工党小伙子：参加童子军，念高中，积极服役。但他总是因为旧式以色列令人窒息的沉闷氛围而感到痛苦。于是，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后，他因心理因素从军队退役了。他去了伦敦，在那里学到了俱乐部文化，而当他回来时，他已经准备就绪。他逐渐打响了名气，被称为"帅气的奥里"、"一个顶尖时尚设计师的年轻恋人"、"特拉维夫夜生活的新王子"。1983年，他举办了他的第一次

盛大派对，以8毫米胶片的色情电影为特色，吸引了数千人。然后，在10年的时间里，他前后经营了12家酒吧和俱乐部，直到1993年年底的一天，奥斯陆协议签订不久，当他走进艾伦比电影院巨大的、被忽略的大厅，他便知道，这就是他要找的，这就是明日之星。就在这里，他将建立起他的快乐王国。他会将这座空旷的电影院变成一个快乐的圣地。因为奥里厌恶悲伤。而就在这个逃离现实的集合地，他将为他自己和其他人营造快乐，欢庆直到末日降临。

“你读报纸吗？你关心政治吗？你有思想倾向吗？”我问他。“当然。”他这样回答。他支持左翼，一直都是如此。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甚至参加了和平示威游行。但如今，他相信“现在召集聚会”要远比“现在实现和平”运动更具有实质意义。“艾伦比58所在之处，也是政治运动正在上演的地方，”他这样说道，“在过去，特拉维夫的俱乐部颂赞着男子气概、高级军官和军队英雄。但是现在，没人再去关心这些统治集团。如果一个精英突击队的指挥官走进来——没问题，但谁他妈的在乎他是谁。这里的英雄是那些歌手、演员，是那些能令其他人感觉很棒的人。而这才是以色列的21世纪、全世界的下一个千禧年将要关注的事情，而不是我即将成为市长、设拉子将成为副市长，也不是又有一个盛大的爱的游行即将举行，而是享乐占据着中央舞台。这才是即将发生的事情，它已经发生了。年轻人不再读报纸，但他们疯狂地跳舞。他们不会前往沙漠，或者建造基布兹，或者成为军队的英雄，他们将疯狂地寻欢作乐，享受欢愉。

“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人们还要求生命具有意义，音乐具有意义，”奥里说，“然后，迪斯科兴起了。但惭愧的是，迪斯科没有蕴含什么意义。而现在你可以说出任何话，不需要羞愧，不需要伪装，没有任何压力。你不用歌唱爱情，你有了性，就在现在，就在这里，就在厕所里。而这种肢体接触是真实的，满足了刺激、愉快和兴奋的需求。这就是现在的以色列所关乎的事情。忘记犹太复国主义的那堆废话吧，忘记犹太人的废话吧。我们有派对，每时每刻都有派对。”

“你在这里就可以看见，”奥里说，“看看你的四周，不再装模作样，不再惺惺作态。音响是那么大声，你甚至都不能讲话。所以你不用问她喜欢什么红酒，或者在上次选举中她把票投给了谁。这里用不着前戏，一切都是迫切而迅速的。你叫什么名字？我们走吧。这些孩子活在网络世界里。他们点击鼠标，购买。所以，他们的爱情也是网络速食爱情，他们没有耐心，他们要求立刻得到满足。而当他们在15分钟后离开厕所时，我观察他们：没有拥抱，没有喜爱，没有温柔。他走这条路，她走那条路。这就完了。我们来，我们来了，我们走了。”

他们自称为国度，舞蹈的国度。在大多数星期四的夜场，凌晨3点是艾伦比58的高潮。尼尼登上台，开始他的挑逗性的表演。裘平通过他的曲目精心策划了他最强烈的高潮；设拉子被他的肌肉男所包围；米甲加入了她的清晨舞伴们；莱维德淹没在数十个衣着暴露的身体中，他们攻占着她的酒吧；而奥里像一个帝王一般跨坐在他的国民之间。当粉色、白色的脉冲射灯切割着黑暗的大厅时，舞池里已经挤满了人，楼梯上也挤满了人，顶上的阳台也站满了人。看起来就像这里有着什么东西，超出了夜生活的意义，超出了在新千禧年的黎明时分、一个火热城市里的一个火辣的夜晚。在这里，一场伟大的反抗正在上演。尽管它是困惑的、不明确的、笨拙的，没有理想、没有口号、没有伟大的宣言，但这是我所见证的最具魅力的反抗。

这些年轻人都很漂亮，这里讲述着一个关于以色列成功的故事，却甚少被提及。在这里，大海、太阳以及显著不同的基因库的组合，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性感之美。而艾伦比58热情的封闭空间令这种性感的美更加明显。同时他们也是非常聪明的年轻人——思维敏捷，反应快速。但他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完全接受现行经济体制的死板法律条文。即便是他们分离出来的世界，也是建立在等级分化、优胜劣汰、市场营销、经济效益的组织原则上。当周末结束，他们在会计事务所，或者电视台，或者一家刚起步的公司又开始了新的一周。然而，在拂晓时分，在艾伦比58，这些年轻人的确发表了一个宣言。他们什么也没有

说，他们通过他们的解放发表了一个宣言，通过他们的性开放和有节奏的仪式发表了一个宣言。他们试图创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一个有着固守仪式、充满欲望和乐趣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们发表了一个宣言。就在酒吧的舞池上、二楼平台上，在最黑暗的隐蔽处，他们不顾一切地试图企及某种个人的真实感，某种完整的以色列。在这个消费主义的时代，在这个局势持续紧张的地区，社会不再为这些年轻人提供真实与意义，而这又是他们所寻求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投入到艾伦比58的仪式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沉溺于摇头丸、销魂夜、浩室音乐以及这座建筑里的无比欢娱。

清晨5点，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队伍出发了。首都里早起的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辆接一辆的汽车驶进这个沉睡的城市，古怪的仿佛从未来穿越而来的音乐震耳欲聋，从他们的车窗里飘出。青年们坐在车里，询问去豪曼大街的方向，他们脸上挂着微笑，眼睛红红的，打扮得像吸血鬼或带着干草叉的邪恶魔鬼，也有人只扮成水手、公主或者粉红色的精灵。在黎明的灰色天空下，在这个偏远工业区的车库、车间和廉价的家具城之间，一支巨大的奔流涌向豪曼17号的仓库。狂欢的人海被俱乐部所吸引，就好像那儿有一种磁力，以一种不祥的节奏吸引着他们前来。

设拉子的余兴派对（after-parties）只对完全沉浸在狂欢中的那些人开放。如果你没有一套完整的装扮，至少你的脸要有亮粉的装饰或者你的衣服可以发出磷光。尼尼是正确的，现在是男同性恋者引领潮流的时代。他们定下了基调，他们掌控着舞池。但设拉子也是对的，这不仅仅是男同性恋者的时代，这是一个混合的时代，而这种混合正在发挥效力。当所有这些不同的性感能量在一个地方、在同一片屋顶下发生碰撞时，产生了极度深刻的东西。剃着光头的瘦削小伙子们在舞台上热烈地互相拥抱，穿着透明衬衫的艳丽姑娘们在酒吧里热舞，大麻的强烈气味充斥着这里的空气。每一分钟，都有几对离场去另一个房间。男孩和女孩，男孩和男孩，女孩和女孩。

一切都颠倒了。这是耶路撒冷里的特拉维夫，这是白日里的夜晚，这是耶路撒冷最神圣日子里的哈桑那节（Rosh　Hashanah），也是犹太新年。数千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主要的俱乐部，在洞穴状的大厅里，证明他们可以开着浩室音乐连续庆祝10~12个小时，而不会变得好斗、不耐烦、粗鲁。证明那些认为新以色列还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神权政体的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谈论的是什么。

如果没有毒品，一切不会发挥这样的效力，但毒品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切，很多因素都在当中发挥了效力。以色列是一个移民社会，还没有根深蒂固，还有着非宗教的保守主义。以色列是一个幸存者的社会，他们渴望着生活。以色列是一个处在边缘状态的国家。在这里，豪曼17号，能量突然迸发的结果并不像它在伦敦、巴黎或纽约表现的那样，所以，尽管设拉子的余兴派对只是一个极端现象，但它透露了很多现象本身的信息。它透露了在新千禧年的开始，这些年轻的以色列人在文化和情感层面的表现。你在耶路撒冷豪曼17号的舞池里听到的，是现世主义解放的号叫；你在耶路撒冷豪曼17号的舞池里看到的，是21世纪的青年们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要求、法令、约束的反抗。够了，他们说。让我们生活。让我们及时行乐。

舞台上的表演开始了——就在几年前，它还被认为是离谱的事情：一个小伙子在另一个小伙子面前跪下，崇拜他巨大的勃起。屋外，是耶路撒冷一个盛大节日的正午。但在这咆哮的大厅里，似乎没有人为正在舞台上进行的色情的崇拜仪式感到困扰。因为这不是他们在乎的问题。他们在乎的是这群年轻人正在崇拜：解放，自由，以及冲破禁忌。摆脱对他们的压制，跨越每一条边界，活到一种极致。高举起他们挥舞的手，这些浑身是汗的半裸小伙子们在个人享乐的圣坛上献上崇拜；高举起她们挥舞的手，这些苗条的、挑逗的姑娘们在震耳欲聋的快乐圣坛献上崇拜。而在大厅里的所有人都拼命试图从这一切中塑造出一个国度，试图塑造一个可代替的国家，一个可代替的现实，一种可代替的人生意义。起来反抗以色列的过去，起来反抗以色列的命运，起来反抗以色列

的现状。

---

1. 西班牙一个极为美丽的小岛，一个久负盛名的旅游胜地。
2. 最早的电子音乐形式，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美国。旋律反复，受到迪斯科舞曲的影响。
3. DJ，英文全称Diss Jockey可以理解成唱片骑士。DJ是随DISCO发展起来的，是现场打碟职业的名词。

第十三章
上加利利，**2003**



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穆罕默德（Mohammed）淡褐色的眼睛直视着我的眼睛："你必须知道，它是没有用的。你的犹太思维让你提出了这个犹太民主国家的设想，这是聪明的幻想。但这个设想不会生效，这种幻想站不住脚。所以，比起谈论我们即将共同经历的漫长旅途，我们应该做的是安静地坐下来，拼凑出一个新的协议。因为你没有其他盟友了，我是你唯一的盟友。比起寻找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你应该来找我；

比起尝试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寻找那些具有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然后把他们都带到以色列，你应该跟我商讨。因为我在这里，就在你的身后；我就在这里，不打算去其他任何地方；我就在这里，状态良好。”

“采访我，”这位巴以混血的律师穆罕默德·达哈拉（Mohammed Dahla）说道，“跟我交流，把你的手伸给我，让我成为你的伙伴。因为，不论你喜欢或者不喜欢，你在中东就是一支少数民族。尽管你的国家参加了欧洲电视歌唱大赛，篮球也打进了欧洲联赛，但如果你打开一本地图集，翻翻地图，你就会看到，在你周围，3.5亿的阿拉伯人包围着你，15亿的穆斯林包围着你。所以，你们真的以为，你们可以继续掩藏在虚拟的犹太国家的构想里吗？你真的以为，你们可以凭借一个矛盾的犹太民主国家保护你们自己吗？坚持这个犹太国家的犹太人特性，委实是生活在刀刃上，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将再也不能这样做。世界会发生变化，力量的平衡会被打破，人口也会发生改变。事实上，人口正在发生改变。你们要在这个阿拉伯和穆斯林的世界里继续生存，唯一的途径就是与我结成同盟，我是你们唯一的希望。如果你们今天不与我结盟，明天也许就太晚了。到你变成一个少数派的时候，你会来找我，但我那时就不在这里了。到那时，我也许对你要提供给我的东西不再感兴趣。那时可就太晚了，我的朋友。”

一大早，我们就踏上旅程，从耶路撒冷一路向北。从盖代拉开车前往哈代拉，我的朋友——也是我的仇敌——穆罕默德·达哈拉这样对我说：“看看这栋建筑，对于这片土地来说，它的异域风格是这样凸显，显得如此陌生。就像某支侵略军队从海里冒出来，然后登陆。它缺乏对地形地貌的敏感度，也对区域特征不甚了解。那些从远方来到这里的移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历史毫无感觉。他们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建起了这些建筑，他们修建了高大而傲慢的建筑，但是，这些建筑看起来几乎是粘在地上的。它们不是拔地而起，它们不属于这里。这就是为什么，它们看起来这般不协调。它们是具有侵略性的城市建筑群，有

着令人不快的混凝土面孔。”

“看看这些路标，”穆罕默德说，“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用希伯来语和英语书写的，没有阿拉伯语。因为你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当游客们来这个国家旅游时，会认为这里确确实实是一个犹太国家。但是，我在你们的路上，同其他的160万阿拉伯人一起。这就是你们为什么会觉得我们这般难搞定。为了保持你们杜撰的一个欧洲犹太国家的漂亮小小说，你们尝试隐藏我们的存在。你们尝试彻底抹掉我们的景物、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身份。”

“难道一个犹太国家的主张是毫无根据的吗？”我问达哈拉，“难道犹太人民没有民族自决的权利吗？难道犹太人不允许在1967年边界内拥有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吗？”达哈拉告诉我，现在居住在这个国家里的犹太人当然有民族自决权，但是，任何人都可以理解巴勒斯坦人为什么拒绝执行联合国在1947年制订的分治计划。任何人都必须了解，在这里没有平等的权利。“在你的权利和我的权利之间没有维系平衡的点，”他这样说道，“从一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犹太人就没有法律的、历史的、宗教的权利。他们唯一拥有的权利就是从他们被迫害的遭遇中衍生出来的权利，但这个权利并不能说明，他们夺走这片不属于他们的土地的78%的领土就是合理的。这个权利并不能为反客为主的事实做辩护。到最后，拥有这片土地优先权利的人应当属于本土居民，而不是移民——属于那些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数百年的人，他们已经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就像这片土地已经成为他们的一部分一样。我们不像你们，我们不是陌生来客，不是流浪者，不是移民。我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居住了几个世纪，我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没有人可以把我们连根除去，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这片土地上分割出去，即便是你们也不行。”

1968年，达哈拉出生在加利利的图兰村。他学习刻苦，工作努力，自食其力。在希伯来大学的法学院，他表现突出，之后，他成为以色列最高法院的首名阿拉伯法官助理。1993年，他在耶路撒冷开启了自己的

法律事业，很快生意兴隆。1995年，他成为阿拉伯少数民族权利法律中心（Legal Center for Arab Minority Rights，Adalah）的创办人之一。2000年，达哈拉与苏哈德（Suhad）结婚，她是一名律师，也是一名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奥马尔（Omar）在2002年出生。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局势紧张的那两年，穆罕默德和我都是以色列公民权利协会董事会（the Association of Civil Rights in Israel，ACRI）的联合主席。所以，当我们坐在他蓝色的梅赛德斯汽车里一路向北进发时，我们进行了一次谈话，基于一个共同价值观和理念：人权、少数族群权利、自由民主，但不像我们曾经有过的谈话。这次谈话中，我们每个人都唤起了他的民族历史感和洞察力，以及他心中存在的焦虑。这一次着实令我吃惊，穆罕默德对我坦露了他整体的世界观：他告诉我，他不再相信对于这块土地的分治计划，不再相信一个所谓的两国方案。

他在村庄里长大，他的身份是本土的，他告诉我，他就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小伙子。直到进入大学，他才获得了一个民族上的巴勒斯坦人身份，而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觉得两国方案是武断且不充分的。它不能解决1948年的阿拉伯人问题（那些在战后仍然逗留在那儿或者返回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也不能处理被战争驱逐的阿拉伯人灾难。但当奥斯陆协议在1993年签订时，他被暂时地说服了，认可两国方案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然后到2000年，他意识到，这是毫无希望的。这个和平议程实际上只是一个迫使巴勒斯坦人民屈服于以色列意愿的议程，是一个维持占领的议程。以色列并没有为一个历史性的和解做好准备。他们并不愿意给予巴勒斯坦人基本权利，所以，没有其他方法，只有斗争。以色列的社会必须要被动摇、被扰乱。然后最终，这个解决方案将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解决方案，一个位于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民主国家，一个有着回归的犹太法律和回归的巴勒斯坦公民权的国家。在这个政治实体中，希伯伦的定居者将离开他们现在的处所，1948年战争中，被摧毁村庄的巴勒斯坦难民也被允许返回他们的家园。

这是我们第二次去加利利。2000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暴动波及北部全境。戴维营和谈失败后，出于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同情的抗议很快演变成了暴力。前来的以色列警察遭到袭击，他们枪杀了13个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作为回击。在这个残酷的一周的最后一天，穆罕默德用他的梅赛德斯车载着我，让我亲眼见证这场斗争。我们参观了一个犹太社区，这里不允许巴勒斯坦人购买房产。我们拜访了烟雾弥漫的乌姆伊利费赫姆城，这里的火焰刚刚熄灭。我们顺道拜访了雷德·萨拉赫（Raed Salah）酋长，他是极端主义运动的领袖。这位眼睛明亮的酋长谈论着全国各地被毁灭的村庄里的废弃清真寺，谈论着笼罩在阿克萨清真寺的危险。他宣称，犹太人对圣殿山根本没有历史权利，他们的圣殿山故事完全就是虚构的小说。然后，我们去了一座帐篷，哀悼年轻的沙希德（Shaheed）——他是一个为事业牺牲的殉道者。在卡纳的村庄，一位刚刚失去他17岁儿子的父亲自豪地告诉我们，每天他的儿子参加示威游行后回来都会遗憾自己活着回来了，直到有一天，他再也没能活着回来。然后，我们走上拿撒勒的空旷街道，走进废弃的餐馆。每一处我们走过的地方，最令我震撼的就是寂静，恐惧的暗哑寂静，感觉就像以色列的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都为他们刚刚做下的事而感到恐惧。尽管双方都以一种自愿宵禁的方式缩在自己的家里避难，但与此同时，他们都焦急地等待着即将出现的未来。

尽管如此，现在已经过去了两年。如今，这里到处都是人群，有以色列的犹太人，也有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瓦迪阿拉区熙熙攘攘，全是犹太观光客。拿撒勒的餐厅人满为患，几乎找不到一个位子。讲希伯来语的人和讲阿拉伯语的人并排坐着，铲起带鹰嘴豆沙的皮塔饼[注]。人们大声地点烤肉，声音中夹杂着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就好像，已经恢复了和平；就好像，2000年10月的伤口已经愈合；就好像，暴乱从未发生。

所以，当穆罕默德和我再次穿过萨拉赫酋长朴素办公室的大门，我们进来后都惊讶了。这位酋长的眼睛不再像以前那样闪闪发光，他的眉

头紧锁。他用说得还不错的希伯来语告诉我，以色列将在不久之后试图把阿拉伯人从这块土地上驱逐出去。他说，阿维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提议将瓦迪阿拉区作为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一部分，这是一种针对人口迁徙的精妙手段。如今，就感觉在阿拉伯的村庄里，历史将重演，1948年已经发生的事情即将再次上演。

萨拉赫酋长在他的白色长袍外面，套着朴素的深色外套，一顶针织的白色无边便帽盖住了他一头灰色的头发。现在同那时一样，他神情庄重，态度亲切。隔着他布满灰尘的桌子，他警告我，国际犹太复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结成联盟其实是犯下了一个重大错误。他认为，在21世纪就有可能重现20世纪时英国和法国强加给中东的压迫的殖民主义统治，这也是错误的。萨拉赫说，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明白，尽管阿拉伯人已经沉默了100年，但他们不会继续沉默下去。15亿穆斯林将不再沉默。“我不是一个先知，”他这样说，“未来在上帝的掌控中。但如果你们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演变为犹太人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其后果将是恐怖的。那些在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新教徒[注]，他们想要的是末日大决战[注]。所以，世界，中东，确切地说，这片土地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阿克萨清真寺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我为之感到深深的忧虑。我感觉到一场大灾难正在来临，这场灾祸将危及犹太人的未来。”

我们与酋长告别，前往穆罕默德的家乡——加利利。当我们经过阿罗尼姆枢纽时，（‘卡夫拉曼达枢纽’，达哈拉坚持道。）穆罕默德说，他不一定赞同萨拉赫酋长的全部观点，但他尊重萨拉赫的信念和谦逊，以及他的活动事迹。他指的是旗帜行军活动，由萨拉赫酋长带领的每周朝圣之旅，把满载信徒的巴士从加利利带到阿克萨清真寺。这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精心策划实施的行动，它的规模还在持续增长。因此，尽管穆罕默德不是一名宗教人士，尽管他接触到了西方文化并接受了它的很多价值观，但他说，他，萨拉赫酋长，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你们的故事——圣殿是3 000年前索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建造起来的——完全是纯粹的小说，”达哈拉对我说道，“萨拉赫酋长回应说，穆

斯林在这片土地上真实地存在了1　400年。这句话捕获了我的心。在这样的延续里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东西。当我聆听那位酋长的讲述时，我感觉仿佛穿越了时间隧道，我同早期的以色列连联结在一起，同奥马尔·伊本·哈塔卜（Omar Ibn al-Khattab）[注]哈里发联结在一起，我的儿子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我与伟大的伊斯兰连接在一起。这带给我一种深刻的平静感和安全感。我知道了，我们不是注定要被击败的。我知道了，我们不是一个少数派。一个少数派的主张是与伊斯兰文化不相容的——它适合犹太教，但不适合伊斯兰文化。而你环视四周，你就会发现，我们确实不是少数派。实际上，在这片土地上占大多数的犹太人才是少数派，而（阿拉伯的）少数派实际上是多数派。所以，每一次那些当权派追击萨拉赫酋长，我都会提供帮助。对于那些专长是犹太法律的人，我都会尽我所能地帮助他。”

我们前往犹太人的莫沙夫特兹珀瑞。（“是萨法瑞亚”，穆罕默德提醒我。）“在1948年的时候，这里就是一个有着数千人口的庞大村庄。于是今天，这里拥有了数万的后裔——有的人在叙利亚，有的在黎巴嫩，还有的在加利利的村庄，甚至连我的姐夫都是从萨法瑞亚来的，”他说，“他的孩子们也将自己看作萨法瑞亚的后代。后来，在独立纪念日，我们在这里举行了一次壮观的纪念集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保证，“我们将永不忘记，永不原谅。”

他穿着一身浅色西装，系着条金色的领带。他身高均等体型匀称，有着充沛的精力以及深色的皮肤。他为自己的肤色正是土地的颜色这一事实而感到自豪。他将自己的肤色与土地融合在一起了，他这样说道。当我们泊好车，达哈拉带我观看特兹珀瑞国家公园里的几丛瘦骨嶙峋的刺梨以及附近的一些石砌台基。他告诉我，确切地说，虽然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大灾变不像犹太人经历的大屠杀，但他也不愿意接受犹太人对“大屠杀”这一术语的垄断。“虽说这里的确没有集中营，”达哈拉说，“虽然大屠杀已经停止，但是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大灾变仍然还在持续。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场对人的屠戮，而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大灾

变是一场对人和土地的屠戮。是对我们人民的毁灭，”他说，“也是对我们家园的毁灭。”

特兹珀瑞的民宅漂亮而整洁，有着白色的墙体和红色的屋顶。在一栋房子的前院中，一位美丽的年轻母亲向她一岁的儿子张开手臂，这孩子正朝他的母亲迈出他的第一步。但穆罕默德说，他不知道人们怎么还能住在这里。“理论上说，这片乡村有着田园牧歌般的风景，魅力十足，但事实上，这里就是一个墓地。从表面上看，你正在你的花园里散步，但事实上，你正走在众多的尸体上。这简直不是人类能承受的事情，”穆罕默德说，这就好像他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电影讲述一个美国郊区小区建在一块美国公民公墓上，墓中的鬼魂便在他们坟墓上方的家庭里徘徊不去，“我不是鼓吹神秘主义，”穆罕默德说，“但是，我感觉到，他们的精神还滞留在这里，而我知道，他们会不停地在你们之间徘徊。”

宗教基布兹贝特利蒙坐落在图兰山的岩石山脊的峰顶上，俯视着穆罕默德、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他的曾祖父出生的村庄。“几百年来，我们居住在这里，”穆罕默德说道，“从法典记载以前的远古时代，我们就居住在这里。这片山区成千上万德南的土地都被英国托管行政官指派给图兰村村民以保证他们的利益，直到以色列的政府从中夺取了一万德南的土地，用以在山顶建造贝特利蒙阿尔法、贝特利蒙贝兹以及贝特利蒙吉姆瑞。犹太主人高高在上，而巴勒斯坦奴隶生活在底层。”

当我们沿着山路抵达这个基布兹，绕过锁着的铁门后，穆罕默德的手机响了，一个恐怖分子试图在耶路撒冷的一家酒吧厨房外引爆丁烷气罐，他的家人向达哈拉这位自由战士求助。达哈拉同意了，并打电话给耶路撒冷市中心的俄罗斯收容所警卫部，让其询问那名被拘留的恐怖分子的下落。当他处理完毕后，我问他是否认为，贝特利蒙是一个定居点；他是否认为，在占领区定居点上发生的事情会发生在贝特利蒙。“逻辑是相同的逻辑，”穆罕默德回答道，“思维形式是相同的思维

形式。甚至还有一个在实质上的相同之处——相同的规划、相同的建筑风格。这就是外邦的。这就是从上而来的异己力量，并在这片土地上施加影响。”正是早中午的时候，空气清新，可见度良好。“看看那边的犹太社区，还有那边的犹太社区，”穆罕默德说道，先指向右边，又指向左边，“它们规划的是那样整齐、受到严格管制，欧式风格那样浓郁。它们与我们的村庄完全不同——我们的村庄从干涸的谷道延伸到山峦上，就像一株攀缘的植物。显而易见，它们侵入了我的加利利。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被建造出来。为了在村庄与村庄之间造出分隔。为了防止加利利变成一块阿拉伯人的土地。因此阿拉伯的加利利不能要求领土的自治权，不能要求脱离以色列，不能要求加入巴勒斯坦国。”

“你真的认真考虑过要求加利利的自治权吗？”我问道。达哈拉回答说：“对我而言，最佳的解决途径就是基于两个民族的一个国家民主政权。然而，如果不通过一场‘两个国家’的运动，我们是不会满足于一个缩小的、破碎的、不能拥有自己领空的巴勒斯坦国家。这不是一个国家，这是一个笑话。因此，如果你们继续坚持‘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加利利的自治权运动将不得不高涨起来。而且自治权的要求不仅仅在于文化方面，还包括了领土、治安权以及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有效控制。我们将需要三块自治州：在北部，拥有对加利利的自治权；在中部，对阿拉伯三角地带的自治权；在南部，拥有对贝都因内盖夫的自治权。此外，以色列国土上，居住在雅法、拉姆拉或者吕大的巴勒斯坦人，也享有与上述三个巴勒斯坦自治州的同等的个人自主权。”

我们穿过穆罕默德的图兰村，对于穆罕默德来说，为我展示邻近的卢比亚村废墟比在家乡停留更重要。他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他的村庄已经被完全包围了。这里是贝特利蒙，他不能在这居住；这里是特兹珀瑞工业园，他不能在这建造一座工厂；这里是一个军事基地，却没有他的军队；这里是戈兰尼大桥的纪念碑，它所纪念的回忆却不是他回忆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认为，我已经得救，”穆罕默德这样说道，“如果我认为，我的家庭因为几个月的黎巴嫩放逐而成功逃离了1948年的大灾

变，我就会不断地提醒自己：在这里，我是不受欢迎的；在这里，我处在永久的假释状态；在这里，我没有任何权力。因为，高高耸立在戈兰尼分叉口，我们的玛斯卡南分叉口的纪念碑，欢庆着获胜者，遗忘了失败者。戈兰尼分叉口的麦当劳餐馆，以色列装甲车，蓝白相间的旗帜，清晰地宣告：我们征服了你。而因为我们征服了你，我们的力量便允许我们在你们的领土上欢庆我们的胜利，在你们加利利的土地的中心深处欢庆我们的胜利。”

达哈拉蓝色的梅赛德斯沿着公路驶抵犹太国民基金会建造的南非森林，然后，驶上松树和针叶树之间的砾石小路。“这不是一片清白无辜的森林，”我的朋友穆罕默德说道，“这是一片象征否认的森林。通过种植这片森林，你们自认为，你们可以否认你们犯下的罪行。”然后他告诉我，这片森林第一次打动他的事情。那是20世纪90年代末，他参与了巴勒斯坦上层人士与以色列和平反战分子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举行的非官方会晤。在一次会谈中，巴勒斯坦人要求对他们所遭受的苦难进行赔偿，要求以色列为将来的巴勒斯坦国支付这笔赔偿金以供巴勒斯坦使用，就像以色列利用德国支付的赔偿金进行国家工程建设一样，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要求。但那些反战分子变得暴怒起来。就因为这一个请求，谈判破裂了。达哈拉和他的同伴们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家，他们寻求的历史公正的认可化为泡影。

不久之后，他跟着他母亲的亲戚马哈茂德（Mahamoud），一个卢比亚村的后裔，来到这片森林。他跟着马哈茂德沿着森林间的小径爬上山，当他们抵达这个遗址后，马哈茂德认出他家园的废墟，然后他哭了。“我的家乡湮灭了，”他哭道，“我的人生也湮灭了。”而成功的以色列律师穆罕默德·达哈拉站在他身旁，同他一起哭泣。

我问穆罕默德：“所以，你要说的是什么呢？”“那些对巴勒斯坦人做下的不公正的行径，是不能被宽恕的，”他回答道，“因为在那个时刻，当以色列人在南非森林的树下野餐时，卢比亚村庄的难民正在叙利

亚的雅穆克难民营里衰败腐烂。因此，公正就是，我们有权利返回到这里。至少那些在难民营里衰败腐烂的人应当被允许返回。”

“我并不知道这些人会有多少，”他说，“也许不到100万，也许有几十万。但我看到他们的回归。就像我的家庭从黎巴嫩返回到这里，在数月的放逐后，骑着他们的毛驴，带着他们的行李，沿着图兰山的岩石山脊来到这里，其他人也将回归。排着长长的队伍，他们将全部回归。”

在拿撒勒，阿兹米·比沙拉（Azmi Bishara）注在他的私人办公室欢迎我们的到访。20世纪90年代中叶，这位出生在加利利的哲学家建立了一个世俗的民族主义的阿拉伯政党，他也曾经是议会的一名引起争议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的议员。在这间巴拉德党领导人的总部，屋子里没有标语，门上没有标示牌，但他的办公室通风而舒适。墙上悬挂着一幅装框的、刺绣的巴勒斯坦地图——整体的巴勒斯坦，没有特拉维夫的雅法，没有雷霍沃特的吕大，没有抹大拉哈梅克的拿撒勒。当然，一张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的照片也挂在那儿。这位埃及总统和20世纪60年代的泛阿拉伯领袖是比沙拉心目中的英雄，当我们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他就从巨大的黑白照片里俯视着我们，一身灰色的西装，系着黑色的领带，撇着他的小胡子愉快地笑着。

自1996年起，这位议员就以直言不讳著称，而现在，他变得非常谨慎小心，因为，他正在等待来自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这份决议将决定他的政治前途。与其说他像一头危险的猛虎，不如说他看起来更像一只营养充足的肥猫。他待人友善而热情，乐于助人。他为我冲泡了一杯高浓度的黑咖啡，询问我是怎样减掉这么多赘肉，询问我的恋爱经历。他跟我谈论起他刚刚撰写的一篇评述和刚刚完成的一篇小说。他看起来显得小心翼翼，就好像他可能正在遭受着政治上的心力交瘁。但他强调了，法院不取消他的参政资格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如果法院因为他拒绝承认以色列为一个犹太国家而判决不让他参与接下来的选举，那么这个决议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判决。它将被视为把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退

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尝试。甚至形式上的民主面貌都将就此消融。

“他们还会发动像2000年10月那样的暴动吗？以色列的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将把以色列分割成碎片吗？”我问他。比沙拉指出，他现在没有任何资格来做任何威胁。但达哈拉扬着头，说出比沙拉因为小心谨慎而没有说出的话：如果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巴勒斯坦人的平等得不到保障，那么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暴动将爆发。

当我们离开拿撒勒时，穆罕默德告诉我：“比沙拉是我的身份的另一面。他象征着我们现代巴勒斯坦人的骄傲，他同样也象征着一个现代的世代，一个没有经历过失败和驱逐的世代，一个因为了解而并不真正惧怕以色列的世代。这一代人从以色列学到了肆无忌惮与厚颜无耻，因此他们不祈求什么，他们提出要求。他们不采取防守，他们进攻。他们不像少数派那样思考，也没有少数派的认知感觉，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派。未来是属于我们的，”穆罕默德·达哈拉总结道，“不管你们尝试什么把戏，你们都不能在这里以犹太人的身份特征维持一个西方化的国家。你们所能实现的就是角色的逆转。我们将成为主人，而你们将变成我们的奴仆。”

几个星期后，最高法院将允许比沙拉再一次参与国会议员的竞选。但四年后，2007年，比沙拉将因2006年黎巴嫩战争期间，向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通报火箭袭击战略位置的嫌疑而遭到警方问询，之后比沙拉逃出以色列。达哈拉心目中的世俗英雄比沙拉将开始流亡，然后，成为泛阿拉伯卫星电视网络媒体，半岛电视台的明星，但大多数的以色列人都会将他视为一个叛徒。达哈拉心目中的伊斯兰宗教英雄雷德·萨拉赫酋长将被送进监狱，又出狱，但他仍然是以色列最具影响力的颠覆性政权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但现在，夜幕逐渐降临，穆罕默德非常累了。

未来的一切还为时尚早。他让我替换他开车。当我在黑暗里开车向南进发时，他在我旁边睡觉，我思考着他也思考着我自己。我想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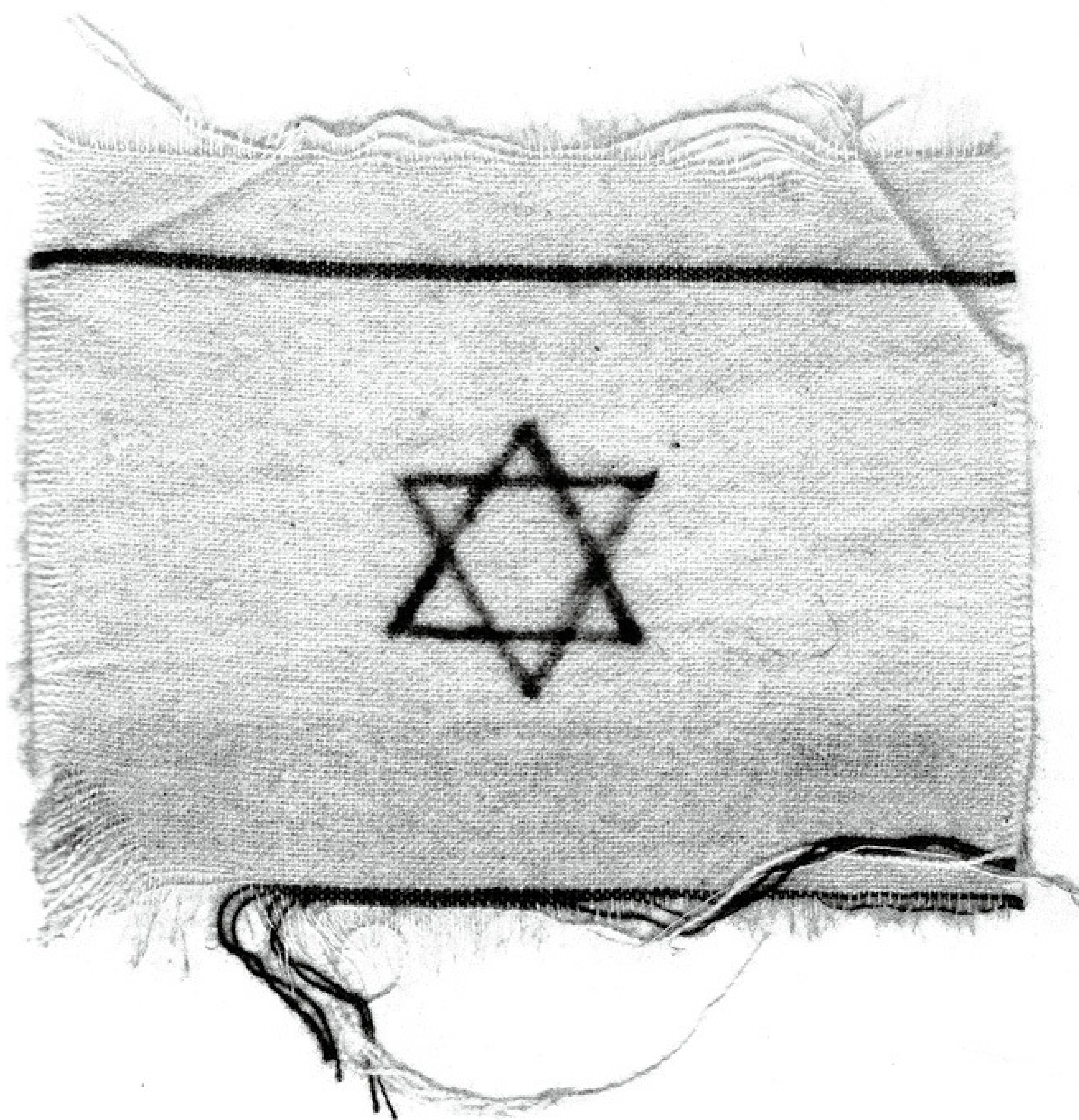
我们的机会是什么。在这样可怕的历史中，我们还能幸存吗？

我喜欢穆罕默德。他聪明睿智，工作勤奋，充满活力。他是坦率而热情的，同时天赋过人。如果他愿意的话，他现在想必已经成了一位法官，或者一个和平反战分子，一个市长，或者以色列巴勒斯坦社区的一名领导人。他就像任何一个我所知道的以色列人。他是我朋友中最机敏的。我们同在一个城市里，同在一个国家里，同在一个家乡。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然而，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是可怕的分裂。我们之间又会发生什么呢，穆罕默德？我在黑暗中漫步。在我的女儿塔玛拉和你的儿子奥马尔身上又会发生什么呢？而在我的土地上，你的土地上，又将发生什么呢？

---

1. 当地最受欢迎的主食。大多为圆形面饼，外形有点像面包，中间空心像个口袋。
2. 指16世纪脱离罗马天主教之基督教团体或后来由其形成的基督新教成员。这里是比喻的说法。
3. 《圣经》里描述的在世界末日发生的善恶大决战。
4. 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的第二任哈里发（634年起），先知穆罕默德最著名的拥护者和战友之一。
5. 阿兹米·比沙拉，1956年生于巴勒斯坦拿撒勒，是一个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巴勒斯坦基督徒，曾是以色列议会成员之一，巴勒斯坦学者、政治家、作家，阿拉伯研究和政治学中心主席。1996年至2007年4月期间代表阿拉伯政党国家民主大会任以色列国会议员，他也是该政党的领袖。

第十四章
现实的冲击，2006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占领是明显的，但不仅仅是占领。如果今天的以色列就像它早期时候那样头脑清醒、意志坚定、保持专注，它现在就已经在处理占领问题了。迟早，常理判断将占据上风。经过一些判断的失误和鉴察后，一个公道正义的共和国的一帮通情达理的国家领导人集团将采取行动。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他们将终止占领。然而，尽管占领是错误的、无效的、邪恶的，它依旧不是所有罪恶的来源。有一些事情在以色列已经发生了，远比占领要深远、普遍、复杂得多，令人吃惊的是，大多数的以色列公共事务观察员们却忽略了它们。

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以色列已经经历了七轮不同的国内反抗：定居者的反抗、和平的反抗、自由司法的反抗、东方犹太人的反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反抗、个人享乐主义的反抗以及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项反抗都是寻求公义的，它们为一个受压迫的少数群体诉求公义，呼吁解决潜在的但至关重要的需求。它们都掀起了一波震荡中央的主导力量，而这些力量在之前是被蓄意忽略或处于边缘状态的。然而，这七轮反抗却导致以色列共和国的崩溃。之前为国家地位奋斗50年以及在建国21年里精心培育的那些东西，在1973年战争后的40年被大大地腐蚀了。因此，尽管大多数的反抗是公正和必要的，但它们累积的影响却是毁灭性的。它们没有将以色列发展成为一个运转良好、自由民主的国家，它们也没有将以色列重组成为一个强大、多元化的多部族联盟，而是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令人刺激和兴奋、多元化、色彩丰富、精力充沛、可悲可笑的政治马戏团。与其做一个在中东的危险水域中平稳驾驭的强大、稳固的政治实体，以色列选择成为一个奢侈的大街市。

定居者们奋起反抗政治的规章和约束；反战分子奋起反抗历史与地缘的现实；自由主义者们奋起反抗太过强势的国家；东方犹太人们奋起反抗西方犹太人的控制；极端正统派们奋起反抗世俗主义；享乐主义者

们奋起反抗犹太复国主义者集体思维定式的令人窒息的因循守旧；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奋起反抗犹太民族主义。然而，所有这些反抗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反抗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本·古里安所打造的犹太国；反抗那个兴建了供给房、创立了迪莫纳、稳定了年轻的现代犹太国家的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以色列。在征召了一代人、管制了一代人、动员了整整一代人之后，以色列人觉得他们已经受够了。他们想要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每个以色列的群体想要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每一种被轻视和怠慢的人类情感想要得到宣泄，想要被释放，自由表达自己的声音。但所有这些人、群体、情绪从来没有找到令它们并存不悖的表达途径。它们从来没有规划出一个新式的政治架构，以允许以色列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代表它们。这样就会是一个令人陶醉的、充满生气的社会，伴随急速发展的经济，而不是现在这个功能失调的政府，一个名存实亡的以色列共和国。

从这一点上说，所有的反抗都是必要的，它们都是成长与开放必经的重要进程。但从某个角度说，它们价值不大却很危险，而且它们是不能停止的，即使是现在，以色列的问题也不是本·古里安打造的庞大集权下的经济体制问题。现在的问题是领导人的缺失，是领导方向的缺失，是反抗者自身执政能力的软弱。一个曾经过分强势的国家，现在则是太虚弱了。以色列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陷入混乱的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本身就是混乱的国家。

传统观点认为，1967年是以色列历史上的关键的一年。这个说法既是正确的，又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以色列历史上有三个关键的年份：1967年，1973年，1977年。在这十年里，以色列经历了一个非凡的胜利，一个令人痛苦的挫败，一个不朽的政治突变，经历了工党将近30年的执政后，右翼的利库德集团赢得了大选。这三起戏剧般的事件震撼了国家以及权力核心，导致了占领，又把占领变成了一种制度。然而在事后看来，这三个起决定意义的年份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应该是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创伤终结了统治以色列的旧政权，它传播了一种深刻的不

信任，对国家，对政府，对其领导集团。它赋予了个人权利，削弱了集体主义。它摧毁了本·古里安的遗产，摧毁了他打造的具体的国家形象。

而这样的结果是，整个国家陷入了动荡不安。旧有的不满重新浮上水面，旧有的伤口再次被撕开。再没有一个真正的牧羊人或者主人，再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道德典范，再没有一个人拥有足够的能力来领导、教化、指导整个国家。统治集团崩溃了，明确的目标消失了，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分崩离析了。在反抗最激烈的时候，大熔炉本身熔化了。拒绝融为一个整体后，以色列的不同群体开始走上他们的不同道路。以色列的个体同样也是如此。又经过半个世纪的组织、动员、训导后，他们拒绝再接受来自任何人的命令，他们不再信任任何人，他们变成了不为人所知的无政府主义者。

1989年至1991年期间，迁入的大量俄罗斯移民更增添了混乱。这些在三年内涌入以色列的100万移民固然盘活了经济、壮大了犹太人口，但也削弱了本就缺乏的凝聚力。当他们抵达以色列的时候，旧式的犹太复国主义大熔炉已经不再运转了。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新来者感觉他们比接纳自己的本土居民更加优越，因此，他们没有像之前的移民者一样，褪下他们的旧有身份签署一个以色列人的身份。他们保持了俄罗斯价值观体系，俄罗斯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所居住的大量俄罗斯的飞地。他们在促进以色列的科技、技术、艺术以及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加快了将以色列社会转变为一个松散的不同群体联盟的历史进程，这个联盟不再紧密联系，不再共享一个绑定的国家代码。

以色列从来不曾拥有一部宪法，其选举制度和政治架构也一直是摇摆不定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了统治的理念，也失去了统治的精英集团。没有人可以控制以色列，没有人可以掌管以色列，以色列变成不能被统治的地方。更糟糕的是，旧有的统治精英现在背弃了他们失去的国家，而新的统治精英——那些反抗力量，又懒得自己创造一个有奉献精神

的、贤能的精英集团。结果就是，我们的头顶出现了一个裂开的真空，没有可尊敬的领导集团，没有发挥效能的行政部门，只有一个虚弱的公共部门和破裂的民族精神。新的政治游戏是互相指责的游戏：左翼指责右翼，右翼指责左翼。但在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中，没有一支政治力量可以成熟、理性地承担起运转这个国家的责任。以色列失去了它的政治理念。

这个游戏还能继续进行下去，是因为侥幸的区域博弈。赎罪日战争之后的33年是以色列最平静的时期，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还有太多的噪声——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活动、巴勒斯坦起义、黎巴嫩战争、两次海湾战争。但事实上，从1973年开始，以色列就再也没有受到过来自任何一个邻近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攻击，甚至没有受到过威胁。迪莫纳的冲击和以色列的空中优势是具有压倒性力量的，但威慑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以色列享受着利欲熏心的阿拉伯世界罕见的稳定时期所带来的便利。埃及和约旦确实与以色列国签订了和平协定，而其他不怎么接受调解的阿拉伯国家并不想轻易发动战争。苏联衰落了，美国崛起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他们自身的内部缺陷使阿拉伯的独裁者们确信，发动与以色列的战争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项。因此，以色列得以享受一个特殊的、长期的战略安定，忽略外面的世界，沉溺于自己的奇思怪想和愚蠢。

现实的第一次冲击发生在2000年10月，戴维营谈判破裂不久。一系列的恐怖主义袭击在以色列的城市里肆虐了整整三年，提醒着以色列人他们住在哪里，他们又面临着什么。然而，在旧时代的战士阿里埃勒·沙龙的领导下，以色列奋起接受挑战。在最初的震惊后，以色列国防军和辛贝特进行了富有经验、成效卓著的反击。以色列社会证明了自己远比预期中的恢复力强。2004年，以色列成功地阻止了自杀式恐怖主义袭击，这真令人欢欣鼓舞，它重新赢回了安全感和自信心，促使了一场经济的繁荣。2005年，自加沙地带的单方面撤军——真是一种解脱——在最初同样被认为是又一个成就，带来了普遍意义上的安全感。将军们一

致认为，我们的战略地位从来不曾这样好过，随着以色列越发成长、越发繁荣，这个国家再次沉溺于自我满足，沉溺于放荡的生活。

2006年7月12日，现实的冲击再一次袭来。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并不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它持续了33天，带走了165名以色列士兵和平民的生命，以及大约1300名黎巴嫩人的生命，但它从来没有真正危及过以色列的存在。尽管这场战争一点儿也不像赎罪日战争，但却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以色列没能打败敌人。而这次的敌手并不是什么超级大国，它甚至都不是一个国家。这个对手只是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民兵组织，只有8 000个强壮的男丁。以色列无力阻止真主党将火箭炮架在北方城镇的现实委实令人震撼。以色列的脆弱和无能委实令人震撼。整整一个多月，超过100万的以色列人生活在炮火之下，大约有50万的以色列人逃离他们的家园。这个国家感到了无助和羞辱。

于是，就到了清算的时候了。回荡在全国各地的问题就是：我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结束了半废弃的加利利城令人忧愁的旅行之后，我尝试在《国土报》上的一篇短评中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我们都被政治的正确性所蒙蔽了。有关政治正确性的论述在最近十年里占据了最高地位，但这是与现实脱节的。它关注占领问题，却没有指出以色列已经陷入了遍布宗教地雷与文化地雷的生死存亡的冲突之中。它太过关注以色列过去犯下的错误行径，却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历史与地缘政治关注得太少。

以色列政治正确性同样给出一个假定：以色列的势力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保持这种势力的需求遭到了轻视。因为军队被认为是一支占领者的军队，它遭到了公开指责。任何有关军事的、民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事物都遭到了蔑视。集体主义价值观让位于个人主义价值观，权力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旧式的以色列男子气概遭到阉割，我们放纵自己，沉溺于绝对的公正和绝对的欢娱。旧式

的关于使命和承诺的演说被新式的关于抗议和享乐主义的演讲所取代。

还有另一些因素。以色列迷恋于对常态的幻想。但从根本上说，以色列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这是一个地处阿拉伯世界的犹太国家，是一个地处以色列的西方国家，是一个地处专制统治区域内的民主国家。它与它周边的环境是不相容的，这就是在以色列与它周边世界之间存在的持续、固有的张力。这就意味着，以色列不能拥有像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那样正常的欧洲生活。但是，由于它的价值体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以色列别无选择，只能尽力尝试过上一种正常的生活。这是个本质的矛盾，也是个永久的矛盾。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造就一种足够处理这种消极的、异常态以色列生活的独特的、积极的异常态。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在建国初的30年里，通过一些独特的社会发明——比如基布兹、以色列总工会引导的工党社会经济，来引导人民实现的。这就是以色列建国初始的30年所成就的，通过维系以色列独特的国家需求与其国民对个人空间及理性程度的需求二者之间的微妙平衡。然而，在1967年、1973年、1977年之后，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色列陷入了疯狂。我们陷入了幻想，幻想这个风雨飘零的港湾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避风港。我们自欺欺人地以为，我们可以定居在这片海滨，其他民族可以居住在他们的那片海滨。我们浪费了以色列独特的、积极的异常态。自始至终，我们都在自掘坟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些希望以色列达到正常态的人，将以色列变成了一个一片混乱的国家，非但不能将以色列引向正常，而且只会令它完全陷入混乱。

政治正确性和对于正常态的幻想都是在精英集团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公众们则保持着头脑清醒和坚强。以色列中产阶级没有忘记以色列所面临的生存挑战，在困难时期，他们坚韧且恢复力强。但以色列的精英们却将他们自己从以色列的历史中剥离。商业、媒体以及学术模糊了以色列的视野，削弱了它的精神。他们不再翻阅地理地图，他们不再铭记历史或者理解历史，他们对民族主义、军事主义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的连续攻击从内部不断侵蚀以色列的存在

感。通过商业彻底的私有化和建立富有侵略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方式，绞尽脑汁地灌输一个正常态的幻想，这种方式并不适用于解决这个国家所陷入的冲突。学术界绞尽脑汁地灌输僵化的政治正确性，将富有建设性的自我批评方式转变为强迫性的解构主义。媒体推销一种虚假的意识观念，将狂热的消费主义与伪善的正义结合在一起。抛弃了意志和承诺，以色列的精英们陷入自我疑惑和愤世嫉俗之中。每一个领域都以自己的方式暗中削弱犹太复国主义。它们误导以色列，让以色列相信特拉维夫就是曼哈顿，市场就是国王，玛门[注]就是上帝。正因为这样，它们没有为年轻的以色列人提供一个合乎标准的工具，来为他们的国家战斗。一个没有平等、没有团结、没有对自己事业的信念的国家是不值得为之战斗的。这不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或者年轻的小伙子愿意为之征战沙场或甘心为之奉献自己生命的国家。但是在中东地区，一个没有年轻人愿意为之奉献自己生命的国家只不过是在拖延时间。这种时光不会持续长久。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火箭猛烈袭击我们的城市和村庄的景象，不仅仅是以色列军队无力保护它的国民，也是以色列精英历史性失败导致的严重后果。以色列的精英们背弃了现实，背弃了国家，不再引领以色列，不再维护以色列的团结一致。以色列精英的每一根纤维都透露着，它想让以色列成为当代的雅典。但在这片土地、这个地区，雅典人没有未来。只要斯巴达动动小手指，雅典就将不复存在。在这里，一个享受生活的社会是没有未来的，它根本就不能处理死亡迫近时的威胁。于是现在，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必须重塑我们的民族国家，我们必须恢复力量与常态之间的微妙平衡，我们必须修复我们防御盾牌上面的划痕。在这么多年的错误幻想、自我欺骗以及鲁莽轻率后，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命运，我们必须不辜负我们生命的旨意。

不幸的是，战争是以色列国家力量的证明。1948年以色列的非凡胜利，证实了在独立战争之前的20年，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塑造了怎

样一个坚毅果敢、组织精良的社会。1967年以色列的惊人胜利，彰显了在六日战争之前的20年，本·古里安打造了怎样一个紧密团结、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而2006年以色列的萎靡无能，显示了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之前的20年，从旧式以色列的灰烬里兴起的奇形怪状的政治实体是如何迷失方向、功能失调。没错，占领的确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给了我们致命一击，但是，占领不是萎靡不振的原因，而是结果。在21世纪，以色列面临的挑战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是在和平或战争之间做出选择，它面临的挑战应当是如何恢复国家效能。一个无力的以色列不能实现和平，发动战争，或者结束占领。2006年的创伤为以色列提供了一幅其政治实体总体状况的精确图景：一个虚弱无力的国家领导集团，一个几乎不起作用的政府，一个腐败的公共部门，一支腐化的军队，以及大都市与外围的惊人脱节。

但2006年的经历也提供了一幅以色列周边世界的精细全景图：伊朗正在崛起，真主党在北部兴起，哈马斯在南部积累着力量。和平已经无从谈起，占领已经宣告失败。单边主义不复存在。在南方和北方，以色列在过去收回的每一块土地都被一支足以用火箭威胁以色列的恐怖主义实体所占据。当伊朗上方盘旋着核威胁时，成千上万的火箭环绕着以色列，危险迫在眉睫。面对着新兴的生存危机，以色列却还没有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国家战略。这是多么糊涂而麻痹啊。

严峻的新地缘政治现实与国家本身固有的内部缺陷笼罩着以色列。的确，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为以色列赢得了时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真主党将在发动新一轮袭击之前再三思量。它可不想看到黎巴嫩再一次被彻底摧毁，就像它上一次惹怒以色列那样。但这一事件平静地了结后，以色列所面对的要比它在2006年受创的夏季所遭遇的糟糕十倍。下一次，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迪莫纳核反应堆都可能处于战火之下。那些因为以色列存在而怒火中烧的人们将向以色列的每一处基址、每一个家园发射火箭，成千上万的以色列市民将被杀害。

在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一个世纪，犹太人被证明是生机勃勃、足智多谋的。他们从容迎接每一个挑战，战胜了许多危及以及甚至几乎终结他们民族事业的巨大障碍。他们镇压了1936~1939年的阿拉伯大起义，赢得了1948年战争。1967年，兴建起迪莫纳保护这个小小的年轻国家。1973年，以色列普通士兵的战斗精神把这个国家从鬼门关拯救了回来。因此，伴随2006年的崩溃，以色列所面临的问题是，以色列还需求什么。在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二个世纪，还需要什么才能使犹太人像第一个100年他们所做的那样，奋起迎接挑战、保卫他们的民族事业。

以色列的基础是良好的：我们有强大的经济、充满活力的社会、天赋超群的人民以及引人注目的判断力和恢复力。但以色列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正饱受病痛折磨，萎靡不振，根深蒂固。七轮以色列的内部反抗从下层侵蚀着这个主权国家，精英集团的不满从上层侵蚀着这个主权国家，被束缚的以色列传奇已经土崩瓦解。其结果就是，没有一个人为平静而稳健的以色列多数派进行辩护。没有一个高见妙策，甚至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平台可以处理以色列所面临的真正挑战。与建国前十年相比较，以色列这个民族国家的第七个十年远不及当时坚固。

当战争在北方肆虐时，我决定重游特拉维夫，欣赏那里的夜景。现在这个时候，艾伦比58已经关门，但耶路撒冷的豪曼17号已经把特拉维夫南部的一个巨大车库变成了一个跳舞、毒品、约炮的新圣地。在黎巴嫩南部，当以色列的军队拼命挣扎着向真主党控制的领土推进时，我在充斥着汗味的拥挤酒吧待了一个晚上，然后我去了巴特亚姆的一家俄罗斯舞厅，然后继续拜访特拉维夫南郊阿亚隆高速公路旁刚刚开张的一家新会所。我在特拉维夫的一家秘密的嘻哈舞厅终结了这个夜晚，它位于一个地下室，墙壁漆成了黑色。这里有异性恋者，有男同性恋者，也有双性恋者。这里有很多黑暗的东西。“人类真是太需要这个玩意儿了，”一个25岁的金发心理学学生递给我一小瓶可卡因，我礼貌地拒绝了，她这样告诉我，“摇头丸会让你爱上性，可卡因会让你疏远性。”她继续说：“在和平土崩瓦解、自杀式炸弹袭击盛行之后，20世纪90年代

的天真就让位于令人眼窝凹陷的派对，就像你今晚看到的、我们周围的这些派对一样。这是露骨的、胆大妄为的，但没有爱情，也没有喜欢。归根到底，还是没有希望。”

我看着我周围的一切。孩子们当然是漂亮的，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性感。色情而刺激。但今晚的北方正发生着战争。就在这个时刻，年轻的士兵还在灌木丛中奋战，压制着他们心中的恐惧，嗅着近在尺咫的死亡滋味。而那些在黎巴嫩忍耐的士兵与这些在特拉维夫黑色墙壁的地下室里的泡吧者之间的差距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几乎年龄相仿，有着同样的社会背景，接受同样的教育。但他们处于不同的世界，不同的行星。他们正在演绎以色列的精神分裂。

以色列的所有战争都有着这种形式的张力。1948年，当市民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被射杀时，其他人在特拉维夫的咖啡馆里调情；1969年，当士兵们在苏伊士运河的哨站开火时，其他的以色列人正在特拉维夫的迪斯科舞厅举办一场舞会。这种二元性是以色列健康和力量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约定：今天我站岗，你参加派对；明天我参加派对，而你站岗。以这种方式，我们并没有将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大营房，生活才真正地有价值；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一边继续生存，一边保卫我们生存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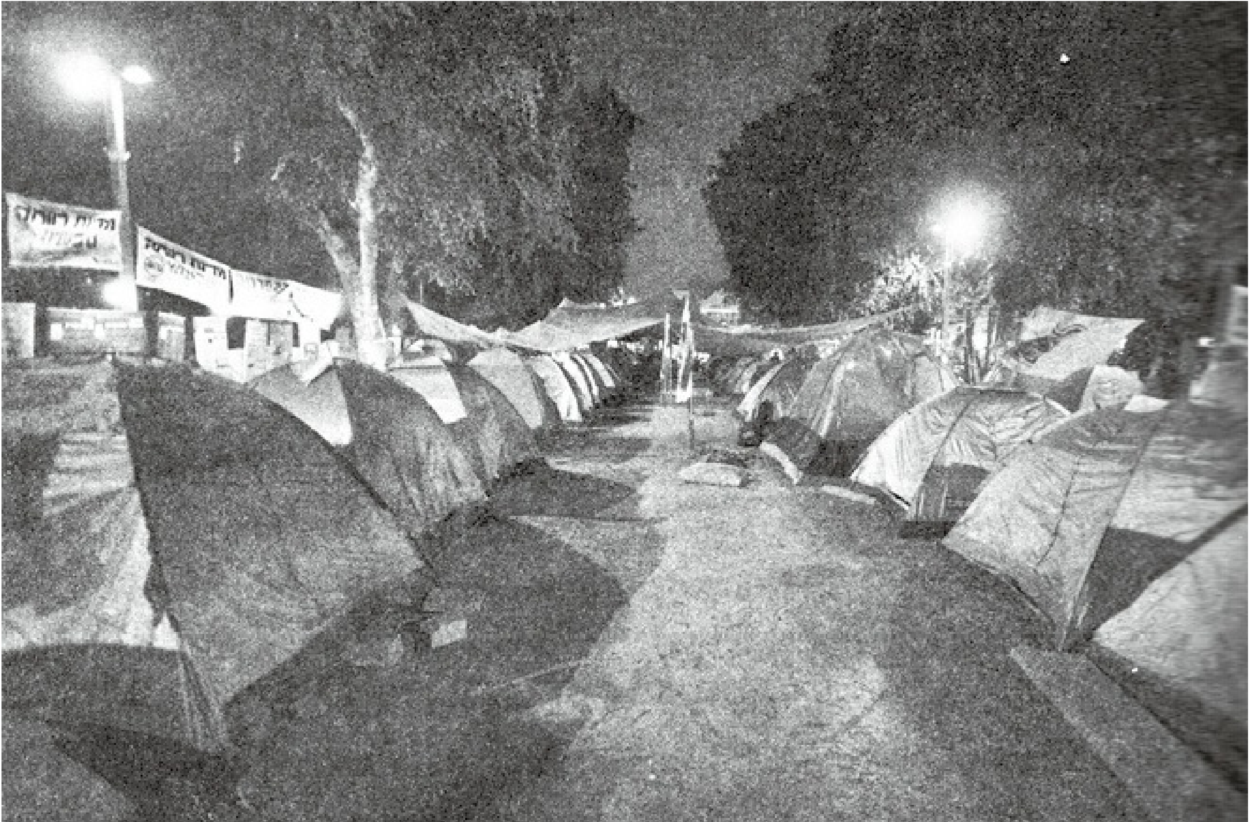
但现在的情况却不同了，现在这里有一条完完全全的隔断。这就是为什么，2006年战争看起来这般怪异。士兵们在战斗，北部的市民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变成了难民，但太多的其他人生活如常，并不真正在意。很多富人在自己的游艇上度假，很多中上层阶级的人正在埃拉特寻找避难所。夏季的巡游、夏季的派对、夏季的毒品一切照旧。就好像这个国家并没有陷入战争，就好像这个国家并没有遭受挑战，而这才是真正的威胁——这才是真正可怕的现象。这里没有以色列人的患难与共。这个国家无力保护它的国民，而它的国民也不会走出来支持他们的国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将这个国家人民凝聚在一起。

这一次，我们幸存了下来。这一次仅仅是未来几年将会发生事情的预告片。然而，当袭击我们的不再是小规模的什叶派民兵组织时，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我们的某些真正强大的对手决定开展攻击时，那些漂亮的舞者和这个性感的特拉维夫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结束了一次快速的邂逅，25岁、金发碧眼的姑娘在酒吧与我会合。她用呆滞的目光环视四周，扯出一抹困惑的微笑，自言自语道：“这是一个泡沫，这就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泡沫，它不会持久。”

---

1. 玛门（Mammon）。古迦勒底语或古叙利亚语，于新旧约时代之间于犹太人间兴起的恶魔名号，意思是财富。在新约《圣经·新约》中使用，是钱财的代名词。如马太福音第6章第24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

第十五章
占领罗斯柴尔德，**2011**



斯特劳斯的故事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它不仅仅讲述了一个成功的家庭如何发家致富，还是讲述了以色列勤劳的资产阶级的故事；它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家庭的故事，还是一个讲述以色列繁荣以及它是如何繁荣兴旺起来的故事。

理查德·斯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和希尔达·斯特劳斯（Hilda Strauss）在德国的乌尔姆结婚。不久之后，阿道夫·希特勒执掌了政权。1934年5月1日，迈克尔-彼得（Michael-Pater）出生了。一年后，当

希尔达抱着自己的长子时，她听到了戈培尔（Goebbels）通过无线电发表的讲话。当这位纳粹宣传部长贬低犹太人时，她感到从身体内部发出一阵疼痛，她知道灾难即将来临。1936年4月，斯特劳斯一家人将他们的行李装上汽车，驶向瑞士。希尔达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我们正在移民。我们将前往何方？前往我们祖先的土地，我们的家园，以色列之地。为什么我们要去？因为我们出生于此的国土不再需要我们，我们挚爱的国土不再需要我们。我们必须维持我们的尊严，就像我们应当做的那样，这样，我们的孩子才能为他们的父母是犹太人而感到欢喜，并不仅仅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是基于他们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离开这里，前往一个新的家园。"

1936年6月18日，斯特劳斯一家抵达了海法的港湾。一张清晰的黑白照片记录了他们登陆时的情景：理查德穿着宽大的、白色的亚麻短裤和白色的T恤，头戴一顶白色的帽子；希尔达穿着一身长长的、格子的夏裙，抱着吵闹不已、只穿着短裤的迈克尔–彼得。最开始的时候，这一家人住在莫沙夫拉莫特哈夏维姆村，不久就搬到贝尔图维亚的南部殖民地，然后又迁到了纳哈里亚的北方殖民地。这里非常炎热，条件十分艰苦，而1936~1939年，与阿拉伯人的战争更是野蛮残酷。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理查德，在这片他选择的土地上感到失落不已。他发觉自己很难放弃他的学术梦想，很难适应他的新生活——在地中海地区的一个偏远的行省当一个出租车司机。"失望慢慢渗入了，就像蛇的毒液，"希尔达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我们在这片新土地还没有一个家，我们感到极度失望。日子变得非常漫长，充满痛苦。只有孩子欢乐的大笑才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存活。"

1937年4月，在购置土地数月后，斯特劳斯一家终于获得了那一小块土地：纳哈里亚东部边缘，九德南的长方形土地。同这块土地一起的还有一栋40平方米的房子、一个牛棚、若干基本的农业工具、一套灌溉系统，还有沿着地产边界的一条轨道及配套的敞篷马车，以供产品的运输。房子很小，对未来的疑问却是很大。希尔达在她的日记里这样写

道："未来将会是什么模样？我们将成为什么模样？我们的命运掌握在陌生人的手里，我们能做的只是履行我们的职责并信任上帝。"

几个星期后，乐观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了纳哈里亚的小屋。希尔达在日记里记述道："今天已经是第八天，牛棚里有了一些牛。屋子里有了牛奶，乳白色的新鲜牛奶。我们必须努力工作，学习运营一个奶牛场所需的专业知识。"

斯特劳斯一家就是新兴讲德语的殖民地上的自由企业精神的最佳范例。他们学得非常快。每天早晨，理查德挤牛奶，注入巨大的铜罐，又将铜罐装载上他的自行车，骑着车挨家挨户地兜售斯特劳斯鲜奶。但纳哈里亚已经有很多奶牛场，对鲜奶的供给已经超出了市场需求。希尔达意识到未来的出路在于制作奶酪。她研究了奶酪制作工艺，将她的小厨房转变成一个小型的制酪场。通过欧洲的专业的期刊，她学会了如何制作难闻的林堡干酪和气味淡薄的罗马杜尔干酪，并试验了用软质干酪搭配胡椒和辣椒粉。她将100克规格和500克规格的奶酪用蜡纸包装成小包，盖上一个令人骄傲的蓝白相间的鸵鸟纹章。1938年，她赢得了乳制品的英国高级专员奖（British high commissioner’s prize）。1939年年初，她说服理查德关掉了奶牛场，卖掉奶牛，集中生产优质奶酪和其他乳制品。1939年的夏天，当德国犹太人数千年的历史即将终结之时，希尔达和理查德创办了他们的第一家乳制品工厂。当欧洲犹太人消失在大屠杀的巨大黑暗之中，希尔达和理查德创办了斯特劳斯–纳哈里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纳哈里亚的发展，把这个奋斗的农业殖民地变成了一个急速发展的休闲城市。正享受着战时繁荣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巴勒斯坦犹太人，被这个德国犹太人的纳哈里亚的欧式魅力深深吸引。沙滩上挤满了人，膳宿酒店满客，咖啡馆熙熙攘攘，供应着草莓和冰激凌，优质的面包和进口的肉类。室内音乐会、爵士乐演奏会、探戈晚会、查尔斯顿竞赛在这里举行。在海滩，坐落着一排排格雷–加利尔公司（Galei-Galil Company）的彩色棚屋。纳哈里亚沙滩小伙子们的强

壮手臂划着各种帆船和划艇，向地中海进发。特拉维夫的苗条姑娘们来到这里度假，中午在沙滩棚屋旁与人打情骂俏，晚上在爵士乐酒吧享乐。在欧洲陷入一片战火之时，在这个小型的欧式村庄，这个由欧洲的幸存者们在地中海海滩上建起的避难所充满了生命力。纳哈里亚现在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最著名的乐土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也推动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一个农业经济体系转变为工业经济体系。在孤立的中东拥有一个先进的后勤和科技基地，英国的这一需求，使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犹太人的巴勒斯坦成为私营企业和改革创新的一个中心地。这一进程促进了以色列工业的创新型资本主义的发展，斯特劳斯一家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然而，当战争爆发之时，悲剧也降临了：在移民巴勒斯坦之后不久，理查德美丽的姐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理查德同样也经常感到沮丧。他经常陷入暴怒的情绪，经常在纳哈里亚年轻姑娘的臂弯里寻求安慰和欢娱。然而，希尔达仍然专注于工厂生产。她看到战时繁荣提供的机会，并紧紧抓住了它。她以坚韧的精神与来自邻近基布兹的牛奶供应商们谈判，她积极进取，将乳制品推向繁荣的咖啡馆，拿到膳宿酒店的超额订单。然而尤为重要的是，在刚刚起步乳制品工厂，她一丝不苟地制定了职业道德、卫生标准以及产品标准。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期间，希尔达·斯特劳斯为她的公司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作为纳哈里亚的一家德国犹太人开办的高级制酪厂，这里生产卓越的欧式奶酪。独立战争之后，希尔达撤下了斯特劳斯鸵鸟徽章，代之以一个更相称的：水塔商标。

20世纪50年代为斯特劳斯家族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德国的赔款。就像大屠杀的其他幸存者一样，他们以及整个以色列经济受益于1952年戴维·本·古里安与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签署的赔偿协定。希尔达和理查德投资了他们的制酪厂，他们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收到的德国马克为他们弥补了

在乌尔姆失去的一切。他们从德国进口了他们的第一批商业生产设备，也同样输入了专业生产技能。他们把在纳哈里亚出生的小女儿莱雅（Raya）留在家里，将他们早熟的儿子迈克尔送到瑞士和德国，完成他在乳制品生产专业的学业。在20世纪60年代，斯特劳斯的企业开始在德国拓展业务，希尔达与理查德同欧洲食品行业的巨头达能集团（Danone）旗下的一家德国子公司成功结成战略同盟。这一合作关系伙伴的确立很可能基于斯特劳斯家族的德国背景：如果不是希尔达，达能集团可不会同这样一个偏远国家的小制酪厂结成这样的联盟。达能集团改变了这个家族企业，重新将希尔达与一个世代前拒绝她的祖国联结起来。它同样令斯特劳斯家族得以从巴勒斯坦的边缘地区返回到欧洲的中心，跟进最新的欧洲技术和商务活动。在1973年夏天，在斯特劳斯家族九德南的小块土地上，就在这片1937年严酷冬天时他们紧紧依靠的土地上，现代化的达能–斯特劳斯工厂正式开放，这一事件不仅仅是工业上的胜利。在戏剧般的30年后，曾经从欧洲逃亡、在纳哈里亚建起一个避难所使他们得以摆脱欧洲而幸存的三个灵魂，现在又将欧洲引入了纳哈里亚。

当父母在纳哈里亚定居时，迈克尔–彼得只有两岁半。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赤着脚走在牛群之间；当长成一个少年，他向酒店和咖啡馆兜售母亲做的奶酪。然而年轻的迈克尔大体上就是个自己把自己养大的野孩子。他的母亲固然爱他，愿意为他付出，但她忙于生意。他的父亲脾气很坏，有时候还会虐待他。他的妹妹比他小6岁，是父亲最爱的孩子。迈克尔是在足球场、篮球场以及沙滩上接受教育的。他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外面度过的，与双亲之间的距离已经远得不能再远了。他的父亲与母亲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却不愿意去上学。他的父母都是遵纪守法的资产阶级，但他却是不守规矩的反抗分子。他的父母传统而保守，但他却是一个传统观念习俗的破坏者。在欧洲礼仪的屋顶下，一个富有魅力、凭直觉行事、热爱生活的以色列沙滩小伙子成长起来，他将为斯特劳斯家族的制酪厂带来以色列的特征。

从13岁到22岁，是迈克尔的离家漂泊期，他曾经在海军学校、海军军队、商人的船队里生活。他非常适应水手的艰苦生活。但在瑞士和乌尔姆接受培训后，23岁的他回到了这里，回到父母的制酪厂，同他的母亲一起工作。迈克尔为他们的企业贡献胆识和毅力。他认为天空才是他们发展的上限：母亲小小的制酪厂可以征服这个年轻的以色列国家。当20世纪50年代末他们的生意濒临崩溃时，他迈进了耶路撒冷贸易与工业部长的办公室，申请应急资金。当60年代一家银行为难他们，他说服特拉维夫的另一家银行贷款给斯特劳斯家族更多的钱。凭借个人魅力，迈克尔赢得了合伙人的支持，战胜了竞争对手，用甜言蜜语诱哄并且安抚雇员、管理层和销售代理商。凭借他的决心和精明，迈克尔成功地实现了生产的现代化，扩大了销售，让斯特劳斯的产品打入了以色列每一家杂货店。然而，迈克尔真正的专长是他对人类的感知：他可以凭直觉知道人们的长处、人们的弱点和人们的需求。在20世纪70~80年代，迈克尔·斯特劳斯将斯特劳斯制酪厂变成了一家现代化的公司，利用其在欧洲的能力，为以色列提供了一切所需。

以色列是一块严酷、焦热的土地，而冰激凌却是凉爽而令人舒适的。因此，以色列消耗的冰激凌要比北美和西欧多得多。1950年，希尔达·斯特劳斯意识到了冰激凌的潜力。尽管生产过程充满困难，她坚持她的制酪厂要生产冰激凌。但迈克尔，却把他母亲的冰激凌做成了一个国家品牌。他造就了竞争对手阿提克公司（Artik）的崩溃，收购了竞争对手魏特曼（Vitman），与英荷巨头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结成了合作关系。今天，斯特劳斯冰激凌已经成为以色列最大的冰激凌制造商，占据了几乎一半的市场。

以色列是一块充满痛苦的土地，乳制品甜点是甜蜜并且慰藉人的。因此以色列热爱着乳制甜点。在1967年战争后不久，希尔达·斯特劳斯和迈克尔·斯特劳斯就意识到了乳制甜点的潜力。他们明白，属于禁欲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时代结束了，属于基本款白色奶酪和薄薄的、乳酪样的酸奶的时代结束了。随着更好的时代降临，人们也需求更好的、更丰

富的乳制产品。因此，他们对特努瓦合作社的垄断发出挑战，为新的以色列顾客提供优质的酸奶和乳制甜品单品。在新建的达能–斯特劳斯工厂，他们制造出一种牛奶巧克力布丁，取名“丹尼尔”，丹尼尔征服了20世纪70年代的市场。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们生产出一种受德国风味影响的、黑巧克力和生奶油甜点米奇（Milky），米奇几乎打入了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冰箱。斯特劳斯成为了一个繁荣的商业巨擘，掌控着目前以色列乳制品市场的最大那块蛋糕。

以色列是一个令人兴奋和容易激动的国家，所以，以色列人需要不断增加的刺激。斯特劳斯的团队明白实现这一点的方式就是一切食物都必须是尝起来有风味的。他们意识到，以色列的咸味点心必须比他们的美国同行的点心更咸，糖果必须比欧洲糖果更甜。巧克力和香草的味道要更加浓郁。对于以色列来说，不存在细微差别，一切都必须是强烈的、富有侵略性的，用味道狠狠刺激味蕾。举个例子，以色列的米奇，加入的生奶油就是在德国的两倍。但以色列人需要的不是量大，他们需要新鲜的东西。他们非常容易厌倦，所以斯特劳斯产品推陈出新的速度要远比其欧洲姐妹公司的速度快得多。为了在这里继续生存，斯特劳斯必须不停地跑步前进。而迈克尔和跟随他的员工喜欢跑步前进。他们是不知疲倦的奔跑者。所以他们接收了希尔达的小型的、稳固的德式工厂，把它变成了一个以色列的超能帝国。

1975年，理查德·斯特劳斯博士在纳哈里亚去世。1985年的夏天，希尔达·斯特劳斯在德国去世。他们留下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七个孙子，以及中东地区最先进的乳制品制造公司。1997年，希尔达去世12年后，斯特劳斯家族收购了伊莱特公司（Elite），这是以色列顶尖的巧克力和咖啡制造商。这一举措令斯特劳斯–伊莱特公司成为以色列最大的食品及饮料生产集团。2000年，斯特劳斯–伊莱特公司在加利利新开设了一家制酪厂。这家全自动化的亚希忽（Ahihud）工厂每一年生产超过10亿杯的酸奶和乳制甜品。在2005年前后，斯特劳斯–伊莱特公司兼并了东欧和南美的几家咖啡公司。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尾声，该公

司渗透进美国市场，并更名为斯特劳斯集团（Strauss Group）。2010年，它在弗吉尼亚州开设了世界上最大的鹰嘴豆沙制造工厂，现在已经占据了50%的美国市场份额。2011年，斯特劳斯集团的销售额将近20亿美元，营业利润将近1.8亿美元。每年的销售额增长率接近10%，主要基于海外业务的扩张。一段时间以来，以生咖啡的采购额计算，斯特劳斯集团已经成为世界上排名第四的咖啡制造公司——超过了拉瓦萨（Lavazza）和世家兰迪（Segafredo）。

迈克尔·斯特劳斯在他海蓝色游艇的甲板上欢迎我的拜访。这艘游艇叫“幸运号”（Lucky Me），停靠在克罗地亚人的渔村哈弗。迈克尔身材高大匀称。他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稍显凌乱，他的声音雷鸣般洪亮。尽管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仍然有着一个年轻水手般的作风、举止、活力，以及调皮的模样，他渴慕生活，永远在寻觅着下一个越轨行为。但是在工作时间里，斯特劳斯是纪律严明的。我发现他正在浏览几小时前从公司总部发送来的电子邮件：季度报告、年度工程项目、中国市场分析报告。在给我倒了一杯香槟后，他明确地告诉我他必须继续工作。尽管他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并且正在享受夏天的假期，但一个人必须做他该做的事。直到他读完最后一封公司的简报后，他才登上甲板与我会合，尝试理解为什么我要经过长途跋涉来同他谈话。

“对于斯特劳斯集团来说，以色列意味着什么？”我问道，“以色列的什么因素使得斯特劳斯集团走向成功？”迈克尔立即回应道：“是以色列的人民，以色列有着非凡的人民。以色列的人力资本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以色列的商业业务所面临的挑战都是巨大的——我们有一个功能失调的政府，一套效率极差的官僚机构，还有战争。以色列永久的不确定性是其实存在的一个缺点。然而，弥补这一切障碍的却是以色列人本身。我已经环游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人民。以色列人异常地行动快速、富于创造力、大胆创新。甚至连他们工作的方式都是迷人的。他们不辞辛劳，孜孜不倦。他们被赋予了一种竞争精神——对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需求。并且为了第一个冲过终点线，他们愿意做任

何事情。他们从来不说‘不行’。他们从不接受失败，也从不承认失败。”

中午时分，迈克尔和我顺着船尾的楼梯下到救生艇，救生艇载着我们穿越了海湾，抵达一个偏僻的小岛。现在还不到旅游的旺季，岛上几乎没有人：只有两个俄罗斯的富人正在享受阳光，随同他们的是三个铂金色头发的艳丽姑娘。迈克尔与一位身体穿环并且文身的酒吧女郎调情，她为我们调了一杯正午的夏敦埃 （Chardonnay）。在诱人的酒吧的茅草屋顶下，她没有拒绝斯特劳斯，而是与他玩起了游戏。在这个亚得里亚度假胜地，一切都是透明的：财富就是财富，年轻就是年轻，并且它们可以互相影响。

我询问迈克尔，斯特劳斯家族的故事是否就是以色列的故事。迈克尔说，尽管他的母亲不善言辞，但他经常可以感觉她的深深的疼痛：离开了德国，从欧洲被驱逐，然后发觉自己正处于一块偏远荒凉的土地，而她从来不曾完全掌握这块土地的口音。当他的父亲用其他女人转移自己的疼痛时，他的母亲用制酪厂转移自己的疼痛。借着从她所遭遇的痛苦中兴起的力量，她维持了自己的家庭，创办了自己的生意。希尔达是一个虔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旧有家园背叛的创伤让她珍惜新家园。她认为这座制酪厂就是她参与营建这个犹太国家的方式。直到她注意到，斯特劳斯家族与以色列交织在一起。当以色列成长的时候，斯特劳斯也在成长；当以色列一路穿过历史的长廊，斯特劳斯一路进军市场。因此，即便希尔达从来不曾涉及政事，从来不曾熟练地掌握希伯来语，也从来不曾真正地了解这个国家，她仍然是个以色列人。她象征着以色列的需求，体现着以色列对未来的决心，讲述着以色列奇迹般的传奇。

当我们回到游艇后，迈克尔下到他的客舱享受一个夏敦埃酒后的小睡，我独自留下来，与我的思绪作伴。乌尔姆同样也是艾伯特·爱因斯坦的家乡，爱因斯坦是大离散中的犹太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一个科学天才与泛世的人文主义者的结合。然而，爱因斯坦和斯特劳斯家族的德国犹太人大离散却是命中注定的。爱因斯坦前往普林斯顿，希尔达前往纳

哈里亚。希尔达没有沉溺于自怜自哀，而是发动了反击。她意识到，她这一代人的任务就是生存。她明白她的世代必须创造一个新世界，以便他们的孩子能够在这里重塑自我。在这个新世界，她从来不曾有家的感觉。她的生活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但最终，她的孩子和孙辈将拥有一个家乡，拥有一个家。他们把希尔达的厨房制酪场变成了一个跨国的巨人，雇用了来自超过15个国家的4万余名工人，生产数百种产品。于是现在，当游艇的主人带着水手般的微笑从他的客舱里冒出头来，欧洲幸存者儿子的这艘闪耀的游艇滑入了杜布罗夫尼克的港湾。经过一番操作后，它在一堆俄罗斯大亨、法国百万富翁、英国贵族们的游艇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带着欧洲的趾高气扬。

里克特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科比·里克特（Kobi Richter）出生在1945年的圣诞前夜。他的父亲卡尔曼（Kalman），是秉持修正主义（Revisionist）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的一个门徒。卡尔曼出生在波兰的利沃夫（Lvov），1935年移民至巴勒斯坦，改信了工党，在塞多姆（Sdom）的一家钾碱工厂工作，并加入了北部的拉玛特约翰南基布兹。他的母亲米拉（Mira），出生在利沃夫的一家极端正统派犹太家庭——她的家族没有及时移民到巴勒斯坦，在大屠杀中遇难。卡尔曼成了拉玛特约翰南的一名焊接工，同样也是这个基布兹的财务和经济主管。米拉在一个奶牛场里工作，并管理着日常服装仓库。卡尔曼和米拉是强硬而严格的人，都是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忠诚士兵。

里克特有记忆以来的第一个回忆就是战争。1948年初，当里克特一家坐在基布兹的防空洞里时，两岁的里克特将他的手指伸进空花生壳里，把它想象成头盔。但他的童年时光是非常平静的。在20世纪50年代拉玛特约翰南非常繁荣。没人提及大屠杀，战争是英雄史诗般的回忆——目力所及中不存在真正的危险。在他的眼里，基布兹就是以色列社会的精英团体，是以色列人民的精英团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精英团队。只有足够幸运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基布兹的儿子，是人生顶峰的顶

点。

科比·里克特天赋非凡。4岁的时候他就学会了阅读，7岁的时候他一周能读完4本书，10岁的时候他就阅读了狄更斯（Dickens）和海塞（Hesse）的著作。8岁时他学会了游泳，12岁时成为基布兹的游泳冠军，16岁时在以色列混合自由泳比赛中名列第二。7岁时他在焊接车间掌握了不同螺丝钉的用法，10岁时他学会了焊接，15岁时他组装了一辆摩托车。在他的少年时代，拉玛特约翰南是一个人间天堂：这里有游泳池、金属加工车间，以及大片的麦田；这里有拖拉机、马和姑娘；在这里可以猎鸭、撬锁、采摘蘑菇，还可以开着借来的车在晚上兜风。在这里可以做任何事情。

科比·里克特是一个富有洞察力的小伙子。在他的受诫礼（bar mitzvah）[注]临近之时，他就认识到，基布兹所持有的两种价值观——平等与自由——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尽管他意识到了公社生活中的嫉妒、虚伪、吝啬，但他仍然投身于基布兹。他用歌声和舞蹈赞美伟大的社会主义，在国家和犹太民族的节日庆典上载歌载舞。当女人们围着圆圈跳舞，当男人们手执犁头重新开垦一轮收获季，当孩子们被高高举起，科比的眼睛便会湿润。他完全支持犹太先锋者们这种世俗化的、极富魅力的宗教。何其有幸，他能成为少数几个领导人之一，能带领他的人民从奴役走向解放、从软弱走向强大、从浩劫走向复兴。

拉玛特约翰南并不仅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公社，它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业范例。在这里的现代化奶牛场里，母牛的产奶量是美国中西部奶牛场的两倍。这里新建的塑料厂是基布兹运动中第一个建立起来的。基布兹里还有一个鳄梨园，16岁的里克特在这里架设了一套革新的灌溉系统。基布兹还有一块棉花田，17岁时，里克特为这块棉花田设计并组装了一台机械采摘机。拉玛特约翰南的农业生产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而它的工业则实现精细生产。这个公社不仅是浪漫的社会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温室，同样也是乐观进取的民族精神以及引人注

目的技术能力的温室。当1964年里克特加入以色列空军时，他发现自己最被看重的是卓越的能力、竞争意识和高新技术。他爱上了掌控这些飞行机械的感觉，它们就是为了敢于挑战高度和速度的男人而设计的。对于里克特来说，飞行员就是一个孤独的骑士，一个与另一些孤独骑士进行生死相搏的孤独骑士。里克特热爱战斗。他相信自己的能力，热爱每天挑战自己的能力。他的优越感并不能让他在同伴和指挥官中受欢迎，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否认他非凡的天赋。这名优秀的学生、焊工、游泳运动员、猎人、舞者和技术奇才，成为了一名杰出的战斗机飞行员。在20世纪60年代，英俊、骄傲的里克特成为了以色列空军中的偶像人物。

1967年6月5日，科比·里克特驾驶着一架法国制造的“飓风”轰炸机在吕大机场起飞。同他107空军中队的同伴一起，他向南低空飞行，保持无线电通信的绝对静默，直到转向东南朝埃及飞去。这次“焦点行动”（Operation Moked）以色列空军演练了好几年。里克特自己就演练了数十次。“焦点行动”的战略思想就是令以色列几乎所有的战斗机倾巢而出，同时升空并精准地突袭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的30个空军基地。而现在，当107空军中队盘旋在西内盖夫的上空，里克特激动地看到这个计划变成了现实。数十架飞机在天空飞行，一些飞向卢克索（Luxor），一些飞向安曼（Amman），一些飞向大马士革（Damascus）。成群结队的黑鹰亮出尖喙准备攻击，天空几乎要被它们染黑了。里克特感觉就好像小小的以色列国突然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这股嘎嘎作响的能量正冲向整个中东。他感觉自己就是这股神秘力量的一部分，从以色列的应许之地倏然升空。每一架轰炸机都在它的正确的位置上，都在正确的海拔高度上，都在正确的航线上。而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绝对的静默和完美的协调中，就像一场非凡的圣礼。这样的事情在以前从来不曾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将永远不会重现。

在他的“飓风”0745号上，里克特驾驶着飞机从300英尺爬升到3 000英尺。他看到的阿里什（El-Arish）空军基地与他记忆中的完全一样：机场控制塔台，那些跑道，那些米格战斗机。里克特向高射炮组发射了

76枚火箭弹，30秒后，基地的对空高炮化为乌有。然后他又折返，发动了三次精确袭击，摧毁了地面上的三架米格–17。在15分钟内，107空军中队废掉了阿里什空军基地。在30分钟内，以色列的空军摧毁了四个国家的空军力量。当里克特启程返航，飞越雷霍沃特的柑橘园，在吕大机场着陆时，他知道这一时刻就是战争胜利的时刻。以色列现在成了一个地域大国，成为中东地区最强盛的国家。

1968年，科比·里克特接受了拦截训练。从1969~1973年期间，他参与了一系列的空中格斗战，击落11架敌机。他现在成了空军的王牌战斗飞行员之一，为以色列赢得了制空权。当他还在服役期的时候，他就获得了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博士学位；从1979~1982年，他在麻省理工大学从事人工智能方面的博士后研究。几年后，里克特上校离开了空军，连同其他军事安全系统的四名研究生，创办了他的第一家高新技术公司奥伯特（Orbot）。奥伯特公司为印刷电路板的大规模生产研发了一套革新的自动化光学检测系统（AOI），在这个领域内，奥伯特公司的生产速度和创新的决心是前所未有的。1986年，奥伯特将它的第一批产品投入市场。到1989年时，奥伯特控制了全球自动化光学检测市场的60%的份额，兼并了以色列竞争对手奥多特（Optrotech）之后，奥宝（Orbotech）诞生了，控制的自动化光学检测市场份额达到了80%。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奥宝的员工人数达到1 500人，年收入超过了4 000万美元。1992年，里克特从公司辞职，准备投资其他业务，但他仍然是奥宝公司的最大股东。

1992年12月，里克特创办了梅蒂诺（Medinol）公司。他意识到，在心血管领域的下一件大事是斯滕特氏固定模（stent），这是一种由金属丝脉管组成的小型装置，用于插入一条动脉保持张开状态，以便让所需的血液流动畅通无阻。20世纪90年代初的斯滕特氏固定模是有问题的——有的太坚硬以致很难插入，而有的在插入后又太容易滑动或者坍塌。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式的斯滕特氏固定模，要求它在插入时是柔韧的，在插入后则是稳固的。里克特同最近移民以色列的俄罗斯工程师格

里沙·平夏斯克（Grisha Pinchasik）一同研发了这种新式的、兼具柔韧性和稳固性的斯滕特氏固定模。它的第一个模型诞生于里克特在拉玛特约翰南的厨房，是用空的白干酪容器雕刻而成的。在与波士顿科学院（Boston Scientific）签署了一项合作与分销协议的五年后，梅蒂诺斯滕特氏固定模的月销量达到10万件，年销售额达到2亿美元。到1999年夏秋时分，这间以耶路撒冷为基地的极小型公司，占据了国际斯滕特氏固定模市场的35%的市场份额。

而令梅蒂诺的成功更富有传奇性的是科比·里克特发明的独特的生产方法。其结果是，梅蒂诺每一美元营业额的税后利润达到了86美分。在20世纪90年代末，科比·里克特和耶胡迪·里克特坐拥世界上最盈利的公司之一。

2000年，在里克特家族与波士顿科学院之间爆发了一场痛苦的法律纠纷，生产和分销陷入停滞。经过五年的法庭交锋后，里克特家族获胜了。他们获得了7.5亿美元的赔偿，这笔钱财令门格尔双胞胎其中一位的女儿（她在比萨隆供给房社区长大），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士兵的儿子（他在拉玛特约翰南基布兹长大），成为以色列最富裕的夫妇之一。

我与科比已经相识多年，他是我的一位好友。像往常一样，我与他在特拉维夫北部、繁华的阿素夫郊区的海边别墅里会面。他站在他的客厅，按下一个看不见的按钮，召唤出盛放极品葡萄酒的液压升降酒柜。他打开了一瓶1964年的勃艮第，倒入醒酒器，等待一会儿，然后倒进玻璃杯。他询问我对酒的评价，然后告诉我应该怎么评价。他跟我讲了很多，关于勃艮第葡萄酒以及产出这瓶酒的特定葡萄园和酿酒厂，当地继承法是如何塑造勃艮第葡萄酒的传统的。之后，在品尝了这杯酒之后，他给出了他的最终裁决：美妙绝伦。他高举起酒杯，向美好的红酒佳酿、向美好的书籍、向所有完成的工作致意。

我拿曾经问过迈克尔·斯特劳斯的问题询问科比："是什么将以色列引向成功？对于奥宝和梅蒂诺来说，以色列意味着什么？"里克特回

答，秘诀就是“将宝剑锻成犁头”（to beat swords into plowshares）——他笑着说，不是因为这对和平有好处，而是因为它对犁头是好的。宝剑的锻造不仅仅是以赛亚书（Isaiah）和弥迦书（Micah）的预言呼唤，它同样也是一个合理的商业计划。令奥宝和梅蒂诺成为可能、令以色列高新科技的繁荣成为现实的，是国家几十年来在先进军工业生产方面投入的庞大资源。军工业对于以色列的意义，就像航天计划对于美国的意义。军工业造就的惊人的人力资本、开发的尖端技术，最终惠及高新工业生产，并推动其发展进步。无怪乎梅蒂诺的突破性进展，都是由三个飞行员以及两位以色列安全奖的获奖人取得的；无怪乎梅蒂诺的突破性进展都是基于以色列的激光和导弹生产技术。50年来，国家为保卫自己所投入的资产产生了效果，获得了高新科技蓬勃大发展的大量股息。

但是还有第二个因素，里克特说道。奥伯特拥有一支由杰出个人组成的跨学科团队。“我们有最好的人工智能，有最好的计算机硬件，有最好的精密机械。这个团队可以完成任何事情。这也是典型的以色列风格——有一支由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组成的小型精英团队，他们一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夜以继日地工作。梅蒂诺是这支相同的主旋律中的一段变奏曲，在梅蒂诺，一个人要处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公司里所有事务：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科学以及精密机械。在美国的大企业里，让一个程序员理解血管生物学或者让一个医生理解材料工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最后的决议需要协商拟定通过，这是一个繁琐而不精确的过程。但是在梅蒂诺，这是综合的，就像奥宝是一个完全跨学科的公司一样。时间被节省下来，效率则提高至原来的三倍。于是，企业就像一个紧密结合的有机体一样运作：专注、强大、健康，并有能力达成最佳的结果。在很多新兴的以色列企业，类似的体系以不同的模型和形式运转。他们小型和统一的团队有着忠贞的精神、权宜的考量、创新的推动力，这在美国和欧洲的企业中是几乎看不到的。”

第三个因素就是移民，里克特这样说道：“在20世纪90年代，100万的俄罗斯人来到了以色列，其中，又有数十万的、极其出色的工程师、

技术员、程序员。奥宝和梅蒂诺都从中受益。从这一方面说，我们的雇员有85%左右都是俄罗斯移民。俄罗斯移民是软硬结合板（rigid-flex）的发明人，也是公司的共同所有人。整个以色列工业生产都因这股移民浪潮而受益。当犹太人的创造力与俄罗斯人的彻底精神相逢，就碰撞出出类拔萃、富有成效的功绩。如果你问我是什么造就了我的成功，造就了以色列高新技术革命的成功，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国防工业的基础建设、以色列的创造力、俄罗斯人的技能，以及一个整合了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的小型无畏的团队。让我的公司走向成功的独特组合也同样作用于以色列，以稳固这个新兴国家的方式拯救了以色列。”

里克特一边品尝着他的红酒，一边试图将一个个历史节点连接起来：“在以色列忙于兴建基布兹的20年里，我生活在一个基布兹。在以色列忙于军队建设的20年里，我正在军队里。在以色列忙于高新科技研发的20年里，我从事着高新技术。我恰巧处在以色列前进的每一个聚焦点里。我的生活将我从以色列的一个传奇带入下一个传奇。”

“在农场里，我们感觉就像是上帝的儿子，”科比说道，“我们体格健壮，英俊迷人，皮肤被太阳晒成健康的颜色，就像令人骄傲的犹太贝都因人，赤脚走在田里，驾驶着拖拉机，追逐着姑娘们。我们是从旧犹太人的灭亡中兴起的新的、强壮的犹太人。我们看不起大离散中的犹太人，看不起颓废的特拉维夫市民。我们是真实的存在，我们是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实现者，我们是以色列存在的核心。20世纪60年代的传奇就是我们，我们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传奇。我正是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注]20世纪60年代对我们的基布兹考察中所描述的那个小伙子：一个做梦的小伙子。”

“在空军中我是王牌飞行员。1969年至1970年的以色列与阿拉伯的空中格斗，实际是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与支持阿拉伯的苏联之间的战争。所以，我的拦截队伍配备了最精良的装备技术，这些都是美国提供的。但我的队伍比美国人有着更多的实战经验。我向美国人的空军拦截队和

海军拦截队传授经验。我的的确确是张王牌。我不是在扮演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的角色，而是汤姆·克鲁斯扮演着我。在成为战斗飞行员十年后，我成了西方国家最优秀的战斗飞行员之一。我称得上是一个世界冠军。再一次，我发现我把传奇拟人化了。当基布兹日渐衰落，空军就是以色列卓越精锐的缩影。我的同事们和我，就是以色列能力和优越实力的体现。”

“但是到80年代后期的时候，”科比说道，“军队的传奇衰落了。尽管以色列的空军保持着它的力量，但我意识到，以色列绝对统领天空的时代即将结束。我意识到，没有军事权力和军事胜利，就不能解决以色列的基本问题。然而，当第二个传奇摇摇欲坠时，第三个传奇又出现了：高新技术。最开始的时候是赛天使公司（Scitex）[注]，然后是奥宝集团，然后是一百个新兴的企业，然后是一千个、一万个。这里有了风险投资基金、研究与开发中心、电信业、生物技术、医药行业、清洁科技产业。创造力就宛如一柱令人惊异的喷泉，突然从这片贫瘠的土地喷涌而出。在世界上，以色列是人均医疗设备专利数最多的国家。我们拥有比法国更多的新兴企业。每一家跨国集团都想在这里设立子公司，因为他们都认可我们的非凡创造力——所有那些精妙绝伦的金点子都出自所有这些年轻的以色列人。当基布兹和军队衰落后，第三波以色列浪潮已经掀起。这第三波的技术革命浪潮令我们摆脱困境。尽管有诸如占领、定居点、国家腐败等问题，它令我们得以保持昌盛繁荣。它是以色列生命力的新的化身。”

斯特劳斯和里克特的故事，代表了以色列经济腾飞传奇的两个方面。斯特劳斯代表着坚实的以色列传统工业的革新，而里克特体现了以色列耀眼的高新科技行业的创新。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和21世纪最初的十年里，当以色列的政治失败、和平的希望破灭、伊斯兰的核威胁开始浮现时，以色列的经济蓬勃发展。在21世纪，诸多的像斯特劳斯、里克特以及其他千余家公司的企业，令以色列成为西方最活跃的经济实体之一。

要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将目光投向了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这位69岁的经济学家在罗得西亚出生，在伦敦接受教育，在美国赢得了职业声望。从1994年到2001年，他都是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首席副总裁。从2002年到2005年年初，他担任花旗集团（Citigroup）的副主席。八年来（2005~2013）他担任以色列银行（Bank of Israel）[注]的行长，成为执掌以色列经济的大祭司。在他赫兹利亚的宅邸里，穿着莫卡辛鞋[注]、棕黄色的百慕大品牌的短裤、绿色的鳄鱼牌的衬衫接待我。

当他谈论当代以色列的经济时，他更倾向于列举确实的数据，而不是空洞的吹嘘。他坐在大大的红色扶手椅里，衬得他本就矮小的身躯显得更加矮小，他用缓慢、平和的盎格鲁——撒克逊希伯来语（Anglo-Saxon Hebrew）谈论着那些相关数据。从2004年到2008年，以色列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5.2%。当整个世界陷入2010年至2011年的经济危机时，以色列的年均增长率仍然为4.7%。“虽然这个数值还不能使以色列成为一只中国虎，”他对我说，“但以色列呈上的演出已经远比美国和欧洲要精彩得多。”这的确是一个非凡的经济成就。

费希尔告诉我达成这一成就的原因有四个：大幅度减少了政府开支（从2002年花费51%的GDP减少到2011年的42%）、显著削减了国家债务（从2002年的100%的GDP减少到2011年的75%）、维持一套保守而承担责任的金融体系、创造以色列高新科技工业继续繁荣发展所需的条件。“以色列高新科技的发展真的非同凡响，”他这样说道，“它是带动以色列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因为高新科技产业的存在，我们的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实现了贸易平衡，我们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以色列已经变成了一个创业之国（start-up nation）。以色列在学术研究和产品研发上的投入占GDP的4.5%，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投入只有2.2%。到目前为止，以色列的创业者人口比率是全世界最高的。由以色列人提出的发明数量更是令人吃惊。所以，以色列在纳斯达克（NASDAQ）进行交易的公司的数量超过

了加拿大与日本，而且以色列的风险投资总额超过了德国与法国，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一次又一次地为之惊讶，这里有改革创新，这里有胆大无畏，这里有着罕见的野心。以色列人愿意冒险，他们相信，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所以，在以色列有着一种特殊的创业精神。而这种精神就令以色列成为了出产独创技术的强国。任何人都不应得意忘形。我们仍然只是一个市场狭小的小国，并且面临严峻的挑战。然而，高新技术革命与稳健宏观经济政策的结合，令以色列成了繁荣的中心。”

当我问及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危险，他回答得非常谨慎。“我们面临着四个困难，”他说，“以色列的教育体制已经恶化，而这一点危及我们维持卓越技术的能力；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就业率仅为45%；大多数的阿拉伯妇女没有工作；不到20个的企业集团控制了大部分的本地市场，从而限制了竞争。这四个困难重重压在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上，但高新技术的奇迹遮掩了这一切。但是从长远观点看，这些问题将危机以色利瓦伊持繁荣和成功的能力。”

丹·本·戴维（Dan Ben David）则不像费希尔这般小心翼翼。我开车从赫兹利亚驶抵耶路撒冷，在以戴维为首的智囊团队中，听这位经济学教授明确地谈论那些政府与央行都只能暗示的事情。“以色列真正的经济奇迹发生在1955年至1972年，”本·戴维告诉我，“在那些年里，以色列GDP的增长速度是其他西方国家的两倍，同时以色列还保持着西方最平等国家之一的身份。尽管它吸纳了数百万的移民，参加了三次战争，但它仍然成功地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标准和工人的生产效率。与此同时，它还促进了优质教育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团结。”

“但在1973年，一切都出了问题。在赎罪日战争的创伤后，国防预算增加了一倍，经济增长开始缓慢，通货膨胀开始失控。即便通货膨胀在1985年被成功抑制，人均生产总值已经沦为20年前的三分之一。如今国家的经济负担不再是国防开支，而是福利救济——从1972年到2002年期间上涨了四倍。与其投资在人力资本和基础建设上，以色列更倾向于

将大笔的资金转让给穷人和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而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不断扩大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和占人口少数的阿拉伯人群体，不能充分地参与以色列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在以色列建国的第一个25年，它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还保持着美德、凝聚力和社会公正；但在刚过去的25年里恰恰相反。近年来，经济增长率仍然居高不下，但美德、社会凝聚力以及社会公正已经被腐蚀得岌岌可危。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不过是前一代人在人力资本方面长期的投入所结的果实。然而，蓬勃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也创造了一个繁华的闪耀泡沫，掩盖了当今我们并没有对未来的人力资本进行同等投入的事实。财政预算有了缺陷，公共政策走向失败，以色列的社会生病了。如果以色列不尽快改变方针，即便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奇迹也终将逐渐消失。”

本·戴维在美国长大，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是少数几个外流的顶尖经济学家之一——就在20年前，外流的学者数量有很多。当他在萄比中心（Taube Center）宽敞的办公室里与我谈话时，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真正的焦虑。“看看这个。”他招呼我走到他的办公桌前，指着他的电脑屏幕上一系列彩色的图表对我说道。

“令这一切更加糟糕的就是人口，”他说，“就像你在图表上看到的，在过去的30年里，以色列经历了一场人口革命。在这些年里，学龄期儿童的入学比例中，进入极端正统派犹太学校的孩子从4%上涨到将近20%，进入阿拉伯学校的学龄期儿童从20%上涨到28%。所以现在，所有的学龄期儿童中有48%都在极端正统派犹太学校或者阿拉伯学校。又有另外的14%在现代正统派犹太学校，只有38%的孩子在世俗的学校。这意味着到2030年，以色列原本占大多数的世俗犹太人将缩减为少数派。以色列的文化特性将改变，同样改变的还有它的社会经济概况。世俗犹太人是那些工作、生产、纳税的人。一旦世俗犹太人寡不敌众，以色列将成为一个落后的国家，无法迎接第三个千禧年的挑战。”

我说：“你给我展示的是一个正在形成过程中的国家的灾难。”本·

戴维悲伤地点头：“如果以色列拥有一个高效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府，它将能够对抗这个灾难性的趋势。现在还不算太晚，但是很快就要来不及了。而与此同时，持续功能失调的以色列政府所做的恰恰相反：他们奖励这些不工作的少数派们，用津贴拉拢他们，而不是要求他们接受现代的、民主的教育。结果是，将近一半的人口都不是国家奋斗的组成部分，都不承担对国家未来的责任。承担社会生产环节的士兵，肩上的重担已经令人难以承受。越来越少的以色列人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工作，以养活那些不工作的犹太人。越来越少的以色列人不得不加快奔跑的速度，以带动那些一点都不挪步的犹太人。一个失败的政权体系保证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定居者、富豪们的特殊利益。然而承担生产的中产阶级却被国家抛弃了。这就是为什么筋疲力尽的中产阶级感到越来越痛苦。他们感觉国家已经背叛了他们。他们看到了他们所爱的国家正濒临崩溃。”

施穆里（Shmuli）的故事同样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1980年2月，伊奇克·施穆里（Itzik　Shmuli）出生在特拉维夫。他的父亲出生在雅法，是一个餐馆老板；他的母亲是一个出生于库尔德斯坦（Kurdistan）的保姆。施穆里一家五口人，居住在拉马特甘（Ramat Gan）[注]的一间拥有一个半卧室的公寓里。尽管他们的生活并不轻松，他们的家庭是温暖的。双胞胎兄弟和他们的小妹妹，沐浴在爱的阳光下。

伊奇克·施穆里是一个举止得体的高中生，也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后来成为一名正派的士兵。服完兵役后，他跟随父亲在他们特拉维夫的简陋的餐厅里工作。2004年，他看到一个电视节目，报道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上的无家可归的饥饿儿童。在24岁的时候，施穆里登上了飞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设了一家孤儿院。当他回到以色列，他在一所省立大学接受特殊教育，并被选举为本校的学生会主席。三年后，他成为全国学生联盟（national student union）的会长。

2011年7月14日，施穆里正在纽约。他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正在特拉维夫的罗斯柴尔德大道上发生。一个名叫达芙妮·利夫的24岁的视频编辑在这条著名的大道中央上搭起了一个帐篷，以行动抗议高涨的房价[注]。一天之内，数百人加入了她的队伍。两天之内，数千人加入了她的队伍。施穆里登上飞机返回特拉维夫，加入了罗斯柴尔德的抗议运动。几天后，他成为这场抗议运动的负责人。

利夫圈子里的很多人缺乏经验和组织能力，而施穆里两项兼备；当利夫圈子里的很多人被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时，施穆里则是一名头脑清醒的社会主义民主派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认为，为了不失去公众的支持，这场抗议运动就不能是宗教的或者激进的。他希望这场运动可以代表尽可能多的以色列人。因此，他同样也在大道上搭起了一个帐篷。两个星期后，施穆里已经成为要求新社会秩序的新一代以色列人的领导人。

7月23日，三万青年走在特拉维夫的街头，高呼着一个新的复古口号："人民要求社会公正。"7月30日，队伍壮大到13万人；8月6日，壮大至30万人；9月3日，45万人——以色列6%的人口——涌上了街头。他们在特拉维夫的国家广场举行集会，施穆里是大会的主旨发言人。"我们是新以色列人，"他向33万名欢呼的游行示威者呼吁道，"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国家献出生命。让我们住在我们所爱的国家。"

从许多方面看，2011年的抗议运动是所有抗议运动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定居点运动、和平运动、东方犹太人的沙斯党运动从来不曾召集过如此之多以色列人、点燃过如此高涨的热情、赢得过如此广泛的公众支持。定居点运动、和平运动、沙斯党运动也从来不曾以这样一种文明而富有建设性的方式将国民联合起来。以色列2011年的国内抗议运动，远比开罗的更和平，远比纽约的更有效。总体而言，这些占领罗斯柴尔德大街的年轻人要比这一年晚些时候占领华尔街的青年更温和节制、更

富有策略、头脑更清醒。在世界上，所有的由社交网络发起而演变为社会抗议（social-networks-to-social-protest）的运动中，以色列的这一次运动是最温和的。温和而非暴力，它成功地赢得了80%的以色列民众的支持。在这个夏季里，它再次团结了以色列人，给他们一种希望。然而，就像这波反抗的浪潮兴起一样，它又消失了。因此，在一个深秋的夜晚，当我和施穆里走在罗斯柴尔德大道上时，这里什么都没有留下。没有帐篷，没有游行示威者，也没有社会变革。狂欢节结束了。它完全就像一个仲夏夜晚的甜蜜的梦。

施穆里则不同意我的看法。“我是一个可以参加马拉松赛跑的人，”他这样说道，“我可以跑很长一段路程。我知道生活有其固有节奏，我知道革命不会发生在一夜之间。从一开始，我就认识到，2011年的夏天将只会是第一个赛段。但我确实相信我们会有第二个和第三个赛段。我不需要每天都有示威游行，也不期待不间断的抗议运动。但我真的认为，2011年的夏天是一个临界点。它的意义，远比住房价格、食品价格或者富人关于规则的辩论要大得多。2011年的夏天让我们成了一个民族。在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以色列人感觉到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不是无助的个体，不是互相竞争的教派的成员。而以色列的人民所求的，就是社会公正。”他们希望政府进行改革，这样才会促成国家变革。的确，现在的罗斯柴尔德是安静的。每个人都回家了。但我们经历的转变不会离我们而去。我们不再将自己看作愤世嫉俗的享乐主义者。如今，我们作为以色列人的人生拥有了意义。这种拥有意义的新感觉就是2011年所达成的伟大成就。我们再次爱上了以色列，信任以色列，我们决心变革以色列。

施穆里令我着迷。他中等体格，身材瘦削，有着棕色的眼睛。他有着一颗善良的心，面带羞怯的微笑。当他穿着牛仔裤、T恤、背着一个背包走在大道上，年轻人们走向他，与他击掌，告诉他不要放弃。“继续战斗，”他们告诉施穆里，“让政府看看，把我们的要求传递给政府。”这名学生领袖既不是才智过人，也不是空想家；他没有超凡的魅

力，也不具备权威。但是在他推行的过程中，他的许诺是理智并庄重的。他的领导风格不是大男子气概式的，但是鼓舞人心。毫无疑问，他拥有一个光明的政治前程。他将成为以色列议会中的一员，他所代表的年轻一代将塑造未来的以色列政治。2011年的概念性革命将改变以色列的精神状态和以色列的政治面貌，所以，施穆里争取希望的主张也许是正确的。我也希望他是对的。我们的未来取决于2011年是否可以用一种温和而建设性的方式使反抗制度化。

当施穆里离开后，我独自走在大道上。它又回到了以前的模样：人们在这里悠闲漫步，遛狗的小伙子，遛狗的姑娘，遛狗的小伙子和姑娘。所以我现在在脑海里组合着不同片区的拼图——所有我从斯特劳斯、里克特、费希尔、本·戴维以及施穆里处听到的一切。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下面这些内容：以色列工党的霸权自1973年战争后开始下降，在20世纪80年代末完全分崩离析。古老旧体制的衰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新的以色列个人主义将新的以色列资本主义转变为巨大的成功。自由的市场令以色列的天赋和主动性迸发并创造了急速发展的现代经济，持续地削减公共支出和军费支出加速了这一进程。私有化、解除管制和货币自由同样也是如此。当私营企业一派欣欣向荣时，公共部分则变得摇摇欲坠。

一个平庸的政府及其狭隘的政治不能让国家制衡自由市场的弊端。反垄断法及强制执法是那样软弱。匆忙地执行私有化。没有对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任何保护措施。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水平都在下降。没有住房政策。几乎所有私有的东西都蓬勃发展，几乎所有公有的东西都面临破产。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有太多的宣言，那么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以色列没有任何宣言。如果说半个世纪以前以色列没有资本主义，那么现在以色列到处都是资本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迈克尔·斯特劳斯将一个乡下的制酪厂变成了一个跨国界的帝国，而科比·里克特用他独特的洞察力创造出一个市值10亿美元的巨擘。然而，同样在这种背景下，财富被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社会

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少数的以色列大资本家占据了大部分的国家资源以及其他资产。困扰着斯坦利·费希尔和丹·本·戴维的潜在不安正在蔓延，日益恶化。伊奇克·施穆里奋起反抗的不公正制度已经扎下了根。人们幻想着这个市场可以替代政府，于是以色列人失去了可以代表他们、服务他们、促进公共利益的政府。再没有政府可以调控市场的运作，处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少数派或阿拉伯人少数派带来的挑战。再没有一个政治实体来抑制定居者和贪婪的富人，来代表大多数的以色列人，维护辛勤工作的、富有建设性的中产阶级。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根本的问题被忽视了。20家强大的商业集团统治着以色列的经济，也统治着以色列的媒体和公共话题。然而在近些年，在以色列政治生活的外表下，一种批判意识正在酝酿。所以当达芙妮·利夫在罗斯柴尔德大街上搭起帐篷，整个国家都投以关注的目光。所以当伊奇克·施穆里领导这场国内的抗议运动，所有公众都予以回应。在25年的新自由主义的霸权统治后，一股新的社会民主的浪潮浮出了水面。然而还不明确的是，2011年的这场概念革命是否将变成一个政治现实；这里是否有了一个领导集团和领导平台，可以将新以色列人的诉求变成新以色列的现实。

在罗斯柴尔德大街的两侧，昂贵的新式公寓区和国际风格的建筑被一盏盏灯点亮。以色列的富裕正在这里上演。市场的力量还没有衰退。沿着中央的大道，穿着破牛仔裤的男人们正在散步；泡夜场的俱乐部会员们旁观着，化学般的充满诱惑的光芒在他们眼里闪烁；一个漂亮的姑娘骑着她时尚的自行车。当黎明降临，大道上空旷无人，我尝试权衡着成功与失败，冒险与回报，希望与绝望。在我看来，现在我们的很多美德和很多缺陷正是来自相同的源泉。正是这相同的基因造就了我们，也危害着我们。

以色列高新技术发展的秘密就是抵制权威、忽略传统的智慧、蔑视游戏规则；而以色列国家的缺陷也正是抵制权威、忽略传统的智慧、蔑

视游戏规则。犹太人的律师、犹太商人、犹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犹太移民催生了一个焦躁不安的以色列公民群体。而这个不可预料的公民群体创造了一种不受控制的能量，不允许国家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实体履行职责。在半个世纪里，本·古里安的官僚专制给这种能量套上了辔头，组建了一个国家。但是，在1973年本·古里安去世后，这个他塑造的国家就开始分崩离析了。它无法再统治它的族群、派系和个人。它无法再包容它的多元化的少数民族群体及其互相抵触的身份特征。这个国家不再处理以色列的真正挑战，停止了合理的运作。以色列不再是一艘向着目标进发的突击艇，而是成了一艘寻欢作乐的轮船，没有船长、没有指南针、没有方向。

2011年夏天，在罗斯柴尔德大道上发生的事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以色列人害怕失去他们的单一民族国家，他们正尝试重新改造这个民族。在大道的尽头、在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成立的古老的特拉维夫博物馆建筑上方，新的一天亮起曙光，我希望这个警钟可以真正地将我们全部唤醒。确实到醒来的时候了，这个新兴的国家必须重新启航。这个不成熟的政治实体必须成长。在崩溃与绝望之余，我们必须奋起迎战一切野心勃勃的计划带来的挑战：家国的重建。以色列共和国的复兴。

---

1. 受诫礼（bar mitzvah），为满13岁的犹太男孩举行的成人仪式。
2. 卢克索（Luxor），埃及中东部的一座城市。
3. 安曼（Amman），约旦首都。
4. 大马士革（Damascus），叙利亚首都。
5. 奥地利裔美籍心理学家，以其对儿童和教育的研究而著称。儿童自闭症经典研究的发起人。作品有《仅有爱是不够的》（1950年）和《魅力的用处》（1976年）。
6. 赛天使（Scitex），全球最大的宽幅数码印刷设备供应商之一。总部位于以色列纳塔亚，在美国亚特兰大、墨西哥、欧洲布鲁塞尔、南非和中国的香港和上海设有分支机构，全球共有500多名雇员。2005年10月被并入惠普集团的Inkjet Industrial部门。
7. 以色列的央行。
8. 莫卡辛鞋（moccasins），北美印第安人穿的无跟软皮平底鞋，通过手工缝线将鞋面和鞋底（鞋帮）连合在一起。

9. 拉马特甘（Ramat Gan）,以色列西岸城市。为特拉维夫——雅法城镇群中的最戴维星城，位于特拉维夫东北。

10. 以色列“帐篷运动”。

第十六章
生存挑战，**2013**



我第一次意识到伊朗造成的威胁是在2002年。那时，一场关于是否

进攻伊拉克的激烈辩论席卷美国。那时，以色列正努力遏制第二次巴勒斯坦反占领起义发起的又一波自杀式炸弹袭击。然而就像其他少数以色列人一样，我意识到，美国必须尽力遏制的区域力量不是伊拉克，而是伊朗。以色列所面临的真正存在的威胁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伊朗人。一旦伊朗拥有了核武器，整个中东就拥有了核武器，世界秩序将趋于崩溃，以色列危在旦夕。

三年后，我开始用一种激进的、甚至是急迫的口吻来撰写关于伊朗威胁的文章。然而，即便在2006年、2007年、2008年，当我述及伊朗的浓缩铀旋转离心机时，几乎没有人愿意听。只有极少数人同意伊朗的核问题是以色列建国以来所面临的最引人注目的挑战。对于我来说，任务是明确的：国际社会和以色列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免不久之后就将遭遇可怕的困境——（伊朗的）核弹或者（以色列的）轰炸。然而，不论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家里，很多人都把我视为一个杞人忧天的人，不怀好意地散布着恐慌和焦虑。那些我身边的以色列的著名人士以及我所工作的以色列媒体只是对伊朗徒逞口舌，却拒绝去了解伊朗。国际社会与国际媒体也是如此。尽管大家都知道伊朗的威胁在那儿——而且更加迫近——但鲜有人承认这一点，更少有人殚精竭虑地做那些必须做的事情以阻止伊朗的核威胁。

伊朗的核挑战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的。自1945年起，国际社会就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成功遏制了核武器的扩散。但是，如果伊朗拥有了核武器，就会导致核武器的全球化，这可能最终危及到长崎事件后（post-nagasaki）奇迹般的和平局面。

伊朗的核挑战同样有一个美国背景。在进攻伊拉克和从伊拉克撤军之后，美国在中东的操控力量被认为是减弱的。随着阿拉伯民族的觉醒，美国失去了一些古老的阿拉伯联盟，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一旦华盛顿在与德黑兰的战略对抗中败北，它将可能失去中东对美国的尊重。一个核化的伊朗将成为世界一块重要区域的主导力量，

并且将带动这块区域对抗美利坚帝国。

伊朗的核挑战同样也有一个以色列的背景。确实，大家都说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但是以色列从来不曾利用它的核武器。尽管以色列一直受到来自邻居的威胁，但它从来没有恐吓说要消灭它的邻居。在核领域，以色列有着极其负责和克制的态度。伊朗却是不同的。伊朗谋求区域霸权，他们想要看到以色列的毁灭。如果他们获得了原子弹，很可能会使用它，或者把其交给可能会使用它的人。一个核化的伊朗将会迫使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也走向核化，环绕着以色列将诞生一个不稳定的、多极化的核体系，使它的战略地位崩塌，将其国民的生活拉入一个无休止的噩梦中。

然而，尽管这三重背景已被人们知晓并认可，但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以色列，这么多年来都对伊朗不闻不问。其问题不在于意识形态或者道德道义，而在于认知。在纳坦兹和福尔道，那些面对着铀浓缩设施的人没有好人或坏人的区分——只有看到和没看到的分别。在21世纪初，形势已经非常明显，以色列的第一要务就是尽其一切所能，使之不要抵达核弹爆炸的临界点。但以色列却没有以严肃的态度处理伊朗的挑战。战略制定和情报机构会关注这个问题，但广大公众却忽略了它。因为伊朗的威胁还没有造成直接的后果，或者耗费有形资产的成本，所以这个威胁仍然是抽象而模糊的。它没有成为政治辩论或者公共话题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它还没有真正的立足之地。就这样，一种心理上的阻碍让我们不能看清伊朗，耗费了我们关键性的十年，而我们本可以在这十年中利用我们的力量阻止伊朗。

被这个认知障碍遮蔽的不仅仅是以色列。2005年，所有的西方情报机构都知晓了伊朗的核计划。所有的西方领导人都知道这可能危及美国、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未来。但是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观念上，西方的公众舆论无法处理这个挑战。西方的媒体、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们正关注伊拉克和阿富汗，对伊朗的挑战不闻不问。很多人不愿去听，不愿去

看，不愿去理解。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没有在遏制伊朗的行动上给予必要的政治支持。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急迫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被搁浅了。没有及时地强制实施严厉制裁。一份与俄罗斯达成的对伊朗实施贸易禁运的协议遭到搁浅。伊朗的最高领袖并没有收到一个确切的最后通牒：是要（军事上的）核化，还是（政治上的）生存。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德黑兰碰上了一个虚弱而心不在焉的西方，这样的西方根本不能阻挡它迈向核弹的脚步。

以色列的认知障碍和西方的认知障碍有很多的共同点。它们都是战略上的成功与稳定造成的后果。40年来，在迪莫纳的保护伞下，以色列人享受着相当舒适的生活，他们开始认为，以色列战略上的区域垄断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或者干脆拒绝去想象这种垄断有可能结束，而一旦结束将带来可怕的后果。确实，曾经爆发了两次海湾战争、两次黎巴嫩战争、两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但它们不会威胁到以色列的存在。既然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受到威胁，自满的情绪便开始滋生。以色列人再也不去想他们有多么幸运，不去想一旦迪莫纳的核保护伞破裂，会有什么事情降临在他们身上。

70年以来，在西方战略优势的安全保障下，美国人和欧洲人享受着和平而富足的生活。因此，他们同样也将这种优越性视为理所当然，没有意识到，一个激进的伊斯兰核威胁的出现将直接影响到巴黎、伦敦、柏林、纽约的美好生活。确实，在此期间曾经爆发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布什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的战争，但是除了古巴导弹危机（the Cuban missile crisis，1962年）之外，美国和欧洲还不曾暴露在真正的核威胁之下。当战略稳定没有遭遇到真正挑战，他们的自满情绪也在滋长。美国人与欧洲人再也不去想他们有多么幸运，不去想一旦核威胁危机到他们的安逸生活和幸福追求，会有什么事情降临在他们身上。

伊朗的核工程就像一棵猴面包树。在它成长的早期阶段，它非常容易被连根拔起。伊朗早期的核工程无法同西方力量对抗。但是在它成长

的早期阶段，没有任何人认真尝试要把它连根拔起。因为在伊朗的坚韧同以色列与西方的自满之间，伊朗人占据了上风。美国陷入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沼，并没有关注伊朗。以色列忙于处理定居点问题，没有关注离心机。欧洲因为其内部弱点而陷入瘫痪。西方和以色列都看到了从伊朗长出的可怕的核武器的大树，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却都没有砍伐它。

我与阿莫斯·亚德林（Amos Yadlin）会面的地方是在特拉维夫东部、嘉美约瑟夫（Karmei Yosef）舒适的家中。从阳台向外望去，这里的景致真是美极了：特拉维夫的天际线、地中海的海岸线、雷霍沃特白色的城区、胡尔达灰绿色的葡萄园，特拉基色（Tel Gezer）的考古遗迹。园篱外大约500码的地方，基色山的山坡上，是一片受到精心照料的果园，那里曾经坐落着巴勒斯坦人的村庄阿布舒莎以及我的曾祖父在20世纪20年代来此定居时居住的豪华宅邸。

1981年，八名以色列飞行员轰炸了伊拉克的奥西拉克——这是由法国人建造的核反应堆，亚德林（Yadlin）少校就是其中之一。2007年，作为军事情报团的首席成员，亚德林将军负责收集关于朝鲜人修建的叙利亚代尔祖尔（Deir ez Zor）[注]核反应堆的情报。从2006年到2010年，亚德林在以色列对抗伊朗核工程的行动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他并不是那个把“贝京学说”（Begin Doctrine）[注]概念化的人，但他是主要参与者之一。以色列的贝京学说不允许任何敌对国家拥有核武器。他以不同寻常的方式两度成功贯彻贝京学说，而第三次尝试差一点就成功了。所以我坐在这里，坐在庭院用椅上，认真聆听这位圆圆脸庞的以色列将军，聆听这位思想深邃的将军如何一次又一次恰巧地邂逅决定历史的时刻。

亚德林首先跟我谈起他在内盖夫的哈泽里姆基布兹度过的童年时光，在那里开拓土地的农夫们在盐碱地上挣扎着努力工作，并最终征服了这片土地。抚养并塑造了亚德林的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他们是属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他们温和而仁慈，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征服

沙漠，为犹太人民在沙漠中建起一个家园。然后，亚德林告诉我他在以色列空军里度过的早期生涯。在20世纪70年代，他很为自己属于这个最专业、高效的以色列机构而感到自豪，空军保证了犹太民族家园的存在。然后，亚德林向我谈起那受创的18天以及赎罪日战争的那个晚上：他同队的7名飞行员牺牲，5名被俘，而他所在空军中队拥有的30架天鹰轰炸机（Skyhawk bombers）中17架被摧毁。当战事在亚德林周遭全线爆发时，他学会了更加坚强，并重拾了对自己的信心。在1973年后的恢复时间里，以色列空军（IAF）也是这样。1980年的夏天，当亚德林从犹他州的集训返回以色列时，他已经成为以色列第一支F–16战斗机中队里顶尖飞行员中的一员，他与他的同伴都感受到一种复兴的力量。

1981年的任务看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轰炸巴格达郊区法国人为伊拉克建造的核反应堆。他们所面临的现实是，巴格达过于遥远，以色列的空军还没有掌握实现这个任务所需要的技术。那时还没有GPS，没有智能炸弹，也不能实现空中加油。这样的任务也没有一个先例：世界上还没有一支空军曾经轰炸过一个核反应堆。然而，1981年6月7日，当地时间16时，八架最先进的F–16轰炸机起飞，飞越了埃拉特海湾，低空飞行了600英里，穿越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他们越过了山峦、沙漠、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山谷，越过了高原、运河、铁路、房屋和田地。一些伊拉克的平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向低空掠过他们房顶的飞行员们挥手致意。然后，在飞行了103分钟后，亚德林在20秒内从500英尺爬升到10 000英尺的高度。现在，他可以看到核反应堆的圆顶，5秒钟后，核反应堆就进入了炸弹的射程瞄准。10秒钟后，这个年轻的基布兹社员按下了按钮，投放出两个2 000磅重的炸弹。20秒钟后，他快速下降躲入防空导弹喷发的滚滚浓烟中，再次下降到500英尺的高度，飞越了渐暗的伊拉克沙漠，穿越沙特阿拉伯和约旦，逃回了家。亚德林坐在驾驶舱里，他知道，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那瞄准目标、细致入微的一分钟就解除了第二次犹太人大屠杀的威胁。

2007年的任务看起来也是不可能完成的：摧毁朝鲜人为叙利亚建造

的，并未挑起战争的核反应堆。亚德林没有跟我谈论那些被非以色列的媒体认为是以色列操作的技术细节，但是很多关于“果园行动”（Operation Orchard）信息都被国外记者和专家们披露报道。

这一次的挑战不在于技术层面而在于观念层面。飞机和炸弹并不是最困难的，困难的是获得准确的信息并且及时做出正确的决定。2006年，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Institute for Intelligence and Special Operations，摩萨德）的局长迈尔·达甘（Meir Dagan）认为，在叙利亚进行情报资源的投入是没有意义的，这将是无用功，因为叙利亚不可能以任何形式威胁到以色列。阿莫斯·亚德林不敢苟同。他记得三年前，以色列就未能侦查到利比亚的核工程；于是他要求他的助理们扫描所有可以得到的材料，看看有没有潜藏的惊喜。2006年夏末，其中一名助理发现，在位于代尔祖尔的一座大型建筑里可能潜藏着朝鲜人民的钚反应堆。到秋天的时候，已有一些证据支持这个看似疯狂的假设。根据一些并非出自以色列的消息，亚德林向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以及一名被解雇的美国情报官员诉说了他的忧虑。这两人都受到达甘的影响，达甘坚持叙利亚不存在核反应堆。然而，2007年3月，一则情报完全颠覆了达甘的认识。根据一些非以色列的材料，这位摩萨德的局长现在要求在核反应堆激活之前，在叙利亚认识到他们的大秘密被发觉之前，立即采取行动。在2007年春末这段时期，亚德林成为这项行动的负责人。非以色列的消息宣称，正是亚德林建议总理和参谋长计划一个低调的行动，以免令叙利亚的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感到尴尬，以免他发动一场全面的报复性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人还为阿萨德提供了掩护，他们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非以色列的消息还宣称，亚德林的军事情报同样证明，还有足够的时间计划一次合理的、高度冒险的空袭，最佳时机就在几个月之内，当核反应堆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现在看来，亚德林的确是正确的，果园行动的精确定时定性达成了两项基本目标——清除核心，没有战争。

根据美国记者和分析人士戴维·马科夫斯基（David Makovsky）的

说法，2007年9月5日午夜刚过，四架F–16轰炸机腾空，飞向叙利亚的核反应堆。飞机从伊兹拉山谷空军基地起飞，26年前，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的飞机同样从这里升空。在2012年《纽约客》（The New Yorker）发表的一篇长文中，马科夫斯基描述道，四架F–16飞机由四架F–15飞机护航，从沙漠里的空军基地起飞——这个基地距离亚德林孩提时代的基布兹不远，后来他在这里担任指挥官。八架以色列飞机，配备有先进的电子对抗设备，沿着地中海沿岸、沿着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界飞来。午夜过后，他们向生产钚的工厂投放了17吨的炸弹，将之夷为平地。

在接下来的72小时里，气氛十分紧张：叙利亚会回以一个毁灭性的导弹袭击、让特拉维夫陷入一片火海吗？会爆发一场威胁到几千条生命的战争吗？就像亚德林所预料到的那样，一个被打垮的叙利亚没有任何回应。以色列的力量、威慑和秘密行动能力，令叙利亚在被击溃的沉默中低下了头颅。这是贝京学说的第二次贯彻，也是引人注目的又一次成功。当全世界都无法阻止一个阿拉伯的独裁政权走向核化，当美国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之际，以色列抓住了主动权，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谨慎地盘旋在目标之上，以色列再一次地解除了第二次大屠杀的威胁。

然而，对伊朗的任务要远比1981年或2007年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伊朗人要远比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更富有经验，也更加狡猾。他们的战略目标不是快速地建造一枚核弹，而是安全地建造出一枚核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工程有那么多迹象可循：他们在布什尔建造了一个核反应堆，在阿拉克建造了一个核反应堆，在帕尔钦建起一个军事基地，在纳坦兹兴建铀浓缩设施，在福尔道兴建了一个地下燃料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尝试在国际合法性的庇护下进行大部分的工作。他们小心地不被当场抓获，不留下确凿的证据。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避免挑衅到西方，以免激怒西方，刺激他们采取措施。就在亚德林于2006年1月被任命领导以色列情报机构时，伊朗开始在纳坦兹提炼浓缩铀。他们先获得了几台离心机，然后是几十台、几百台。在2007年

初，他们还只有1 000台离心机。到2013年，他们拥有的离心机超过了15 000台，其中有一些是非常尖端的产品。因此，伊朗的浓缩铀产量从2008年初的区区50公斤增长到2013年中旬的7 000公斤。尽管国际社会（虚弱地）提出了抗议，并实施了（有限的）强制制裁，但伊朗人耐心而顽强地向他们的目标进军。在以色列国防军13层的宽敞的办公室里，亚德林将军所监控到的情况就是，伊朗人愚弄了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愚弄了联合国，愚弄了西方列强，越来越接近他们觊觎的原子弹。

以色列回应伊朗的时候已经晚了。2002年，阿里埃勒·沙龙总理要求迈尔·达甘化解伊朗的核威胁。根据非以色列的消息，摩萨德收到了大笔的资金，并执行了一系列的惊险行动，包括了网络攻击和对核能专家的暗杀，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战略成果。然而，达甘的正常的自信心态变成了傲慢。在2005年，他向他的同事和上级承诺，伊朗不可能旋转起哪怕一台离心机。两年后，当超过1 000台的离心机在纳坦兹旋转起来时，以色列国防军最高统帅部（IDF High Command）开始担忧达甘的方式将把以色列引向一个死胡同。当外交交涉和制裁措施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除了考虑军事行动，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根据非以色列的消息，情报机构头目亚德林、空军指挥官埃利泽·沙基德（Eliezer Shkedi）、副总参谋长丹·哈雷尔（Dan Harel），都坚持以色列必须准备一个可靠的、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尽管一些高级将领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参谋长加比·阿什克纳齐（Gabi Ashkenazi）仍然命令空军去规划一个行动计划。情报开始被收集分析，飞行员开始接受训练，就像1981年和2007年那样。以色列国防军准备着要把贝京学说第三次付诸实施。

2007年11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NIE）代表美国16家情报机构的共同观点提出，尚未有任何确凿证据表明伊朗确实在尝试发展核武器。当亚德林与他的美国同行在罗马会面后，他明白了这份令人惊异的报告诞生的原因：以伊拉克战争的创伤为前提，以白宫操纵的错误情报为基础，美国情报界决心阻止总统乔治

·W. 布什突兀地对伊朗采取行动，阻止美国卷入与第三个伊斯兰国家的第三场战争。但是当亚德林返回特拉维夫，与他的参谋们对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报告进行评估和再评估时，他们得出结论：美国这份报告站不住脚。摩萨德和军事情报机构的四支不同的分析团队宣称，伊朗正在发展军事化的核力量，而美国人严重低估了伊朗核计划的操控水平。

孤立伊朗是非常困难的。法国和英国是仅有的两个真正了解伊朗的国家。与此同时，俄罗斯和印度都与伊朗有合作。欧洲的很多国家仍然在与伊朗有贸易往来。而美国身陷战争，对伊朗分身乏术。甚至在以色列内部，领导集团也没有对伊朗投入过多关注。人们普遍地认为达甘可以阻挠伊朗的核工程。当伊朗的离心机成倍增加、伊朗的铀成堆地生产出来时，以色列正在呼呼大睡。一些非以色列的资料表明，即便是沙基德和亚德林的军事行动也正变得不为人重视。

直到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执政。当他在2009年4月踏进办公室的时候，跟随他进来的还有他全新的应对伊朗的方式。就像他看到的那样，他认为伊朗就是21世纪的纳粹德国，其非常规的体制配以非常规的武器会是致命的。21世纪初的西方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那般虚弱而颓废。但是犹太人民不会再次走向某个核化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现在的犹太人民有了一个国家，有了一支军队，有了技术力量。他们将用尽一切力量防止特拉维夫变成广岛。

这位新总理在对抗伊朗方面做出的伟大贡献就在于认知觉醒。与他的前任们不同，内塔尼亚胡了解伊朗，深入探究伊朗，几乎是完全地关注伊朗。从他就职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他的人生使命就是阻止伊朗走向核化。为了阻止伊朗，他与工党的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组建起一个奇异的联合政府，并任命巴拉克为国防部长。为了阻止伊朗，他调拨了巨额的资金，并分配给情报收集和空军建设，同时保持与西方领导人的坦诚的对话。为了阻止伊朗，他规划了一套高效率的以色列军事行动计划，并时刻准备启动该计划。随着他将以色列国防军整装就

绪，美国变得越来越担忧。2009年、2010年、2011年里有好几次，以色列表现得就像要攻击的样子。看起来中东战争一触即发，不论是华盛顿还是以色列都十分紧张。

阿莫斯·亚德林和他的将军们并不清楚内塔尼亚胡是不是真的打算发动一场袭击，或者他们只是在玩一局前所未有的战略游戏。因此，这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对他的上级进行了一个测试：他要求他们拨付特殊资金和授权特殊的情报收集权力，所需的这些都是在谋划一场真正的袭击过程中才会需要的。巴拉克驳回了要求，但内塔尼亚胡批准了。于是这位以色列国防军的最高情报官员得出结论：也许国防部长有自己的秘密议程，但总理却是认真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是真的相信犹太民族命悬一线。如果其他方式都失败了，那么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会展开攻击。

华盛顿方面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009年都浪费在毫无意义的接触政策上，2010年都浪费在强迫联合国实施制裁的失败尝试上。但是在2011年，一个绝望的以色列下了一步棋，令人忧虑，以致促使鸽派的奥巴马政府采取了非鸽派的措施。奥巴马首先批准了对伊朗的网络战，然后，在协调好欧洲人以后，他开始对伊朗实施单方面的制裁；最终，他命令五角大楼为有效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然而，当以色列的军事选择被证明是一个政治上的成功时，以色列内部却乱套了。达甘拒绝承认付出宝贵时间的秘密行动和网络战没有达成击败伊朗的战略目标。参谋长加比·阿什克纳齐坚决反对将他设计的军事行动真正付诸实施。一场大型的斗争爆发了，一边是内塔尼亚胡和巴拉克，另一边是达甘和阿什克纳齐。国家安全局辛贝特的局长尤瓦尔·迪斯金（Yuval Diskin），以及大多数的军队将领支持达甘和阿什克纳齐。而总理和国防部长认为，他们的下属缺乏历史远见和勇气，而这些高级军事将领们认为，他们的上级是以救世主自居的、煽动战争的狂热分子。两方的激烈争论很快变成了针对个人的人身攻击，粗俗而令人厌

恶。为了使这场辩论更切题而少一些针对个人，亚德林将军起草了一个包含17个问题的调查问卷，旨在让他们可以做出合理的决策。只有当亚德林的所有问题都得到肯定的答复，以色列才有理由对伊朗展开一场袭击。

随着以色列内部的辩论逐渐失控，各种各样的灾难预言传播开来。鸽派认为以色列无缘无故地发动突袭将危及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导致一场区域战争，引发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上千人甚至上万人将因此丧生。而鹰派则坚称，现在的不作为将导致中东地区多元化的核体系的建立，将导致整个地区走向激进，卷入无休止的常规战争中，特拉维夫将很可能遭到原子弹的袭击。而亚德林尝试走第三条路。一方面，他赞同以色列的轰炸将阻止一枚伊朗的核弹是合理的战略构想，并且不会导致末日战争降临。他相信以色列的军事选择是有效的，并且不论是以色列还是西方国家，都足以承受必须付出的小小代价。如果以色列回避采取行动仅仅是因为几百颗伊朗导弹和几千个真主党的火箭弹，以色列将没有权力也没有办法继续生存。另一方面，亚德林认为，在没有获得国际合法性和美国支持的情况下，以色列的轰炸是毫无意义的。如果美国拒绝辅之以制裁，只需两年时间就会付出极其昂贵的代价。亚德林宣称，挑战并不在于军事行动本身，而在于采取行动后的十年。他敦促内塔尼亚胡总理不要与奥巴马总统争执，而是与之建立一个亲密的战略同盟。只有庞大的美利坚民主政体与小小的以色列民主政体齐头并进，才能阻挡正在上升的什叶派的力量。

内塔尼亚胡无视亚德林的建议。他不仅没有以占领区的让步换取奥巴马的支持和以色列国际地位的改善，而且他激怒了奥巴马。他使以色列陷入半遗弃状态。无论是在以色列国内还是国外，内塔尼亚胡都没有为其宏伟的军事行动建立起合法性的外衣。当这项军事选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政治成就，以色列的总理开始自视甚高。在2012年的夏天，内塔尼亚胡被指控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而在这一年秋天，事实已经很明显，他已经错过了时机，也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政治影响力。

2012年9月，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红线演讲”（red-line speech）[注]，号召国际社会在伊朗的核计划进入最后阶段之前采取行动，这实际上是一个表示让步的发言。在意识到他没有能力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发动袭击后，他将关键点挪后到2013年至2014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将以色列的命运交到了奥巴马总统的手里。但亚德林告诉我，在这次重要演讲之后，情况已经恶化了。伊朗发动“突围”（breakout），发动核弹袭击的时间，从6个月缩减到不到3个月，很快又缩减到一个月。亚德林说，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伊朗人已经越过了内塔尼亚胡的“红线”。他们正在接近他们的目标，而以色列已经没有能力去阻止。不久以后，他们将抵达目标，届时，即使是美国也会发觉自己很难阻止他们。揭晓真相的时候到了，如果西方还不赶快清醒，如果美国还不下定决心，以色列将很快面对最戏剧化的十字路口。它将被迫做出选择：是轰炸，还是被轰炸。

亚德林认为，伊朗总统选举中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总统的令人惊异的胜利，暗示了内塔尼亚胡的策略是部分成功的：以色列在2010年至2011年的威慑力导致了2012年的国际压力，并相应地导致了伊朗在2013年的政局变化。如果西方没有让步，如果西方加强对伊朗的制裁并提出一个军事选择，就可以达成一个化解伊朗核危机的全面协议。但是，第二任期内的奥巴马政府优柔寡断，伊朗也许已经占据了上风。亚德林再一次地被吸纳入以色列的决策圈，他认为，揭晓真相的真正时刻就在2013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或者2014年的第一个季度。一旦犹太国家被逼至绝路，它将义无反顾地发动突然攻击。

对伊朗的决议，也许是在当今这个时代以色列所做过的最艰难的决定。在某种意义上，它仿效了迪莫纳的决议。无论是迪莫纳还是伊朗，所承担的风险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无论是迪莫纳还是伊朗，所需要的都是无畏、责任和狡猾。以色列必须与西方势力合作，但也同样必须经得住它们的压力。面临一场不同寻常的挑战，国家必须动员它的全部资源和技能，由一个成熟的领导集团支持并推动找到一个不同寻常的解决

办法。因此，当我坐在阿莫斯·亚德林身边的时候，我想起了在那些艰难的年代运营迪莫纳的工程师。贝京学说是对迪莫纳的一个补充，用以确保在整个中东只有一个迪莫纳。而亚德林和他的同伴们在21世纪初面临的挑战与工程师及他的同事们在20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挑战没什么不同。不过，有一个主要区别。当建造迪莫纳时，年轻的以色列有着堪称典范的行为举止，但面对纳坦兹和福尔多时，中年的以色列步履蹒跚，摇摇欲坠。诚然，伟大事迹的实现要归功于卓越的情报和技术。根据非以色列的消息，这些成就都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但是这个曾经创造奇迹的国家现在还没有调动它的全部力量、采取适当的抗争，来应对它眼前的最富戏剧性的生存挑战。

亚德林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带着苦笑，再现了他任期时的那段令人沮丧的时光。在亚德林任期的第一年，每个人都相信达甘会解决掉伊朗问题，而亚德林将宝贵的军事资源和情报资源花在当前对伊朗的斗争上。在亚德林任期的第二年，情报和军事能力都显著提高，但叙利亚的核反应堆转移了人们对伊朗的注意力，美国的NIE报告又搅了浑水。在亚德林任期的第三年，他已经手握对伊朗的充分情报，但此时在纳坦兹，伊朗人已经转入到秘密地下工作状态，已经建造了福尔多浓缩铀工厂，已经跨上了以色列先前定义的不归路。在亚德林任期的第四年，内塔尼亚胡再次启动了阻止伊朗的战斗，但不久就证明，亚德林和达甘所指望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网络战作用非常有限。在亚德林任期的第五年，仍然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说服国际社会果断采取行动，而以色列国内的辩论逐渐变得越来越丑恶。但是在亚德林退休后的几年里——2011年至2013年——他多年的努力终于开始结出果实。美国人和欧洲人最终对伊朗实施了强制制裁，虽然制裁时机已经迟得令人无法原谅。伊朗的经济开始崩溃。诚然，伊朗人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浓缩铀，足以令他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爆发性地制造出6~7枚核弹。然而最终，他们脚踩的大地开始颤抖。希望在最后一刻，他们可以被成功阻止。

也许已经太迟了。也许已经没有其他方法，除了包容伊朗或者以武

力阻止它。但是在经历了十年的沮丧后，亚德林想要相信西方能够在午夜降临前的一分钟醒来，相信西方不会舍弃以色列，让它独自面对意在把它消灭的狂热势力。

“请给我讲一讲那些伊朗人，”我对亚德林说道，“当你阅读着从德黑兰来的机密情报，你从中知道了什么呢？你看到了他们是怎样的一种社会、怎样的一种体制？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

“在伊朗人身上，你可以看到宗教狂热和战略审慎的融合，”坐在我对面的这位戴眼镜、热心的退休将军说道，“伊朗人野心勃勃。他们将自己与美国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斗争视为文明之间的冲突。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文明是更为纯正、正义，因此理应更加强大。对于他们来说，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文明是一种邪恶的帝国主义文明，而这种文明正处在衰退阶段。他们因看到英国人、美国人、俄罗斯人在伊朗所做的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所做的一切而感到由衷愤怒。他们完全相信，因为我们的文明是被宠坏的、是道德败坏的，因此我们的文明不能经受挫折，没有恢复能力，必将腐败堕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丝毫不怀疑自己将占据优势地位，丝毫不怀疑他们最终将使以色列、欧洲和美国衰败。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坚信。他们正在崛起的文化将颠覆我们的文化。”

“可是，”亚德林继续说道，“在他们的日常行为中，这些狂热分子行事老练而克制。他们并不着急，也不轻率，他们很少犯错误。与其提前直接挺进他们的目标并且吸引战火，他们更倾向于建立一个广泛而稳定的战线，慢慢向目标进发，这样就能在适当的时候以高度的精确性占领它。我大约花了两年的时间才理解了这一点，而当我真正领会到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后，我被折服了。除了向这些伊朗人表示尊重，你无法给出其他评价。他们极其严肃，以自己的行为方式行事，令人印象深刻。”

“现在跟我说说以色列人吧，”我对亚德林说道，“我们是怎样行事

的？我们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吗？”

“我们的问题是，在每一个方面，伊朗都离我们太远了，”他回答道，“于是，伊朗没有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有的以色列人认为伊朗与我们不相干，而有的人认为我们承担的东西已经太多了。这两种想法都导致了同一个结果：我们处理巴勒斯坦人的恐怖主义行动，我们对付加沙地带闹独立的巴勒斯坦人，我们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商议和平进程——但是，我们没有关注伊朗人。我们没有认真对待伊朗问题。直到现在，已经太晚了。与此同时，美国人正在处理基地组织、阿富汗和伊拉克，也没有关注伊朗。没有认真处置伊朗问题。直到现在，已经太晚了。因此对于以色列人和美国人来说，他们可以很轻易地对摩萨德说道：‘拿着这些钱，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吧。’摩萨德拿了这些钱，但他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2007年，以色列国防军才奋起应对这个挑战；而一直到2009年，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集团才应对这个挑战；一直到2011年，全世界才清醒了过来。这个戏剧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清醒是不是来得太迟了。我们不知道答案。”

如果说2011年的夏天是一个充斥着抗议的夏天，那么2012年的夏天就是一个充斥着焦虑的夏天。在这一年年初，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与埃胡德·巴拉克就暗示过，对于他们来说，2012年是决定性的一年。两人都认为伊朗即将进入“免疫区”，这个免疫区将令以色列无法对其实施军事对抗行动。如果国际社会不打算立即停止对“免疫区”的塑造，以色列将不得不以自己的力量阻止伊朗——通过行使其现在享有盛名的军事行动。随着夏天的临近，局势越发紧张。我自己就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我随同总理参加了两次非公开的会议，随同国防部长参加了三次非公开会议，当我走出会场时，我觉得双膝在颤抖。他们真正的意思真的是他们说出来的那些吗？内塔尼亚胡真的觉得奥巴马总统就像在1944年选择不轰炸奥斯维辛的罗斯福（Roosevelt）总统吗？巴拉克真的认为仅仅在9个月或者12个月之后我们就不得不发动一场袭击吗？很难解读巴拉克的想法，但内塔尼亚胡看起来是完全真诚的。他似乎确信他就是21世纪

的丘吉尔，他必须从终极邪恶中拯救他的家园，拯救整个西方。

但是，内塔尼亚胡的行事并不像丘吉尔。他没有与他的人民分享他对现实的敏锐觉察，也没有使他的国家准备好应对一个终极考验。尽管他正确地看待了伊朗的挑战，尽管他是一个富有天赋和战略眼光的战略高手，他并没设计出他理应完成的宏图。在他的领导下，人们认为真正威胁世界和平的是耶路撒冷，而不是伊朗。因为他的个人行为，在以色列内阁、以色列军方、以色列人民以及世界之间，横亘着难以想象的‘鸿沟’。

我曾经对以色列的几名杰出的战略专家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刊登在2012年夏天的《国土报》上，他们证实了我在十年前凭借直觉理解的事情：伊朗并不是内塔尼亚胡创造出来的一个可怕的妖怪，它是确实存在的威胁。所以当焦虑的夏天即将结束时，却没有发动一次攻击，我知道这仅仅是一次中场休息。伊朗危机没有解决，它只是简单地被推迟了。在巴勒斯坦战线重新燃起战意之后，在以色列陷入激烈的竞选之后，原本应该在2012年年底做出的决定被推后。但是伊朗危机仍然在这里。伊朗给以色列的未来笼罩了一片浓重的阴影。

2013年的上半年意义非凡。尽管现在以色列人充分意识到伊朗造成的困境及其意义，但他们选择了忽略。在以色列2013年的竞选中，伊朗议题的谈及次数还不如三个月前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被谈及得多。当以色列的新政府在2013年春组建时，伊朗还不是一个突出的议题。如今，几乎所有的老牌政客——巴拉克、达甘、阿什克纳齐、迪斯金和亚德林以及一些参与到伊朗议题讨论中的著名行政部长们——都已经离开了，但有一名真正关注这个问题的政客仍然留了下来：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与这位连任的总理及他的新任国防部长摩西·亚龙（Moshe Yaalon）以及新任参谋长本尼·甘茨（Benny Gantz）的会谈中，我非常明确地看到伊朗问题已经被排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在给予奥巴马一个机会、给予制裁一个机会、给予外交一个机会之后，他们确实感觉手中

的论据是前所未有的强悍。而现在，以色列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他们也同样感觉到地缘战略的变化——叙利亚的彻底垮台、真主党的软弱、逊尼派（Sunnis）和什叶派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这一切宣告鸽派所称的危言耸听成了过去时。如果以色列发动袭击，收到的反击将不会是灾难性的，中东不会被区域战争的战火所吞噬。所以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是一个美国问题。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有这个决心吗？经历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美国会阻止伊朗或者允许以色列阻止伊朗吗？不像以色列的普通公众，以色列的决策者们充分地意识到，2013~2014年最重要的事件或者最期待的事件就是伊朗事件。

在与阿莫斯·亚德林告别后，我看向外面古老的基色的坟冢，在这里有着二十多个文明遗迹，我看向特拉维夫的地平线。特拉维夫自由开明以及富有创造力的文化就像纽约文化一样：它只能在西方战略优势的保护伞下生存。然而，特拉维夫比纽约更为暴露，它能倚靠的不只是迪莫纳，还有迪莫纳的补充——贝京学说。从某种程度上说，在1981年和2007年，特拉维夫有能力实践贝京学说，保障它的未来。但随着时间流逝，这种能力也受到了削弱。当世界改变了，迪莫纳的垄断也褪色了。到2020年、2030年，特拉维夫还能维持它个人主义及享乐主义的生活吗？最先进的轰炸机，低低地飞过基色古老的坟茔。

---

1. 叙利亚东部城市。

2. 1981年，时任以色列总理贝京派出八架F–16战机彻底摧毁了巴格达附近的核基地，并在内阁公报中写道："以色列绝不允许敌人对我们的人民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将采取一切必要的先发制人的行动来保卫以色列的公民。"该事件定义了以色列现行的国家安全策略，即著名的"贝京学说"（Begin Doctrine）：强有力的先发制人，才是最好的防御。

3. 内塔尼亚胡在第67届联合国大会做一般性辩论发言，通过一张画有炸弹和导火索的卡通图表向各国代表说明了伊朗核计划的具体进展情况，并在标注伊朗核计划第二阶段位置着重画出一条加粗红线，警告说伊朗拥有核武器是未来世界最大的威胁，因此为了确保能够阻止伊朗核计划，应首先在其铀浓缩活动这个要害部位上画条"红线"。"画一条'红线'是和平阻止伊朗获取核弹的唯一途径，'红线'不会导致战争，'红线'会防止战争。"图片参考：http://pic.jschina.com.cn/0/13/99/45/13994593_574957. jpg。

第十七章
在海边



每年夏天，我和我的家人都会前往英国旅行。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根在那里。也可能是因为英国与我的家乡就像世界的两极。当以色列陷入一片狂乱、动荡不安时，英国安宁平静、政局稳定。当飞机在希思罗机场降落，一种真切的、难以名状的归乡情绪占据了我的心房。而我载着我的妻子与三个孩子穿过萨默塞特（Somerset）和多塞特郡（Dorset）时，那平静之感越发深切：我们经过了成群的羔羊、乡村的酒馆以及古老的教堂。当我们抵达南德文郡（South Devon）的海岸我们租下来的石头的乡村别墅,我的幸福感满满的要溢出了。白色的峭壁从我们的宅

邸一直延伸，横亘田野。在细雨中,我与妻子汀娜，以及我的孩子塔玛拉、迈克尔和丹尼尔，站在悬崖边，看着深绿色的溪谷向下蜿蜒，一直到灰绿色的海洋。这里就是英国。几个世纪以来，还没有一支外族可以成功入侵这里。几十年以来，这里没有发生过暴力冲突。借着它坚实的特性所带来的深刻的平静，英国具备我们从来不曾拥有并且以后也可能不会拥有的一切：和平。

我告诉我的孩子们，我们的历史更为悠久。当我们撰写《圣经》的时候，在这座绿岛上生活的人们还是目不识丁的野蛮人。但我们的历史就是“你要离开本地”[注]的历史，而我们的土地本身就是一座坟茔，生命一层层堆叠直至毁灭。是的，当英格兰还是一片沼泽的时候，我们犹太人就已经拥有了耶路撒冷。但是，英国拥有的是我们只能在梦境里奢望的：生于安乐之时，死于宁静之期。没有一场世界大战危及到他们的生存。而我们，恰恰相反，我们总是惶惶不安，因为我们就生活在战火之间。我们在灾难之中繁衍壮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如此的应变力、生命力与创造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如此的神经敏感、高调行事和难以包容。我们就生活在冒烟的火山不断逼近的阴影之下。

英国给了我的祖先们很多优待。大英帝国为赫伯特·本特威奇敞开了它的大门，并赋予他权利、自由以及机会，这些都是1 500多年来犹太人不曾享有的。英国让他的两个儿子得到了西方可以提供的最好的教育。在20世纪的前半叶，它让成百上千被解放的犹太人得以在仁慈的帝国冠冕下过上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虽然某些岛屿也被反犹主义所污染，但犹太人仍然在商业、科学甚至政治上都颇有建树。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成了英国的知识分子和领导阶层的精英。因此，在100多年前，本特威奇家族就会像我们一般度假。盛夏时分，他们有时前往康沃尔郡,有时就待在英格兰湖区。但大多数假期本特威奇家族会选择位于肯特（Kentish）海岸的家族产业——卡梅尔庄园。在他们的这座爱德华时期的庄园里，他们生活得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里描述的拉姆齐家族生活的那样。本特

威奇家族的假日正如拉姆齐家族的假日一样。当汀娜在我们租住的乡村别墅的厨房中忙碌，孩子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喧闹嬉戏的游戏时，我思考着我的英伦祖先本特威奇家族，思考着我自己。如果我的曾祖父不曾带我们迁离英国的这片绿色海岸、定居巴勒斯坦的那片荒凉海岸，我会变成怎样的人？如果赫伯特·本特威奇控制住了他对锡安城的痴迷向往，我的母亲、我自己以及我的孩子们又会迎来怎样的命运？

我想象着我是一名在牛津大学任教的文学老师，或者是BBC的一名制片人。我会在汉普斯特德（Hampstead）拥有一座华丽的宅邸，在西多赛特（West Dorset）拥有一座有着茅草屋顶的乡村别墅。我的生活将远比我的以色列生涯惬意得多、安全得多。我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欣赏诗歌和音乐。我的孩子们的未来将不会笼罩着一片阴云。但是，我会有更加丰盛的内心体验吗？我的人生经历会更有意义吗？

人口统计学的结论是非常糟糕的。当我的曾祖父在肯特郡的海滨消遣他的闲暇时光时，犹太人还占英国总人口的0.8%。而今天，犹太人的人口比例不到0.5%。而令人口构成的情况更糟糕的是，在20世纪后半叶，成千上万的东欧犹太人移民到大不列颠。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他们的后代占曼彻斯特（Manchester）当代犹太社群三分之一的人口，占伦敦当代犹太社群人口的五分之一。在当今的犹太人口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是20世纪20年代英国犹太人的后裔。赫伯特·本特威奇的英国犹太社群的人口消失率是十分惊人的。在过去的100年里，很多英国古老犹太人的后裔已经不再是犹太人。

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英国犹太人社群是引人注目的。犹太人的天赋与英国的文化结合，催生了许多杰出的诗人、作家、剧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科学家、律师、银行家、企业家、政治家和革命者。犹太裔的英国人至少赢得了12次诺贝尔奖。他们创造了传奇般的财富，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各种改变公共话语权的激进运动中表现突出。然而，这个富有创造力的社群正在迅速萎缩。低出生率和高通婚率使非正统犹

太人减少。在英国，他们似乎逐渐丧失了对犹太人生活和犹太人身份的兴趣。近年来在英国出生的赫伯特·本特威奇的后裔不是犹太人，他妻子的英国祖父的后裔也不是犹太人。在英国，还有罗斯柴尔德、戈德史密斯（Goldsmiths）以及米利班德（Millibands）的后裔，但在一个世代或两个世代之后，他们也将不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因此，当我站在德文郡（Devon）的灰色悬崖上向外眺望，如果我的曾祖父没有把我带出这片海岸，今天的我很可能也只有一半的犹太人血统。塔玛拉、迈克尔和丹尼尔很可能完全不会认为自己是犹太人。我在汉普斯德特和多塞特的个人生活将充实而宁静，但我们所归属的集体将消失在我们身边。

对了，还有美国。北美仍然保留着非正统犹太人的生机勃勃的犹太社群。在美国，我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骄傲的自由主义的犹太人，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或者为《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撰写文章。就像赫伯特·本特威奇移民美国的两个女儿一样，我也许会在这里保护好我的犹太人身份。但是美国犹太人的人口统计同样令人堪忧。这些数值还存在争议，但大体上说，1950年，有3%的美国人是犹太人；1980年时，2.4%的美国人是犹太人；而2010年，这个数值大约为2%。到2050年，犹太人可能只能占据美国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舒适的生活条件使英国的非正统犹太人数量在过去的50年里大为缩减，而同样舒适的生活条件将很可能使美国的非正统犹太人数量在接下来的50年里大为减少。在21世纪，北美的犹太人生育率很低，而通婚率则居高不下。犹太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呈现。越来越多的被接纳的犹太人是正统犹太人、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或者只是老人。大多数的世俗犹太青年可不像他们的父母，他们对以色列和有组织的宗教生活不感兴趣。他们挣脱犹太人身份的万有引力，进入非犹太人的宇宙空间。一些赫伯特·本特威奇的年轻的美国后裔，他们的父母已经不再遵循犹太人的法典，所以他们也不再把自己看作犹太人。在我的世俗英国犹太人家庭和世俗美国犹太人家庭，你都可以看到这种穷途末路。你可以看到犹太人的最终结局。

因此，当我看着塔玛拉、迈克尔和丹尼尔踏上小路，走向海边孤零零杵着的粉刷好的渔夫小屋，我陷入了自我纠结之中。我希望英国可以成为他们的故乡，这样他们也能过着如同《到灯塔去》里的那般生活。但是我意识到，我们不能走这条路。经历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的部落已经无法在这片郁郁葱葱的绿色草地上生存。这片岛屿没有大屠杀，没有迫害，没有公开的反犹主义，它会轻柔地把我们杀死。开明的欧洲同样也会轻柔地把我们杀死，就像民主的美国所做的那样。温和的西方文明将毁灭非正统的犹太文明。

这就是为什么赫伯特·本特威奇从肯特郡的海岸驶向雅法的海岸的疯狂旅程显得那么必要。因为这些柔软的英国山峦和古老村舍都不是我们的。它不间断的历史、坚实的身份、深刻的宁静，也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匆匆过客，地处边缘，即将启程。这就是为什么将非正统犹太人集中到一个地方是那么必要。而非正统犹太人能够汇集的一个地方就是以色列的土地。所以雅法之旅是无可规避的。我们必须在雅法周边建造一个犹太民族家园来拯救我们自己。

几天后，我从德文郡返回以色列，穿过雅法的古老港湾。曾经，这里是一个柑橘的出口港，然后成为一个移民的港口，再然后成为一个渔港。近年来，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休闲娱乐的港湾。我找到一间位于旧仓库的大型酒吧，坐在里面呷着我最喜欢的单一麦芽威士忌，看着年轻帅气的以色列小伙们吃着，喝着，寻欢作乐。我聆听着以色列动感十足的夜生活的甜蜜呢喃。

以色列的犹太人口就是离散中犹太人口的写照。1897年，约有5万犹太人居住在这里。而现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口超过了600万。英国的犹太人数量增长了不到20%，美国的犹太人数量增长了350%，而以色列的犹太人数量的增长比率超过了10 000%。

大离散的犹太人口与以色列犹太人口的对比是十分惊人的。在1897年，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只占全世界犹太人总数的0.4%。1950

年，上升到10.6%。到1980年，上升到25.6%。而现在，我们占据了大约45%。为了在应许之地汇集全世界大部分犹太人的历史工程已经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今天，以色列的犹太社群是全世界两个大部分的犹太人其中的一个。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到2050年，世界上大部分的犹太人将成为以色列人。

19世纪，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土地的大移民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伟大胜利。它证实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论断，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预判带来了希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另一个胜利就是他们在以色列创造的杰出的人口出生率。2012年时，美国的人口出生率为2.06，英国的为1.9，意大利的是1.4，德国的也是1.4。而以色列的人口出生率是令人难以置信的2.65，是目前为止在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与会国家中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国家。当欧洲的犹太人走向老龄化，以色列却非常年轻。当大离散犹太人中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走向老龄化，以色列的犹太人正忙于繁衍生息。当一半的欧洲犹太人超过了40岁，一半的以色列犹太人还不到30岁。他们令我们的城镇和城市生机勃勃，在雅法港的这间酒吧里，我所看到的一切都生机勃勃。

所以，在犹太复国主义实施的第一个世纪，在我们的圣地，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在这里施加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我离开了雅法港，踏上了追随我曾祖父足迹的旅程。不像赫伯特·本特威奇，我没有在米凯维以色列停留。离开雅法，我驶向里雄莱锡安，穿过了在1897年还不曾存在的特拉维夫的卫星城：霍隆、巴特亚姆、阿祖尔。旅途中，自1897年后巴勒斯坦村庄消失了：特拉伊利卡比尔、亚祖尔、贝特达扬。高速公路上车道纵横，十字路口拥堵不堪。在柑橘的装货港和朱迪亚的第一块犹太人殖民地之间，已经不再有开满野花的田野，不再有草地或者牧场。没有骆驼或成群的羔羊，没有过着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为移民修建的大量住宅占据了巴勒斯坦，无休止的丑陋的供给房一直延伸到雅法南部和东部。1897年，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的马车队所走过的十英里的线路上，

如今已经塞满了酷热、喧嚣的城市。

当1897年4月我的曾祖父抵达里雄莱锡安时，这里大约有100户家庭、50座房屋、30个马厩以及3条街道。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一块殖民地周围环绕着4000德南的葡萄园，农夫们在这里种下了100多万株的优质的葡萄植株。这里的葡萄酒厂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它是中东地区最大的葡萄酒厂，也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葡萄酒厂之一。山顶上坐落的犹太会堂令人印象深刻，开阔的殖民地林荫大道两旁，漂亮的殖民地风格的房屋拔地而起。这个小小的殖民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希伯来人的专属学校、世界上第一个专属希伯来人的市政厅以及巴勒斯坦一流的管弦乐队。尽管它仍然处在幼年期，但仍然可以清晰地预见里雄莱锡安光明的未来。就像它在1897年打动了我的曾祖父，它同样打动了一年后拜访这里的赫茨尔博士。“但愿，”这位犹太复国主义的奠基者在里雄莱锡安写道，“从这个地方可以涌出对我们命途多舛的兄弟的祝福”。

从这个地方确实涌出了对我们命途多舛的兄弟的祝福。犹太人从70个不同的国家逃亡到里雄莱锡安。这个城市的人口从1897年的500人上升到2013年的将近25万人。里雄莱锡安现在已经是以色列的第四大城市，拥有40所小学、一所快速发展的大学、一个交响乐队以及一个急速发展的商业区。单单在过去的25年，它的居民数量就上涨到原来的2.5倍。73%的当地家庭拥有自己的公寓，74%的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81%的家庭拥有一台个人电脑，96%的家庭可以接入互联网。平均而言，里雄莱锡安的每一户家庭都拥有2.5部手机、两个以上的卧室。这个中产阶级的城市同样也代表着以色列的中产阶级：它既不保守，也不自由放任；既不偏向阿什克纳齐犹太人，也不偏向塞法迪犹太人；既不宗教化，也不世俗化。在2013年的选举中，这里将近一半的选民都把票都给了中间派的政党。里雄莱锡安是第三个千禧年中的典型的以色列犹太城市，它的居民都是辛勤工作的移民以及移民的后代，这些移民在这里世代繁衍。

从高速公路上，我右拐至西里雄。在1985年，这里还什么都没有，除了赫伯特·本特威奇在1897年从远方眺望到的沙丘。在100年的时间里，什么都没有改变。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解体带来了100万的移民，他们迅速在这里定居下来。10年后，沙漠上铺设了一条条马路。20年后，新西里雄的面积已经超过了西里雄的旧有面积。在它100年诞辰之时，犹太复国主义被证明是强大而有效的。它再一次地上演了白手起家的奇迹。又一个现代化的以色列城市诞生了。

在湛蓝的天空下，矗立着一座座公寓楼。迫切而庞大的需求使大量的公寓楼快速建成。它们有效而经济，但却没有灵魂。街道就像它们是从制图桌延伸下来的一样。这里洋溢着富裕的气息，但却没有和平的气息。

就像邻近的雷霍沃特，两三个世代以来，里雄莱锡安保持着它的身份和特质。在柑橘园取代古老的葡萄园之后，它变成了一个繁荣的柑橘园殖民地。1948年后，它又迎来了20世纪50年代、70年代、90年代人口激增的浪潮。区域认同被抹去了，独特的特质也被抹去了。如今，民族大熔炉不再是思想意识形态的，而是经济形态的。它仍然运作着，将不同的种族和身份混合在一起，在一个巨大的屋宇下统一了所有的移民。

埃胡德·巴拉克曾经将这个国家视作丛林中的一栋别墅。但真实的以色列不是别墅，而是一座购物中心：廉价、喧嚣、热情激烈、充满活力。这座购物中心象征着以色列的状况——这是一种绝望的尝试，在经历了不正常的历史之后，在不正常的环境下尝试过着一种假装正常的生活，眼看不正常的未来近在咫尺。西里雄就是这样一个购物中心。维持它生存的就是消费。

我走进电影城，这是一座由26家剧场所组成的华丽殿宇，为里雄莱锡安提供成为加利福尼亚所需要的一切。沿着走廊，矗立着超人、蝙蝠侠、查理·卓别林、亨弗莱·鲍嘉的蜡像。这里有Ben and Jerry’s的冰激凌、多米诺（Domino）的披萨以及可口可乐（Coca-Cola）。年轻人穿

着迪赛（Diesel）的牛仔裤、GAP的运动衫、A&F的夹克，手捧大桶的爆米花。里雄莱锡安独特的早期的最初承诺一丁点儿也没有保留下来。然而，透过20世纪的恐怖的棱镜，入目所及的一切只会唤起我的同情。因为里雄莱锡安是一个拯救生命的工程。尽管它看起来并不像，听起来也不像，但它确实是一个难民进行康复治疗的城市。

离开西里雄，我启程前往拉姆拉。1897年，拉姆拉是一个拥有6 000人口的阿拉伯城镇，以其清真寺、教堂、旅馆和市集闻名。它的很多旅馆都是为了满足朝圣者们从雅法前往耶路撒冷之行所需而开设的。今天，拉姆拉成为一个由68 000的混合人口组成的不快乐的城市：50 000名犹太人、15 000名的穆斯林、3 000名的基督徒。1897年，居住在这里的阿拉伯穆斯林的所有后裔，几乎在1948年被驱逐干净。今天的穆斯林人口主要是由贝都因人和巴勒斯坦人组成的，在以色列建国早期，他们的祖先从他们的村庄迁移到这里。

继承拉姆拉的犹太人主要是移民，其中将近30%的人口是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这段期间，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埃塞俄比亚迁徙而来。这些阴沉的供给房里所居住的居民，很多都是年轻而贫穷的人，他们中的三分之一都依靠社会福利救济为生。如果把社会经济划分为一到十的十档，拉姆拉只能划到令人沮丧的第四档。

仍然还有一些漂亮的巴勒斯坦式的建筑矗立在这里。有一些壮观的历史遗迹，现在已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市集活跃而繁华，一些不错的民族风味餐馆坐落四周。在古老的穆斯林公墓旁，正兴建一个新的购物中心，附近有一个新的现代街区，旨在吸引中产阶层的专业人士。然而总体上说，拉姆拉是令人沮丧和忧虑的。在失去了它的阿拉伯特征后，它从来没有获得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以色列身份。里雄莱锡安还给予它的居民一个消费主义的光环，而拉姆拉连这一点都没有做。这座城市还没有从1948年的大灾难中恢复。

巴勒斯坦人也许会说，当赫伯特·本特威奇乘着托马斯·库克的马车

抵达这里时，也带来了一种致命的病菌。就像所有的征服者一样，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种病菌彻底摧毁了巴勒斯坦的免疫系统和巴勒斯坦的文明，糟蹋了古老的拉姆拉。我不会对此提出辩驳，但我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最终，同样的致命的病菌也袭击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初的梦想。在1987年，犹太复国主义还能设想一个总体规划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但到1950年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来实现任何计划。重重需求、重重压力、重重危机。这些天真的征服者们陷入了他们最初行为造成的后果的混乱风暴中。使他们从欧洲迁移到拉姆拉的历史使命如今造成了一场灾难，没有人可以阻止。这场灾难首先摧毁了土著文化，然后又摧毁了开拓者的文化，然后又将我童年时代的迷人的柑橘园连根拔起，然后它创造出令人不满的、毫无特色的以色列城市。

我登上白塔的119级台阶。以色列的沿海全景令人着迷。一个小镇接一个小镇，一个街区接一个街区，一座建筑接一座建筑，一栋公寓接一栋公寓。将近300万的人口拥挤在3 000平方公里的特拉维夫郊区。

也许已经没有其他方法。在当今的时代，为了保持世俗犹太人的生存，我们必须聚集在一个地方。如今，这种人口的聚集不仅仅是必要的，而且还是以色列的本质。因为看起来我们犹太人需要聚集在一起。我们需要彼此联结，甚至彼此争斗。就好像我们不能以个体的形式独立生存，就好像我们恐惧着，如果我们独立我们就会消失。所以我们没有私人领域的概念，我们不会把个人从集体中摘出。在严寒中，我们互相依靠彼此取暖，我们过着集体的生活，聚集在一个基布兹，或者一个莫沙夫，或者一片供给房社区，众多的人口拥挤在一处，从海德拉到盖代拉，从西里雄到东拉姆拉。

……

离开拉姆拉后，我来到了吕大。火车站仍然坐落在1891年法国人为土耳其人修建的石砌的枢纽站上。1897年春天，英国犹太人的朝圣团等待前往耶路撒冷的火车的地方，现在站着微笑的以色列士兵，他们扛着

以色列制造的冲锋枪，拿着可乐罐和巧克力棒。两个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正热烈地探讨着时事新闻。一对年轻的说俄语的夫妇正在压低声音争吵。一个穿着紧身牛仔裤、戴着头巾的漂亮穆斯林年轻姑娘正从旁边经过。

在开着空调的火车车厢，透过全景窗，我向外眺望着拉姆拉、吕大以及犹大平原。铁路的东边是特拉基色。在公元前3400年，这里曾矗立着基色的古老定居地。在公元前1700年，这里曾矗立着一座富裕而强大的迦南人的城市。在公元前10世纪，这里曾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希伯来人的城市，以及历时1900年的、叫作阿布舒莎的巴勒斯坦村庄。1923年，曾祖父本特威奇在这里购置了一栋华丽的宅邸。1948年，以色列国防军的吉瓦提步兵旅占领了阿布舒莎村，杀戮、驱逐、放火烧村，阿布舒莎消失了。如今，特拉基色的山脉南部坐落着嘉美约瑟夫的以色列社区，阿莫斯·亚德林以及雷霍沃特柑橘种植者的孙辈们在这里过着富裕优渥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代表了以色列的胜利：面对着古老的、阴森的坟冢的豪华宅邸。

几架F–16轰炸机从头顶飞过，准备着又一场战争。这里又包含一个悲剧的胜利：当黑暗消失，犹太人终于看到了巴勒斯坦的村庄，他们终于承认了他们所陷入的且无法退却的戏剧化情境当中。他们没有恐慌，没有畏缩，也没有崩溃。恰恰相反，他们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在这道铜墙铁壁里，他们建起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他们复兴了希伯来语，创造了充满活力的以色列文化；他们制作了音乐、戏剧、美术和电影。他们相爱，结婚，孕育后代。他们的眼睛凝视着命运，做了必须做的一切，在这里守护了100多年。

铁路沿线，有耕犁好的田地，还有葡萄园和一排排紧紧包裹的棉株。山岭之外，有一个秘密的导弹基地。

所以，如果我正要出席一次假想的、盛大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我会谈什么呢？我也许会谈我们的需求是真实的。我们天才般的洞察力。

我们的宏图是激动人心的——雄心勃勃，但不疯狂。而我们的坚持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犹太复国主义已经表现出非凡的毅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它的适应力、可塑性及其意志决心都是出类拔萃的。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落后一步，让大屠杀抢占先机，使大量东欧犹太人涌入这片土地的前提条件被证明是错误的。认为阿拉伯人的抵抗是软弱的前提也是错误的。因此，犹太复国主义工程没有成为它期待的模样：一个宏大的、精心策划的伟大工程，就像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以及荷兰的围海造田一样。它没有成为一桩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以一种合理的方式解决人类社会中其中一个最丑恶的问题。它没有用现代医学根除肺结核和脊髓灰质炎的方式根除反犹主义，也没有用现代医学降低婴儿死亡率问题的方式解决犹太人问题。恰恰相反，犹太复国主义以不完美的解决方式仓促应对严峻挑战，这一过程是难以驾驭的，它呼唤新的需求，适应新的环境，创造新的现实。它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改造自己，以不同的方式处理着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绝望的情况。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在20世纪，一步步前进的方式，这就是它塑造这片土地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当这辆火车驶向耶路撒冷的山峦，我看到的景致是这般模样：就像一床胡乱缝制的被子，布满补丁，总是临时拼凑解决方法。

火车经过了贝特西迈希——这是一个发展中的城镇，现在被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占据，滑向索雷克峡谷。轨道两旁，岩石的山延绵起伏。有一些山坡是光秃秃的，另一些则覆盖着犹太复国主义者种下的茂密的松树林，树林的灌木丛中，隐藏着一些巴勒斯坦村庄的废墟。

将犹太人集中到一个地方的举措是有必要的，但同时也是危险的。如果又一场历史性的灾难袭击这里，它将可能是犹太人所遭遇的最后一次灾难。那些开创犹太复国主义的先辈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清楚他们正带领着世界上最悲惨的国家走向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自己以及对别人有那般高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以那样一套精于算计、机变狡诈、训练有素的方式行事。他们清楚他们的使命是人类的能力难以企及的，就如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责任是人类的能力

难以承担的一般。然而，多年以后，它已经无法再保持这样一种高水准的革命纪律性。它无法再保持这样一种奉献、严谨和献身的精神。承袭的一代人失去了历史眼光和责任感。他们被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成就所愚弄，他们没有看到在犹太复国主义的行径中所蕴含的风险。逐渐地，他们失去了在深渊之上走钢丝所需的专注与谨慎。当意志衰落、智慧耗尽，再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来领导孩子们的十字军东征。这场运动的早期阶段，几乎一切都是对的，但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几乎一切都是错误的。

当他的火车驶进耶路撒冷，赫伯特·本特威奇冲出这个城市的古老而迷人的火车站，奔向最神圣的犹太遗迹——哭墙（第二圣殿的遗迹）。当我抵达耶路撒冷时，我冲出耶路撒冷新的、毫无魅力的火车站，奔向以色列最神圣的地点——亚德瓦谢姆（Yad Vashem），犹太人大屠杀历史纪念馆。

当我走到入口处，我屏住呼吸。墙上挂满了幽灵般的黑白照片。孩子为导师拉响了小提琴。情侣在雪地上滑行。犹太村，一辆有轨电车缓缓穿过。年轻人围着圆圈跳舞。一个小姑娘抱着一个洋娃娃。两个姑娘挥手对我说再见。

纪念馆是用钢筋混凝土筑成的三角形结构，穿山而过，就像一个地堡。在隧道似的主展厅两侧是讲述故事的黑暗画廊，讲述基督徒的反犹主义，纳粹的反犹主义，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注]。记录了书册被烧毁，犹太教堂被烧毁，人们被监禁。种族主义的法律，（纳粹分子强令犹太人佩戴的）黄星布，隔离区。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570万犹太人，被绞死，被枪杀，被毒气夺去生命。而三角形隧道的两边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终极论据：波纳利（Ponary）[注]、巴比谷（Babi Yar）[注]、马伊达内克（Majdanek）[注]、索比堡（Sobibor）[注]、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注]、达豪（Dachau）[注]、特雷布林卡（Treblinka）[注]以及奥斯维辛。还有波兰外交官简·卡思基（Jan

Karski）令人难忘的脸庞，正是他的回忆披露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是那位在1944年下令不轰炸奥斯维辛的人[注]。发黄的地图上散落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荷兰的140 000犹太人——死亡102 000人。罗马尼亚的817 000犹太人——死亡380 000人。匈牙利的825 000犹太人——死亡565 000人。苏联的3 020 000犹太人——死亡995 000千人。波兰的3 255 000犹太人——死亡3 000 000人。

但这些数字中最令我震撼的是巴比谷大屠杀中犹太人的遇难人数。在1941年9月29日和30日，33 771基辅犹太人被带到森林中。纳粹命令他们站在深谷边，然后在谷边射杀了所有人，并把他们埋在深谷里。在巴比谷的48小时里，被射杀的犹太人比锡安之战之前的120年中死去的犹太人还要多，比以色列所有战事中死去的犹太人还要多。因此，有充分的理由理解这个建筑设计：这条欧洲犹太人毁灭的隧道最后通向一个明亮的阳台，在这里，你可以眺望耶路撒冷山峦的深绿色的森林。而当我站在大屠杀纪念馆的阳台，我无法抑制地为以色列而感到自豪。我生下来就是以色列人，我活着像以色列人，我也将像个以色列人那样死去。

从大屠杀纪念馆出来，我又继续前行，来到基瓦扫罗。为了使犹太复国主义赢得1948年的战争，为了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不会终结于某个巴勒斯坦的巴比谷，本·古里安指示哈加纳在这一年的四月继续进攻。他命令犹太武装军队占领巴勒斯坦的村庄——胡尔达、代尔–牧塞、贝特马赫、萨里斯、艾尔–奎斯特，以封锁通往耶路撒冷的通路。配合着哈加纳的行动，民族主义的伊尔根（Irgun）[注]和斯特恩帮也对自己的村庄展开了进攻。1948年4月9日的清晨，他们袭击了西耶路撒冷的村庄戴尔亚辛，至少100名巴勒斯坦村民被屠戮。弹痕累累的尸体被一个排的17岁左右的士兵所埋葬，他们被送来收拾残局。他们当中最小的一位就是赫伯特·本特威奇的孙子，在他的余生里，他所见证的恐怖情景在心中萦绕不去。然而，以色列处理1948年战争创伤的方式是非常实际的：他们在1951年把巴勒斯坦戴尔亚辛的废墟遗迹变成了封闭的精神疗

养院卡法扫罗（Kfar Shaul）。

我走近白色的金属大门，询问守卫我是否可以进去。她拒绝了。所以我沿着篱笆走，找到一个缺口，偷偷溜了进去。一栋老式的巴勒斯坦石头房屋现在成了一个用于专业治疗的木器店。另一栋老式的巴勒斯坦石头房屋现在成了一间开放式的病房。还有更多的巴勒斯坦石头房屋现在成了封闭式的病房，用以收容那些会伤害自己和伤害别人的病人。最震撼我的是，具有宗教信仰的病人的庞大数目。他们当中，很多男人戴着白色的圆顶小帽，很多女人遮住了她们的头。尽管各处的迹象都显示，这里是一个现代的病院，但归根结底，那个古老的村庄仍然在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大多数的巴勒斯坦村庄被摧毁后，少数几个保留下来的其中一个村庄成了巴勒斯坦大灾难的核心标志。它无声的石头房屋仍然在讲述着故事：这里曾经是什么，当犹太人发疯的时候，这里又发生了什么。

戴尔亚辛的山顶现在被卡布兰大街和卡兹尼兰博根大街所环绕，这是哈尔诺夫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社区的主街道。以色列工党成员并不情愿建设这个被玷污的山峰，但新以色列人可没有这些顾虑。利库德集团和沙斯党看到了戴尔亚辛的房地产的潜能，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就在距离卡法扫罗围篱缺口——我钻进来的这个口子——几步远的地方，坐落着两座花哨的、宏伟的神庙——尼珥哈伊姆犹太学校和利夫·阿哈龙犹太学校。在他们之间，是欧罗特·海特舒瓦犹太学校的大型住宅区、宏伟的奈提维·海特尔穆德犹太学校以及小型的米希坎·哈特拉犹太学校。超过20所的犹太学校、犹太教堂和宗教学校坐落在戴尔亚辛的北坡，还有20所坐落在其东坡和南坡。这里的宗教机构占据了上万平方米的土地，它们的学院不工作、不纳税、不服兵役。规划了伟大的梦想、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承担了可怕的罪行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戴尔亚辛的土地上建立的，却是一个新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隔离区。

离开戴尔亚辛，我来到以色列的国家纪念基址——赫茨尔山国家公

墓（Mount Herzl）。这里汇集了华盛顿纪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林肯纪念堂（Lincoln Memorial）、阿灵顿公墓（Arlington Cemetery）。过去，这里曾经是巴勒斯坦人的沙拉发山，在西耶路撒冷气势雄伟的山峰上，散落着一些巴勒斯坦的石头房屋和采石场。1948年4月，一支伊尔根小队驻扎于此，机关枪的火舌如雨倾泻，降落在戴尔亚辛。16个月后，西奥多·赫茨尔被安葬在这座山上。他的庄严的国葬被认为是战争结束的象征性标志以及犹太民族运动的胜利。克服了面对的所有障碍，这段始于1897年的伟大旅程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梦想实现了：锡安主义抵达了锡安。

这一栋建筑是庄严而压抑的。赫茨尔的朴素的黑色花岗岩坟墓顶部平坦，四周环绕着不规则椭圆形的园圃、花园小径和石头的围篱。公墓一角是赫茨尔的家人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们的坟墓。公墓的另一角是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的坟墓，他是右翼修正主义势力的领导人，也是“铜墙铁壁”[注]的预言者。第三个角落安葬着以色列的总统们、总理们以及议会的议长们。这里的象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就在这里，在这个山顶，犹太复国主义融入了以色列，以色列也融入了犹太复国主义。这里是自赫茨尔美景演变成真实的以色列的确切反映。这个象征性的基址是端庄而神圣的。它的力量蕴含在共和国的谦逊、经济和苦行主义中，蕴含在它开阔的沙砾小径和稀疏的地中海灌木中。它是理性的，没有任何神秘主义、弥赛亚主义或沙文主义的迹象。这里没有人为雕琢的痕迹。赫茨尔山国家公墓是一座不朽的纪念碑。

军人的公墓同样也是民主而节制的。这些牺牲的一排排士兵的名字并没有刻在墓碑上。几乎在每一片墓区，将军们都和下士们并排地安葬在一起。这里没有颂扬英雄主义和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题词。这里不会试图剥除每一个死去的人的特质。相反，小小的石碑强调着安眠在它们之下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简洁的墓志铭并没有让战争中的死亡变得圣洁，而是留下它原本的模样：最终的，可怕的。

赫茨尔山是我童年记忆中的以色列。它是1967年以前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以色列。它是世俗的、民主的、纪律严明的，兼顾了严酷苛刻与人文主义，兼顾了集体主义和个人感知。这里没有民族主义的媚俗，没有宗教的媚俗。在静谧的尊严中，它发表着宣言：这个山顶——全是富有远见的智者。在智者之下，有他的门徒；在门徒之下，有国家的领袖们；在国家领袖之下，有军人。他们艰苦跋涉，他们追求梦想，他们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大屠杀纪念馆和戴尔亚辛都在问着同样的可怕问题：我们还活着吗？我们战胜了过去吗？赫茨尔山则说，我们应当做到。它专注地讲述，宣告我们理当继续生活，因为我们不能沉溺于过去。我们应当生活下去，因为我们成功地压抑了大屠杀纪念馆和戴尔亚辛。我们应当继续生活，因为我们公正、强大、现代。我们的以色列是以未来为导向的。团结、进步和勇气占据了以色列这个主权国家的制高点。然而，这种良性的讲述终止于1967年。我们还能复兴吗？21世纪的以色列还能重建赫茨尔山的共和国吗？

离开赫茨尔山，我来到了斯科普斯山。站在1897年赫伯特·本特威奇对他渴慕的城市道别的地方，我反思着那些经典的以色列问题：以色列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的机会在哪里？这个犹太国家还能再存活一个世纪吗？在2097年的时候，我们还会在这里吗？

这几年来，耶路撒冷经历了某种意义上的复兴：与千禧年之交的那段日子相比，它有了更多的夜生活、更多的艺术活动、更多的年轻的能量。但是这个首都的人口是没有前途的。1897年，犹太人的数量占了大部分，达到62%。到1967年，犹太人的比率上升到79%。然而在上一个十年中，人口数量降低到1897年的水平：63%。在当代的耶路撒冷，进入学校的适龄儿童中，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约占40%，阿拉伯人的比率超过了35%。耶路撒冷的青年中，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比率不到四分之一，非宗教的犹太青年的数量只有八分之一。看起来就像世俗的犹太复国主

义从未出现过一样。

诚然，耶路撒冷不是以色列。但就全国范围而言，犹太人口的统计数字都不容乐观。如今，大以色列的全部居民中，有46%是巴勒斯坦人。预计他们的总人口将在2020年上升到50%，到2040年时则增长到55%。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锡安的未来将变成非锡安主义。

为了探究以色列所面临的挑战，我向北进发，从斯科普斯山来到贝特艾。当我的曾祖父看到被认为是雅各梦见天使上下往来的梯子(注)的考古遗址时，他的心陷入宗教的情感而不能自拔。然而，如今这些遗址淹没在预制的水泥墙和水泥塔之间，以色列的占领者用这些水泥建筑保护定居者们在这条道路上往来，以免被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的怒火波及。追随着我曾祖父的足迹，我又从贝特艾来到希洛。我曾祖父看到的拜占庭式教堂的遗迹横亘在这里，一直延伸到一个被高高的围篱所环绕的犹太人定居点，这里的人们选择成为以剑谋生的奴隶主。无论是贝特还是希洛，它们的问题都是：究竟会是以色列终结了占领，还是占领终结了以色列？同样的问题也围绕着纳布卢斯和道唐山谷。犹太政府会拆除犹太定居点吗？是犹太人的政府将拆除犹太人的定居点，还是犹太人的定居点将拆除犹太人的政府？这个交叉点只有四条通路：一个在占领区实行民族清洗的有罪国家，一个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一个包容两个民族的国家，或者一个带着巨大痛苦退回到分界线的犹太民主国家。我仍然相信，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倾向于第四条道路。但这些人并不团结，也没有决定性的力量。以色列缺乏领导这场痛苦而冒险的撤退所需要的政治力量。同样不明确的是，以色列共和国是否拥有撤销定居点和划分土地所需的能力。在1897年4月，赫伯特·本特威奇穿越而过的撒玛利亚地区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庞大的定居点工程。到目前为止，犹太复国主义还没有能力召唤出可以保护它的力量。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创造出来的悲惨现实中，它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了绳索。

我偏离了我曾祖父的路线，向巴力夏琐山进发。在本书的引言中，

我写道，有两个因素使以色列有别于其他国家：占领和威胁。在21世纪，再没有另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征服另一支民族，再没有另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受到威胁。现在，当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将我带上撒玛利亚的最高峰，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占领和威胁。在监测以色列领空的雷达基地里，我思考着以色列周围渐渐迫近的威胁。

外围是伊斯兰的圈子。以色列是一个可以在很多穆斯林中间激起宗教仇恨的犹太国家。占领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放大了这种仇恨，然而，这却是以色列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非伊斯兰的政治实体，在这片对伊斯兰具有神圣意义的、四周环绕着伊斯兰的土地上生存的方式。于是，这就造成了这个小小的犹太国家和广大的伊斯兰世界的固有的紧张关系。这么多年来，以色列明智地处理着这种宗教上的紧张关系。它与稳健派的伊斯兰国家建立了联盟，而与其他伊斯兰国家保持着秘密的商业往来。它与伊斯兰国家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了共同的利益，谨慎小心地避免将地区冲突转化为宗教冲突。但近几年来，当激进的伊斯兰主义纵横政界后，以色列便失去了一些伊斯兰的同盟。犹太极端势力与伊斯兰狂热势力相互依靠。在某些伊斯兰的国家，对以色列的敌意正日益活泛。在今天的西亚与北非的政局面貌中，反以色列的潮流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要抓住任何一个时机，这些力量就会燃烧起来。伊朗是巨大的威胁，但其他一些穆斯林国家同样也是巨大的威胁。一个包含15亿穆斯林的巨大的圆圈包围了这个犹太国家，并威胁着它的未来。

中间圆是阿拉伯人的圈子。以色列是一个建在阿拉伯世界心脏位置的犹太国家。阿拉伯民族运动试图阻止以色列的建国——但是失败了。阿拉伯的国家试图毁灭以色列——但是失败了。因此，以色列作为一个非阿拉伯国家存在于中东地区，就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失败的见证。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当阿拉伯的民族主义遭到削弱、腐化堕落时，它被迫暂时搁置了它的不满，表面上承认了以色列。于是造成了以色列与埃及的和平协议、以色列与约旦的和平协议以及区域稳定。然而阿拉伯民

族的觉醒改变了这一切。当稳健而腐化的政治体制被新的政体所取代，公众的紧张情绪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群众要求对以色列采取强硬态度。尽管以色列与阿拉伯之间的大型战争还没有迫在眉睫，但区域的稳定脆弱得不堪一击。以色列现在面对的阿拉伯军事力量没有之前那么多，但却需要面对更多的阿拉伯动乱。当阿拉伯民族国家（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崩溃时，环绕在以色列周围的将是一圈失败的国家[注]和极端主义的国家。就像开始于2013年8月末的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证明的那样，新的危险正在酝酿。所以和平如履薄冰。由3.7亿的阿拉伯人围成的圆圈包围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威胁着它的生存。

第三个圈子是巴勒斯坦人的圈子。以色列是一个被它的邻居看作建立在本地的巴勒斯坦的废墟之上的定居者的国家。很多巴勒斯坦人将以色列视作外邦，他们被驱逐出自己的聚居地，以至于无立身之地。庞大的巴勒斯坦族群有着一个隐秘的愿望，就是盼望阻止以色列的政治运动，因为以色列的政治运动破坏他们的社会、摧毁他们的村庄、清空他们的城镇、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变成了难民。只要以色列还拥有压制性的力量，稳健的巴勒斯坦人就会掩藏他们的愿望甚至压制它。但稳健的巴勒斯坦人的阵线正在回缩，激进的巴勒斯坦人数量不断增多。当宗教极端主义和阿拉伯的极端主义开始主导整个区域时，巴勒斯坦的实用主义就陷入了重重包围。因此，如果有那么一会儿以色列虚弱下去，被抑制的巴勒斯坦愿望就将猛烈爆发。而由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总人口超过了以色列犹太人的人口，他们将赢得真正强大的力量支持。由1 000万巴勒斯坦人组成的核心力量威胁着以色列的生存。

近几年中，这三个威胁圈已经融合了。随着伊斯兰军事力量的增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稳健派的势力遭到削弱，达成全面和平的可能性逐渐降低。与此同时，以色列从南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单方面撤军，为不时用火箭弹和导弹威胁以色列的恐怖主义组织清出了大片的土地。这就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以色列不从约旦河西岸撤军，那么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将是穷途末路；但如果它真的撤军了，它就会面对一个以伊朗

做后盾、由伊斯兰兄弟会（Islamic Brotherhood）支持的西岸政权，其拥有的导弹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结束占领的需求是前所未有的强烈，同样，结束占领的风险也是前所未有的。

到目前为止，犹太复国主义对这三重威胁圈的抵御都是非常有效的。以色列高明的外交手腕阻止了伊斯兰的圈子合并成一个足以扼杀以色列的政治活动圈。以色列的军事力量阻止了阿拉伯获得在战场上打败以色列的能力。以色列的智慧阻止了巴勒斯坦用恐怖主义袭击破坏以色列政局的稳定。然而，巨大的压力正压在以色列的铜墙铁壁上。一枚伊朗的核弹，阿拉伯新一波的敌对浪潮，或者一轮新的巴勒斯坦危机，也许就会把它击垮。所以，以色列在它建国的第七个十年所面临的挑战，就如同它在建国最初的几年里所面临的挑战那般戏剧化。当我站在巴力夏琐山的山顶时，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正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

从约旦河西岸的最高峰，我向北进发抵达他泊山。当我到达山顶时，我走出汽车，绕着方济会的修道院（Franciscan monastery）而行，观察赫伯特·本特威奇1897年穿越撒玛利亚经过的山谷。在那时，还没有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居住在这里。到处都是沼泽，有自给自足的农夫，还有贝都因人。但是自他泊山开始，百年奋斗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伊兹拉山谷，大多数居民都变成了犹太人，但是在加利利的山区，阿拉伯人占据优势。当犹太复国主义攻克了圣地的山谷，它的山脉间仍然遍布巴勒斯坦人。尽管付出了所有的努力，犹太复国主义仍然没有占领内盖夫的山脉、加利利的山脉以及中部山区。犹太复国主义仍然是一个幻景，将它的长长卷须伸入内陆的山谷。美吉多和拿撒勒之外的村庄里的白色宣礼塔，让这一幅图景更为清晰。消失的阿拉伯人回来了。

以色列一直忽略了它的阿拉伯平民。它还没有找到吸纳它的五分之一阿拉伯人口的合适途径。没有在1948年被驱逐的阿拉伯人已经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压迫了几十年。这个犹太人的国家没收了阿拉伯人的土地，

践踏着他们的权利，没有给予他们真正的平等。这几年来，压迫有所减轻，但以色列并没有与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缔结一个真正的公民契约以保障阿拉伯人的完整公民权。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明确定义这个犹太民主国家对作为少数民族的阿拉伯人所承担的义务，也没有明确定义作为少数民族的阿拉伯人对这个犹太民主国家所承担的义务。一方面，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从未享有真正的平等；另一方面，政府并不总是在其管辖范围内进行执法，而是允许他们的部分城镇和村庄处于无政府状态。于是造成了不受法律制约的危险处境。很多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不尊重中央政府，也感觉不到他们属于政府的管辖范围。他们更亲近以色列之外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周遭的阿拉伯人，这意味着他们的情况与北美和西欧的少数民族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尽管他们是犹太国内的少数民族，但他们却是本区域内占据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将以色列的犹太人变成区域内的少数民族。从未有人处理这个复杂的事实，也从未有人明确阐释这种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互相转化的关系。目前为止，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经济利益和公民权利还是有一定保障。尽管他们从不曾公开承认这一点，但他们都清楚地知道一个事实，就是他们的境况已经比在埃及、约旦、叙利亚的兄弟姐妹要好得多。但是，政治的隐患仍然存在。随着阿拉伯少数民族的人口持续增加，随着他们的自信逐渐增强，他们将危及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民族国家的身份属性。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个关键性的问题，骚乱是不可避免的。

我继续我的旅程，从他泊山来到太巴列（Tiberias）。本特威奇的代表团曾经在这座古老城市的南面、加利利湖的湖滩上搭起了白色的帐篷。我开车赶往更远的南方，穿过了约旦河，来到加利利海的南部边缘。这里就是德加尼亚，它是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基布兹，试图融合乌托邦理想、公社集体生活和殖民主义。在这片湖滩之上，曾经进行着激动人心的人类社会实验：为了创造一种能够拯救犹太人的民主的共产主义制度。

在它成立的39年后，德加尼亚被叙利亚军队袭击，经历了空袭、炮

击和装甲突击。保卫公社的基布兹社员和士兵们用反坦克火箭筒、步枪和燃烧弹阻挡了入侵的坦克。数十人在战斗中牺牲，安葬在战场的不远处。一辆在战斗中被俘获的坦克被安置在基布兹的大门口，以纪念他们的牺牲。

站在神话般的坦克前，我思索着21世纪以色列所面临的精神挑战。德加尼亚的守护者能以这样的生命成本阻挡叙利亚的军队，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信念。乌托邦的梦想和公社迅速成长的现实，赋予他们精神力量来承受诸如1948年战争这样的挑战。然而，当代的以色列已经没有乌托邦的梦想，没有了公社，曾经拥有的决心和承诺也只是虚有其表。没有了它们，我们还能在这里生存吗？我们还能为我们陈腐的以色列奋勇作战吗？就像德加尼亚的战士们为他们的基布兹梦想而战。当真正的艰难日子降临，我们还能保持我们的消费至上的民主吗？在伊斯兰的威胁圈子、阿拉伯人的威胁圈子、巴勒斯坦人的挑战圈子以及国内的威胁圈子之内，还有着来自精神挑战的第五重威胁。以色列的集体意识是否已经不再适应以色列的悲惨现状？

赫伯特·本特威奇曾经乘着船渡过了加利利海，而我开着车绕湖而行，途经了太巴列、塔布加和迦百农。距离古老的渔村北部几英里的地方，就是耶稣曾经教导门徒的地方，现在是殖民地罗什平纳。1897年，有一位叫伊扎克·爱泼斯坦（Yitzhak Epstein）的教师曾经定居在这里，尝试把犹太人与阿拉伯人联合起来，在同一所学校教导他们的孩子。十年后，这里是农艺学家海姆·马格里斯·卡拉瓦瑞斯基（Haim Margolis Kalawariski）的家园，他是第一批致力于实现和平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一位内科医生基甸·梅尔（Gideon Mer）就居住在罗什平纳，在他的诊所里，救治了饱受疟疾摧残的阿拉伯邻居们。但是在1937年，在罗什平纳出现了第一位犹太恐怖主义分子什洛莫·本·约瑟夫（Shlomo Ben Yosef），在他尝试谋害一辆正在驶向迦南山地的阿拉伯巴士上的乘客后，他被英国人实施了绞刑。

以色列所面临的第六重威胁是道德威胁。一个陷入无休止战争泥沼的国家是很容易堕落的。它很可能会变成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或者只是变得残忍无情。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持久的国家战争中，以色列仍然维持了大体上的民主观念和民主机构。在很长一段时间，它保持着一个合理的社会道德体系。大多数人尊重人权，支持自由与民主。但是在近几年，以色列民主的核心正承担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占领对以色列的道德造成负面影响。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和俄罗斯移民的少数群体常常并不珍惜民主观念，而是视为理所当然。对日益增长的占据人口优势的阿拉伯族群的恐惧孕育了排外情绪和种族主义。正在实施的占领、正在进行的争斗、人道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崩塌令黑暗的力量威胁着这个国家。半法西斯主义思想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吸引了一批右翼的边缘势力，现在又赢得执政党里的某些主要政治人物的支持。然而，就像2013年大选所证明的那样，以色列并没有全然地充斥着黑暗。以色列仍然拥有一个理智的中产阶级核心。然而，一场持续百年的战争引发了一场道德危机。1937年在罗什平纳爆发的残忍暴行仍然在继续。以色列仁慈民主的身份依旧在不间断地被质疑。

从罗什平纳向北进发，我抵达了约旦河。当赫伯特·本特威奇骑着马穿过胡尔达山谷时，这里住着阿拉伯人，这里还是一片浅水湖。在1947年至1948年期间，阿拉伯人被赶走。在1953年至1957年期间，湖被填平，为农业定居点铺路。在我出生的十年前，犹太复国主义克服了它在这个山谷所面对的两大障碍。随着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它清理掉了巴勒斯坦人。随着一项宏伟工程的开展，它清理掉了浅水湖，清理出一整块区域供资深的开拓者和新移民居住，落后的巴勒斯坦被现代的以色列所取代。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早期年代，它的这种双重作用成功地引领着一个新的、强大的希伯来身份属性。

这个希伯来的身份是革命性的。它把自己定义为对犹太宗教、犹太人的大离散、犹太人的被动生存状态的反抗。它坚持以希伯来的土地、希伯来的语言以及对希伯来人对未来的信念为根基。它将《圣经》的历

史视为神话，同时也忽视了后圣经时代的犹太历史和传统。它珍视进步、行动以及对生活的世俗的态度。它以一种普世的视角来小心地平衡民族热情。它的其中一个意向为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另一个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但两个都反对宗教干预政治、抵制外邦人。两个都是集体信心与启蒙运动的结合。这就是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相信它是合适的，并且说服别人它是合适的。这是一段长长的、长长的旅途，但我们必须走上这段旅途，我们还要边走边唱。我们必须上路，并且相信它并非还要好几年才降临而是立刻降临，相信它不是通向上帝而是通向我们自己，相信我们将凭一己之力实践这种新的、世俗的宗教，相信我们将凭借自己的能力，驱逐阿拉伯人、填平浅水湖、移走山峦。

在20世纪前三十几年，以色列把自己镀上了希伯来的身份。在接下来的三十几年里，这种身份保持着主导地位。它是一种真正的力量，正是它战胜了1938年的阿拉伯大起义，战胜了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战胜了1967年的阿拉伯国家。它是建立一个国家、保卫一个国家、吸纳移民定居于这片土地的力量所在。从某些方面说，它又是一个残酷的身份。它把以色列人从大离散犹太人的群体中分离出来，它切断了他们的犹太根基，令他们失去了传统，失去了文化的连续性。就某些方面而言，它是一种虚假的身份，将一个基于抑制和否定的人为身份强加于以色列人身上。失去了犹太人灵魂的深度和多样性。但是，如果犹太复国主义革命要想取得胜利，革命的希伯来身份是无法避免的。它赋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种狂妄自大的观念，但是却适合当时以色列的情况。它赋予以色列最高权力，没有这个权力以色列将无法生存。它做下这一切时并非严肃地板着脸，是高高兴兴的。它令以色列的整整一代人，高兴而乐观地走上他们需要走上的路。我们正踏上我们的旅程，他们这样高歌。我们在路上，吆么嗬嘿，吆么嗬嘿！

在20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这个希伯来的身份变得晦暗不明。到21世纪初的时候，它看起来似乎已经分崩离析了。占领、全球化、大量的移民以及非犹太复国主义的少数派势力的增长，已经磨损了希伯来的霸

权。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更加野性的、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取代了僵硬死板的生活方式。爱国主义与普救说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对大离散和宗教的世俗反抗平息了。世俗的信念遭到削弱，进步遭到削弱，集体主义的观念已然消失。就像胡尔达的苦咸水又渗透回它的河床，犹太教、犹太区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再度折返。就像曾经在这个山谷里发生的残忍行径再度出现，犹太人集体心理曾经经历的残忍行径也杀了个回马枪。蓬勃发展的以色列的自信心笼罩上了生存问题的阴影：成功，还是失败？繁荣，还是毁灭？

以色列所面临的第七重威胁就是它摇摇欲坠的身份所造成的威胁。我途经的众多基布兹就像一块画着以色列现代景观的油画布：高高耸立的桉树、挺立的苍柏、耕犁好的田地以及堆满谷物的筒仓。但是在基布兹的大门后面，已经发生了变化：公共食堂和幼儿园已经空无一人。曾经在这里的关于以色列的一切如今已不复存在。定居于这个山谷、并且很快在这个山谷站稳脚跟的希伯来文化已经不复存在。它们改变了形式，改变了特质，变成了还没有被定义的某种东西。当我离去，将山谷远远抛在身后，我意识到，这个身份问题将是核心问题。

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核心是身份的革命。这种身份革命是诱人而危险的，它就像性别的更改。在我们的病例中，手术看起来是成功的，结果看起来是非凡的。但这个病人的问题在于没有获得内在的平静，仍然处在焦躁不安的状态中。而现在，他完全崩溃了。我们的新的、暴躁的身份正崩解为大量的身份，其中一些非常脆弱、令人困惑。到那时，我们将再也不能识别出我们自己。我们将不能确定我们究竟是谁。

赫伯特·本特威奇从约旦河登上了黑门山的山腰。而我则更有野心：我的目标是山顶。越过了卡拉特宁录的十字军要塞，越过了迈季代勒舍姆斯的德鲁士村庄，越过了内夫阿提维的以色列定居点，越过了滑雪胜地的低缆车、高缆车，我抵达了黑门山上封闭的军事基地。这里海拔2 230米，我站在以色列的最高峰。

以色列有七个威胁圈，分别来自伊斯兰、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国内、精神、道德以及身份属性。我们选择了这块土地，便把我们自己置身于这七重同心圆的威胁圈的中心。然而在21世纪，尤其危险的是，自从我们抵达片土地就一直给予我们支持的力量正在遭到削弱。西方世界处在相对的经济和政治衰退阶段。大离散犹太人群体正处在人口的衰退阶段。以色列与西方开明犹太人的同盟正处在衰退阶段。而与此同时，西方势力在中东维持秩序的能力也在衰退，他们在第三世界阻止核武器扩散的能力也是如此。当伊斯兰的狂热势力日益增长，却没有多少西方力量可以站在以色列的身旁。以色列的占领、犹太极端主义以及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正在削弱支持以色列的剩余力量。

1967年，以色列占领了黑门山，并在山顶建立了一个在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基地。1973年10月6日，叙利亚攻占了这个基地，俘获了里面的工作人员。两周后，数十名以色列士兵在这个陡峭的山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让以色列得以恢复在这个最重要的山峰上的控制权。如今，大部分最尖端的科学技术都出自这个如同科幻小说一般的山顶工作站。黑门山的高科技城堡让以色列能够密切监视叙利亚以及叙利亚以外的广大区域。

因此，当我注视着山下荒芜的叙利亚平原以及身旁复杂精妙的以色列高科技城堡，我突然意识到，以色列本身就是一个城堡。就像800年之前的十字军，我们正住在一个面朝东方的悬崖之上。就像基督教的骑士们一样，我们仰赖我们高高的围墙、锋利的宝剑，是它们使我们得以生存在这个想要清除我们的地方。然而，这个现代以色列城堡的力量却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它如今的行事和感觉已经不像一座城堡。

它并非一贯如此。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尝试夺得这片土地的方式是修建乌托邦式的水塔，就在水塔下面我们兴建红屋顶的基布兹房屋，我们在祖先的土地上灌溉耕犁棕色的农田。然后，当现实受到冲击，我们通过修建带有瞭望塔和围栏的定居点来夺取土地：这些预制的要塞能

让犹太人在阿拉伯人带着敌意攻击他们的境况下仍然能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经历了一代人或者两代人，以色列便装备上了瞭望塔和围栏。就像十字军一样，它过着基于意识形态、谦逊和纪律的宗教般虔诚的生活。犹太复国主义本质的强硬刻板令我们征服了这片土地，令我们得以在这片土地上定居，令我们能够征收并保卫这片土地。

但是，在过去的一个世代里，我们的要塞是如此成功，以致它停止了发展，看起来再也不像一个要塞。每隔几年我们就会想出一个新的发明：迪莫纳、摩萨德、空军、辛贝特、箭式导弹、“铁穹”防御系统。这些发明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这些在常态下创造出来的力量将使常态永久维持。一个自由的社会和一个自由的市场给我们带来对手不曾拥有的优势。再也没有必要需求瞭望塔与围栏式的十字军精神。相反当十字军还需要集体节欲来维持他们的要塞，我们将解放和个人主义转变为我们力量的源泉。以色列的要塞已经成为一个不设防的要塞，从中产出源源不断的霸权。

但是时代正在变化。西方的逐渐衰落和东方的骚乱使天平倾向于叙利亚和东非大裂谷地带的一边。而在黑门山，这种体现几乎是直观的。旧的叙利亚消逝了，伊拉克改变了，约旦的稳固正面临质疑。就像大规模屠杀平民和使用化学武器证明的那样，残忍暴虐已经超出了人类的理解。在山顶边界迎面吹来的呼啸的风，正在变成横扫中东的十二级飓风。因此，悬崖要塞的未来暧昧不明。当我注视着赫伯特·本特威奇在1897年4月遗留下来的土地时，我不知道我们还能把我们奇迹般的生存故事延续多久。再多一代人，两代，三代？直到最终我们再也不能紧紧握住手里的宝剑，直到最终这把宝剑锈迹斑斑。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直面这样一个周边的世界——世界都拿着矛对准它，对峙了100多年。

针对以色列所面临的七重威胁，2013年有了两个戏剧化的进展。一个是新中东，另一个是新政治。

在刺激国际舆论几年后，“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注]仍然在改变着阿拉伯的世界。由埃及塔利尔解放广场革命引发的一连串事件造成了深刻、持久和惊人的影响。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以及伊拉克）半世俗的、伪现代的独裁政权的灭亡，宣告了持续半个世纪专制、腐败政权的终结。重要的民族阿拉伯国家的崩溃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殖民力量组建的、延续一个世纪之久的地缘政治现状。如今，阿拉伯民族主义让位于部落主义。面对宗教极端主义，阿拉伯的现代化走向恶化。随着阿拉伯民族国家和阿拉伯的国民一统性遭到削弱，混乱滋生。虽然阿拉伯君主专制仍然坚挺，失败的国家、极端主义运动、四分五裂的国家取代了曾经世俗而紧密团结的阿拉伯共和国。

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的泛阿拉伯梦想已经破灭，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的“不战不和”不复存在，萨达姆·侯赛因（Sadam Hussein）、哈菲兹（Hafez）和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ssad）推行的残酷的复兴世俗主义已经消失。目前，尚不清楚像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利比亚这样的国家是否还能维持他们的民族身份。在20世纪结束后不久，曾经在20世纪挑战犹太复国主义的巨大力量就分解了。

显而易见，这些重要的变化在短时期内提高了以色列的战略地位。随着这个犹太国家证明自己是西方国家唯一可靠的中东盟友，它重新赢得了某些旧有的正统性，并再次被视作一个有价值的资产。随着高科技的以色列与其衰落的邻居们之间的军事鸿沟的拉大，它再次恢复了作为区域主导力量的地位。当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和埃及陷入持续混乱，旧有的一场全面常规战争爆发的威胁也随之减小。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激烈斗争让阿拉伯新兴的宗教势力疲于奔命。大部分阿拉伯人的注意力都倾注在阿拉伯内部的问题上，暂时消减了他们危及以色列生存的能力。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寄希望于以色列，希望以色列能够把他们从激进元素中拯救出来，因为现在这些激进元素直接威胁到他们的未来。因此现在，朝气蓬勃的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看起来比它100年来的对手——衰落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要团结得多、有效得多。由贝

尔福勋爵在1917年11月2日签署的宣言，已经被证明——到目前为止——要比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及查尔斯·弗朗索瓦·皮科特（Charles François Picot）在1916年5月16日达成的协议要更为切实可行。1916年的协议把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与法国之间的阿拉伯土地进行了划分，由此而定义出现代的阿拉伯民族国家。诚然，以色列是在暴风骤雨的海洋中孤独矗立的一块礁石。但是在它出现的66年后，这块礁石似乎远比它周边的水域更为稳固。

然而，从长远来看，新中东可能要比旧中东更加危险。如今，和平已经毫无希望：没有一个拥有必要合法性的温和派的阿拉伯领导人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实体签署一项终止争端的新协议。而现在，即便是基于威慑的稳定也很难保持：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足够稳定和强大到可以保证边界稳定和长治久安。现在，以色列将最终成为阿拉伯世界替罪羊的风险正在增加：如果伊斯兰的政治力量不能实现它的承诺，如果民众们继续奋起反抗它，宣泄这种愤怒的简单方法就是将之转向他们隔壁的、生活得异常繁荣和自由的异教徒身上。

精良武器落入狂热分子手中的危险正在增加，他们非常渴望将这些武器用在这个犹太国家身上。简而言之，随着阿拉伯军事力量的旧威胁的衰落，新的威胁就是阿拉伯世界的混乱。令人不安的情况正是阿拉伯的混乱和伊斯兰的狂热正在敲响以色列的大铁门。来自以色列国外的伊斯兰阿拉伯的普遍不满和来自国内的令人绝望的巴勒斯坦动乱，它们结合起来是令人震惊的。以色列树立高大（科技的）围篱和威武（物理的）城墙的能力是令人敬畏的。近几年的情况表明，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高大的围篱和威武的城墙是有效的。但是在将来，这种重重包围的孤岛策略将耗尽它自身。总有一天，这块坚固的礁石将被区域性海啸的愤怒波涛击得粉碎。

新政治是以色列2013年大选戏剧性的结果。富有魅力的电视明星、中立派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以及年轻的软件企业家、民族宗教

主义的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 Bennett）的惊人成功，重塑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投票中，2011年社会抗议运动的反资本主义情绪转变成了压倒性的反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票选优势。以色列中产阶级不再奋起反抗金融寡头，他们反抗的是宗教极端分子和尸位素餐的政客。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断缩水的犹太复国主义多数派突然振作了起来，阻挡着不断扩张的非犹太复国主义的少数派，并尝试抓住对这个误入歧途的国家的控制权。一种新的力量浮出了水面。一些令人吃惊的事件正在发生。以色列新的政治游戏，其名字就叫新政治。

拉皮德以组建一个新政党的方式启动了他的竞选——他成立了未来党（拥有未来，Yesh Atid，There Is a Future）。他的成功引发了对未来党现象的讨论，未来党是新政治的核心，但还没有适当的定义。以下是未来党的一些特征：拒绝旧有的左右翼划分；故意漠视巴勒斯坦问题、伊朗核威胁以及以色列所面临的外部挑战；加强对普通以色列人日常生活的关注（主要关注高额的生活费用和不断飙升的房地产价格）；厌恶特殊利益集团和享有特权的少数派，因为他们没有与公众分享利益；赞扬工作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肩负为保障以色列继续航行的军事和财政负担；奉承实用主义的、理智稳健的以色列身份。

未来党的政治基础就是那些辛勤工作、纳税、服兵役的以色列犹太人，这正是丹·本·戴维在前一段时间对我提及过的。在未来党中，这些从事生产的、中间派的以色列人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声音，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图标。在这个拉皮德缔造的政党里，这些理智的以色列人可以看到能够将犹太国拉出泥沼、引领它前行的火车头。因此，2013年的大选唤起了希望；因此，变革正在空气中酝酿的感觉鼓舞人心。

确实，这种变革在空气中扩散。尽管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的拉皮德因其保守的紧缩预算而受到批评，他仍然是这番变革的一位强力代理人。改革无处不在。一阵社会运动和经济复兴的浪潮登上了当代以色列公共生活的中央舞台。开始尝试征募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改革政府、限制垄

断的能量、削弱工会，以及促进更为公正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新想法是残酷的撒切尔主义的，但其他主张都是基于平等主义的。然而这种对政治的活跃态度经常被平民主义所感染。大部分主张都是被立即取悦广大民众的渴望所驱使，代表着资产阶级政治的自我满足和利己主义。而这远超过一些带有敌意的、针对弱势的少数派的反自由主义。这些党派政治的运作方式带上了一些不民主的污点，其对目前占领状况的默许令人担忧，其对阿拉伯世界的兴趣缺失更令人惊恐。尽管新政治已经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复兴中的以色列的新图景，但还不明确在这幅图景之后，真正埋藏的是什么。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好消息，就是以色列日益比它的邻国强大，以及以色列决定变革它自身。但这个十年里的坏消息就是，中东地区正在扩张，而以色列已经背弃了中东。军事和技术上的优势已经让新的以色列变成古怪的孤立状态：他们只关注内部，他们忽略了他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巴勒斯坦人现在变成了被刻意回避的屋子里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注]，没有人敢谈论。临近的阿拉伯国家以及广阔的伊斯兰世界仿佛隔着几千英里远一般。危险的地缘政治的回避和地缘政治的满足，让以色列再一次地陷入了极端的自鸣得意中。

作为犹太人，我们从来没有生活得这般好。20世纪是犹太民族戏剧化的历史中最戏剧化的年代。这个世纪的前半叶是我们所经历的最残酷的时期：我们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民，每三个犹太人中就有一个离去。但是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却是令人惊叹的。在北美，我们创造了最完美的大离散犹太人；而在以色列的土地上，我们建立了现代的犹太主权国家；在欧洲、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犹太人同样过着优越的生活。21世纪的犹太人拥有着他们的曾祖父母只能在梦境里才能拥有的东西：平等、自由、繁荣、尊严。我们曾经是被迫害的人民，而现在我们获得了解放。曾经令人怜悯的人民现在赢回了骄傲。我们获得了充实我们自己、充分享受生活的能力。一场史无前例的犹太人的文艺复兴令三代犹太人相信他们逃脱了犹太人的命运。在美国，一项引人注目的工程已经

完成：一个组织严密的、自由的、由精英实施管理的犹太人社会已经建成。在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成就非凡。犹太民族解放运动赋予了犹太人民他们曾经被剥夺的基本权利，赋予了他们曾经失去的生活期待。它征服了一片土地，解放了一个民族，进行了一场与众不同的革命。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革命会比特拉维夫港的革命更加明显。就在这里，雅孔河的南岸，第一届犹太人奥林匹克运动会——马加比厄运动会——于1932年春天在这里举行。短短几周之内，一个体育馆被匆匆搭建起来，数千名的观众在这里聚集，观看从21个国家来到巴勒斯坦的数百名运动员，他们要证明，20世纪的犹太人是一个全新的犹太民族：运动的、健壮的、强大的。就在这里，马加比厄体育馆以南，特拉维夫的第一届国际博览会——黎凡特展销会——于1934年春天在这里举行。仅仅在8个月的时间里就竖起了一栋包豪斯风格的建筑，36个国家的2 200家公司在这里展示他们的商品，展示他们对现代特拉维夫的信心。大约60万的参观者前来观看了这个奇迹：在雅孔河的南岸上，中间东方的场地，竖着一只飞驼——这是黎凡特展销会的会标，证明其建筑和杰出的商业连接着西方和近东。在黎凡特展销会的西边场地，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36年夏天建立的第一个港口。短短几个星期，一栋海关大厦竣工，包括众多的仓库和一个木头搭建的码头。码头上，第一个希伯来码头工人扛着第一个水泥袋走进第一个希伯来城市的第一个港口。数千人聚集在他的身边，高唱着充满希望的国歌《希望之歌》，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之情。七个月之后，当巴勒斯坦爱乐乐团（Palestine Philharmonic Orchestra）第一次音乐会举行时，他们再一次在简易大厅里唱响了《希望之歌》。当反法西斯主义的阿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指挥着法西斯主义下的65名幸存者，在特拉维夫的海岸奏响勃拉姆斯、门德尔松和舒伯特的作品时，很多观众热泪盈眶。两年后，一名前俄国的革命者在简易大厅的北面开设了一家里程碑式的电站。在短短九个月的时间里，这位灵巧的工程师平夏斯·罗滕伯格（Pinchas Rotenberg）带领着他的1 000名工人夜以继日地工作，成功建造了雷丁电站，加速了这片土地的电气化，为快速发展的特拉维夫提供了电力。

与此同时，在雷丁电站以北，这座第一个希伯来城市的第一个机场里的第一条跑道铺设完毕。1938年秋天，第一架国际航班升空：从特拉维夫途经海法到达贝鲁特。在这块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小区域里，在六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六起不同的大事件，每一件都足以称得上是一个传奇。在特拉维夫的北部边缘，奠定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的、富有创造的、至关重要的、热爱生活的犹太人生存的地基。

我选择从机场向南走。漫步在跑道与大海之间的长廊上，恰巧碰上一家高新科技的公司员工出游。20个戴着头盔的男人和女人骑在红色轮胎的赛格威电动车上。在他们身后是骑着自行车的人，他们穿着无袖T恤和莱卡短裤，表情坚毅。清晨的慢跑者显得更为轻松：有结婚的夫妇，有男性的同性伴侣和女性的同性伴侣，他们装备着带荧光的跑步设备。我看到穿着溜冰鞋的苗条姑娘、固执己见的退休者以及业余的垂钓者。我面前、地中海的海岸上坐落着以色列的中央公园，这里是中东的汉普特斯西斯公园（Hampstead Heath）——四周萦绕着只有自由的社会才能给予其公民的寂静和安宁氛围。在这里，有着犹太人两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幸福感。

20世纪30年代，在这几百英亩的土地上成就的六项事业奠定当代特拉维夫的根基。他们孕育了主动、勇敢、活泼、创造、智慧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但他们的体现有所不同。马加比厄运动会和黎凡特展销会，是充满希望的。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在这里改变，我们赢得胜利。但是港口、乐队、电站和飞机场是诞生于危险之上的成就。它们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聚拢的阴云之下，发生在德国的威胁和阿拉伯的威胁之间，发生在欧洲预计到的灾难和开始于巴勒斯坦的战争之间。当前两项奇迹发生时，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视野；当后四项成就发生时，面对的是残酷历史的钳形攻势的迫近。

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就以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令人惊叹的能量为特征，但这个特征在1936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那时起，犹太

人在巴勒斯坦的生活就变成了一场艰苦的战斗：加强对抗命运的信念，与命运搏斗，付诸行动。因此，挖掘港湾、演奏门德尔松、建设电站、铺设跑道，此时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兼具了英雄主义和悲情。

这个电站令我着迷。在后来的日子里，电站被添加了某些丑陋的结构。但1938年的原始建筑物是朴素而宏伟的。罗滕伯格的建筑师们所选用的里程碑式的国际风格突出了现代的力量。尽管20世纪30年动荡不安，但是使巴勒斯坦走向电气化的涡轮机仍然被安置在雅孔河北部河岸的神社里——这是在几个月内建立起来的。但是特拉维夫故事的意义并不止这些。在阿拉伯大起义切断了特拉维夫与雅法港之间生命线整整一个月后，特拉维夫修建了一个木制的码头。在它竣工的当天晚上，它就被冲到了海里，但很快就被一座坚固的铁制的码头所取代。但是这还不够。特拉维夫修建了一条防波堤，并修建了更多的码头。在被围困六个月后，这个城市从自己的码头送出了第一箱柑橘——送往白金汉宫。通过这样做，它整合了犹太复国主义对抗那些意图毁灭它的行动模式。它并不是用恐惧回应恐怖，而是用建设回应恐惧。它表达了一个年轻国家坚决战斗的生命冲动，并相信它想要生存下去的信念将克服环绕它四周的死亡氛围。

我站在温暖的瀑布旁，它从电站落入地中海。当又一个骑着自行车的队伍从我身边经过时，我思考着，我们身上是否还有在特拉维夫修建电站、开挖特拉维夫港口的坚韧刚毅。因为如果要面对落于我们身上的七重威胁，我们需要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智慧、能量和献身精神。我们需要的是主动、勇敢、活泼、创造、智慧，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作为个体，这些所有的特征都体现在“是的，我们能”的精神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拥有如此引人注目的创新和如此出色的别出心裁。但是作为一个集体，我们看起来已经失去了我们所有曾经拥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民族国家功能严重失调，我们的政治是如此的可怕。如今，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自由但是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所以关键问题是，这个出现在这里的自由社会，是否可以产生足够大的力量来抵御危及它的外部和内部

威胁。

过去的经验是令人鼓舞的。一次又一次，我们奋起迎接挑战。这种克服威胁的模式不断重复着，甚至在21世纪最初几年的特拉维夫港也是如此。2002年，一波恐怖主义袭击以色列。每个月因自杀式炸弹袭击而遇难的人数多达数十人。整个国家吓得目瞪口呆，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然而，就在街头血迹未干之时，一个新的倡议就被提出来——翻修历史悠久、被忽略多年的港口。两年之内这些废弃的旧仓库就变成了繁荣的休闲场所建筑群：商店、咖啡馆、餐厅、酒吧、夜总会。就在这个地方，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战胜了阿拉伯人大起义。将近70年后，这种以色列的精神又战胜了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暴动。所以，现在的挑战是战胜我们内部的弱点。我们有寄予厚望的充分理由。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如果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能够被统一到我们的现代社会中，这将带来一股类似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大移民所带来的能量。如果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能够融入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并被赋予他们应得的平等，他们可能更喜欢民主以色列为他们提供的平等，而不是巴勒斯坦和伊斯兰的激进政治运动所提供的。如果对近海天然气的意外之财（这很快让以色列成为能源富裕国，并使之更加富裕）进行适当的投资，这将为一场真正的内部革命提供大笔资金，而以色列共和国将得到复兴。就像2013年所证明的那样，以色列并非失去了一切。它还拥有理智，还拥有建设性的态度和前进的深切愿望。当越来越多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现代正统犹太人以及俄罗斯移民接受这个犹太民主国家的准则和民族精神后，反民主的势力将会平息。

我穿过雅孔河进入港口。尽管还是早晨，但木夹板上的咖啡馆中已经熙熙攘攘。我周围都是漂亮的女人和男人，健康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们，年轻的家庭和年轻的单身人士。他们吃着欧式早餐、有机早餐和以色列早餐，呷着他们的双倍浓咖啡、金巴利开胃酒和香槟。我看到了自行车、小轮摩托车、滑板和婴儿车。一束束氦气球，它们的彩色铝制护鞘在日光下闪闪发光。这是一幕正在上演的哑剧，这是一场即兴的手风

琴演奏会。这是一杯鸡尾酒：在蓝色地中海背景布之下的移民社会和武士社会。犹太人的历史、以色列的现在和蓝色的天空。痛苦的基因在这里绽放出喜悦快乐。律法研读的基因在这里迸发、创造。生活在边缘，生活在水边。

我登上甲板，经过一家时髦的瑜伽俱乐部。一位年轻的母亲走过，穿着名牌的紧身牛仔裤和红色的全明星运动鞋。当她走进去后，她将橘色婴儿车推到另外十几部婴儿车旁边，加入了其他母亲的队伍中，做起瑜伽中产后恢复的仰尸式。这里充满了活力，这里充满人类的希望。这是几乎灭绝的种族的自我复苏。不像欧洲的自由社会，以色列的自由社会是再生的。我们的自由社会不关乎政治不满和道德败坏，而是关乎温暖和家庭。我们的自由社会热爱孩子，将他们带至这个严酷的世界，让他们在面朝大海的彩色垫子上爬行。就像我看到的那样，以色列就是未加工的钻石。以色列就是破碎的彩色万花筒，各种身份汇集起来形成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不知何故，一些不可思议的迹象在这个既古老又新潮的国家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情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仅仅是创造的、革新的，我们还是真实的、直接的、温暖的、真诚的和性感的。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人际关系是独特的，这里的人际往来是引人注目的。归根结底，以色列是无家可归的。尽管他们彼此不同，尽管他们属于对立的部族，这些在海滩聚集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仍然结成了一个庞大的、奇特的、声音洪亮的、多元化的大家庭。

我的孩子正向我走来，22岁的女儿塔玛拉带着9岁的迈克尔和4岁的丹尼尔。两个穿着花哨紧身衣的划船手划着他们的赛艇出海，丹尼尔冲他们大声呼唤，迈克尔挥着手，塔玛拉放声大笑。当我沿着码头往回走，我突然意识到，都在这里了。这个在错误的地方匆忙修建这个港口，这个不合理工程，它不能把这个浅水港变成深水港，不能为这个小小的人工港口提供庇护，以阻挡冬天充满破坏力的波涛。整个事情从一开始就不该发生。整个工程在地理位置上是有缺陷的，在经济上是无意

义的，在计划上是不周密的。但是因为它是引人遐想的，不曾拥有特拉维夫港股份的数千人加入了特拉维夫港的修建。因为它是对一种深层次心理需求的回应，数千人修建起特拉维夫港。最终，这股涌出的力量创造出远超过其缺陷的东西。因此，尽管特拉维夫港发挥其预期作用的时限只有短短三年，它仍旧成为彰显我们独立、创新和活力的一个标志。每一代人、每一波移民都将再次认识到这一点。而现在，它成为这样一个嘉年华。数千的以色列人在这里歌颂生活，享受生活。迈克尔勇敢地跑在我的前头。丹尼尔尝试与他的哥哥竞争。塔玛拉加入了她弟弟们的队伍。在港口流淌的金色阳光下，赫伯特·本特威奇孙女的孙辈们在木质的甲板上欢快地奔跑。对这个世界的一切毫不在意，对成为一个犹太人毫无负担。就像过去不曾有过迫害，未来也不会有迫害。就像过去不曾有过大屠杀，未来也不会有大屠杀。他们的脚下是坚实的土地。他们身处自己的家园。

我们以色列人面临着赫拉克勒斯一般的艰巨任务。为了在这里居住，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义一个国家，不得不划分土地、讲述一个新的以色列犹太人的故事。我们将不得不恢复一个破败的国家，统一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培养一个值得信赖的平民领导集团。在结束占领后，我们将不得不在新的边界竖起一道新的、坚固的、合法的铜墙铁壁。面对区域内的宗教激进主义的浪潮，以色列将不得不成为教化的孤岛。面对七重威胁圈，以色列将必须成为一个符合道义、进步、紧密团结、富有创造性的强大的以色列。当我们在雅孔河的港口创立这个现代的勇敢工程之时，我们已经没有其他办法，除了更新我们在这里发起的一切。我们的生存之战仍然在延续。

当塔玛拉带着迈克尔和丹尼尔回家，我继续前往雅法港。近几年，这个港口也经历了改造，现在有了画廊、餐厅、酒吧。一个关于未来的金属架构取代了古旧的阿拉伯仓库，但几十条木质的渔船仍然在古老港口后的平静水面微微晃荡，这里就是赫伯特·本特威奇在1897年4月登陆的地方。

我们也许必须得来到这里。而当我们抵达这里时，我们带来了奇迹。不管怎样，我们做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我们上演的是最奢华的现代戏剧。这个剧目是激动人心的。但直到最后才有可能正确地认识起始点。只有我们知道了主人公已经经历了什么，我们才会知道他是对还是错，才会知道他是战胜了还是屈服了悲剧的裁决。

这里不再有乌托邦。以色列将永远不会成为它起初规划的理想国，它也永远不会脱离欧洲。这里不会有伦敦、巴黎或者维也纳。但是，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进化出来的东西将永远不会消失。一系列伟大的反抗在这里创造出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它鲜活、热烈、迷人。这个自由的社会富于创造、富有激情和狂热。它赋予在这里居住的人们以独特的生活品质：温暖、直接、开放。诚然，我们都是孤儿。我们没有国王，也没有父亲。我们没有一致的身份，也没有连续的过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没有市民文化。我们的魅力是来自野性的半野蛮的魅力。这是未经束缚的、粗野的年轻魅力。我们不尊重过去，不尊重未来，也不尊重权威。我们是不敬虔的。我们的内心深处是没有秩序的。然而，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都是孤单的，我们因此而联结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孤儿，我们就成了命运路途上的手足兄弟。

这里期望和平，但是这里没有和平，至少不会很快迎来和平。这里期望安宁，但是这里没有安宁，至少在这一代没有安宁。我们建立的家园，根基是摇摇欲坠的，不断的地震在动摇它。因此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真正拥有的东西是不断前进的冒险，是一场长途的奥德赛征程。这个犹太国家不像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为它的国民提供的不是安全、幸福和内心的平静，它提供的只有生命岌岌可危的强烈感觉，是生活于危险、贪婪和极端的肾上腺素刺激。如果一座像维苏威那样的火山在今晚突然爆发，终结我们的庞贝城，被惊呆的就是这样一支鲜活的民族。这支民族从死亡走出来，活在四面环绕死亡的处境里，然而，它却创造了生活的壮观奇景。这支民族不停地跳着生命之舞，直到末日降临。

我走进几周前曾来过的同一间酒吧。再一次地，我坐在吧台边，呷着我的单一麦芽威士忌。我透过窗户注视着古老的港口，我注视着人们坐在餐厅里，在画廊里漫步，在码头徜徉。我认为，就其底线而言，犹太复国主义是要复兴犹太人的活力。以色列就是一部排除万难仍然生机勃勃的传奇。所以这样的二元性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们是你能想象的最平凡和最棘手的民族。我们不能容忍清教徒般的拘谨或者多愁善感。我们不信任激情的演讲或者高大上的概念。而我们每一天都沉浸在惊人的历史视野中。我们参与的事件远远比我们自身更重要。我们是一部史诗电影中的一个衣衫褴褛的角色，我们不知道，也不能领会我们要经历的情节。编剧已陷入疯狂，导演已经逃离，制片人已经破产。但我们仍然在这里，在这幕《圣经》化的背景之下。摄影机仍在旋转。随着摄影机的摇摄和升降，它记录着我们在这片海岸汇集，在这片海岸坚守，在这片海岸生活。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就在这里。

---

1. 《旧约·创世记》第12章第1节，“Now the LORD had said unto Abram, Get thee out of thy country, and from thy kindred, and from thy father's house, unto a land that I will shew thee.”译为“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2. 或译碎玻璃之夜，是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党员与党卫队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的事件。被认为是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

3. 立陶宛维尔那城郊的一个地方，立陶宛犹太人被驱赶到这里，然后被全部枪杀。

4. 基辅市外的一条深谷，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西部。该城市的犹太人于1914年被德国军队杀害。

5. 波兰卢布林城东南4公里。“二战”时，纳粹德国在此设立大规模死亡集中营，先后囚禁过26个国家的15万公民，死难者达8万之多。

6. 波兰的卢布林城索比堡村附近。建有犹太人集中营，约2.8万名犹太人在此遇难。

7.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距汉诺威州采勒（当时属普鲁士）西北16千米处的贝尔根和贝尔森两村附近。1943年7月建立，部分为战俘营，部分为犹太人转运营。从1940年到1945年，这里关了大约12.5万人，约7万名被关者遭到杀害。纳粹用推土机将尸体推入万人坑掩埋。安娜·弗兰克于1945年3月死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内，她的战时日记《安娜日记》后来轰动了全世界。

8. 达豪集中营，距慕尼黑市20千米，从1933年到1945年间，共登记在押206 206名囚犯，包括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等反对党人、同性恋、犹太教徒、吉普赛人、政治

犯、国家敌人、犹太人、战俘。从1933年到1945年间，共登记在押206　206名囚犯，死亡人数永远不会为世人所知，有记录的死亡统计数字是31 591人。

9. 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灭绝营，距离华沙到比亚维斯托克主干线上的马乌基尼亚火车站2.5英里。建于1942年夏初，是赖因哈德行动的一部分，纳粹计划通过该行动灭绝普通政府地区（波兰的内陆地区）的犹太人。总共约870 000人在特雷布林卡遇害。

10. 1944年，曾被关在集中营、后冒险逃出的简·卡思基辗转来到美国，向罗斯福总统揭露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和焚尸炉等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真相。

11. 伊尔根（Irgun），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时期进行地下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右翼组织。

12. 指为了生存，犹太人将不得不建立一支“铜墙铁壁”的军事力量，直到阿拉伯人接受了他们的国家。

13. 《旧约·创世记》第28章第12节，雅各“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之后神显现，将雅各躺卧之地赐给雅各及其后裔。

14. 失败国家，意指一个被认为未能满足和履行某一些作为主权政府应有的基本条件和责任的国家。

15. “阿拉伯之春”运动，又称“阿拉伯的觉醒”、“阿拉伯起义”，是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暴力运动。

16. 形容明明存在的问题却被人刻意回避。

致谢



如果不是我的妻子、我的至爱、我的灵感来源——汀娜·罗森赫玛（Timna Rosenheimer），这本书将不会问世。在写作的五年时间里，我没有很好地担负起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职责，而我的生活伴侣一直用勇气、温暖与恩赐支持着我。我对她欠下的债是永恒的。

加利亚·里希特（Galia Licht）是我写作搭档。她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以及初步的编辑工作，她让我的写作过程非常愉快。这本书中的所有闪光点都有她的功劳。

辛迪·施皮格尔（Cindy Spiegel）是一位来自施皮格尔和格劳出版社（Spiegel & Grau）的乐于助人的编辑，她大胆地决定信任我，相信我确实能在书中写出她预想中的以色列。辛迪的支持和指导贯穿我的整个旅程，她杰出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敏感为原始文本提供了所需的塑形和准确性。

我还需要感谢另外两名将本书带入这个世界的助产士。缇娜·贝内特（Tina Bennett）不仅仅是我亲爱的代理人，同样也是我的守护天使。在我们遭遇的所有困难和障碍中，她一直以亲切的态度来帮助这本书，也帮助我。朱迪·福利吉特（Judy Friedgut）不仅仅是我亲爱的秘书，还是我站立的双腿。她拥有我所缺乏的纪律性和明晰的条理，她夜以继日地工作，使这一切美梦成真。

我亲爱的朋友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以他特有的职业水准为我检查了手稿，并贡献了宝贵的意见。他是鼓励我撰写这本书的人，他也是自我创作伊始就亲切地关照本书的人。在我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是我亲爱的内兄吉利·罗森赫玛（Gili Rosenheimer）给予了支持。同样支持我的还有老友加比·平克（Gabi Pikker）和阿维·伊利亚胡（Avi Eliahu）。对这三位我致以诚挚的感谢。感谢那坦基金会（Natan Fund）可以接受这部手稿，并授予其最佳图书奖，对此我深表感激。伊斯特·艾什洛夫（Ester Asherof）做了最后的研究工作。我的唯一，塔玛拉·沙维特也贡献了她的力量。在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在想，这就是塔玛拉的未来，也是她的弟弟们——迈克尔和丹尼尔的未来。

《我的应许之地》是基于对以色列人——包括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男人和女人——的大量采访和讨论。他们都打开家门，敞开心胸，同我分享他们的以色列经历。因为他们人数众多，我无法在这里一一致谢，但是，我确实深深感谢他们中的每一位人。这些与我同胞们的亲密而热情的谈话，赋予了我关于我们挚爱而饱受摧残的家园的独到见解，而这正是我要讲述的故事。

资料来源



《我的应许之地》并非是一篇关于历史的学术报告。相反，它是一个人穿越当代以色列和以色列历史的个人旅程，通过几十个具体的、深远的、辛酸的以色列人的故事来详细讲述大以色列的传奇。

“一见钟情”是基于本特威奇家族的家族文献、赫伯特·本特威奇自己撰写的文稿、一些他留在旅伴处的笔记，以及当时发表在犹太人英语出版物和希伯来语出版物上对1897年马加比朝圣团的描述文章。

“步入深谷”的资料包括对伊扎克·塔本金的信徒的一些访谈，以及艾因哈罗德档案室里数目庞大的记录和回忆录。

“柑橘园”一章的灵感来自与雷霍沃特诸位年老的柑橘种植者的大量谈话，他们在21世纪初仍然健在，还有雷霍沃特档案室里的地方志。

“马萨达”一章中关于旅行和学习班的资料是基于1992年我对什马利亚胡·古特曼进行的采访，以及1942年春天在劳工运动报纸和期刊上发表的文章。

“吕大城”章节整合了大量的创伤性事件的记述，它们都是20世纪90年代由穆拉·科恩（Mula Cohen）、什马利亚胡·古特曼、伊斯里尔·格劳尼克（Yisrael Goralnik）、加百利·科恩（Gabriel Cohen）、雅艾尔·德加尼（Yael Degani）、奥特曼·阿布·哈曼德以及其他1948年悲剧的事件

参与者所提供的。

“供给房”一章讲述我采访的大屠杀（或者大迫害）幸存者的人生故事——来自泽夫·斯坦赫尔、阿哈龙·阿佩菲尔德、阿哈龙·巴拉克、露易丝·安纳齐、安娜·施皮格尔、阿里·贝尔德伦、耶胡底·费希尔、什洛莫·泰歇以及其他比萨隆供给房社区的居民。

“核工程”一章的核心来自我与约瑟夫·塔里曼（Yosef Tulipman）在2009年的不寻常的会面，他是迪莫纳核反应堆在关键性的1965年至1973年期间的迪莫纳基地的局长。

“定居点”一章是对关键性定居点奥弗拉的建立的复原，基于2009年至2011年期间我对约尔·宾·努恩、平夏斯·沃勒斯坦、耶胡达·伊曾、伊斯雷尔·哈雷尔以及其他奥弗拉建立者的采访。

“加沙海滩”首先发表在1991年的《国土报》和《纽约书评》上，那时，我刚刚在臭名昭著的拘留营服完兵役。

“和平”一章的材料来自我在2008年至2011年期间对约西·萨里德、尤西·贝林、阿维赛·马格利特、梅纳赫姆·布林克尔、阿莫斯·奥兹的采访，以及更早的对贾马尔·蒙赫尔的访谈（1993年）。

“我控诉”是阿里耶·德里向我讲述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生故事，来自我对他与他的母亲的访谈，以及他的个人传记和以色列杂志描述他20年生活的文章。

“性，毒品及以色列的现状”是关于特拉维夫夜生活全面的、最新版本的片段景观，在上一个千禧年接近尾声之际我发表于《国土报》上。

“上加利利”同样最先发表在《国土报》上，时间是2003年1月。

“现实的冲击”体现了2006年我亲身经历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的

真实感悟。

“占领罗斯柴尔德”基于我对迈克尔·斯特劳斯、科比·里克特、伊奇克·施穆里的深入访谈（2007~2011年），以及与斯坦利·费希尔和丹·本·戴维的谈话（2011年）。

“生存挑战”出自阿莫斯·亚德林对伊朗事件的解释，这是他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向我描述的，此外还有一些我自己的见解。

“在海边”一章包括了这几年的行程临近结束时，我在家乡旅行所观察到一小部分现象。

在追寻我的以色列之旅的过程中，无论是古老的以色列还是新式的以色列，我阅读了数百册的书籍和数千份的档案文献，这些材料赋予我灵感，丰富了我的感悟。为了确保所有的细节都是正确的，我用文献史料对口述史料进行了核对和再核对。采访具体个人的兴奋过程，与数据收集和事实核查的细致过程交织在一起。然而，当此书完本之际，《我的应许之地》关乎所有的人。我撰写的这本书是每个以色列人看到的以色列传奇，而我是其中之一。

照片来源



第VII页：米哈·巴–艾姆提供/玛格南图片社

Courtesy of Micha Bar- Am/Magnum Photos

第2页：美国殖民地/马特森精选集，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供

American Colony/Matson collection, courtesy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第24页：亚伯拉罕·索斯金/拉冯学院档案馆，特拉维夫

Avraham Soskin/Lavon Institute Archive, Tel Aviv

第48页：美国殖民地/马特森精选集，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供

American Colony/Matson Collection, courtesy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第68页：阿扎里亚·阿龙提供

Courtesy of Azaria Alon

第96页：本诺·罗森伯格。照片版权为本诺所有

罗森伯格的著作权只属于以色列梅塔有限责任公司

Beno Rothenberg. The copyright of the photograph of Beno Rothenberg belongs solely to Meitar Collection Ltd., Israel

第130页：罗伯特·卡帕提供/玛格南图片社

Courtesy of Robert Capa/Magnum Photos

第170页：《泰晤士报》/北爱尔兰辛迪加

The Times/NI Syndication

第196页：米哈·巴–艾姆提供/玛格南图片社

Courtesy of Micha Bar- Am/Magnum Photos

第222页：摄影者佚名/档案馆：GPO，耶路撒冷

Photographer unknown/Archive: GPO, Jerusalem

第234页：波阿斯·拉尼尔提供

Courtesy of Boaz Lanir

第268页：摩西·米尔纳/档案馆：GPO，耶路撒冷

Moshe Milner/Archive: GPO, Jerusalem

第296页：帕维尔·瓦尔贝格提供

Courtesy of Pavel Walberg

第312页：阿姆鲁·伊利–阿巴里/ Zochrot组织，特拉维夫

Amr El-Abari / Zochrot Organization, Tel Aviv

第326页：戴维·塔特科瓦提供

Courtesy of David Tartakover

第340页：伊利达·拉法里提供

Courtesy of Eldad Rafaeli

第366页：戴利亚·阿莫茨，特拉维夫戈登画廊提供

Dalia Amotz, courtesy of the Gordon Gallery, Tel Aviv

第384页：泽夫·柯恩提供

Courtesy of Ziv Koren